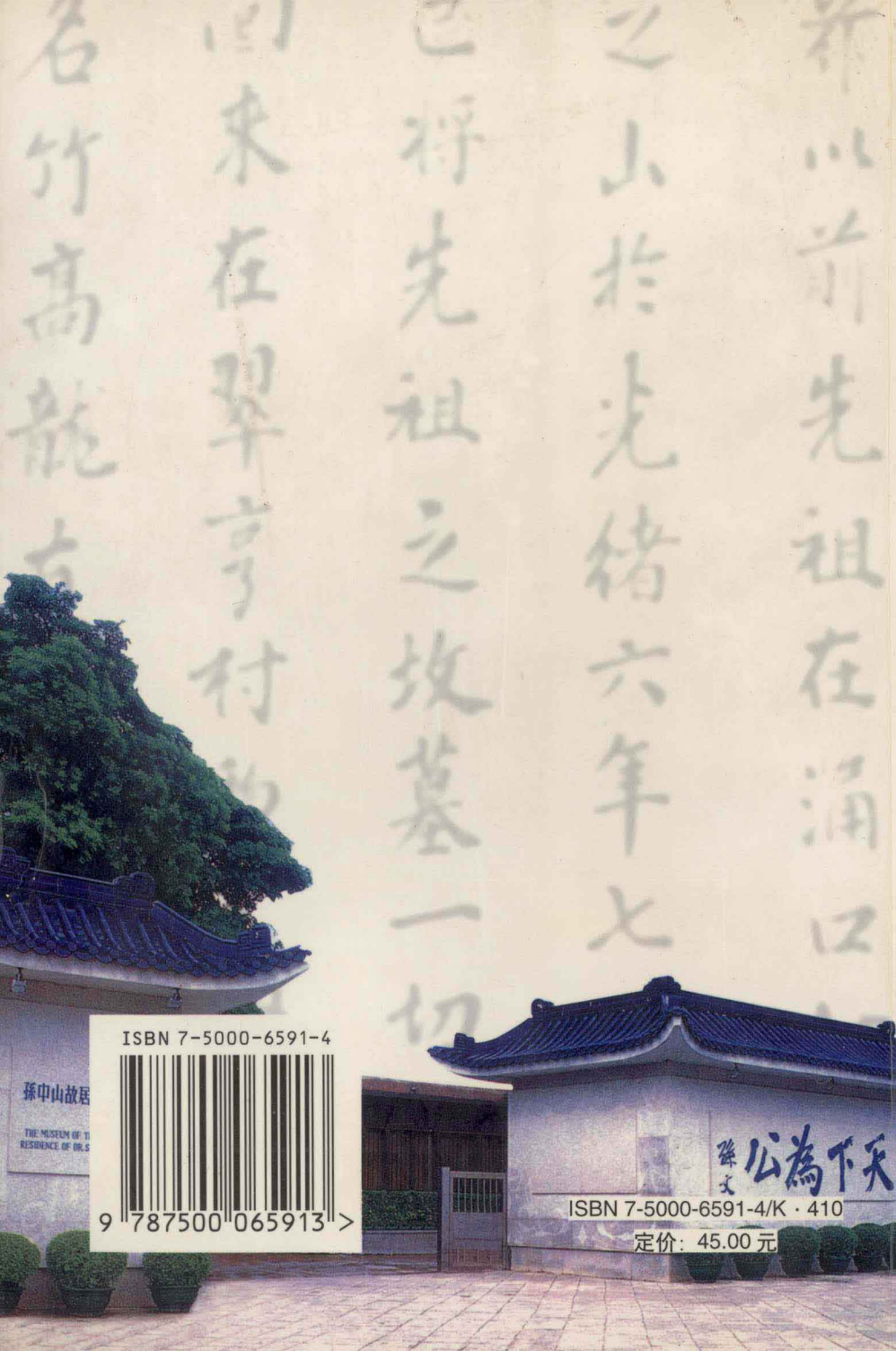
孙中山的家世

资料与研究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ISBN 7-5000-6591-4

9 787500 065913 >

ISBN 7-5000-6591-4/K · 410

定价：45.00 元

孙中山的家世
资料与研究

中国　翠亨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11
ISBN 7-5000-6591-4

Ⅰ．孙… Ⅱ．孙… Ⅲ．孙中山(1866～1925) 家族
－研究 Ⅳ．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810 号

责任编辑：吕建华 朱杰军
编 审：孙关龙
装帧设计：吕建华 刘晓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编：100037）
网址：http://www.ecph.com.cn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23 字数：536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00-6591-4/K · 410
定价：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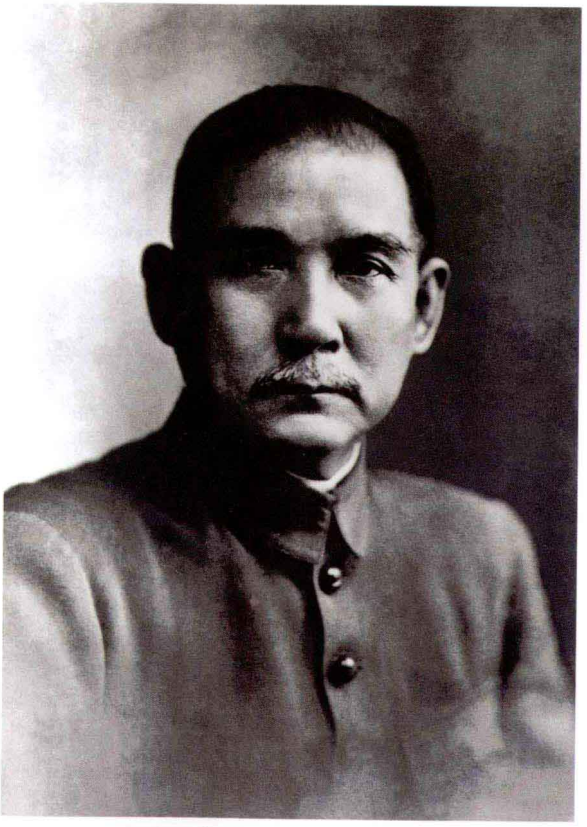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纪念

辛亥革命90周年

孙中山先生诞辰135周年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THE MUSEUM OF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DR. SUN YAT-SEN


孫文
天下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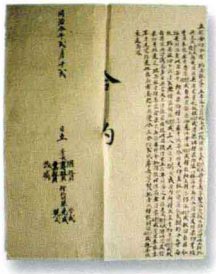
图版一　《孙氏家谱》(翠亨)封面（原件藏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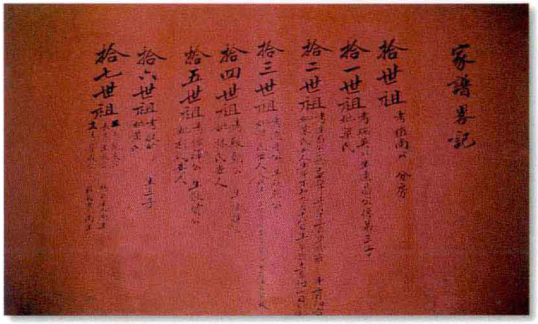
图版二　《孙氏家谱》(翠亨)部分内文



图版三 《孙梅景等人卖田契》(原件藏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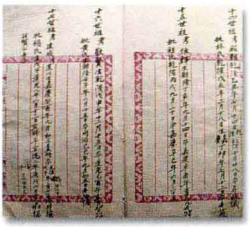


图版四 《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原件藏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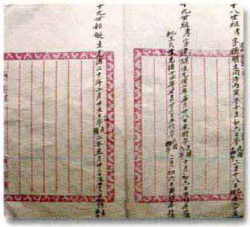


图版五 《家谱略记》(翠亨)(原件藏孙满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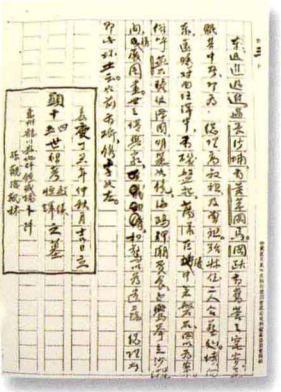




图版六 《列祖生没纪念部 [簿]》(翠亨)(原件藏本馆)



图版七　翠亨附近现存孙中山直系先祖坟墓墓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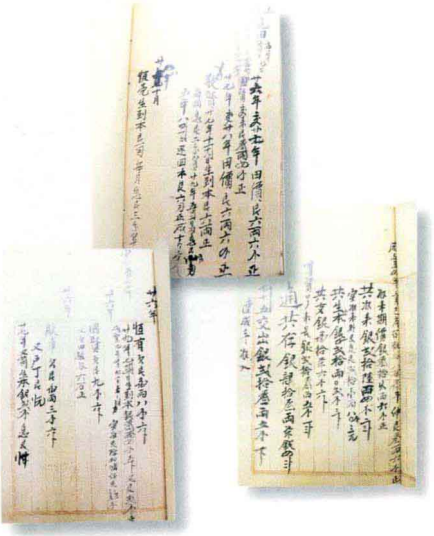
图版九　王希于1931年录下的翠亨孙氏十四世孙殿侯与十五世孙恒辉叔侄合葬墓的碑文（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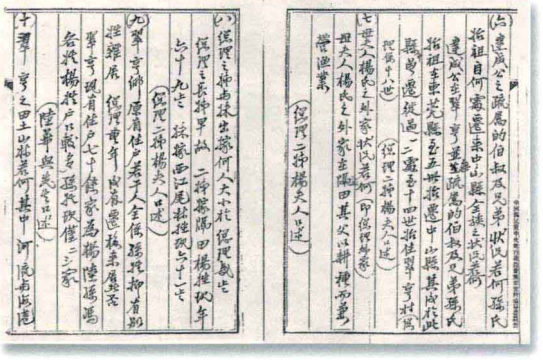
图版八　翠亨附近现存孙中山直系先祖坟墓墓碑（二）



图版十　《翠亨孙氏祖尝账册》封面(原件藏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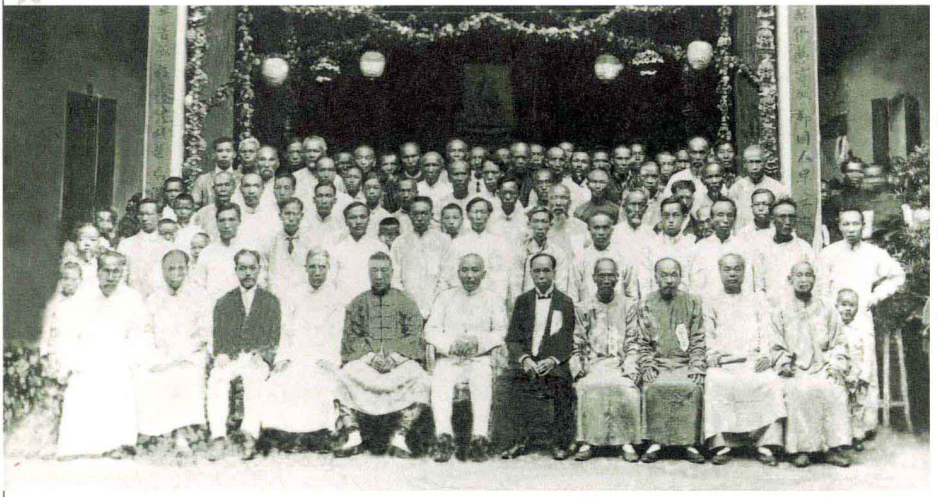
图版十一　《翠亨孙氏祖尝账册》部分内文



图版十二　1931年钟公任《采访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局部(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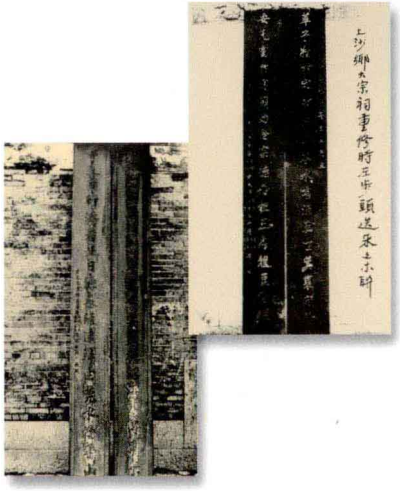
图版十三　1912 年 5 月，孙中山、孙婉在左坍孙氏宗祠与宗亲合影。(原件藏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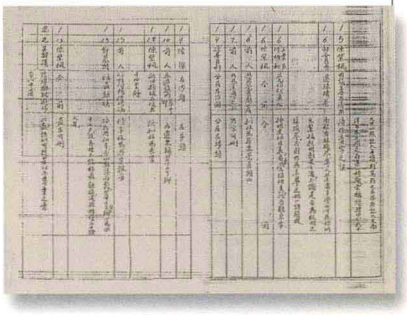
图版十四　1912 年 5 月，孙眉在左坍孙氏宗祠与宗亲合影。(原件藏本馆)



图版十五　1912年5月，孙眉夫人谭氏、孙中山夫人卢慕贞、孙中山长女孙娅在左埗孙氏宗祠与女性宗亲合影。(原件藏本馆)



图版十七　左埗头孙氏为东莞上沙乡大宗祠重修所赠对联照片，系由邓慕韩于1932年所摄。其一副对联联文为："庙貌庆重新，想当年乐业安居，遗绍江东传岭表；宗支同汗脉，看此日源长流远，泽由莞水播香山。"另一副对联联文为："萃予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妥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图版十六　1933年5月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局部(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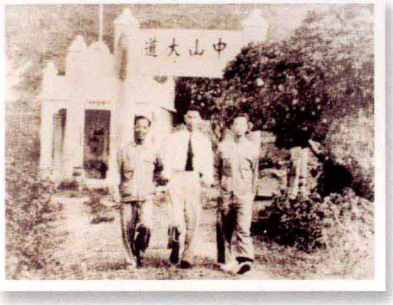




图版十八　1912年5月11日，“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恩亲会”会后合影及传单。（原件藏东莞市上沙孙沂佳处）



图版十九　东莞上沙车站茶亭正面照片。其“国父先代故乡”六字系孙科于1947年5月所题，“上沙站”三字系蒋光鼐手书。（原件藏香港上沙同乡会）



图版二十　东莞上沙车站茶亭背面照片。其“中山大道”四字系孙乾于1947年所书。（原件藏香港上沙同乡会）



图版二十一　1993年5月，孙满夫妇、孙乾夫妇到上沙拜祖时与孙氏宗亲合影。

图版二十三　罗香林所著《客家研究导论》注释中有关[Kung Kun]即[东莞]的解释

（註一）Lindbergh氏前稿公自註，粗研东莞江Kung Kun，下一字篤[篤]對音，上字當是Tung，字字誤，按其增築種之，當是東莞無疑，民十五國智衆局碑來，證作贊公，非是。



图版二十二　2001年11月，孙治平(前排左五)率子孙国雄(前排左六)等在左坳祭祖时与众乡亲合影。



THE MUSEUM OF DR.SUN YAT-SEN

孫中山故居

凡　例

一、收录范围：本书收录涉及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讨论相关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调查访问记录、函电、年谱与传记，以及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著作、论文，介绍这方面研究状况的文章或评论等。有的资料与论著只收录了直接涉及孙中山家世源流讨论的部分。

二、编排顺序：除第一类“历史文献”外，其他各类资料，原则上按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编列；著作、论文和文章则按出版、发表时间先后编列。

三、所收录的文物、资料均在每篇正文首页用题注注明收藏地或出处；所收录的著作均注明版本；所收录的文章均注明发表的报刊及期数、时间。

四、注释：1. 题注和注释均置于各页页下；2. 编者对有必要加以说明的篇目加题注，用 * 号表示；3. 其他注释用①②③……号表示；4. 凡编者所加注释，均标明“编者注”，以区别于原有注释。

五、对所有资料及论著，收录时均尽量保持原貌，但是，原来是繁体字的改排为现行的简体字。例如一些论著中将《列祖生殁纪念簿》写为《列祖生没纪念部》，将“孙妙茜”写为“孙妙西”，诸如此类，均未作改动。个别文章的某些观点或提法，我们并不赞同，为保持客观和原貌，收录时均未作改动，相信读者自会鉴别。

六、对小部分史料酌加校勘，凡加以校勘的地方都以特别的符号标明：1. 订正错字，置于[ ]内；2. 增补漏字，置于〈 〉内；3. 若干

地方用( )补入公元纪年,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4. 凡疑有讹误但又难以确定的用"?"表示;5. 辨认不清的字用□表示;6. 对原文的删节部分用……表示;7. 原件无标点的均酌加标点。

七、与本书内容相关的部分文物、资料等照片,制成图版附于书前。

序

在孙中山诞辰135周年之际，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成《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一书，我觉得，对孙中山研究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自罗香林先生提出孙中山祖籍紫金之说后，几十年来，围绕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孙氏家族内部意见亦不一致。在孙中山之前，翠亨孙氏世代为贫苦农家，并没有留下完整的家族谱牒资料。而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对自己个人、家庭、家族的事务却从来没有予以太多的注意。他没有主持或授意族人续修家谱，在他的所有著作和言论中，也没有关于家世源流的明确表述。因此，罗先生放弃原来同意过的“东莞说”而提出“紫金说”，以及日后众说纷纭，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历来认为，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的祖籍在何处，对他的历史地位并无影响。但孙中山又是全体炎黄子孙十分崇敬的人物，有关他的一切都应该研究。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我与中山大学的同事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时，曾安排人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帮助下，收集、研究有关文献与文物，并作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访问。当年，李伯新先生还带我一一勘察过孙氏的祖墓。当邱捷、李伯新写出论文《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时，我对他们的意见表示赞同；在与编撰的同仁讨论后，《孙中山年谱长编》在记述孙中山祖辈时就采取了“东莞说”。

“孙中山祖籍在何处”是一个历史学考证的论题，讨论的双方

都应该拿出自己的史料依据，都应该按照学术规范去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进行讨论。但也有人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多数未必有时间去收集有关的资料，也不一定了解论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所以，在社会上往往还会有各种疑问。瞻仰孙中山故居的海内外游客，很多人曾询问过孙中山祖籍的问题。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了这本书，把“东莞说”和“紫金说”两方的文献、文物、口述资料（特别是孙氏族人的意见），以及两说的主要论著收录于此。这样，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就可以全面地了解两说的论据与观点，在此基础上再作出自己的判断。对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来说，这是完成了一项本职工作；对孙中山研究的学术界来说，是出版了一种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无论如何，这件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这本书所收集的资料和论著，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的，而且，所有资料和论著都注明了出处，以便读者查核。于此，可见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同志用力之勤以及态度之认真。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就与纪念馆的老馆长李旭昭认识。几十年来，纪念馆换了几任馆长，但一直坚持同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仅在维护文物、宣传孙中山的光辉思想与历史功绩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而且对孙中山研究也做出了贡献。1986、1990、1996、2000、2001 年，在孙中山的家乡都举行过大型的研究孙中山的学术讨论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在筹办这些会议时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纪念馆陈列内容之丰富、选择之谨严，给海内外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结合文物保护，对孙中山的家世、家庭以及孙中山早年生活、当时香山的社会环境等课题，做了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果不是长期收集有关的资料，关注有关的讨论并进行研究，是编不出这样一本书的。

在学术研究中，很多问题需要经过反复推敲、反复商榷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罗香林先生在孙中山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都有不少建树，即使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结论可以商榷，亦当无损罗先生的学术地位。从这本书收录的论著可以反映出，罗先生和多数学者研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出发点都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都是就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深入探讨。我认为，讨论孙中山祖籍必须坚持这些原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同志在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但愿意同持不同意见者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坚持以文物史料说明问题。这种学术风度，是值得称道的。

如果这本资料集出版后，对大家在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上取得共识或引起进一步讨论有帮助，那正是我的希望。我相信，那也是编者的愿望。

陈锡祺

2001 年 11 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目　录

凡例……（1）
序……（1）

一、历史文献

孙氏家谱(翠亨)……（1）
家谱略记(翠亨)……（9）
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翠亨)……（10）
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选录)……（12）
孙氏族谱(香山左坡头)(选录)……（29）
孙氏族谱(东莞上沙)(选录)……（34）
孙氏族谱(紫金忠坝)(选录)……（38）
孙氏支谱(紫金袁田)(选录)……（44）
孙氏族谱(中山沙边)(选录)……（46）
孙梅景等人卖田契……（54）
翠亨孙氏祖尝账册……（55）
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清同治二年)……（64）
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清同治三年)……（65）
重修翠亨村祖庙碑记……（66）
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68）
四修翠亨祖庙碑记……（71）
翠亨村祖庙铁钟铭文……（74）

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传单) …… (75)
附:孙族恳亲会纪事 …… (77)

二、孙中山亲属对家世的看法

孙妙茜对家世的口述 …… (79)
孙科夫妇对家世的表述 …… (81)
孙满兄弟对家世的表述 …… (85)
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对家世的表述 …… (106)
孙中山亲属在《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扉页上的签名 …… (108)

三、调查访问材料

总理故乡调查纪要 …… 邓慕韩 (109)
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 …… 王 斧 (113)
采访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 …… 钟公任 (120)
附:钟公任致陈肇琪函(一) …… (125)
附:钟公任致陈肇琪函(二) …… (128)
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
请修正总理始迁祖一案
……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 (129)
总理世系及家庭(选录) …… 邓慕韩 (141)
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选录) …… 李伯新 (143)
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选录)…… 黄 彦 李伯新 (151)
我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 孙社正口述 李伯新记录 (156)
关于"国父先代故乡"之说
——东莞长安区上沙乡调查纪要 …… 唐 灵记录整理 (157)
孙中山来香山县始祖居住过的涌口村 …… 李卓枢 (159)

为“国父先代故乡”事再访上沙乡…… 马汉民　唐　灵调查整理　(161)
翠亨附近孙氏祖墓情况 …… 李伯新整理　(166)
孙中山祖籍紫金中坝的名胜古迹…… 张玉杰　陈国岐　(168)
翠亨地区的调查访问记录 …… 林家有等　(170)
访问孙社正老人 …… 李伯新记录　(176)
翠亨孙氏先代墓葬简况…… (184)
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选录) … (188)

四、函电

撮叙金山冯总领事(诜蘅)禀函电报详细节略 …… (200)
孙汉基致罗香林函…… (201)
邓慕韩致邹鲁函…… (203)
温济琴致罗香林电…… (205)
杨连逢复邱捷函…… (206)
李旭昭复邱捷函…… (207)
孙乾复孙社正函…… (208)
孙满复孙子生函…… (209)

五、年谱与传记选录

孙逸仙传记(选录) …… (美)林百克著　徐植仁译　(210)
附: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选录)…… (214)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选录)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219)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选录)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220)

总理年谱长编稿(选录)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223)
总理事略(选录) …… 胡去非 (225)
总理与中国革命(选录) …… 吴稚晖 (226)
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选录)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227)
孙中山先生传(选录) …… 高良佐 (229)
国父年谱(第一次增订本)(选录)
…… 中华民国各界
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 (232)
国父年谱(第二次增订本)(选录)
…… 罗家伦主编 黄季陆增订 (234)
国父年谱(第三次增订本)(选录)
…… 罗家伦主编 黄季陆 秦孝仪增订 (236)
国父年谱(第四次增订本)(选录)
…… 罗家伦 黄季陆主编 秦孝仪 李云汉增订 (238)
孙中山年谱长编(选录) …… 陈锡祺主编 (240)
东方巨人孙中山(选录) …… 广 宁主编 (241)
国父传(选录) …… 柯绣雪发行 (243)
民国总统家世(选录) …… 何虎生主编 (245)

六、研究及评述

客家研究导论(选录) …… 罗香林 (248)
总理先族之故乡及世系之研究 …… 高良佐 (252)
总理世系确由东莞上沙迁来之考证 …… 邓慕韩 (259)
中山先生之先世 …… 叶溯中 (261)

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考 …… 罗香林 (265)
国父的家世 …… 高良佐 (279)
国父家世源流考(选录) …… 罗香林 (281)
国父家世源流考正 …… 邓慕韩 (317)
国父年表(选录) …… 邓慕韩 (323)
《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 …… 罗香林 (325)
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 …… 谭彼岸 (330)
国父家世流源再证 …… 罗香林 (341)
国父的家世源流 …… 中 原 (349)
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
——读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存疑 …… 孙甄陶 (351)
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辩正问题 …… 祝秀侠 (368)
孙中山先生家世辩争平议 …… 钟正君 (376)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选录) …… 谢福健 (386)
孙中山祖籍何处?
——东莞市举行座谈会探讨 …… 杨维敏 (405)
中山先生始祖来自东莞
——孙中山祖籍座谈会侧记 …… 夏 木 (409)
孙中山祖先从何处迁来? …… 曾若醉 (412)
孙中山系同何门?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三大错误 …… 谭彼岸 (414)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
…… 邱 捷 李伯新 (439)
在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会上的发言(选录)
…… 金冲及 (464)

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考证
…… 舒斯华 王 延 张祝强 蒋作绍 (465)
翠亨孙氏源出东莞之说不能成立
——与李伯新、邱捷同志商榷 …… 洪永珊 舒斯华 (471)
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续考 …… 薛 翘 刘劲峰 (479)
“紫金说”与“东莞说”孰是孰非
——孙中山祖籍何处? …… 张 方 (488)
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 …… 邱 捷 (490)
《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所考证的并非孙中山的先世 …邱 捷 (509)
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 …… 方式光 (512)
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
——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 潘汝瑶 李虹冉 (519)
来自闽南? 源于赣南? 国父是客家人!?
——两岸史料阻隔,学界无法肯定 …… 江中明 (551)
港台学术界对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问题的争议 …… 刘孔伏 (553)
国父不是客家人 …… 施荣安 (557)
认识国父家世
——由《联合报》载《国父不是客家人》说起 …… 陈运通 (558)
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 … 邱 捷 (560)
关于翠亨孙氏是否为客家人的问题 …… 林家有 (579)
再论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并答《再谈关于孙中山
的祖籍问题》…… 潘汝瑶 (596)
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 潘汝瑶 何国华 (627)
也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 …… 邱 捷 (644)

孙连昌公迁香山动因经过之分析
——读罗香林先生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指误 … 钟正君 (658)
关于孙中山家族的两件土地契约文书释文 …… 梁方仲 (663)
谈谈孙中山的思想和孙中山研究的有关问题(选录) … 尚明轩 (668)
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选录) …… 邱 捷 (670)
中华姓氏录·孙(选录)…… 杨师群 (682)
孙中山研究(选录) …… 王 杰 (688)
一代天骄
——孙中山的历程(选录) …… 尚明轩主编 (689)
孙中山评传(选录) …… 茅家琦等著 (692)

附录

关于潘汝瑶、何国华诬指我馆篡改、歪曲历史的复函
……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696)
附件一:1990年我馆给市文化局答复潘汝瑶指我馆篡改历史的函 ……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699)
附件二: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几点意见
……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 (702)

后记…… (706)

一、历史文献

孙氏家谱(翠亨)*

兹以前先祖在涌② 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盖[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盘[搬]迁回来,在翠亨村黎[犁]头尖土名竹高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途遥远,来往艰辛之故,是以檀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盘[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

始祖婆陈氏太安人,生终年月无考。

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③ 居住。

五世祖礼赞公④,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左步[埗]头,乐南居住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

---

* 该谱原由孙妙茜保存,由其后人捐献本馆。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藏品。该谱系宣纸抄本,正文共53页。第1页至第7页记载了孙氏祖坟迁葬经过及祖上从东莞迁居香山的概况,第7至21页记载五世祖至十四世祖妣世次、名讳、生卒时间、葬地。以下空白29页,至最后两页记下未列世次之祖考29人及其配偶,估计29人为旁系或无法确定世次者。该谱中还夹有孙威及其子孙生辰纸一份。原文无标点。见本书图版一、二。

② 编者注:"涌"字在当地方言中与"冲"字同音。

③ 编者注:长沙乡现名上沙乡。

④ 编者注:"礼赞"墓碑作"礼瓒"。

在牛路坟同墓。长、次子因贼马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①]，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蔭村居住，建造祖祠。

五世祖考礼赞公，妣莫氏太安人，生终年月无考。

六世祖考乐南公，生于成化己丑年二月初九日，卒于八月初五日，葬于黄南坑。妣阮氏太安人，生于成化丙戌[戌]年四月初八日，卒于四月十八日，葬于桶[涌]口村芒皮山之原。乃系二房。

乐南祖生下四子，长子桂廷、次子日昌、三子耕隐、四子容窝是也。

七世祖考桂廷公，生终年月无考。

七世祖考日昌公，生于五月十八日，卒于丁丑年二月初七告终。妣王氏安人，生于癸未年八月初二日，卒于乙丑年十月十一日，享寿七十九岁，葬于土名黄南杭[坑]。

七世祖考耕隐公，生终年月无考，葬于土名黄南杭[坑]。妣王氏安人，葬于土名芒皮山。

七世祖考容窝公，生于嘉靖乙亥年[②] 八月十二日，卒于正月十九日告终，葬于桶[涌]口村土名对面山。妣梁氏安人，生于甲辰年四月十五日，卒于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告终，葬涌口村土名容[榕]树园。

八世祖考怀堂公，生于五月初八日，卒于八月廿九日，享寿七十二岁，葬涌口村对面山。妣陈氏安人，生于崇祯十四年[③] 二月初四日，卒于九月十三日，享寿八十八岁，葬涌口村对面山。

九世祖考派清公，生终年月无考，葬涌口村土名蔭山上。妣曾氏安人，生终年月无考。

---

① 编者注：估计为顺治甲午年。

② 编者注：嘉靖无乙亥年，当系正德乙亥年，即正德十年。

③ 编者注：此年份与各七世祖妣生年相差一百二十多年，估计有误。

九世祖考东园公，生于戊申年七月廿四日，卒于己巳年二月初五日告终，葬于涌口村对面山。妣林氏安人，生于辛亥年三月廿四日，卒于辛未年八月十一日告终。

九世祖考派源公，生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岁十二月十五日，卒于康熙癸丑年十二月初三日告终，葬涌口村蔺山上。妣麦氏安人，生于丙辰年九月十一〈日〉，卒于辛亥年三月廿五日告终。妣陆氏安人，生于乙丑年正月廿九日，卒于辛未年二月十五日告终。葬于土名担水杭[坑]坐乾向选[巽]之原。

九世祖考辛霞公，生万历甲子年[①] 三月廿八日，卒于康熙乙亥年四月廿日，享寿七十二岁，葬乌石洋紫马领[岭]。妣黄氏安人，生于甲子年[②] 三月初八日，卒于康熙戊子年八月十三日，享寿八十五岁，葬涌口村马凌林，坐向丙壬兼午子。

十世祖考赞广公，生于丙子年四月初四日，卒于庚午年八月初八日，享寿七十六岁，葬于涌口村土名黄皮山，乃系二房。妣高氏安人，生于甲申年七月廿七日，卒于十月卅日告终，葬于涌口村芒皮山。

十世祖考直吾公，生于万历丙子年二月初三日，卒于戊子年正月初八日告终，葬后沙海坐寅向申。妣林氏安人，生于壬子年十月十一日，卒于庚寅年二月十八日告终。

十世祖考毓表公，生终年月无考，葬于涌口村对面山。妣梁氏安人，葬于看山田祖祠左侧。

十世祖考毓伦公，生于壬午年十月初三日，卒于十一月廿九日告终，葬于涌口村蔺山上坐戌向辰。妣黄氏安人，生于丁亥年二月

① 编者注：万历无甲子年，估计为天启甲子年。

② 编者注：估计为天启甲子年。

廿一日，卒于丙戌年十一月廿四日告终。

十一世祖考维进公，生于癸亥年八月廿六日，卒于壬子年十二月十八日告终，葬于涌口村土名南皮山。妣梁氏安人，生于癸酉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于戊寅年十月十六日告终，葬于涌口村土名南皮山。

十一世祖考奇进公，生于康熙年二月初四日，卒于乾隆年正月十一日告终，葬担水坑。妣麦氏安人，生于四月廿六日，卒于乾隆年十二月廿六日告终，葬看山田祠左侧边。

十一世祖考宗曜公，生顺治戊戌[戊]年十月十六，卒于雍正己酉年四月初四日告终，享寿七十二岁，葬土名后沙[海]坐东向西。妣蔡氏安人，生于顺治辛亥年[①] 正月初六日，卒于康熙七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四十一岁告终，葬土名后沙海。妣梁氏安人，生康熙壬子十二月初二日，卒于乾隆四年十月十三日，享寿六十八岁，葬后沙海。

十一世祖考友奕公，生于戊戌年十月十七日酉时，卒于八月初一日辰时告终。葬迳仔朗[蒲]后门企石坐乙向辛兼卯酉之原。妣蔡氏安人，生于壬寅年四月廿九日酉时，卒于壬寅年八月十一日申时，享寿六十一岁，葬茶奇落金竹园。

十一世祖考瑞英公，生终年月无考，葬看山田，后迁上林边。

十一世祖考友飞公，生于乙巳年正月十一日酉时，卒于乙巳年三月十五日告终。妣梁氏安人，生终年月无考，此名字新查人家牌位可知之矣。

十一世祖考友义公，生于顺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康熙庚辰年十月初四日，葬于担水坑坐戌向辰之原。妣蔡氏安人，生于康

① 编者注：顺治无辛亥年。

熙元年壬寅九月廿六日，卒于甲子年九月廿七日告终。妣林氏安人，生于辛丑年四月初四，卒于雍正乙巳年正月廿五日告终，蔡林氏同墓葬海唐还。

十一世祖考友桂公，生终年月无考。妣梁氏安人，查人家牌位可知之。

十二世祖考连富公，生于戊戌年正月廿六日，卒于十月初八日告终，葬后门埔。妣□氏安人，失去。新查人家牌位可知之。

十二世祖考连德公，生于丙午年三月十一日，卒于丁巳年五月廿一日，享寿七十二岁，葬后门山。妣徐氏安人，生于庚午年七月十三日，卒于己巳年正月十一日告终，葬看山田。

十二世祖考连昌公，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于雍正年二月初二日告终，葬看山田坐庚向甲之原。妣陈氏安人，生九月十八日，卒于十一月初一日，五十八岁，葬茶园山。

十二世祖考表腾公，生于康熙辛亥年正月廿四日，卒于乾隆癸酉年正月卅日，享寿八十五岁，葬于涌口村南皮山。妣李氏安人，生于康熙丁巳年七月十二日，卒于乾隆八年三月廿七日告终，享寿六十五岁，葬涌口村对面山。

十二世祖考廷尊公，生于康熙甲申年十一月廿八日，卒于乾隆八月廿五日，享年五十八岁，葬海唐还烟墩下月地。妣杨氏安人，生于康熙年九月十九日，卒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廿一日告终，葬海唐还烟墩下。

十二世祖考不知，稽查下落。妣梁氏安人，生于康熙丙戌年八月十九日，卒于乾隆甲戌年十二月十九日告终。

十二世祖考表国公，生于十月廿三日，卒于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二岁，葬大丘山。妣□□出嫁官唐卓家。

十二世祖考表生公，号集圣，生于二月廿五日，卒于十一月十

二日告终，葬迳仔朗[葫]山。妣林氏安人，生于十二月廿七日，卒于七月廿二日告终，葬茶树园坐癸向丁。

十三世祖考云辉公，生于甲戌年六月廿六日，卒于甲寅年七月初三日，享年四十一岁，葬迳仔朗[葫]后门山坐北向南。

十三世祖考迥千公，生于康熙辛巳年十一月十六日，卒于乾隆辛未年二月廿一日告终，葬后门山坐癸向丁之原。妣谭氏安人，生于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于乾隆廿八年八月廿九日告终，葬后门山坐癸向丁之原。

十三世祖考云宵公，生于丙辰年六月初十日，卒于雍正乙巳年二月十一日告终，葬后门埔。妣麦氏安人，生于七月初九〈日〉，卒于乾隆甲子年十一月廿一日，葬土名不知稽考。

十三世祖考全光公，生于七月初六日，卒于乾隆辛酉年正月初四日告终，葬海唐还。妣蔡氏安人，生于乙丑年九月廿日，卒于庚寅年十一月初一日告终，葬迳仔朗[葫]。妣阮氏安人，生于庚申年正月十九〈日〉，卒于亥时告终，葬海唐还同墓。

十三世祖考集望公，生于三月初九日，卒于七月初二日告终，葬迳仔朗[葫]。妣林氏出嫁亨尾程家。

十四世祖考植尚公[①]，生于康熙壬寅年六月初八日，卒于乾隆年二月廿一日告终，葬后门山癸丁之原。妣阮氏出嫁。

未列世次考妣二十九人名录：

祖考竹居府君，罗氏安人，刘氏安人。

祖考友生府君，毛氏安人。

祖考梅景府君，梁氏安人。

① 编者注：《家谱略记》(翠亨)记植尚公为十世祖。

祖考梅占府君。
祖考裔千府君。
祖妣陆氏安人。
祖考裔伦府君，吴氏安人，杨氏安人，陆氏安人。
祖考贤明府君，阮氏安人。
祖考表理府君，蔡氏安人。
祖考源立府君，黄氏安人。
祖考连维府君，陆氏安人，谭氏安人。
祖考连魁府君，杨氏安人。
祖考连日府君。
祖考友发府君。
祖考连皋府君，陈氏安人，程氏安人。
祖考友太府君，陈氏安人。
祖考表廷府君，王氏安人。
祖考表奕府君。
祖考表亮府君。
祖考云后府君。
祖考云沛府君。
祖考表现府君。
祖考进友府君，欧氏安人，曾氏安人。
祖考云瑞府君，梁氏安人。
祖考允俟府君。
祖考桥成府君，简氏安人。
祖考表兰府君，梁氏安人。
祖考进雄府君。
祖考连胜府君，陆氏安人。

附孙威及其子孙生辰纸：①

十九传考建唐号亚威。
长子名业，次子胜本，三子胜亨，孙容芳。
孙威承慈命令男等灯酌名列左：
建唐，五十岁，十月十二日子时〈生〉。
长男，二十二岁，十一月十五日子时生。
次男，二十岁，三月十日巳时生。
三男，十六岁，正月十五日辰时生。
长孙，一岁，十一月初七日丑时生。
长女，十八岁，五月十日巳时〈生〉。
次女，十四岁，十月二十日子时生。
长孙女，三岁，九月五日辰时生。

① 编者注：据翠亨孙氏族人称，孙威是檀香山土人，由孙眉从檀香山送回翠亨，过继已亡二弟德祐香火。孙威于抗战前在翠亨去世。

家谱略记(翠亨)*

拾世祖考植尚公①,分房。

拾一世祖考瑞英公,妣梁氏,生连昌公系第三子。

拾二世祖考连昌公,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于雍正年二月初二日。妣陈氏安人,生年不知,九月十八日生,卒于十一月初一日,卒年未详。

拾三世祖考迥千公,妣谭氏安人,生殿朝公。殿侯公生恒发公,〈恒发公〉生尊贤公。由殿侯公分枝。

拾四世祖考殿朝公,妣林氏安人,生恒辉公。

拾五世祖考恒辉公,妣程氏安人,生敬贤公。

拾六世祖考敬贤公,妣黄氏安人,生三子。

拾七世祖长考达成公,杨氏安人尚生;次考学成公,程氏安人尚生;三考观成公。

---

* 据孙满藏原件。原文无标点,见本书图版五。

① 编者注:《孙氏家谱》(翠亨)记植尚公为十四世祖。

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翠亨)*

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三岁①,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②。

十三世祖考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一月廿六日,卒壬申年二月廿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廿七日③。

十四世祖考殿朝,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生〉,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廿八日卒,寿四十九岁。妣林氏,〈生〉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生,嘉庆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寿六十岁。

十五世祖考恒辉,生朝[乾]隆丁亥年九月十四日,卒嘉庆辛酉年正月初九,寿三十五岁。妣程氏,〈生〉乾隆丙戌九月二十日,卒嘉庆辛巳年④ 六月三十日。

十六世祖考敬贤,生乾隆戊申年十二月十五日,卒道光己酉年十二月廿三日,六十二岁。妣黄氏,生朝[乾]隆壬子年二月廿五日,卒同治己巳年九月初五日,寿七十八岁。

十七世祖考达成,号道川,生嘉庆癸酉年九月初三日丑时,卒

---

* 该谱原由孙妙茜保存,由其后人捐献本馆。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藏品。该簿封面为白厚双层纱纸,簿里为朱丝栏格8行玉扣纸,全簿共15页,仅抄3页零1行。原文无标点。见本书图版六。

① 编者注:《孙氏家谱》(翠亨)记载十二世祖连昌卒年为雍正年二月初二日。

② 编者注:《孙氏家谱》(翠亨)记为"生年不知",卒年相差一天。

③ 编者注:与《孙氏家谱》(翠亨)对照,生辰后了10天,卒年后1年。谭氏卒日后2天。

④ 编者注:嘉庆无辛巳年,当系道光辛巳(道光元年)。

光绪戊子年二月十一日戌时，七十六岁。妣杨氏，生戊子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亥时，卒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十三日午时，八十三岁。敬贤公长子。

十七世祖考学成，敬贤公次子，生道光丙戌年二月初三日，卒同治甲子年八月十八日，寿三十七岁。妣程氏，生道光丙申年六月十四日，卒壬子民国元年十月初六日，寿七十七岁。

十七世祖考观成，系敬贤公三子，生道光辛卯年四月初七日，卒同治丁卯年八月初八日，寿三十七岁。妣谭氏，出嫁。

十八世祖考德彰，达成公长子，生咸丰甲寅年十月十七日卯时，卒民国三年甲寅十二月廿八申时，六十一岁。

十八世祖考德佑，达成公二子，生咸丰庚申年九月廿五日，卒同治乙丑年十二月初一日，寿六岁。

十八世祖考字德明[①]，达成公三子，生同治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寅时，卒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巳时，寿六十岁。

十九世祖考字建谋，生光绪七年五月廿八日未时，卒民国六年十月初六日申时，寿三十七岁。妣王氏，生光绪十四年七月廿三日丑时，卒民国四年二月初六日寅时，寿二十八岁。

十九世姑娗，生光绪二十年二月廿五日戌时，卒民国二年五月廿二日阳历六月二十六号，寿二十岁。

① 编者注：即孙中山。

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 (选录)

孙满 编

序一

家谱之作,由来尚矣。前人有云:"家乘犹国史也。"是故谱系之学,史学也。中华民国元年五月,吾族十八世祖德明公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后返粤,于广州孙族恳亲会云:"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氏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见重";"合无数之家族,而即成为国家"。日后更于《民族主义》演讲中详论家族之起源,家族、宗族与国族之关系。由是可知,国父之重家族,其主旨乃在提倡民族主义,非仅为重视一姓一族之事务而已。今日吾辈从事于家族谱牒之修撰及研究者,尤须注意此点焉。

十八世祖德明公,讳文,号逸仙,世称中山先生,以推倒清廷、创建民国,立不世之功。民国廿九年,国民政府明令尊称为国父。功业既显,闾里与有荣焉。循名责实,国父之家世故里,乃为世人所注目,欲求其详,此翠亨孙氏家谱之所以重要者也。

吾翠亨孙氏之直系先世,据先辈历代口碑相传及家族之简略谱牒所记,元末明初,常德公避乱南来,徙南雄珠玑巷,后又移居东莞,是为入粤始祖。始祖及二三四世,俱在东莞居住,五世祖礼赞公,自东莞上沙乡迁来香山县涌口村。礼赞公之长子乐千,居香山

---

* 据孙满编《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1998年12月印本。

左坡头，次子乐南仍居香山涌口。吾翠亨孙氏，乃乐南之裔。至十一世祖瑞英公，迁来迳仔蓢，十四世祖殿朝公，迁入翠亨。至十七世祖达成公所居，即今日国父故居之基址也。

国父曾云吾翠亨孙氏“世居香邑”，“先人躬耕数代”。闻诸先辈及乡人，吾翠亨孙氏历代无人应清廷之考试及捐纳职衔，不闻于世；于地方文献，亦无记载。及至清末，翠亨孙族，散居四方。先祖德彰公，早岁侨居海外，破家以助国父革命；国父德明公，致力国家民族大业；先父建谋公，跟随国父革命，壮年为国捐躯；先叔建华公，任职中枢，为国宣劳。吾孙氏两代皆以国事为重，无暇于家族资料之收集整理与家谱之修撰。而先辈留下之家谱资料，类多简略。满忝为孙氏二十传长房，撰修家谱，本属责无旁贷。唯早年因职务关系奔走四方，兼逢国家多故，战乱流离，事久无成。中年以后，寄居香港，海隅多暇，始得集中精力清理家族旧物；于翠亨故里之文物庐墓，亦设法寻访考证。及至近年，始将先祖、先姑婆遗下之家族文献收集整理完毕，经与兄弟子侄详为讨论，并多方征询对孙氏源流有研究人士之意见，恭谨修撰，成此《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以贻子孙。俾后世皆知源流之所自，毋忘祖先创业之艰难，一本国父“天下为公”之旨，服务于国家与世界。

二十传裔孙满序于美国洛杉矶
公元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

序二

自先祖德明公倡导革命以来，已百有余年。以往由于种种原因，翠亨孙氏传人，于家族事务，未遑兼顾，是以翠亨孙氏完善之谱

牒，尚告阙如。吾兄满有鉴于此，毅然以修纂翠亨孙氏家谱为己任，依据先人遗下之家族文物及孙氏叔侄提供之资料，详为考订编次，并征询学者意见，五易其稿，修成《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达成公散居于海内外之后人，可藉以明本源而资联络，则兹谱之成，于促进吾翠亨孙氏家族之亲睦，功莫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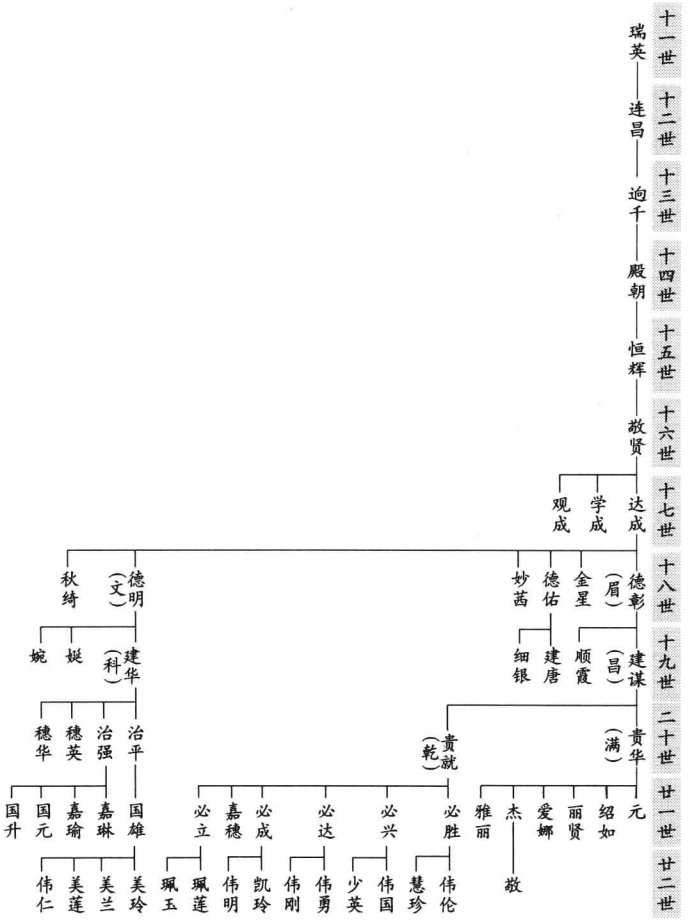
民国十二年，国父为《五修詹氏族谱》作序，阐明家族谱牒之价值，并提倡扩充家族之亲睦，使人类各去敌意而谋亲爱。序中云："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由是可见亲亲之道，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大同关系甚大。吾翠亨孙氏，历代于家族中孝敬友于慈爱，且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故乡父老言，达成公为乡之长者，于兄弟妯娌，极尽友于之义；乡人有急难者，达成公无不乐于助力。若德彰公于国父早年之培育及日后于国父革命之支持，以及国父对德彰公之终生礼敬，皆载诸民国史册，非惟吾孙氏家族之楷模而已。先祖德明公，世人称之为国父，更为吾翠亨孙氏引以为莫大荣耀。《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之立，其宗旨实本诸国父遗训。吾翠亨孙氏子孙亦当光大祖德，为消除一国一民族之敌意及实现世界大同有所贡献也。

二十传裔孙治平序于台北
公元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

1395508

THE MUSEUM OF DR.SUN YAT-SEN
孙中山故居

世 系 表



家 谱

十一世祖考瑞英公

生卒年月无考

妣梁氏

生卒年月无考

生连昌公(第三子)

十二世祖考连昌公享寿六十岁

生于一六六九年二月十三日(康熙己酉年正月十三日)

卒于一七二八年三月十二日(雍正戊申年二月初二日)

妣陈氏享寿五十三岁

生于一六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康熙丙辰年九月十八日)

卒于一七二八年十二月二日(雍正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生迥千公

十三世祖考迥千公享寿五十二岁

生于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康熙辛巳年十一月廿六日)

卒于一七五二年四月五日(乾隆壬申年二月廿一日)

妣谭氏享寿六十岁

生于一七〇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

卒于一七六三年十月三日(乾隆癸未年八月廿七日)

生殿朝公

十四世祖考殿朝公享寿四十九岁

生于一七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

卒于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一日(乾隆癸丑年十月廿八日)

妣林氏享寿六十岁

生于一七四八年四月十五日(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

卒于一八〇七年八月十五日(嘉庆丁卯年七月十二日)

生恒辉公

十五世祖考恒辉公享寿三十五岁

生于一七六七年十一月五日(乾隆丁亥年九月十四日)

卒于一八〇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嘉庆辛酉年正月初九日)

妣程氏享寿五十六岁

生于一七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乾隆丙戌年九月二十日)

卒于一八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道光辛巳年六月三十日)

生敬贤公

十六世祖考敬贤公享寿六十二岁

生于一七八九年一月十日(乾隆戊申年十二月十五日)

卒于一八五〇年二月四日(道光己酉年十二月廿三日)

妣黄氏享寿七十八岁

生于一七九二年三月十七日(乾隆壬子年二月廿五日)

卒于一八六九年十月九日(同治己巳年九月初五日)

生三子,长达成、次学成、三观成

十七世祖考达成公讳观林号道川享寿七十六岁

生于一八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嘉庆癸酉年九月初三日丑时)

卒于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光绪戊子年二月十一日戌时)

妣杨氏享寿八十三岁

生于一八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道光戊子年六月十三日亥时)

卒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宣统庚戌年六月十三日午时)

生三子,长德彰、次德佑、三德明(即国父)

长金星享寿四岁

生于一八五七年(咸丰丁巳年)

卒于一八六〇年(咸丰庚申年)

次妙茜享寿九十三岁

生于一八六三年三月十四日(同治癸亥年元月廿五日辰时)

卒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民国四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廿三日)

适隔田杨紫辉

三秋绮享寿四十二岁

生于一八七一年九月一日(同治辛未年七月十七日寅时)

卒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民国元年壬子三月初二日)

适四区西江里林喜智

十七世二叔祖考学成公享寿三十九岁

生于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一日(道光丙戌年二月初三日)

卒于一八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同治甲子年八月十八日)

妣程氏享寿七十七岁

生于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道光丙申年六月十四日)

卒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民国元年壬子十月初六日)

女桃享寿五十一岁

生于一八六二年三月四日(同治壬戌年二月初四日)

卒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九日(民国元年壬子十月初一日)

适四区安定乡程维熙

十七世三叔祖考观成公享寿三十七岁

生于一八三一年五月十八日(道光辛卯年四月初七日)

卒于一八六七年九月五日(同治丁卯年八月初八日)

妣谭氏(公殁后改嫁)

生卒年月不详

女殿享寿九十九岁

生于一八六一年六月三日(咸丰辛酉年四月廿五日)

卒于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民国四十九年庚子五月三十日)

适四区茶园陈秋光,生女淑英配建华公为妻

十八世长房考德彰讳眉号寿屏享寿六十二岁

生于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六日(咸丰甲寅年十月十七日卯时)

卒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一日(民国四年乙卯十二月廿八日申时)

妣谭氏享寿七十七岁

生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同治壬戌年九月廿八日辰时)

卒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二月初五日辰时)

子建谋

养女顺霞享寿七十二岁

生于一八八六年一月十九日(光绪乙酉年十二月十五日巳时)

卒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民国四十六年丁酉二月初五日)

适七区南屏容吉兴

十八世次房考德佑讳典享寿七岁

生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七日(咸丰庚申年九月廿五日)

卒于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同治乙丑年十二月初一日)

嗣子建唐(檀香山土人)

嗣女细银享寿七十四岁

生于一八八一年一月十四日(光绪庚辰年十二月十五日)

卒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民国四十三年甲午九月十日)

适七区南屏容当

十八世三房考德明讳文号逸仙别号中山享寿六十岁

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同治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寅时)

卒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民国十四年乙丑二月十八日巳时)

元配卢慕贞(一九一五年离婚)享寿八十六岁

生于一八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同治丁卯年六月廿九日酉时)

卒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七日(民国四十一年壬辰七月十九日丑时)

子建华

长女婓享寿二十岁

生于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光绪甲午年二月廿五日戌时)

卒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民国二年癸丑五月廿二日)

次女婉享寿八十四岁

生于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光绪丙申年十月初八日寅时)

卒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民国六十八年己未五月十六日)

适王伯秋,离异后适五华戴恩赛

侧室陈粹芬享寿八十九岁

生于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同治甲戌年八月十三日)

卒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民国五十一年壬寅九月廿三日)

妣宋庆龄享寿八十九岁

生于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光绪壬辰年十二月初十日)

卒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辛酉年四月廿六日)

十九传长房长孙考建谋讳昌号振兴享寿三十七岁

生于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光绪辛巳年五月廿八日未时)

卒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民国六年丁巳十月初六日申时)

妣王金顺享寿二十八岁

生于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光绪戊子年七月廿二日丑时)

卒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民国四年乙卯二月初六日寅时)

生二子,长贵华、次贵就

继室梁旺

十九传二房嗣孙考建唐讳威享寿五十岁

生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七日(光绪丙戌年十月十二日子时)

卒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七月初九日)

妣名不详

生三子,长业、次胜本、三胜亨

长女妙喜

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十日(民国五年丙辰五月初十日巳时)

次女妙屏

生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民国十年辛酉十月二十日子时)

十九传三房长孙考建华讳科号哲生享寿八十三岁

生于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日(光绪辛卯年九月十八日寅时)

卒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民国六十二年癸丑八月十七日卯时)

妣陈淑英享寿九十八岁

生于一八九三年八月十九日(光绪癸巳年七月初八日申时)

卒于一九九〇年六月三十日(民国七十九年庚午闰五月初八日)

生二子,长治平、次治强

长女穗英

生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民国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九日寅时)

适新会林达文

次女穗华

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民国十四年乙丑二月廿四日巳时)

适云南张家恭

二十传长房曾长孙贵华名满号名誉

生于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二日(光绪丙午年四月十九日辰时)

妻伍月娥(离婚)

生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己酉年)

子元

长女绍如

生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民国十九年庚午三月初三日)

适南海许保樑

次女丽贤

生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正月十一日)

适中山容应骐

三女爱娜

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四月廿四日)

适美国文士德

子杰

妻孙妙娟

生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民国十四年乙丑八月廿五日)

女雅丽

生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民国五十年辛丑十月初一日)

二十传长房曾次孙贵就名乾号名良

生于一九〇八年七月二日(光绪戊申年六月初四日卯时)

妻苏仲英享寿四十四岁

生于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国三年甲寅四月初四日)

卒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民国四十六年丙申十二月初五日午时)

生五子,长必胜、次必兴、三必达、四必成、五必立

女嘉穗

生于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卒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民国三十六年壬申五月十四日)

继室李惠娱

生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六月十七日)

二十传三房曾长孙名治平

生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民国二年癸丑十月十九日巳时)

妻谢秀玲(离婚)

生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民国二年癸丑四月廿六日)

子国雄

妻张佩霞

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民国四年乙卯十一月十一日)

二十传三房曾次孙名治强

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民国四年甲寅十二月十三日巳时)

妻刘肇云(离婚)

生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日(民国九年庚申八月初九日)

长女嘉琳

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十二月初三日)

适美国司徒白理

次女嘉瑜

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民国三十七年戊子九月十八日)

适美国司徒约翰

妻林伦可

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七月初五日)

生二子,长国元、次国升

二十一传长房长室玄长孙名元八个月夭折

二十一传长房长室玄次孙名杰

生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日(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六月初六日)

妻杨坤仪

生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民国四十二年癸巳十一月十三日)

子敬

二十一传长房二室玄长孙名必胜

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五月十九日)

妻彭雅丽

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民国三十年庚辰十二月初七日)

子伟伦

女慧珍

生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日(民国六十二年癸丑二月初三日)

二十一传长房二室玄次孙名必兴

生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六月初六日)

妻吴冰明

生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四月十五日)

子伟国

女少英

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民国五十七年戊申九月十六日)

二十一传长房二室玄三孙名必达

生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民国三十年辛巳二月二十日)

妻程礼庆

生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十月廿八日)

生二子,长伟勇、次伟刚

二十一传长房二室玄四孙名必成

生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八月廿一日)

妻张承慧

生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十一月廿六日)

女凯玲

生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民国六十一年壬子二月初五日)

子伟明

二十一传长房二室玄五孙名必立

生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十一月初八日)

妻刘颂慧

生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民国三十八年己丑二月廿一日)

长女珮莲

生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民国六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初二日)

次女珮玉

生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民国七十三年甲子闰十月十八日)

二十一传三房长室玄长孙名国雄

生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五月初五日)

妻藤本(离婚)

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五月初一日)

长女美玲

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民国五十五年丙午七月十二日)

次女美兰

生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民国五十八年己酉五月廿七日)

妻孙秀兰

生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民国四十四年乙未十月十八日)

女美莲

生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民国七十七年戊辰五月十四日)

子伟仁

二十一传三房二室玄长孙名国元

生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民国六十八年戊午十二月廿四日)

二十一传三房二室玄次孙名国升

生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民国六十九年己未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二传长房长室次门裔孙名敬

生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民国七十四年甲子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二传长房二室长门裔孙名伟伦

生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民国五十八年己酉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传长房二室二门裔孙名伟国

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八日(民国五十三年甲辰四月初七日)

二十二传长房二室三门裔长孙名伟勇

生于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民国六十一年壬子三月十一日)

二十二传长房二室三门裔次孙名伟刚

生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民国六十六年丁巳十月初六日)

二十二传长房二室四门裔孙名伟明

生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民国六十五年丙辰四月十九日)

二十二传三房长室长门裔孙名伟仁

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午时(民国八十三年甲戌九月十一日)

孙氏族谱(香山左坡头)* (选录)

集录本宗族谱记序

天地间,水滔滔,胡来乎?曰:有源在;木萋萋,曷茂乎?曰:有本在。物亦有之,人固宜然。故家谱之作,于迁析[徙]之初者,诚亟而作;于昌炽之日者,尤不容缓,凡以不忘所自也。且支分派别,而不笔之于谱,将世远年湮,有茫然不知其祖宗,视一脉如秦、越者。予郡乐安,望出太原,自苏门而传映雪,不知曾几何时,而衍于南雄府珠玑巷,聚族而居。讵料咸淳年间,因胡妃之难,各姓夜窜潜处,我祖常德不得已,越东莞而住沙头。传及六世祖乐川,问渡铁城,览风景人物,忽至左步[坡]头乡,见夫山环水抱,土田饶沃,跃然兴曰:"是真吾庐也。"遂于是而居之、安之,不复有故乡之想矣。由是惟勤惟俭,置宅置庄,并书谱以遗,诚兢兢乎迁析[徙]之初者也。迄于今,凡十二世矣,子孙渐蕃,或迁省城,或居别乡,苟失其谱,得毋历世久远,不知所出,而失亲亲之情乎?杰忝读儒书,光宗未能,用怀崇本,谋诸父老,辑成谱帙,俾我族人睹瓜瓞之绵绵,思祖宗之庇荫,各廑尊敬之忱,愿我子孙当体一迈之相承,勿泥亲疏之有别,共敦友爱之谊,亦不忘所自之意也云尔,故于是乎序。

时

雍正元年癸卯岁,十世孙华亭(宗英,杰)谨识

---

* 据中山市左坡头村孙燕谋藏抄本原件。原文无标点。

纂修谱序

古今来，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位乎其中。人也，胡与天地同悠久哉？曰："有志之者"。"志者何？"曰："如诗书之记载，国史之流传，皆志其人其世，以垂不朽。"然其间，不过曰某人在某朝如此，某世有某事如此，未尝总人人世世而志之也。是则总人人世世而志之者，其惟各族之有谱乎？谱也者，由所自出之祖，序世代，明昭穆，顺少长，别男女。举凡婚、嫁、生、死、坟墓，罔不笔之，其中以昭示于无穷者也。我族源远流长，鼻祖常德公以前，世胄莫可悉考，旧谱所载，则自常德公于咸淳年间，由南雄珠玑巷越东莞，而住沙头始。传至六世祖乐川公，甫到铁城抵左步[坡]头乡而居焉。迄于今，一十有五世矣。前者谱帙之修，一修于雍正癸卯年宗英公之笔，再修于乾隆辛巳年宗英公之笔。嗣后生齿日益繁，子孙日益盛，徙居别地者日益多。四十年来，曾未闻有议及重修族谱者，广窃憾焉。憾乎及今不修，将至繁者愈繁，盛者愈盛，多者愈多，不无荒失莫考矣。广于此有慨，然有续修之志，但愧才疏学浅，未能胜任，因与族中弟侄英乙、立周等商之，幸各欣然，遂尔分任厥事，不数月，而谱帙告成。是谱也，源源委委，世代迭然，昭穆凛然，长、幼、男、女、婚、嫁、生、死、坟墓，靡不详然悉然。据事直书，按图如见，循序备录，有条不紊，信以传信，未敢故增一字，以欺将来，疑以传疑，何至妄减一词，以罔前辈。自兹以往后之人，或十余年而一修，或数十年而一修，承承不已，上以缵先绪于勿替，下以启后嗣于无忘，此则予之厚望也，而亦族之厚幸也。是为序。

时

嘉庆六年辛酉岁秋仲桂月上浣，十二世孙心斋(英广)谨识

四修谱序

余族谱系自宗英公创始于雍正癸卯，祖乐川公重始迁也，上及常德公，溯重源也。乾隆辛巳，公复手修之，勤勤恳恳及其身，一再纂录，诚念夫支分派别，所以敬宗收族而教后人于孝弟者，将于谱示之也。嘉庆辛酉，英广公继其志，重修之，迄今又三十三载矣。两公修谱具存，而近代生卒迁葬又不可无以纪之也。爰命侄俊育、俊华，以宗英公始修之本为据，凡英广公所录，有互异者，有加详者，附注其后，将以征信，亦以传疑也。至于义例之未尽协，与夫烦冗复见之处，悉仍旧书之。盖余老无能为役，又无力足以就正高明，姑令族中人，凡先代所传及近日所知，荟萃成编，不使及余身而就湮没，若精益求精，则后之人之责也。虽然是犹谱之文也，非谱之意也。余观近人处宗族乡党间，往往因小得失，斗狠争讼，一结而不可解，争利已耳，不欲外人占便宜已耳。不知以同姓与异姓较，则异姓为外；以本房与别房较，则别房为外；以己身与兄弟较，则兄弟又为外。盖存一自利之心，则无人非外，虽骨肉，有不胜其衅隙者，而他无论已。今余族自莞之沙头，迁居于是，又有各姓错处其间，族之人倘有意乎？敦友爱而笃睦姻也，毋亦于谱求之，由无服而上推，则皆有服也；由有服而上推，则亲兄弟也；亲兄弟之先，则一身已耳。人莫不自爱其身，而今之散而为千百人之身者，皆一人之身所分布，则孝弟之意，有不油然生乎？以和于宗族者，和其乡党，此笃近举远之道也。聚族于斯，俾炽而昌，实由乎是，是尤余所拳拳深望也夫！是为序。

时

龙飞道光十三年岁次癸巳仲冬谷旦十三世孙立宝、立国谨识

五修谱序

窃以自仁率亲，自义率祖，求所谓仁至义尽，则莫如修谱一端。以序世代，则尊祖也；以明昭穆，则敬宗也；以顺少长，则收族也。《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谱之修也，行一事而三善皆得，而祖宗于是乎尊敬，而族于是乎收矣。故或数十年而一修，或十余年而一修，为子孙者，所当以是为兢兢也。我祖常德公迁徙之由，前已详明，其谱帙之经修明者，四次矣。材取而观之，觉世代序，昭穆明，少长顺，乃欣然于前人作之修之者，侠其祎如也。第由六世而上溯四世、五世，其坟墓之在上沙者，向未拜祭，窃有憾焉，惚惚不乐，欲一至其处而观之。无何，不数日，适我等倡建双壮祖祠上梁日，忽有上沙之叔侄至，出谱示信不爽，质其来由，即以欲修三世祖墓告。窃自喜曰："奇哉。斯来也！"留数日，会同俊义、俊满、俊官、文辉、文元、文通到上沙，拜观其墓而修焉。此殆先祖在天之灵，默相于其间者欤？不然，何应念而至者？其人之突如其来，其事之不相谋而相合，若斯之巧也。洎入观始祖庙，见栋宇摧残，垣墙颓坏，又窃自憾也。询之族姓，皆曰："欲修无资，奈何？"材即设法得数千金，始行修焉。而祖庙之摧残颓坏者，于是焕然一新。其时为同治十二年，岁在癸酉也。且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材于始祖庙及三世祖墓之在上沙者，且得力以修之。而于我族之谱经重修者，四十余年矣，及身尚未修也，岂遂曰无憾乎？爰商之族中，俊堂、俊义、俊满、文元、文业、文赞、文通等长幼皆欣然。乃于光绪三年，议推俊连、文杰、文元三人创其稿。阅五年十月初，起而修之，至六年腊月望，而谱帙告成焉。材自愧不佞，无能亢宗，尚思收族，于此事之兢兢者，匪伊朝夕，而有志竟成，是所望后之贤子

孙，世世修明而靡已也。虽然，材尚有望焉，盖谱帙之修也，以睦宗族，由宗族而乡里，引而近之，与居与游，犹吾宗吾族也。即以睦宗族者睦乡里焉，庶几得修谱之深意云尔。是为序。

时

光绪六年庚辰腊月谷旦，十五世孙梓材谨识

孙氏族谱(东莞上沙)* (选录)

孙氏世系原序

古帝王锡姓授氏,胙土分茅,姓氏所由来也。予族系出太原,乐安衍派,自汉唐以前,代远年湮,姑弗深考。至宋熙宁时,历官枢密副使,世袭金吾。太始祖温靖公,讳固,字允中,号和父,望重朝端,勋铭竹帛。其生平行谊,不能备述。嫡孙常德公,讳八郎,号员沙,仕元,为杭州刺史,诰授奉议大夫。当元祚将衰,顺宗昏暗,刘福通、陈友亮、张士诚辈蜂起,生民涂炭,靡有宁居。公即洁身去乱,流寓于南雄之珠玑巷。建明,太祖定鼎金陵,世泰时和,河清海晏。公之长子贵荣公、次子贵华公、三子贵绍公、四子贵武公复迁宝安。

贵荣公字子敬,居员头山,与我乡同邑,惟是。

贵绍公字子厚,居三株竹,又名三多竹。

贵武公字子伦,居南海各府而各邑。

贵华公字子贤,居上沙,遂为我乡之始祖,而实则本族之二世祖也。

是序本于他房房谱抄来,未审作者何人,三株竹又无县名录出,后人有心者而细究焉。

民国庚午拾九年伍月
廿一传侄孙惠南重录

---

* 据东莞市上沙孙衍佳藏抄本原件。原文无标点。

孙氏世系辨(依前辈抄来)

本族系谱有数序,有云:太始祖允中,讳固,乃宋枢密副使,袭金吾,原居金陵省之城,因议王安石,陈青苗,忤旨被谪吴西,由是世居江西也。考之宋纲目,议新法不合,出居真糊矣。第拜枢密使,袭金吾。在召回复识后,则谪江西者,然非随父任者也。又有云:始祖常德公,讳八郎,乃元浙江杭州刺史。自祖与父,由宋而元,由元而明,递相沿也。因靖寇而至南雄珠玑巷寓焉。祖与东莞县伯何公交善,爰是卜居莞之员头山。长子贵荣公定省在家,而世居于此。贵华公则偕二弟学游天下。贵绍公卜居三株竹。贵武公卜居南海。惟贵华公则卜居莞之沙头村,今则改名上沙。

常德公,一号员沙,以长、次二子同邑居住,则将员头、沙头两村而为别号。意者欲后世当思木本水源,而两村后人互相亲爱,此是确论也。因而录之以备参考云尔。

民国庚午拾九年伍月
廿一传侄孙惠南誊录

宋太始祖

温靖公,讳固,字允中,号和父,谥温靖。诰授光禄大夫,枢密副使,世袭金吾。

妣袁氏,诰封一品夫人。

公妣原居金陵省城,后复迁居江西省,生有八子,分派各省居住。

温靖公履历图

公登进士第，始仕州县进知，历官颍王宫侍讲，又为侍读，擢天章阁侍制知通进银台，及后公被谮，出于檀州，还，复领银台，封驳兼侍读，判少监府，旋因安石当国，又出公于真定府，洎复职时，即进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元丰初同知枢密院事，改大中大夫，枢密副使，进知院事。又拜观文殿大学士，知河阳寻奉祠，历拜门下侍郎，复知枢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

元始祖

常德公讳八郎，字常德，一号员沙。或云温靖公之八子也。诰授奉议大夫，浙江杭州刺史。

公生于元仁宗戊戌九年三月初三日，终于明洪武庚戌年九月初九日，享寿七十三岁。

妣邓氏，诰封五品宜人。

公妣原居江西，于元末时靖寇，至南雄珠玑巷寓焉。

生四子，长贵荣，次贵华，三贵绍，四贵武。

常德公四子图

长子贵荣公，字子敬，居莞邑员头山。由此分族，公裔不录。

次子贵华公，字子贤，号鹤湖，居莞邑上沙乡。我乡之祖，下则细录后裔。

三子贵绍公，字子厚，居三株竹（又名三多竹）。由此分族，公

裔不录。

四子贵武公，字子伦，居南海肇庆。由此分族，公裔不录。

元明二世祖

鹤湖公，讳贵华，字子贤，乃常德公之次子也。明赐乡饮正宾。生于元末，终于明初，葬于怀德乡土名土瓜山狮子滚球形穴，甲寅向。

妣陈氏，明例赠六品安人，生于元末，终于明初，葬于罗田乡白石山。

生子长礼和，次礼忠，三礼禋。

鹤湖公三子图

长子礼和公，讳康念，号碧澜。妣谭氏、赵氏。我房之祖，下则详录后裔。

次子礼忠公，讳马儿，号沙洲。妣陈氏。由此分房，公裔不录。

三子礼禋公，讳戊申，号耿明。妣欧氏。由此分房，公裔不录。

孙氏族谱(紫金忠坝)* (选录)

孙氏族谱序

(上略)[①] 我祖讳友松、友义兄弟,离闽迁粤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一图开创于上正约忠坝,遂家于此,则为发冈头,乐安孙族矣。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奉割琴江一都二图,归善二都五图,通共七图,计粮米三千九百八十余石。六年汇造版籍,则为惠州府永安县上镇约之孙族矣,祖创基业丰隆,苗裔蕃衍,有声于大明。(中略)[②] 时皇清雍正七年岁次己酉仲春月初二日增修立。十世嗣孙宗麟、学容、庆祥、尚兰同修。如盛、宗兰、任成、宗元同校。十二世嗣孙继周号武平薰沐谨书。

重修孙氏族谱序

礼云: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盖言人本乎祖,而同姓不可不合族也。苏氏曰:观吾之族谱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龙门子曰:三世不修族谱者,是谓不孝。是族谱之宜修亟矣。然非己族而冒之者谓之乱,厌己族而弃之者谓之叛,无其实而虚张者谓之僭,三者有一非谱也。如上念祖祢,下念子孙,旁念昆弟,起而后焉,将见读家乘者,仰而思祖宗之泽,俯而念同气之亲,相与讲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藏抄本影印件。原文无标点。

① 编者注:"(上略)"两字及括号是抄本原有的。

② 编者注:"(中略)"两字及括号是抄本原有的。

乎源流昭穆之说，而内外有别，长幼有序，有无相周，吉凶患难相扶助，岁时伏腊祭飨相往来，是族谱之修有关于伦理而扶世教也大矣。夫书公，字子占，为齐大夫，伐吕[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遂以为郡，即吾开姓之祖也。绵绵延延，世代蕃衍，下逮权公，字仲谋，与刘、曹三分天下，据有吴粤之地。迨及诩公，族众曰伯将公，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才武，选为伯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是也。以功封为平东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宁化县，或居雩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雩都青塘，或居安远。惟三郎士元，居广东循州，即今龙川县也。又二郎英，生五十八郎，居广东兴宁县，子契全公开基，积德昌后，生齿日繁，其子孙遂多莺迁。及我祖友松公，偕弟友义公，大明永乐年间由闽迁居嘉应州长乐县，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县，即惠州府永安上镇约开基始祖也。迄于今，来永者十有余世矣。椒衍瓜瓞绵长，历久愈盛。苟无谱牒纪载，不独无以联子姓，敦本支，且非为人后者关念宗族之道，合族为此惧。前于咸丰三年间，族众商议续修，在田亲承族议，编列世次，稍增卷帙。历代源流有条不紊，意图刊刻，有志未逮，即于族内商议，我永族谱未缮写明，上无以绳祖武，下无以昭来许，中无以慰连族感情，遂不忘固陋，独任草创，日昃不遑，阅历日久，遂成谱焉。则族内类皆鼓舞从公，劝成美举，继自今后起英贤无忘修谱之心，尤当勉为守谱之典，非惟免不孝之名，正所谓数典不忘也云尔。大清光绪二年岁在丙子孟秋月朔九日，十四世嗣孙见龙字光斗号在田，百拜谨序并云。

孙氏源流

孙氏族系自以书公为鼻祖，但历代久远，迁徙无常，世次未免

阙漏，故兹谱之辑，仍照旧藏写本，以上镇约开基为一世祖，其前代列祖，容俟考核清真再行续写，后人其毋忽焉。再上镇即忠坝也，黄牛挨磨，即开基祖祠也。

（一）[1] 友松公，孙伯三十三郎，葬贺岗约，林和塘，螳螂捕蝉形，酉山卯向。妣骆八十娘，葬发冈头不子上。所遗祭田，小土名林塘肚，又忠坝公馆背、灌水塘、杨坊矿石屋下三坟地。旱塘仔即上镇约开基之始祖也。分四房：长房祠堂上孙排，二房祠堂上袁田，三房祠堂下孙排，黄牛挨磨，即开基祖祠是也。

（一）友义公，上镇约土头墩开基，经同治年间祠毁，凑集松公嗣孙合鼎建总祠。友松、友义共牌，香火永兴旺。（二）成曜公，妣黄孺人。（三）祖缵公，妣黄孺人。（四）车全公，妣陈孺人。（五）予冠公，妣张孺人。（六）汝良公，妣朱孺人。（七）统先公，妣张孺人。（八）文华公，妣陈孺人。（九）泮元，妣罗氏。（九）维元公，妣张孺人。（十）乾光公，妣李孺人。（十）礼光公。

（二）敬忠公，分住上排祠堂开基住。

贯忠公，移羌畲开基住。

劝忠公，妣刘孺人，分袁田祠堂开基住。

荣忠公，妣徐孺人，住下排祠堂开基住。

三世祖永久公，移江西英德县马房庙侧角开基。

三世祖永良公，妣吴孺人，合葬于祖祠右片矿沙窝尾地坟上穴的。

四世祖讳怀文公，妣汤孺人，合葬于九社下火烧须三坟地，上下左右相连壹共五穴。

五世祖讳凤宗公，葬在祖祠花昭上，正干两穴。妣叶孺人，未

① 编者注：括号及其中的中文数字是原有的，当系表示世次。下同。

知葬处。

六世祖讳明言公，葬在祖祠脑左边。妣宋孺人，葬在铁罗坑，大窝背孟子洋。

七世祖讳仕伯公，葬于永城黄岭头，紫金山正干两穴。

八世祖讳绍宗公，合葬于三坟地怀文公坟脚下左片穴的。

八世祖（伯祖）耀宗公，另有坟一穴，未知何世系，永九公房内之人，未可谅也。另白石甲小土名不子下遇及收葬之坟，今当奉为先代老人之坟。八世妣古孺人，葬于坑仔塘眠牛形，何孺人葬于石仔冈背矮塘仔猫尾洗面形。

九世祖讳乃和公，葬于崩冈背路面上。妣林孺人，葬于岭兵营顶，伯祖耀宗公葬于兵营顶九世妣林孺人坟脚下。

十世祖讳宗荣公，葬于中正约，公坑凹口寨，妣叶孺人，葬于杉子坑半岭。生鼎茂公、鼎标公、鼎山公。

十一世祖讳鼎茂公，葬于铁螺坑粪箕窝。妣谢孺人，葬于林塘肚食水坑田面上河树岗。生三子：道元、桂元、发元。

十一世祖讳鼎山公，妣陈孺人，合葬于祖屋背左片，寅山兼甲，尾宿十二度。未传。

十一世祖讳鼎标公，葬于水口，未知何穴。妣叶孺人，葬于径口，未知何穴。生三子：琏盛、琏昌、琏桥。

十二世叔祖讳道元公，妣朱孺人，未传。

叔祖兰公，葬于下角老楼场，未知何穴。

伯祖继东公，葬于祖祠屋背，未传。

十二世祖讳琏盛，未传。

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

十二世祖讳琏桥公，移走他方未知。

十二世祖讳贵元公，葬于铁螺坑狗径伯公树背。妣贺孺人，葬

于老里塘田面上癸山兼子分金，生二子。

十二世祖讳发元公，妣王氏，生一子。十三世景文公，妣叶孺人，生应谱公。谱公讳耀祖，妣甘氏，生三子：长学仁，次学华，三子未详。

十三世祖讳景泰公，葬于鹿子岭下塘肚，往交趾，未回，葬艮排。妣欧孺人，葬于九社下，火烧须堡？三坟地左片正见骑龙木节穴。所生三子：长贯谱，次赞谱，三质谱。

叔祖讳景廷，往交趾未回，妣张孺人，葬于老李塘田面上，系赞谱房内人等祀奉。

十四世祖讳贯谱公，葬于崩岗背路面上。妣张孺人，所生三子：长球，葬于富坑；次瑞珍，妣沈孺人，所生二子，移博罗；三立德，生一子，名纯桂，苏村浊水湖开基。

十四世祖讳缵谱公，葬于铁螺坑，粪箕窝，系鼎茂公坟左片。妣张孺人，葬于林塘肚，河树岗，骑龙穴。所生五子：长寿宝，次康宝，三水宝，四宜宝，五定宝。

十四世祖讳质谱公，葬于林塘肚大肚岭，妣李孺人，葬于老里塘，所生三子：长金宝，妣叶氏，生五子；次传宝，三群。

十五世祖讳寿宝，号训棠，字国珍。妣贺老安人，所生三子：长云，未传，次桂芳，三桂香。（民国廿九年庚辰岁十月初九日卯时，安葬贺老孺人之墓，葬矿沙窝尾，内甲山兼卯，外寅山兼甲，尾宿九度，水初放庚水，对中流有水涵，放甲水。甲辰年可开，下甲子年可放，丁水亦可。）[①]

叔祖康宝，往番未回。

叔祖水宝，妣张氏，所生三子：长桂尧，次桂逢，未传；三过继围

① 编者注：原文如此。

田。

叔祖宜宝，未传。

十五世祖讳定宝，葬于祖祠右片上角矿沙窝口，系桂香过继承嗣。

十六世祖长桂芳，所生二子：长春先，妻沈氏；次材先，妻张氏，过继于叔立嗣。

十六世祖次桂香，本命辛巳，生十二月二十日午时建生，材先过房承嗣，妻张氏，己丑生，十一月二十一日辰时建生。所生一子，长男月麟，未传，后立嗣，壬申年八月廿八日巳时，得添长男命名汉光承嗣。妻贺氏，名亚来，甲戌生九月廿九日子时建生。

十五世祖讳金宝公，妣叶孺人。所生五子：长桂兰，次桂梅，三桂英，四桂月，五桂鑫。

叔祖传宝，未传。

叔祖群宝，未传。

十六世祖讳桂兰公，所生一子，命名锦先，随祖母叶孺人，并叔桂梅、桂鑫兄弟焕先，一共移居博罗开基，未为住止。

桂英妣贺氏，所生四子：长炳先，次增先，三润先，过继石盛承嗣，四喜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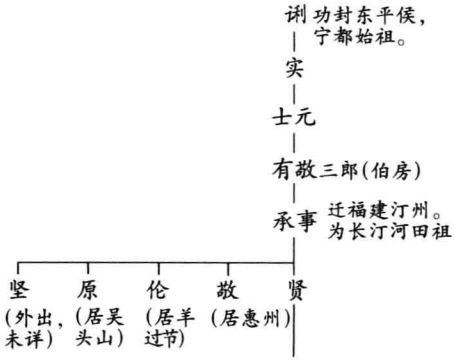
十四世祖讳耀祖，讳应谱，妣甘氏。所生三子：长学仁；次学华，未传；三未详，未传。

十五世祖讳学仁公，妣陈氏，所生三子：长石风，妣杨氏，生一子澄先，〈妣〉陈氏；次石龙未传；三石盛，妣王氏，立润先承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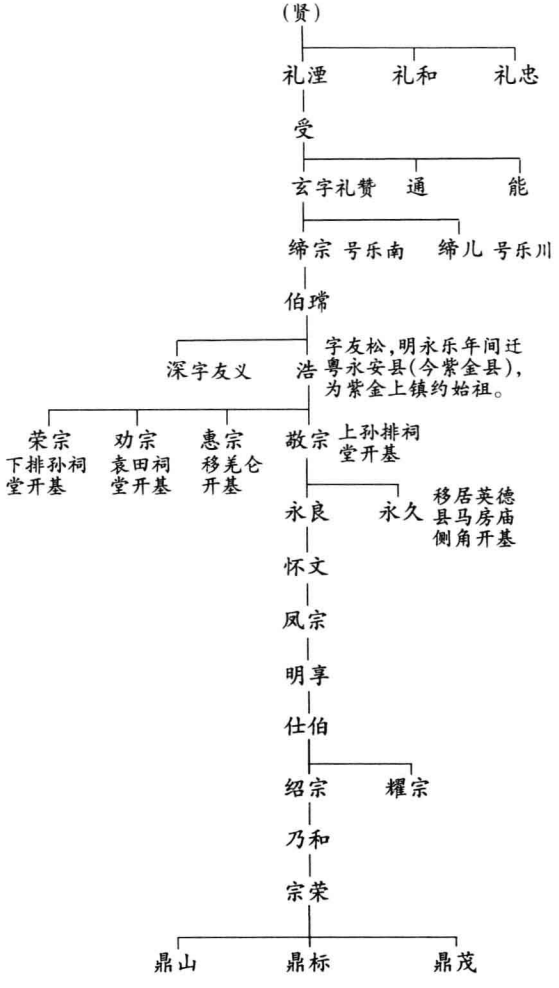
孙氏支谱(紫金袁田)* (选录)

迨孙讳公,族众曰百将公,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才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省,越江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是也,以功封为东平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宁化县,或居雩都城内,或居本郡雩都青塘,或居安远。惟三郎士元子孙,有居广东循州。……积德昌后,生齿日繁,其子孙遂多莺迁。及我祖友松公,偕弟友义公,大明永乐年间由闽迁居广东嘉应州长乐县。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县,即惠州府永安县上镇约开基始祖也。分四房:长房祠堂——孙排;次房移羌仑开基另祠;三房祠堂——袁田;四房祠堂——孙排。友义公上镇约土头墩开基,同治年间祠毁,凑集友松公嗣孙合鼎建总祠。友松、友义兄弟共牌,香火永远兴旺。清光绪二年,孙见龙撰。

世系:



* 据陆允昌等主编:《中国孙氏世系源流》,(沈阳)白山出版社,1999年8月版。


(贤)
礼湮
礼和
礼忠
受
玄孚礼赞
通
能
缔宗 号乐南
缔儿 号乐川
伯瑞
深字友义
浩 字友松,明永乐年间迁粤永安县(今紫金县),为紫金上镇约始祖。
荣宗 下排孙祠堂开基
劝宗 袁田祠堂开基
惠宗 移羌仓开基
敬宗 上孙排祠堂开基
永良
永久 移居英德县马房庙侧角开基
怀文
凤宗
明享
仕伯
绍宗
耀宗
乃和
宗荣
鼎山
鼎标
鼎茂

孙氏族谱(中山沙边)* (选录)

序

中华民族各姓氏之号称世家者,类皆有谱,盖以尊宗族,而明系统,便后人之回溯也。我沙边孙氏族谱,前人之欲修而不果者屡矣。族人之所期望于修谱者至殷,故有修谱委员会之设。余不才,何敢言此,第以前人之所未遂,今之人而复忽之,则后之来者,更不知其所由来,而无所稽考矣,于是乎黾勉以将事焉。或曰:"方今社会革新而进入大同,子犹斤斤然与言宗族事,毋乃迂腐之甚乎?"余曰:诚然。社会之演进,乃人类之所推动,人民者,国家之要素也。总理有云:"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是则国家发展,必先家族而后推及于国族也明矣。中国古称文物之邦,人民家族思想最富,举凡簪缨世胄,姓氏百家,无不昭穆有序,谱传灿然。其流传于后世者,历百数十传而不坠,是殆东方之文化也。我中华民族素重家族主义,数千年来世代相传,家乘所系,由来久矣。而我沙边孙氏开族至今,二百余年,生齿日繁,房族愈众,惟族谱未修,族人皆以为憾。前清同治乙丑年间,当我族宗庙落成之会,我先皇祖荫武公,曾发起修编族谱,然因格于红、黑线之议而未成,深为可惜。余生也晚,此次冒膺修谱之重任,盖欲继我先皇祖未竟之志也。幸我族中父老领导于前,诸昆季襄助于后,遂不揣冒昧,而从事焉。讵意编印将半,适值国难开始,战祸频仍,华南告警,以致家乡沦陷,不得已遂告停版。荏苒

---

* 据孙干宾编《沙边孙氏族谱》,1940年刻本。原件无标点。

至今，屈指已届三年矣，若长此迁延下去，诚恐印成之谱帙，行将废弃无遗。用是与用宾、凤朝诸君，筹商继续编印，共策进行。遂将遗下之谱稿，分别整齐，已印者修而辑之，未印者编而纂之。编印告成，分装四册，内分五代为一表，修至十七传为止。至十八传以下，多是壮年，有待于后之来者，故略而不修也。然开始工作以迄于今，关于调查编纂，校勘付印等工作，皆赖诸同事协力赞助，继续进行，费数年之工夫，始克勉强以蒇事。惟是年湮代远，稽考难周，挂一漏万，势所难免，略修其概，毋使数典而忘祖可也。是为序。编者干宾氏识于映雪斋，廿九年九月十五日。

乐安郡中山沙边孙氏谱系考

闲尝考宗族之有谱系，所以纪世族而明系统，昭示子孙，使有所观感而不忘也。溯我孙氏系出康叔之后，至武公惠孙为卫上卿，因以为氏焉。历周、秦、汉、晋、唐、宋、元、明，以迄于今，代有高贤，伟人辈出。武略则有武子之兵书，文才则有兴公之雅赋，埋蛇传楚国贤相之名，释经著东州大儒之号。至若勤学则孙康之映雪读书，清谈则孙楚之枕流漱石，隐居有明复之高，医学夸思邈之妙，此皆峥嵘史策，芳流千古者也。又如现代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发扬国民革命，声威所播，薄海同钦，尤为杰出。是则我孙氏之丰功伟绩，照耀人寰者，已数千百年于兹矣。然而远溯原始，近考历朝，书厥有间，悉难叙述，惟取其有可据者而志之。粤考我孙姓，以书公为上世始祖，自书公以下，代远系繁，则有富春派、乐安派、清河派、大原派、庆源派等之别，一一未能详考。而我沙边孙氏，则系出乐安郡，乃东吴之后也。原籍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人。先世出仕粤之南雄始兴县，遂家于粤焉。宋咸淳八年，因胡妃事，与珠玑巷九十七户，挈眷南来，入籍古冈州，是为我孙氏由粤南来之始也。考我

远祖世英公，为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高塘村人，在宋出任广东南雄府理刑官，署保昌县知县，遂家于粤之南雄府雍州保昌县沙水里。嗣后我恒所公，复为广州府路官，因而迁居于粤之省城华宁里。公生二子，长希文，次希武。希文公迁居顺德县熹涌乡，即元名人孙西庵公房族，公与莞伯何真公友善，其后人乃迁于东莞员头山而住焉。孙总理宗族系由东莞迁于香山翠坑乡，夷考谱传，总理即公之裔孙也。我希武公则迁居于新会县濠桥里，生三子，长弘基，次肇基，三开基。弘基公迁于开平乌石，即新兴孙尚德之房族；开基公则分居水南高州府，即广州北门外，宝剑出匣名山，孙建吾公之房族；我肇基公即绳祖之字，别号龙山，居新会潮连，生五子，仁祖、义祖、信祖，分居各属；智祖随绳祖居住新会潮连；我礼祖即会泉公，迁居新会逊边，生一子曰普庵，因会城多故，由是迁居于香山城南门外和宁里而住焉，是为我中山沙边孙族之始祖也，旋徙于东镇之黎村乡。至清初顺治五年岁次丙午，我九世祖国信公，始迁于沙边乡。时忠信公则迁于尾乡，其后则有长房之成信公、永业公，二房之永吉公、永隆公，相继迁来，于是忠信公亦由蓢尾迁来沙边居住，遂开大族，以迄于今，二百余年，房族愈众。若无修明之谱帙，子孙将何以知其本源乎？用是博考各房旧谱，录取顺德、新会两房所修遗帙，编而缵之。上考原始，历溯支流，虽旧谱纪载，略有差异，而支派同属源流，自经此次之重加审订，博考周详，庶或正本清源于万一，而有裨于敬宗修族之资也。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秋月吉日，十九传孙干宾谨识

中山孙氏族谱纪略

中山县原名香山县，宋以前属东莞，为香山镇，绍兴中始设县

治，以五桂山有神仙花鸟及大小花园诸胜，故名香山。陈天觉量土建城，杂以铁砂，又称铁城。民国肇造，国民政府以邑人孙中山先生手创共和，功在万世，令香山县改名中山县，俾垂奕祀而资崇报。予纪孙氏族谱，因首述之县名书中山者，从今制，尊总理也。中山孙氏原籍浙江钱塘县高塘乡，宋时谏议大夫孙天球，疏讦权奸，贬为广州路推官，因家于粤，遂为粤人。景定四年甲子，年七十岁，卒于广州华宁里。生二子，长希文，次希武，后益繁衍，是为粤东孙氏之始祖，与妣梁氏合葬于广州白云山东北之原。清嘉庆七年，十五世孙，雷州徐闻县儒学教谕孙荣，重修公墓，碑曰：宋谏议大夫，广州路推官，讳天球，字汝求，号恒所，孙公之墓。集合中山、南海、佛山、新会、东莞、顺德、番禺、高要、阳春、开平、从化、东安、潮阳诸孙氏枝房，为置墓田，各房岁为一祭，每三岁一合祭，子姓济济，咸集墓所，例于重九节举行。其祭文云："呜呼！在昔我祖自浙来粤时，遭权奸之嫉，谪官潜隐，卜宅于兹。子孙日幸昌炽，节孝表于闾阎，忠义昭于朝野，聪颖为士，朴实为农，有工有商，世守其业，枝派流远，氏族日繁，甲第连绵，土田相望，名宗著姓，邑邑相属。"云云，语虽近夸而措词典雅，持义却正。二世祖希文，号质庵，因赘于顺德县熹涌乡关氏，遂居顺德，传至四世，为孙西庵公，公讳蒨，字仲衍，号西庵，性警敏，于书无所不读，为诗文挥毫立就，少惊耆宿，与赵介、李德、王佐、黄哲，结诗社于南园之抗风轩，号"南园五子"。元季中原兵起，东莞伯何真保有南海，公与之善，往从之，真使掌记室。洪武改元，征南将军廖永忠至粤，公为作书请归附，曲尽诚款，永忠不戮一人。而粤东晏然者，公之力也。永忠寻征，公典教三年，庚戌，明祖昭天下设科取士，公举于乡，授工部织染局使寻，出主虹县薄，时经兵燹，十室九空，公安集劳来民，还其业。甫一载，入翰林，典籍学士宋濂乐韶凤，承旨詹同甚重，日侍帝，奏对敏便，

容仪飘逸，濂辈自以为莫及也。八年，同修洪武正韵。九年，以奉常之节，监祀西川，居翰林三载，力求外补，为平原薄。无何，以事逮，系输左校版筑间，望都门讴吟为粤声，督者以闻，召至陈诗，皆忠爱语，特命释之。十一年，罢归，遨游云林中，益肆力于学问，尝和陶潜归去来辞，以写其情。十五年，召拜苏州府经历苏剧，郡难治，公区画有方，政用大和。廿二年，谪戍辽东，时都帅梅思祖，节镇三韩，素闻公名，迎置家塾，寻坐蓝党，见逮，或劝以疏，自明不答，长歌就刑，天下冤之，年五十有六。门人黎贞，时亦在戍所，解衣裹公尸，殡于安山之阳，识与不识，为文祭之，读者无不堕泪。公生平撰述甚富，有《通鉴前编纲目》七卷、《孝经集善》一卷、《理学训蒙》一卷、《西庵集》八卷、《和陶集》一卷。番禺赵绚称公，究极天人性命之理，濂洛关闽之学，为岭表儒宗。其子复为沦亡，所著散佚，仅《西庵集》为门人黎贞所编传于世族中，存公手迹只行书七律一首《过梅关·谒张曲江祠》："提兵昔过梅关北，奉命今还梅岭东，古庙尚留朱履迹，旧题惊见碧纱笼。一天云气千山雨，万壑松声百里风，谒罢遗祠重回首，篷莱宫阙五云中。"西庵孙贲，西庵公后，多不传。至十三世礼赞公始迁中山，居东镇涌口乡，生二子，长业[乐]千，次乐南。乐南又居左步[埗]头乡。适当明季，满胡寇边，军粮急于星火，田赋烦苛，中山海盗蜂起，乐南公避居东莞未几，明社已屋。唐王永历先后至粤监国，义师大起，号为勤王保国。东莞一隅，从者如云。乐南公尝返乡，率子弟往莞赴义，至不复来。有谓沿海绿林悉应东莞张家玉之召，因以舟载公往然，左步[埗]头因亦有后。今左步[埗]头、涌口乡，俱有孙氏子姓，称兄弟之乡。降至清乾隆中叶，左步[埗]头乡七世祖瑞英公，始迁翠坑（又称翠亨）乡，居迳仔蔭，建宗庙，辟庐墓，遂为翠坑乡之初祖。时乡中人口稀微，少壮多外出营生，计虽田舍数家，而颇见整洁，背山面海，五桂、

凤凰山脉蜒蜿而下，至翠坑遂结为平坡，气象万千。瑞英公后为殿朝公、迥[迥]千公、建[连]昌公、恒辉公、敬贤公。至敬贤公，为总理之祖，盖翠坑乡八世也。敬贤公生达成公，是为总理之父。达成公年弱冠，聘同邑隔田乡杨腾[胜]辉公少女为配，归十载始生德彰公，(总理伯兄，即经商夏威夷，以资财助总理革命者也)，自是逾三载，长女金星生，次子德佑[祐]、次女妙西[茜]，均逾三载而次第生。未几，长女及次子俱殁。丙寅生总理，再逾五载，而季女秋绮生焉。总理生时，达成公年已五十四，杨太夫人三十九。总理幼名德明，字帝象，又字载之，后更名文，号日新，又号逸仙，三十三岁避地日本，别名中山樵，时人遂称中山先生。总理事迹，自有专传纪于国史，且其功绩已见于年谱，大彰于世，故族谱谨从略焉。呜夫！总理先世，在宋为谏议公，在明为典籍公，至明亡，有乐南公附义不返，是皆以忠节、文章、勇敢赴义闻于世。《传》曰：明德之人，其后必大予述族谱而益信已。中山孙氏，翠坑、左步[埗]头、涌口乡而外，有曰沙边者，亦为孙氏，聚族而居，子孙繁衍，以此乡为最。沙边居邑东海之滨，有高山为屏蔽，其下沿海潴为沙田，有河通至山下，土田饶沃，河之两旁，孙氏子孙居室鳞毗，无别姓杂处，户口约七百家，丁男二千余人，小学校一，学生四百余人，校舍整齐修洁，为一邑乡校之冠。年前，邑运动大会，乡校获其冠军，名振一时。乡风纯朴，百数十年间，无有为盗而犯国刑者。盖乡人饶于田产，自耕自给，余则为商，有远至美洲、澳洲、英属加拿大，兼业工商，三五年归，归则筑室、娶妇，再往，如是往来二三次。或有携其妻、子远走重洋，视同庭户，中岁以后，尽携所有归，不再往，遂优游林下，以诗书教其子孙以终老。妇女习劳苦，田间操作不让男子，虽富有之家，亦无闲居之妇，其习俗然也。民国廿八年七、八月间，敌寇中山沙边，去海口不远，当东海战线之冲，乡人受总理主义陶育，深明

种族大义，男子持械随县兵以抗战，妇女则负馈前趋，或则舁伤兵，埋狄尸，不辞危苦，勇不言懈。县长张惠长、司令吴飞见之，深致嘉许，称为女丈夫，诚非过誉。沙边之孙，其远祖亦出于谏议公，谏议公生二子，长希文，赘于顺德，后迁中山，是为涌口、翠坑乡孙氏之初祖；次子希武，字立夫，号英扬，迁于新会，至五世普庵公始迁中山之藜村。清初顺治五年，以藜村地近海隅，明末清初，变乱时起，乃相地，得县东门外十五里附洋洲之边，建立屋宇，聚族而居，数十年后，遂成村落，取名沙边，至今宗庙巍峨，庠序完美，家室壮丽，蔚为望族，计十九世矣。合翠坑、左步[埗]头、沙边、大布、西桠、乌石之孙，共六乡约三千余人，惟沙边居孙氏一族，称巨乡，余均与他姓杂居，乡亦较沙边为弱。然翠坑自总理后，今有总理故乡、总理纪念学校，规模宏壮，风景宜人，中外人士游于中山者，匪不停骖驻足，此民族历史之光，又非沙边所可比拟，顾合六乡而溯源，于远祖则匪不同，咸属兄弟之乡，是为中山孙氏云。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吉日，十七传孙璞谨识

孙总理族谱系考

先世系出金陵，其远祖元中公，在宋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王安石青苗，忤旨，谪江西，遂居以终。十五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珠玑巷后，与莞伯何真公善，复偕子贵荣、贵华、贵绍、贵武至东莞员头山居，是为来粤之始。十四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至明代，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香山县，即今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乡，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步[埗]头，寻以田赋烦苛，胥返东莞避之，会攫世变，不复来香山，然自是有后于其地。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再迁镇内翠坑乡，居迳仔蓢，建宗庙，明

祀典，顾丁口甚稀，老壮多外出。未几，而室祠以圮。瑞英公以降，六世祖建[连]昌公、五世祖迥[逈]千公、四世祖殿朝公、曾祖恒辉公、祖敬贤公，父达成公娶同邑隔田杨腾[胜]辉公女，阅十载而生德彰公，自是长女金星生，次子德祐、次女妙西[茜]，皆递隔三载而生。长女及次子夭。丙寅生总理，再阅五载而生季女秋绮。总理生时，达成公年五十四岁，杨太夫人年三十九岁。总理名文，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德明，字帝象，又字载之，三十三岁时避地日本，署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称焉。

编者孙干宾
廿六年十月廿三日

孙梅景等人卖田契*

立明卖田契人孙梅景、梅占、云灿，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愿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依口酬还时价银壹拾陆两。四家允肯，五面言定，就日立契期，银一色当中交足，景、灿二人亲手接回应用。税现在本户孙通办纳。立契之日，交尊、迁[千]批耕管业，不干众人之事。此田明买明卖，不是债利准拆，并非信写等情，如有不明，系同中理明，不干买主之事。今恐无凭，立明卖契为照。

一实卖到土名横坑上税田四亩。

一开四至：东至山，西至山，南至沟，北至山。

一实接到价银壹拾陆两正。

乾隆八年十二月拾柒日

立卖契〈人〉：孙云灿押
梅占押
梅景押
连维押
云瑞押
亚喜押

见银作中人：谭恒玉押

乾隆九年七月
十二日纳税讫

* 该契约原由孙妙茜保存，由其后人捐献本馆。原文无标点。见本书图版三。

翠亨孙氏祖尝账册*

土名“龙田”。每年〈田〉价艮[银]六两六。

廿六年交廿七年田价艮[银]六两六钱正。国贤交来艮[银]叁两四钱正。

廿七年交廿八年田价艮[银]六两六钱正。

廿七年息艮[银]壹两四钱正,廿八年息艮[银]壹两四钱正。

敬贤廿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到本艮[银]六两正,每两息艮[银]二分算,廿九年五月初二日收息艮[银]二两一钱三分,五年八月初一日还回本艮[银]六两正。减吉完。

廿八年十月

恒亮生到本艮[银]一两,每月息艮[银]三分算。

廿九年二月初七日,何汉辉、亚海仝[同]生到本银柒两正,每年每两息艮[银]三钱算,三十年八月廿八日收回本艮[银]叁两正,欠本银肆两,作猪仔本艮[银]一元。

三十年三月廿九日,收来息艮[银]一元。

八月廿八日收息艮[银]二两七钱八分五厘,共艮[银]三两五钱。

共十八个月。

---

* 该帐册原由孙妙茜保存,由其后人捐献本馆。帐册封面原题“道光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部[簿]”,左上角和左下角分别写有“乐安堂号”和“仕合号”字样,内文主要记载翠亨孙氏祖尝的收支情况,先后涉及翠亨孙氏“殿”字派、“恒”字派、“贤”字派、“成”字派四代,记载中的敬贤、达成是孙中山的祖父和父亲。原文无标点,《翠亨孙氏祖尝帐册》的名称是编者酌加的。见本书图版十、十一。

三年正月十八日收艮[银]三两正。

咸丰四年二月初五日,收回本利艮[银]式两六钱五分,共收来息银叁两四钱三分五厘。作减吉完。

除扣猪仔本银实收息艮[银]二两七钱二分。

廿八年交廿九年田价艮[银]六两六钱正。
廿九年交三十年份田价银六两六钱正。
三十年交元年份田价银六两六钱正。
元年交二年份田价银六两六钱正。
二年交三年份价银六两六钱正。
三年交四年份价银六两六钱正。
共期价〈银〉叁拾九两六。

廿八年十式月廿七日
何门李氏伯润涵生到本银四两正,每两每月息艮[银]三分算。吉。

咸丰二年正月三十日收来息银式两〇八分五厘。
三年式月十三日本利收回艮[银]柒两六钱七分五厘。
完。
实收息艮[银]五两七钱六分。

廿八年七月十二日
陆达新欠息艮[银]壹两四钱正。
将生出本艮[银]一两四钱,每月息艮[银]三分算。
咸丰元年四月初二日收艮[银]一两四钱。完。

廿六年恒有欠艮[银]壹两八钱六分,廿九年七月廿四日生到本银叁两四钱五分,又艮[银]弍钱正。咸丰元年四月初三日来艮[银]一两三钱四分,实收艮[银]除扣猪仔艮[银]九钱八厘。实欠弍两六钱七分。

廿六年国贤欠艮[银]九钱六分,又欠田租谷六石正。

廿六年殿章欠艮[银]壹两三钱六分,又户丁艮[银]二元。
廿九年又四月初,生本银弍钱,息艮[银]二算。

廿六年恒彩欠户丁艮[银]一元。

廿六年敬贤欠艮[银]八钱四分。

廿四年黄三欠谷壹石五斗。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五日,陆赞车生出本银肆两正,每年共息艮[银]八钱正。

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国贤生到本银捌两正,每月息艮[银]二分算。咸丰元年润[闰]八月二十日收艮[银]叁两六钱四分。实欠艮[银]四两三钱六分。

何汉明三十年十二月廿八日,生到本银弍两正,每年息银六钱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收息银六钱正。三年乍[作]猪仔本艮[银]一元。三年十二月已尚除猪仔本,实收息艮[银]一两〇八分

五厘。四年二月初九日收息艮[银]一两二钱。

廿八年

支阮士昌粮艮[银]三钱六厘。

支隔年咸鱼二斤半,钱壹百二十;肉三斤二,该三百六十五;鱼二斤二,该钱一百一十七;茨菇六斤,该钱一百〇八;对纸一张半,钱二十七;虾米六两,该钱七十八;年货、酒、米、香油,该钱七百六十七。

钱伸艮[银]五五算,共该钱壹千五百八十二文,伸艮[银]八钱七分〇一厘,二共支艮[银]壹两弍钱三分〇一厘。

廿九年

开登[灯]支钱九十七,钱伸艮[银]五分三厘三五。

廿八年何汉明来田租谷一石。

三月十三日清明支数:

支谷一石,支肉艮[银]一元,咸鱼十六斤,该钱五百七十六;菜丝二斤,钱三二算,该钱六十四;鸭旦[蛋]十五只,钱七五算,该钱一百一十三;酒、宝、烛、炮、香、山钱、山竹、茶,该钱四百四十六。

共该钱一千一百九十九,伸艮[银]六钱一分四厘九。

三月廿七日存艮[银]三两六钱二分六厘五,共支钱伸艮[银]六钱一分四厘九。

廿九年石碧坑田八分,该租谷弍石八斗。

国贤上造来谷一石四,下造来谷一石四。

廿八年何汉明迳仔蒴和[禾]亭边租谷一石,国贤交谷一石,交敬贤收。

三十年达成二月廿一日交出艮[银]一两,三十年支用。

廿九年十二月廿六日隔年猪肉二斤半,钱一一算;茨菇六斤,钱六十;大菜十斤,钱二十;虾米五两,钱六十五;鱼一斤半,钱七十二;米式斗,钱三百二十。

共支钱九百一十二,伸钱五五算,伸艮[银]五钱一分九厘,共支银壹两〇一钱九分一厘。

支阮仕昌粮艮[银]三钱七分,

支山门粮钱一百,

一支廿八年上帝庙收田亩该艮[银]壹钱四分。

三十年二月廿三日,清明开列:

一支开灯钱三百二十八;一支肉十六斤,钱一一算,该钱一千七百六十;一支咸鱼一十八斤,钱三四算,该钱六百一十二;一支鸭旦[蛋]十五只,钱八算,该钱一百二十;一支菜丝二斤,钱三二算,该钱六十四;一支安茶钱一十;一支男孙利试[是]钱四十;支谷壹石正;一支山门粮钱一百,伸银五分二厘;一支恒有捉[作]猪仔艮[银]三钱三分。

共支钱伸银五百二十,伸艮[银]壹两九钱六分九厘。

三十年石碧坑田上造来却[脚]谷一石二斗,下造来谷八斗。

一支阮士昌粮艮[银]三钱六分;一支十二月隔年;一支肉三斤,钱三百;一支咸鱼一斤十两,钱七十八;一支唐[塘]鱼钱五十

六;一支茨菇十斤,钱一百一十;一支虾米四两,钱五十六;一支大菜十斤,钱二十;十支生油二两,钱一十一;一支米二斗,钱三百;一支信利货酒,该钱九百三十一。钱伸艮[银]五五算,共支银八钱七分二厘。

咸丰元年开列:

一支开灯钱二百八十五;一支清明肉艮[银]一两;一支咸鱼十五斤,钱七百二十;一支鸭旦[蛋]二十只,钱一百六十;一支菜干一斤,钱三十六;一支礼饼十斤,钱三百八十;一支宝烛、香、酒,该钱三百八十;一支米谷一石;支山门粮钱一百;一支阮士昌粮艮[银]三钱六分;一支隔年肉二斤半,钱二百五十;一支唐[塘]鱼一斤四两,钱六十二;一支虾米四两,钱六十;一支咸鱼一斤,钱六十四;一支米一斗五,钱二百二十五;一支大菜十斤,钱二十;一支茨菇五斤,钱六十;一支信利货钱七百;支生油四两,钱二十;一支芒盐钱二十六。

国贤上造、下造共收来谷二石五斗,二共支钱三千五百四十八,钱伸艮[银]五五算,共伸艮[银]壹两九钱五分一厘四。肉银一两,又粮银三钱六分。

通共支艮[银]叁两叁钱一分一厘四。

二年正月初八日,支开灯钱二百四十。

三月清明:〈支〉猪肉艮[银]壹两〇七分五厘,鸭旦[蛋]钱八十文,饼钱壹百九十文,菜丝钱八十四文,咸鱼钱八百文,宝烛、香、炮、酒钱四百六十八文,又二月十五生油半,钱五十六,五月支打坡钱弍百八十文,支山门粮艮[银]钱一百文,咸丰二年支阮士昌粮艮

[银]三钱六分。共钱二千二百九十八,伸〈银〉五五算,艮[银]壹两贰钱六分三厘九。

共肉艮[银]、粮艮[银]共支贰两六钱九分八厘九。

二年五月收来尊号买枯树艮[银]三钱八分,四年支出用。

国贤上糙[造]来谷一石九斗,内支缉联谷五斗,实收来谷一石四斗。

业贤上糙[造]来谷一石,

国贤下糙[造]来谷九官斗。

十二月廿七,〈支〉隔年肉三斤,一四四算,钱四百三十二;咸鱼二斤,六四算,钱一百二十八;茨菇六斤,一六算,钱九十六;虾米二两,钱三十二;菜十斤,七算,钱七十;白米二斗,二算,钱四百;信利店货钱四百六十八。正月十八日交钱。塘鱼二斤,六四算,钱一百二十八。

共支钱一千七百五十四,五五算,伸艮[银]九钱六分四厘七。

三年二月廿七清明〈支〉数:

肉艮[银]壹两,男孙利试[是]钱四十文,咸鱼二十斤,四五算,钱一千,酒、宝、香、烛、炮钱四百六十四,鸭旦[蛋]钱九十文,菜丝钱七十文,一支阮仕昌粮艮[银]三钱六分,一支山门粮钱一百。

共支钱一千七百六十四,伸艮[银]九钱七分〇二厘。

共支艮[银]贰两三钱三分〇二厘。

十二月廿八日隔年开列:

一五算,十三块,钱六十五;肉四斤,一三六算,该钱五百四十;

三头支花红四对，钱三十二；唐[塘]鱼二斤，钱一百一十二；字方一对，钱二十；茨菇十斤，钱一百三十；米弍斗，钱三百七十；生油一斤，钱八十四；鞭炮一百头，钱四十四；酒三并[瓶]，钱五十四；双九一对，钱九；古宝四十，钱一十二。

一共该钱一千四百七十八，伸艮[银]五五算，八钱一分二厘九。

三年国贤来谷二石。

四年三月初八日清明开列：

一支肉艮[银]弍元；一支米谷壹石；一支咸鱼二十斤，钱四四算，该八百八十；一支宝烛钱五百；一支男孙利试[是]四十。

共支钱七百八十一，伸艮[银]五五算，四钱二分九厘五五。

共支壹两八钱五分九厘五五。

咸丰四年三月已尚存粗谷八石壹斗，伸艮[银]三两六钱正。

收来期价银叁拾九两六钱正，

共收来银弍拾陆两四钱二分三厘。

实收来外艮[银]息艮[银]弍拾壹两八钱〇三厘。

共生出本银弍拾〇两弍钱三分。

共支银壹拾柒六钱六分一厘。

尊贤交来长银弍拾叁两五钱一分三厘。

通共存银肆拾叁两柒钱四分三厘。

七月十五交出银弍拾叁两五钱一分，达成手收入。

上帝庙粮艮[银]一两三钱八分，

仁辉粮艮[银]五钱四分，
启焕粮艮[银]六钱，
学伦粮艮[银]四钱二分，
达勋粮艮[银]三钱，
启章粮钱一百四十，
业勋粮钱三十，欠钱六十，
伦车粮钱一百，欠二百，
亨美松文粮钱一百，欠一百，清吉。
隔田耀红粮艮[银]四钱二分，
礼中粮艮[银]三分，
官英粮钱二十，欠钱二十，
元勋粮钱五十，
尧勋粮钱五十，
建南粮钱二十，
亚成粮钱二十，
麦才粮钱三十，欠三年，钱六十，
西坑许元德粮钱二十，欠钱一百二十。
年年召[照]实征纳无差。

廿九年来汉山田租谷一石，廿七、八年份，
达成收扣租谷五斗，廿九年份。
早廿五年存下艮[银]六钱，交国贤手收。

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清同治二年)*

立明合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蓢"山埔壹段,嗣孙孙达成、学成与房长尊贤、国贤同众叔侄商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开荒围园,不用丈量,税亩为限,任达成、学成围筑以种果物,限以伍拾年为期。达成、学成所筑园及种果物等项费用本银若干,乃系达成、学成二人事。众议愿抛荒伍年,任达成、学成种植,倘得利,乃系达成、学成收回自用。如满伍年抛荒期,由第陆年起,此园每年所出果物、利息若干,俱要登明,大部当祖炉前算数,贰八均分,每两瑞英祖份下该得贰钱,种植嗣孙达成、学成二人份下该得八钱。或有异言,又不得强霸植此园。园内□□所种等物,不关瑞祖之事,乃系达成、学成前所费用,本银俱化为乌有。此园及种果物等项俱归果园瑞英祖管理为业,集众再酌另行发批,以价高者得。恐口无凭,今立合约贰纸,种植达成、学成收执壹纸为据。

一批卖果之银每月每年经份为凭。

一批明瑞英嗣孙执壹纸。

房长尊贤的笔

弟国贤

弟业贤

侄茂成

同治贰年拾月十三日立

---

* 此合约原由孙妙茜保存,由其后人捐献本馆。原文无标点。

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清同治三年)*

立明合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蒭"税山埔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无庸丈量税亩,任达成、学成、观成围筑以种果物,限以伍拾年为期。今围园及种果物等项费用,本银若干,乃系达成、学成、观成自出。众议愿抛荒伍年,任达成、学成、观成种植,所出利息,仍系达成、学成、观成收回自用。如抛荒期满者,此园每年所出果物、利息若干,俱要登明,大部当祖炉前算数,弍八均份[分],每两银瑞英祖份下该得弍钱,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三人份下共该得八钱。或园内所种些瓜菜等物,乃系达成、学成、观成收自用,众无得浅见,多生异言;又不得强霸占植此园,须待至五拾年期满之日,达成、学成、观成将此园及所种果物等项送还瑞英祖管理为业后,集众再议,另行发批开投,以价高者得。前达成、学成、观成费用本银,亦不得追究填还,化为乌有矣。恐口无凭,今立合约弍纸,房长尊贤执壹纸,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执壹纸,永远为据。

合　约

同治叁年弍月十弍日立

国贤　　学成

房长尊贤　　种植嗣孙达成

业贤　　观成

茂成

---

* 此合约原由孙妙茜保存,由其后人捐献本馆。原文无标点。见本书图版四。

重修翠亨村祖庙碑记*

盖闻位极北方，天上久尊真武，灵昭南粤地中，尤焕人文，劳乎坎者，万物归居其所者，众星拱天，官书所称北宫黑帝，其精玄武者也。吾粤滨临大海，如天妃、洪圣、北帝，凡权尊水族者，庙祀尤虔。昔汉武帝伐南越，祷于太乙，而南越平太乙者，即玄天上帝也。我翠亨村上帝祖庙，创自大清康熙年间，于乡之北隅定基址焉。溯其来龙，本乎乾位；按其脉络，旋转坤宫，坐庚申而福曜辉荣，向甲寅而文峰蔚起。梯山耸翠，崖海潆青，说虽采之堪舆，神倍彰其灵应。惟是星霜久阅，鸟鼠频穿，宋惧颓，桴焚恐剥，用合同人谨商鼎革，以崇庙貌，以妥神灵礼也。诹吉曰：以涓成。望神庥其来下，规模式旧，丹蔼重新。想披发仗剑之威严，以降善消灾为庇荫。夫持麋作供，尚喜动人天；施柰为林，且辉生龙象。何况成囷子敬之米，满库尉迟之钱，有不各随香火因缘，畀之吉祥德泽者乎？从此朝夕敬恭，春秋匪懈，玄旗耀采，七星灿而五福齐臻，金剑腾光二曜明，而合村同庆矣。

陆仁车喜助工金银五十二两正

喜认人物案台壹张

陆厚车喜助工金银壹拾两正

陆满源喜助工金银壹拾大员

刘元芳喜助工金银一大员

冯天祐喜认人物彩门壹架

杨国禧　冯辑耀　杨富辉

已上喜助工金银叁大员

---

* 据本馆藏翠亨村北极殿（俗称翠亨村祖庙）重修记事石碑原件。该碑立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系用黑麻石刻成，纵105厘米，横66厘米，厚6厘米，碑文文字为阴刻楷书。原文无标点。

杨达勋　冯振堂　杨兆勋　杨瓒勋　杨观忠

已上喜助工金银弍大员

陆程宇　陆贤宾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两弍钱正

孙敬贤　冯天庆　杨寿鼐　杨裕辉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两正

杨礼卿　杨灿辉　杨朝卿　冯灿垣　冯辑典　冯辑芳　杨焕辉
冯辑华　冯辑联　陆耀宇　杨集勋　杨达聪　杨敬辉　麦德一
冯三富　冯辑本　苏光泰　孙殿碧　杨尧勋　杨阿国　杨金玉
陆赞车　杨联辉　杨阿沛　苏灿明　陆爵车　杨业勋　冯辑在
杨兰辉　杨寿祺　杨颖辉　何润涵　孙阿德　何润瑜　陆达理
陆阿勇　甘秀伦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大员

陆达茂　陆达锦　麦亮阶　冯辑鹏　何阿焕

已上喜助工金银五钱正

何汉辉　陆阿魁　陆阿帝　苏阿发　谭侯登　何元爵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中员

孙阿海　孙阿叠　孙阿章

已上喜助工金银叁钱正

杨建昆　陆达宜

已上喜助工金银弍钱正

何元秀壹大员

梁敬雄壹中员

陆阿仲仝上

重修执事:杨达勋　陆爵车
冯辑鹏　孙　德

道光八年岁次戊子仲冬吉旦勒石

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

尝闻帝德建极，道运清虚，帝位配天，恩周宇宙。星躔金厥，灵符修于琼宫；光彻紫微，飞舆卫以玉女。此主静所以无为，而环拱因之有象也。我翠亨村之立此庙也，创自大清之朝，建于康熙之岁。前则环绕乎崖溪，后则盘踞乎桂岭，三百六度，久戴仁天，数百余年，安居乐土，民康物阜，祥和协于四时；雨顺风调，丰亨遍乎百室。固由地脉之灵，实赖神灵之庇也。兹以星霜递易，寒暑迭更，风雨未免飘摇，栋宇恐因颓废，欲鼎新而革故，爰集众而议修，询谋佥同，捐赀并喜。位则兼设乎天后，神则并祀乎金花。既鸠工而庀材，复蔬涂而丹蕤，运乘乾位，堵作坤宫，坐则主申而兼庚，向则主寅而兼甲。众轻易举，果集腋以裘，成神灵孔昭，不逾时而工竣。仰庙貌之巍峨，益神光之焕彩，纪成功于葭月，行祀礼于腊辰，将见宝剑宏挥，妖邪悉伏，灵旗点指，魑魅胥潜。海晏河清，利涉群占乎坎德；育婴保赤，资生咸赖乎坤元。从此以妥以侑，神明永享其诚，因之俾炽昌，士女并沾其福矣。

值理：孙尊贤　杨业勋
　　陆达聪　冯辑照

显：
杨承光喜认神龛一座

俊：
杨启文　杨启操　杨启怀

---

* 据本馆藏翠亨村北极殿三修记事石碑原件。该碑立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系用黑麻石刻成，纵100厘米，横60厘米，厚5厘米，碑文文字为阴刻楷书。原文无标点。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百大员

杨启垣喜助工金银柒拾大员

孙学成　陆廷芳　杨启宽　孙亚察　陆亚兆　陈谦容

六共喜助工金银弍佰五拾五两弍钱四分正

杨启彰　杨启焕

已上喜助工金银五拾大员

杨启荣　杨锦初

已上喜助工金银叁拾大员

陆润怀　冯建彰

已上喜助工金银弍拾大员

杨泽辉　陆久怀　陆庆怀

已上喜助工金银拾五大员

陆英怀　杨启懿　杨启泰　杨礼明　冯建南　杨义辉　陆善怀　杨礼贤

已上喜助工金〈银〉拾大员

杨礼中　冯建和

已上喜助工金银五两正

陆廷深喜助工金银六大员

陆用才　杨启昌　陆亚悦　陆正怀　陆廷津　陆怀恩　陆怀旷　陆亚翼　杨金祐　杨官听　杨瓒初

已上喜助工金银五大员

杨达勋　杨耀锦

已上喜助工金银四大员

杨元勋喜助工金银三大员

杨尧勋　杨裕辉　冯辑照　杨仁辉　陆达聪　冯亚成　杨亚星　杨官水　杨奕初

已上喜助工金银弍大员

冯建儒喜助工金银壹员半

冯辑联　冯呀姑　冯帝爽　陆朝车　杨亚泽　杨亚南　杨亚良　麦亚有　麦亚才　杨贵勋　苏帝新　苏亚快　杨华勋　陆爵车　冯官英　谭社安　孙茂成　孙达成　苏照明　杨尔炽　杨有荣　陆怀晃　陆怀成　陆怀升　陆亚学　陆亚好　杨国禧　杨亚平　陆达新　冯官有　陈谦广　陈谦赞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大员

杨启文程氏喜助工金银拾大员

杨启操郑氏喜助工金银五大员

杨启彰李氏

杨启焕黄氏

已上喜助工金银弍大员

杨启怀程氏喜助工金银壹两正

杨启垣谭氏　杨礼明母李氏　杨礼贤母谭氏　杨礼中程氏　杨仁辉卢氏　杨启荣谭氏　杨启宽许氏　杨锦初卢氏　杨启昌陆氏　冯建彰谭氏　陆用才程氏　陆廷津母卓氏　陈谦容孙氏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大员

杨元勋卢氏　冯建和母谭氏　冯建南谭氏　冯建儒谭氏　陆廷芳许氏　陆庆怀卢氏　陆英怀王氏　杨启懿卢氏　杨启泰陈氏　陆久怀卓氏　陆达新许氏　杨义辉程氏　杨奕初程氏　杨瓒初程氏　陆谦广梁氏

已上喜助工金银壹中员

陆达荣卓氏喜助工金银弍钱正

咸丰陆年岁次丙辰仲秋吉旦勒石

四修翠亨祖庙碑记*

自圣人以神道设教，而人心之感应于神者，咸肃将敬恭焉。吾乡庙祀玄天上帝，兼奉天后圣母、金花夫人，神灵丕应，匪今斯今。读重修、三修碑文，帝德神恩，暨夫山川之秀灵，坐向之美善，固已言之详明矣。今夫庙者，何貌也？貌也者，将以仿佛而形容之也。观瞻于是乎存，寅畏于是乎深，拜祷于是乎切，庇荫于是乎广。前之人若曰：必庙貌之庄严，斯神光之显赫耳！重修之距初基，其年岁盖难确考，迨三修则仅越二十有八年，执事慎敏，可不谓敬恭神明欤？比年来，以斯庙经今且四十一年，翠墨既不免销磨，栋宇且时虞鼪鼯。每一瞻拜，心实难安，正议捐修，迁延未果。适六月十九日飓风为虐，佥曰雨师警我，起风伯逼人来，其为神之示，应意可知也。爰即倡修，诹吉秋八月七日巳时兴作，随即劝捐，以季冬十三日丑时奉神升座斯庙也。由创而继，既因且仍，前代定之，后世守之，人事之所振兴，悉神功之所保佑。向使因循，姑待年过年来，将视先人所云："以崇庙貌，以妥神灵"之谓何抑？又何以彰感应之灵，而摅敬恭之志哉？庙既成，仍如旧列，各捐项若干，如左语有之。有人心，有神心。人惟能以其心心乎神，斯神亦将以其心心乎人。明圣经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以心即心者，正谓此也。诗云：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庶几哉！乡人士女，有感必应，惟恭则寿，惟敬则吉焉。

值理：杨启文　陆庆怀　杨义辉　陆廷深　杨礼谦

---

* 据本馆藏翠亨村北极殿四修记事石碑原件。该碑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系用黑麻石刻成，纵120厘米，横74厘米，厚5厘米，碑文文字为阴刻楷书。原文无标点。

杨启文捐银玖百柒拾柒员柒毫

敬送花草人物香案台壹张

杨启文正室程氏捐银伍拾员

杨启文副室郭氏捐银肆拾员

杨启文副室梁氏捐银肆拾员

杨礼华　杨礼浚　杨礼桓　杨礼耀　杨礼灿　杨礼周　孙德彰　杨礼钦　杨礼烜　杨礼泰　杨礼润　杨锡宗　杨德初

以上每捐银叁拾员

杨礼和捐银弍拾大员

杨联甲　陆雄明　杨存乐　钱福传　杨礼珍　苏浦庸　杨启寿　钱福昌　杨焕文　杨韶乐

以上每捐银壹拾员

杨文乐　杨秉俭　陆雄邦　杨锡初　陆望华　陆立本　陆远怀　杨镇乐　陈受邦　冯德纶　陆献文　陆四全　杨贞义堂　陆华造

以上每捐银五员

杨德初程氏捐银五员

杨礼铨　麦礼容　孙拔贤　陆雄和　陆廷义　杨帝荣

以上每捐银弍员

杨启文　杨礼华　杨礼钦　杨礼浚　杨礼烜　杨礼桓　杨礼泰　杨礼耀　杨礼润　杨礼灿　杨锡宗　杨礼谦　杨礼明　陆庆棉　杨郁文　冯建周　陆植怀　杨万胜　杨成乐　杨礼祥　杨振国　杨信乐　苏沛庸　陆雄国　陆雄明　冯德纶　杨　彭　孙德修　钱福传　冯贵全　冯帝明　杨启科　杨焕文　冯庆光　杨德初　杨启寿　陈寿英　苏声庸　麦礼容　杨礼周　杨镇乐　杨广文　陆树昌　陆华显　杨礼让　陆振怀　陆远怀　陆廷魁　杨义

辉　杨联甲　冯国纶　冯裕纶　杨正乐　陆廷深　孙集贤　杨礼庄　杨炳楚　陈受邦　陆廷芳　杨文乐　杨邦文　杨礼镗　陆献德　陆作庸　杨礼禧　杨礼沣　杨诵周　陆廷开　梁配祥　陈寿祥　陈天接

以上每户捐银壹员五毫

陆文成　陆可道　陆可盛　陈钟沛　陆　昌　陆华熙　陆帝时　孙德修　杨　荫　钱　爱　钱　金　冯建周　杨礼权　杨士彪　陆庆怀　杨礼南

以上每捐银壹员

杨　显　杨帝江　冯帝尧　杨　贯　杨　耀　苏宗铬　苏宗兆　孙　胜　冯帝光　杨　沛　杨　本　杨礼彤　杨炳灿　杨炳炘　陈钟悦　杨帝麟　杨帝关　杨帝清　陆庆庄　杨广文谭氏　陆树昌方氏　杨礼镗母程氏　苏沛庸陈氏　杨万胜母程氏　冯建周谭氏　杨礼权母林氏　杨礼权刘氏　杨礼镗梁氏　陆植怀程氏　梁配祥詹氏

以上每捐银壹中员

续捐杨礼登捐银贰拾员

光绪贰拾贰年岁次丙申季冬吉旦勒石

翠亨村祖庙铁钟铭文*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沐恩弟子杨昆池　孙德彰　杨德初　杨文纳　孙拔贤　冯建周　陆作庸　陆檀生　陆祯祥　杨仕同　杨帝荣　陆振怀　陆文灿　杨　郁仝敬送

德金炉造

光绪二十一年孟夏吉旦立

* 据本馆藏翠亨村北极殿铁钟原件。该钟铸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系用生铁铸成,口径58厘米,高74厘米,钟身铭文为阳刻楷书。

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传单)*

月之十一日,孙族恳亲会,假座大石街萧公馆欢迎中山先生。是日,孙族到者约二百人。两打半钟,中山先生驾临,由招待员引入接应室,少憩,随请先生登演说坛。正会长孙崇泰,宣布开会理由,宣布员孙龙光演说,先生答词后,即茶会拍照而散。

宣布员孙龙光演说词:"今日我孙氏叔伯兄弟,开恳亲会,欢迎中山家先生,皆以一睹颜色为幸。盖以先生提倡革命,扫除专制,建设共和,开四千年未有之政局,作第一任临时之总统,有功民国,造福同胞。大业告成,洁身而退,高风美德,世所同钦。余等忝属同乡同宗,开会欢迎,殆亦表示崇拜伟人之意也。虽然,今日之欢迎,其感情岂止崇拜而已哉!余鉴世界之所趋,惕大难之未已,有不禁从惊喜中,骤现出一种至危险之状态。故今日欢迎先生,亦不禁从崇拜中,而生出无穷之希望也。民国尚未承认,财政又云监督,此外交上之至危险也。至于财政奇绌,政治紊乱,军士骄横,商务颓败,盗贼频仍,此又内治上之至危险也。其最堪痛恨者,默察吾国之人心,与夫一般人民之普通程度,类皆不知共和为何物,以为共和政体之下,人人可以执己见而行,事事可以由私意而出,以嚣张不守秩序为平等,以胁迫放浪为自由,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大局如此,人心如此,蹉跎数月,吾恐茫茫神州,不亡于满廷,而亡于民国;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岂不寒心!然则如何改良之,威慑之,光大而维持之,此皆不得不希望于

---

* 据东莞上沙乡孙衍佳藏原件。1912年5月11日,东莞上沙乡部分孙姓族人参加了于广州举行的"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会"。此件系由当时与会的孙同发带回保存。现由其子孙衍佳收藏。原文有断句,但无标点。见本书图版十八。

先生者也。抑余尤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枝派虽同，毫无联络，且生计艰难，智识未开，是亦我族之羞也。先生素持三民主义，今者革命功成，民国设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已达其目的。惟民生主义，尚未发达，故又提倡振兴实业，以为社会生计革命之先声。以先生博大之学识，之经验，之能力，而进行之秩序，静观动察，又有最广义、广义、狭义之区别。则最狭义之最先着手，亦意中事也。富强中国，先生之素愿，此最广义也。而先生必思先整顿广东为模范省，则以广义为最广义之先导，大可知矣。且先生欲先整顿香山为模范县，则以狭义为广义之先导，又可知矣。不特此也，又有所谓最狭义，料为先生意中最先着手之点者，非我孙氏家族耶？则整顿家族为模范族，又可知矣。然则如何教育之，生养之，联络而固结之，则又不得不希望于先生者也。虽然，君等须知天下事，非一人所能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故君等均当以先生之热心为心，以先生之毅力为力，人人以先生为法则，事事以先生为标准，由一中山，化而为十百千万之中山，即是由一伟人，化而为十百千万之伟人。如是，吾孙氏之家族，不更光大而久远耶？此又鄙人所希望于君等者也。鄙人愿与君等勉之。若谓今日之欢迎，徒曰崇拜伟人而已，岂足尽所以待先生之心哉？”〇〇此词由孙龙光撰。

中山先生答词，略谓“今日得与我族叔伯兄弟相见，甚属欢喜。惟念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氏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见重，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甚好，合无数之家族而即成为国家。今者民国成立，政尚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将来再为推广，连亚州[洲]而联络之，岂我一族而已哉！”

附:孙族恳亲会纪事*

月之十一日,孙族恳亲会,假座大石街萧公馆,欢迎中山先生。是日,孙族到者,约二百余人。两打半钟,中山先生驾临,由招待员引入应接室少憩,随请先生登演说坛。正会长孙崇泰,宣布开会理由,宣布员孙龙光演说,先生答词后,即茶会拍照而散。宣布员孙龙光演说词:"今日我孙氏伯叔兄弟,开恳亲会欢迎中山家先生,皆以一睹颜色为幸。盖以先生提倡革命,扫除专制,建设共和,开四千年未有之政局,作第一任临时之总统,有功民国,造福同胞。大业告成,洁身而退,高风美德,世所同钦。余等忝属同乡同宗,开会欢迎,殆亦表示崇拜伟人之意也。虽然,今日之欢迎,其感情岂止崇拜而已哉!余鉴世界之所趋,惕大难之未已,有不禁从惊喜中骤现出一种至危险之状态。故今日欢迎先生,亦不禁从崇拜中而生出无穷之希望也。民国尚未承认,财政又云监督,此外交上之危险也。至于财政奇绌,政治紊乱,军士骄横,商务颓败,盗贼频仍,此又内治上之至危险也。其最堪痛恨者,默察吾国之人心,与夫一般人民之普通程度,类皆不知共和为何物,以为共和政体之下,人人可以执己见而行,事事可以由私意而出,以嚣张不守秩序为平等,以胁迫放浪不法为自由,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大局如此,人心如此,蹉跎数月,吾恐茫茫神州,不亡于满廷,而亡于民国;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岂不寒心!然则如何改良之,威慑之,光大而维持之,此皆不得不希望于先生者也。抑余尤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

* 据广州《民生日报》,1912 年 5 月 15 日。

处，枝派虽同，毫无联络，且生计艰难，智识未开，是亦我族之羞也。先生素持三民主义，今者革命功成，民国设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已达其目的。惟民生主义尚未发达，故又提倡振兴实业，以为社会生计革命之先声。以先生博大之学识，之经验，之能力，而进行之秩序，静观动察，又有最广义狭义之区别。则最狭义之最先着手，亦意中事也。富强中国，先生之素愿，此最广义也。而先生必思先整顿广东为模范省，则以广义为最广义之先导，大可知矣。且先生欲先整顿香山为模范县，则以狭义为广义之先导，亦可知矣。不特此也，又有所谓最狭义，料为先生意中，最先着手之点者，非我孙氏家族耶？则整顿家族为模范族，又可知矣。然则如何教育之，生养之，联络而固结之，此又不得不希望于先生者也。虽然，君等须知天下事，非一人所能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故君等均当以先生之热心为心，以先生之毅力为力，人人以先生为法，则事事以先生为标准，由一中山化而为十百千万之中山，即是由一伟人化而为十百千万之伟人。如是，吾孙氏之家族，不更光大而久远耶？此又鄙人希望于君等者也。鄙人愿与君等勉之。若谓今日之欢迎，徒曰崇拜伟人而已，岂足尽所以待先生之心哉？”中山先生答词，略谓“今日得与我族叔伯昆弟相见，正属欢喜。惟念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民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而血族之见重，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正好，合无数之家族，而即成为国家。今者民国成立，政当共和，合满汉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将来推广其博爱，家连亚洲而联络之，岂第我一族而已哉！”

二、孙中山亲属对家世的看法

孙妙茜对家世的口述

答钟公任问*

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总理系十八世)

关于孙家居住迳仔蓢的口述**

妙茜姑太口述过,从前孙家居住于迳仔朗的,到翠亨建屋也极艰难。中山出世的屋可能是孙达成建的,但全族孙姓在翠亨庙中没有猪肉分的,不单是中山一家,不是说拜山猪肉,而是祖庙猪肉。到中山当总统后,当入了庙,全体孙姓才有猪肉分。左步有个孙锦芳,在唐山是机械总技师,有权威的,带左步叔侄三四百人去唐山做工,都是孙姓居多。孙眉和锦芳是有联系的,孙中山到唐山也拜

---

* 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钟公任《采访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原件。见本书图版十二。

** 据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载《中山文史》第38辑,中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96年10月版。李伯新1965年10月10日访问孙锦言,孙锦言忆述孙妙茜的话。

会过他们，有同乡会的摄影留念。当孙眉、锦芳筹建一所乐南、乐千合作祠，锦芳答应本人出资兴建，后因地点没商议好，一个坚持左步，一个坚持建于翠亨而作罢。孙中山回翠亨时(1912 年)也曾到左步一行。因他不信菩萨，没有拜祖，只是拜会叔侄作摄影留念。当时孙妙茜叫孙中山出资由孙丁财(即锦言父)负责筹建一所家祠，孙中山只是说，现在不是时候，不必担心，以后搞纪念堂也说不定。结果不遂，以后没有打算再起祠堂。

孙科夫妇对家世的表述

孙科对《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的签注*

页数	行数	签注人	初稿原文	签注意见	备注
1	9	孙委员科	分居左沙头	分居左坊头	

孙科为东莞上沙车站茶亭的题词**

国父先代故乡

《国父家世源流考》孙科序***(选录)

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罗君香林所撰述也。罗君深治史学,探究国父家世源流,且十年矣。所阐发,皆明确。或

---

*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1933 年印本。该页签注全部内容已收入本书"五、年谱与传记选录"。

** 据香港上沙同乡会所藏茶亭照片。该茶亭已毁于 20 世纪 60 年代。见本书图版十九。

*** 据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 年版。该序全文见本书第 279~281 页。孙满 1989 年访本馆时说:"当年在重庆,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请孙科写序,并由罗香林代孙科起草了序的文稿,请孙科签字,我曾对科叔说,关于我们的祖籍不应认为是在紫金,而科叔则认为人家(指罗香林)是学者,我们应尊重学者的研究。后来科叔也认同过我们的祖籍在东莞的意见。"(此段引文见本书第 94 页)

有以谱乘世系，多侈言祖先华宠，不足深究而几研之者，是不知世系研究有其重要意义与严密法则也。

……

罗君此书，于资料搜讨，事迹阐发，皆惨淡经营，成之匪易，贡献实巨。盖即所谓世系研究有其明效大验之实证也。惟余尚欲有所言者，罗君所考，自国父上世入粤始祖以还，诚赅矣备矣，然自晚唐以至赵宋，其各代名讳事迹，与自赣迁闽经过，则第条列大体，未遑详述。斯固资料不备，有以致之，而闽赣之仍须调查，以别为一书，亦至明焉。抑国父以外，海内豪俊，相与追随效命，以助成革命建国大业者，其家世源流，亦须综为考述。以罗君之史学才识，而黾勉不辍，吾知其必继此更有述作也。

八十述略* （选录）

一、先世述略

民国三十一年，国立中山大学的史学教授罗香林写了一本《国父家世源流考》。罗先生这本书，对于我们香山孙氏这一支派，如何自中原转徙江南，而后定居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根据史料，作了一个扼要的叙述。

按我们孙氏这一族，在唐以前，都是住在河南陈留；晚唐僖宗时，我们的远祖，时为中书舍人及两浙节度使的孙拙，有子曰孙诜者，甚贤能。黄巢乱起，充承宣使，引兵游击闽越江右间，以军功封东平侯，屯于虔州虔化县，就是现在江西的宁都县，由于治绩懋著，

---

* 据孙科：《八十述略》，（台北）孙哲生先生暨德配陈淑英夫人八秩双庆筹备委员会1971年印。

百姓又安,为当地父老所挽留,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孙诇公五传至承事公,迁居福建长汀的河田。明永乐中,有友松公者,再迁广东东江上游紫金县的忠坝公馆背;又十一传至鼎标公,时当明清之际,鼎标公随钟丁先起义抗清,勇敢善战,为钟所器重,尝于一日升官三级,时人称公馆为连升馆,颂其功也。后鼎标公以兵败,族人多离散;其子连昌公,迁居增城;康熙中,再迁至香山县涌口门村,又二传至殿朝公,复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

殿朝公是国父的高祖,其子恒辉公生敬贤公;敬贤公生三子:长为达成公;次为学成公;三为观成公。达成公娶杨太夫人,亦生三子:长德祐公,早殇;次德彰公;三德明公,就是国父。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国父奉达成公命,娶同邑外莹乡卢耀显公之女慕贞女士为妻。生我及长妹金琰、次妹金琬三人。

以上略述,计自友松公算到我的儿子治平、治强、恰好是二十代;从迁到翠亨村起,算至我这一代,也有六代。

从史书上看,我的祖先都是深明民族大义,很重气节的。宋亡,则不仕于元;明亡,则不仕于清。到了抗清兵败,就干脆隐居起来,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这种屡世相传的民族大义,对国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后来之所以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帝制;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的环境所刺激;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祖先遗传的结果。

林添福编《孙氏族谱》孙科序*

我中华民族自古聚族而居,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外来之忧患

* 据林天福编:《孙氏族谱》,台北 1972 年印本。

艰危，亦莫不和衷共济。故其始也，因生活习惯之一致，而萌忠义之心。洎乎人口日益繁衍，宗族于焉形成。长幼尊卑之序愈明，大宗小支之别愈显。久而久之，千支万派，亲如叔伯兄弟，因年代久远亦不相为谋，其疏远者，见面几不相识，势必数典忘其祖，而不知此身之所自出也。是故欲明宗族之所由来，支派之所由分，则族谱尚矣！吾孙氏宗族出自河南陈留，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八七六年）由于黄巢作乱，孙诇为承宣使，领兵在闽越间从事围剿，屯兵于今江西宁都，遂家焉，此为我孙氏南迁之始族也。其后孙诇之子孙散居赣闽南部，及粤之东北部迨明朝永乐年间，有孙友松者，从福建迁徙于广东东江上流紫金县之忠坝，此为我粤籍孙氏上代入粤之始族，迄今盖五百余年矣。至于渡海来台之孙氏，起于何时，来自何地。因日据时代，遭受日人之催残压迫，素乏宗亲组织，宗族谱牒渺无可征，今幸修谱专家林添福君从事族谱纂修，顾兹事体大，资料搜集整理，应力求详实周到，俾我孙氏族系了如指掌，庶几后子孙，远不忘本，近不失亲，由宗族之联系，而达于国族之团结，进而重光华夏，则岂仅裨益于孙氏一姓，且有助于国家民族之复兴，岂不伟欤！

建国六十一年元月 日
裔孙考试院院长孙科谨序

陈淑英题字*

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

孙陈淑英（章）
七十二.五.二

---

* 据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版。

孙满兄弟对家世的表述

孙满致秦孝仪函*

一

孝仪主任勋席：

来示敬悉，照片簿各件，均拜领，费神，至感！（罗香林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舛误百出，满等已在《传记文学》为文，分别指斥其谬，）并曾将各种有力证据证实我翠亨孙族非出自客家之资料，在台北亲送党史会收存有案。

国父遗教："宗族中有穷源极流的旧习惯，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牢不可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满自幼至老，四十余年，曾走访东莞、中山两县宗亲，请教父老，对家谱，晋宗祠，发家藏之旧物，广征我祖家谱之旧习惯文献，我家谱文献足征，稽诸家藏真本，证诸乾隆同治年间所遗留之旧契约，用知我家谱之世系，有条不紊，自有待内证史料之发覆，而后国父家世源流足证，绝不可以外求，哗众立异。

顷在此间继续搜集得此类资料若干篇（附目录），兹随函奉上，请查收，研究，证明，迅赐公布，以正视听，倘蒙俞允，凡我中山翠亨孙族，同源感戴，匪独满一人永矢弗忘已也。专此布臆，顺颂
党祺！

民国七十二年十一月

---

* 据本馆藏原函影印件。

二

孝仪主任委员勋鉴：

前接七十三年一月十九日(73)史二字第〇一一号大函，敬悉。一是关于前函所述(2)乾隆八年香山县八世祖容窝公卖田契白文及注释及(3)同治三年达成公兄弟三人共订十一世祖瑞英公迳仔蓢山埔地合约白文及注释两件原照片，现由广东故乡翠亨村寄到，兹映印附奉，敬希察收，存备参考，余后当面陈述。专此。并颂党祺！

弟孙满谨上
七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恭述国父家世源流*

孙　满口述　祝秀侠笔记

先曾祖达成公号道川，妣杨氏生三子，长德彰又名眉，字寿屏，即我的祖父。次德佑，早殇！幼德明，名帝象字中山，号逸仙，即国父也。生三女，长四岁夭折！次名妙茜，适隔田杨子辉，寿九十有四。幼女秋绮，适西江尾林喜志。达成公兄弟三人居长，二弟学成公，妣程氏生一女，名亚桃，适安定乡陈维喜。幼弟观成公妣谭氏，无出。先祖父德彰公，妣谭氏，生一子，建谋公即先父，讳昌，号振兴，先妣王氏生满及胞弟乾二人。先叔祖德祐公，六岁卒。国父中山公，妣卢氏生一子建华，名科，号哲生。即已故考试院长。生二

* 据台北《广东文献》第12卷第4期。

女，长金媛，卒年廿岁。幼女金婉，适戴恩赛。继室宋氏，无出。

先叔父哲生公，娶婶陈氏（淑英）生二男，长名治平，次名治强。生二女长名穗英，次名穗华。兄弟姊妹，均已婚嫁，儿孙满堂，不多叙述。

我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为国父胞姊妙茜姑太收藏，大红色纸张，墨笔所写，我曾抄录一本。自先高祖敬贤公至十世祖植尚公，生卒年月日，一一载明：为我孙氏唯一家传信史。

五十年前胡去非先生所撰《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略述："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字允中，谥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至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真之聘至广东东莞任西席，遂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贵华公，分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贵华公生三子其十世孙名玄，号植尚，字礼赞，始迁香山县（今改名中山县）之东镇涌口村，此为孙氏居香山之始祖。礼赞公生两子，长缔宗，号乐千，次缔儿，号乐南。乐南公分居左坡头。后以不胜苛征暴敛，又返东莞，至满清乾隆时，十一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朗，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谱所载，自常德公侨居东莞后至中山先生之世为十八代……。"

已故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于民国廿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会演讲：《总理与中国革命》，曾说："总理直系的老祖宗，是北宋时候南京一位名士做过宋朝枢密使的孙固，总理就是孙固的三十三代子孙。在元朝末年，又有一个杭州的孙常德，曾做过元末的刺史，他是孙固的十五代孙。这位孙常德，为人最重气节。元朝亡后，到了明朝，他因不愿身事二主，所以就从杭州远远的迁到广

东东莞县隐居起来了。他的子孙，也就在这里一直住下来。后来到了他的八代孙，就是孙固廿三代孙，又从东莞搬到香山县，再移到翠亨村，这就是后来总理的诞生地了。”在总理的父亲这一代的家道，也是很艰苦的。但总理父亲的为人，却非常诚实严正，待人很是慈祥和蔼，在乡里中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老人家。总理的母亲，更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现在我们从许多有关的书上，还可以看到这位老太太的照相。大家看看总理的相貌就很像他的母亲。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个凡是相貌像母亲，而性情像父亲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可以想到，自然也有许多人这样去说总理的。这种古人传下来的说法，我们固然不必过于相信，不过在事实上，总理确是这样的。”(《中央训练团团刊》五十三期)。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编印孙总理年谱长篇初稿，内容叙述总理先代原籍及世系甚详。稍后叶溯中先生在杭州越风社所编印之《越风》月刊二卷一期，发表《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除列国父世系与上述谱稿略同外，曾提及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总理世系由其乡迁出各情词，源委颇备。

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所编印之《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与《越风》二卷一期所列孙公世系简表，同载始祖常德公，此为精确可征之记载。又《西南党务》月刊第廿六期，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亦谓：

“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长子乐千居左坡头，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朗，再迁翠亨。查核与左坡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源。”

又《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载有孙总理家谱序云：

“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大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循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子因马贼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四世祖殿朝公，即迁来迳仔朗居住，建造祖祠。”

谨按乾隆年间迳仔朗乃十四世祖殿朝公，非十一世祖瑞英公恐族谱记载有误也。

先曾祖达成公迁葬祖先之事实，其文云：

“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故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途遥远，往来艰辛之故，是以檀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

我在故乡时曾经听过妙茜老姑太说这样一段家世故事：“祖父敬贤公以耕读发家，很有钱。后来因为相信风水，各处找寻山坡佳地，准备迁葬上代祖宗坟墓，所费不赀。又因争山地而涉讼，变卖田地，入不敷出，家道中落，至父亲达成公，亦好风水，终年养一位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各祖先坟墓，都是父亲所寻得风水最好之地改葬的。祖父敬贤公之墓葬在翠亨村北犁头山南峰，墓门可远眺金星港诸多岛屿，气象壮阔，风景甚幽。地师说：‘葬后十年，必生伟人。’咸丰四年安葬，至同治五年，胞弟德明（国父）诞生，相去果然只有十三年间，而你的祖父（德彰公）后来在外洋开垦山林农场，畜牧牛羊，发了大财，岂不是富与大贵都应验，在我们孙家，你应该了解此事。”

国父初期十次革命，经费不足时，均由先祖眉公接济支援，可以说功在党国。民国卅一年秋，兴宁罗香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并请先叔父哲生公及党国元老

邹海滨、吴铁城、陈立夫先生等为之作序(先叔在世时,祝秀侠先生因事谒见谈话中曾询及此序是否亲撰?哲公答系罗香林送原稿请渠签名而已;又问吴铁老亦复如此)颇为称许。因之出版后风行一时。此后公私著作凡述及国父先世者,皆引用之,以为十二世祖连昌公旧居紫金县忠坝公馆背遭时多艰,迁徙外地,由增城再迁香山云云。当时邓慕韩先生阅后,心甚不悦,乃撰《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以驳之。罗教授不敢正面公开答辩,谨致书先叔父略论邓慕韩之文章谩骂相加,非有信据以正史实等语(函长不能详述)。

其实罗教授是根据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barger)所写《孙逸仙传记》谓国父自述其祖祠,原在东江之 Kung Kun 村迁居中山,仅数代耳。其文云:

"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的,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生在火奴鲁鲁,便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几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宗,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北的一个龚公村(Kungkun)里。据开智书局译本第一章翠亨'"。

于是,罗教授认定这个英文村名,不是东莞,而千方百计,托其友人代为调查,发现紫金忠坝公馆背,有一个孙氏旧族谱中,记载十二世祖"琏昌",硬指我十二世祖"连昌"公,为同一祖公,移花接木,把他们的十一世祖鼎标公,上溯至始祖友松公。制出"国父家世源流图表"一个,以为对国父家世尽了最大的努力。殊不知我家妙茜老姑太所收藏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所载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而忠坝孙氏族谱中并无记载此二代祖宗名讳。此事非同小可,十几年来,时常留心有关国父先世之文

章,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最近看到《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第四两期(七十年三月四日出版)国父逝世五十六周年纪念特辑,登载孙甄陶先生所撰《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上下两篇文章,洋洋数千言,再三阅读,不但文情并茂,而且所提理由非常充足,尤其"罗教授所谓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之说为吾人所怀疑之理由",十分精彩。例如:"吾人以为林百克氏此传记原稿之 Kung 字未必非 Tung 字,其 T 字误植 K 字或属手民之误,而非林百克之误。此其一。'东莞'二字,英译为 Tung Kun 是译音。中国地名之英文译音者,有从国语而来,亦有从方言来……"其结论:"上述罗教授所言,谓:'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坡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于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坡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一属人,亦未能以片语肯定。'玩其'既未必'与'亦未必','是否'与'亦未能'等语气,可知其尚未敢断然否定国父上世与左坡头孙氏为同一本源及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于此足觇罗教授以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氏之论据,自身尚立足不稳也。"

民国廿三年(日子记不清楚了)我曾陪同党史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到东莞上沙乡、员头山、迳仔朗等地视察该乡孙氏宗祠,邀请其族长及干事取出族谱,翻阅祖先名讳,果有十二世祖"连昌"公大名,与我翠亨孙氏家谱,名讳相同。因之邓慕韩先生当时致函西南执行部,证实总理家谱所载五始祖礼赞公,是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再迁翠亨的。而且陪往翠亨村坟地察看过,确有上代金塔(广东对骨灰的名称)十余个,但先高祖敬贤公及先曾祖达成公之坟墓,则地势较高,风水更佳耳。

本年(七十)九月廿四日孙甄陶先生自美国寄给祝秀侠先生一封信,内附共区传来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山大学历史讲师谭彼岸在

《学术研究》第三期中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即索阅之,其内容是:"谭彼岸根据一九五一年中山县土地改革中发现的旧香山县,孙氏祖尝旧契约四张和管公尝旧帐簿一本,进行研究考证,对罗香林的说法,提出辩伪。谭彼岸首先根据新发现的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兄弟批垦其十一世祖瑞英的迳仔朗山埔的合同,证明瑞英迁居迳仔朗的记载确是事实,从而否定了罗香林谓孙中山十二世祖连昌与十一世祖瑞英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朗迁出的说法。谭彼岸再根据乾隆八年,香山县孙梅景等卖田契约内容分析,证明翠亨村《孙氏族谱》的世系及世数无误,十一世祖瑞英必然是连昌的父亲。由此足以证明孙中山的上代,早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县大字都,所谓紫金县忠坝公馆村琏昌为翠亨村的始祖之说,不能成立。"

读了谭彼岸这篇文章,有根有据,其最重要者则为翠亨十二世祖连昌公有兄弟八人,而忠坝公馆村琏昌公兄弟四人,无一同名者,把罗香林教授所持理由,全部推翻。国父在天有灵;邓慕韩、胡去非先生等地下有知,亦可告慰矣。

我半年来研究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所载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中附刊总理世系图;又同月刊第廿六期所载左坡头孙氏族谱世系图与神位次序;以及越风第二卷第一期,叶溯中先生所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列孙公世系简表等,来粤始祖均为常德公——至十世祖礼赞公生二子。长缔儿(为左坡头始祖)次缔宗(涌口乡始祖再支分翠亨村)以此推算,则缔宗公生十二世祖连昌公已无疑问。是则我《孙氏列祖生歿纪念簿》中所记的十世祖讳植尚,十一世祖讳瑞英,必为礼赞公及十一世缔宗公之乳名或别号。已故胡适之博士有两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现在试作《国父家世祖孙表》一份,以后再去求证,这也是为子孙者应

尽之孝道也。

孙满回故乡* (选录)

孙满先生在中山翠亨活动时,讲了很多孙家的轶事,并与陪同人员就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孙满先生也发表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现择记如下:

在孙中山故居,孙满先生告诉大家孙中山先生当年出生的地方(在故居前院西北角),并告诉大家当年妙茜姑婆如何在故居的正厅中向他述说孙中山的故事。他还告诉人们,神台上的牌位是当年卢慕贞收起来的,因为她信奉基督,不再信奉佛教。看了孙中山故居内部一些家具陈设,引起了孙满先生的怀旧之情,他兴奋地说:都是原物,都是原样子。在寿屏房,他看到了陈列的酸枝木大理石面的圆桌,急切地问工作人员还有一张在哪里,工作人员告诉他,另一张在楼上书房。在二楼的书房,孙满先生说,书房的铁床原在板障后面的,但现在为方便观众参观,搬出来放在这里未尝不可。在孙中山故居厨房后面的浴室孙满告诉工作人员,浴室的浴缸是其祖父孙寿屏购回,当年还购回了一批自来水管及配件。在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他向工作人员解释了一些照片上的人物。他这次回乡也带回了一些文物和资料让我们作为陈列使用。

在谈到孙穗芳、孙穗芬、王弘之等人的时候,孙满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孙家现在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还是应该承认他们是孙家的人,不管他们的父母过去怎么样,但他们还是与孙

---

* 近年来,孙中山侄孙孙满先生多次回乡访问。此为1989年12月本馆工作人员接待孙满先生的工作记录(原件藏本馆)。另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香山——孙中山研究文集第3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61~264页。

家有血缘关系，我看还是要承认的。

关于孙氏祖籍和家世源流问题，是这次孙满先生回乡想要澄清的主要问题。此次孙满先生带回了一些资料，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孙满先生认为他的祖籍在广东的东莞是不容质疑的。这次他带回了其祖父德彰所藏的“家谱略记”原件和孙氏十二世祖连富（翠亨孙氏十二世连昌的兄弟）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所藏的族谱影印件。据孙满先生说，这个影印件曾在台北孙治强处保管了一段时间，这次孙满先生回乡把它带回。这个族谱与孙中山故居所藏（原为孙妙茜所藏）的族谱基本吻合，进一步证实了瑞英与连昌的传代关系，为孙中山祖籍东莞说提供了又一证据。现有族谱中孙家的传代关系又与孙氏墓葬基本吻合。孙满先生认为：从当地的历史和民俗方面看，孙家不是客家人。因为：1、客家人移居到此，一般与客家人合居，而不与当地人合居，涌口村不是客家村，左步村和翠亨村也不是客家村，孙家迁居到这些村子，显然不是客家人。2、过去本地人一般不与客家人通婚，孙家亲属在翠亨的无一人与客家人通婚。孙满先生说：出门在外的有两个人与客家人结婚的，即孙婉的丈夫戴恩赛和孙治强的妻子林伦可，在当地的没有。3、孙家不讲、也不会讲客家话。孙氏居住的涌口门村和涌口村、左步村的语言是与闽语同一语系，而不属客家语系。这些都可证明孙中山祖籍不是客家，即不是从紫金迁来，而是从东莞迁来的。当有人提到关于孙氏祖先是从紫金迁来的说法是罗香林提出，孙科承认的。孙满先生说：“当年在重庆，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请孙科写序，并由罗香林代孙科起草了序的文稿，请孙科签字，我曾对科叔说，关于我们的祖籍不应认为是在紫金，而科叔则认为人家（指罗香林）是学者，我们应尊重学者的研究。后来科叔也认同过我们的祖籍在东莞的意见。”“罗香林是移花接木，

硬把孙氏祖先的传代关系剪断,然后在紫金找到一本族谱接上。”

在看了孙家部分坟墓和看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藏的《孙氏家谱》和《列祖生没纪念簿》后,针对有人说这些东西是伪造的的言论,孙满先生说:“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山坟是真的,家谱也是真的,尽管在家谱中有些误点,当是传抄时的错误所致,但决无伪造可言。”孙满先生认为:孙氏山坟是世代相传、年年祭拜的孙家祖先的墓葬,岂有弄错之理,更何来伪造。

孙满先生自始至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孙家的祖先来自东莞”。

对《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一文之答复*

孙　满

广州《岭南文史》1993 年第 2 期潘汝瑶、何国华之《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①,以满主张吾翠亨孙氏祖籍为东莞而不承认紫金之故,指满“对孙家家族历史知之甚少”;又称:“孙满是孙中山的侄孙,孙中山在世时他还是小孩,其父又早年去世,他何处得来家史知识?”或谓满承认东莞为祖籍“毫无根据”,并指满受人利用,自造家谱赝品。对上述质问及无根据之攻击,满自不能缄默不言,爰撰此文以正视听。

满为翠亨孙氏十八世长房德彰公(孙眉)嫡孙,十九世长房建谋公(孙昌)长子,生于民前六年(1906 年),幼随先祖父居住澳门。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文集》(10~11),1994 年版。

① 潘汝瑶、何国华著《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一文见本书第 627~643 页。

民国六年(1917年),先父为国捐躯,满与弟乾返乡就养于先祖母谭太夫人。先叔祖德明公(即国父中山先生)悯予兄弟孤苦,令人接余兄弟出广州,使居于广州河南大元帅府,由宋太夫人(庆龄)照料,后又送余兄弟至广州培正中学就读,满兄弟皆承先叔祖抚育,得以成立。及民十四年(1925年)叔祖逝世,满已廿龄,惊闻噩耗,哀痛欲绝。满早岁于乡间,得常随侍先姑婆妙茜姑太及叔祖元配卢太夫人,对家族历史颇有所闻见,非如所称"对孙家家族历史知之甚少"。诸长辈及乡中父老咸称翠亨孙氏祖籍为东莞,与左坡头孙氏同源,现尚有先祖德彰公、先叔祖德明公于民元(1912年)五月谒左坡头祖祠照片多帧为证。民廿二年(1933年)满兄弟曾随邓慕韩前往东莞导访祖先祠墓。及至抗战军兴,始有所谓吾翠亨孙氏出自紫金之说,余力持其非。及至赴台后又数向先叔建华公(孙科)提及,以先叔既为东莞上沙题写"国父先代故乡",又承认紫金为祖籍,殊不可解。先叔答以无论东莞紫金,均为尊崇国父起见,不必过于计较。以上情形,吾孙氏兄弟子侄均知其详。若翠亨孙氏确为来自紫金,系客籍人士,今客籍人于政界、财界、学界多有巨子;先祖父、先叔祖及先父多有客籍友人,满又何必拒绝承认?惟吾孙氏语言、风俗与紫金客籍人有异,满今年八十有八,不能讲客语,先祖、先叔祖、先叔与家人相处,均操广州白话,此亦亲友所共知者。且先祖德彰公及先姑婆妙茜遗下各种家族文物,均为与紫金孙氏无关之明证,以是未便承认紫金为祖籍,非满好辩,亦非有恶于某县某籍人士也。满纵愚鲁不孝,亦断无冒认祖籍、伪造家谱之必要。若为名乎?满为国父侄孙,余祖、父均功在国家;当今之世,无论籍贯在何处皆有平等之权利,认东莞为祖籍固不足增余之荣宠。若为利乎?满行年九十,尚复何求?且祖籍无论紫金抑或东莞皆不能予满分毫之利。谓满受人利用,陷入"东莞说"者"以

孙制孙”、“以亲制亲”之计，更为无稽。满曾受高等教育，今已两倍于不惑之年，岂外人所能轻易耸动者？余数十年来不承认紫金为祖籍，一以贯之，以此说不足为据之故也。满忝为翠亨孙氏长房嫡孙，于吾家族事务自当有发言权，无须外姓人允准，岂有潘、何两位于吾族家世源流有发言权，满反无发言权之理乎？

瑞英公为翠亨孙氏十一世祖，其墓在连昌公墓侧，客岁6月满曾再返中山祭祀。瑞英公在历史上并非有名人物，于今亦无遗下任何产业，如并非吾翠亨孙氏先祖，其墓何以准许列入孙家祖坟坟场？满又何必祭祀之？《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一文强称瑞英公非十二世祖连昌公之父，非吾翠亨孙氏祖先。潘、何两位并非我孙氏族人，试问有何资格将瑞英公革除出族？且其文称“瑞英公是单身汉，单身汉如何能生连昌公？没有父子关系的两人，硬说他们是父子俩，这不仅是虚构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吾翠亨孙氏族人世世代代拜祀至今之先祖竟被他人指为伪造，实对吾翠亨孙氏宗族之极为不尊。

尚有一事，乃余所不忍言又不能不言者。潘先生又曾撰文《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刊《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1989年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题目已失之武断，兹暂不论；其文论及余曾祖达成公一节，尤为荒谬。现翠亨故居纪念馆收藏有达成公兄弟批耕瑞英祖遗下山荒合约，系先姑婆妙茜姑太遗下之家族文物。达成公兄弟于合约中自称为瑞英祖之嗣孙，潘先生竟指为伪造，并称：“我以为这是因为达成公不是真正瑞英公的后代，他不可能自认他是瑞英公的那一代孙，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能从权地采用了这个含糊名词，正如刚才在上面所说过的那样，使用‘嗣孙’两字要看是哪种场合，才能辨明其意义。在宗法社会里，一个祖尝的尝产如尝山、尝田等的使用权，只有其直系子孙才能分享。尝田

通常轮耕或收租，山荒地可能批种，在批种的时候，按照习俗，其对象必须是直系子孙，达成公虽然孙姓，但和瑞英公这一派孙氏，是不相统属的。现在想要批种瑞英公的尝山，除非攀宗认亲，在合约上写上个什么亲属的名词，以符合乡俗，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对方批种的同意，在这种场合下，使用含糊不清的'嗣孙'（不管是哪种意义）这个名词是完全可能的。但不能以此即认为是瑞英公的真正后嗣。"吁！是何言哉！按潘先生所言，达成公非唯与瑞英公不相统属，且达成公为批耕山荒，攀亲认宗，甘作外族人嗣孙。言下之意，竟直指作伪者为达成公！吾曾祖达成公为德彰公、德明公（国父）生父，平生耿介自持，从不为苟且蝇营之事，载于史籍，众人皆知。今有人公然诬指达成公作伪，此为我翠亨孙氏子孙所万万不能容忍者。

吾翠亨孙氏先世，躬耕数代，家族文献遗存无多；自德彰公、德明公以还，两代为国宣劳，无暇于家族事务。加以昔年国家多故，是以吾家族文物之收集整理尚欠完备。学者对吾翠亨孙氏家世源流，有所歧议，本无足怪。海内外人士，如作学理之探讨，客观之研究，满无不表示欢迎，即使意见不一，亦无须加以干涉。若有人作意气之争，甚至辱及吾孙氏先人，此非惟满兄弟子侄所不能容忍，也是大家不能赞同的。

关于家世的答问*

孙必胜记录

1. 关于孙满、孙乾 1933 年到东莞上沙祭祖事

孙乾:邓慕韩非常关心孙家的事,当日除邓慕韩及我两兄弟外,还有孙绳武及另两名姓孙的同往东莞上沙乡,见到祠堂及对联等。

孙满:还有童军欢迎。

孙乾:我们在东莞只住了一个晚上。上沙乡有几千人。我们去看祠堂及其他文物。邓慕韩深近视,眼镜很厚。

孙满:他教我们书,差不多为我们开笔。其实胡汝昌为我们开笔,教我俩书。

孙乾:胡汝昌跟阿公做笔墨的事,教我们读书。当时我们住澳门,他很喜欢赌"白鸽票",他是胡家的人,在新界有很多鱼塘。其来历不明,但一向在澳门料理我家笔墨的事,后来一变成为最虔诚的基督徒。后来跟澳门婆料理家事,也是做文笔的事。

2. 关于家谱

孙满:姑婆即妙茜姑太,给我看的那本家谱关于家世源流记载得很简单,写明我们家是由东莞迁居中山翠亨的。我还亲眼看过上沙孙氏族谱,明确记载上沙先祖系自南雄珠玑巷迁去。

3. 关于孙家是否说客家话

---

* 据本馆藏孙必胜手稿。此系 1991 年孙必胜在美国加州蒙特利市与孙满、孙乾谈话的笔录。

孙满:我家不是客家人,檀香山有很多客家人,而且很多结拜兄弟也是客家人。澳门婆(即卢慕贞)从来不与客家人来往,而且国父根本不会说客家话。当婉姑姐要出嫁时,他们带戴恩赛去见叔公(即国父)的那一天,刚巧亦是我们三人去访叔公,三人即我、阿乾及孙振。

孙乾:孙振即林少容的舅父。

孙满:还有,他们带戴恩赛去澳门见澳门婆,她半天不下楼,不肯见。

孙乾:因她对"崖(音 ai)子佬"(过去广府人对客家人的蔑称)有意见。

孙满:后来经人相劝,才下楼接见。

孙乾:戴恩赛是客家人。

孙满:客家人很团结,通常互相通婚,但我家的女士都不讲客家话,除戴恩赛外,未有与客家人通婚的。

孙乾:达成婆,即葬在百花林的杨太夫人是崖口人,我婆(即孙眉夫人谭氏)亦是崖口人,都讲"白话",以前婚姻重要,都由家长安排,我家并没有与客家人通婚。以前我家一佣人,叫黄婆,是客家人,但太婆、叔婆都不是客家人。我们祖家,左边为竹头园,很近,过了马路就是了,右面为牛角就有很大树林,翠亨为这两条客家村夹在中间,但仍未有婚姻来往。反而到较远的崖口(杨太夫人所居村落)、外沙(卢太夫人所居村落)娶亲。国父可能会说一两句客家话,因他到十多岁还在村里玩,可能与客家小孩交友。

4. 关于国父二夫人陈粹芬

孙满:阿太(陈粹芬)与国父有一幅合照相片。她是福建人,与国父在香港相识。

孙乾:当汪精卫(或胡汉民)跟阿太及卢太夫人说国父要他们

签离婚书时，阿太曾亲自与朱卓文及一位叫“阿清”的女士陪同到日本亲自问过国父才签离婚书。后来阿公(眉公)要与阿太同去南洋做生意，先给一笔钱嘱阿太先去，他(眉公)将随后来。当时有陆文辉与阿公很要好，且在南洋发达。

孙满：阿太拿到一笔钱，到南洋与陆文辉合作搞树胶园。阿公说明年会去南洋加股。

孙乾：结果阿公去世，阿太留南洋，姓陆的照顾，以后才返国。阿公被香港政府赶出境，想去广州湾，但结果到澳门买了一座大屋，风顺堂4号。前后有两个花园。若把屋拆了可有两三条街那么大。阿公对阿太(陈粹芬)特别好。澳门屋有四个大房，另有一个很长的房间，我们住的那间很近厨房。

孙满：澳门婆住第二间。阿太那间最大，有行李间，有睡房有客厅。晚上七时后，规定不能烧水，阿太则例外，因为她每晚要宵夜。

孙乾：阿太住大房，在楼下，楼上住杨德初(翠亨杨华日家人)，我们小时到阿太房看她打牌，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打牌。

5. 关于檀香山的族谱

孙满：大概有10年以上了。华祥婶及女儿返台湾观光，我南下观光时，碰到了她们，并问及她们家里是否有族谱，华祥婶说有，并说已交治平。治平前年在他办公室给我看，我当时在他办公室影印了几份，并将原稿带回美国，再用挂号寄回檀香山，她们亦已收到了。

孙乾：华祥婶仍在。

孙满：仍在。我们叫她叔母，她有女婿。

孙必胜：孙华祥是哪一房的？

孙乾：他与林少容的母亲有亲戚，在孙振的那一边。孙振与林少容的母亲(孙秀英)为兄妹。

孙满:他们那一支先发。

孙乾:就是黄草冈那挂山,还有支山歌,"……燕石在中央,谁人葬得着,世代为侯王。"抢葬黄草冈,先发那一支,有兄弟到了宁波,发了达,还娶了宁波女子,我们叫宁波婆,她就是华祥叔的祖母,与眉公同辈,华祥父亲为孙梅生。

孙满:总之,檀香山的族谱与《孙氏家谱》所载差不多。十一世为瑞英公,到十四世植尚及殿侯公止。连昌公有几个兄弟,连昌是第三房,他们那边有田契为证,连昌公的名字也在里面。我们家从瑞英公开始是绝对不会错的。

6. 红纸《家谱略记》是如何找到的

孙满:《家谱略记》乃先祖存下衣箱内,由金满于 1979 年整理文件时发现。其原件用红纸墨笔书写,纸质因日久已变残旧。

二十传裔孙满、乾恭述早年在乡之见闻*

满、乾幼失怙恃。民国四年,先慈弃养;民国六年,先严为国捐躯,其时满年十二岁,乾仅十龄,先依祖母谭太夫人乡居,稍后又到广州,蒙国父抚育,得以聆听教诲。满长成后长期任职广州,乾亦曾任职中山县,故得常省问随侍祖母谭太夫人、叔祖母卢太夫人、妙茜姑太,与乡人亦时有往还。今虽事隔多年,所闻所见,仍历历在目,谨恭述于下:

当年,满、乾均曾亲睹妙茜姑太收藏之简单家谱,即《孙氏家谱》,上记翠亨孙氏上世来自东莞长(上)沙乡。六世祖乐千公居香山左坡头,乐南公居香山涌口,是为吾族居香山之始。是以翠亨孙

---

* 据孙满编:《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附录,1998 年 12 月印本。

氏与左坡头孙氏系同宗共祖。民元五月，国父辞临时大总统职后曾至左坡头孙氏宗祠祭祖所摄照片上，国父坐神殿前排正中位，右为秘书宋蔼龄女士，西帽西服，左侧为国父次女孙婉，与会宗亲一百九十余人。另有一幅亦为民元五月所摄之"广东孙族恳亲会"照片，国父坐第一排正中，国父之右边第二人手抱小孩者系左坡头族长孙庭赞，满认识其人。

翠亨村原建有孙氏祖祠一所，满十余岁时曾亲见，唯年久失修，上盖已失，四壁犹存，大门上石刻之对联亦在，记得是东莞上沙族人所赠，惜联语已忘。

翠亨村附近有吾先人茔冢数处，其一为犁头尖山一带，包括犁头尖山脚之达成祖墓、父建谋公与母王金顺墓和犁头尖山腰之始祖婆陈氏、五世祖礼瓒公、六世祖乐南公、七世祖耕隐公、八世祖怀堂公、十四世祖殿朝公、十六世祖敬贤公以及祖父德彰公墓共十穴。其二为翠亨东北二公里许崖口乡附近谭家山(土名"猪肝吊胆")之孙家坟场，为吾孙氏祖墓集中地，共四十余穴，其中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墓、十二世祖连昌公墓、十三世祖迥千公墓、十九世祖建唐公、娅姑姐墓，其余各穴则为孙氏远祖及旁系先祖墓，在此不一一列出。另外尚有翠亨西南黄草岗之十六世祖敬贤公妻黄氏墓、翠亨以西三公里"逼虎跳墙"山上之十八世祖德彰公妻谭氏墓及位于翠亨以北约十公里西江里村西北约半里之十八世秋绮姑太墓。

按《孙氏家谱》载及先祖所言，一八八〇年八月(光绪六年七月)，为便于清明祭扫祖墓，由达成公出面，藉檀香山各叔侄所捐输之银两，将涌口村先祖墓一并迁至翠亨犁头尖山土名竹高龙(今中山纪念中学附近)安葬。德彰公极乐此事，投银最多。约至一九三二年，时唐绍仪任中山县长，因欲修建总理故乡纪念学校(即今中山纪念中学)，须将孙氏部分祖坟迁走，故由唐县长亲理此事，由西

南政务委员会拨款，买得谭家山“猪肝吊胆”山地做坟场。原拟全迁，后建华公请一杨姓风水先生察看祖坟，故风水较佳者均未迁动，其余在犁头尖山脚之祖坟大都迁往谭家山孙家坟场。迁葬一事，自始至终皆由建华公与满参与，卢夫人与妙茜姑太亦予以关照。具体事务由族人社正（其人幼年曾参见国父，后曾随满供职于广州士敏土厂）与锦兴负责。

幼年尝闻祖母述及祖墓之事：敬贤公在世时，有先世遗下田产十数亩，惟因笃信风水堪舆之说，常登山玩水，且请人相勘，破费颇多，至变卖部分田产以维家计。沿至达成祖时，家境虽渐贫困，然达成祖亦好风水，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黄姓堪舆先生。各祖先坟地，皆黄某寻得，故将先祖茔冢一并迁至翠亨近处之风水佳地，且将原葬翠亨附近之风水欠佳之先祖墓一同改葬。时地师谓敬贤祖墓穴风水最佳，葬后十年，必生伟人。妙茜姑太述及先祖之事时，亦尝言及此事，故至今仍记忆犹新。

另在今纪念中学后山背，厝置祖先金塔十余具（金塔为放置骨殖之黄色陶瓮），据族人言，系自东莞上沙及涌口附近迁来。

或有人言，翠亨孙氏为客家人，讲客家话。翠亨附近确有不少客家村，村民均讲客家话，老姑太有一女佣工，系临近村庄之客家人。唯吾翠亨孙氏，并非客家人，亦不讲客家话。先祖父德彰公讲广州白话，乡音颇重；先祖母谭太夫人与妙茜姑婆、卢太夫人均讲中山本地白话；国父同吾辈谈话时讲广州白话，与部下讲话时或用国语，但我们没有听过国父讲客家话。先父建谋公、先叔建华公与吾辈日常谈话时亦操广州白话，从未讲过客家话。

民国二十二年，吾兄弟曾与邓慕韩到东莞上沙谒祖祠，同行者尚有孙绳武及另外两名孙姓者。吾等拜谒祖祠之后，又遍览其它文物，并在上沙宿一晚。邓慕韩深度近视，与先祖父、先父相熟，早

年教吾等读书，但跟吾辈开笔的是胡汝昌。胡跟德彰公做笔墨之事，喜赌“白鸽票”，他在新界有很多鱼塘，一向料理吾家笔墨事，后来变成虔诚之基督徒。德彰公过世后，胡又跟卢太夫人料理家事，亦为文笔事。

翠亨村国父故居，原系德彰公产业，当年德彰公自檀岛寄款回乡，由国父规划，请人建筑。民国二十五年，中央为纪念国父，特派员前来求赠故居，以供国人瞻仰，满慨然允诺，从夹万（保险箱）中取出清朝时所立之纱纸地契房契，其上书明产权人系德彰公，交中山县长杨子毅君转呈中央，此后由县府派员管理。时满赠出祖父名下之故居，并无任何条件及代价，仅为成全政府纪念国父之美意而已。

二十传裔孙满、乾恭述
二十一传裔孙必胜恭录
公元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

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对家世的表述

孙治平致孙必胜函* (选录)

……

在这些信件里面,有一个人(寄信者)声称,在战争年代,他曾在重庆见过我父亲,并和他谈过话。他在信中写到我父亲当时是用客家话跟他说话。我记得在父亲的早年,他在檀香山读高中的时候,他经常和一家说客家话的叫郑昭(音译)的人在一起,父亲教郑昭读书写字,并教他讲广州话,父亲当时跟他学了一些客家话。

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希望你在适当的或有机会的时候尽量去改正关于我们家世研究的错误和不当之处。

……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孙治强序** (选录)

谢君十分景仰国父的道德事功与国父的睿智、气宇。因此,十分留心国父的事迹及思想。为了探究国父家世源流,谢君除了详

---

* 据本馆藏孙治平签字原件。1992 年紫金县温济琴、温子初、孙林光等人分别写信给孙治平,指本馆"篡改和歪曲国父祖籍","又提出'东莞说',海内外影响甚坏"。温济琴在信中还提到孙科曾用客家话跟他说话。这是孙治平为此事给孙必胜的信。1994 年本馆萧润君馆长访台北时,孙治平先生向其表示翠亨孙氏祖籍来自东莞,不是客家人。在公开此信内容时,我们征询孙治平先生的意见,孙治平再次明确表述其祖籍来自东莞,不是客家人。原信为英文;孙治平在此中文译稿上签署"我同意此摘要稿 可以用。孙治平"。

** 据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版。

研史学家罗香林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外，多方旁征广引，走访故老，以求言证。于书中，将国父上世于唐末时，由河南陈留南迁江西宁都，明初友松公由闽西迁居广东紫金，清初连昌公迁居香山，皆略加阐述。还将迁粤始祖友松公至吾儿国元、国欣，历六百年，传二十一代，以科学方式，编成表格，一览无遗。对国父家庭与后裔及客家源流，亦予详实报导。

孙中山亲属在《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扉页上的签名*

送孙中山纪念馆存

孙治平	孙张楣	孙治强	孙林伦可	孙穗瑛	孙穗华
孙国雄	孙国元	孙国升	孙必胜	孙必兴	孙吴冰明
孙必达	程礼庆	孙必成	张承慧	孙　杰	杨坤仪
孙　敬	孙伟伦	孙伟刚	孙伟勇		

……

* 《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1998年编纂完成后，在各地的孙中山亲属中传递签署了两本，分别送本馆和萧润君馆长存。这是送给本馆的一本扉页上孙中山亲属签名中的一部分，表达了他们对孙满主编的《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的认同。

三、调查访问材料

总理故乡调查纪要*

邓慕韩①

余前编孙中山先生年表，为世所许，然七八易其稿，犹未敢刊而问世，恐一出入，贻误无穷也，兹被命编纂党史，且兼承总理年谱主任，负此重责，尤不敢不勉。适派赴粤组织广州办事处之便，乃约总理之又侄满（寿屏先生之孙）现供职广韶铁路，往澳，邀同同事王编纂斧军（王君奉中央党史会派回调查总理少年事迹）前往总理故乡详查一切，并得总理胞姊及其家人所谈述，益知前者所纪，尚有出入，无任愧悚！爰将大要摘录，其详则俟诸王君也。

邓慕韩谨志

孙氏之先，居粤东莞县属长沙乡。至明代，其五世祖礼赞公与妣莫氏迁于香山现改中山县东镇涌村口；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分居左步头。旋二人因赋税催迫，回东莞以避；卒以兵戈扰乱，竟不能返香山新迁之处，只留后嗣以居焉。爰及十一世祖瑞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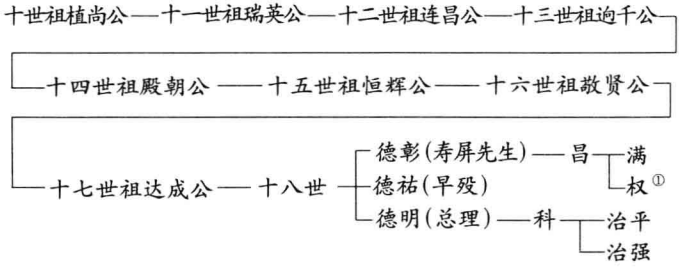
* 据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编：《新声》第18期，1930年出版。

① 编者注：邓慕韩（1881—1953），广东三水人。1905年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1930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广州办事处主任。

公，于清代乾隆时，再迁镇内翠亨村边之迳仔蓢，建有祖祠，然以人口稀微，老壮出外，乏人料理，故祠久圮矣。

翠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林木葱苍，风景佳绝。乡内一百四十七户；（民国初年所查）杨、陆、孙、何、冯诸姓聚族而居，杨姓最巨。

总理之谱系，可得而考者，自十世祖始，至总理已十八世矣。（其始祖至四世祖，均无名号，须往东莞长沙乡再查。六世祖至九世祖，则不甚明了须往涌口村再查）。兹将可考者，列之于后：



达成公，名观林，号道川；家贫。三十三岁，而与同邑隔田乡杨胜辉之女结婚。十年，而生寿屏先生；再三年，而生长女金生（四岁而殁）；又三年而生次子德祐（六岁而殁）；逾三年，而生次女妙西（适隔田乡杨子辉，七年而孀，生一子，三孙，现尚健存）；迟三年，乃生三子总理；再越五年，则生三女秋绮（适同邑西江尾乡林喜智，四十二岁而逝，生一子一女）。杨太夫人享寿八十二岁，卒于庚戌（民国前二年）六月十三日，不及见儿辈之建立民国，惜哉！然太夫人以六月十三日同月同日而生，亦奇事也。

总理之祖敬贤公，享寿七十八岁；父达成公，享寿七十六岁；兄

① 编者注："权"应为"乾"。

寿屏先生，六十一岁；总理亦六十岁，家多寿考。

总理少名德明，又名象。（习俗信神，其乡有北帝庙，多以儿女契之，故呼时多加帝字于其上，因又名帝象，非以帝字为派，以别昭穆也）。及立志革命时，自改名文，取义于前有武子以兵法而垂后世，己则以文治而改革前代也。别号日新，后在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时，以不雅，乃改逸仙。（或谓区凤墀所代拟）

总理生而重瞳，性泼活勇敢，善泅泳缘木；闲则画地为道，井然不紊，人问之，则谓须如此，乃可以利行人。遇儿童有不平事，则挺身以赴；由是群儿德之，虽在小姓，亦戴为首。故总理游戏，常部勒群儿，指挥一切。

总理家贫，至十岁，始在乡中冯氏宗祠受业于何铁士，复从程植生游。十四岁，往檀香山，依其兄寿屏先生以读书。十八岁，因宗教神权故，与其兄意见不合，遂于六月返国，与同乡陆皓东提倡新智识，适其乡有北帝庙，素为乡人所崇信，然年久神像剥落几坠，乡人疑总理与陆皓东所毁，欲得而甘心，旋为二人之父所解释，乃无事。其兄爱弟情切，恐再酿事，乃使离国。总理遂于十九岁十月再赴檀，二十岁三月返国，四月与卢夫人结婚；立志革命，亦在是年。（然自第一次由檀归国后，至二十岁时，曾在香港皇仁书院拔萃书室习英文。）廿一岁入广州博济医院习医，廿二岁转入香港西医学校，廿三岁丁父忧，廿六岁生子科，在乡亲营屋宇，廿七岁毕业西医学校。总理毕业后，香港雅丽氏医院愿月送五十元，聘为医生，总理却之，而往澳门业医。先是总理将毕业时，旅澳曹子基、何穗田家人患病，延总理诊治，一药便瘳，曹、何惊为神奇，俟其毕业，即邀请到澳，为之组织中西药局，（该局先暂设于仁慈堂附近，后设于草堆街遗址尚存，现为公安公司商店。）请总理主持医药。总理为利便人民起见，来诊只收诊金二角，出诊乃收一元，并在华人公

立之镜湖医院赠医，亦不受医院薪金。（镜湖医院之聘请西医，自总理始。）一时求医者，不特佩总理医术精深，益感其用心仁爱，以是业务益盛，遂招葡人之妒，出而禁阻。总理乃于廿八岁迁往广州，然当时遗下之器物书籍，尚有留存杨鹤龄、葡人飞氏处。

总理三十岁在广州革命失败之耗，传至翠坑，家人避往别处，然屋宇始终无恙，坟墓不被毁掘，诚属万幸。（只当日香山知县史继泽曾派谴差役到翠坑查办，勒索数十金便去）。乙未冬，杨太夫人偕卢夫人与子科（时已五岁）遂赴檀香山以远避。（至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迟日编出，其见于前著总理轶事者不复赘。）

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

王　斧①

粤中山县汉为番禺辖地，晋易东官郡，唐改东莞，宋始分置为香山。《太平寰宇记》云“东莞县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其地多神仙花卉，故名。”

沿珠江流域，出虎门，度伶仃洋。南望九洲，海天苍苍，海水茫茫。岛屿大小无数，嵯峨突兀，三五成群，若驯狮熟象，蹲伏沧溟中，隐从海外以卫中原门户者，中山南澳之形胜也。

恍若巨灵伸臂，一掌河山，湾原藻缋，林木郁蓊，海峡环抄，航樯云集。居斯土者，大抵中华人物，然国旗迎风而舞者，则又非天日之徽章！是即广州中山交通之要区，于有明嘉靖十三年，被葡萄牙人名为租借，实则占据之澳门也。

革命以来，革命党人，以避地轮输革命故，遂与此地不无关系。而总理当日，所以曾设医馆于其间，俾为革命机关，有由来矣。试由澳门，越关闸——葡人筑以为界者。——自南溯北，以达中山腹地，则中山全县，虽分为九区，然从第七区发轫，经六区，五区，过四区，便可以抵总理故乡——翠亨，程途则为二一·五三公里。

斧今此偕同志梁宿明，搭长途市车，赴总理故乡笔记一切矣！车既离前山，贫民丛瘁处。途中风物，似较前佳。新筑之阡陌，伸展其路线于平畴万顷间。高峰旁矗，岩石崚嶒，故垒萧萧，尚留残

---

* 据《建国月刊》第5卷第1期，1931年出版。

① 编者注：王斧（1880—1942），字玉父，号斧军。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1901年起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1930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

迹。陇畔稼穑，虽已葳事。但农人积秆成团，稻草余香，辄因风以扑人鼻观。而两旁山势蜿蜒不止，层峦叠嶂，林色菁葱，松杉遍山麓。山容老壮肥瘦虽不一，然山脉绵邈不绝，丘陵起伏，似有到处皆山之概。已而车逾古鹤，近下栅，东瞰淇澳岛，即复见伶仃洋，山光水色，冷日晴云，一望无际。汽舟与轻蓬交往，又觉炉突传烟，势若游龙。帆翼掠波，形同舞燕！



车迅进迅进。过长沙埔，有黄草冈焉。冈趺有旧营之窀穸，长眠其中者，即为总理高叔祖及曾祖，殆叔侄二人合葬处。坟向东，远嘱对面汪洋中，有矶盘起，荡漾巨浸，中若磐石，因以为案，俗呼燕石。瞻彼泽国，明丽如镜，海鸥狎潮觅食，白鹭拳立沙滩间，胜展图画。世之堪舆家，相惊以为遗荫总理者，即此抔土云。穴前有碑，镌字如左。

（观林为总理父名）

前次游此，尝记土人有山歌一首曰：

土名黄草岗，大海作明堂。

鳌鱼游北海，旗鼓镇南方。

金星塞水口，燕石在中央。

谁人葬得着？黄金大斗量。

（按歌中曰旗，曰鼓，旗作淇，鼓谐古。淇者淇澳，古者古鹤也。金星，乃海中小屿名。）

无何车顿止，吾侪已飘忽抵翠亨。古者史家之对于贤王圣帝也，恒有山岳降灵、日月入怀等佞言，未免为识者诮。然窃以为凡一伟大瑰琦之士之杰出，自必有其杰出之基。盖个人之精神、思想，常与其家庭、环境，有极大影响也。斧未履总理故乡之先，想象

总理故乡，当如何如何？今身亲其境矣，浏览周遭天然景物，其壮观及美丽，真出乎意表。吾侪姑立于总理室前之旷场，褒衡既广，泉山且环绕，白云如絮，徐徐出岫。古树多章，老干纵横，垂荫亩余。原上野花遍放，夜草怒生，牛羊慰慰，徘徊草畦间，耸其茸茸两耳，以听牧童之歌声，殆极田家风味也。

屋之故址，为第十世祖尚植公分房居此。据言当时不过拓地数弓，筑舍数椽而已。及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总理始将旧屋拆卸，建筑以今宇。纪元前十八年，总理悄然离去。民国元年四月十一日，曾一度归来。屋内北墙下，有石阑干井一，即总理诞生之所也。

时门内之警士向吾侪敬礼，吾侪已回敬而入室矣。我呼曰："姑婆！"

有老女仆应曰："姑婆在楼上，请坐！"

姑婆者即总理胞姊，予之敢作此称呼者，为循亡友孙昌烈士（被难于护法之役）之哲嗣，亦即总理从孙孙满同志，并村中一般人之口吻也。姑夫人为总理第四女兄，字妙西，适邑之隔田乡杨公宪华之三子，子辉先生为妻。嫁七载而寡居。无所出，有螟蛉侄子一，孙三个。年六十九岁。少选，姑夫人自内出，吾等起立。姑夫人蔼然曰："王先生多日不见了！"斧歉然曰："是的！因为小儿女连续染病，且在危险中，刚刚闹了一个多月，故耽搁至今才来。"

姑婆慰问曰："那末现在好了？"

"算是好了，但还是服药。"斧敬谨答。

姑婆怜悯地曰："小孩真是要小心管理呵！"

"是的！"斧颔之。

随回面见陆华熙同志自外入，彼此略一握手，便相率入一厅事。（总理从前书室。）我为宿明同志介绍，言特偕来共同工作者。众便环一圆桌而坐。姑婆则另坐一椅上。陆乃先烈陆皓东先生堂

弟，现住总理家，职司招待，及庶务。我报告曰："姑婆！日前我们所影之相，统共六十七张。已由邮局挂号寄南京了。"姑婆点首。

华熙曰："那末，王先生今天之来，是要记记姑婆所说的话了。"

我答："是的！"我与宿明稍理携来之楮笔。

华熙起身曰："现在已九点半钟，你们请即管工作，我去督人弄点饭。"

我谢曰："请不要弄饭，因为刚才在车上，遇见杨君鹤龄之兄弟子刚同志，他约定要去唐家湾买些大蚝回来，请老友们到他家去吃饭的。"

华熙复曰："这样，就不客气了！"

"王先生！我日前不是曾告诉你些我的三代吗？我的高祖殿朝公，是生在满清乾隆乙丑年，四十九岁卒。高祖母林氏，六十岁卒。曾祖恒辉公，是生在乾隆丁亥年，三十五岁卒。曾祖母程氏，是乾隆丙戌年生，嘉庆辛丑年卒。祖父敬贤公，是生在乾隆戊申年，六十二岁卒。祖母黄氏，七十八岁卒吗？"

姑婆一气说毕，稍停，复殷勤续曰："我的祖先，除我的父亲达成公葬于镜仔朗，曾祖恒辉公葬于黄草冈外，其余如祖父等，及以上各祖，均是葬在犁头尖。犁头尖就是一出门便远远望见那一个，最高而且尖的便是也。"

斧曰："是的！我曾望见这山，打算下次是要上去看的。"

姑婆慨叹曰："先生！有许多事情，是为我所不知道的。有点即使当日知道，现在年久月长，亦已忘掉，况者，我是不识字的！"

斧曰："只要姑婆随便教道教道就得了，不必一定要怎样怎样的讲才行的。"

"我父亲今年是一百二十岁，若还在的话。"姑婆挺身而坐，不待思索，娓娓而言："他三十三岁娶我母亲，四十三岁生大兄眉公；

四十七岁生女兄金星，四岁便夭；中间又生三兄德祐，六岁而殇。五十一岁生我。五十四岁生总理。六十岁生秋绮妹，她是四十二岁不在的。我家很穷，我父亲四十余岁前，完全是一个工人。曾在澳门充当鞋匠。每月工钱四块，一年统共四十八块。后来他又辞了那种职业，回来耕种，兼牧畜。田园不过二三亩。但种菜呀，养猪呀，是尽够的。他常说：'无豕不成家，要造成一个家，是离不了要养豕的。'"

我停笔曰："请姑婆慢些讲，我这钝笔来不及。"

姑婆点点首："我兄眉公是十八岁去檀香山的，二十五岁才回来，与我嫂谭夫人结婚。那时总理才十三岁，过了一年，便离开村学塾，跟眉公往美国读书，十八岁回香港续学英文。常亦回家。不料乡中神庙中，有数处偶像，忽然被人断颈裂胸，拗手折脚的，扔在地下。他们道是总理及陆皓东所为，便上门来大吵。登时，迫我父亲交出总理，总理恰巧不在家。我父又没有法子息众人的怒，乃操大杖出，四处找寻总理不见，回来气得发昏，并马上写信给我哥哥。自从闹出这场乱子，总理躲在香港，不敢回来。不久，总理接得哥哥的信，叫他再往檀香山，便于十九岁那一年十月起程。讵意一到埠，便给哥哥打了他一身。"姑婆言至此，以手搏心，似不胜其疼惜。"因为哥哥痛恨总理不该在家闯祸，令父母吃人陵辱的亏。"

华熙夫人自外捧茶一盅入，趋献姑婆。姑婆接饮已，即命役撤去吾侪冷茶，而易以热者。

"但是总理很崛强，总是不输伏。那些伙计又瞧不起总理，一切洒扫的苦役，大家都暗中相约不执，让总理一人去干。甚至上毛房，一张草纸，也要总理递给他们。次年，总理乃决意要走，临行的时节，他便对我的丈夫子辉这样说：'我不堪他们这班无知东西的苛待，但我却不想因此区区小故惊动我的哥哥。我去了，尔是要好

好帮助我哥哥的。我的哥哥,不是尔的哥哥吗?'他的姊丈无法阻止他,只得由他静中走了。总理孑身跑出檀香山大埠,得遇他的教师,美国人佛兰爹文。那教师向来是器重总理的,即请总理到他的寓所,细询总理以后行踪。总理告诉他,要回中国,他愿尽力相助,慨然出多金任总理携取,但总理只取美币三百员作旅费,辞谢教师而行。且先遍游美国各埠,然后给信眉公,说要回国。眉公得信,亲到大埠见总理,想要总理多住个把月。但总理不肯,说是已经定了船位。眉公道:'那我没有钱给尔。'总理答道:'我不要尔的钱!'总理就此离美国归。顺道游日本,次游上海、南京,然后回家见父母。我记得最确,当时他回来,还剩美国中金一枚,奉给老母,而且带回许多缥致的布疋,给我们姐妹裁衣服穿呢!"

姑婆言至此,态度略异,举目看壁上时钟,戚然曰:"好了,今日算是说了好些。时候已到,我要往澳门上省去!"

我闻言愕然,莫明其故。盖姑婆年届古稀,不轻出门,今言上省,究因何事?岂不悦我侪之刺刺,托词谢绝耶?我敬问曰:"姑婆何事上省?"姑婆不及答,适有一人仓卒入,为答曰:"请恕我唐突,我是姑婆的儿子。说也惭愧,真不幸!我的小儿子荣,去年起,才在粤汉铁路商股办事处册库组当审查员,竟经手失去废股票九张,共一千七百十五股,又于去年八月间,签名填写申请书,于同事程某手失去的废票一张,计五百股。俾重换公债票,现在这事发觉,子荣及程某,均已被拘。铁道部且有电回粤,着严行追究。这事不是玩的,故家母万不得已,命我跟他上省,看如何解救。"

姑婆此时蕴泪于眶而言曰:"我孩子方十余岁,前天新年假满,始离我而去。我本想他多念几年书的,因为他的表兄阿满,在广韶铁路管理局作事,见他闲在家,便介绍他这小位置。谁想他竟犯了罪。先生。我一生捱苦,是没有补的。总理从前对我说过:'二姐,

只要尔在家照料照料，尔的后裔，是用不着担忧的。'于今他受累坐牢了，败坏名誉，我是怎样痛心……"姑婆以巾拭泪。

斧敬慰曰："姑婆不要苦恼，令孙不过因嫌疑而株连，法律是公平的，何愁不水落石出。"

姑婆起身，取其毛织肩围及伞，徐步行。我为问曰："姑婆何日回来？"曰："大约十日八日。"我偕众尾送姑婆出门，望其子掖之使登车，而返。吾侪收拾笔记回匣。杨子刚已来，为邀我等及华熙饭其从兄杨劼庭君家。盖杨宅与总理居比邻，由总理屋右偏侧门后出，行数武，便达杨前阶。未食之先，各人忙于亲自行庖，独杨君陪我踯躅总理屋畔。

杨君曰："村内户口不过百余，以杨、孙、冯、陆四姓人丁较多。孙总理自起义革命，村中虽时有逻骑出没，然总不如袁世凯时代，龙济光派袁带驻兵石岐，时时带其爪牙落乡来，扰得鸡犬不宁。而孙家那时，简直亦无人敢住。我向在天津贸易，乡中多是传闻，但于幼年的事情，还能记得。总理的父道川公，他常在他的门前大榕树下石凳上坐着，手拿旱烟袋，尽吸。他的脸庞长长地，两颧高高，双眼睇人有神。他的须眉甚长，而且白。穿的是粗布衣裳。有时足登屐。他总是有事在心似的沉思。有时爱讲故事给我们听。他极爱朋友，他家虽不丰，但他曾奉养一位朋友至十八年之久。说也奇怪，他耐心供给那朋友这么久，固难，然同时那朋友也耐心跟他一块儿这么久，更难。"

我伫立静听移时，室内杯盘已陈。同席复有乡中父老三二人。惜吾侪须趁五时之最后岐关车返澳门，为时既促，酬酢而已。不克一一叩父老以史料。既而我偕宿明辞谢款我者，约再访而匆匆归。沿途车虽笨劣簸荡不堪，然不觉倦。惟车抵翠微，遥望马鞍。则薄霭笼山，灯光星发，钟鸣七句矣。

采访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

钟公任①

(一)总理曾祖父母及祖父母家庭状况若何?是何界人?在社会上地位若何?

曾祖父母业农,有田产十余亩。祖父母亦业农(祖父信堪舆学,常游玩山水),其时家境渐窘,先世所遗之田产,曾因急需而变卖多少。(总理的二姊杨夫人口述)

(二)有人说总理出生在东莞,二三岁后始迁翠亨,究有何据?

总理实生于翠亨,所谓出生在东莞者不确。(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三)总理生时当日之家庭状况若何?达成公在社会上地位若何?

达成公五十四岁而生总理,时家境清贫。(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四)达成公在澳门学工在总理生前若干年?因何故、于何年舍澳门回乡?

达成公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以前,在澳门学做皮革工(即做皮鞋),卅岁以后回家耕种。

以上是总理二姊杨夫人所口述,而总理的元配夫人则称:达成公在澳门学习裁缝,善制洋装衣。

---

* 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原件。

① 编者注:钟公任(1882—1947),广东镇平(今蕉岭)人,1905年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1930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成员。

(五)总理有胞叔二人,营何事业?曾读书否?与达成公同居抑异居?于何年出洋,谋何事,死于何地、何年?

总理之二叔学成公,曾往上海做工,后没于乡。三叔观成公,先往檀香山做工,后往上海做工,卒没于上海。二叔、三叔均曾读过几年书,住于翠亨村祖先遗下之老屋,与达成公异居。达成公所居之地址,即现在翠亨村第一号屋。(此屋系经眉公改造过来的)。(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六)达成公之疏属的伯叔及兄弟状况若何?孙氏始祖自何处迁来中山县?全族之状况若何?

达成公在翠亨,并无疏属的伯叔及兄弟[①]。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总理系十八世)。(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七)母夫人杨氏之外家状况若何(即总理外家)?

母夫人杨氏之外家在隔田[②],其父以耕种而兼营渔业。(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八)总理之姊与妹出嫁何人?大、小于总理几岁?

总理之长姊早故,二姊嫁隔田杨姓,现年六十九岁,妹嫁西江尾林姓[③],现六十一岁。(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九)翠亨乡原有住户若干?人全系孙姓,抑有别姓杂居?总理童年后,有迁移来居者否?

翠亨现有住户七十余家,为杨、陆、孙、冯各姓,杨姓户口较多,

---

① 编者注:翠亨村除了孙达成三兄弟外,同宗叔伯兄弟有孙茂成、孙玉成等人,后茂成迁居距翠亨七公里的南蓢圩生活,玉成移居檀香山谋生。但钟公任调查时,翠亨已无与孙达成同辈的族人居住。

② 编者注:隔田是崖口乡的小村落,以杨姓为主。

③ 编者注:应是西江里,不是西江尾,现属榄边乡,孙秋绮于1912年去世。

孙姓现仅二三家。(陆华兴先生口述)

(十)翠亨之田土山林若何?其中河流与海港相通否?能通行何等样船只(须分别注明)?五十年前状况若何?现在状况若何?

翠亨之田土尚佳,有山围绕,但林木不多,无河流,惟离海不远,海岸风景甚佳。

(十一)翠亨之住民普通以营何业者为多?工商事业发达否?

翠亨之住民,以营农、渔业者为多。在檀香山营农、工、商业者有百余家。(陆华兴先生口述)

(十二)翠亨乡原来之文化若何?总理前有无闻人?总理出生后读书人多否?村中有义塾否?总理蒙师有几人?学过英文否?总角交有否?

翠亨乡原来之文化不甚发达,总理前少闻人,总理出生后,读书人亦不多(惟近时有画则师、工程师及矿务、电机等专门技术人材),总理蒙师仅一老塾师(其为王姓或黄姓不详,因粤语王与黄同音)。总理在翠亨时未学英文。当时之总角交是陆皓东(陆皓东生时亦住翠亨村)。(总理二姊杨夫人及陆华兴先生口述)(陆华兴系陆皓东之弟,现住总理家中)

(十三)翠亨乡位于中山县何方?离城若干里?附近有无大市镇及大村落?离澳门、香港、广州若干里?离九龙若干里?水陆之交通若何?

翠亨乡附近无大市镇,离原日[来]之县城(石歧[岐])一六·五三英里,离澳门二一·五三英里。现有直达石歧[岐]、唐家湾及澳门之公路,交通颇便。

(十四)外国传教士在总理生前曾到过翠亨乡否?总理之父兄曾入教否?

总理之父兄未曾入教。(陆华兴先生口述)

(十五)翠亨乡当时之风俗若何?居民生活难易若何?三合、三点会的人多否?总理父兄与会中人有关系否?

翠亨乡当时之三合、三点会人不多,总理之父兄与会中人无关系。(陆华兴先生口述)

(十六)总理之父居翠亨时,尚营工业否?抑系专以耕种为业?总理生后家境若何?

总理之父由澳(门)回家后,仍以耕种为本位。总理生后,眉公未由檀(香山)回家前,家境尚清贫。(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十七)总理之兄,因何事故,于何年月出洋赴火奴鲁鲁?出洋时,总理已若干岁?总理之兄长于总理十岁,其出洋日至少二十岁,则父达成公应已六十余岁矣,究竟是达成公之意,要其出洋否?出洋时有无同伴?与何种人同伴去的?

总理之兄眉公,因家贫,于十八岁由其自己决定出洋,当时往沪、往檀,踌躇未定,卒取决于神而往檀岛,未有人同伴。(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总理元配夫人谓总理少于眉公八岁)

(十八)总理之兄出洋,总理仍旧在家读书,家道谅是小康,则达成公时已六十余岁,在社会上想亦很有地位,如刘季之太公居家时矣,然究有事实可证明否?

总理之兄眉公出洋时,曾将仍存之田数亩卖去,以作川资[①],则其时家非小康可知。(总理二姊杨夫人口述)

(十九)总理之元配夫人外家家庭状况若何?离总理家若干远?是达成公为之早定之亲否?年龄与总理相去几何?

总理之元配夫人之外家,其祖父时家道小康,其父承先业,读

① 编者注:据翠亨老人陆天祥回忆,孙学成去美国,寄钱回来买了4亩土质低劣的田地,由孙达成代耕。后孙眉出国无川资,孙学成妻程氏为资助孙眉,把四亩田典给别人,孙眉遂成行。

书经商，此外家（在外博[1]，现改称外沙）距总理家七八里。定亲时，达成公年岁已多，未理家事，故由眉公作主。元配夫人卢氏现年六十一，即少总理一岁。（总理元配夫人卢氏口述）

（廿）总理之二叔、三叔均早故，生有子女否？二叔母程夫人少年守寡，至民元方故（七十七岁），当然是旧社会中所称之贤淑女子。但其生时，生活状况若何？与总理家同居抑异居？

二叔、三叔均无子，而各有一女，二叔母程夫人生时，生活困难，与总理家异居。（总理之二姊杨夫人口述）

（廿一）总理出生后，乳名取为帝象是何意义？翠亨乡父老尚有能明其故者否？

帝象之名系总理的祖母所赐。象之意义，系取义于某山之形。（总理二姊及总理元配夫人口述）

（廿二）总理之子女若干人？何时出生？婚嫁状况若何？

总理之长子即哲生部长，现四十二岁。长女现三十七岁，早亡。次女适戴恩赛，现三十五岁。（总理元配夫人卢氏口述）

① 编者注：应是外茔（读 bó），现称外沙。

附:钟公任致陈肇琪[①] 函[*] (一)

为呈报事:

任此次奉命赴粤调查总理史实,经于前月十日晚由京起程,二十一日抵广州,往见邓慕韩编纂,询其以前调查各种经过。二十四晚乘船往中山县,二十五日上午抵石歧[岐](旧县治),下午乘车抵唐家湾,谒中山县主席唐少川先生[①],随赴澳门。是晚谒总理元配夫人卢氏。二十六日上午赴翠亨乡,瞻仰总理故宅,谒总理二姊杨夫人。下午复回澳门。二十七日见王斧编纂,询问各种。二十八日上午,与王编纂约定下午偕同往见杨鹤龄先生,讵届时而王编纂以有事不果行。复约明日下午偕往。二十九日上午,王编纂即遣人告以"杨鹤龄先生已于昨晚乘轮赴广州矣。"任即赴王编纂寓所,与王编纂商定办法,即是晚任赶回广州见杨鹤龄先生,如不获见,则应询问杨先生各节,随后由王编纂任之。任于三十日复至广州,到光复中学(杨先生为光复中学校长,寻常杨至广州必赴该校)探询杨先生是否来校。该校办事人答以未至,如此数日内有来必通知等情。任候了两日,杳无消息,拟即往谒陈少白委员,惟陈委员之住址询之革命纪念会书记亦不甚明白,只云到江门便可访得。是时广州风声日紧,江门船在此数日间开行时刻不定,而往江门之事遂以中止。本拟赴港见邓泽如委员,因邓对中枢之通电已发,故任到港亦未往见,而即乘原轮赴沪矣。

此次调查,其主要目的系探访总理幼年事迹。而总理幼年事

---

① 编者注:陈肇琪时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

* 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原件。

① 编者注:即唐绍仪。

迹则以总理二姊及总理元配夫人为较为明白，故任除先访问总理元配夫人外，即到翠亨乡访问总理二姊，谈论数小时，除将本会所嘱关于总理家世各节向其询问外，复请其演述总理幼年事迹。总理二姊以年老善忘谦让辞谢，经任再三恳请，始略述总理幼年事迹之一二。至于总理二十余岁在香港、广州、澳门宣传及运动革命事，任想杨鹤龄先生总能道其详。殊任见王斧编纂时，王编纂即出示杨先生复伊手书，中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年老多忘”及“如要谈论此事，暇时或能忆及多少”等语。以王编纂与他相交二十年之久，犹如此推辞，则欲对杨先生探访总理革命事实，非宽假时日，恐难得其真相也。所以任赶回广州寻杨先生未见之后，而即以此种探询任务商请王编纂随后相机进行。

而关于总理世系，则任初到广州时，邓编纂对任说：“前数日已将孙族报告总理世系呈文抄呈本会，不过其中之七世至九世则无从查考。因为孙氏已无族谱，而祖坟碑文又不甚明白，间有父子或叔侄共坟而不明其何者为父、何者为子，或何者为叔、何者为侄者。而父子或叔侄之间其名字竟有上一字相同，骤看之似为平辈者，所以考查实非易易。”①

总理故乡属于中山县之东镇，东镇属下分为三都，每都有数十乡村，翠亨即东镇某都中之一乡村②，风俗习惯与别乡不甚悬殊，惟逼近海岸，且离金星门不远，所以自来多出外谋生者。总理幼年对于不良风俗甚多怀疑，惟其所处环境，实无可以助其解决此问题

① 编者注：此处转引邓慕韩说孙氏已无族谱的话显然有误，因邓慕韩曾在中山故居抄录《孙氏家谱》，三十年代报刊文章谈到孙氏家世，多转抄自邓慕韩所披露的内容。“叔侄共坟”确有其事，王斧赴翠亨调查时，曾于长沙埔黄草岗看见十四世祖殿侯公、十五世祖恒辉公叔侄合葬墓（此墓今已不存）。

② 编者注：翠亨属大字都。

者，所以幼年时屡欲出洋以广其见识。迨至赴檀岛数年归来后，即具改革大志，盖其观察力实比寻常人不同。由怀疑而研究，由研究结果遂筹解决之方，此自幼年时固已如此矣。所以总理的天才实非环境所能限，而良好的环境亦足资为改革之明鉴也。除将询问所得另录呈核外，

为此谨上

陈秘书转呈

常务委员。

钟公任(章)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十四日

附呈报告书一本。

附:钟公任致陈肇琪函*(二)

敬启者任于本〈月〉廿五日抵唐家湾,随赴澳门谒见总理元配夫人卢氏。本日往翠亨村谒见总理之姊杨夫人。所询各节,均蒙答示概要。关于总理先世之考证,任抵广州时,邓编纂① 谓"于前数日已据孙族呈复各节,转呈本会。惟总理先世之七世至九世则不甚明白,且不易探索。"本晚任往谒王编纂未遇,明日拟谒杨鹤龄先生,而陈少白先生则于回广州时往谒。

本十六日钧处函示,任于抵广州时已奉到矣,先此奉复。

此上

秘书陈转呈

常务委员。

钟公任谨上(章)

中华民国廿年四月廿六日

---

* 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原函。

① 编者注:即邓慕韩。

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一案*

迳启者：

案查本部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据秘书处签呈，称前准西南政务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及据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先后转来东莞县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呈，称总理原籍实系东莞上沙乡，但刘耀廷、孙洁生等前诬称员头山乡为总理故乡一案，确于事实不符，请为考核修正等情，并粘附上沙乡代表前呈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驻粤办事处原文、孙总理家谱序文、孙总理先代世系图表、上沙乡状况表各一件前来，正核办间，复据东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呈同前情，当经一再函准广东省政府查复，略称总理始迁祖缔宗公确自东莞县上沙乡迁来中山县翠亨乡，至员头乡孙姓，系由赞礼公① 分枝，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等由，并抄送总理家谱四修谱序暨总理家系图各一纸、东莞县长邓庆史原呈一件，准此查此案既准广东省政府查明属实，似应将呈案转送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核办，是否有当，理合签呈核示等情一案，当经决议照办在案，相应抄录全案随函，送请查照办理，并希见复，至纫党谊。此致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计抄附孙绳武等原呈、广东省政府复函、上沙乡代表前呈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原文、孙总理家谱序文、孙总理先代世系表、上沙乡状况表、孙总理家谱四修序、孙总理世系图、东莞县

---

* 据《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原文无标点。

① 编者注：应为“礼赞公”。

长邓庆史原呈及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函各一件。

常务委员胡汉民
陈济棠
白崇禧
刘纪文
邹　鲁
林翼中
中华民国廿二年二月十八日

附录本案各关系文件如下：

1.孙绳武等原呈

呈为事关信史，不可讹误，特陈请详为考核，迅赐修正，以资昭垂事。窃敝族来粤之始祖讳常德，元时官浙江杭州刺史，元末避乱居南雄珠玑巷，与莞伯何真友善，偕来东莞，命其长子贵荣居员头山乡，为员头山乡孙姓始祖，次子贵华随父常德公营居于长沙乡（长沙乡即今上沙乡），是为上沙乡孙姓始祖，建立家祠。常德公没，安葬本乡附近土名土瓜山，其坟俗呼狮子滚球。贵华公之曾孙礼赞公，上沙乡孙族五世祖也，长子乐川，次子乐南，分居于香山（今中山县）左步头乡及翠坑乡。读总理家谱载由东莞长沙迁来者，实录也。绳武等前以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驻粤办事处考查总理故乡世系，于十九年十二月，依据敝族族谱、总理家谱，切实陈请转呈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已蒙颁给奖状在案。员头山乡刘耀廷、张德、孙洁生诬称伊乡即为总理故乡，呈由陈前县长转呈省府具报国府，遂致信以为确认作事实。不知世系源流、家谱、族谱编载详

明，岂可讹误。绳武等以事关信史，实难缄默，谨将总理家谱、敝族族谱暨总理世系表统呈鉴察，伏祈详为考核，迅赐修正，用资昭垂，敝族幸甚，仍乞批示，实为公便。谨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

东莞县上沙乡代表孙绳武
孙春山　孙子安
孙跃衢　孙霭廷
东莞县员头山乡原日代表孙蕊民
中山县左步头乡代表孙少华

计粘前呈前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驻粤办事处原文一件
孙总理家谱叙文
孙总理先代世系表

中华民国廿一年六月十日

2.广东省政府复函

迳启者：

案查关于东莞县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呈请考正总理故乡一案，前准贵处第一三九号公函以此案经陈奉常务委员谕，仍转省府饬县查复等因，复请查照办理等由，当经饬据东莞县长邓庆史呈复派员调查情形，连同上沙乡孙氏族谱影片十四张、宗祠对联影片二张，缴请察核等情前来。复经据情转饬中山县长饬属详细查明具复去后，现据呈复称，奉令遵即令行县属第六区区公所筹备委员会详查具复去后。现据该会常务委员唐炜深呈称，遵经派委区员弛赴总理故乡，会同该乡公所主席委员亲诣总理家庙，详细调查。兹据将总理家谱四修谱序暨世系图抄呈前来，经职详为考核，总理始

迁祖缔宗公，确自东莞县上沙乡迁来本县翠亨乡，至员头山乡，系由赞礼公分枝，当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奉令前因，理合备文，呈复钧府核转，实为公便等情，附呈总理家谱四修谱序暨世系图各一纸前来，据此缘奉前因，理合将遵令饬查总理故乡信史情形备文，连同总理家谱四修谱序暨世系图各一纸，缮呈钧府察核等情，附呈总理家谱四修谱序暨总理世系图各一纸到府。又经本府第六届委员会第一五七次会议议决，函送西南执行部核办，纪录在案。除分别令复东莞、中山两县外，相应抄同原附总理家谱四修谱序暨总理世系图各一纸，并东莞县原呈一件，函送贵处查照，转陈核办，见复为荷。此致

西南执行部秘书处。

附抄送总理家谱四修谱序暨世系图各一纸、东莞县长邓庆史原呈一件。

主席林云陔

廿二，一，十八

3.上沙乡代表前呈中央党史编委会广州办事处原文

具呈人：上沙代表孙绳武、员头山代表孙蕊民、左坡头代表孙少华，呈为系统查确支派已明，恳请转详立史，以重本源而彰祖德事。

窃孙总理原籍所在及历代昭穆宗亲名讳一案，前奉东莞县转奉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驻粤办事处，暨东莞公会，先后派委函询，饬即查明呈报等因，敝乡以案关党史，不能苟简，当经召集东莞之员头山乡及敝上沙乡分房中山县之左坡头乡，派出代表议决，分别搜求各乡族谱，以期明确而昭核实。虽以年湮代远，未能悉详，然

按代流存族谱记载，当可征信。兹就调查所得，敬为贵主任陈之。

查敝长沙乡之得名，实缘敝乡地濒海滨，长沙成带，位居乡前。长沙之名，实因于此。然敝乡又居长沙之上游，故又有名为上沙，此则地名之可考者也。至历代昭穆，稽之族谱，其事实略陈于左：

（一）远祖略历。太始祖讳固，字允中，号和父，谥温靖，宋管城人。登进士，初仕州，为宰相韩琦所知，历官颍王宫倚讲，及颍王立为太子，随转侍读，太子即位，擢任天章阁侍制知通银台司。神宗时，任枢密院及门下侍郎等职。其望重朝端，勋铭竹帛，事迹具详于鉴史，兹不赘。

（二）来粤始祖讳常德，号员沙，温靖公嫡孙也。仕元为浙江杭州刺史，当元末陈寇之乱，迁居珠玑巷，与东莞伯何真相公友善，真公并慕其品学，聘为西席，旋相偕来粤，至东莞员头山乡，即何真公乡之右邻。当始祖来粤时，携子四人，长曰贵荣，次曰贵华，三曰贵绍，四曰贵武。公初命长子贵荣居员头山乡，后率次子贵华公乃居上沙乡，此即敝上沙乡始祖也。三子贵绍公出居惠州三株竹，四子贵武出居肇庆。常德公偕长子贵荣居员头山乡，未几，即雅爱敝上沙乡风景清幽，故一届暮年，即常颐养于上沙乡贵华公家内，寿终后，卜葬于离乡八里许之土瓜山，俗名狮子滚球者是也。只以族少丁稀，强邻逼处，始祖坟墓近且为豪强占用，致一抔之土，无力保存，使祖宗踞处于九京。嗟我子孙，苟生人世，言念及此，痛愧何如。查贵绍公、贵武公分居后，子孙渐繁，或迁省地，或居别乡，辗转留存，散处各方，来往遂稀，现则无可稽考矣。然自二世祖贵华公居上沙乡后，传至五世礼赞公，生二子，长曰禘儿，号乐千，次曰禘宗，号乐南。乐千又分居中山之左坡头村，乐南则分居中山之东镇涌口，由涌口而支分翠坑。翠坑者，即孙总理诞生之故乡也。此则历代昭穆，稽诸族谱而可言者也。爰将各祖名讳统系开列，暨各

乡状况表分别列明，谨呈
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驻粤办事处主任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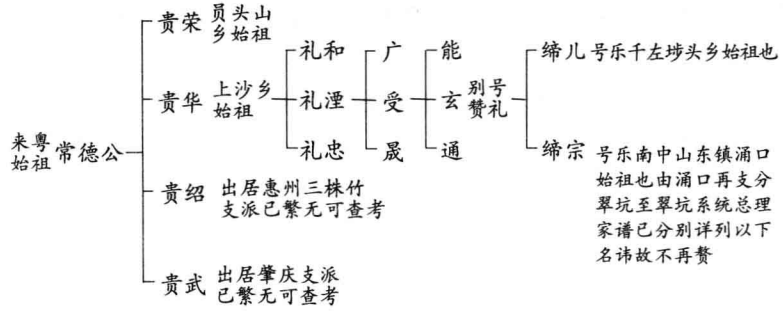
4.孙总理家谱序(据云总理之父笔记)

兹以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故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坑村坡头尖土名竹高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途遥远，来往艰辛之故，是以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

始祖婆陈氏太安人，生终年月无考。

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次子因贼马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村居住，建造祖祠。

5.孙总理先代世系表



6.上沙乡状况表

乡名沿革　乡名上沙，又名长沙，盖本乡濒海滨，长沙成带，本乡

居沙之上游，故名上沙。总理家谱所叙由东莞长沙迁来者，即此乡也。

所在区域　原日属东莞县缺口司，现属东莞县十一区。

交　　通　距离虎门太平墟约十八里，前临大海，直通港澳，后接宝太公路，直达石龙、广州，交通颇为利便。

党　　务　党部与区分部俱无，只有少数人入党而已。

教育状况　民十九始开办中山小学校一所。其初，学生约七十余人，现已开办三年，学生增至一百三十余人，已成全级小学。惟查全乡学童约有二百人，然限于经费，未能尽量收容，亦一憾事耳。

生活状况　乡人以农为业十之八九，并兼渔业及割水草。妇女辈亦能破草工作，生活亦颇自给，其余赴港营工商者十之一二。

农　　产　谷米、甘蔗、薯、芋为多，其余水草一项，运往外洋亦属不少。

渔　　业　乡居濒海，颇利渔业，海鲜虾蟹鸟鱼俱多，每年秋间特产者，则有禾花雀。

工作状况　除两造农工外，夏秋间收割水草，且随时均可业渔，乡人如属勤敏者，永无失业。

风　　俗　近年风气以办学及阅报之故，已暂开通，惟多崇尚朴实者。

宅　　地　坐北向南，横约二百丈，深约一百五十丈。

乡　　户　约四百五十余户，连柴间牛房在内。

祖　　祠　来粤始祖常德公之大宗祠在此，其余各房家祖祠约十三、四所。

祖　　墓　常德公墓地葬在离乡八里许土瓜山狮子滚球之原，现尚被强邻占用过半，不能恢复。其余二、三、四世祖墓，俱在乡后土名山口。

耕　　地　淡田约一百五十余亩，沙田约三十余顷。

池　　泽　村前鱼塘一口，约五十余亩。村中鱼塘二口，二十余亩。

男　　丁　约一千零六十余人。

女　　口　约一千左右。

备　　考　查惠州三株竹地方之孙姓，即与我同一始祖，如常德公之子孙，只以族少丁稀，被强邻压迫，十年前重有三千余人逃难来此，我乡亦曾接待，并于后村水围建泥屋十余间，供其住所，此项宗亲勤俭过人，现目皆能自给，而安居乐业矣。

7.总理家谱四修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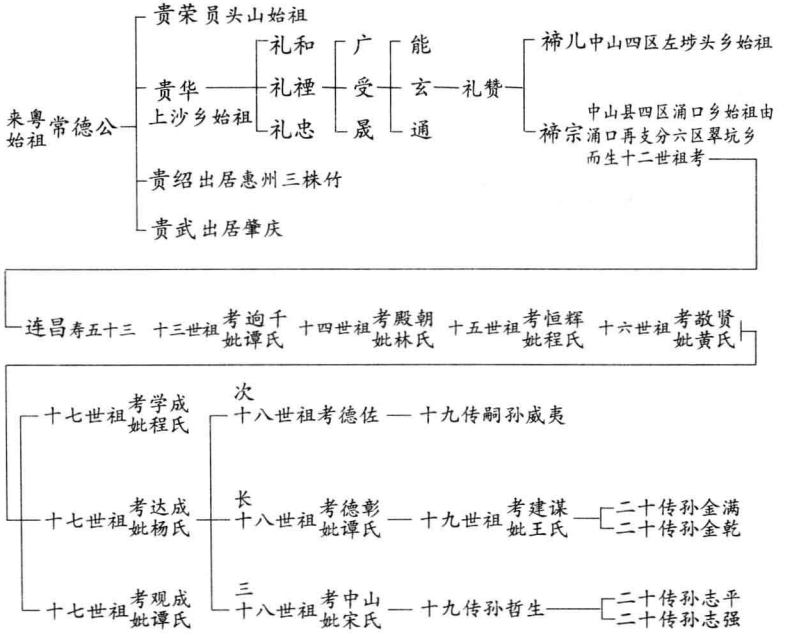
余族谱系自宗英公创始于雍正癸卯，祖乐川公重始迁也，上及常德公，溯重源也。乾隆辛巳，公复手修之，勤勤恳恳及其身，一再纂录，诚念夫支分派别，所以敬宗收族而教后人于孝弟者，将于谱示之也。嘉庆辛酉，英广公继其志，重修之，迄今又三十三载矣。两公修谱具存，而近代生卒迁葬又不可无以纪之也。爰命侄俊育、俊华，以宗英公始修之本为据，凡英广公所录，有互异者，有详加者，附注其后，将以征信，亦以传疑也。至于义利之来，尽协与夫烦冗复见之处，悉仍旧书之。盖余老无能为役，又无力足以就正高明，姑念族中人凡先代所传及近日所知者，荟萃成编，不使及余身而就湮没，若精益求精，则后之人之责也。虽然是犹谱之文也，非谱之意也。余观近人处宗族乡党间，往往因小得失，斗狠争讼，一结而不可解，争利已耳，不欲外人占便宜已矣。不知以同姓与异姓较，则异姓为外；以本房与别房较，则别房为外；以己身与兄弟较，则兄弟又为外。盖存一自利之心，则无非外，虽骨肉，有不胜其衅隙者，而他人无论已。今余

族自莞之沙头，迁居于是，又有各姓杂处其间，族之人倘有意乎？敦友爱而笃睦姻也，毋亦于谱，求由无服而上推，则皆有服也；由有服而上推，则亲兄弟也；亲兄弟之先，一身已耳。人莫不自爱其身，而今之散而为千百之身者，皆一人之身所分布，则孝弟之意有不油然生乎？以利于宗族者，利其乡党，此笃近举远之道也。聚族于斯，俾炽而昌，实由乎是，尤余所拳拳深望也夫！是为序。

时

道光十三年岁次癸巳仲冬谷旦十三世孙立宝、立国谨识。

8.总理世系图



9.中央党史编委会广州办事处复函

迳复者：

关于孙绳武等修正总理先代世系一案，五月廿二日，慕韩偕同总理侄孙孙满、孙乾二君，曾往东莞上沙乡，调查总理世系及始祖坟墓，大致与总理家中所存族谱相符。但当时尚未有与员头山乡孙族发生异议，故未将争持之点详细查明。准函前由，除函总理侄孙孙满函约上沙、员头山两乡孙族耆老定期携同族谱，在敝处详查外，俟查明实情，然后详细奉复。先此函达，希为查照。此致
西南执行部秘书处。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

10.东莞县长邓庆史原呈

呈为呈复事查接管卷内案，奉钧府文字第一三五二号训令关于东莞县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呈请修正总理故乡信史一案，令发附件，饬照详查具复等因，嗣又迭奉钧府教字第五五二号、第五六三号、第六零八号训令，以孙绳武等呈请考正总理故乡一案，与员头山乡孙族代表孙茂勋等呈请拨款建校，以教育总理先族故乡儿童一案。有关现拨款建校案，经饬据教育厅转据省督学黎钟查得情形，拟具意见，呈复到府，饬迅遵前令，将考正总理故乡一案查明具复，以凭并案核办各等因，当经黎前任迭令县属第十一区公所就近详查具复，并将遵办情形，于十月十七日备文呈报钧府察核。有案嗣以第十一区公所查复，有失详实，复经黎前任指令，严饬该公

所会同第二公安分局长,联赴该上沙乡切实确查。克日具复,以凭核转去后。兹据第十一区公所蒋兰雪暨第二公安分局长张孟才呈称案奉钧府第一七三二号指令,据蒋兰雪等呈一件,遵将总理故乡信史调查情形呈复察核,由内开呈悉。查本案迭奉省政府令饬查复,经已数月,据称派员调查言人人殊,而对于查得各方面情形若何,未据说出,殊欠明晰。仰第二区公安分局长会同十一区公所,上紧前赴上沙乡切实确查明白,克日详细具复,以凭核转,事关总理故乡信史,应速妥慎办理,幸勿敷衍塞责为要,此令等因,计抄发原案一卷奉此,自应遵照办理,当经会同第十一区公所派员,驰赴上沙乡调查。据该乡绅耆佥称总理故乡先代世系,在属乡均有族谱暨祖祠中先人牌位可查,并将族谱三本呈阅职等稽考。该乡族谱纪载历代昭穆,其太始祖讳国,字允中,一字和父,谧温靖,管城人。登宋进士,历官侍讲、侍读、侍制、枢密院及门下侍郎等职。其始祖常德公,讳八郎,号员沙,温靖公嫡孙也。仕元为杭州刺史,元末寇起,流寓南雄珠玑巷,因与东莞县伯河公交善,卜居莞邑员头山。常德公生四子,长贵荣,居员头山;次贵华,居上沙;三贵绍,居三株竹;四贵武,居南海。贵华字子贤,号鹤湖,明赐乡钦正宾。生三子,长礼和,次礼忠,三礼湮。礼湮生三子,长子受,次子广,三子晟。受生三子,长子能,次子通,三子玄。玄字礼赞,生二子,长禘儿,次禘宗。禘儿字乐千,迁往香山县左坡头村;禘宗字乐南,迁往香山东镇涌口村。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奉令前因,理合将调查情形连同上沙孙氏族谱影片十四张、宗祠对联影片二张,备文呈复钧府核转,实为公便等情。计呈孙氏族谱影片十四

张、对联影片二张，据此缘奉前因，理合将办理情形连同附呈影片共十六张，备文呈报察核。谨呈

广东省政府主席林。

计呈孙氏族谱影片十四张、对联影片二张。

东莞县长邓庆史

总理世系及家庭* (选录)

邓慕韩

余自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西历一九〇五年)投身革命,即随总理孙中山先生于役越南,及戊申、己酉(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清宣统元年,西历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又同寓星洲,勷办党务,民国二三年之间,复寓于其澳门家中,并授其侄孙满、乾二人国文,故总理家人,虽均认识,然于其世系,则未详也。民国十九年,备员中央党史会,兼广州办事处主任,亲往国父翠亨故乡,调查其世系及幼年事迹,得阅家谱,知其族由东莞长沙始迁涌口,再迁翠亨,所载简略。返广州后,向莞人查问长沙所在,均无所知者,迫得致函东莞党部、县府调查。莞之孙氏闻之,遂有员头山、长沙两族出而争认总理所自出,诉之中央,而就正于余,然无细阅族谱,均欠完满之证明。厥后又与总理侄孙满、乾二人,先后往东莞上沙乡、中山左步头孙族,将其祖坟、族谱、神位、对联等,细为研究,计阅时数载,而总理之世系,乃得真确焉。

(一) 世系

翠亨孙族之先,系出金陵(员头山乡族谱所载)。其远祖固,号元中,谧温靖,宋代进士,受知宰相韩琦;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王安石青苗忤旨,被谪江西,遂分居焉。至玄孙常德,号员沙,为元杭州刺史,遭陈寇之乱,乃迁于南雄珠玑巷,后与明东莞伯何真公善,真公慕其品学,聘为西席,旋相偕来粤,至东莞员头山乡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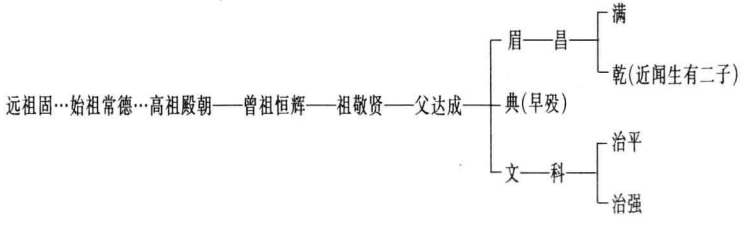
---

* 据《新生路》月刊第8卷第2、3期,1944年出版。

焉，是为来粤之始祖。常德公来粤时，携同长子贵荣、次子贵华、三子贵绍、四子贵武，初与长子贵荣居员头山乡，后以次子贵华分居上沙乡（即家谱所称长沙乡），爱其风景清幽，遂颐养于此而终（上沙乡族谱所载）。爰及明代，五世祖玄，号礼赞，迁于香山（现改中山）东镇涌口，生二子，长缔宗，号乐千，又号乐川，次缔儿，号乐南，缔宗则分居左步头，寻以田赋烦苛，胥返东莞以避。会樱世变，不复来香山，然自是有后于其地。至清乾隆时十一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至翠亨乡迳仔蓢，建宗祠，明祀典，顾丁口甚稀，老壮出外，乏人料理，未几祠圮（家谱所载）。溯自常德公至粤，以至总理已为十八代矣。

按孙氏族谱所载，第二世各有不同，如员头山谱所载常德公生二子，长贵荣，次贵华；上沙谱所载，常德公生四子，长贵荣，次贵华，三贵绍，四贵武；左步头谱所载，常德公生五子，长贤（居上沙，分支香山），次敬，三伦，四厚（居员头山），五坚，又图载常德公生四子，长鹤湖（即贤），次敬，三厚，四伦。各谱于人数既有不符，而次序亦复相异，大抵世远年湮，纵不遗失，亦为虫蚀，事后回忆，传闻遂异，致有此误，此属常有之事也。故特识于此，以备考核。

总理世系自六世祖至九世祖，家谱不甚明晰，兹将高祖以来，叙之如下：



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选录）

李伯新

访问陆天祥

时间：1965 年 9 月 4 日

年龄：89 岁

地点：翠亨村

访问人：李伯新

陆天祥口述：

我记得童年时，在迳仔朗有一间很小的孙家祠。

孙达成过去是有种过一些山地，什么时候开荒种的不清楚。当时种到一些山桔、梅仔加上几棵荔枝、龙眼合共约 100 棵左右，面积约有三四亩，因管理不善，果物没好收成，有时有些收成的，也没有见他成批卖过。种这样的旱田作物，劳动力不足，其妻杨氏是小脚女人，也要出去锄草种瓜等。

达成有佃耕过桃母田四亩，现供销社处，是劣田，一造亩产三石谷左右，无人愿意耕的。田租交学成妻（他们分家自食的）。龙田的土质较好，年中每亩有十多石谷收成的，因这是祖尝田，不一定是达成耕。达成耕一段时间，光贤（孙林汉父）也耕过该田，不用开投的。

---

* 据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载《中山文史》第 38 辑，中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96 年 10 月版。

中山幼年时，家有母黄牛一只，有时生牛仔也卖去。我童年时替光贤看过牛，当时他是耕龙田的。

迳仔朗有二家孙姓的，即孙来的兄弟。

达成识字很少，不大会写信。学过补鞋的，未见过他当过什么裁缝。

程植生是孙中山的启蒙老师，名帝根，是由南朗来的。

学成当时的住屋是肥佬雄对面、谭卓厨房背后的房子里，孙眉细小时也在此住过。

亚桃后来不知嫁于何处。

访问孙社正

简介：孙社正，男，住南朗圩尾，是孙中山宗亲，孙中山家族的坟墓，是他料理的。

时间：1965 年 10 月 4 日

年龄：54 岁

地点：南朗孙社正家

访问人：李伯新

孙社正口述：

瑞英祖尝田土名龙田二亩多，1949 年前收租每亩十多石谷，共收廿多石谷，是翠亨谭华国耕种的。年年都有猪肉分，清明拜山时分的，平时年节没有祭祖的。旅居外国的孙姓侨民很少回来扫墓的。

我父亲孙惠小孙眉二岁，一起去檀香山，由涌口门坐船去的。孙惠在那边开赌场的。

我曾祖父旭贤公，生子茂成。旭贤公死，妻李氏，改嫁南朗程

家,把茂成也带去南朗,茂成坚持孙姓。

龙田祖尝田由达成公管理。达成公死,交德联管理(茂成子),德联交玉成管理。玉成死,又交德联管理,德联死后交孙锦兴管理,由锦兴交谭华国耕种。

南洋婆陈粹芬,是孙中山没有正式结婚的妻子,取养女苏仲英,和孙乾结婚。孙乾论辈份低苏仲英一辈,即姑姐嫁侄子,无血缘关系。孙科认为:不论礼教,你们二人同意就可以了。

访问孙锦言

简介:孙锦言,男,翠亨孙姓迁居南朗居住,锦言祖父和孙中山兄弟很要好,他童年在翠亨读书时住于中山故居,和妙茜较亲近。

时间:1965 年 10 月 4 日

年龄:74 岁

地点:南朗孙锦言家

访问人:李伯新

孙锦言口述:

我父亲号帝彬,字建乃,名丁财。我家和孙中山一家是瑞英祖后裔。当时有四房人,即梅生一家、孙来(玉成)一家、中山一家和我一家。不知那四房人的父亲是谁,因无族谱,极难查考。过去锦兴(按,其弟)有一本的,后来分家产时也丢了。听伯父孙惠讲,林汉一家和胜好一家是涌口村孙姓跟来的。泮沙大队西坑村孙姓也是乐千公的后裔。

翠亨孙姓是东莞(长沙圩)迁来的,乐南、乐千在左步做收猪粪小买卖,后有一支从左步搬去涌口,现左步孙姓有 1000 人口。

翠亨的贤字派几多人,我也不了解。专贤的后人就是梅生、赞

生。梅生字德修。

孙中山一家人过去生活也很艰苦的,听姑太(妙茜)说,孙眉在16岁那年已去南朗程名桂处做工,不是卖身的,但家务活孙眉也要干。可能由于勤劳肯干,于18岁那年程名桂带他去檀香山做工的,以后生活才好转。

孙眉出国之初,其父达成仍耕龙田的田。所缴交租谷给祖尝作拜扫用,每亩要谷子六石,很贵的。每年也有烧猪肉分的。因我们孙家人丁很少。达成耕田时有小黄牛一头。他为人忠厚,肯为人办事的。

访问孙锦言

时间:1965年10月10日

年龄:74岁

地点:南朗孙锦言家

访问人:李伯新

内容:主要调查翠亨孙姓族谱的来龙去脉问题

孙锦言口述:

我从小在翠亨读书,和孙妙茜姑太一起共食,聆听姑太教言回忆不少,由于日久健忘,现仅补充说明一些东西及要和杨连合查证一些问题:

1. 关于孙达成三兄弟即达成、学成、观成,只有达成有子继后。达成要孙眉继自己的香火,孙文继学成香火,但只有两兄弟,观成香火无继人,后孙眉在檀香山娶一个加拿大婆,生下二、三个孩子,决定叫加拿大婆所生的一个儿子孙威回来过继观成,继承香火。抗战前回来,准备回檀香山,抗战爆发后不能回去,到澳门居

住,不久死了。

2. 关于南朗孙家抄孙族谱事,十一世瑞英、十二世连昌、十三世迥千(上述和中山家族相同)、十四世云灿(我们故居[①] 有一契据载云灿、梅占等卖田给迥千、廷专[②] 等人)、十五世殿英、十六世旭贤(广贤未娶妻)、十七世茂成(是旭贤死后其妻李氏改嫁南朗程家把茂成带去,而茂成认回本人姓孙的),茂成生四子,其第四子即德联,德联之孙子,字明昆,名锦言(还有孙锦兴是其弟,解放前,孙中山的家庭及协助卢夫人料理许多事务,也是孙家权威人士,解放后被捕,土改斗争时给枪毙了。)

3. 关于专贤[③] 的后人,今日到专贤家中调查确实,十二世连昌、十三世迥千也是同一宗族,十四世直尚、十五世殿候(有疑问)、十六世专贤、十七世富成。富成名新汉,娶谭氏生赞生,娶张氏生梅生。

4. 现南朗孙家属翠亨祖宗的有九丁人,即锦言、儿子强、志海、志坚一家,孙社正、儿子炳基一家,锦洪一家,丙夫、丙森一家(即孙锦兴之子),人丁单薄。

5. 孙林汉是很高辈份的,其子帝福是成字派,林汉就是光贤了。

6. 妙茜姑太口述过,从前孙家是居住于迳仔朗的,到翠亨建屋也极艰难。中山出世的屋可能是孙达成建的,但全族孙姓在翠亨庙中没有猪肉分的,不单是中山一家,不是说拜山猪肉,而是祖庙猪肉。到中山当总统后,当入了庙,全体孙姓才有猪肉分。左步有个孙锦芳,在唐山是机械总技师,有权威的,带左步叔侄三四百

---

① 编者注:此处"故居"指翠亨孙中山故居。

② 编者注:"迁专"即《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中的"廷尊"。广州话"尊"、"专"同音。

③ 编者注:"专贤"即《翠亨孙氏祖尝账册》中的"尊贤"。

人去唐山做工,都是孙姓居多。孙眉和锦芳是有联系的,孙中山到唐山也拜会过他们,有同乡会的摄影留念。当孙眉、锦芳筹建一所乐南、乐千合作祠,锦芳答应本人出资兴建,后因地点没商量好,一个坚持左步,一个坚持建于翠亨而作罢。孙中山回翠亨时(1912年)也曾到左步一行,因他不信菩萨,没有拜祖,只是拜会叔侄作摄影留念。当时孙妙茜叫孙中山出资由孙丁财(即锦言父)负责筹建一所家祠,孙中山只是说,现在不是时候,不必担心,以后搞纪念堂也说不定。结果不遂,以后没有打算再起祠堂。

1912年故居[①] 重修过一次,由孙丁财负责搞的。

7. 当时孙家值理是达成,因翠亨最老是达成,由达成管二亩五分龙田尝田,作扫墓分猪肉用。达成死后,由丁财掌管。后玉成(即孙来)从檀香山回,由玉成管。玉成死后由丁财再管。丁财死,由孙锦兴管理。每年必有烧猪肉分的,逢孙姓有猪肉分,中山一家当然毫不例外。尝田每亩每年收租六石,社正说每亩十多石谷的说法不对。

8. 桃姑太嫁南朗新填地程家,生子程丙坤,孙子天德,桃姑太很早丧偶,长住故居,后来死于故居,50多岁。

访问孙日源

简介:孙日源,又名孙财进,南朗左步村人。

时间:1965年10月25日

年龄:67岁

地点:南朗左步村

① 编者注:此处"故居"指翠亨孙中山故居。

孙日源口述：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旧历四月十二日坐一乘轿子由30个卫侍队员跟随来左步村，我们在村前沙岗仔欢迎，接着到孙家祠开茶会，由孙文庄主持。我当时13岁，正在读书，也作招呼他的人，他不肯吃饭，开完茶会就走。随后孙眉续至，下午他们的家眷才来，在此饮完酒才回。

左步孙姓是和孙中山的太祖同兄弟的。1927年我是雇农，参加农协会，受镇压出走上海至今才回家。

访问孙锦亦

简介：孙锦亦，男，左步人。

时间：1965年10月25日

年龄：64岁

地点：左步村

孙锦亦口述：

中山于1912年在左步孙家祠谒祖。孙眉和孙锦芳商量建孙家合作祠，不成。

我们太始祖名叫常德，生子公一，长住左步至今。

访问孙锦言、孙社正

时间：1973年10月3日

年龄：孙锦言82岁，孙社正61岁。

地点：南朗孙锦言家

访问人：李伯新

孙社正口述：据父亲说，起初迳仔朗。由旭贤公生茂成，茂成随母改嫁到南朗。广贤公30岁死，不娶。广贤、旭贤是亲兄弟。

抗战前，迳仔朗有一间屋，泥墙上盖由禾杆头夹起一片片遮盖屋顶，作孙氏祠堂，里边有许多神主牌，是孙家历代祖先的。后来该泥墙屋倒塌，就将神主牌搬去西亨孙姓祠堂处。

左步村孙锦芳在唐山做机械总管，有几百万身家，和孙眉二人商讨搞乐千、乐南合作祠，后来因地点不合，没有建成。

礼赞公在明代洪武年间来中山，连昌公在下四府有后裔几百人，解放前有人来联系过。

孙梅生是小婆生的，其兄梅景是大婆生的，去南洋。梅景生子名眉，女彩银。

梅生生下四子，华祥、帝景(7岁死)，在中山故居出横门之屋，是孙福的。孙福死，妻改嫁去韶关，有六十多岁，有执仔(过继儿子)。

孙锦言口述：孙中山在日本革命时收养过一个儿子，辛亥革命后已找不到了。

孙眉收养一“加拿”仔，在檀香山，是半“唐番”，字建唐，名威，人很高大。他留下几个儿女，现家族有30多人在檀香山居住。

孙玉成已去世，但其兄留下一大群子女在檀香山。玉成的侄子名华贵，居住檀香山就有四五十人。

孙梅生也有一群子女在檀香山。

在迳仔朗搬出的孙氏现只有二家人口存在。

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选录）

黄　彦　李伯新

（一）孙中山诞生前后的翠亨村概况

翠亨，清时属广东省香山县永宁乡大字都，是珠江三角洲下游的一个小村落。群山环抱，滨临南海，西北距县城石岐五十余里，南行七十余里可达澳门，东南方隔着水域与香港遥遥相对。在孙中山诞生前后，全村居民共七十户左右，有杨、陆、冯、孙、苏、谭、麦、陈、钱、梁等十姓，其中以杨姓人数最多，孙姓仅六、七户。

翠亨虽位于珠江三角洲，却是一个极端落后的中国农村，村中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极少。鸦片战争前后，土地集中的趋势加强，杨、陆两姓的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对翠亨一带农民进行十分残酷的封建剥削。做过广州洋行买办的陆仁车，回村后广置田产，他仗着与官府的勾结和洋人的势力，在村前举目了望，伸手指及的翠亨及邻村的田园，统统强行买下；拥地三百五十亩左右，不少自耕农因此失去了土地。靠拐卖"猪仔"暴富的杨启文，也占有土地三百亩左右。地租剥削苛重，有对分租，也有"主七佃三制"。除实物地租外，当地还盛行着一种所谓"期价银"的货币地租形式，即按谷物的时价折银，佃户须在每造插秧时甚至上一年先行交足租银，而不管收成怎样。由于当时天灾流行，

---

* 据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广东文史资料（25）·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农作物经常歉收，而无地少地的农民为了得到土地耕种，事前便不得不忍痛地向地主交纳一笔按风调雨顺的一般标准计算的“期价银”租额，故这种地租剥削是更加骇人的。高利贷剥削也非常残酷，月息一般是百分之二、三。官府的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每逢官差入村催收粮赋，则常向农民敲诈勒取，需索酒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层层压榨，加上翠亨因背山濒海地多砂碛，土质硗瘠而得不到改良，耕作技术落后，水稻和杂粮的产量很低，故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不少农民忍受不了沉重剥削和贫困生活的煎熬，离乡背井，到檀香山、美国、吕宋、香港、澳门、广州、上海等地，或垦荒耕种，或为人佣工，也有少数人经营商业。

翠亨地主势力为了维护其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还利用神权对农民进行精神统治。他们设立翠亨村祖庙——“北极殿”，大搞迷信活动，每年元宵举办规模盛大的“游神”仪式，并用竹制炮筒燃放火药，以祈丰年，名曰“炮会”。他们尽力使这座村庙拥有最高的权威，规定凡在翠亨定居时间不长的，或属于所谓“下户”姓氏的，不得加入村庙，而不入庙就不算“翠亨人”。他们又利用村庙进行剥削敛财：村庙拥地百余亩，用于出租；以举办元宵“游神”、维修村庙等为名，勒令每家每户捐款，从中贪污舞弊；每个男孩出生要缴交“户丁银”二元才算入庙，外村人也可申请入庙，但要缴纳一笔很大的款项。

翠亨又保留有奴隶制的残余。陈、钱、梁三姓被称作“下户”，给所谓“上户”（即地主家）当奴做婢。当奴婢期间，人身自由完全遭到剥夺。“下户”各姓被禁止加入村庙，不得与外姓通婚，并被冠以侮辱性的称谓——男人称“亚娣”，女人称“亚嫂”，即使年迈也不得称为“亚伯”或“亚婆”。在地主的凶残压迫下，曾发生过婢女自尽的惨剧。

孙中山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是在地主和农民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这就使得他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劳动群众的贫穷痛苦和地主官吏的贪狠残暴。[①]

(二)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诞生于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一七八九——一八五〇)，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佃耕农。父亲孙达成(一八一三—— 一八八八)从十六岁起，到澳门一间鞋店当了三年学徒。随后在板障堂街一间葡萄牙人开设的鞋店当鞋匠，每月工资仅四元。三十二岁返回翠亨，与附近的隔田乡(今崖口乡)杨胜辉的女儿杨氏(一八二八—— 一九一〇)结婚，此后就一直居乡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相继生下了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一八五四—— 一九一五)、姊姊孙妙茜(一八六三—— 一九五五)、孙中山本人和妹妹孙秋绮(一八七一 —— 一九一二)。[②] 孙达成是一个佃农，完全没有自耕地，先后租过祖尝田二亩半(每年租谷十五石，折交“期价银”六两六钱)，及弟媳程氏(孙学成之妻)的田地四亩，[③] 耕种水稻和杂粮；并曾养过一头耕

① 本节内容据陆天祥、杨珍、杨国英等口述，以及《孙氏乐安堂仕合号帐簿》(原件藏于翠亨孙中山故居)、《重修、三修、四修翠亨村祖庙碑记》(原碑藏于翠亨孙中山故居陈列馆内)等。

② 在孙中山出生前，还有一兄孙典，五岁殇；一姊孙金星，三岁殇。

③ 孙达成有两个弟弟孙学成(1826—1864)和孙观成(1831—1867)，因家境贫困，约于五十年代初期分别到上海和美国等地做工。这四亩田是孙学成从上海汇款回来购置的，程氏与孙达成存在着租佃关系。后来孙学成和孙观成相继在外地去世，在翠亨各遗下一妻一女，与孙达成家分居分食(孙观成之妻谭氏不久改嫁)。

牛。缠足的杨氏和年轻的孙眉也参加了辅助性农业劳动。孙家又曾饲养过一、二头猪和几只鸡鸭,作为家庭副业。孙达成还在夜间兼任更夫,每年挣得几石谷的工钱来补助家庭费用。逢村中有人办喜事或治丧事时,他也常去帮忙。他们全家数口住在村边一间简陋的小砖房(约长二丈六尺,宽一丈二尺)里,以番薯为主要食粮,家境相当艰难。①

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九日(清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孙达成以他和孙学成、孙观成兄弟三人的名义,订立了批垦孙氏祖产迳仔蓢山埔的合约,所批垦的山地面积不详。立约时孙学成、孙观成在外做工而不居乡,据估计,这是拟由他们两人提供资金,由孙达成提供劳动力以经营果木的一项合作计划。但是,立约后半年孙学成即身故,孙观成也于三年半后死去,经营资金落了空,孙达成自身的劳动力又不足,故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孙达成在这块山地上种了些荔枝和山桔之类的果树,但为数不多,收获量很少,从未出售过。②

从保存至今的一本孙氏公尝帐簿(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即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所立)的记载中,得知在孙中山出生前,孙达成曾管理过公尝,时间长短不详,已知的是一八四九——一八五〇年(道光二十九——三十年)。据帐簿所载,公尝田仅数亩,收支帐目至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约有四五十两银之谱。当时翠亨孙姓仅数户(没有一户是地主),男子多数出洋做工,公尝系由在乡的各户男子轮流或合作管理的。故孙达成曾管公尝一事,

① 以上据孙妙茜、陆天祥等口述,及《孙氏乐安堂仕合号帐簿》。孙妙茜说,她长大后,因住屋太狭小,只好寄居在邻人杨成发家中。

② 据《孙达成兄弟开荒合约》(原件藏于翠亨孙中山故居),及陆天祥口述。

并不说明他在族中有什么特殊地位。①

孙达成的家境困窘，可以从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所立的《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的记载中得到一个有力的佐证。由于全村各姓居民（被视为“下户”的除外）都负有维修村庙的“义务”，捐款是带普遍性的，故从所捐数目的多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捐户的经济能力来。碑记载明孙达成捐款一元，捐这个数目的人数最多，也是男丁捐款的最低额。② 这事发生在孙中山诞生前十年。

孙达成因为家贫，备受有钱势人家的欺凌侮辱，自己只好忍气吞声。他有一片园地种上红豆，被邻村迳仔蔭一家姓何的强行占了去（该事约发生于一八七一年前后）。有一次，孙达成挑粪到田里施肥，路过一地主家门前，地主仔杨宝常辱骂他，并喝道：“粪味真臭，以后再不准你挑粪经过我家门口！”孙达成不敢置辩一词，默默地走开。又一次，地主杨启焕之妻诬称孙达成夫妻偷了她一只鸡，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捉人，后来才发现鸡是跌死在粪坑里。③

① 据《孙氏乐安堂仕合号帐簿》，及陆天祥、孙锦言等口述。
② 村中地主杨承光则捐神龛四座，杨启文兄弟三人各捐一百元。
③ 据孙妙茜、陆天祥等口述。

我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孙社正①口述　李伯新记录

距今五十九年的八月(即一九二四年),那时我才十二岁,父亲名孙惠,携带我到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去见孙中山先生。当时孙先生在大元帅府办公,元帅府就设在该厂里。那里车水马龙,人员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父亲领着我,在大元帅府的传达室里,对传达人员说:"我是孙中山先生兄弟,从家乡出来要见他"。传达人员说:"孙先生很忙,我只管报告一声试试看"。等了一会儿,就有人通知我们父子进内。中山先生在接待室里等候,当见到我父亲时即起身握手说:"三哥,你今早出来吗?"又摸摸我的头,问我多少岁,读书没有,接着又说:"我即将出发到韶关北伐了,很忙,阿正留在广州读书好吗?"父亲见他这么忙碌,说回家乡读书好了。孙先生送了一点钱给父亲帮补生活费。我因见世面不多,总是低着头,有时候抬头看看接待室四周,见到只有一张长木台,十多张高背木椅,一张茶几,别的摆设就没有了。俭朴无华。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我从前在檀香山做工时,所赚到的钱,都大力资助中山先生搞革命。推倒满清后我想做官,中山先生回复我说:'你没有文化,办不好事,还是做你的生意吧!'"我们在翠亨的孙姓人丁不多,而中山先生都没有因亲族关系,私自举荐我们出来做事的。　　(1983 年 9 月)

---

* 据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讯·增刊》,1984 年 11 月出版。

① 编者注:孙社正系孙中山宗亲,与孙科同辈。

关于“国父先代故乡”之说*

——东莞长安区上沙乡调查纪要

唐　灵　记录整理

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在中山翠亨村，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国父先代故乡”在东莞上沙村就不是人所皆知了。最近，香港玄学画会名誉会长篮田先生，亲自到上沙村对这一问题作了考证。

七月二日，篮田先生在县的有关同志和长安区的区长陪同下到上沙村召开了调查会，参加座谈的有上沙村的干部和乡村父老共八人，通过座谈初步了解到如下资料：

一、孙中山的原藉（先代）是在东莞上沙，翠亨村家族的支脉在第五世时由上沙村（旧称沙溪）分支出去，孙中山是第十七世孙，这段史实、曾载入上沙村礼禋祖族谱，当时这一族谱由第廿二世孙孙秋保存，礼禋祖的账目也由孙秋家父管理。孙秋现任长安区合管会主任，他回忆说，中山翠亨村孙姓同宗父老曾赠题一副对联给礼禋祖祠：

庙貌庆重新想当年乐业安居德绍江东传岭表

宗支同衍派看此日源长流远泽由莞水播香山

二、一九四六年曾建牌坊于村口，牌坊题字“中山大道”和对联是孙中山侄孙孙乾的墨迹（孙乾是当时的中山县长），对联云：

中所景仰外所景从革命首倡共和肇建

山无不容河无不润故乡追念浩气长存

---

* 据东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东莞文史》第4辑，1984年12月出版。

三、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上沙村数十名乡亲父老被邀请到广州参加恳亲会，有集体照相留念，又有赠送的大总统相片带回来挂于孙氏宗祠，两旁的对联是：

萃子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

妥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

四、孙中山逝世后，村民修建茶亭于公路边作纪念。当时派村民去广州请孙科题字，孙科写了“国父先代故乡”六个字。当时一齐去请题字的人，现有孙秋健在，他回忆说，当时接见他们的是孙中山的侄孙女孙丽莲。该茶亭的对联是现任香港“东莞沙溪同乡会”会长孙子生所题：

中原致力建国元勋天下为公民主义

山斗仰名追源本系岭南望族莞沙溪

茶亭的设计人孙秋现根据回忆重画了茶亭的图纸。

五、孙中山前妻卢氏夫人曾培养过的孙绳武——省明伦堂局长，解放前做过三水、宝安、惠阳县长。现存孙绳武的楼房一座。

以上事实除孙绳武住宅一座外其余未有物证。茶亭于1981年修广深公路时毁了，其它东西均为“文革”期间毁掉。有关资料和历史事实有待进一步考证。

1984年9月7日

孙中山来香山县始祖居住过的涌口村*

李卓枢

过去,一些书刊在叙述孙中山的家世源流时说,孙中山的先祖是由外地迁居香山县的涌口门村。笔者认为:孙中山来香山县始祖在涌口村。

涌口门与涌口村是两个不同的地名。历史上的涌口门是一个小渔村,在丰阜湖出海处东北一座名为"三圣公"的古庙附近。居民多是流动渔民;而涌口村在丰阜湖的正南方,是一个有名的大乡。村民以梁姓为主,杂以黎、陈、孙和其他姓氏,两村相隔一个丰阜湖。《香山县志》卷一,四大都两图曰:"松柏山下。山东至企石山,东北一里为涌口,西一里为左坡,东北为大流角山……,五里西北为涌口门炮台,西北半里有山当涌口门。"(见国治《香山县志》卷一)

居住在涌口村之孙中山的始祖为礼赞公。在孙妙茜保存的翠亨《孙氏家谱》抄本中有这样的记载:"五始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坡头,乐南居住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在牛路坟同墓。"当地有这样的传统,次子以下成家后即要分家,另图发展,为开枝发叶。但长子乐千见左坡一带水草肥美,便移居与涌口村一隅之隔的左坡村,成为现今左坡乡孙氏的鼻祖。

---

* 据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讯·增刊》,1984 年 11 月出版。原文将地名"涌口"和"涌口门"均写作"冲口"和"冲口门",因当地方言"涌"、"冲"同音,故易写错。今经作者同意,将上述"冲"字均改为"涌"字,以使本书相关地名一致。

次子乐南在涌口村成家立室,生下桂廷、日昌、耕稳、容窝四子(见翠亨《孙氏家谱》),乐南卒后,葬于涌口村黄南坑。后来,乐南的后人迁居迳仔蓢、翠亨村。因此,每年清明时节,翠亨孙氏都组织男丁到涌口扫墓。杨连逢说,孙眉就曾去过涌口扫墓。涌口及附近村落的老人,都闻及翠亨孙氏族人有这样的传统。

后来,由于涌口与左坡两乡不断闹矛盾和其他社会原因,涌口孙氏逐渐迁离涌口村,迁居翠亨及附近各乡,但翠亨孙氏后人和左坡孙氏后人因系同宗而一直保持来往关系。笔者祖母欧氏,一九八三年去世,时年九十四岁,左坡乡人。生前曾对笔者说:翠亨孙氏曾有过这样的族例:凡孙氏后人,日后如果由外地回乡,定要回左坡孙家看望族人,以认宗亲。此事经孙社正同志证实。一九一二年夏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由广州回翠亨村探望乡人,也曾到左坡乡一行。笔者的祖母曾目击孙中山当年打着轿子到左坡乡来。

上述情况说明,孙中山来香山县始祖,不可能居住在涌口门,但不能说涌口门与涌口村毫无关系,涌口门是凸出珠江口海面的一个小港湾,在没有现代公路的时候,涌口门就是从水路联番禺、东莞、新安(宝安)及县内各地的小港口,与涌口村的水路联系也很方便。据一些老渔民反映,东莞、宝安的渔民,只需一个潮汐,就可以到达涌口门。所以每当渔汛就有许多渔民来这一带海面作业,也有许多商人把糖、油杂货运来涌口门转销香山各地。所以,礼赞公在来涌口村时,一定要经过涌口门。

注:本文在撰写时孙社正、杨连逢二同志提供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为“国父先代故乡”事再访上沙乡*

马汉民　唐　灵　调查整理

自本刊第四期刊出《关于“国父先代故乡”之说》这篇调查纪要后，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联系。一九八五年九月《历史大观园》第三期发表了李伯新（孙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和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邱捷两位同志写的《孙中山祖先并非由紫金迁来》一文，指出可能是由东莞迁来，还引述当年邓慕韩（国民党党史编纂）曾经极力反对“紫金迁来”之说，并曾带过孙中山哥哥孙眉的两个孙子孙乾和孙满到东莞“寻根”的史实（孙乾曾任中山县县长）。为了进一步研究关于“国父先代故乡”事，我们决定再访上沙乡。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我们来到了东莞市长安区上沙乡，党支部书记孙宜寿、乡长孙润洪等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召开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者，有当年管理过族谱和去过广州孙科先生处领回“国父先代故乡”题字的孙秋先生，有当年参加过“恳亲会”和其他联系活动者的后人，等等有关人士。从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如下几方面的情况。

一、上沙曾派数十名父老兄弟参加“欢迎中山家先生”的“恳亲会”，并保存有两件珍贵的文物。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孙姓族人在广州大石街萧公馆召开恳亲会，欢迎中山家先生，参加者二百多人。其中有东莞上沙村的代表三、四十人，现在记忆起有姓名的就有：孙跃衢、孙同发、孙兆

---

* 据东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东莞文史》第9辑，1986年7月出版。

权、孙善富、孙培富、孙启瑞、孙蔼庭、孙占鳌、孙鸿鳌、孙金堂、孙子南、孙耀堂、孙锦胜、孙家胜、孙家开、孙新等十数人，孙同发的儿子孙衍佳还保存有当年恳亲会摄影留念的集体大照片一幅及《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新闻传单一张。照片虽因年代久远而褪色，但"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纪念"的横额字迹还清楚可见，照片前排正中坐着的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等影像，也隐约可见。

至于《欢迎中山记》这份新闻传单，更具体记述了开会的时日、地点、参加人数、主持者的致词、孙中山的答词、等等全过程。据了解，当年广州《民生日报》5月15日的一篇报道，其内容与这篇新闻传单几乎一致(《传单》全文附后)。据当时参加恳亲会的代表的后人说，他们的父辈也曾讲过，因为上沙孙族与中山孙族有宗支源流关系，所以有资格被邀参加恳亲会。

二、关于"国父先代故乡"题字及《乐安亭记》的补充情况

本刊第四期所刊载的《调查纪要》，曾提及孙科先生为上沙题写过"国父先代故乡"六个字的事。当年曾作为代表之一到广州领取孙科题字的孙秋补充说：一九四七年五月，他们把题字塑刻在村边修建的"乐安亭"上，这个亭子里面还镶嵌有《乐安亭记》石碑，因此亭既作历史纪念，又是供避风雨的茶亭，后来又作为宝太公路的上沙车站，所以把"国父先代故乡"题字塑刻于亭上，让过往人等知道上沙是"国父先代故乡"。另外，在上沙村口，当年还建有一个牌坊，上有孙乾的"中山大道"题字。

可惜，当年曾作车站的"乐安亭"以及上述各种题字塑刻、石碑，均于"文革"及拓筑广深公路时全部毁灭。幸好，上沙乡长孙润洪日前到香港拜访了香港沙溪同乡会会长八十多岁的孙子山先生，得知他还保存有当年孙堂发为乐安亭撰写的《乐安亭记》的草

稿原件，于是征得孙老先生同意，把原件复印一份带回来。这篇《乐安亭记》除了说明建亭的缘由、作用外，还谈及“国父先代故乡”的题字问题：“盖国父中山先生，系出吾村，藩衍中山之翠亨，稽诸谱谍，维时未远。今孙院长题书石坊，曰国父先代故乡者，即其乐称本源云尔。”孙科先生当年的题字，当地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以及一些过往人都有所了解。《乐安亭记》碑文亦谈及此事，然则上沙乡是“国父先代故乡”之说，并非无所本矣。

三、关于孙乾、孙满到上沙“寻根”事。

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党史编纂、中央党史编委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极力反对罗香林教授认为孙中山先代是从紫金迁来的主张，他提出了不少论据，论证孙中山的先代是从东莞（上沙）迁来的。为了深入调查，搜索更多的论据，他当时就带同孙中山的两位侄孙——孙满、孙乾先生到东莞上沙村“寻根”，当时的东莞县县长黎国材也奉命同他们一起进行调查。据现年75岁的独身女社员孙秀馨回忆说，当年接待孙满他们的礼仪是在礼禋祖祠举行。孙秀馨当时被分配做打扫祠堂的勤杂工作，她亲眼看到当时全村的热闹情景，她还说年纪大的人，很多都参加过当年的欢迎盛会。

这里顺便说清楚一点：因为中山翠亨的孙氏是东莞上沙乡孙族礼禋祖的后代，所以在礼禋祖祠来接待。据说，上沙孙氏宗祠过去曾挂有香山（今中山）宗亲送来的木楹联，联云：

萃子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

妥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

联里所指的“三房”，是上沙孙氏先祖礼禋、礼和、礼忠三个房系，他们是贵华祖的三个儿子。贵华祖是迁居上沙乡的始祖。礼禋祖生三子：长子受，次子广，三子晟。受生三子：长子能，次子通，三子玄。玄生二子：长禘儿，次禘宗。禘儿是中山左坡头乡始祖；

禘宗是中山涌口乡始祖，涌口再分翠坑(亨)乡。所以，中山翠亨孙姓是礼禋祖的后代。(见《孙总理先代世系表》载于1933年广州出版的国民党《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第27页。)

关于孙中山先代从何处迁来中山翠亨的问题，早在三十年代前后就发生过争议。东莞上沙乡孙绳武等在此期间一再呈请当时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力证上沙乡(亦曾称长沙乡)是孙中山的先代故乡。他们引证孙氏族谱及孙中山家谱等资料，说明中山翠亨孙族是从东莞长沙乡(即今上沙乡)礼禋祖之后分支去的。所以当邓慕韩带同孙乾、孙满返上沙作"寻根"调查时，上沙族人就在礼禋祖祖祠接待他们。对当年孙绳武等呈请修正孙中山先代世系(始迁祖)一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饬令广东省政府及东莞、中山两县政府反复调查。后来在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由西南执行部(常务委员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林翼中)作出结论，函请"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核办。函内说道："总理始迁祖缔宗公确自东莞县上沙乡迁来中山县翠亨乡，至员头山乡孙姓系由赞礼公分枝，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这件公函附录本案各有关文件，计有①孙绳武等原呈。②广东省政府复函。③上沙村代表前呈中央党史编委会广州办事处原文。④孙总理家谱序(据云是总理之父笔记)。⑤孙总理先代世系表。⑥上沙乡状况表。⑦孙总理家谱四修谱序。⑧孙总理世系图。⑨中央党史编委会广州办事处复函。⑩东莞县长邓庆史原呈。以上这些资料，均见于1933年广州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十四期。

附录：

(一)《乐安亭记》全文

吾村古称长沙，又号沙溪，位于虎门珠江河右。其峰峦拥叠，阡陌连绵，称繁庶焉。考我孙、蒋、任三姓，郡号乐安，原与蒋姓，同居于金陵，初徙乐城，再迁平邑。于宋世之末，复联迁是间，迨后蒋姓，以支派藩衍，始再迁南栅。经世数十，历年千百，而两姓和睦，守望相助，团结友爱，敦厚之风，迄今未改，虽经八年抗战，屡遭劫夺，尤能互助互惠，敦睦如故者，良有以也。村后有公路，环百余里，为宝太之通衢、港穗之枢纽也。然近于山陬，每遇酷暑严寒，暴风骤雨，行客苦无休憩之所。今夏，村人乐乎河山之光复，感乎百事之待兴，其谋所以便行旅，垂纪念者，惟鸠工庀材，经营浩大，同人等爰集村人，与港侨乡亲之力，又获蒋姓之襄助，由是造亭林，筑车站，于上冈之阴，建石坊，修支路于下冈之阳，以臻胜事，而显令德。盖国父中山先生，系出吾村，蕃衍中山之翠亨，稽诸谱牒，维时未远。今孙院长题书石坊，曰“国父先代故乡”者，亦即其乐称本源云尔。而国父之伟大，举世钦迟，以故石坊为中山纪念坊，使经其道者，共获仰止焉。及秋，诸工告成，故名其亭曰“乐安”，以维我孙、蒋、任三姓深厚之友爱，而示后人之楷模。异日乡民旅客，临亭披襟，倾北海之金樽，细谈今古，指西畴之绿野，共话桑麻，则其为乐，又何如哉！是以为之记。

里人孙子安撰并书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吉旦 立

（二）《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
（见本书“一、历史文献”，此处略）

一九八六年五月

翠亨附近孙氏祖墓情况*

在翠亨附近的孙中山先代及亲属墓，大致分布在三个地点。一处是犁头尖山脚西面，即现在中山纪念中学背后附近，此处有孙中山之父孙达成墓，兄孙眉墓，及在犁头尖山脚南面的侄孙昌墓。第二处为犁头尖山腰，土名竹高龙的地方，该处有七穴山坟：始祖婆陈氏，五世祖礼赞公，六世祖乐南公，七世祖耕隐公，八世祖怀堂公，十四世祖殿朝公及祖妣墓地。山腰南面土名皇帝田的地方，有十六世祖敬贤公的墓。据《孙氏家谱》记载，此处部分祖墓系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从涌口村附近迁来的。第三处为翠亨村以北二公里多崖口乡附近谭家山（土名猪肝吊胆）的孙宅山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二世祖连昌公，十三世祖迥千公，葬在第一排，孙中山长女孙娅葬在第二排末穴。此处集中了孙氏大多数山坟，共三十九穴。此外，地名黄草岗有孙中山祖母黄氏的坟墓，未立碑碣。

据曾参与孙氏祖墓迁葬及一直管理、祭扫孙氏祖墓者称，谭家山孙宅山庄的祖墓是三十年代始从犁头尖山脚的看山田、上林边等地迁去。约在一九三二年左右，唐绍仪任中山县长时，因要修建中山纪念中学，须将孙氏部分祖坟迁走，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拨款，唐绍仪亲自过问，经过选择，最后买下谭家山的一片平坡地及附近一些田亩，作为孙家的墓地。原拟把全部祖墓集中迁葬此处。孙科对迁葬事颇为关心，曾派人请到一位杨姓风水先生来翠亨勘察

---

* 翠亨附近孙氏各祖墓由本馆保护、管理，本馆于20世纪80年代初对全部墓地做过详细勘查。此据当时的勘查记录（原件藏本馆），另见中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总第10辑，1986年10月出版，第31～33页。

孙氏各处祖坟的风水，他还写下一张纸条，孙社正看过，大意为："请杨先生勘测各处山坟，若风水好的，可保留下来不动，其余则可迁往孙宅山庄"。经杨勘测结果，认为竹高龙的各穴山坟，风水俱佳，不宜迁动。而风水最佳的是孙中山祖父敬贤公葬在皇帝田的墓，以及孙中山祖母黄氏葬在黄草岗的墓。在犁头尖山脚（今中山纪念中学背后）的孙达成、孙眉、孙昌之墓亦未动。其余在犁头尖山脚绝大多数坟墓则迁葬孙宅山庄。十一世祖瑞英公因有过祠堂，翠亨孙氏都是他的后代，故孙社正对瑞英公的墓印象较深，记得原在上林边。与《孙氏家谱》所载瑞英公葬地一致。迁葬工作主要由孙社正与另一族人（实为孙姓养子）孙锦兴负责。他们督工把原墓各个金塔（骨殖塔）挖出，另装入新塔。又因旧碑大小不一，精劣各异，故一律废弃，雇请石工打制统一形状之墓碑，碑碣则按原墓镌刻。后来犁头尖山竹高龙地各墓的碑亦按此规格换过。唐绍仪曾有将孙宅山庄扩充成陵园，并在其中修建亭台的计划，但因呈报拨款费时，审批太慢，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修建陵园的事就无从进行了，故孙宅山庄各墓至今仍是泥坟，三十年代时的样子维持至今。

孙社正老人说："迁葬一事，自始至终，都通过孙科、孙满等人，卢夫人与孙妙茜姑太也予以关照过的。"解放以后，孙氏的祖墓基本保存完好，历年都由孙社正父子祭扫维修，近年来由中山故居纪念馆拨款助祭。

孙中山本人是没有什么封建观念的，他生前一直没有对祖坟加以维修扩建，他的亲属坟墓与当地老百姓完全一样，（孙眉、孙昌因系公葬，故例外）从此也可以反映他的民主精神。

孙氏列祖各墓，从第五世祖礼赞公起至十九世姑娖，多数名讳可与《孙氏家谱》、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对应。其间尚缺第九、第十两代。这些墓葬对研究孙中山的家世是有价值的实物证据。

孙中山祖籍紫金中坝的名胜古迹*

张玉杰　陈国岐

中坝原名中镇属长乐(今五华)管辖,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类栖息繁衍,是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驻兵之所,又是孙中山先生入粤始祖的开基地。这里山高地宽,山环水绕,峦峰叠翠,林木参天,邑人先祖留下许多古迹名胜。

公馆:座落在紫金县中坝镇北面的黄牛挨磨山麓,是孙氏入粤始祖的开基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祖籍。相传明代永乐(1403－1424)年间,孙氏始祖孙友松偕弟友义,从福建长汀南移嘉应州长乐,落居于上镇约发昌村。时值时局动荡,旦尚未置县,故多有农民起义,官府也常来"剿劫",又由于姓氏之间,宗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械斗发生。孙氏为保护本姓利益,便在发昌村孙屋排建一拳馆,邀请族中的青壮年人,练枪习武。明末孙氏十一世祖孙鼎标,得知先祖遭兵乱由中原迁至江西,后移闽再陟粤的族史,对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恨之入骨,从小就精心习武,练就一身高超武艺,随着年龄增长,他成为一个身躯魁梧,气力过人,且又食量大,故人称为孙大食。为保护族中利益,他主持武馆,广招门徒,后因清兵入关,邑中解元钟丁先募兵勤王,屯兵中镇凹下山,即拜鼎标等人为千总,鼎标与子连昌受命出兵福建,后联合博罗的丁先同科举人韩如炎起兵及至惠州,故称公馆。

卧龙岗新石器遗址:与公馆隔河相望的中山中学后枕是卧龙

---

* 据广州《岭南文史》,1989 年第 2 期。

岗,近年来这里出土有磨制石斧钺,“田纹”、“米纹”、“云纹”的陶片,据省考古学家考证,卧龙岗和相距 10 公里的敬梓鹅山都是新石器遗址。

中山中学:卧龙岗山麓是中山中学,1942 年乡人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由乡绅张仿渠等人倡导而建。孙中山长子孙科先生还亲自为该校书写校名和校联,校名为“中山中学”,校联为“和平”、“奋斗”。现经重修面目焕然一新,园丁们辛勤劳动,为祖国四化建设精心培育英才。

石笏斋:距中坝 2 公里处的中镇山,有一石,高丈二,大八尺,端正如笏。明代永乐年间举人黄镛建斋于此,隐士黄石公常憩此处。知县侯启御闲游至此,见斋边梅树环绕,又在悬崖中有一敞石,望之如亭,叫好不绝,即起名为“梅亭”。

碧云古洞:是道家胜地,远山清秀,近水潺潺,游人到此,真有如步入“仙境胜地”一般。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率兵入粤抗金,曾驻兵此洞,挥笔写下“壮帝居”正楷大字于正殿。后人在洞门树一大石碑,刻下一首形如竹叶的诗,诗曰:“大节千霄日,牙青壮古今,东君卿写意,挺拔万年根。”现在庙碑完整无缺。

离中坝 10 公里处的敬梓乡,是清代广东第一才子宋湘的祖居地,并有汤泉,可供游泳。

翠亨地区的调查访问记录

第一次调查访问*

调查访问主题:1. 翠亨一带居民的状况;

2. 翠亨一带客家人祖先由何处迁来。

甘桂明:

翠亨镇有4个管理区;翠亨、崖口、石门、下沙。石门全为客家,无混杂,多数姓甘。翠亨管理区有4个村:竹头园、平顶、长沙埔是客家,唯有翠亨村不是客家。下沙是水上人家,俗称"水流柴"、"蜑家",说是从番禺来的。崖口全不是客家,讲本地白话。

石门甘姓祖宗,我们知道是从紫金迁来,1991年紫金还有人来过。(问:甘姓和原籍紫金还有无来往、联系)。攸福隆村解放前同紫金有来往,听一些老人讲,也去过紫金,现在紫金建有祖祠,香港攸福隆同乡还送了烧猪到紫金的祖祠。1991年12月,紫金修甘氏族谱,因为没有中山一脉的内容,有人下来了解。近年,紫金人甘湘华来石门耕田,因为他听自己父亲说有姓甘迁到中山,要他来找甘贡三,甘湘华父亲同甘贡三有过来往。

当地甘伟雄有一本族谱,"文革"才失传。他对历代什么祖、什么公都很清楚。我们解放初参加工作,所以对族谱不大清楚。

(问:当地客家人风俗与本地人同不同,以往有无缠足者?)

---

* 1992年1月13日晚,本馆李伯新、萧润君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林家有等学者访问了石门兰溪村前生产队长甘水连(时年73岁)、田心村民甘国雄(时年65岁)和翠亨宾馆离休干部甘桂明(时年67岁),此为当时所作的访问记录。记录稿现藏本馆。

甘水连、甘国雄、甘桂明：

石门客家人没有小脚女人。

甘国雄：

我阿婆过身时，我已十多岁，我阿婆是大脚的。

甘桂明：

我八九岁时，我阿太八十多岁，没有小脚的。现在石门还有不少老人家，都没有小脚的。

（问：客家人与讲本地话的人通婚的多不多？）

甘桂明：

客家人、本地人通婚，以前很少，只有很穷的人才会。现在多一些。解放前兰溪百多户，只有三、四家和本地人通婚，可以数得出来。

甘水连、甘国雄、甘桂明：

翠亨镇的客家人70%姓甘：攸福隆、龙舟地（现逸仙水库）、新村、兰溪、书房坳、后门坑、甘竹山、田心、白石岗、剑首、龙田、大象埔、三家村，以上都姓甘。

杂姓的：练屋（姓练）、杨贺（姓杨或姓贺）、张琶歧（姓何）、张洛坑（姓谢）、木子埔（姓谢）、峨嵋（姓徐）。官坑（姓谢）是一条小村，后来住的人都搬走了。葵坑遗址还在，人都搬走了，（姓什么不清楚）。还有两个村：黄猺头、张洛坑。张洛坑本应叫“獐鹿坑”。

（问：客家村有无孙姓）

甘水连：除翠亨以外，没有姓孙的。客家村没有姓孙的。

（问：客家人平时讲什么话）

甘国雄：我们回家都讲客家话，同外人讲本地话，紫金的同宗来同我们讲话，口音已经不一样了。

甘水连：我们回家都讲客家话，在村里讲客家话，三句不离客家话。

（问：翠亨村以前有无客家人？）

甘桂明：翠亨村在解放前都没有客家。

甘国雄：解放前，石门九堡包括竹头园、长沙埔、平顶，石门九堡都是客家村，但不包括翠亨。

（问：以往同本地人关系如何？）

甘国雄：本地人称我们“挨子仔”、“挨子佬”。我们都住山坑角落，为避免械斗。我们也说本地人：“Xisa 佬，Xisa 嬷，煮饭不煮茶”。崖口人在解放前欺负客家人。

解放前，石门客家人很少有书读，初中毕业的也少。由于生活条件差，读书的人比本地人少，多数文盲、半文盲。

解放前，客家地主不多，有也是十亩八亩田的。兰溪有两家是地主，肯定是华侨。

（问：住房和本地人有无区别？）

甘桂明：区别不大。

甘国雄：以前，石门有砖屋、泥砖屋、舂墙屋，99%都是平房。现在变了样，很多楼房。

（问：出外的情况如何？）

甘国雄：外出谋生很普遍，到秘鲁、檀香山、南洋，每条村都有。18－19 世纪，兰溪村的多数去秘鲁。

甘桂明：外出的人多过留在本地的人。以前拜太公分猪肉，就知道外面的人还多。

甘国雄：我的一支，去了两个叔公，一个堂叔公，两个阿叔，多数去了秘鲁。

（问：你们对紫金迁来的情况清不清楚？）

甘桂明、甘国雄、甘水连：我们从长辈得知祖先从紫金迁来，但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村。可能有三四百年。

甘国雄:我是二十五世,葬在村背的太公第十七世。

甘桂明:我是二十二世。

甘国雄、甘水连:我们从小都没听过有族谱。

甘桂明:我家的一本是"文革"才烧的。保存得很好,用牛筋穿,红色栏格纸抄写。

甘国雄:我们以前的神主牌都写"渤海甘姓"。白企、合水口、长沙埔都有不少姓甘的。

(问:客家人有无住入本地人村庄的?)

甘桂明:客家人都是聚居的。一家客家人不会搬入本地人的村庄。

(问:是否听说过孙中山是客家人?)

甘桂明、甘国雄、甘水连:我们从未听说过孙中山是客家人。

甘国雄:客家人都住在山区。白企、合水口、背头里都是山区。沿海多是本地人。还有东区的长江、大寮,整个五桂山镇(石鼓挞、石楼坑、石营桥等)。以前欧初打游击都得客家人支持,抗战时客家人受害特别多。现在,客家人的村经济上还是比不上本地人,因为条件不同。

第二次访问记录*

问题:1. 翠亨附近居民状况

2. 孙中山家族是否客家人

甘伟雄:

我以前有一个简单家谱,我是既沾公 21 传孙,对祖上来龙去

---

* 1992 年 1 月 14 日上午,本馆李伯新、萧润君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林家有等学者在翠亨访问了石门供销社干部甘伟雄(时年 57 岁),此为当时所作的访问记录。记录稿现藏本馆。

脉了解较多。

我们石门有很多村落，多数是客家人。整个五桂山区全部是客家人，大部分来自紫金，还有来自增城、博罗。紫金来的姓甘最多，石门姓甘占80%以上。我们老祖宗在长乐大坪，后分支到甘田。后来有两兄弟下香山，十二世祖既沾公（住田心）和既济公（住兰溪）。

我们的家谱是

十二世	既字辈	既沾	既济	
十三世	和字辈	和智		
十四世	奕字辈	奕汉		
十五世	物字辈	物利		
十六世	秀字辈	秀明	秀英	秀高
十七世	联字辈	祥联	毓联	开联
十八世	庆字辈	庆隆	庆祥	
十九世	元字辈	贞元	瑞元	
二十世	建字辈	建南	建波	
二十一世	兴字辈	达兴	中兴	
二十二世	泽字辈	泽伦		

甘姓除了田心、兰溪，还有攸福隆。攸福隆甘先一郎，紫金南塘人。

谢姓也是来自紫金，什么地方不清楚。

我们甘姓来自渤海郡（山东高邮）。

客家人宗族观念很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祖先来历。以前，与本地人通婚的很少。

我们这一辈人都知道祖上从紫金迁来，3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解放前也有人回紫金拜过老祖宗。家中老辈很念祖，都向后

辈讲述祖先来自紫金。

翠亨村没有客家人住。我也听人讲过孙中山老祖宗是客家人，孙家原住迳仔蓢，后来迁到翠亨，听说只落来几辈，是他阿公才来的。有老人讲孙家来自紫金，也有老人说来自东莞，不很清楚。

这一带没有姓孙的客家人。在中山也没有听过姓孙的客家人。

客家人和当地人以前也有矛盾。但和翠亨村一直和睦相处，没有打过。但同崖口就有争斗。没有用枪，用手脚、锄头，事情发生在抗战前。翠亨村是讲本地话的，同石门没有争斗。以前石门村客家人租了翠亨陆、杨姓人的田，他们是华侨地主，比较通情达理。每逢天旱，会适当减免田租。我们客家人送租去，有时他们会给点零食给小孩。因为翠亨周围被客家人包围，他们也不敢对我们恶，大家相处得很好。

翠亨一带的田都很瘦。

中山的客家人，不少在政界做事。如甘子贤、甘伟光、杨社（淮海战役时当师长）、李斌、凌伯棠（合水口人）、甘玉明（市委、龙田人）。不少中山客家人在省、市、军队任职。

我有一首石门村名的七言诗。（另纸）

客家人有罗、幸、官、黄（灯笼坑 ）、王、梁（三乡）、曾、林等。当地孙、谭、程姓没听说过有客家人。

社会风气，客家村一般比讲本地话的村好一些。

访问孙社正老人*

李伯新记录

为了对孙中山先生家世及亲族状况作进一步了解，以有助于对孙中山先生家族状况的研究。我有幸多次访问孙中山先生的后辈族人孙社正老人。他年届八十有二，是我市前两届政协委员。孙社正老人的介绍，为我们提供了孙中山祖祠、先人墓地、家属活动等几个方面的资料。下面是孙社正老人的自述。

两代经历

我的曾祖父是旭贤公。祖父茂成公居住于翠亨迳仔朗村，和中山先生父亲达成公是同宗兄弟，是“成”字辈。我们孙族辈数定下“排行”是这样的：成字辈以前，从十四世至十六世是殿、恒、贤字辈，从成字辈起，下面是德、建、明、立。用完族人规定的字以后，又重新开派。现在迳仔朗仍有我家一条屋地旧址。祖父因家贫，去南朗圩[①] 找到姓程的老伯，因他膝下犹虚，晚年无人奉侍，孤独一人生活，有平房小屋一间（现在我仍居住于此）。我祖父愿向程伯“投家口”[②]，事前双方言明，祖父保持姓氏，将来可安放孙、程两姓神主牌位于同一屋内。祖父就奉侍程老伯去世，遗下的屋，就是我

---

* 据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翠亨小组编：《酸豆》第1期，1994年10月7日印行。

① 南朗圩距离翠亨村七公里，今南朗镇政府所在地，每逢农历二、五、八是圩期，一直都十分兴旺。

② 投家口，就是被异姓的人认做螟蛉子。同姓者称为过继。

家祖屋，存有孙程两家祖宗牌位。我们本有家族谱记载的，遗憾的是“文革”时没有保存下来。祖父在南朗圩以卖粉果糕点等谋生，生下四个孩子，老大老二不育，老三叫德勤，即我父亲；老四德联。老四生下三个儿子，成年后都先后死去，他就向顺德县买下一儿子，取名锦言（一九八一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锦言父母免费多送一儿子，即锦言之弟，取名锦兴（曾当过伪乡长，土改前被人杀死）。德联收买锦言兄弟为子不久，其妻怀孕生下一子，取名社金（现已死），社金生下一子名锦洪（现居香港），故锦言兄弟被改作孙辈，过继为德联长子次子为嗣。

我祖父一生勤俭，除清明回翠亨祭扫祖先坟墓外，平时和翠亨孙族多有来往，享年六十岁。我祖母程氏。

我父亲德勤，从十七岁起赴檀香山做工，性喜赌钱吸鸦片烟，有时也卖鸦片烟，叫做“捞偏门”，没有什么积蓄。每当手头有钱时，而孙中山在檀香山发动华侨捐款，家父也积极支持，有时也参加募捐等活动。民国初年，父亲回到家乡，自己买来一批剪刀，为乡民剪辫。他不是大张旗鼓宣传蓄长发的害处，而是见到男人在街上行走拖着长辫子，他就走上前，把别人的辫子一下子剪掉。乡民不明白道理，思想不通，一时人心惶惶，想来好笑。由于父亲没有什么本事谋生，生活不好，时时得到孙中山的接济。[①]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父亲带我去广州，见到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准备北伐，整装往韶关督师，在百忙中抽空接见我们父子，还给我父亲一笔生活费。中山先生想留我在广州读书，我们不愿意麻烦他，就返农村。[②] 我父亲因文化低，没有正当职业，而母亲靠捡猪

① 中山先生写信给卢夫人（一九一六年）就有寄款抚恤穷亲内容。刊于《孙中山与翠亨》图册中。

② 详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通讯》第一期《我见到孙中山先生》一文。

粪去卖过活，生计日艰。父亲七十岁去世。

父亲生下我兄弟姊妹四人，我为老大，二妹社梅，嫁大岭头甘姓，三弟社生，抗日战争时失踪，四妹春梅，嫁翠亨村谭姓。

我的生涯

我仅读了两年书就失学了，十五岁时父亲故去，生活很困难，就去崖口乡由孙锦言经营的利和米铺做工，工作了十一年。离店后，就往广州找到孙满，他任广州士敏土厂经理。我得到他的帮助，任管仓员，直至日本沦陷广州，失业回家，以收购鸡鸭到翠微或澳门出售为生。一天，我从南朗骑自行车去澳门，路经竹头园附近（离翠亨村一公里远），见路旁陈着一具尸体。我回来后，才知道是我们翠亨孙族人，叫孙钟荣。原来他因家贫，饥寒交迫时，曾去偷过一些蕃茨芋仔充饥。这一次，他是到泮沙乡姊姊处，请她资助，而其姊也穷，就把煲熟的蕃茨给他带回家食用。不幸行到竹头园，给更夫检查到有熟蕃茨，认为他又是偷来的，却硬生生把他打死在路旁。孙家本已人丁稀薄，在翠亨村仅三几户，而钟荣死了无后人。还有一家叫孙福仔，跟随孙乾当过兵，驻军于韶关，抗击日本侵略军进攻，浴血奋战一个多月，使日军无法越雷池一步，后来英勇牺牲了。因此翠亨村现无孙姓人居住。若不是日本沦陷，他们生活得到救济，不致减少丁口这么快。

我为生活所迫，砍柴烧炭换米为生。孙锦兴串同翠亨乡长来干涉，我不服气，争吵一番，孙锦兴跑到澳门向卢慕贞夫人处告我一状。卢夫人虽和孙中山先生离了婚，孙中山生前对她是关怀备至的，她又是孙科的母亲，孙家里里外外的事，她是管得很严的（如卢夫人有事外出，她在公馆里的家人立刻聚赌，当卢夫人乘坐专用

的人力黄包车回来时，聚赌的人听到黄包车特制的铃当响声后，即时如鸟兽四散，各就各位，一声不响）。卢夫人见锦兴告状，马上把我传到澳门去，问我为什么烧炭连祖先的树木也砍倒，我回答为换米充饥，但锦兴不应打我。卢夫人很生气，把躲在房子里的锦兴叫来，责备锦兴说："社正是孙家的正枝正叶，他打破你的头犹自可，你是买来做孙姓仔的，你敢伤他一根毫毛，我唯你是问！"锦兴唯诺而退。

我每次去澳门到卢夫人处，若逢星期天，她必带着我们去教堂做礼拜祈祷，中午这餐饭是红豆甜粥，很少有改变的。我临走时，必有十码黑色土布和十元钱给作生活费用。从来没有亏待我们的。有一次，卢夫人听说我抽鸦片烟，即传我去澳门，严加责备，我说并无此事，她即留我在澳门住一天，观察到我无烟瘾才放我走。

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孙满办的广州士敏土厂做工。解放前夕，孙满叫我跟他到香港找工做，我不忍抛下自己的妻子及儿子炳基，就没有去香港。解放后，全家回自己家乡，又做起鸡鸭买卖。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当了生产队会计，直到年老不干为止。我是民革成员；又是中山市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我还参加了孙中山研究会。在家乡里，我被选为乡中侨务委员，为乡梓做一些事情。

孙氏宗祠

有人以为翠亨孙氏没有祠堂，这是不确实的，翠亨孙氏是有祠堂的，我也见到过。我们孙氏宗祠座落在迳仔朗，即现在中山纪念中学校道旁边的篮球场附近，坐西北向东南，是一间十三坑瓦阔的泥墙屋，我见到时已无上盖。当时是什么原因致上盖坍塌我不知道，我知道孙钟荣父亲用山草将后座几尺地方遮盖好，遮盖地方存

放有十一、二个神主牌。我们家和孙中山家的贤字辈有牌位。这座祠堂是孙家年终祭祀、农历新年初八开灯(孙姓这一年添丁才开灯)活动的场所,清明扫墓回来吃饭,有时也在祠堂,但多数在中山故居举行。

中山纪念中学未兴建时,这座祠堂周围都是树林,我家祖屋就在这祠堂后边隔三两间屋的地点,该房屋已不存在了。因迳仔朗以何姓为主,我们孙姓只有三两家,丁财都不旺,都先后迁走了,无所谓迳仔朗孙姓了,只有翠亨孙姓,并无外地孙姓人氏插入当子孙的,故此管理祖先公尝田地,来来去去都是几位年老的男丁轮流管理。尊贤公管公尝的机会最多,孙达成也管理过。

我记得很久前有几个外国人来旅游,走到孙家祠堂拍摄照片,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可惜我们无法拍到此祠堂的照片,若果外国人将照片发表,就可知道孙家祠堂旧有的面貌了。现该祠堂已荡然无存,因倒塌至少有五十年了。中山纪念中学规划建校时,已将这间祠堂地点用去了。

有些外国人或华侨到这里瞻仰孙中山故居,参观祠堂,很多时请翠亨村人作向导,带领他们上山,寻找孙氏坟墓。他们是有准备而来的,携带有食物、水果之类作午餐。我的亲戚谭大根,就熟悉孙家墓地,常带领旅游者去参观,除享用午餐外,还得一份导游费呢。

红白二事

卢夫人每年都回来中山故居几次,关心乡梓,赈济穷亲。

一九四七年,是卢夫人八秩晋一的大寿,贺寿者络绎不绝,不少人送来珍品,如江西景德镇瓷碗瓷碟等物,卢夫人还送了一套金

边碗给我,在文革时期给打坏了。

当时在中山纪念中学礼堂举行盛大的贺寿仪式,孙科、孙满、孙乾等人都回来祝寿。警戒的人不少。我记得拜大寿时,最好吃的是焗猪。先把一只不大的猪刮净吊干上香料,预备好一堆圆石叠得中间空,石与石之间有隙缝,易于透风,在叠石下面腾空地方加猛火,把圆石烧得烘烘发烫,然后熄火,把猪(猪要隔上一层布或纸)放上去,用滚烫的石子把猪全身围密,过一会猪就香浓扑鼻,里边肉和皮都酥脆,吃起来十分可口,是由澳门师傅上来泡制的,是盛宴的好菜色。

我作为孙家人,参加筹备卢夫人贺寿的一切事务工作。

孙眉伯的妻子谭氏,是崖口乡人,一向居住于澳门尾山之街约卅二号或卅五号。

一日,我接到通知,说大伯母去世了,叫我立即去澳门奔丧,我当即赶去澳门哭灵。

移灵是一九三八年夏天,在澳门尾山之街家里出殡,葬在澳门西洋坟场。我记得在灵车前面,正中牵帛带的有孙满、我及锦兴等孙家后人,两边是护灵亲友,我们一直护送到墓地。记得大伯母去世时设置灵堂哭祭三天才移灵,安葬之后又守灵两天,丧事方告结束。此时孙眉大伯的坟墓已迁葬翠亨,大伯母则葬在澳门,后迁葬翠亨邻村石门土名"逼虎跳墙"。是什么原因不合葬,我无从知道。

竹高龙墓

翠亨犁头尖山的顶峰下,在半山腰有一地名叫竹高龙,是中山先生祖先从外地迁葬在此的祖先坟墓,有始祖太婆陈氏安人墓、五世祖礼赞公、六世祖乐南公、七世祖耕隐公、八世祖怀堂公等墓穴

七穴之多。我细小时候，已到此扫墓，这些坟墓的碑记至今完好无缺。从竹高龙往下走，在中山纪念中学背后，还有中山先生父亲达成公墓、大哥孙眉公墓，都完好地保存。一九八一年，达成公墓等灰沙造的墓地给风雨剥蚀，灰沙剥落和裂缝，我们重新修理过，犁头尖山麓南面的孙昌墓地也同样做过修理。据老人传说和一些风水先生（舆师）说："最好风水莫如'皇帝田'山，葬中山先生祖父敬贤公，还有黄草冈山，葬敬贤公妻黄氏。"这两穴坟墓都是佳地。此两穴山虽不同地方，但方位上同向着珠江口的金星口，金星口两边山峦伸延，中间是金星岛，若双龙戏珠，风景很好。

一九三二年左右，因欲在犁头尖西南山脚修建总理故乡纪念中学（今中山纪念中学），一些孙家山坟需要搬迁，孙科便请到一位来自嘉应州的姓杨的舆地师勘测孙家山坟情况，确定哪穴山坟风水好不好，并写有一张纸条，内容大意是说请杨先生来勘测安葬各地的山坟，若风水好的，可保留下来不动，其余可迁往崖口附近谭家山安葬。当时由我和孙锦兴两人负责此事。竹高龙墓经测定，认为较好，不宜移动，其余的坟墓差不多都迁到谭家山孙宅山庄安葬。

孙宅山庄

一九三二年前后，唐绍仪长中山县时，很关心孙家坟墓，曾得到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批准拨款，买下了翠亨村北行二公里许，未到崖口乡公路左边土名"猪肝吊胆"的一片平坡地及坡地下面的一些稻田做为孙宅山庄陵园的基地。当时由政府规划分期拨款。首批得到款项后，由政府划出地段约两个山面，计划建亭台楼阁。不久，应迁葬的坟墓都迁来了，分五排安葬，我直接参与其事。我

们看到从前的墓碑是很细小的，而埋入葬土的石块很大，而规格大小不一，精劣各异，很不雅观。经商议后，把旧墓碑全部弃掉，重新请石匠按指定规格、统一字体刻制新碑埋入坟前。后来竹高龙几穴祖墓也按同样规格重刻新碑安放好。这件事不但得到孙科兄的同意，还征得卢夫人、孙妙茜姑太同意后才进行的。

孙宅山庄分上下五排，最高一排的正中有皇明太祖墓、十一世祖瑞英公墓、十二世祖连昌公墓、十三世祖迥千公墓等几代祖先墓，中山先生女儿孙婓大学毕业未婚即病逝，其墓亦迁葬在此，其墓碑文刻有“显十九世祖妣孙姑婓之墓”。

这些坟墓至今仍是泥坟。一九三七年，当地政府曾打算把孙宅山庄修建成孙氏陵园，把土坟改造成泥砖坟墓，并将这个规划呈报给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继续拨款，不料，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拨款修建陵园的事就停止了，孙宅山庄也就一直以泥坟的形式留存下来。

解放以后，每年清明祭扫祖坟的事都由我全家负责，由各叔侄合力进行。孙家在翠亨附近的坟墓有五十穴之多，分散在五、六个不同地点，最远是涌口，扫墓需要二、三天时间才能全部完成。近年来，得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资助，扫墓及维修事宜方便得多。

翠亨孙氏先代墓葬简况*

十一世祖瑞英公与夫人梁氏墓：瑞英公原葬犁头尖山脚看山田，后与夫人梁氏墓同迁至上林边（犁头尖山脚）合葬，约一九三二年迁至翠亨以北二公里多崖口乡附近谭家山（土名“猪肝吊胆”）孙家坟场第一排西起第二穴。

十二世祖连昌公与夫人陈氏墓：连昌公原葬看山田向甲之原，夫人陈氏原葬茶园山，约一九三二年同迁至谭家山孙家坟场合葬于第一排西起第三穴。

十三世祖迥千公与夫人谭氏墓：原葬翠亨后门山坐癸向丁之原，约一九三二年同迁至谭家山孙家坟场合葬于第一排西起第一穴。

十四世祖殿朝公与夫人林氏墓：位于犁头尖山西南山腰顶部，面对西南之黄牛山。

十五世祖恒辉公墓：恒辉公原与其叔殿侯公合葬于黄草岗，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纂王斧访问翠亨，曾见此墓，并将该墓墓碑图样与文字手绘于其所著之《国父故乡史料征集记》（载《建国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该墓今已不存。

十六世祖敬贤公墓：葬于犁头尖山东北侧土名“黄帝田”山顶南侧，面南微东，正对金星门，墓碑铭刻“咸丰四年五月十一日吉立，坐戌向辰兼乾巽”文。

十六世祖敬贤公夫人黄氏墓：葬于翠亨西南土名“黄草岗”阳坡，即今中山烈士陵园侧，为土坟，面南微东，面向金星门。

---

* 据孙满编：《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1998年印本。

十七世祖达成公墓：达成公于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逝世于翠亨，葬于犁头尖西南山脚今中山纪念中学后坡，面南微东，墓碑铭刻“本山坐庚向甲兼酉卯之原，民国十五年仲秋吉旦立石”。

十七世祖达成公夫人杨氏墓：杨氏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逝世于香港九龙，葬于九龙西贡飞鹅岭百花林，墓碑刻“香邑孙门杨氏太君墓”文。

十八世祖德彰公墓：德彰公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一日逝世于澳门，原葬澳门，一九三三年迁葬于犁头尖西南半山腰，面南微东，正对金星门，墓石刻“亥山巳向室宿十七度丁亥分金，江西兴国杨柳桥授男其邦订，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清明日孙满、乾敬立”文。

十八世祖德彰公夫人谭氏墓：谭氏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逝世，葬于翠亨以西石门村以西土名“逼虎跳墙”山顶东北角阳侧，面向东南，正对翠亨西南之黄牛山尖，并可遥见翠亨。

十八世祖德明公墓中山陵：德明公即国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四月二日，又移柩北京西山东麓碧云寺。四月四日，北洋临时执政府依国父生前遗愿，决定国葬国父于南京紫金山（又称钟山），宋氏与建华公等一并赴南京选址，并选取吕彦直建筑师之设计方案施工。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举行奉安大典，国父遗体安葬于紫金山阳坡之中茅山，陵园周围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区域辟为孙中山陵园，设碑像阁榭多处。国父陵墓与国父陵园，统称“中山陵”。

十八世祖德明公夫人卢慕贞墓：卢慕贞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七日逝世于澳门，三十日葬于澳门大西洋公墓，由建华公及其二子治平、治强立碑志念，一九七三年迁葬凼仔孝思永远墓园，并辟周围之地为卢慕贞陵园。

十八世祖德明公夫人陈粹芬墓：陈粹芬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逝世，原葬香港荃湾华人永远墓园，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迁

葬于谭家山孙家坟场西北山顶，面对金星门。

十八世祖德明公夫人宋庆龄墓：宋庆龄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遗愿，六月四日，宋庆龄之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内，并辟周围一百五十九亩土地为宋庆龄陵园。

十八世姑太妙茜墓：妙茜姑太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逝世于故里，葬于谭家山孙族墓地第三排西起第一穴。

十八世姑太秋绮墓：秋绮姑太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八日逝世，葬于翠亨以北约七公里之西江里村西山面，与其夫林公喜智合葬。

十九世祖建谋公与夫人王金顺墓：建谋公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广州黄埔海域因公殉职，奉国父德明公之命，遗体公葬于广州黄埔公园，一九三三年由不孝男满、乾迁葬于翠亨犁头尖南山脚与夫人王金顺合葬，墓碑刻“亥山巳向室宿十七度丁亥分金，江西兴国杨柳桥授男其邦订，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清明日男满、乾敬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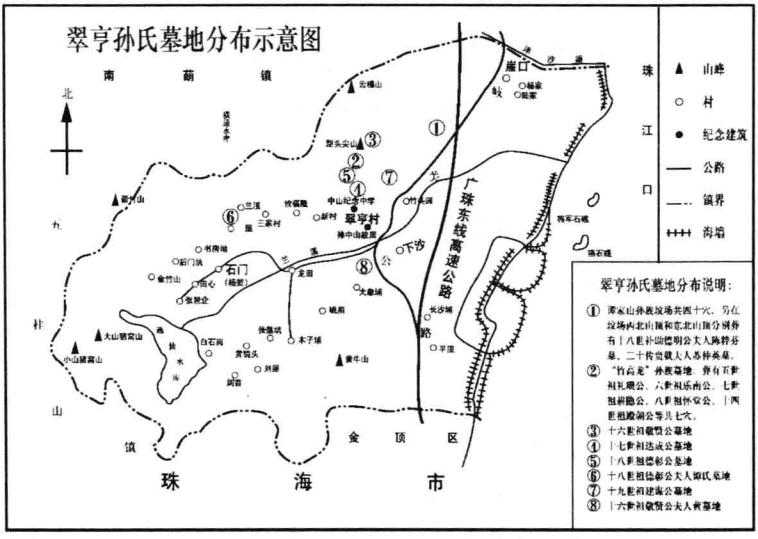
十九世祖建华公墓：建华公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逝世于台北，次年六月一日葬于阳明山双重溪之阳，占地一点四公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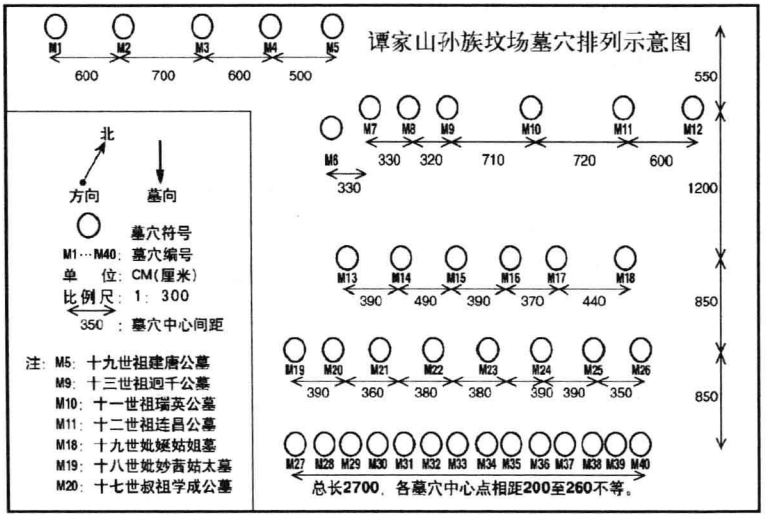
十九世祖建华公夫人陈淑英墓；陈淑英于一九九〇年六月三十日病逝于台北，葬于阳明山双重溪建华公墓园之内。

十九世姑娅墓：娅姑姐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病逝于澳门，原葬澳门大西洋坟场，约一九三二年迁葬于谭家山孙家坟场第二排东起第一穴。

十九世妣婉墓：婉姑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病逝于澳门，葬于澳门凼仔孝思永远墓园，后迁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坟场中四十四段右侧戴家墓地与夫戴恩赛合葬。

附：《翠亨孙氏墓地分布示意图》及《谭家山孙族坟场墓穴排列示意图》。


翠亨孙氏墓地分布示意图
南 蓢 镇
北
九 龙 山
桂 山
镇
珠 海 市
金 顶 区
翠亨村
中山纪念中学
孙中山故居
石门
龙田
下沙
广珠东线高速公路
庙口
珠 江 口
山峰
村
纪念建筑
公路
镇界
海塘
翠亨孙氏墓地分布说明：
① 谭家山孙族坟场共四十六，另在坟场内北山顶和东北山顶分别各有「八世补园德明公夫人陈舒芬墓，二十传宗敬夫人苏仲英墓。
② 「竹古龙」外族墓地，葬有五世祖礼顺公，六世祖添南公，七世祖裕隐公，八世祖怀安公，「四世祖敬湖公等共七穴。
③ 十六世祖敬贺公墓地
④ 十七世祖达成公墓地
⑤ 十八世祖德彰公墓地
⑥ 十八世祖德彰公夫人梁氏墓地
⑦ 十九世祖建唐公墓地
⑧ 十六世祖敬贺公夫人黄墓地


谭家山孙族坟场墓穴排列示意图
M1 M2 M3 M4 M5
600 700 600 500
M7 M8 M9 M10 M11 M12
330 320 710 720 600
M6
330
550
1200
M13 M14 M15 M16 M17 M18
390 490 390 370 440
850
M19 M20 M21 M22 M23 M24 M25 M26
390 360 380 380 390 390 350
850
M27 M28 M29 M30 M31 M32 M33 M34 M35 M36 M37 M38 M39 M40
总长2700，各墓穴中心点相距200至260不等。
北
方向
墓向
墓穴符号
M1…M40：墓穴编号
单 位：CM(厘米)
比例尺：1：300
350 ：墓穴中心间距
注：M5：十九世祖建唐公墓
M9：十三世祖迥千公墓
M10：十一世祖瑞英公墓
M11：十二世祖连昌公墓
M18：十九世妣婉姑姐墓
M19：十八世妣妙茜姑太墓
M20：十七世叔祖学成公墓

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选录）

严肃认真　积极筹备

——紫金县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积极开展筹备工作

今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作为孙中山先生祖籍的紫金县，经过县委、县政府、人大常委、政协、纪委五套班子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丰功伟迹，振兴山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定于11月12日，在中山翠亨村的开基祖连昌公的出生地——紫金县中坝区孙屋排，召开全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以政协为主与有关部门组成大会筹备领导小组，认真做好大会准备工作。

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由政协副主席钟信任组长，副组长张祝强（县委办主任）、钟佛燕（统战部长）。领导小组成员：刘尔题（县政协副主席）、魏百超（宣传部副部长），蒋作绍（县档案局长），邓铭培（县志办副主任）、钟声（党史办）、叶启青（紫金中学名誉校长）、陈添来（党史办政协文史组）、赖海如（中坝区区长）。下设办公室分为若干组，分别由刘乃超、温济春、张专如、郑观兴、钟其森、张杰、

---

* 据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会秘书组编：《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1986年11月12日铅印本。

曹佛昌、黄茂宏、陈国岐等同志负责。

在纪念大会筹备小组成立以前，江西省档案局根据“孙中山祖籍有新说”的情况，按照国家档案局的意思，派出了舒斯华、王延同志，到了南京、北京、广东的广州、惠阳、中山、东莞，对孙中山先生的祖籍问题，进行认真调查考察，最后于10月18日来到了紫金，与县档案局的同志，共同核对了江西省《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和紫金《孙氏族谱》，并与中共紫金县委办公室主任张祝强、县档案局长蒋作绍等同志，组成联合考察组，到中坝区对孙氏的祖祠、木主、墓地、文物进行认真考察，查阅县档案馆珍藏的《中华姓氏源流堂号考》，查考孙氏姓源，同时与县志办，党史办、中坝孙氏和孙氏邻居外姓老人进行座谈，通过这些活动，对孙中山先生的祖先从河南－江西宁都－福建长江－广东紫金－增城、中山的迁徙过程，证实谱谱相符，中坝迁粤祖始孙友松墓地保存完好，木主具在，所有这些史料记载与中山翠亨村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有世代相传关系，各代祖始的墓碑均与族谱中的记载一一相符。同时还了解到当年孙科先生为了保卫连昌公的练武“公馆”曾派出部队处理孙氏族内、族外的纠纷，1946年为“中山中学”校名题字，还有中坝孙观胜等出席孙中山先生恳亲会的许多情况。在《孙科先生拟先世略》中明显记载：“承事公迁居福建长汀，河田，明永乐中，友松公再迁广东紫金，十一传至鼎标公，清康熙中期，其子连昌公再迁香山涌口门村，又传至殿朝公，即国父孙中山先生高祖，迁居翠亨村”。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上，江西省档案局舒斯华、王延、紫金县委办张祝强、紫金县档案局蒋作绍写出了《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考》这篇文章，论证了孙中山先生祖先从河南到江西、福建、广东紫金、再经增城到中山的事实经过。不久，《江西日报》、《中国新闻》根据这篇文章发表了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代主席屈

武付来了“紫金中坝孙中山祖籍纪念馆”书写的新馆名，再次肯定了孙中山先生祖籍在紫金。紫金县档案馆把有关孙中山先生祖籍问题的新老材料，经过整理之后，展出了《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考证》的档案史料。县长赖燕枢、县委常委郑水源等党政领导同志，亲自查阅了这些史料，对此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大会筹备小组的同志，通过县档案馆观看展出的材料之后，制订了筹备纪念大会的详细实施方案。钟信副主席还特地陪同美籍华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师周天和博士及香港崇真堂主任牧师叶贵廷先生到县档案馆参观了有关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全部档案史料的展览，周博士，叶先生参观后挥毫写下了“资料丰富，内容真确”的题词。后来，周天和博士在纪念大会上，怀着对孙中山先生非常崇敬的心情，特地作了感情深厚，内容热情洋溢的发言。

为迎接纪念大会的胜利召开，钟信同志亲自带领筹备小组的全体同志和大会工作人员，多次深入中坝区，与当地党政领导共同作好会场布置，定出参观路线，安排文物史料展览，做好大会发言的组织工作，邀请省、地有关部门指导大会。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的积极筹备，深得各方支持，取得了大会的园满成功。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我县各界在孙中山祖居地隆重举行纪念大会

紫金县各界人士二千多人，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在孙中山祖居地中坝公馆背村隆重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大会场设在孙中山纪念小学校坪，会场布置庄严，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两侧挂着：“发动革命志士，推翻帝

制，建立共和，业绩昭彰光祖国；坚持独立自主，致力统一，振兴中华，功勋彪炳耀神州”的金色对联，主席台前摆满了鲜花。

出席大会的有政协主席叶景浓，副主师钟信、刘尔题、徐伯仁、周爱英，县委办公室主任张祝强，县委统战部长钟佛燕、中坝区委、区公所领导，县直部、委、办、局领导，邀请前来的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博物馆的同志，美籍华人、香港同港，东江日报和省电视台记者也在主席台前列就座。

民革中央委员会还发来了贺电。

十时三十分，县委统战部长钟佛燕同志宣布大会开始，全体肃立，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钟佛燕同志代表紫金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筹备小组，向参加大会的省、地来宾、美籍华人、港澳同胞，报社和电视台记者，以及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县政协主席叶景浓同志作了大会讲话。他说：“今天，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先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县各界人士在中坝发昌孙屋排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是因为孙中山的祖籍公馆背村就在这里。

他接着赞颂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时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腐败卖国的清王朝。结束了持续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建立了革命武装，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他最后说：“愿国内外所有炎黄子孙，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携起手来，并肩前进，为振兴中华，完成统一祖国的千秋大业而努力。”

县政协副主席、高级农艺师刘尔题、中坝区长赖海如、孙氏后

裔代表孙仕文、罗香林教授著述的《国父家世源流考》编后纪中提及的友人温济琴、聆听过中大历史系教授罗香林先生作有关《国父家世源流考》的报告的省人大代表、紫金中学名誉校长叶启青、美籍华人、中文大学讲师周天和先生,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大会以后,各界人士、来宾们还参观了孙中山祖籍陈列馆和孙氏祖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屈武同志办公室,还付来屈武代主席为孙中山纪念馆题写馆名,文曰:"紫金中坝孙中山祖籍纪念馆。"

原中大罗香林教授的友人温济琴的发言

我是罗香林教授著述《国父家世源流考》编后记中提及的友人温济琴。

值此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在这里谈谈在广州、韶关、重庆三次与罗香林教授相遇的回忆:

1932 年我当选为紫金县第六区公所委员,调去广东省地方自治人员训练所训练一个月。结束后,我一直没有回乡,在广州寻工做。1933 年我在修筑红花岗四烈士坟场委员会当事务员。其时,我就读勷勤大学商学院,取得文凭于 1935 年考入广东燕塘军校政治深造班普通组,由于同乡刘乃绪之介绍,认识了罗教授。

记得 1935 年在一次中大文学院罗教授办公室,参见了罗香林教授。当时,罗先生正同另一位居士谈论反清复明史料。在交谈中我插了一句话,我说,在家乡听长辈讲,明末清朝初义士钟丁先(明朝解元公),统率中心坝各姓人,抗击清兵,其中一个叫孙大食的武术精湛同清兵对抗。家乡许多山头都削平建了山寨,同清兵

打了很长时间，后来因遭挫折，钟丁先首先解散义兵，后削发为僧。后清王朝下旨要斩九族，孙姓人四处逃亡。这一席话，引起了罗教授的兴趣立即进行了纪录。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市社训总队任教官。1938年广州沦陷，我随队撤退到广宁，后在马坝财政厅工作。1939年秋，我随顾翊群厅长去韶关黄岗省府开会，遇见了罗教授和紫金县长李慰春先生。他们在省府会客厅谈得很高兴。李慰春县长面交罗先生一大捆紫金县志和孙氏族谱。罗教授接受道谢之后说，我带回中大抄录后定将原件奉还。尔后，罗教授对我说："我究研孙总理家世源流已经九年了，从掌握的调查资料，可以肯定总理的先祖是东江上游，我拟到龙江、河源、紫金各地走访，你（指我）曾说过你家乡反清复明斗争，有孙姓人参加，有没有公馆这个村名？"我答不知道。他又说："我决心去紫金一行，到你中心坝去"。要我写介绍信给家乡有名望的人帮忙，我立即写信给张仿渠、温聘、温秀如三位知名绅士，并交罗香林教授带交。

1939年冬，我去重庆中国农民银行工作，1941年一次遇见同乡郭文敬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1942年我在郭文敬家再次幸遇罗香林教授，罗香林教授高兴地拿出已编印出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给我，并用感谢口语对我说："我多谢你，给我提供了调查研究的线索，使我完成了党国给予的任务。""我持你的三封信，当年即乘还乡兴宁之机，去你中心坝见到了温秀如、张枋渠、温聘先生还有孙姓几位老人，他们谈了许多有关钟丁先解元统率抗清的史绩，并讲清了当时钟丁先住的是孙大食的拳馆叫"公馆"，"公馆"背为公馆村。由此完全解决了我们调查十年想望找到的孙中山对美国人罗伯克所说的"家庙在东江上游公馆村的问题"。在谈论过程中，我还记得罗香林教授谈过如下一段话。他

说:“我写这本书,曾因“公馆”谐音“东莞”,加上孙中山当大元帅时确实又曾带廖仲凯、王宠惠(当时的外交部长)和邹鲁(中大校长)去东莞拜过祖。其实,孙中山到东莞为名,捐军饷是真。因为,当时军饷很困难,东莞明伦堂握有万顷沙田,钱多粮足,以致讹传说,“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是东莞了”。谈这些话郭文敬先生亦在那里。

罗香林教授著述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发行已经四十多年。此书发行时是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委慎重研讨,反复核实作了定论的。该书是立法院长孙科(孙中山长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秘书长吴铁城等写了序文的。因此,我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祖籍在紫金县中坝公馆背村即现在的(孙屋排)是经得起史实检验的,是无可置疑的。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坝孙屋排孙氏后裔代表孙仕文的发言

同志们,来宾们,先生们:

在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个大会上,我作为孙中山先生在紫金的祖先友松公的第十八世嗣孙,代表孙氏后裔讲几句话。乘此简要介绍一下孙氏家世源流。根据我们孙氏族谱记载,我孙氏祖先讳公于唐末,从河南迁居到江西宁都,八世祖三承事后裔迁居福建长汀县,明朝永乐年间友松公、友义公兄弟,由福建迁至这里定居,至十二世祖连昌公一度迁至增城,再迁中山定居,成为孙中山先生在中山县翠亨村的开居始祖,历史事实,世人皆知。我祖在紫金中坝生殇详情,族谱记载详尽,历代祖坟尚在:一世祖友松公葬于贺光约林和堂;二世祖敬忠公葬在良庄姜拳村水口;三世祖永良公葬于祖祠右片矿沙窝;四世祖怀文公葬于九

社下火烧须三坟地；五世祖凤宗公葬于祖祠花台上；六世祖明享公葬于祖祠背左边；七世祖仕伯公葬于紫金县城黄岭头紫金山上；八世祖绍宗公葬于三坟地怀文公坟下；九世祖乃和公葬于崩岗背路面上；十世祖宗荣公葬于上正约凹下山；十一世祖鼎标公葬于水口。鼎标公生三子，即连盛、连昌、连桥。连桥移居外地，景情未知。连昌公初移增城，后徙中山涌口，再到翠亨村定居，成为孙中山先生在中山的开居始祖。连昌公迁居中山县后，其后裔对祖居还常有书信来往和互相拜访，仅孙科先生来信也不少于十八封。这些书信均由我中坝十六世祖观胜负责处理。孙科先生对祖籍文化福利事业都很关心，1942 年曾提议创办紫金农学院，由于战乱无法实现。1945 年建立中山中学时还亲笔书题校名“中山中学”。抗战胜利后，为保护连昌公练武的“公馆”，还派一连人驻守了一个多月，处理了姓氏之间，族内之间的纠纷。

孙中山先生为了拯救中国，图谋国家富强，四十年致力国民革命的精神，一直鼓舞人民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中坝孙氏子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要发扬革命精神，为国为民，振兴中华，奋力开拓前进。

孙中山家族世系表

入宁都之世次	入广东之世次	入香山之世次	名讳		注记
			考	妣	
一			诹	陈氏	诹为孙中山先祖、唐中和四年定居宁都县生一子：实
二			实	邱氏 刘氏	生五子：耀、英、士元、爽、允（公侯伯子男五房）

续表

入宁都之世次	入广东之世次	入香山之世次	名讳		注记
			考	妣	
三			士元（伯房）	赖氏	生四子：有恭、有敬、有惠、有信
四			有敬	林氏	生一子：六郎
五			六郎	赖氏	生一子：十六居士
六			十六居士	陈氏	生一子：九承士
七			九承士	张氏	生三子：二居士、三承士、四职医
八			三承士		后裔由宁都徙福建长汀河田，名讳世次待考。
	一		有松	骆氏	明永乐年自河田迁紫金中坝，为入粤始祖，生四子：敬忠、惠忠、勤忠、荣忠。传至孙中山先生为十八代。
	二		敬忠		生二子：永久、永良
	三		永良	吴氏	生一子：怀文
	四		怀文	汤氏	生一子：凤宗
	五		凤宗	叶氏	生一子：明亭
	六		明亭	宋氏	生一子：仕伯
	七		仕伯		生二子：耀宗、绍宗
	八		绍宗	古氏	生一子：乃和
				何氏	

续表

入宁都之世次	入广东之世次	入香山之世次	名讳		注记
			考	妣	
	九		乃和	林氏	生一子:宗荣
	十		宗荣	叶氏	生三子:鼎茂、鼎标、鼎山
	十一		鼎标	叶氏	生三子:连盛、连昌、连桥
	十二	一	连昌	陈氏	清康熙年间由紫金中坝迁居广东增城,复徙中山(香山)县涌口门村。生一子:迥千
	十三	二	迥千	谭氏	生一子:殿朝
	十四	三	殿朝	林氏	乾隆中叶由涌口门村迁翠亨。生一子:恒辉
	十五	四	恒辉	程氏	生一子:敬贤
	十六	五	敬贤	黄氏	生三子:达成、学成、观成
	十七	六	达成	杨氏	生三子:德彰、德祐、德明(中山)
	十八	七	中山	卢氏	生一子:科
				宋氏	
	十九	八	科	陈氏、严氏、蓝氏	生二子:治平、治强;四女:惠芳、惠英等
	二十	九	治平	张氏	生一子:国雄
			治强		生二子:欣、元

续表

入宁都之世次	入广东之世次	入香山之世次	名讳		注记
			考	妣	
	二十一	十	国雄		生二女:美玲、美兰
			国欣		
			国元		
	二十二	十一	美玲		现居美国
			美兰		

一九八六年十月

(摘自江西省档案局、中共广东省紫金县委办公室、紫金县档案局联合调查考证资料《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证考》)①

紫金县举办孙中山家世源流展览

在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伟大的民族英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百二十周年筹备小组,分工由紫金县博物馆、文化馆负责,在孙中山先生先世入粤始祖——紫金县中坝区发昌乡公馆村孙友松祖祠上厅,举办了《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展览》。

展览在前言之后,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孙中山祖先的来由》。在孙中山遗像和生平年谱后面,有江西、中坝的族谱,中山市会讯,孙氏宗祠老屋、祖牌、香炉、残墙、门墩、残灶及孙氏历代墓地照片和拓片,用事实说明孙氏祖先由河南陈州——江西宁都——

① 编者注:上述世系表多处存疑或有误,俱按原文照录。

福建长汀定居。在明永乐年间孙友松又由闽迁粤，首先在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上正约公馆村（即今紫金县中坝区发昌乡）落脚，孙友松是紫金的始祖，也是孙中山祖先入粤的始祖。至第十一世孙鼎标，时值清兵大举南侵，孙鼎标和其子孙连昌投入福建监军道，广东按察使司副使钟丁先（本邑解元）部，协同募兵勤王，意图恢复，率兵千余，屯兵中坝凹下山，与清兵连战十余年。孙鼎标、孙连昌父子分别任钟丁先的义兵千总、武术总教练。由于大势已去，义兵解散，清兵杀害甚凶，钟丁先削发为僧，孙连昌离乡背井，远逃增城，不久，又迁香山涌口门村，至十四世孙殿朝再迁翠亨，孙连昌乃孙中山在翠亨的始祖。

……

四、函　电

撮叙金山冯总领事(诜蘅)禀函电报详细节略*

孙文原字帝象,别号逸仙,改字载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现改称早埔头人,年约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须,剪发洋装,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陆,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官,前次创议废主,因其未隶檀籍,所谋不逞。均挟厚资,居檀年久。是否孙文同党,尚难臆断。惟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七百零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并闻有沿途联合各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该犯随身携带私刊书册两本。虽无悖逆实迹,检其上李傅相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现将原书设法觅取寄呈,俟访明该犯赴纽行期,再行电禀等语。查阅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一系上李傅相书,洋洋万余言,自称文素在香港习西医,已蒙考取,欲乞傅相专委筹办农务。两种文笔俱畅达,昨已附致总署备核矣。

---

* 据罗家伦著:《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南京 1935 年版。此电文是 1896 年 7 月 18 日清政府出使美国大臣杨儒致出使英国大臣龚照瑗密函所附之抄件。1929 年 4 月,王亮畴于驻英使馆《广东要犯孙文逃往伦敦扣留查办卷》中抄出。

孙汉基致罗香林函*

香林世兄先生台鉴：

昨接敝族锡鹏来函，藉稔先生近在中大文学院课授史学，曷胜钦佩。承嘱缮寄吾家上世源流以研讨总理先世系统，敢不从命。查敝族于民廿五年由家君倡修粤赣闽三省孙氏家谱，曾将修谱例言、组织大纲印发各处。当时省内外各属复函赞同者颇不乏人。廿六年拟往各属调查汇稿，迨七七事起，全国骚然，凡属国民，俱以奔赴国难为先务，修谱工作遂告中辍，而总理先世系统，亦因未赴各属调查，无从奉告，深致歉仄。兹仅将家谱先世系统暨所闻所见，另纸缮呈，请予察照。弟意总理先世是否由永安迁居，非到永安实地调查，恐难证实。而永安孙姓，又非一宗一派，是否由兴宁迁去，更难憶测，惜弟为环境所限，不克亲往调查，极为抱憾。弟自岭东捷报被敌机轰炸停版以后，即在家乡筹得小本营生，藉供菽水，家贫亲老，未敢远游；所幸椿庭日暖，尚能健饭如常，堪以奉慰。知关锦注，冒昧奉达。专此。敬颂

台祺！

知弟孙汉基顿首 十二月八日

（又及）查兴宁迁居永安者，有契全公第八代道福、道祥，第十代宗义，十一代承奇、承睿、承超，亦迁永安石塘。又有第十代宗龙，一名茂松，偕子扬明、扬习，亦迁永安。但是否为总理先世，因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藏原函影印件。此函估计写于1941年，原文无标点。原函附有《乐安孙姓族谱世系录》，此处略。

未亲往调查，无从证实。东莞方面则有契全公十二传应生、英生、凤生等，于雍正乙卯由官亭迁东莞石马天生湖等处。年前，据应生后裔孙衍蕃（东莞籍）来函，略谓东莞孙族界分土客，石龙上游员头山（东莞属）有孙姓聚居数百人。查其家谱上世不明，仅记始祖员沙公由闽入粤，初居宝安，后迁东莞。二世分居中山，四世又分居东莞太平圩上沙乡。年前，孙科商请粤省府拨款廿万元在员头山建立中山小学，并摄映祠宇，筹建纪念祠，旋因政变中止等语。观此，则总理先世似又与我兴宁无关。又据中山孙璞（字仲瑛，吴主席任内为省政府秘书）与家兄昱霞谈称："余（璞自称）居中山沙边乡，与翠亨乡是否同派未研究清楚，始祖为闻义大夫，葬广州白云山，每年重阳合东莞、新会族众扫祀（民廿三年弟在广州特觉曾见过中山孙族扫祀之旗插在汽车上，由文德路经过）。于南宋间由浙江钱塘迁珠玑巷而至广州，嗣分两派，一居东莞，一居中山、新会"等语，观此，则总理先世更与兴宁无关。"不过沙边乡与翠亨乡，璞亦未知其是否同派，则白云山之扫墓，翠亨乡有无参加，想亦非璞所知已。"

邓慕韩致邹鲁函*

海滨① 盟长足下：

年来奔走各方，未暇启候，比想起居佳胜。顷者，罗香林先生著有《国父家世源流考》，足下为之序并欲将来列之党史。窃以事关国父世系，似宜郑重从事，幸勿因此而牵累党史。弟以是书与《总理家谱》及所调查不符，经为文正之。是书中引洪秀全创造太平天国，其上世由丰顺而嘉应而花县，国父上世亦自紫金而增城，再迁香山，源流相似，并引香山各姓来自岭东之客籍以为佐证，谓国父非来自南雄之广府人，系来自东江之客籍人。此节足下尤须顾及。民国十九年时，弟与汉民兄谈及本党之起原[源]，汉民兄主张始自中国同盟会。弟谓国父所述均云起于兴中会，应照此。汉民兄云：国父立党应如此。至本党之组织，则应起自同盟会，因同盟会成立时，未尝言及本源于兴中会，此间各同志主张尤力。弟当时不以为然，但未有词以折之。退而思及同盟会之党旗、誓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均由兴中会而来，不特党中会会员，以吾辈立意偏私也。汉民兄遂无言。以后亦不复有是主张矣。足下关于罗先生是书有无与当日同盟会会员主张之偏相类，盖留意焉。专此，即问起居。

弟邓慕韩启七月廿七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藏原函影印件。原函估计写于1943年。

① 编者注：邹鲁之字。

附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乙扣[②]

再者，此事最妙由足下通知罗先生自动停止发行，宣告错误。弟不日护送国父亲订三民主义原本来渝，领教不远。又启。

② 编者注：原函附有《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该文公开发表时题为《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见本书第317～322页。

温济琴致罗香林电*

渝中央党部罗专员香林勋鉴：

晚于徽日抵紫，各界对纪念国父先祖事甚表热诚，对先生深为敬佩，只以事出意外，忠坝孙姓少数人，竟为地方豪劣讼棍所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榨，无不令人感慨。当事者明知纪念事重，乐于退让，奈窃占罪重，法律所绳。而国父祖祠祖墓均仍全在，所买产业均系祖产。纵有窃占，亦已历有年代，依法已属和平占有，可免罹罪。今竟为人假借纪念国父先祖，致遭法纪迫不甘服，事势演变，恐非地方之福。晚鉴兹实况特电陈情，乞转请孙院长迅饬紫金县府法院，对事件处理，应本国父宽大博爱精神明辩论断，不得任人假借纪念国父先祖故加人罪，以息纷扰，地方幸甚。纪念学校事如何？并祈示及。晚温济琴梅县巧（十八日）叩。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藏原函影印件。原电注明1944年1月18日发、31日收。

杨连逢复邱捷函*

邱捷同志：

您好！

古江、旭昭两位昨日也曾找我，同时带来来谕①，现就可所知供你们参考。

1. 翠亨现存的《孙氏家谱》是我在 1956 年底交给故居的，该家谱是家祖母在世时一直保存的，它连同孙家开山荒合约和记事部一齐用一箱子包起来放在柜里保全的，家祖母每年也叫我们拿出来晒一次。（恐怕虫蛀）。

2. 翠亨村附近都是客家村，（如石门九堡、竹头园）惟独翠亨村的人都是讲本地话的，家祖母是讲本地话的。

谨此复。

敬请

时安。

杨连逢敬上

1987.11.2

请代向陈教授致候康安。

---

* 据本馆藏原函影印件。杨连逢系孙妙茜之孙，曾在本馆工作，现居中山市。

① 编者注：来信问及孙妙茜保存《孙氏家谱》的情况及孙妙茜是否讲客家话两事。

李旭昭复邱捷函*

邱捷同志：

函悉。所提两个问题，经和杨连逢同志碰头，根据大家的回忆，情况如下：

1. 所提“家谱”“开荒合约”等文物，全部都是妙茜姑太保存下来的原物，1956 年，由杨同志无偿地献出。

2. 孙家所讲的是中山白话，不是客家话，我和杨同志认为，孙中山先生不是客家人。

以上两点，仅供你们参考，你们对每个问题都这样深入研究，我们十分敬佩。

最后，请代我向陈教授多多问候，并请他好好保重身体。

并祝

身体健康！

李旭昭

1987.11.4

* 据本馆藏原函影印件。李旭昭曾任本馆负责人，已故。

孙乾复孙社正函*

社正叔如晤：

十月一日来信及转来上沙乡各父老来信及草图均已收到，侄才疏学浅，不敢言见，但蒙各父老宗亲如此爱护先祖，深为感动，侄今年不拟远行返里，故此不刻参加十一月十二日国父诞辰纪念庆典，甚感抱歉，如明年有机会返里，当另行奉告。

专此奉复并祝

安康！

侄乾

十月十九日(1989)

再者：敬烦转达侄的谢意给上沙乡各宗亲父老致盼。

---

* 据本馆藏原函影印件。

孙满复孙子生函*

子生会长台鉴：

顷接来函敬悉一切，弟本拟于十月份回来一叙，奈因目前脚部为患加上身体不适，精神影响甚大！故未能成行，至于纪念扁上题名，请为代笔便可，若身体好转些，或于来年，我定回来与大家相聚，届时畅聚，值增高谊，谨此致复，并请代向各位致以谢意及问候，谨此致复，并颂

各事如意。

弟孙满敬上（章）
1991－9－11

* 据本馆藏原函影印件。孙子生时为香港上沙同乡会会长。

五、年谱与传记选录

孙逸仙传记* (选录)

(美)林百克著　徐植仁译

……

著者在这里暂时把我的叙述中止一下,先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孙逸仙生在火奴鲁鲁的传说之不确。

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当他说到同志的时候总是笑的——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的。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说生在火奴鲁鲁,便可以得着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好多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近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

……

要询问中国人家庭间的情形,是不合礼貌的。著者虽和中山的友谊很密,但要问他的母亲是否缠足?好像很难措辞。若是直

---

* 据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徐植仁的中译文与英文原文有较多出入,特在中译文后附录有关原文。

捷爽快的问道:“博士,你的母亲缠足么?”那么,这句话的失礼,比问高贵的英美人道:“喂! 你已故的母亲,腰带缚得紧么;”还要利害。但是著者到后来终于想得一个可以不伤中山感情的方法。著者先取出一张照片来,指着上面的人一个个问他是谁? 最后指着他母亲的肖像说道:“这是一件很美丽的衣服,并且鞋子很美很小!”中山用很郑重的口气说道:“是的,我的母亲是中国人,自然是缠足的!”他很郑重地注视着这张照片,又说道:“我所以这样长久地容忍这种习俗的原因,是因为敬重我们的母辈。”他说到他母亲的时候,音调低下来了。

中山的父亲是留发辫的,他母亲是缠小脚的。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很以民族的旧俗自豪的。他们俩终身相爱,在家庭中很快乐。他们家里还有两个很好的妇人,依靠着这位缠足的母亲而生活;同样的,伊们也是缠足的。伊们是寡妇了,伊们嫁给中山父亲的两个弟弟。……孙家在翠亨村里,也可以算是一个望族。他们的生活,是完全合着中国的风俗,并且也绝对信仰天子和村中的偶像。

……

缠足,那时候在中国人看来是良好的风俗。因为这事情可以表明一家服从众人的风俗,得以维持他们的体面;所以不论那一家,对于这事都是热诚奉行。受苦的女儿,耐许多年的痛苦,因为小脚可以做一个高贵的标记,所以都愿意忍受。缠足的事情,最初大约起于皇室,那时候受苦的女子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将两足施用鸦片,不但缠时可以减少痛苦,而且可以保持原形。许多女子因为缠脚毁伤了肢体,终身成为废人;有的受血毒而死。著者记得曾见一个青年丐妇,常常膝行于上海昆山花园一带,伊因缠足,烂去了一足。但是伊在膝行求乞的时候,还常常高举伊所存的小脚,以表

示伊现在虽是困难，但从前亦是一个高等女子。有时候，那替女孩子缠足的人若是一个专家，那么将来这女子长大了，伊的脚还是很小，像婴儿一样的。但是伊在行路的时候，亦不会因脚小，完全减少了伊的美丽。因为伊每走一步，有一点儿摇摆，倒使伊现出一种秀美的态度来，在中国人眼光看起来，要算非常美丽的。确实这小脚的女子，也自信在步行时有这种特异的摇动，大可增加伊的美丽。缠足之事，实乃违背生理，不但残害肢体，或者还要伤及生命。缠脚的布，染了脓水也不大更换，直到后来，脚带纷乱不堪，足部受害匪浅，好象兽蹄一样，使得被残者终身成了跛足。就是那受害较轻的，缠后的结果，不但脚形变坏，并且脚踝足趾都受伤害。足趾屈在脚下，行路时非常痛苦。

孙家完全是中国式的，相信种种中国风俗，包括缠足。中山的母亲曾受过缠足的痛苦，没有什么危险，还算侥幸。从照片上看出来，伊的脚缠得这样小，年纪高了，不得不用一根竹杖支撑着走路。更从照片上把伊脸上的形迹细细看来，好像从前缠足的时候，受过一番痛苦的。孙家的人，对于缠足的风俗，心里当然以为有些野蛮，但因为这是中国积习，所以认为好的；于是中山的姊姊自然也免不了这个痛苦了。伊忍受着缠得很紧像铁一样的足带所加于他的痛苦，伊足部血液流通受了阻碍，一夜一夜地辗转反侧，呻吟着，竭力忍受，很坚忍地等候天明，盼望可得些治疗，把伊的痛苦减少些。但是到了天明，伊的全体已疲乏不堪，而悲痛又要开始了。后来中山对于此事，不能再忍下去了。他爱他的姊姊同爱家中别人一样。他勇敢地走到他母亲那里说：

“母亲呵，这个痛苦对于伊太厉害了！请不要再缠伊的脚罢。”这是中山对于改造的第一次努力。他的母亲忧愁地摇伊的头。著者推测伊听了中山的话，不免有些惊骇，好象是中山不要他姊姊有

美丽的小脚。

“文呀,倘使你姊姊现在不忍受痛苦,伊的脚怎么能够成金莲呢?总之:这种痛苦:不会十分长久的。你的姊姊调理得很好,伊的经过很好。倘使我们违背了这个中国的风俗,不替你姊姊缠足,伊长大的时候就要嗔怪我们的。

中山很热心地听他母亲讲述的话。他又复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理由的。于是他母亲提出客家不缠足的事情来做有力的辩驳。客家是住在广东的外来的人种,中国人并不把客家同等看待。但是这些话不能解决这个辩论。后来他母亲因为既爱伊的儿子,又怜伊的女儿,不肯再替伊缠足了。于是在村中请了一个女专家,不顾中山继续不断的抗议,依旧把伊足缠小了。中山后来用了政治上的势力,废除这种风俗,现在这风俗侥幸已经过去了。中山初次改造工作,就是开始在“请不要替姊姊缠足罢!”这一句话。描写这位大改造家早年的品性,是很重要的。

附: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选录)

Paul Linebarger

.....

I shall set to rest here the wide - spread and erroneous report of Sun Yat Sen's having been born in Honolulu.

"What about this report, Doctor, that you were born in Honolulu?" I asked him.

He smiled. Sun always smiles the smile of friendship when he speaks of his followers.

"It is true that the report was circulated. You see, some of my over - zealous followers thought that I could obtain protection from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gainst the Manchus by claiming to have been born in Honolulu, where, in fact, I did live for many years. So, of their own accord, they circulated this report; but ah, no! Choy Hung···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s.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in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

.....

---

* 据 Paul Linebarger, *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5。

Now, foot – binding was from the Chinese viewpoint a good Chinese custom which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indorsed with zest, for it maintained the respect of the family by showing that they conformed to custom. The victim endured stoically the years of torture, sustained by the thought that eventually she would wear the badge of a highly respectable Chinese lady.

The original idea of foot – binding presumably started in the imperial harem, where the girl victims had special treatment, including elevation of the fee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pium, both to relieve them from pains as well as to hold the foot to something of its original shape; for a great percentage of these foot – bindings result in mutilation that makes the existence of the victim that of a lifetime invalid. Many die of blood – poison, and I recall a young beggar woman who used to drag herself around on her knees in the vicinity of Quinsan Gardens in Shanghai, who had had one foot rotted off by the process, but who, as she went around on her knees begging, would hold the remaining tiny foot up very proudly, to show that she had, at all events, something of the quality of a Chinese lady.

However, sometimes special and expert service in the binding of a girl's feet results in very small baby feet in the grown woman, which do not entirely detract from grace in walking; for the light toddling and tumbling forward with each step gives a graceful poise to the body, which has a great charm to the Chinese; indeed, this peculiar totter in the carriage gives the victim herself a great self – confidence through the addition to her beauty.

Attempts at foot – binding among the masses, with no precautions, result in great malpractices and in loss of limb and even life itself. Instead of frequent changes of the bands of cloth, the old bandages, soiled and filled with pus, are allowed to remain until they start complications that eventually club the foot, and nearly always break the arches, leaving a hoof – like deformity which makes the victim a hopeless cripple for life. Even the great percentage of cases of "successful" foot – binding results not only in a most distressing deformity to the feet, but in injury to the ankles as well; and as to the toes; well, the toes club up under the feet, making walking, even on the balls of the feet, excruciatingly painful.

The Sun family, being intensely Chinese, believed in all Chinese customs, including even foot – binding. Sun Yat Sen's mother had come out of the foot – binding terror with great good luck for, as will be seen from the picture shown herewith, her feet had been bound so successfully and had become so small that she was obliged to carry a staff to sustain her as the years rolled along. It seems to me, however, that I can note from a study of this dear Chinese mother that there is still shown on her face something of the suffering which she endured in having her feet bound.

The Suns, in their hearts, undoubtedly admitted something of the barbarity of the practice, but it was Chinese, and therefore good; so Sun Yat Sen's sister came up for her share of the foot – binding agony. Stoically she submitted to the clamp of the bandages which hold the foot riveted in an iron – like grasp, destroy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in the lower limbs and setting the whole nervous system in mad rebellion against the torture. Night after night she would toss, moan, and murmur in her attempt to endure the pain, stoically awaiting for the dawn to come when she might have some rude treatment in an attempt to alleviate the pain. But with the dawn, her system racked with fatigue and pain, her sad lamentations would commence anew.

Finally Wen could stand it no longer. He loved his sister just as he loved every other member of the family circle. He went bravely to his mother.

"Oh, Mother, the pain is too great for her! Please do not bind the feet of my sister."

It was one of Sun's first pleas for reform. His mother shook her head sadly. I presume that she was somewhat shocked at this insubordin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good little brother Wen. I suppose that it seemed to her that Wen was disloyal to his sister in not wanting her to have pretty little fect.

"Wen, how can your sister have lily – like feet if she does not endure the pain? And, after all, it may not last so very long. Your sister is having good treatment. She is getting along very nicely. Your sister will be sorry when she grows up and reproach us if we neglect to give her the benefit of the foot – bind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 good Chinese custom."

Wen earnestly listened to the sentiment of his mother expressed in words to the above effect. Again, however, he renewed his protests, declaring that there was no reason why Chinese women

should mutilate their feet. Whereupon his mother brought forth the new and forceful argument of referring to the Hakkas. The Hakkas were an alien people who lived in that part of Kwantung. The Chinese did not consider the Hakkas their equal.

"Behold the Hakkas!"declared the mother of Wen. "No Hakka woma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 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 Hakka woman or a Chinese woman?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

This, however, did not settle the argument nor end the protest. Finally, the mother, with her love for her son, and with her pity awakened anew for her daughter, became so affected that she refused to bind her daughter's feet any longer and, Chinese fashion, turned the hard-hearted job over to a woman specialist of the village, who , in spite of Wen's continued protests, prosecuted the practice to a successful end.

Sun, through his political influence, has done much to abolish this practice, which, fortunately, is now passing away.

I have indulged in the over-lengthy discussion of this episode because it seemed to me important in portraying the early character of the great Reformer, whose first reform was commenced at his own home-side in the plea,"Please do not bind my sister's feet."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选录）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总理氏孙，名文，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德明，字帝象，又字载之，三十三岁时避地日本，署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称焉。先世出金陵，其远祖元中公，在宋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王安石青苗，忤旨，谪江西，遂居以终。十五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珠玑巷，后与莞伯何真公善，复偕子贵荣、贵华、贵绍、贵武，至东莞员头山居，乃为来粤之始。十四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迄明代，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香山县，即今所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沙头。寻以田赋烦苛，胥返东莞避之，会攖世变，不复来香山，然自是有后于其地。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再迁镇内翠亨乡，居迳仔蔭，建宗祠，明祀典。顾丁口甚稀，老壮多外出，未几而宗祠以圮。

翠亨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水木明瑟，风景颇佳，距旧县城石歧五十四里余，距澳门七十四里余。居民百数十户，业田渔或经商檀岛。孙姓偕杨、陆、何、冯，称最巨族。瑞英公以降，六世祖建昌公，五世祖迴千公，四世祖殿朝公，曾祖恒辉公，祖敬贤公，历世未显。父达成公。

---

*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年谱长编初稿》，1932年9月印本。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选录）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一岁

页数	行数	签注人	初稿原文	签注意见	备注
1	3	吴醒汉	总理氏孙	按年谱体裁，类多记名不记姓（例证刊后），原稿所载总理姓氏，不知可否从略？ （例一）公讳宗义，字太冲，号南雷。（见黄梨洲年谱） （例二）先生初名绛，字忠清，明朝亡后，他就改名炎武，字宁人，又曾叫做圭年，别号将山佣，学者们称他做亭林先生。（见顾亭林年谱） （例三）固，字孟坚，亦号兰台。（见班固年谱） （例四）先生名枚，字子才，号简斋。（见袁子才年谱）	
1	3	陈紫枫	总理氏孙	拟用韩欧碑志类文中叙姓氏之例改为“总理孙氏”	
1	3	孙委员科	幼名德明字帝象	幼名帝象，字德明	
1	3	陆灿	同前	同前	

*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1933年印本。

续表

页数	行数	签注人	初稿原文	签注意见	备注
1	3	本会编辑科	又字载之	按原文，字载之，系总理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漫游欧美时之假名，伦敦蒙难之后，剑桥大学教授翟尔斯，请撰生传，总理遂以载之之号写入传中，然自后绝不称用。此处只应与中山樵同记，若记于幼名德明字帝象之下，则不可。又中山樵记入年谱，则高野之名亦应记入，又南洋日本之同志，在某一时期，尝称总理曰公武云。	
1	5	陈紫枫	因议王安石清苗	清系青字之误	
1	6	邹委员鲁	迁珠玑巷	南雄有珠玑巷，粤人北来者多曾寄居，但此文紧接杭州刺史之后，不识是否为杭州之珠玑巷，否则乃为来粤之始一语须改。	
1	6	王云五 何炳松	莞伯何真公	按明史功臣表，有东莞伯何真，此当脱东字。	
1	6	陈紫枫	同前	同前	
1	6	前　人	至东莞员头山居	拟改为居东莞员头山	
1	7	前　人	乃为来粤之始	乃字可删	
1	9	孙委员科	分居左沙头	分居左坊头	
1	9	陆　灿	左沙头	左步头	

续表

页数	行数	签注人	初稿原文	签注意见	备注
1	10	前人	再迁镇内翠亨乡	再迁东镇翠亨乡	
1	12	陈紫枫	距旧县城石歧五十四里余	距拟改为去字	
1	13	前人	孙姓偕杨陆何冯	偕字改为与字较妥	
1	13	邓慕韩	称最巨族	按民国初年，香山县志所载，翠亨全乡一百四十七户，故各姓不能称最巨族，况孙姓仅二十余人耳。	
1	13	陈紫枫	同前	最字可删	
2	2	吴醒汉	信堪舆耽游涉，家以中落	此数语似可从略，以示尊重之意	

总理年谱长编稿*（选录）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总理孙先生讳文，幼名德明，字帝象，稍长号日新，嗣号逸仙，亦尝自署载之，或公武，迨三十二岁时避地日本，署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称焉。先世出金陵，远祖允中公，在宋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王安石青苗，忤旨，谪江西，遂居以终。始迁祖即第一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南雄珠玑巷，与东莞伯何真公善。真公慕其品学，聘为西宾，遂相偕来粤，并率其子贵荣公、贵华公、贵绍公、贵武公等，至东莞员头山而家焉。第二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自是第三世祖礼和公、礼忠公、礼禋公，第四世祖受公、晟公、广公，第五世祖能公、通公、玄公，胥未出上沙境。玄公字礼赞，中岁率其子乐川、乐南，迁香山县（即今改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未几，乐川又分居左坡头，而乐南后裔，则由涌口藩殖。中更丧乱，间有反东莞，或迁异地者。至十一世祖瑞英公再迁镇内翠亨乡，居迳仔蓢，乃建宗祠，明祀典。顾丁口甚稀，老壮多外出，未几而宗祠以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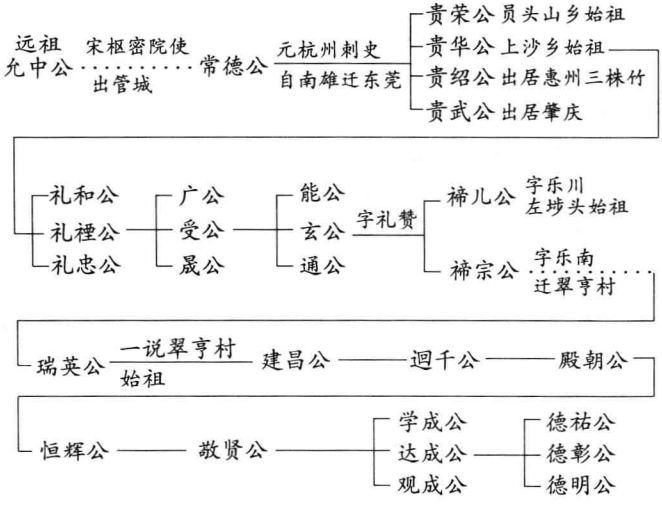
翠亨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水木明瑟，风景佳胜，距旧县城石歧五十四里余，距澳门七十四里余。居民百数十户，业田渔或经商檀香山。孙姓偕杨陆何冯，人数较众。瑞英公以降，十二世祖建昌公，十三世祖迴千公，十四世祖殿朝公，曾祖恒辉公，祖敬贤公，

---

*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年谱长编稿》，1935年11月印本。

历世未仕。父达成公，名观林，号道川，早岁业农。因其父不事生产，乐外游，家以中落，遂赴澳门，业缝工，间亦制革。逾壮，仍返翠亨乡，复旧业。娶同邑隔田乡杨腾辉公女，阅十载而生德彰公，自是长女金星，次子典，次女妙西，皆递隔三载而生。金星及典均殇，典追名德祐。丙寅生总理，亦后于妙西三载，再阅五载生季女秋绮。总理生时，达成公年五十四，杨太夫人年三十九，时西历一八六六年也。纪元后，中国国民党以西历推算，总理系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生，乃规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为总理诞生纪念节。

兹将孙族分支系统敬列简表如左：



总理事略*（选录）

胡去非

胡去非编纂总理事略

孙科敬署（章）

胡君好学，勤研主义，《总理事略》，编订明备，图像合刊，弥具深意，如见羹墙，如闻謦欬，追惟过庭，常懔诏示，敬付梓人，用贻同志。

孙科敬题（章）

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号元中，谧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至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真之聘，至广东东莞任西席，遂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贵华公，分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贵华公生一子，名玄，字礼赞，始迁香山县之东镇涌口村，此为孙氏居香山之始祖。礼赞公生两子，长缔宗号乐千，次缔儿号乐南。乐南公分居左步头，后以不胜苛征暴敛，又返东莞。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蔭，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族谱所载，自常德公侨居广东后，至中山先生之世为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令孙治平治强兄弟，适为二十代；瓜瓞绵延，克昌厥后，勋业之隆，岂仅荣宗耀祖而已哉。

---

* 据胡去非著：《总理事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0月版。

总理与中国革命*（选录）

吴稚晖

总理直系的老祖宗，是北宋时候南京一位名士，做过宋朝枢密使的孙固。总理就是孙固的三十三代孙。在元朝末年，又有一个杭州的孙常德，曾做过元末的刺史，他是孙固的十五代孙。这位孙常德，为人最重气节，元朝亡后，到了明朝，他因为不愿身事二主，所以就从杭州远远的迁到广东东莞县隐居起来了，他的子孙，也就在这里一直住下来。后来到了他的八代孙，就是孙固的二十三代孙，又从东莞搬到香山县，再移到翠亨村，这就是后来总理的诞生地了。

自从孙常德隐居以后，他的子孙便一直没有出仕的，后来由明入清，他的子孙自然更不愿意出来给异族作官了。所以在这一个长时期中，总理的祖先，都守着耕读为本的古训，隐避在乡下读书耕田，度着清净的农家日子。

---

* 据吴稚晖：《总理与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团刊》第53期，1941年出版。此系吴稚晖演讲稿，时间为1941年11月12日。

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选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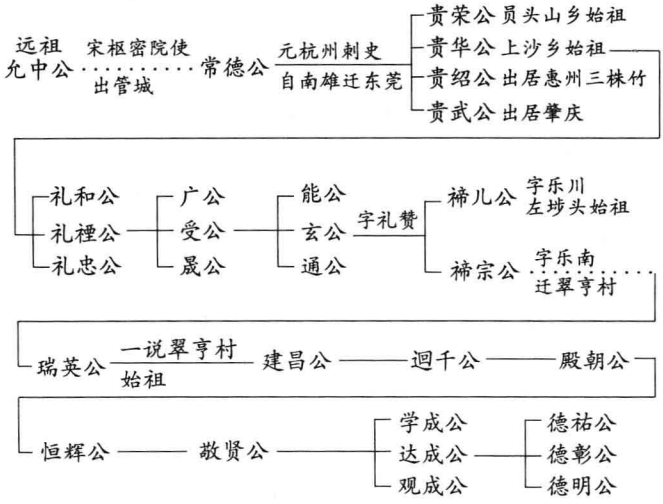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总理孙先生讳文，幼名德明，字帝象，稍长号日新，嗣号逸仙，亦尝自署载之，或公武，迨三十二岁时避地日本，署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称焉。先世出金陵，远祖允中公，在宋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王安石青苗，忤旨，谪江西，遂居以终。始迁祖即第一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南雄珠玑巷，与东莞伯何真公善。真公慕其品学，聘为西宾，遂相偕来粤，并率其子贵荣公、贵华公、贵绍公、贵武公等，至东莞员头山而家焉。第二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自是第三世祖礼和公、礼忠公、礼禋公，第四世祖受公、晟公、广公，第五世祖能公、通公、玄公，胥未出上沙境。玄公字礼赞，中岁率其子乐川、乐南，迁香山县（即今改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未几，乐川又分居左坡头，而乐南后裔，则由涌口藩殖。中变丧乱，间有反[返]东莞，或迁异地者。至十一世祖瑞英公再迁镇内翠亨乡，居迳仔蓢，乃建宗祠，明祀典。顾丁口甚稀，老壮多外出，未几而宗祠以圮。

翠亨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水木明瑟，风景佳胜，距旧县城石歧五十四里余，距澳门七十四里余。居民百数十户，业田渔或经商檀香山。孙姓偕杨、陆、何、冯，人数较众。瑞英公以降，十二世祖建昌公，十三世祖迴千公，十四世祖殿朝公，曾祖恒辉公，祖敬贤公，历

*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1944年1月印本。

世未仕。父达成公，名观林，号道川，早岁业农。因其父不事生产，乐外游，家以中落，遂赴澳门，业缝工，间亦制革。逾壮，仍返翠亨乡，复旧业。娶同邑隔田乡杨腾辉公女，阅十载而生德彰公，自是长女金星，次子典，次女妙西，皆递隔三载而生。金星及典均殇，典追名德祐。丙寅生总理，亦后于妙西三载，再阅五载生季女秋绮。总理生时，达成公年五十四，杨太夫人年三十九，时西历一八六六年也。纪元后，中国国民党以西历推算，总理系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生，乃规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为总理诞生纪念节。兹将孙族分支系统敬列简表如左：



孙中山先生传*（选录）

高良佐

孙先生的家族，住到这可爱的村庄里，只有四代的光景，在这时期以前，他的祖代，因为受了战争的纷乱，生活的压迫，不断地迁徙。他们从远代的友松公在广东紫金忠坝公馆背村立下了家庭的基础，才开始做了广东人。孙先生在少年时代，曾经在火奴鲁鲁住过相当时期，因此很多人对他的籍贯不甚清楚，他有一次答复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说："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宗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Kurg Kun）里。"这龚公村三字，到最近经过了多方面的考证，才知道就是紫金县忠坝的公馆村（见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

到了明末清初，粤东义士举起了反清复明的火炬，抵抗清兵入粤，忠坝为琴江都小盘地，东西南三面，翠山环抱，成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在这里由于钟丁先的领导曾经展开了剧烈的民族血战，不少的汉人在清兵淫威之下，遭受杀戮的惨祸，剩下来的只有流离失所。孙家的人，也有不少参加这一次的血战。事变过后，他们就从紫金迁到增城，那就是十二世祖连昌公，这是孙族向广东中部迁徙的开始。

但这时纷乱的局面，还是不断地发展着：满清政府虽乘明室内乱而夺取了统治权，四方志士，依然到处发动义师，抵抗到底。如

---

* 据高良佐：《孙中山先生传》，成都近芬书屋，1945年版。

郑成功、张煌言等的据厦门、金门，会师金陵，前仆后继，壮烈奋斗，最为满清政府所头痛。他们到了最后无办法，还是退保孤悬海外的台湾，作为复兴的根据地。满清政府为要根除这民族斗争的大患，就对台湾采取严密封锁的办法，下令迁移沿海边界，为坚壁清野之计，企图困灭成功，于是闽粤江浙等省濒海居民，老弱转死于沟壑，少壮流离于四方，庐舍尽燔，膏沃废弃，造成了空前惨剧。但满清政府对这种残酷的政策，并没有阻遏了郑氏的独立，反使户口虚耗，物力减损，使东南各省的经政，蒙受严重的影响。因此过了不久，那些比较有肝胆的疆吏，不忍坐视，先后奏请复界，移民开垦，于是广东北部农民与昔年抗清义民的退散者，都渐渐地向濒海一带去移殖。连昌公也在这时，又从增城迁到中山（旧称香山）县涌口门村，度着他们的劫后生涯。这是大约在清初康熙中叶的时候。一直到孙先生第十四世祖殿朝公，才又从涌口门村迁到这小小的村庄来住。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永传不朽的圣地的名称，它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叫做翠亨村。无疑的，它和孔子的曲阜，耶稣的耶路撒冷，同样的受到后世的追慕和尊敬。

……再从孙先生的家世和故乡的历史来说，孙家的远祖，曾经参加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并且在满清政府的压迫之下，受尽屠毒流离的痛苦，因此民族的意识和反清的思想，在孙家历代相传下来的子孙脑海中，都留存了很深刻的印象。孙先生的胞姊妙西姑太太，曾经告诉人家说，她家的先人，在清代从来没有人去应举觅官，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孙家从增城迁到中山，又在中山的涌口再迁到翠亨，住在这些地带的农民，和孙家同样的曾经参加抗清义师而退散的，或从沿海各地复界还乡的孑遗，他们的民族思想，也挟与俱来，杂错而居，各怀身世，影响所及，就和东南沿海各地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又称三合会或洪门会），发生了共鸣的作用，而中山县濒

海曾被迁界的乡村和岛屿，更演为天地会在广东的枢纽。据同治香山县志记载，道光时代三合会再起的首领，就是和翠亨村毗邻的石门甘秀。这是初期的中国民族运动的秘密组织，对于以后孙先生的革命运动，也有很大的关系。

国父年谱(第一次增订本)* (选录)

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
编纂委员会主编

国父孙先生,名文,幼名德明,乳名帝象。稍长,号日新,嗣号逸仙。又尝自署载之,或公武。三十二岁时,旅居日本,曾署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前,世人常称逸仙先生。及民国建立,遂皆以中山先生称焉。

孙氏先世本中原望族。唐僖宗时,河南陈留有孙谌者,中书舍人孙拙子也,娶陈氏;黄巢乱作,充承宣使,领兵闽越江右之间,因屯军定居于江西宁都。四世孙承事公,复迁福建长汀之河田。明永乐中,有友松公者,再迁广东东江上流紫金县之忠坝公馆背,为先生上代入粤始祖。十二传至连昌公,屡参反清义师,兵败留徙,于康熙时又自紫金迁增城,迫于生计,谋卜居沃壤,因移家香山县(今名中山县)涌口门村,传迥千公,再传至乾隆中叶由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之殿朝公,即先生高祖也。自友松公迄先生已十八世。

---

* 据(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国父年谱》(第一次增订本),(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11月版。

迁至翠亨村,亦有五代。①

先生曾祖恒辉公,娶程氏,生乾隆三二年丁亥(西历一七六七),卒嘉庆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年三十五岁。祖父敬贤公,生乾隆五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卒道光二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年六十二岁;娶黄氏,以耕读起家,生三子:长达成,次学成,三观成。

① 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其考证较详备;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下简称党史会)《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最初油印本及邓慕韩著《国父年表附世系》皆谓先生先世系出金陵;远祖允中公,宋代进士,受知于宰相韩琦;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青苗"忤旨,被谪江西。其入粤始祖常德公为杭州刺史,遭变乱迁至南雄珠玑巷,再迁东莞员头山乡。爰及明代,五世祖玄,号礼贤,迁于香山东镇涌口。至清初,十一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至翠亨乡。(邓著据《员头山孙氏族谱》、《上沙乡孙氏族谱》及《国父家谱》,见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广州《新时代月刊》)。

国父年谱(第二次增订本)* (选录)

罗家伦主编　黄季陆增订

国父孙先生,名文,谱名德明,幼名帝象。稍长,号日新,嗣号逸仙。又尝自署载之,或公武。三十二岁时,旅居日本,曾署名中山樵。后尝署名高野。辛亥革命前,世人常称逸仙先生。及民国建立,遂皆以中山先生称焉。

孙氏先世本中原望族。唐僖宗时,河南陈留有孙谌者,中书舍人孙拙子也,娶陈氏;黄巢乱作,充承宣使,领兵闽越江右之间,因屯军定居于江西宁都。四世孙承事公,复迁福建长汀之河田。明永乐中,有友松公者,再迁广东东江上流紫金县之忠坝公馆背,为先生上代入粤始祖。十一传至鼎标公,尝参反清义师,兵败流徙,于康熙时又自紫金迁增城。十二传至连昌公,复移家香山县(今名中山县)涌口门村,传迥千公,再传至乾隆中叶,由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之殿朝公,即先生高祖也。自友松公迄先生已十八世。迁至

* 据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第二次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11月版。

翠亨村,亦有五代。①

先生曾祖恒辉公,娶程氏,生乾隆三二年丁亥(西历一七六七),卒嘉庆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年三十五岁。祖父敬贤公,生乾隆五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卒道光二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年六十二岁;娶黄氏,以耕读起家,生三子:长达成,次学成,三观成。

① 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其考证较详备。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下简称党史会)《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抄本》(民国三十三年油印本)及邓慕韩著《国父年表附世系》皆谓先生先世系出金陵;远祖允中公,宋代进士,受知于宰相韩琦;神宗时,仁枢密院使,因议"青苗"忤旨,被谪江西。其入粤始祖常德公为杭州刺史,遭变乱迁至南雄珠玑巷,再迁东莞员头山乡。爰及明代,五世祖玄,号礼贤,迁于香山东镇涌口。至清初,十一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至翠亨乡。(邓著据《员头山孙氏族谱》、《上沙乡孙氏族谱》及《国父家谱》,见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广州《新时代月刊》)。

国父年谱(第三次增订本)* (选录)

罗家伦主编　黄季陆　秦孝仪增订

国父孙先生,名文,子载之,号逸仙,① 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时就读香港,入基督教,受洗时署名日新,又尝自署公武。三十二岁时,旅居日本,曾署名中山樵。后尝署名高野。辛亥革命前,世人常称逸仙先生。及民国建立,遂皆以中山先生称焉。

孙氏先世本中原望族。唐僖宗时,河南陈留有孙俭者,中书舍人孙拙子也,娶陈氏;黄巢乱作,充承宣使,领兵闽越江右之间,因屯军定居于江西宁都。四世孙承事公,迁福建长汀之河田。明永乐中,有友松公者,再迁广东东江上流紫金县之忠坝公馆背,为先生上代入粤始祖。十一传至鼎标公,尝参加反清义师,兵败流徙,于康熙时又自紫金迁增城。十二传至连昌公,复移家香山县(今名中山县)涌口门村,传迴千公。乾隆中叶,由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之殿朝公,即先生高祖也。自友松公迄先生已十八世。迁至翠亨

---

*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第三次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11月版。

① 一八九六年十月,先生伦敦蒙难获释,十一月应英国汉学家翟尔斯(Herbert Glles)之请手书自传。

村，亦有五代。②

先生曾祖恒辉公，娶程氏，生乾隆三十二年丁亥（西历一七六七），卒嘉庆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年三十五岁。祖父敬贤公，生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九），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五〇），③年六十二岁；娶黄氏，以耕读起家，生三子：长达成，次学成，三观成。

---

②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重庆；六十五年五月，台一版，台北），其考证较详备。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今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党史会）：《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民国三十三年一月油印本）一页；及邓慕韩：《国父年表附世系》皆谓先生先世系出金陵；远祖允中公，宋代进士，受知于宰相韩琦；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青苗"忤旨，被谪江西。其入粤始祖常德公为杭州刺史，遭变乱迁至南雄珠玑巷，再迁东莞员头山乡。爰及明代，五世祖玄，号礼贤，迁于香山东镇涌口。至清初，十一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至翠亨村。（邓著据《员头山孙氏族谱》、《上沙乡孙氏族谱》及《国父家谱》，见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广州《新时代月刊》）。

关于先生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民国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生侄孙即德彰公嫡孙孙满，致函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检附《孙达成祖家谱重修概述》、《国父孙中山先生族谱世系表》等，指陈罗香林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述有误，力证翠亨孙族非出自客家。但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国父家属代表孙科先生夫人孙陈淑英女士，分函国语日报社、中央党史会、国史馆，则仍确认先生为客家人，老家在紫金县。本谱暂仍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再行补正。

③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当西历一七八八年，道光三十九年己酉当西历一八四九年。惟敬贤公生于乾隆戊申十二月二十三日，时为一七八九年一月十八日；卒于道光己酉十二月二十三日则为一八五〇年二月四日也。

国父年谱(第四次增订本)* (选录)

罗家伦　黄季陆主编　秦孝仪　李云汉增订

国父孙先生,名文,子载之,号逸仙,① 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时就读香港,入基督教,受洗时署名日新,又尝自署公武。三十二岁时,旅居日本,曾署名中山樵。后尝署名高野。辛亥革命前,世人常称逸仙先生。及民国建立,遂皆以中山先生称焉。

孙氏先世本中原望族。唐僖宗时,河南陈留有孙谌者,中书舍人孙拙子也,娶陈氏;黄巢乱作,充承宣使,领兵闽越江右之间,因屯军定居于江西宁都。四世孙承事公,迁福建长汀之河田。明永乐中,有友松公者,再迁广东东江上流紫金县之忠坝公馆背,为先生上代入粤始祖。十一传至鼎标公,尝参加反清义师,兵败流徙,于康熙时又自紫金迁增城。十二传至连昌公,复移家香山县(今名中山县)涌口门村,传迥千公。乾隆中叶,由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之殿朝公,即先生高祖也。自友松公迄先生已十八世。迁至翠亨

---

* 据罗家伦、黄季陆主编、秦孝仪、李云汉增订:《国父年谱》(第四次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11月版。

① 一八九六年十月,先生伦敦蒙难获释,十一月应英国汉学家翟尔斯(Herbert Giles)之请手书自传。

村，亦有五代。②

先生曾祖恒辉公，娶程氏，生乾隆三十二年丁亥（西历一七六七），卒嘉庆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年三十五岁。祖父敬贤公，生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九），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五〇），③年六十二岁；娶黄氏，以耕读起家，生三子：长达成，次学成，三观成。

---

②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重庆；六十五年五月，台一版，台北），其考证较详备。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今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党史会）：《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民国三十三年一月油印本）一页；及邓慕韩：《国父年表附世系》皆谓先生先世系出金陵；远祖允中公，宋代进士，受知于宰相韩琦；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青苗"忤旨，被谪江西。其入粤始祖常德公为杭州刺史，遭变乱迁至南雄珠玑巷，再迁东莞员头山乡。爰及明代，五世祖玄，号礼贤，迁于香山东镇涌口。至清初，十一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至翠亨村。（邓著据《员头山孙氏族谱》、《上沙乡孙氏族谱》及《国父家谱》，见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广州《新时代月刊》）。

关于先生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民国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生侄孙即德彰公嫡孙孙满，致函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检附《孙达成祖家谱重修概述》、《国父孙中山先生族谱世系表》等，指陈罗香林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述有误，力证翠亨村孙族非出自客家。但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国父家属代表孙科先生夫人孙陈淑英女士，分函国语日报社、中央党史会、国史馆，则仍确认先生为客家人，老家在紫金县。本谱暂仍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再行补正。

③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当西历一七八八年，道光三十九年己酉当西历一八四九年。惟敬贤公生于乾隆戊申十二月二十三日，时为一七八九年一月十八日；卒于道光己酉十二月二十三日则为一八五〇年二月四日也。

孙中山年谱长编* (选录)

陈锡祺 主编

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礼赞[瓒]公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①。(据翠亨孙中山故居藏《孙氏家谱》;《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若干资料》,《中山文史》总第10辑)

先生自述:"文之先人躬耕数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祖敬贤公(1788－1849),初薄有田产,后家道中落②;生三子:达成(即先生之父,1813－1888)、学成(1826－1864)、观成(1831－1867)。达成于1846年与隔田村杨氏(1828－1910)结婚。先生诞生时,家中除父母外,尚有祖母黄氏(1792－1869)、兄眉(字德彰,号寿屏,1854－1915)、姐妙茜(1863－1955)。姐金星(1857－1860)及兄德祐(1860－1866)均于先生诞生前夭亡。(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

---

* 据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

① 自罗香林之《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提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于清初康熙年间从广东紫金经广东增城辗转迁至香山后,颇有人以广东紫金为先生祖籍者。也有学者根据翠亨孙中山故居所藏《孙氏家谱》(原为孙妙茜保存)、《孙梅景等卖田契》、《孙达成兄弟批垦山荒合约》(两件)、孙妙茜对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钟公任关于祖籍在东莞的自述及翠亨村附近孙氏祖墓等文物、文献,认定孙氏先世于明代已从东莞迁居香山,并非清初始从紫金迁来。参见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② 关于敬贤公家境,说法歧异。今取罗香林所记孙妙茜忆述。(《国父孙公家世试探》,《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孙妙茜述祖、父因迷信风水,由小康而至贫困,当大体可信。然罗香林所记"敬贤公以耕读发家,颇有钱",则恐有夸大。

东方巨人孙中山*（选录）

广　宁　主编

关于孙中山的家世，孙科在《八十述略》书中“先世述略”一章中写道：

在唐朝以前，我们广东孙氏这一族住在河南的陈留，到了晚唐僖宗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我们的远祖是中书舍人及两浙节度使孙拙。孙拙的儿子叫孙诜，是个很贤达能干的人。在黄巢举事时，他作承宣史，带兵去平息，因立了军功，被封了东平侯，驻在虔州虔化县，就是现在江西省的宁都县。由于治理成绩显著，老百姓安居乐业，当地的人都挽留他，于是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由此看来，孙诜就是我们广东香山孙氏南迁的始祖。①

1983年11月，中山市中山研究会组织了一个调查、考证孙中山家世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开展研究工作。他们走访邑中老人、家族亲属，函调有关县志、族谱，考证了无数的祠堂柱、田屋契文和山坟墓碑，工作得极为细致，极有成效。

在这些调查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发现，是1984年前后在江西省宁都县田头乡孙屋底村孙世龙家发现的五卷六本《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里面记载了孙氏家族从晚唐到明永乐年间在河南、江西、福建的繁衍情况。这个最新发现的《修族谱》记载着：河南陈留县的孙诜是孙氏入赣的远祖。孙诜是唐朝的中书舍人孙

---

* 据广宁著：《东方巨人孙中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

① 编者注：此段文字与孙科原著略有出入。

拙之子，唐朝末年的“黄巢之乱”，孙诩因英勇善战，被选为百将东平侯，率兵征战闽越江右间，后定居于江西宁都。这个记载和以前关于孙中山家世著作的考证大致相同。①

孙科在《八十述略》一书里，提到孙诩五传至承事公，迁居福建长汀的河田；而《修族谱》的记载是：诩生孙实，实生七子，其中第三子孙士元生孙有敬，敬第一个由江西宁都迁居福建长汀河田，成为孙家入闽的始祖。此后，孙家在闽历居四代，直到明朝永乐年间，孙有敬的第七代子孙孙友松由闽迁到广东省紫金县忠兴坝落户，成为孙家入粤的始祖。而孙家入粤以后的情况考证较细较多的，还是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

从孙友松又十一代，适时明清之际，十一世祖孙鼎标，随钟丁先起义抗清，以英勇善战，为钟氏器重，尝于一日升官三级。时人乃称公馆为连升馆，颂其功也。此后，鼎标公以兵败北，孙氏族人为避免战祸，多流徙离散。其次子连昌公，迁居增城，康熙中叶，再迁居香山县涌口门村务农渔，成为孙家入香山的肇族。孙连昌公到涌口门村，越二传，至连昌公之孙孙殿朝起，始由涌口门村迁入翠亨村，成为孙家入翠亨村的开基祖。殿朝生恒辉，辉生敬贤，贤生达成，而孙达成就是孙中山的父亲。由此可知，孙恒辉、孙敬贤、孙达成、孙中山、孙科都诞生在翠亨村。②

① 编者注：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从未成立过此文所称的调查小组。《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的发现，亦与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无涉。

② 编者注：查罗著原文，并无此段文字。

国父传* (选录)

孙家原本并不是世居于广东省,而是约在唐朝僖宗中和三年(西元八八三年)时,河南省陈留县有一个叫孙诜的人,因为被朝廷任命为承宣使,负责领兵对抗当时数十万的流匪,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黄巢之乱"。

于是,孙诜带领军队南征北剿,在广东、福建一带进行游击战,后来驻守在虔州的虔化县(在现在的江西省宁都县)。由于他英勇善战,使得黄巢落荒而逃,受到大家的尊敬。乱事平定后,孙诜原本要班师回朝了,宁都县县民却希望孙诜能留下来,于是,孙诜便定居在这儿了。

从此以后,孙家子孙便散居在江西、福建、广东一带,直到明朝永乐年间,孙氏祖先孙友松,迁居广东省紫金县,孙氏才算是在广东省扎根了。

孙氏到了第十一代时,正逢明末清初,清兵起兵夺取明朝天下的时候,孙氏祖先孙鼎标,便召集了许多爱国志士准备反抗,没想到,清兵已经进入了山海关。孙氏子孙兵败后,便四处走避。直到第十二代祖先孙运昌,搬到广东省增城县,接着才又搬到香山县。

清朝乾隆中叶时,国父的高祖孙殿朝,眼看孙家全集居在香山县的涌口门附近,目标太过明显了;加上明末时,孙家曾经公开抗清,为避免清廷的注意,所以便带着家人由涌口门迁到翠亨村居住。

---

* 据柯绣雪发行:《国父传》,(台北)钟文出版社,1998 年版。

……

孙家由孙殿朝开始，历经曾祖父孙恒辉、祖父孙敬贤、国父的父亲孙达成，一直到国父为止，共有五代孙氏子孙，一直住在翠亨村。

民国总统家世*（选录）

何虎生主编

在中国百家姓上，赵、钱、孙、李皆为大姓，而且这类大姓从中国文化与经济的渊源看，都是中原望族。由于中国中原战乱频频，许多中原望族或没落，或徙江南。从晚唐时起，南方经济渐趋发达，为避战祸，中原许多家族南迁而不返，遂成为现在之状况。从语言上看，江南尤其岭南一带，文化、习俗颇多隋唐遗迹。

孙中山的先世祖宗，据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和1984年前后在江西宁都县田头乡孙屋底村孙世龙家发现的五卷六本《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所载：孙中山先世本为中原望族，居河南陈留，及晚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远祖孙拙，字玄几，官位至中书舍人及两浙节度使。拙有子名洌，甚为贤能。事逢唐末黄巢起兵，后过江南，洌应诏为承宣使，率兵镇压农民军，“引兵游击于闽、粤，江右间”。洌因能攻惯战，被封为百将东平侯，后驻节虔州虔化县（今江西宁都县），由于治绩显著，百姓安居乐业，当地百姓百般挽留，不使之去，同时亦由于中原一带混战不休，洌就在宁都定居下来。孙洌即是孙中山的家族中南迁江南之始祖。

据孙科《八十述略》中所载，自孙氏南迁之世祖孙洌经子孙实，孙孙士元至曾孙孙有敬（孙士元之第三子）因惧兵祸，遂南迁入闽，为孙氏家族入闽之始祖。此后孙有敬生子六郎，六郎有子十六居士，十六居士有子九承事，九承事有子孙友松者，即孙氏南迁之第

---

* 据何虎生主编：《民国总统家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七代子孙由闽迁徙至广东紫金县忠兴坝落户，其时为明朝永乐年间，孙友松遂成为孙氏家族入粤之始祖。

从孙友松起经十一世，传至南迁以来的第十八世祖孙鼎标，时值明清之际，孙鼎标激于民族大义，随钟丁先起义抗清，以英勇善战，为钟氏所器重，曾于一日官升三级。故时人称其公馆为连升馆，颂其功也。此后，孙鼎标兵败，孙氏族人为避免战祸，多流徙离散。时孙鼎标之次子孙连昌，由广东省紫金县迁居增城，康熙中叶，再迁居香山县涌口门村，以耕渔为业，始成为孙氏入居香山之肇祖。

越两代，至孙连昌之孙孙殿朝起，始由涌口门村迁入翠亨村。据传这里尚有曲折，孙氏之先居粤东莞县属长沙乡，至明代，第十九世祖孙连昌迁入香山县镇东涌口门村，生孙迥千，后孙迥千居左步头，旋因赋税催迫而迁东莞，因为兵乱竟不能返香山新迁之处。只留后嗣以居焉。后有孙迥千之子孙殿朝于清代乾隆时再迁镇内翠亨村边之迳仔蓢，并建有祖祠，然已人口稀微，老壮出外，乏人理料，故祠圮久矣。由是可鉴，孙殿朝乃为孙氏入翠亨村之开基祖。

孙殿朝妣林氏，生有一子孙恒辉即孙中山之曾祖父。孙恒辉娶妻程氏，生孙敬贤，孙敬贤即孙中山之祖父。从孙敬贤以上几代均以农耕为主，家境贫寒，人口稀少，属典型的贫农之家，到孙敬贤这一代，因年 14 岁即遭遇父丧，依寡母为生，凭着他的苦干和节俭，终于由一个佃农购得田地 20 亩。但其一生迷信风水醉心于术士的风水之说。有一钟姓术士，系太平天国的一位谋臣，金陵被清兵攻陷后遂避乱于此，孙敬贤对之优礼有加，并对他的风水说奉信不疑。钟指出一“牛眼龙”穴，位于皇帝殿，谓如购得此穴，子孙必大发达。孙敬贤便不惜变卖田地购得，并对坟地大加修缮。以致家道中落。到孙中山的父亲这一代，不得不外出谋生，以致孙中山

的两个叔父均遭难于海外。

综观孙氏家族南迁以来，以世显者少，以无闻者多，可见孙中山的自述中“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之言不虚。同时也基本上符合孙科所言，孙氏祖先都是深明民族大义，很重气节，尤其具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六、研究及评述

客家研究导论* (选录)

罗香林

……

第三,孙公中山的革命及客家民气的激昂。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三年,中国近代国民革命的领袖,孙公中山,也就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诞生了。不久而中国局势也就跟着孙公及其同志诸人的努力而转变了。这是中国现世史上的绝大关键,除非不想过问现代中国各问题则已,不然,则于这个关键,总得加以注意,不能看轻;但于此,尚有一事,须得先为解说,这就是孙公系籍的问题。古先生客人对自跋,曾云:

"此文成后,友人为予言曰:孙中山先生,亦客人也,何以不及?予往阅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先生自言家庙在东江上,迁于翠亨,只数代耳。夫东江者客人聚处之域,而先生兄弟平日善为客语,又人人稔知,指为客人,诚非无据,然予终以慎审,故不敢著录。顷中史党史编纂会,考查先生原籍,距石龙不过三十里,则益近真际矣!特书此,以待质定。"

---

* 据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藏书房,1933 年 11 月初版。

这是还不敢十分断实孙公系籍的言论，我在评古先生客人对一文[①] 曾稍论列，当时是这样说的：

“愚按孙公祖先，确为客籍。去年春，郭冠杰先生尝为予言：‘光宣之际，有梅人某君，尝以革命事，往谒孙公。初相见，某君强操国语，顾字音不正，出口维艰，孙公睹状，慰曰：听君语，粤人也，盍以粤语谭论可乎？某乃改操广州白话，顾亦不熟，所言多不达意。孙公曰：子殆客家人乎？吾当与子讲客话也。某怪孙公能客语，叩曰：总理亦学客话乎？孙公曰：吾家之先，固客人也，安得不解客话’？又闻之范捷云（锜）师云：‘孙中山，实客家人与广府本地系之混血种，所居翠亨，原字菜坑，盖客家移民，初以种菜为生，故以菜坑名村也。’郭范二先生，学问为时贤所敬，平日热心是非之辨，兹所论述，当可置信。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孙逸仙传记（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第一章谓孙公祖祠，在东江东莞[②]。中央党史编纂会，谓孙公原籍，距石龙不过三十里，按其地望，亦在东莞县内，而东莞则固至今尚为客人与本地系人杂居之地。夫孙公已自言先代本为客籍，而原居东莞，又确有客家杂居，则孙公上代为客家之一，不待辩而明矣！然而孙公本人，则不能因此遂谓其为纯客人也，何则？林百克孙逸仙传记第四章，曾述孙公家庭，谓孙公生母，实曾缠足。考客家妇女，从无缠足之风，孙公生母必为广府本地系人，据此，则范先生之言，益为不刊之论矣！”

这是二三年前旧话了。为着要澈底了解孙公的系籍问题，我曾特地去翠亨调查过一回，在翠亨离孙公故居不过二十步左右的

① 文见北平北晨评论（北平晨报副刊）第一卷第十六期。

② Linebarger 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 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 Tung 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

中山农事试验场办事处住过两天。据个人调查观察参合比证的结果①,昔年那篇短文论述各点,幸皆没甚谬误。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至十二世连昌公,复于康熙间与子迥千,迁香山县(今改中山县)东镇(今称第四区)涌口门村,与邻居不很融洽,故数传又迁同镇翠亨村,后来与本地系互通婚媾,至孙父达成(字道川)时,已是本地化了。孙母杨氏,及原妻卢氏,皆为曾经缠足的本地系人,孙公的姊(适杨)妹(已故),亦曾缠足,孙公父子,尚能客语,但他姊妹,和母妻,则已只操本地系白话了。翠亨村距石门坑凡四里,周围凡二十四村,就中除翠亨及迳仔路村外,其余都是纯粹的客家村落,孙公上世,种种经历,及其与客人和本地人的关系,各村老年人,多少还知道一点。据他们说:"客人和本地人,到现在还是不很和睦,惟翠亨孙家,则自来主张互相联合,不肯排客。"② 这亦足征他家确是客家和本地二系互相混化的结果。经过了这次的调查,孙公的系属问题,可说已解决着了。

孙公是兼具着客家本地二系特长的伟人,我在评客人对那篇短文并曾说过:

"……夫孙公,不世出伟人也。其赋性之坚忍耐劳,冒险进取,其气量之恢宏广大,善能容人,其识见之高超卓逸,不拘末务,实足以代表广府客家二支汉族之优良族性,谓非广府客家实行同化之一种善果,不可得也。依不佞愚意,以为孙公人格,已超在客家广府之上,已非纯粹客人,亦非狭义本地,依实定名,似无庸复以客家或广府诸名目以区别之!……"

但此实是含有几分社会作用的言论,究之真际,孙公本人,虽

① 我另有翠亨乡调查报告书,将在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
② 见同上报告书。

非纯粹客人，其事功或不宜归于客家民系；然若依中国“子系从祖”的惯例言之，以其将孙公及其事功，给归其他民系，似乎不如于叙述客家民系时，权且给归并述，较为合理。质之通人，亦当没甚异议！

总理先族之故乡及世系之研究*

高良佐

总理先代之可考者，于中山县翠亨村之家谱，则为十四世祖殿朝公以下，至十七世祖达成公。自十四世祖以上，则必溯诸东莞县迁来之远祖。① 然以支脉繁颐，年代湮没，言人人殊，莫可究诘。于是关于迁中山县之始祖及年代，与夫世系递嬗之状，皆为述总理家世者亟待研究之问题。兹分列诸说如次：

一　五世祖迁香山十一世祖迁翠亨村说　邓慕韩先生之总理故乡调查纪要云："孙氏之先，居粤东莞县属长沙乡，至明代，其五世祖礼赞公，与妣莫氏迁于香山（现改中山）县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分居左步头。旋二人因赋税催迫，回东莞以避，卒以兵戈扰乱不能返香山新迁之处，只留后嗣以居焉。爰及十一世祖瑞英公于清代乾隆时再迁镇内翠亨村边之迳仔蓢，建有祖祠，然以人口稀微，老壮外出，乏人料理，故祠圮久矣"。

二　二世祖分居长沙乡六世祖始迁翠亨村说　长沙乡孙振业堂孙绳武先生等呈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云："来粤始祖讳常德号员沙，温靖公嫡孙也。（按温靖公即远祖允中）仕元为浙江杭州刺史。当元末陈寇之乱，迁居珠玑巷（按南雄珠玑巷，粤人北来者多曾寄居）与莞伯何真公相友善，真公并慕其品学，聘为西席，旋相偕来粤，至东莞员头山而家焉。当始祖来粤时，携子四人，长曰贵

---

* 据南京《建国月刊》第9卷第6期，1933年12月。

① 《总理故乡调查纪要》云：其始祖至四世祖，均无名号，须往东莞长沙乡再查。六世祖至九世祖则不能明了，须往涌口村再查。

荣公，次曰贵华公，三曰贵绍公，四贵武公。居员头山未几，次子贵华公乃分上沙乡，此即敝上沙乡始祖也。三子贵绍公，出居惠州三株竹，四子贵武出居肇庆。常德公偕长子贵荣公，则仍居员头山乡。既而常德公雅爱上沙乡风景清幽，故一届暮年，即常颐养于贵华公家内，寿终后，即卜葬于离乡八里许之土瓜山，俗名狮子滚球者是也。只以族小丁稀，强邻逼处始祖墓，近且豪强占用。致一抔之土，无力保存，使祖宗踞处于九京。嗟我子孙，苟生人世，言念及此，痛愧何如？查贵绍公贵武公分居后，子孙渐繁，或迁省地，或居别乡，辗转流存散处，各方往来渐稀，现则无可稽考矣。然自二世祖贵华公分居敝上沙乡后，传至五世祖礼赞公，生二子，长曰禘儿公号乐川，次曰禘宗公号乐南。乐川公又分居中山之左坡头村，乐南公则分居中山之东镇涌口，由涌口而支分翠坑，翠坑者即总理诞生之故乡也。”（按粤人常以翠坑与翠亨同写，当为字音相似故也；或翠坑原为俗名后转变为翠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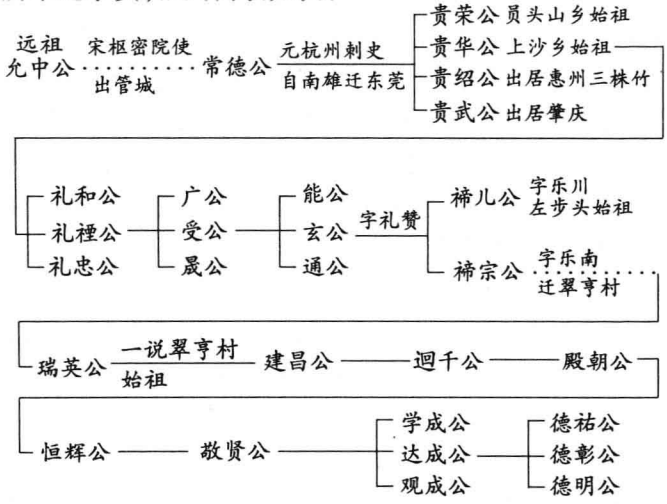
三　四世祖自员头山分支香山说　此说系代表员头山之孙洁生先生等之意见，孙先生呈西南执行部云：“分支香山者，乃员头山二世贵荣祖下之四世华祖，而非上沙贵华祖所分支，更非贵绍贵武所分支”。

上列三说第一说与第二说似相同而实异，第三说，则于二说外别立一帜，综核内容，要皆有待于精审之考证，固未可片言决也。

第一说与第二说均谓总理先族由员头山分支上沙乡，又由上沙乡迁至翠亨村，故员头山为远祖故乡，上沙乡乃总理嫡系始祖之地，此二说相同之点也。顾其分支及迁徙之时代，则一谓五世祖礼赞公已居香山，及十一世祖瑞英公于乾隆时再迁翠亨村。一谓五世祖以前至二世祖，均在上沙乡，至六世祖乃迁翠亨村，此二说相异之点而亦为吾人研究之主题也。

兹为研究之便利计，特依据孙振业堂所定之孙族分支系统表

及其所举之事实，汇列简表如次：



右表其历代祖先生卒之可考者，则自殿朝公始。按翠亨家谱所载，殿朝公生于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于乾隆癸丑年十月二十八日。今以之证第一说，其远祖分支迁徙之遗迹，非可于俄倾间得而考之，则惟求诸世系上之年代而已。

第一说之所据者，似为总理家谱序[①]其原文云："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村居住，建造祖祠。"是礼赞公为开族香山之始祖，及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始占籍

① 此序系孙绳武等呈中央党史会驻粤办事处之附件，尚有四修家谱序，上沙乡状况表，世系图等。并注此序谓："据云总理之父笔记。"

翠亨村。然乾隆甲午年即乾隆三十九年,适十四世祖殿朝公乾隆十年(乙丑)至五十八年(癸丑)之间,十一世祖至十四祖,中逾三世,决不同时;则上列世系之次序,必大可研究者也。如第二说禘宗公迁涌口无误,则自乾隆十年十四世殿朝公上推而数,以八世计,假定为二百四十年,则雍正十三年,康熙六十一年,顺治十八年,约九十余年,再上为明崇祯十六年,天启七年,万历四十八年,隆庆六年,嘉靖四十五年,约百余年,是禘宗公时代及迁翠亨村事,当在明嘉靖隆庆间也。自六世祖降至十一世祖,中有百四五十年之相间,孰为迁涌口始祖,亦大费索解矣。由是以证第一说及其所据之家谱序,如谓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迁翠亨村,则此瑞英公者,决非十一世祖,此其一也;如瑞英公确为十一世祖,则迁翠亨村决不在乾隆甲午年,此其二也。

大抵总理家谱序之所载,苟以上列世系表计之,或出于误记,如四修家谱序孙立宝,孙立国自称为十三世孙,时为道光十三年。然上列世系表,十三世为迥千公,是时当在康熙乾隆之间,道光时代,则已入十六十七世矣。此其推算之误,实与以瑞英公为十一世者无异。虽然,家谱载一姓之先代,录世系之源流,决非草率将事之文,则上述之误,所传总理家谱序非真品乎?不然则孙绳武先生所定之世系表不足凭也。①

第二说较详于第一说,然为第三说抨击之焦点。兹就其可研究者,分别述之:

一、第二说之由来,据孙绳武先生等所述,系邀集东莞县之员头山乡,上沙乡,暨分房中山县左坡头乡等之孙族代表,并搜求各

① 按此序原为孙绳武等所送来,但孙等所述总理远祖及世系,均未采序中所说,不悉何故?孙洁生谓:"孙绳武等所胪举之史实,全是东拉西杂而成,其首段缘起,即盗袭员头山乡族谱,其与中山衔接之一段,则抄自翠亨"。此语颇堪玩味。

乡族谱而决定之者，然其所列之孙族分支系统表，偏颇不全，似有未尽博考精审之能事者。如系统表以常德公为一世祖，至总理本身为十八世，而以礼赞公为五世祖，建昌公为十二世祖。自礼赞公传至禘宗公，则禘宗公为六世祖，由禘宗公传至十二世祖建昌公，则中有六世，而表中未列，必为遗漏。（故本文上表自禘宗至瑞英作虚点，示中断也）又家谱序有谓十一世祖瑞英公，而表中亦未列入，苟能于列表时，加以精详之考订，则于第一说之研究，必大有裨益，殊可惜也。又二世祖贵荣公以下，无一字述及，岂此系无后嗣，或未能详考。实则此系为员头山孙族之另支，其变迁发展之情状，皆足为研究总理先代故乡及世系之助，苟于此未能有精详可靠之记载，殊难使人轻信总理先代出自上沙之说，盖亦情理之常也。①

二、据东莞县县长邓庆史呈广东省政府文有云："禘儿字乐川迁往香山县左坡头村，禘宗字乐南迁往香市东镇涌口村。惟该支派图上，关于玄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今证以孙洁生先生之所述，上沙族谱，修自前代，禘宗分支香山，何不载诸谱中，必待后日增补？宗祠牌位又何仅及禘儿；禘儿禘宗，一分左坡头，一分涌口村，乃前者名载谍谱，位列宗祠，何后者事迹之多乖耶？又翠亨家谱序仅书礼赞，乐千，乐南，而孙绳武先生等所调查而决定之世系表，独于五世玄公标明别字礼赞，六世禘儿字乐川，禘宗字乐南，其与玄公同列之能公通公，何不同标别字；夫礼赞一世为支分

① 孙洁生谓上沙乡孙族家谱，本极简单，而于分香山之支独详，且为后日增添补缀者，此亦研究本题应注意之点也。又谓孙绳武前呈东莞县党部称常德公仅有二子，及呈中央党史会忽又有二子（即贵绍贵武），疑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实则此非本题之中心问题，可勿深究；然其列表时，如能略载此二支后裔之概况，当亦可为研究之资也。

香山之关键，乐川乐南又为再分左坳头与翠亨村之关键，而均未能示以详明之出处，徒足启人疑窦而已。[①] 而玄公之祖皆礼字行，玄之别号亦以礼字行，以孙避祖讳之例言，则礼赞是否即为玄公，非有详证，不足取信于人也。

以上二说，既皆有研究之余地，然则第三说固足取乎？则又未也。第三说谓分支香山者乃员头山二世贵荣祖下之四世华祖。此华祖者历证上述史料皆所未见，按诸世系表，四世祖为受、广、晟、未知所谓华者，为此三者以外同列之兄弟乎，抑三者中之某一别字乎？洁生先生对于第二说所举之事实，能为详明之指摘，独于其所举之最基本问题，则未加以说明，为可惜也。苟此说可信，则孙族支脉分化之状，将一反绳武先生之所述，如员头山乡贵荣以下之分支情形，应有详明之了解，乃能确认谁为总理嫡系之始祖，及始祖之故乡究在何地。此何等事，可凭一言而据为信史乎？

综上所述，可知关于总理先族故乡之传说不一者，实由史料本身之欠健全，又未经精详之调查与考证，故皆可逞以私见而自立其说也。且今就孙绳武先生等所述之史料以观，其本身亦未能通括详瞻者，如家谱序之所述既未加采入，亦未证其确否，此其一。所附四修家谱序，有云："余族谱系宗英公创始于雍正癸卯，祖乐川公，重始迁也，上及常德公，重溯源也。"又云："嘉庆辛酉英广公继其志重修之，迄今又三十三载矣。两公修谱具存，而近代生卒迁葬又不可无以纪念之也，爰命侄俊育，俊华，以宗英公始修之本为据，凡英广公所录有互异者，有加详者，附注其后，将以征信，亦以传疑也"。序中曰宗英，曰英广，曰俊育，俊华，皆未见所列之分支系统表，此其二。就

① 孙洁生谓上沙史料之必以玄祖书礼赞，欲与翠亨家谱相合而已，故谓为"取巧接续"。

二序以观，孙族家谱最后之修订，当为道光间事。[①] 四修谱序之义例，系存其旧观，而增以新材，则此谱必可寻求总理先代之渊源，与夫分支繁衍之情状，乃绳武先生等亦未系以说明，致其所述者与此二序，截然分为二事，此予研究工作上之困难实深且大也。

又王玉父（斧）先生所撰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谓十四十五世祖殿朝及恒辉之墓，均在离翠亨未远之长沙埔。总理胞姊杨夫人且谓迁住翠亨者实以十四祖始，（此系钟公任同志调查报告），玉父先生亦谓总理之故居，即为十四世居屋之旧址，则孙族之迁居翠亨，实为近代事。今上溯源流，穷究底蕴，所亟知者，一为东莞，员头山始祖是否分支上沙再迁香山？二为自上沙迁至香山又迁涌口翠亨者，究属何祖？以前者言，上沙宗祠神位何以独遗禘宗？乐南乐千事又未详载其谱。[②] 其他争讼无论矣。[③] 此先代故乡问题之所由来也。以后者言，家谱序以瑞英为十一世，且为迁翠亨始祖，与禘宗迁居说相距之时代甚远，则所列世系之次序，必大可研究者矣。若谓四世华祖为迁中山之始，则其世系演进之状，有待于详细之调查，尤殆无疑义。虽然，史之所贵，能以精确之事实载诸简端耳。有争论火车启行之时刻者，纷呶不已，苟共莅站头，索诸时刻表，则其争立决。吾人凭一二史料，综核比编，智力所及，本极有限，殊无异于离车站而争议启行之时刻，故欲求澈底明了总理先族之故乡及世系者，其惟再作进一步之实地调查与研究乎？

---

① 家谱序如确为达成笔记，其时当亦在道光年代也。

② 孙洁生谓上沙族谱未载乐南乐千及其子孙史略。

③ 上沙乡孙族宗祠仅见左步头分支送来木联二对，其一云："庙貌庆重新，想当年乐业安居，德绍江东传岭表；宗支同衍派，看此日源长流远，泽由莞水播香山"。其二云："萃子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妥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联中均谓自东莞分支香山，但翠亨孙族何以无一字表诸上沙宗祠？今疑上沙五世祖之分香山者，系在左步头，翠亨一系或非出自上沙，此亦一可能之推想也。

总理世系确由东莞上沙迁来之考证*

邓慕韩

余自十九年得阅总理家谱所载,谓翠亨孙族来自东莞长沙乡,旋问诸莞人,均不知有是乡者。乃函托东莞县政府及东莞县党部代查,由是遂有上沙员头山两乡争认翠亨孙姓为其乡所迁往之事发生。余乃与总理侄孙孙满函约上沙员头山孙族各将谱携来详查,惟两谱所载,均未翔实,然要点全在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迁来香山,长子乐千一派居左坡头,次子乐南一派始居涌口后迁翠亨一节。虽总理家谱五世祖以前阙而不详,然左坡头族谱,当有根据可查,乃决定前往左坡头孙族详细查明,时孙满愿任其事,后满因事未暇,旋又抱病休养庐山,故迁延久未实行。至二十三年元月廿三日,余往石岐会同总理侄孙孙乾(满之胞弟),直抵坡步头,晤其宗人,告以来意,旋将族谱神位细阅,谱中各序,已有虫蚀,原文不备,然世系图完全无阙,所祀神位,自来粤开族始祖常德至五世祖玄,及左坡头开村始祖乐千,与上沙族谱总理家谱大致相符,如是总理始迁祖乐南公确自东莞上沙迁来,殊非员头孙族所冒认也,爰将查得各点,叙列如下:

一、上沙员头山左坡头各谱均载始祖为常德公,则常德公为孙姓来粤开族始祖,确无疑义。

一、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长子乐千居左坡头,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蔺,再迁翠亨,查核与左坡

---

* 据南京《建国月刊》第10卷第3期,1934年3月。

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源。

一、总理家谱谓原居东莞长沙乡，而左埗头族谱则有东莞县沙头始祖图，东莞上沙始祖图，与上沙所称翠亨孙族由该乡迁去并非傅会。即员头山谱序，亦载贵华祖后迁沙头乡，则沙头为上沙无疑义。再查左埗头送与祠堂之木联，所称派衍东莞，尤为确凿可据，更非员头山所称四世华祖居大良，有子孙分支香山，如此空泛者可比。

一、上沙与员头山左埗头三族谱所载相差最甚者，厥为第二世。上沙谱载常德公生四子；长贵荣，次贵华，三贵绍，四贵武。员头山谱所载常德公生二子；长贵荣，次贵华。左埗头谱所载一图常德公生五子；长贤，次敬，三伦，四厚，五坚；又一图常德公生四子；长鹤湖，次子敬，三子厚，四子伦。观此名字既有不同，人数又复相差，长次亦相互异，究竟何者孰是？此则不敢妄断也。（据员头山谱家乘汇编稿序，孙族世系考，均称常德公来粤父子三人而已）。大抵族谱不符，或因传闻误载，或因虫蚀及脱漏，无所根据，事后追忆，以致互异，此为族谱常有之事。即如孙族始祖常德公由珠玑巷来东莞开族，各谱佥同，而员头山谱八世孙大儒所撰本家世系序，则云贵华祖由珠玑巷来，始择莞邑而家，此则来粤者非自常德，乃始自其子贵华，与各说独异，此其例也。

至中山县呈复谓员头乡孙族系由礼赞公分枝，当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查员头山孙姓，确于孙族来粤时已有，谓为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则可，谓为由礼赞公分枝则未免失实。又总理世系图载达成公生三子，次子十八世祖考德佑下十九传嗣孙威夷。查达成公次子名典，六岁而殁；德佑后来追字也。威夷固非德佑所出，又非孙氏血统，系德彰公在檀时抚养为子，数十年来，并未返国，不能附入系统。

中山先生之先世*

叶溯中

国父孙先生之生平轶事，散见报章者颇多，而其先世之籍系，则记述甚稀。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有关于总理先代原籍及世系全案文件之油印本，内载上沙乡孙振业堂孙绳武等呈文有云：

“来粤始祖，讳常德，号员沙，温靖公嫡孙也，仕元为浙江杭州刺史。当元末陈寇之乱，迁居珠玑巷，与莞伯公相友善，真公慕其品学，聘为西席；旋相偕来粤，至东莞员头山而家焉。当始祖来粤时，携子四人，长曰贵荣，次曰贵华，三曰贵绍，四曰贵武。居员头山未几，次子贵华公乃分居上沙乡，此即敝上沙乡始祖也。三子贵绍公出居惠州三株竹，四子贵武公出居肇庆，常德公偕长子贵荣公则仍居员头山乡。既而常德公雅爱上沙乡风景清幽，故一届暮年，即常颐养于贵华公家内，寿终后，即卜葬于离乡八里许之土瓜山，俗名狮子滚球是也。只以族小丁稀，强邻逼处始祖墓，近且豪强占用，致一抔之土，无力保存，使祖宗踞处于九京。磋我子孙，苟生人世，言念及此，痛愧何如？查贵绍公贵武公分居后，子孙渐繁，或迁省地，或居别乡，辗转流存散处，现则无可稽考矣。然自二世祖贵华公分居敝上沙乡后，传至五世祖礼赞公，生二子，长曰禘儿公，号乐川，此曰禘宗公，号乐南。乐川公又分居中山之左坡头村；乐南公分居中山之东镇涌口，由涌口而支分翠坑。翠坑者，即总理之诞生故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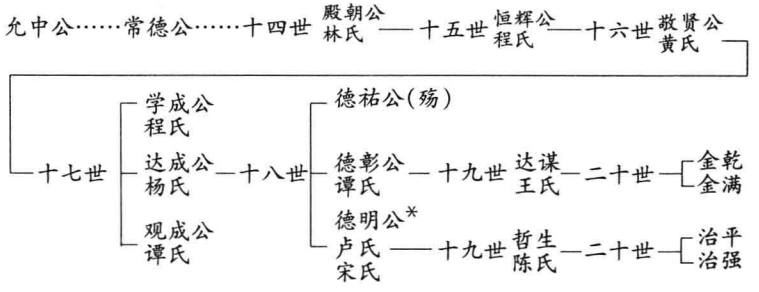
---

* 据杭州《越风》2卷1期，1937年1月。

由此可知员沙公迁粤之前，与杭州曾有一段因缘，斯亦浙省革命轶闻中之佳话也。惟员沙公游宦杭州曾几何时，治绩如何，余以手头无书，甚望浙省同志能于方志中检寻之。又孙氏先世迁居中山县之先，曾卜居东莞，而肇始则来自南雄。珠玑巷为南雄里坊名，粤人北来者多曾寄居。员沙公仕浙后，孙氏昭穆支派如有留浙者，则浙中当亦不乏谱系私乘可供稽考。至孙绳武等呈文中所言之温靖公，按即孙允中，宋枢密院使，出营城。又高良佐总理先族及世系之研究载上沙乡孙族宗祠联云："庙貌庆重新，想当年乐业安居，德绍江东传岭表；宗支同衍派，看此日源长流远，泽由莞水播香山"。所言"德绍江东"，如有所本，则富阳孙氏，当可籍谱乘以追溯大潢远祖世系递嬗与支派繁颐之状也。

自员沙公迁粤之后，分支情状如何，总理出自何系，则尚亦未有定论。依孙绳武等呈文所言，系出自员沙公次子贵华公。但员头山孙洁生等呈西南执行部则谓："分支香山者，乃员头山二世贵荣祖下之四世华祖，而非上沙贵华祖所分支，更非贵绍贵武所分支。"是则总理之嫡系先世，出自员沙公之长子或仲子，实为纷岐待证之二说。又，邓慕韩总理故乡调查纪要云："孙氏之先，居粤东莞县属长沙乡，至明代，其五世祖礼赞公与妣莫氏迁于香山（现改名中山县）。县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分居左步头。旋二人因赋税催迫，回东莞以避，卒以兵戈扰乱，不能返香山新迁之处，只留后嗣以居焉。爰及十一世祖瑞英公，于清代乾隆时再迁镇内翠亨村边之迳仔朗，建有祖祠。然以人口稀微，老壮外出，乏人料理，故祠圮久矣"。此说虽亦谓总理先族由员头山分支上沙乡，又由上沙乡迁至翠亨村，与孙绳武等所言相同，然于迁居之世代，则仍相岐异也。就中央现时已有之史料加以勾稽，其精确可征者，亦仅能以翠亨村家谱为据，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至十四

世祖以上，则即涉及东莞迁居肇始问题，诸说纷芸，莫衷一是。兹依阙疑之旨，列其世系简表如左：



＊中山先生字德明

孙先生之父，讳观林，字达成，别号道川。幼时，曾赴澳门为裁缝学徒。后仍返翠亨乡。据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所载，孙先生之四姊妙西（适同邑隔田乡杨公宪华之第三子孑辉先生为妻）言：达成公三十岁娶杨氏，四十三岁育长子德彰，四十七岁育长女金星，金星生四龄而夭。后又诞生次子德祐，即仅六龄即殇。五十一岁举次女妙西，五十四岁而中山先生降生。六十三岁时，又生三女秋绮，秋绮享年四十二岁。达成公四十岁以前为工人，曾在澳门作鞋匠。后返里从事耕种，兼事牧畜，田园不过三亩，益以种菜豢豕等副产之收入，家计亦勉可应付。又载杨子刚（杨鹤龄先生之弟）言达成公面修而颧高，两目睇人炯炯有神，眉发甚长，御粗布服，有时足登屐，时在门前榕树下石凳憩坐，吸旱烟，状若沉思。尝为乡友讲述故事。待友朋甚诚挚，家虽不丰，曾养其友某君至十八年之久。又据美人林百克孙逸仙传记载：达成公与其妻杨氏，终身相爱，家庭间怡然和乐。学成公及观成公（总理之叔父）赴美后，久不得讯，旋仅悉一卒于上海，一卒于加州金矿区而已。达成公因迎

养程氏谭氏于其家。而杨氏更因妯娌之早寡，弥相敬睦。

凡上所述，系就现有史料加以撮述，其概要亦仅此些须耳。想国人当亦群望中央再有详尽之调查与征集，使国父记传之开篇，得能信而有征也。

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考*

罗香林

一

国父孙公中山辞世十三年矣，虽其主义之行，如日月经天，照耀寰宇，而其家世源流，则尚鲜人为之探述。数年前，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尝编印孙总理年谱初稿，余曾于外舅海盐朱先生家见之，盖为邵元冲先生所赠送者。仓卒一阅，觉其于孙公及党人之革命经过，诚多翔实可佩之记述，然于孙公上世源流，则但明示须慎为理董，而不遽为澈底探究。近日叶溯中先生于越风二卷一期发表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大致亦根据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制关于总理先代原籍及世系全案文件之油印本，除列孙公世系与上述谱稿略同外，曾提及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总理世系由其乡迁出各情词，源委颇备，并曾明示此问题之重要，斯则尤足令人闻风而兴起者也。

余不揣浅陋，于民国二十二年秋，以调查南方民族之便，曾亲至中山县（昔为香山县）翠亨乡瞻仰孙公故居，谒见孙公胞姊妙西，即世所称为老姑太者，及故居管理委员陆华禧先生。[①] 得见孙公家藏孙氏列祖生没纪念簿，并探悉孙公上世逸事，颇有为外间所未

---

* 据广州《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1938年2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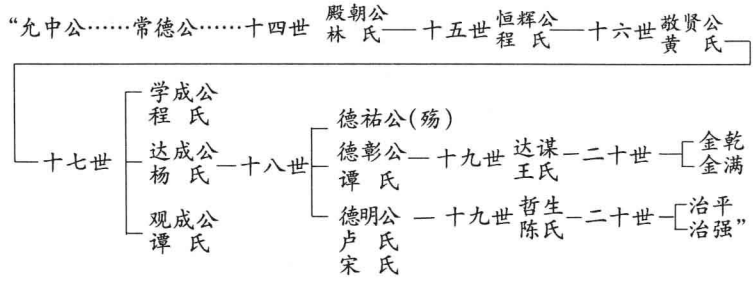
① 陆华禧先生即革命先烈陆皓东之胞弟，余至总理故乡调查，蒙陆先生报告革命史实甚多，并曾出示陆氏家谱旧抄本，兹限于篇幅，不及悉书，容当写一总理故乡瞻谒杂记，俾与此文相辅而行。

道者。比翻检中国国民党前西南执行部所刊西南党务月刊，觉其所载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总理迁出源流一案文件，全文不无自相抵牾或矛盾之处，证以余向所闻，亦多彼此相出入者，爰略加比次，籍明此问题之仍待继续研究。章实斋云："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余愚昧无似，何敢以文辞自饰。然学术乃天下公器，要不敢徇私自蔽焉。

谨接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制关于总理世系全案文件之油印本与西南党务月刊所载总理上世迁出源流一案文件，当属同一内容之物，盖皆为西南执行部所汇集者。就此类文件及叶先生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综合分析，其所录事例，凡可六端：一为翠亨孙氏族谱其精确可征者究能溯至何代之问题，二为总理父祖子侄家人名字行实之问题，三为翠亨孙氏与左坡头孙氏是否同出一源之问题，四为翠亨孙氏是否源出东莞上沙之问题，五为总理上世入粤始祖是否为常德公之问题，六为总理上世果出于何地之问题，兹谨分别论之；然此亦纯属试探性质，商榷而考定之，则非末学如余所遽能为力矣！维高明教之！

二

叶先生中山先生之先世尝列孙公世系简表



且谓:“就中央现时已有之史料加以勾稽,其精确可征者,亦仅能以翠亨村家谱为据,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至十四世祖以上,即涉及东莞迁居肇始问题,诸说纷芸,莫衷一是。”今按翠亨乡孙公故居所藏抄本孙氏列祖生没纪念簿,实溯至十二世祖连昌公,且于各代祖考妣,生卒年月日,皆记述详明,足知孙公家世略况。其文云:

“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十三世祖考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

十四世祖考殿朝,生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寿四十九岁,妣林氏,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生,嘉庆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寿二十岁。

十五世祖考恒辉,生乾隆丁亥年九月十四日,卒嘉庆辛酉年正月初九日,寿三十五岁,妣程氏,生乾隆丙戌年九月二十日,卒嘉庆辛巳年六月三十日。

十六世祖考敬贤,生乾隆戊申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道光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寿六十二岁。妣黄氏,生乾隆壬子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同治己巳年九月初五日,寿七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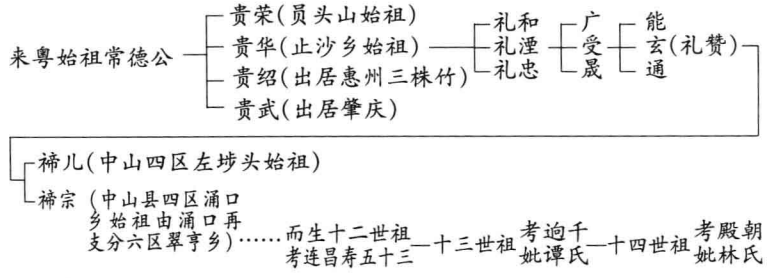
十七世祖考达成,号道川,敬贤公长子,生嘉庆癸酉年九月初三日丑时,卒光绪戊子年二月十二日戌时,寿七十六岁。妣杨氏,生戊子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亥时,卒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十三日午时,寿八十三岁。

十七世祖考学成,敬贤公次子,生道光丙戌年二月初三日,卒同治甲子年八月十八日,寿三十七岁。妣程氏,生道光丙申年六月十四日,卒壬子年民国元年十月初六日,寿七十七岁。

十七世祖考观成，敬贤公三子，生道光辛卯年四月初七日，卒同治丁卯年八月初八日，寿三十七岁，妣谭氏出嫁。”

谨按孙氏列祖生没纪念簿当即翠亨孙氏族谱即世所谓总理家谱或翠亨家谱之简谱，或摘录。逌千生年为康熙四十年辛巳，卒年为乾隆十七年壬申，享年五十二岁，则其父连昌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年以后，以历表考之，必为雍正六年戊申，其生年必在康熙四十年辛巳以前，以历表考之，必为康熙八年巳酉，享寿六十岁，是孙公家藏纪念簿自康熙初叶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已有年数可考，叶先生谓“仅能以翠亨家谱”为“精确可征者”其说是也，然谓其谱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止，则未谛焉。

孙公家世其精确可征者，能推溯至十二世祖连昌公，信如上所述矣，而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一案第八段总理世系图，于十二世连昌以上则竟冠以自常德公以下六代世系：



谨按连昌为翠亨孙氏之第十二世祖，据上述纪念簿所记，当自可信，而此图自常德至禘宗禘儿，不过六代，禘儿父礼赞，为第五代，距十二世祖连昌，其间实缺第七至，十一五世，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可知矣，既非直接本生，则该图自十一世以上是否与总理世系有关，亦兹可疑。要之，谓总理上世源流仅能溯至

十四世祖殿朝公而止，固有未谛，而不加思考，遽谓能推溯至入粤始祖常德公，究亦仍可商也。

三

叶先生中山先生之先世又云：

“孙先生之父讳观林，字达成别号道川。幼时，曾赴澳门为裁缝学徒，后仍返翠亨乡。据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所载，孙先生之四姊妙西（适同邑隔山乡杨公宪华之第三子子辉先生为妻）言：达成公三十岁娶杨氏，四十三岁育长子德彰，四十七岁育长女金星，金星生四龄而夭。后又诞生次子德祐，即仅六岁即殇。五十一岁举次女妙西，五十四岁而中山先生降生。六十三岁时，又生三女绮秋，绮秋享年四十二岁。达成公四十岁以前为工人，曾在澳门作鞋匠。后返里从事耕种，兼事畜牧。田园不过三亩，益以种菜豢豕等副产之收入，家计亦勉可应付。又载杨子刚（杨鹤龄先生之弟）言：达成公面修而颧高，两目睇人炯炯有神，眉发甚长，御粗布服，有时足登屐，时在门前榕树下石凳憩坐，吸旱烟，状若沉思，常为乡友讲述故事。待友朋甚诚挚，家虽不丰，曾养其友某君至十八年之久。又据美人林百克孙逸仙传记载：达成公与其妻杨氏，终身相爱，家庭怡然和乐。学成公及观成公（总理之叔父）赴美后，久不得讯，旅仅悉一卒于上海，一卒于加州金矿区而已。达成公因迎养程氏谭氏于其家，而杨氏更因妯娌之早寡，弥相敬睦。”

谨按总理先世，本为耕读人家，惟有清一代，无应举觅官者。据余昔年亲聆总理胞姊妙西述其家世情况，谓：“祖公敬贤公，以耕读起家，甚有钱。后以醉心风水，屡事坟工，所费不赀，变卖田地，入不敷出，家资遂耗。至父亲达成公，亦好风水，终年养一自嘉应

州来之风水先生。各祖先坟地，皆父亲所寻得改葬，祖父之坟，地师谓葬后十二年必出伟人，咸丰四年安葬，至同治五年总理诞生，相去果仅十三年也。初时父亲家尚小康，以迷信风水，遂致贫苦日甚，不得已乃至澳门，就业于外国鞋铺，每月工资仅四圆耳。如是数年，始复返里。三十三岁与母亲隔田杨氏结婚，其时母亲才十八岁。父亲四十一岁生大老寿屏，四十四岁生大姊金星，金星生四岁而死。四十七岁生二老德祐，德祐生六岁而死，五十一岁生妙西，五十四岁生总理，又五年生妹绮秋。”按此所云总理兄弟姊妹诞生年代，与王斧所记，略有出入。勘以孙氏列祖生没纪念薄所记，则二者皆不无微误。纪念簿所记云：

“十八世祖考德彰公，达成公长子，生咸丰甲寅年十月十七日卯时，卒民国三年甲寅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时，寿六十一岁。

十八世祖考德祐，达成公二子，生咸丰庚申年九月廿五日，卒同治乙丑年十二月初一日，年六岁。

十八世祖考德明，（即总理孙公），生同治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寅时，卒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巳时，寿六十岁。

十九世祖考字建谋，生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未时。卒民国六年十月初六日申时，年三十七岁。妣王氏，生光绪十四年七月廿三日丑时，卒民国四年二月初六日寅时，年二十八岁。

十九世姑娌，生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五日，戌时，卒民国二年五月廿二日，阳历六月二十六号，年二十岁。

考达成公生于嘉庆癸酉年，即嘉庆十八年，德彰即寿屏，生于咸丰甲寅年，即咸丰四年，由此上推至嘉庆十八年，得四十二年，是达成公四十二岁始生长子德彰。又德祐生于咸丰庚申年，即咸丰十年，时达成公既四十九岁，总理胞姊谓达成公年四十七生二老德祐，谅亦误臆所致。

又纪念簿载十八世祖德明，即总理别名。据总理胞姊所述，总理小名帝象，初名文，后字逸仙，复号中山，而德明则为兄弟排行之名。其胞兄德彰，则初名眉，字寿屏。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所附总理世系图，载十八世德祐，传十九世嗣子威夷，十九世建谋，传子二十世金满金乾，十八世总理传十九世哲生，即今立法院孙院长，孙院长传子二十世志平，志强，皆翔实可信。惟另据该刊第二十六期所附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致西南执行部函，则谓："达成公次子名典，六岁而没，德祐后来追字也。威夷固非德祐所出，又非孙氏血统，系德彰公在檀时，抚养为子，数十年来并未返国，不能附入系统。"按威夷非孙氏血统，人所共知，然抱抚养子，以承兄弟宗祧，亦粤俗所常有也。

总理少负天纵之资，然其学业与人格之基础建立，则颇受伊父达成公及伊兄寿屏之影响，而幼年教育与伊母杨氏之督责关系尤巨。据总理胞姊所述："达成公，为人最和平忠厚，且公正廉明，故为村人所敬仰。惟以家业甚稀，故尝终岁勤劳，略不得息，及寿屏渐长，能帮助操作，家计始渐纾裕，寿屏仅读书四年，年十八，即赴檀香山经商，二十五岁返里，与谭氏结婚，翌年即携总理赴檀，时总理年才十四龄也。总理少至聪颖，惟以达成公家计不丰，故至十岁始令入乡塾读书。塾师为台山某氏，嗜鸦片，瘾至僵卧如死人，一日为总理所见，以为业已死去，遽于头脚侧点灯，为塾师所觉，然亦未深责也。塾师教读颇严，所授为四书等经，又善看相，常于达成公前盛道总理非常儿可比，谓此子养至成年，能为非常事业，小事不屑做，做亦必不成。总理小时即喜为人打仗，见群儿被人欺凌，则大抱不平，必奋勇与打，即打不赢，亦不少退。村童衣裳，每为扯破，母亲必代为补好，并严责总理。总理自小反对赌博，十三岁时，值群儿集祠堂为牌九之戏，其中有杨帝卓者，年十七矣，总理拉其

辫子，劝其勿赌，帝卓以拉辫必败赌运，深致不满，俄而大败，遂擒住总理，拉辫子以头击壁，至剧痛绝气，不省人事，后众人以药涂之，一时许始苏，母亲乃携之回家。母亲教子甚严，遇总理与他家儿童无理殴打，必唤返鞭责，是番以曲在帝卓，故未被责。总理自小任事勤敏，自塾回家，必帮助农作，如打禾之类，皆所擅长。又善泅水，入水如蛙，村中儿童皆不能及，十四岁赴檀香山，读洋书，习英文，越二年入耶稣教，以破坏神像，为寿屏所不满，又二年寿屏遂命之返国读书，盖欲其多习中国之伦常道理也。总理既归，乃肄业于香港医学校，毕业后于澳门行医，并从事革命运动，盖其自小志壮，举动皆炯异常人焉。”总理胞姊与总理，手足之情至笃，所言总理幼年行谊，当自可信。惟另据胡根天君中山港名胜漫谈：则谓总理“十八岁又回香港读唐书，不到一年又到檀香山去了。二十岁却又回来，这年便结了婚。结婚之后，他还到过各省去游历，才又回来香港读书，不久便进了香港医学校以至毕业。”其实总理自檀岛回后，先在广州博济医学校肄业，非即在香港读书，[①]总理胞姊与胡根天君或间有误记也。

总理胞姊少适隔田杨氏，二十余岁即不幸守寡，有过继子一，孙子三，生活费今由中山县政府供给，盖以其为总理至亲也。总理夫人卢氏，同县恭都外茔村人，结婚时才十九岁也。今居澳门荷兰园，既年七十一矣。总理之父达成公，卒于宣统二年，葬翠亨村北高山之麓，余尝亲至其处，其墓石署云：“显十七世祖考达成孙公之墓。本山坐庚向申兼酉卯之原，民国十五年秋吉旦立石。石面左右镌：效灵现五桂，耀彩应三台。”对联何所取义，未深悉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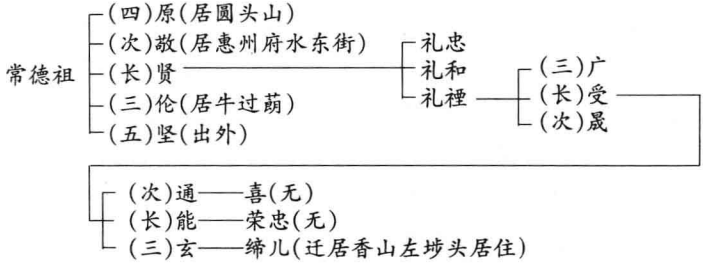
① 见吴敬恒编《总理年谱》及康德黎(Dr, James CantLie)著·郑启中等译：《孙逸仙与新中国》(*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四

西南党务月刊第二十六期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谓：

“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长子乐千居左坡头，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蓢，再迁翠亨。查核与左坡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原。”

谨按香山左坡头孙族原自东莞迁出，其说良是；然谓总理上世与左坡头孙族同出一源，则容有可讨论者。同上党务月刊同期，载左坡头孙氏族谱世系图有东莞县沙头村始祖图：



又同图或偏祠神位及正祠神位次序云：

“始祖常德，二世祖贤，号鹤湖，三世祖礼禋，号耿明，四世祖受，五世祖玄。正祠神位：皇明恩荣宠锡始祖字缔儿，号乐川。”

是左坡头孙氏以缔儿号乐川为始迁祖，而缔儿上世又自东莞沙头乡迁出，其系统固极分明；然此似与总理上世非同出一源。同上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所载总理世系图，虽亦称其始迁祖禘宗与兄禘儿，同为玄公字礼赞之子，然禘儿之禘不作缔而作禘，其别号不作乐千而作乐川，而左坡头孙氏族谱世系图又无禘宗其人，苟禘宗

与缔儿为同自东莞迁居香山之兄弟，即不祀于祖祠，亦当列之于谱，今竟阙而不书，则其不相连接，亦可知矣。又同刊同期载孙总理家谱序，谓；“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大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浦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次子因马贼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细考其意，乐千乐南当日似未曾以子孙寄居涌口等地，而接邻翠亨村之迳仔蓢孙氏，则为乾隆间乐南或其兄弟之子孙所谓十一世瑞英公者始复自外地迁来。所谓号乐南之缔宗公，当与迳仔蓢孙氏关系较深，与今日翠亨孙氏或关系较浅。考总理十二世祖连昌公上文既考定其生年为康熙八年，卒年为雍正六年，而瑞英于乾隆甲午年即乾隆三十九年始自外地迁入迳仔蓢，世数早于连昌，而年代远在连昌之后，则连昌与瑞英无直接之传代关系亦可知矣。邓慕韩所谓“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蓢，再迁翠亨，”诸语。其说虽表面无甚关系，然究之实际，则仍未谛焉。

且即谓所谓别号乐南之禘宗为与翠亨孙氏有直接之传代关系矣，而其人亦未必即迁自东莞。上述党务月刊同期曾载东莞县长邓庆史关于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原呈谓：

“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缔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

是乐南之是否出于上沙，亦滋可疑也。禘宗禘儿或缔儿虽名字与别号似为排行兄弟，然一则系统分明，一则既不见于左坡头世系图，而见于东莞上沙孙氏族谱者，又似为晚近所加入，则其不无

可疑更可知矣。

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曾载总理家谱四修谱序,谓:"余族谱系自英宗公创始于雍正癸卯,祖乐川公,重始迁也。上及常德公,溯重源也。"玩其语意,当即为自左坡头孙氏族谱所录出之序文,非翠亨孙氏所自撰,故其所述祖先名字,亦无一与总理自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有关系者。又同期所载总理家谱序,虽于题下注云:"据云总理之父笔记,"然究之该序实为混合二段史实之物,其一为关于乐千乐南复回东莞至十一世祖瑞英始迁居迳仔蓢之事实,已如上文所引。其二为总理之父迁葬其祖先坟墓之事实,其文云:

"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故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坑村犁头尖土名竹高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途遥远,来往艰辛之故,是以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

该序文将此段史实录于十一世祖瑞英迁居迳仔蓢一事实之上,实无相联关系,盖迁葬祖墓为总理父祖之直接史事,而瑞英公迁居迳仔蓢一事,当为录自迳仔蓢孙氏家谱或根据其他传说而记录之复制文字也。由所谓总理族谱之转抄左坡头孙氏族谱,或迳仔蓢孙谱与其他传说观之,其所记录自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上,由不相衔接之禘宗公以至始祖常德公,似皆为迳自别谱抄入,而未尝为澈底之探求者,故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亦谓"总理家谱自五世祖以前,未有记载",其不能遽信为即与左坡头或东莞上沙各孙氏同源,正亦在此。余颇疑总理上世实自十二世祖连昌公始自外地移入香山涌口门村,人以其地先有孙氏居留,而遗留由乐千乐南立石之莫氏母坟墓,遂以为所谓乐南者与总理上世有传代关系,不知年代与世数,皆不衔接,虽欲混而为一,不可得也。

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虽既明言"总理家谱五世祖,以

前未有记载,"然以"上沙员头山左坡头各谱均载始祖为常德公,"故寻而遂谓"常德公为孙姓来粤开族始祖,确无疑义。"叶先生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亦谓常德公为总理始祖,且以尝根据孙绳武等呈文,并谓常德公在元为杭州刺史,与杭州有一段因缘。[①] 今按总理先世既未必与左坡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业如上文所述,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坡头或上沙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能以片言判定。考广东各地孙氏多自外省迁入,其源流别,不一而足。例如香山小榄孙氏即不与常德公子孙同派,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爰及有明,三卫兵移居小榄,永奇与弟永源,同隶后卫陈宪旗下,遂家焉,分三房,现历二十四代,丁口二百有奇。"明洪武初南海有翰林孙蒉,[②] 其先亦与常德源流不同。而东江上游各县孙氏,如永安中心坝孙氏,[③] 兴宁迳心官田等地孙氏,亦与常德公无涉,故谓常德公为粤中孙氏一部分之入粤始祖则可,若谓"常德公为孙姓来粤开族始祖,"则容有少许语病也。

五

叶先生中山先生之先世,谓"孙氏先世迁居中山之先,曾卜居东莞。而肇始则来自南雄。"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则云:"总理家谱谓原居东莞长沙乡,而左坡头族谱则有东莞县沙头始祖

① 孙常德曾任杭州刺史事,史无明文,元制杭州称路,领县八州一,路有总管府,无刺史也。东莞上沙孙氏谱所称常德仕元为杭州刺史,当非实官,或时代有误亦未可知。

② 见南园前后五子诗集孙蒉传。

③ 见希山丛著山庐文抄卷三孙碧湾先生寿序。

图,东莞沙上始祖图,与上沙所称翠亨孙族由该乡迁出,并非附会。"今按邓氏所谓"总理家谱谓原居东莞长沙乡"者,实据上文所述总理家谱序第二段记载瑞英公迁居迳仔蔴一事实而言。所谓源出东莞,乃迳仔蔴孙氏源出东莞,未得据此片段资料遂谓总理上世居地亦可连带证明也。考美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孙逸仙传记(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fsnblic)谓孙公自述其家祖祠原在东江之 Kung Kun,迁居香山才数代耳。林氏追随总理多年,所言当自可信。兹就其所言东江一词考之,总理上世居地,似亦不在东莞。何则,东莞为清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所谓南番东顺是也。其地虽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则以自惠州起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属地,东莞则不以东江称也,如总理上世居地确在东莞,则以东莞一名之易使人明晓即但称家庙在东莞足矣,何必复冠以东江一词耶?余昔年以 Kung Kun 为即东莞之误,[①] 自今思之,实有未谛。至上沙乡更在东莞南部滨海之地,冠以东江,更为不类。

惟 Kung Kun 究为何地译音?则在今日殊难有确当之考释,民国十五年开智书局出版汉译本孙逸仙传记,译作东江龚公。考东江属县各地,无龚公地名,Kung 字虽与"龚"字同音,而 Kun 则不与"公"同音,疑为译者信笔所成,非有实地可据。今按 Kung Kun 之 Kung 与广州音"公"字同音,而 Kun 则与"昆"字同音。粤中方言,凡以"K"为声母诸字,往往与以"H"为声母之字相混,如亨字有时读音如 Keng,有时又读音如 Hang,壳字有时读音如 Hok,有时又读音如 Kok,坑字有时读音如 Hang ,有时又读音如 Kun,Kung Kun 既为东江区域之属地,按其地望似即指永安县之公坑或

① 见拙著《客家研究导论》第八章。

公坑嶂而言，永安即今紫金县，公坑在永安东部琴江都，自公坑至其东北邻地中心坝，皆有孙氏居住，[①] 中心坝以东为长乐县，即今五华。永安与龙川县，盖即东江上游要地，恰与总理所述之东江相合，而公坑译作 Kung Kun，自方音言之，本可相通，是总理上世居地，或本在永安琴江都公坑嶂也。考永安明初为惠州府属归善河源长乐三县属地，隆庆间以土寇初平，析归善古名宽得二都，长乐琴江都，及河源蓝能为新县，锡名永安，[②] 是公坑一地与今五华县亦有相当关系。总理有女与五华戴恩赛先生结婚，此虽与上世源流不能谓即有若何关系，然即以偶然巧合言之，亦可谓或为总理家史中之一嘉话也。然此尚为假定之解释，一俟获得东江各孙氏家谱或其他可资印证之资料，自当再为讨论，并就其迁移经过而究其迁移动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兴宁罗香林初稿

① 见同上孙碧湾先生寿序及叶廷芳修永安县三志卷一沿革及卷五人物。永安孙族虽人数亦不甚多，然据本志所载，明时有孙修爵官山东典史，清乾隆中有岁贡孙谦，为乳源训导。

② 见同上永安县三志沿革。

国父的家世*

高良佐

翠亨村是国父孙先生诞生的圣地。这三个字太幽美了，当时满洲政府的官文书，也称翠微村，广东人也有叫作翠坑村的。

当国父诞生时，孙家住在这小小的村庄，只有七十年到八十年的光景。在这时期以前，孙家的祖代，因为受了赋税的逼迫，战争的纷乱，不断的迁徙。他们从远代的常德公在广东南雄珠玑巷立下了家庭的基础，才开始做了广东人，那里向来是北人南来的寄居地，这时大约是远在元代。过了不久，常德公带了他的儿子迁到东莞县，这是孙族向广东中部迁徙的开始。到明代，孙先生的第十三世祖礼赞公，又从东莞县的长沙乡迁到现在的中山县（原名香山）东镇涌口村。礼赞公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位又分居在左埗头，但他们终于因为不能担负烦苛的田赋，仍然回到东莞县去。后来又因为战乱的发生，他们就没有再到香山来了。但从这时起，孙氏的子孙却已传播到香山。直到孙先生第四世祖殿朝公才从东镇迁到这小小的村庄来住，那时是在乾隆甲午年。算到孙先生诞生时，才有七八十年的光景。

孙先生的父亲达成公，讳观林，号道川，他是殿朝公的曾孙，是一个质朴正直的农民。在早年时，曾到澳门去做裁缝工，有时也充当鞋匠。当时澳门在葡萄牙人经营之不下，繁华旖旎，五花八门。达成公始终认定这是一个可怕的罗网，本着他纯粹的自重心，毅然的离开了

---

* 据重庆《新民报晚刊》，1942 年 11 月 12 日。

这淫靡娇惰的环境，回去享受那卑陋劳苦而淡泊的乡村生活。

达成公回到故乡以后，仍旧从事农田的操作有时也替人家缝纫，以补助农耕的不足。虽是仅有二三亩的田园，但种菜养猪是尽够的。他常说：无豕不成家，要造成一个家，是离不了要养猪的。总之，他是极满足他的农村生活的。他到三十三岁才和杨太夫人结婚。她是杨腾辉公的女儿，生长在离翠亨不远的隔田乡，是一位慈祥贤淑的夫人。她的下颔稍尖，眉清目秀。虽是老年时代，还是很健康的。她小达成公十五岁，这时才有十八岁。他们结婚了十年，才生下了孙先生的大哥德彰公，名眉，字寿屏。接连着又生了长女金星，次子德祐，名典，次女妙西。金星和德祐，都是幼年夭亡。孙先生诞生时，正当达成公五十四岁，杨太夫人三十九岁。孙先生的祖母黄太夫人也在，大约是七十四岁。

孙先生有两位叔父，一名学成公，曾到上海做工，在孙先生出世前二年，就在本乡死去了。一名观成公，是翠亨村里到美洲做工最先一批人中间的一个，但当孙中山出世后一年，他也死在异乡。

孙先生的故居，原来只有几间很狭陋的小屋，前面有广大的旷场，蓊茏的大榕树，和几棵老干纵横的古树，做了他们前门的屏障。曾经见过孙先生父亲的老辈说：达成公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常常在这大榕树下石凳上坐着，手拿旱烟袋，尽吸。他的脸庞长长地，两颧高高，双眼睇显有神。他的须眉长而且白。穿的是粗布衣裳，有时足登木屐。他总是有事在心似的沉思，有时也爱讲故事给他们听。他是终老在这狭陋的故屋里。直到孙先生二十七岁做了医生，才把赚来的钱，改造了现在的房子，七间轩敞的洋楼，围着矮小的砖墙。大榕树便依然保存在围墙之下。它是一座向西的房子，在全村一律向东的屋子中，是最显著而易于认识的。（摘录拙著国父传纪初稿之一节）

国父家世源流考*（选录）

罗香林

于右任题署：

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

右任（章）

张继题署：

国父家世源流考

张继署

蒋中正题署：

载德弈世

蒋中正（章）

孙科序

《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罗君香林所撰述也。罗君深治史学，探究国父家世源流，且十年矣。所阐发，皆明确。或有以谱乘世系，多侈言祖先华宠，不足深究而几研之者，是不知世系研究有其重要意义与严密法则也。

周官，小史，奠世系，辨昭穆。中土重视家世研究，由来久矣。此盖以纂述世系，辨识考妣，则于先人之盛衰消长，与其气宇魄力，皆可究其真际，明其传袭。而就其先人适以生存演进之美质，勉自奋励，为之发扬光大，则其为益于人群社会，必愈进愈增。而总集

* 据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12月版。

人民谱乘，为之归纳，则大之足以阐扬全民族气宇魄力刚柔强弱之由来，小之足为阐明优生遗传诸学之取证，与撰述人物专史之参稽也。社会组织，家族制度，虽因时渐改，弥进弥易；然生民之所由延续，要不离乎男女居室，种人之所由演进，要不离乎世代层累。昭穆之辨，世系之纪，虽形式有时而易，而其功能固历万世不悖也。则世系研究，顾可忽哉！

抑就人群学术思想与习俗性格之渊源探讨言之，世系研究，亦有不可忽者。盖家世素习，虽与生理传袭无关，然历代相承，足为生民教育之助，而每以影响生民性格，由生民性格，又以影响其人学术思想。故学术思想之探讨，溯本穷源，亦赖谱系研究。昔人纂修谱乘，虽未必尽述其族世传习俗，然必记其祖宗居址与婚配。就其祖宗居地与所婚配女系，证以其他资料，探其接触外缘，必能明其习俗，以究其性格所由构成之底蕴，更以其人性格，与其所历教育经验，寻其学术思想渊源，则虽未必命中，相去顾不远矣。而谱乘所述先人家风世德，亦有足使其子孙感发兴起者。故世系研究，小之可明一族一家存殁人物之性格与学术思考之始基，大之可为综合归纳，以寻求全民之思维传袭。其关系，不綦重耶！

世系研究之法，始于资料搜讨，而终于事迹阐扬。资料搜讨，虽为类繁赜，神而明之，无在而不资参考。然大要以家世谱乘，祠宇木主，墓志碑刻，家世口碑，国史方志，私家著述为主。家世谱乘，虽夸饰傅会，往往而有，然所述历代居址，与其迁移转徙之迹，及晚近世系昭穆，与人口消长，婚姻姓氏，固无伪也。善为考订，必能于其家世演进之真际，有所阐发。而祠宇木主，与谱牒相辅为用，可资互证。墓志碑刻，则于其人德业事功及当地观感有关，亦足资阐发。而家世口碑，则更以辅助文字记录所不足，民族意识，每赖之传递，故为学人所并重。而国史方志，则每并载先民世系资料，取用亦多。

私家著述,则于生民得失之经,每多穷源竟委之论,亦治世系源流之学者所不可废。特校考疏证,提要勾沉,为不易耳。

若就所获资料,以之阐扬与家世有关之事迹,则其方法之严,为证之广,更有不可忽者。如以所考定资料,撷其所载世次丁口与居地,及所婚配之姓氏里居,为之统计,以究其时间演进,空间播荡,则其盈虚消长之迹,必可尽明。如复以所考资料,就其历代迁移事迹,与其学术道艺,声闻志节,职业生计,为之综合分析,究其人文演进,精神传袭,环境影响,则其盛衰兴替之迹,亦可尽明。若复就其盈虚消长,盛衰兴替之迹,而更以分析比较,以明其因果关系,其为益且更溥也。此就世系已明晰者而言之也。至其几经兵燹,谱乘散佚,或转徙他乡,原籍扞隔,旧谱未见。则其研究之法,又当先为建立假设,旁征博引,寻求实证。或分别调查,以为阐发。其艰巨,抑又甚焉。此为世系研究之个别法则,若综合个别研究成果,而更为比证归纳,则全民族盈虚消长,盛衰兴替之所由所届,亦思过半矣。故谓世系研究无其学术功能者,直自愚耳,非知言也。

罗君此书,于资料搜讨,事迹阐发,皆惨淡经营,成之匪易,贡献实巨。盖即所谓世系研究有其明效大验之实证也。惟余尚欲有所言者,罗君所考,自国父上世入粤始祖以还,诚赅矣备矣,然自晚唐以至赵宋,其各代名讳事迹,与自赣迁闽经过,则第条列大体,未遑详述。斯固资料不备,有以致之,而闽赣之仍须调查,以别为一书,亦至明焉。抑国父以外,海内豪俊,相与追随效命,以助成革命建国大业者,其家世源流,亦须综为考述。以罗君之史学才识,而黾勉不辍,吾知其必继此更有述作也。

罗君以此书乞余点窜,余佩其勤笃,因略论世系研究之意义与方法如此。若其所已阐发,则此书俱在,不复赘焉。是为序。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孙科序。

邹鲁序

中华民国建立之十二年，总理鉴于时势演进，不能无最高学府，以研究三民主义，领导学术思想，培植青年学子，以使之为民族国家，拯衰起弊，效死不移，因命鲁就广东各专门学校，筹备广东大学。越明年正月，大学成立。总理在此时期，亲临演讲三民主义。又命鲁汇录本党史事，纂为专书。盖其昭示于革命建国之有赖于大学教育与三民主义学术研究者，至巨切也。其年冬，总理以判决时局，离粤北上，积年劳瘁，至是疾作。越年三月，于旧京谢世，寰宇震悼。而广东大学以纪念总理，爰正名曰中山大学。吾党同志，受总理精神感召，益奋励以赴。赖总裁引导，遂以统一中国。以三民主义为凡百庶政设施纲领。而中山大学，由是使命益重。

盖中国之所由恢张宏伟，虽地大民众，有以致之，而其能开创独立迈行之学术文化，以为人群社会增进无穷福祉，要为保世滋大之主因。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以科学研讨，与精神修养，为协和共进，以达成民族民权民生诸问题总解决之机枢。盖为汇合中国学术治化之精华，与世界最前进之科学研求，而为一交溶互透之开创主义，非墨守陈言，负贩时说为之也。中山大学受命于举世思想混淆，本党排难前进之际，有发扬三民主义，以领导世界学术思潮之专责。故其教学首要，贵以三民主义精神，渗透于一切学术研究，以一切渗透三民主义精神之学术研究，使深造而几极之，以为实践主义，发扬主义之依据，先之于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与强盛，终之于人世大同，生存共进。昔孔子谓“吾道一以贯之”，今日之学术研究，则以三民主义一贯之也。启发睿智，行健不息，拯中国，救世界，咸以此为指拨，使命之大，责任之巨，夫人而知焉。

惟是学术研究，首贵分工合作，而三民主义学术之阐扬，尤空前宏业，非少数人可得毕工，故中山大学亦以巨责重任，分属之全校教授学生，冀各以专门造诣，为阐发基础，使各尽所能并行不悖。鲁与继任诸校长，悉本此志，相继于大学设置各科研究所。而历史乃人类生存演进记录，为真理反映，智识府库，不可或忽，故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较先成立。而本党史事之阐发，足为三民主义创立由来与实施明效之印证，故其研究视他处为早。十八年，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成，虽自视怃然，顾无别书为替，遂以问世。又三年，鲁再任校长，以广东为革命策源地，乃于大学兼修广东通志。适兴宁罗君香林，以调查人种，自旧京南下，因聘之纂修志稿。而罗君由是数往总理故里，谓欲研究总理家世源流。鲁闻之喜甚，盖谓此为大学同人之责。又二年，罗君受聘讲授历史，英秀朗察，于民生史观，史学方法，阐发尤富。又数年，值抗倭军兴，大学迁移，文献浸佚，而罗君顾于其间治史学益笃。以勤于搜讨，遂于东江发现总理上世家谱旧本，覃研精思，益以其他资料，以所阐发，撰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于总理上世参与反清义举，与移殖经过，尤不厌详备。鲁阅之，益欣慰不置。以此为总理专传前纪，党史所不及详。既幸罗君于大学成书，克尽分工之责，又喜其必续有总理专传一巨著也。以罗君之勤笃，觇大学之风气，知全校教授学生，必有以达其使命者，前途开扩，可预期也。

惟是今日中国之学术研究，实有其于国际发扬之使命，而中山大学，尤当致意于此。盖三民主义，本以世界大同为几极，而致世界于大同，尤当先于学术思想为之推扩。曩者，万国大学会议，于德国海德堡举行，鲁代表出席，即依此提议改善教育哲学基础一案，略谓教育目的，在谋人类幸福。而现代教育哲学基础，因建立于物竞天择与阶级斗争两学说上。侵略家认侵略为其本责，教育家为侵略家

制造刽子手与屠刀，亦认为天经地义，于是教育愈发达，则刽子手愈多，科学愈昌明，则屠刀愈精，人类不惟无幸福可言，且将日趋消灭。补救之策，端在改造教育哲学基础，即以仁爱学说，代替物竞天择学说，以互助学说，代替阶级斗争学说，庶能铲除人类相残之恶习，确保人类生存之幸福，而渐致于世界大同。闻者动容。总理学术思想之国际发扬，与世界思潮之中国领导，含义至富。而历史研讨，为其一端，民生史观，尤足破西欧史学理则偏弊。罗君深明此义，诚能以在大学所阐发者，撰为专书，以宣扬于世，吾知承学之士，必恍然于历史演进之所由所届，以知世界大同，生存共进之果可循三民主义而历阶以至也。如此，则与总理家世研究与专传撰述，相得益彰。罗君其有意乎？吾知其必自知责无旁贷也。

罗君以国父家世源流考，乞鲁为序，鲁以其成书于中山大学，因念学校创立之经过，与使命之艰巨，有于罗君不无兴发者，故为之略弁其端。学术乃不朽盛业，况三民主义学术，更有无限开扩。以罗君之勤笃，若继此著述日富，教学日溥，则岂徒大学之幸，抑亦国家之幸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七日，邹鲁序于行都之陈家桥寓庐。

吴铁城序

国民以吾党总理，首立三民主义，创建中华民国，拯救民族，树立民权，厚裕民生，劳身苦思，以事邦国，至于弥留，犹叮咛嘱咐，勖以奋励之道。用使感召所及，贤良蔚起。实维总裁，以承以继，统一国家，万端经纬，指麾全民，对侵略国抗战。至于今遂巍然为世界正义人道独立自由平等之保障。万声唱和，崇德报功，因悉尊总理为国父，相与景行仰止，期之历万世不衰。而学者引述遗训，亦

悉云国父不以别称。自有中国以来，国民纪念元勋之尊号，未有如斯之深广也。

然吾则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尤当并致力于国父家世源流之研讨，不以名号之尊崇为已足也。盖数典忘祖，固为学者之污，而不知国父之源流所自，则其家世传袭，无自而明，而其伟大志业之植基所在，亦无由认识。往者余奉命出主粤政，常于暇日，二三人士，讨论世事，询以总理上世源流，多不省悉，即偶有摘取一二曾至总理故里巡礼所见以报告者，亦世次断续，事迹未具。尝以谓学者不欲尽其职责则已，不然，于总理家世源流之阐扬，有不可忽者。比政府已因国民群意，明令以国父尊事总理，则其家世研究，更与国家功令有关，为义盖弥重矣。粤人上世，多自中原南徙。国父原籍何地？于何时徙粤？其辗转迁移，必有与国史演变有关系者。信能搜集资料，为之穷讨极研，明其年代之传演，究其层累之遗袭，就其迁移之途程，究其感受之所发，则于国父伟大志业之由来，必有能更洞澈而使人兴起者，非徒足以阐扬国父家风世德已也。

然吾又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亦当并致力于国父毕生历史之研讨，不以克明其世端源流为已足也。盖国父立承先启后之伟志，为救国救世界之伟业，百折不挠，屈而愈厉，精神所感，气机所动，学说所被，昭乎日月，不足以拟其明，塞乎天地，不足以拟其广，自非有瑰玮光昌之史才，为之秉笔纂述，实不足副其巨伟。而环顾今日史家，其能就国父一生史实，网罗放佚，悉索旧文，汇为传记长编，以备国民参证者，尚无闻焉。其能就国父一生大仁大智大勇大德大业，与其日常起居言动，撰为专门传记，以备国民普遍讽诵者，更无闻焉。此则殆由史家谦逊未遑，有以致之。然学术乃天下公器，信能勤于搜讨，慎于考订，属辞命意，边追光玮，则大辂始于椎轮，华衮肇于粗服，必有能勒为巨制，以自见以世者。匪唯国父伟

绩，永垂不朽，而其书亦由是俱传也。

然吾复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更当并致力于国父学术思想之阐发，不以已明国父一生历史为已足也。盖国父之所由革命建国，皆以其所首创之三民主义为机枢，而三民主义之底蕴与运用，则以国父全部学术思想为理则。方今世界学术，已以反侵略战争之演进，证明其必以国父之学说与思想为指导原则。盖以西欧近世第重视科学研讨与技术训练，而忽于精神修养，与人世大同，生存共进，诸理想之认取。故其弊也，或流于德意倭等侵略国之穷兵黩武，挟科学与技术以戕贼民生，或流于其他国家之富而不仁，华而不实，智而无勇，终亦难为人类生存共进之引导。而国父之学说与思想，则以人世大同，生生不息，为其哲理体系，与最高鹄的，而其举科学研究，技术训练，与精神修养，人格扩展，为情理双溶，德智交进，品业共建之途径，又不致复蹈西欧近世畸形发展之覆辙；故其说如行也，匪特可使民族民权民生诸问题，根本解决，与民族民权民生诸共业，无穷建树，且可期之为人世立一永不致以戕贼民生之最优学术，其应为今日世界学术思潮之指导原则，无待论也。今国人为文以张三民主义之条贯者多矣，其能以国父全部学术思想之深究，阐扬其所以领导世界学术思潮之卓义者，则未多见。必如何覃研精思，以阐扬其极则与体系，以为世界学术垦辟新路，创进新业？斯则尤为学者之专责也。

抑吾复以为学者之纪念国父，益当并以实践国父所创立之三民主义，以效忠国家为几极，而不以已明国父学术思想之卓义克以领导世界思潮为已足也。盖国父以世界大同，生存共进为人类最高鹄的，故其革命运动，始之于中国之全民，终之以世界之人类，而其运用方式，则以民族自由，民权平等，民生乐遂，为机枢要领，人而不欲其民族国家之自由平等，不欲其国计民生之强实利乐，斯亦

已矣，不然，则于三民主义之躬行实践，有不可一日忽者；人而不欲世界跻于大同之境，人类安于生存共进之乡，则亦已矣，不然，则于三民主义之躬行实践，亦有不可一日忽者。际此强寇侵陵，肆无忌止，国土沦崩，生民涂炭，凡我国民，尤非实践三民主义，受政府驱策，竭其智能物力，不足以屏卫民族，维系民生。而学者之言动，尤为青年所表率。必如何以三民主义之昭示，为立业行事之准则？与专门学术研究之深造与心得，贡献于国家，以助成政府抗战建国之大业？则尤为学者之大任也。

兴宁罗香林同志，向治史学，熟于民族国家盛衰消长之理，而尤深于本党史乘，教授于国立中山大学，盖有年矣。顷以发现国父上世家谱旧本，爬罗抉究，益以历年所得资料，错综互证，以所阐发，撰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始晚唐孙诜，自河南陈留，以堵御黄巢变乱，迁江西宁都，越五传有承事公者，复迁福建长汀河田，至明永乐间，有讳友松公者，再迁广东紫金，是为国父上世入粤始祖，又十二传，有讳连昌公者，以连世参与反清义师，兵败流散，于康熙间自紫金迁居增城，旋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是为国父先世迁居中山县肇祖，又二传有讳殿朝公者，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是为国父高祖，盖自友松公至国父，已十八代焉。所考得之世系与事迹，皆明备为前此所未晓，其发现之多，可敬佩焉。罗同志乞序于余，余以其好学深思，忠贞奋发，尝谓其必有更为宏伟之贡献，故为略述学者纪念国父应有之职责归之，而并以商榷全国学者。倘亦全国学者与罗同志之所心会也夫。是为序。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吴铁城序。

陈立夫序

罗君香林，考国父家世源流既成书矣。征序于余，余观罗君之

意，殆非独远追周官小史已也；其亦缅怀休烈，不胜高山景行之思，用走访于故老，亲叩询于阙门耶；抑向往弥深，求之古今而罕可比俦，乃不得不推溯谱牒，索解答于先天之秉赋乎。余读罗君之书，而后知罗君之功力为不捐也。昔在周初，太王积德累世，而后诞生文武。自契至汤，自汤至于孔子，亦四十五世，而后金声玉振，集文教之大成；其源远，其流长，泽及于今，又七十余世。我总理继往古之贤圣，创万世之国基，兼孔子之德言，并汤武之事功，其所得于前人者至厚，盖不仅一姓一氏之祖宗已也。然而诩公则奋威烈于唐代矣，连昌公父子，则御外寇于明季矣，终清之二百又五十年，世以耕读相传，无一屈身辱志，然后我总理应运而生，亦云伟矣。罗君学有师承，精于勘核，其贡献所在，厥为通排翠亨忠坝之谱。至于琏昌连昌之别，当非融父伷宙之比。林氏公馆村之传闻，或已足资佐证。若夫补苴充美，固不妨俟诸他日。质之罗君，倘不以为谬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吴兴陈立夫。

国父家世源流图表

始祖考友松百三十三郎 妣骆孺人八十娘 友松公与弟友义公，于明永乐间自闽迁粤永安上镇约，即今紫金县忠坝，居住。生四子：长敬忠，次惠忠，三劝忠，四荣忠。	二世祖考敬忠公 妣 敬忠公分住忠坝上排祠堂，即今孙屋排。生二子：长永久，次永良。	三世祖考永良公 妣吴孺人 永良公生一子，怀文。	四世祖考怀文公 妣汤孺人 怀文公生一子，凤宗。

续表

五世祖考凤宗公 妣叶孺人 凤宗公生一子，明享。	六世祖考明享公 妣宋孺人 明享公生一子，仕伯。	七世祖考仕伯公 仕伯公生二子：长耀宗，次绍宗。	八世祖考绍宗公 妣古孺人，何孺人 绍宗公生一子，乃和。
九世祖考乃和公 妣林孺人 乃和公生一子，宗荣。	十世祖考宗荣公 妣叶孺人 宗荣公生三子：长鼎茂，次鼎标，三鼎山。	十一世祖考鼎标公 妣叶孺人 鼎标公生三子：长连盛，次连昌，三连桥。	十二世祖考连昌公 妣陈孺人 连昌公生康熙八年，卒雍正六年。于康熙中叶，迁居增城，继迁中山县涌口门村，开基立业。生子迥千。
十三世祖考迥千公 妣谭孺人 迥千公生康熙四十年，卒乾隆十七年。生一子，殿朝。	十四世祖考殿朝公 妣林孺人 殿朝公生乾隆十年，卒乾隆五十八年。于乾隆中叶，再迁翠亨村开基。生一子，恒辉。	十五世祖考恒辉公 妣程孺人 恒辉公生乾隆三十二年，卒嘉庆六年。生一子，敬贤。	十六世祖考敬贤公 妣黄孺人 敬贤公生乾隆五十三年，卒道光二十九年。生三子：长达成，次学成，三观成。
十七世祖考达成公 妣杨孺人 达成公生嘉庆十八年，卒光绪十四年。生三子：长德彰，名眉，字寿屏；次德祐；三德明，即国父，名文，字逸仙，号中山。	十八世祖考文公 夫人卢氏 夫人宋氏 国父生同治五年，卒民国十四年。卢夫人生子科，字哲生，即今立法院长。	十九世科 夫人陈氏 生子治平，治强。	二十世治平 治强

一 引 论

人类之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虽甚恃后天之启发与培植，然其长受启发与培植之质素，则为由历代演进与遗传所成之先天机能，故欲探究一代贤豪之所由兴起，而阐扬其造诣之基层与几极，则有赖乎关于其人家世源流之研讨。此谱牒世系之学，所由不可废也。

国父孙公中山，辞世十六年矣，虽其主义之行，如日月经天，照耀寰宇，然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所由发为绝学与殊才，而创建其主义与大业者，则尚鲜学人为之阐扬。此无他，以国父家世源流，尚多未及详考，援据不足，虽欲追记，无由为明确之表白也。

七八年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尝编印孙总理年谱长编初稿，[①] 余曾于外舅海盐朱逿先先生（希祖）家见之，仓卒一读，觉其于国父及党人之革命经过，诚多翔实可佩之记述，然于国父上世源流，则但明示须慎为理董，而未遑即为澈底之探究。稍后见叶溯中先生于越风二卷一期，发表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大致亦根据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制关于总理先代原籍及世系全案文件之油印本，除列国父世系与上述谱稿略同外，曾提述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总理世系由其乡迁出各情词，源委颇备。以知国父世系，实多未能即为明晰之点。而近年商务印

①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编印之总理年谱初稿，盖为故邵元冲先生为该会主任委员时所主编。关于国父事迹之按年叙录者，前有吴稚晖先生所作中山先生年系，及吴醒亚先生所编中山先生年谱，惟皆事属始创，文甚简略。而上海卿云公司所印孙文全集首集传记，除载吴稚晖先生所作年系外，复载徐民编及未署编者名氏之年表各一篇，亦过于简略。就已刊行之国父年谱而论，当以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编总理年谱较为具条统矣。惟该书今日已甚鲜流行。

书馆所出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于国父家世源流，尤矛盾抵牾，盖亦未尝为缜密考核也。

余浅陋无似，于国父世系问题，初不敢妄赞一词。惟幸于民国二十二年秋，以调查种姓之便，曾亲至中山县翠亨乡，瞻仰国父故居，[①] 得见国父胞姊妙西姑太太，及故居管理委员故陆华禧先生。获读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自十二世祖连昌公，以至十八世为国父孙公，各世名讳，与生卒年月，悉可稽识。并获悉国父上世逸事，颇有为外间所未道者。其后翻检中国国民党前西南执行部所刊西南党务月刊，见其所载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总理迁出源流一案文件，虽全文不无前后违异，然正足为相互校考之资。因略加比次，为作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一文，载余与友人黄凌霜先生（文山）所编更生评论二卷二期。首述一般关于国父家世源流凡所追记之讹误，继根据美人林百克（Paul Linbarger）孙逸仙传记（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所述孙氏家庙在东江公馆（Kung Kun）一事实，假定国父上世或自广东东江之紫金迁出。惟以未得东江各孙氏谱乘为佐证，仍以假设未得明验为憾也。

① 余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曾至总理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调查国父家世。由广州乘轮舟至澳门，转乘汽车赴翠亨，在距总理故居小洋房约二十步之中山县农事试验场，住宿三日。每日除访问翠亨村居民，及附近各村如石门坑，竹头园，迳仔蓢等村居民，并搜访文献外，即至总理故居，谒国父胞姊妙西，即中山县人士所称为老姑太者，请彼讲述国父家世源流，家庭景况，并幼年生活，亲戚景况等。同时访问故居管理委员陆华禧先生，即先烈陆皓东之胞弟。并抄录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没纪念簿，与陆氏家谱所载中山县陆氏源流，获得资料颇富，并于当地写成访问记一厚册，于老姑太及陆先生之赞助，有铭感而不能忘者。本拟专作总理故乡巡礼记一书，藉资纪念。以人事纷纭，久久未得排比缮定，仅将有关系各资料，与关于广东人种调查所得之资料，同置一箱，随身携带。会倭寇侵陵，肆无忌止，广州寓所，虑为所炸，乃将该箱移庋于番禺某乡。迄广州紧急，车辆缺乏，无法救运，遂与俱没，心血所聚，竟以无踪，惜哉！倘该资料仍能为国人所弋获，甚望能赐予寄回，岂惟余感谢无竟，抑于学术研究，不无小补也。

三数年来，每遇广东孙氏人士，辄为探求其上世源流，[①] 而于紫金一县，亦尝调查询问。[②] 赖天假机缘，适旧友李蔚春先生(蔚)，奉命出为紫金县长，因驰函查访。得彼协助，卒于紫金忠坝(俗称中心坝)，弋获与国父孙公上世有关之家谱旧抄本。[③] 其中所载十二世祖连昌公，名讳与年代，适与上述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同，而自连昌公以上，各世名讳，及其由中原南迁之情由，亦可循迹考求。勘以其他文籍，益知国父上世之辗转迁徙，实与当日时局转变有关。而国父之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之根源，亦可循是渐求认识。凡余昔日所作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假设各点，今皆得为印证。爰合前文所论，并理董而表白之，倘亦博雅君子所乐许欤？

抑余文质无底，于时贤所为关于国父孙公中山之家世追述，虽不能无所论列，然皆奉为前路引导，而深致敬意。盖以余之不才，其能有所阐述，皆由获遇特殊机缘，与得友人协助之所致，非谓所

---

① 余所访问之粤东各孙氏人士，多以口头述其家世源流，或出示有关系各文献。而官田孙汉基先生，幼承其尊人孙碧湾先生(天麒)之家学，所识特多。除抄示其家谱所载源流世系外，并详述关于粤东各地孙氏源流之问题与资料。今附此致谢。

② 余于紫金孙氏之源流及现况，自民国二十二年以后，即甚注意。尝以东返之便，亲往忠坝调查，并向国立中山大学紫金籍学生，询问一切。惟初无结果。二十七年复嘱中大助教紫金人郭文敬君，为致函紫金各界，详为调查，亦无所获，盖以紫金孙族，多僻居山地，访问实甚难也。直至友人李蔚春先生(蔚)为紫金县长，始得查出忠坝孙氏之现况，及其与国父上世之关系。又近据紫金人张君倬文语我，紫金尚义一带有孙族数千人，或亦与国父上世有同一源流之关系。按孙汉基先生所抄寄之兴宁孙氏族谱，谓兴宁开基之孙契全公，其子孙有迁居永安尚义约者，族裔甚繁。则今日紫金尚义孙氏，似仅与国父上世为同自唐代孙诜所传演，而其入粤始祖，则非同一人也。

③ 迄本年(民国三十年)八月一日，紫金县长李蔚春先生，至曲江出席广东省行政会议，始克将其所借得之忠坝孙氏族谱旧抄本携出相示，即为传抄一份。多年沉郁，至此为宣。而友人紫金忠坝温济琴先生，旋为余述忠坝地理情况，与有关之史迹，足以补充李先生所寄孙氏族谱旧抄本之不足，李先生与温先生之热心学术，至可敬佩，谨此致谢。

学无多，蒙昧如余，亦能自为创获也。

二　近人所述国父上世源出东莞说之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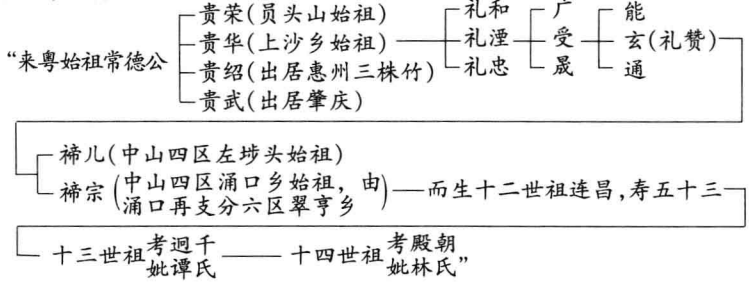
国父孙公中山，今举世莫不知其为广东中山县翠亨村人矣，其家未居翠亨以前，曾一度居中山县涌口门村，亦为世人所孰知矣。然而其族之宅处中山，仅数代已耳，原籍何地？尚待研考也。近人之追记国父家世源流者，每谓国父上世，实自东莞之员头山或上沙乡所迁出。此盖以国父上世曾一度居住之涌口门村与左坡头村相接，其后所迁处之翠亨，又与迳仔蓢村相接，而左坡头与迳仔蓢之孙氏，则为自东莞所迁出，以居地之相近，或以为即同出一源。而普通人士之所谓总理家谱者，又为混合中山县迳仔蓢左坡头二地孙氏源流与翠亨孙氏一部分传说而成之文籍。资料之条统既不明备，依之以绌绎之世系，自亦难符。如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

“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字允中，谥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真之聘，至广东东莞任西席，遂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华贵公[①]，分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华贵公生一子名玄，字礼赞，始迁香山县（今改称中山县）之东镇涌口村，此为孙氏居香山之始祖。礼赞公生两子，长缔宗，号乐千，次缔儿，号乐南。乐南公分居左坡头。后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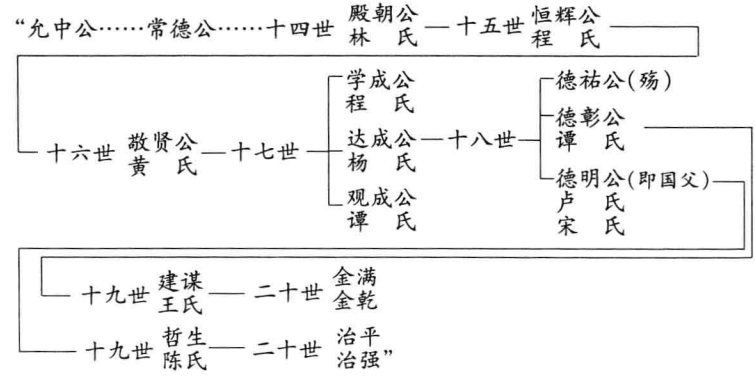
① 编者注：查胡著原文，常德公仲子为“贵华公”，并非“华贵公”，此系罗先生之误。

胜苛征暴敛，又返东莞，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谱所载，自常德公侨居东莞后，至中山先生之世为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令孙治平治强兄弟，适为二十代。”

而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一案，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亦作：



越风第二卷第一期，载叶溯中先生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列孙公世系简表，亦作：



并谓“就中央现时已有之史料加以句稽，其精确可征者，亦仅能于翠亨村家谱为据，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至十四世祖以上，即涉及东莞迁居肇始问题，诸说纷芸，莫衷一是。”又同上西南党务月刊第二十六期，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亦谓：

“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长子乐千居左坡头，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蔺，再迁翠亨。查核与左坡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原。”

又吴稚晖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会，演讲《总理与中国革命》[①] 亦谓：

“总理直系的老祖宗，是北宋时候南京一位名士做过宋朝枢密使的孙固，总理就是孙固的三十三代孙。在元朝末年，又有一个杭州的孙常德，曾做元末的刺史，他是孙固的十五代孙。这位孙常德，为人最重气节，元朝亡后，到了明朝，他因为不愿身事二主，所以就从杭州远远的迁到广东东莞县隐居起来了。他的子孙，也就在这里一直住下来。后来到了他的八代孙，就是孙固的二十三代孙，又从东莞搬到香山县，再移到翠亨村，这就是后来总理的诞生地了。”

凡此诸说，虽皆同谓国父先世为自东莞迁出，然其中亦多相违异处，如邓慕韩先生函，列礼赞公为常德公以后之第五世，而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则列之为常德公之孙，即第三世。东莞上沙乡孙氏始祖，据孙绳武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谓名贵华，而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则称华贵。孙绳武列孙公世系图自常德公至禘儿禘宗为一段，另接以“而生十二世祖考连昌”以下一段，而叶溯中先生则

① 吴稚晖先生演讲总理与中国革命之讲词，见中央训练团团刊第五十三期。

谓翠亨孙氏谱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为可据。邓慕韩先生函,谓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蓢,再迁翠亨,而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又称乐南居左坡头,乐千后有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翠亨迳仔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究之实际,则皆由于根据不健全之资料,而未加详考。今按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于记述翠亨孙氏世次,虽篇幅无多,然皆明载生卒年月,而略无浮词,国父胞姊妙西及故陆华禧先生皆谓其为唯一家传信史。其所记世次,自十二世连昌公起,文云:

"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十三世祖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

"十四世祖考殿朝,生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寿四十九岁。妣林氏,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生,嘉庆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寿二十岁。"

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卒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享年五十二岁。则其父连昌公,卒年戊申,当在康熙四十年以后,以历表考之,必为雍正六年戊申,其生年己酉,必在康熙四十年以前,以历表考之,必为康熙八年己酉,享寿六十岁。纪念簿谓其享"寿五十二岁",当是误以其子迥千之寿数为寿数。要之国父家藏文籍,自康熙初叶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已有年数可稽。叶溯中先生谓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止,其说未谛。而胡去非先生所谓"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更为绝大谬误。夫自明初至乾隆中叶,凡三百

九十余载，谓常德公至瑞英，仅传七世，平均每世积长至五十余年，当无是理。而自乾隆中叶至国父诞生，则未足百年，谓其已传十一世，平均每世相积不及十年，其为无稽，亦不待辩而知也。迳仔蓢与翠亨，本为二村，所谓于乾隆时始自涌口迁至之瑞英公，乃为迳仔蓢孙氏始祖，与翠亨无涉。且为第十一世，非第七世。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载所谓孙总理家谱序云：

“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大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子因贼马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

细考此谱序语意，乐千乐南当日似未必曾以子孙寄居涌口等地，而接邻翠亨村之迳仔蓢孙氏，则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岁乐南或其兄弟之子孙所谓十一世瑞英公者，始复自外地迁来。所谓号乐南之禘宗公，当与迳仔蓢孙氏关系较深，与今日翠亨孙氏，或无甚关系。国父之十二世祖连昌公，既生于康熙八年，卒于雍正六年，而瑞英公于乾隆三十九年始自外地迁入迳仔蓢，世数早于连昌，而年代则在连昌之后，则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所再迁，亦可知矣。西南党务月刊所载总理家谱序，意者乃原自迳仔蓢孙氏族谱所转抄附益，非翠亨孙氏之固有文献；不然，不应如是抵牾也。

即退一步，姑承认所谓别号乐南之禘宗为与翠亨孙氏有传代关系矣，而其人亦未必与东莞上沙乡孙氏有迁出关系。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曾载东莞县长邓庆史关于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原呈，谓：

“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

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

是乐南之是否出于上沙，亦滋可疑。禘宗禘儿虽名字与别号似为排行兄弟，然一则系统分明，一则似为晚近始于东莞上沙孙氏族谱加入其名者，不足信赖，更可知矣。

即再退一步，姑承认上沙孙氏族谱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之禘宗为果自东莞迁居中山县涌口村矣，而其人亦未必与国父上世有传代关系。盖自常德公至禘儿禘宗，据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下距第十二世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孙可知矣。既非本生，而又无别种资料足以补其所缺之五代，或证实其所缺失之情窦，则诸人所述禘宗以上至常德公诸代名讳，是否为国父之祖宗，亦滋可疑矣。意者其张冠李戴之类耳。而员头山孙氏世系，亦与国父上世无相为衔接之痕迹，故西南党务月刊所载总理上世迁出源流一案，亦未为援据。余颇疑国父上世实自十二世祖连昌公始自外地移入中山县涌口门村，人以其地先有孙氏居留，而遗留乐千乐南立石之莫氏母坟墓，遂以为所谓乐南者与曾居涌口村之国父上世，有传代关系；并以乐千一名与中山左坡头孙氏始迁祖名禘儿字乐川之乐川二字相仿佛，而乐南又似与中山迳仔蓢孙氏之源流有关，左坡头与迳仔蓢之孙氏均自东莞迁出，从而遂以为国父之上世亦自东莞所迁出。不知年代与世数皆不衔接，欲强为牵合，亦徒见空疏无谓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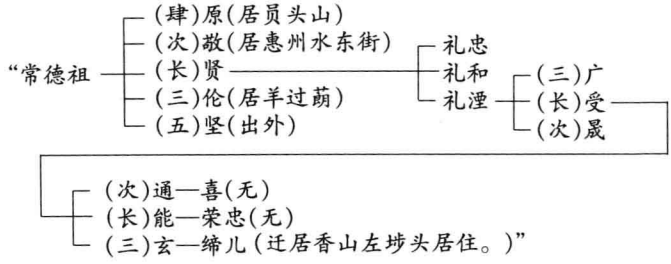
三　国父上世与左坡头孙氏同源说之非是

而说者又谓国父上世与中山县左坡头孙氏为同出一源，邓慕

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即曾依此立论。此盖以国父昔年自檀香山赴金山，以避人耳目，曾改称左埗头人，或缘此遂被认为同源，亦未可知。罗志希先生（家伦）编孙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载出使美国大臣杨儒致出使英国大臣龚照瑗函附件，即撮叙金山冯总领事词蘅禀函电报详细节略，谓：

“孙文原字帝象，别号逸仙，改字载之。香山蔡坑村人，现改称早埔头人。年约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须，剪发洋装。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陆，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官，前次创议废立，因未隶檀籍，所谋不逞。均挟厚赀，居檀年久。是否孙文同党，尚难臆断。惟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沙加冕度街（Sacramento Street）第七百零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并闻有沿途联合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该犯随身携带私刊书两本，虽无悖逆实迹，检其上李傅相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现将该书设法觅取寄呈。俟访明该犯赴纽行期，再行电禀等语。查阅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黄黎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一系上李傅相书，洋洋万余言，自称文素在香港习西医，已蒙考取，欲乞傅相专委筹办农务。两种文笔俱畅达，已附致总署备核矣。”

按此所云蔡坑村，即诸书所云之翠亨，早埔头即诸书所云之左埗头。国父之改字载之，与改称左埗头人，盖欲避人耳目，达其革命使命，观冯词蘅所禀情况，即可察其底蕴，非谓国父亦自以为左埗头人也。左埗头孙氏，似为自东莞所迁出。西南党务月刊第二十六期，载左埗头孙氏族谱世系图，文作：



又同图载偏祠神位及正祠神位次序,文云:

“始祖常德,二世祖贤,号鹤湖,三世祖礼湮,号耿明,四世祖受,五世祖玄。”

“正祠神位,皇明恩荣宠锡,始祖宗缔儿,号乐川。”

是左坡头孙氏以缔儿号乐川为始迁祖,而缔儿上世又自东莞沙头迁出,其系统固极分明。国父之上世源流,虽据同上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所载总理世系图,亦称其始迁祖禘宗与其兄禘儿,同为玄公字礼赞之子,然禘儿之禘不作缔而作禘,其别号不作乐川而作乐千。而左坡头孙氏族谱世系图亦无禘宗或缔宗其人,苟禘宗与缔儿为同自东莞迁居中山县之兄弟,与居地为相邻二村,子孙必易以来往,即不祀之于祖祠,亦当列之于家谱。今竟阙而不书,则其不相连接,而非同出一源,亦可知矣。

又同上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又曾载总理家谱四修谱序,谓:“余族谱系自英宗公创始于雍正癸卯,祖乐川公,重始迁也,上及常德公,溯重源也。”玩其语意,当为自左坡头孙氏族谱所录出之序文,非翠亨孙氏所自撰,故其所述祖先名字,无一与国父直接世系有确实关系者。又同刊同期另载总理家谱序,虽于题下注云“据云总理之父笔记”,然究之该序实为混合二段事由之作品:其一为关于乐千乐南复回东莞至十一世祖瑞英始迁居迳仔蓢之事实,已如上文

所引;其二为国父之父达成公迁葬其祖先坟墓之事实,其文云:

"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故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途遥远,往来艰辛之故,是以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

该序文将此段史实录于十一世祖瑞英迁居迳仔蓢一事由之上,实无相连关系,盖国父上世曾一度居涌口村,稍后始移居翠亨,迁葬坟墓为国父一家直接史事,而瑞英公迁居迳仔蓢一事,当为录自迳仔蓢孙氏家谱或根据其他传说而记录之复制文字也。由所谓总理族谱之转抄左蓢头孙氏族谱与迳仔坡孙谱或其他传说观之,其所记录自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外,由不相衔接之禘宗以至始祖常德公,似皆为迳自别谱所抄入,非其固有世系。

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以"上沙员头山左坡头各谱均载始祖为常德公",寻而遂谓"常德公为孙姓来粤开族始祖,确无疑义。"叶溯中先生所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亦谓常德公为总理始祖;且以尝根据孙绳武等呈文,并谓常德公在元为杭州刺史,与杭州有一段因缘。而吴稚晖先生(敬恒)等亦盛称常德公及其远祖孙固之为人。今按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坡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坡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能以片言肯定。考广东各地孙氏多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例如中山县小榄孙氏,即不以常德公子孙同派。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爰及有明三卫兵移居小榄,永奇与弟永源同隶后卫陈宪旗下,遂家焉。分三房,现历二十四代,丁口二百有奇。"可知即就中山县之孙氏而论,亦派别不一,未可悉以常德公子孙目之也。

四　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忠坝公馆背之证据

然则国父上世，果自何地迁出乎？欲释此问题，果当从何处着眼乎？曰：此须先从国父所自述者求之。考美人林百克（Paul Linbarger）孙逸仙传记（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谓国父自述其祖祠，原在东江之 Kung Kun 村，迁居中山，才数代耳。其文云：

“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当他说到同志的时候，总是笑的，——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的，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说生在火奴鲁鲁，便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几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Kung Kun）里。（据开智书局译本第一章翠亨）”

按林氏追随国父多年，所言当自可信。兹就其所言东江 Kung Kun 一语考之，国父之先世居地，亦似不在东莞。何则？东莞为清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所谓“南番东顺”是也。虽其地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属县。如国父上世居地确在东莞，则以东莞一名之易使人明晓，即但称家庙在东莞或东莞某一村足矣，何必复冠以东江一词乎？至上沙乡则更在东莞南部滨海之地，冠以东江，更不类矣。

惟 Kung Kun 一词，究为何地译音？则为研究国父上世源流之关键所在，不可不严为考求。开智书局汉译本孙逸仙传记，译作

龚公村,殆为依音托字之译词,非东江各地果有龚公一地名也。考Kung一音词,确为公字对音,而Kun则为馆或莞对音,公莞于文义无着,东江各县亦无如此地名。而公馆则为普通名称,广东境内,以公馆为地名者,南路合浦县东部有公馆墟,东江紫金县忠坝旧有公馆背村。南路公馆墟与国父所述方位不合,紫金公馆背村则方位正符,而其地又确为孙氏所居,则Kung Kun为公馆对音,而紫金公馆背村,殆可为研究国父上世源流问题之一着眼处矣。

而证以自顷所发现之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则所谓国父十二世祖之连昌公,与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上Kung Kun村者,皆一一相合,而年代亦相符,其非偶然类似,实无可疑。该谱所载孙氏源流之一段云:

"十世祖讳宗荣公,葬于上正约口坑凹口寨。妣叶孺人,葬于杉子坑半岭。生鼎茂公,鼎标公,鼎山公。"

"十一世祖讳鼎茂公,葬于铁炉坑粪箕窝。妣谢孺人,葬于林塘肚食水坑田面上河树岗。生三子:道元,桂元,发元。"

"十一世祖讳鼎山公,妣陈孺人,合葬于祖屋背左片,寅山兼甲,尾宿十二度。未传。"

"十一世祖讳鼎标公,葬于水口,未知何穴。妣叶孺人,葬于径口,未知何穴。生三子:琏盛,琏昌,琏桥。"

"十二世祖讳道元公,妣朱孺人,未传。叔祖兰公,葬于下角劳楼场,未知何穴。伯祖继东公,葬于祖祠屋背,未传。"

"十二世祖讳琏盛,未传。"

"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增城(原误笔作曾城),于后未知。"

"十二世祖讳琏桥公,移走他方未知。"

琏昌之琏,虽视翠亨总理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载十二世祖连昌公之连,多一偏旁,然此类偏旁或加或不加,为粤中

命名与家谱著录之常例，绝非相异之二名，观该谱旧抄本之书增城作曾城，知其抄手本非能文之士，其非伪作冒充之文籍，正亦在此。而该谱所述家世，亦确与公馆背一地名有关，其文云：

“（始祖）友松公，孙百（原作伯）三十三郎，葬贺约林和塘，螳螂捕蝉形，酉山卯向，妣骆八十娘，葬发岗头墩子上（原作不子上）。所遗祭田，小地名（原作小土名）林塘肚。又忠坝公馆背，灌水塘，杨坊矿石屋下三坟地。旱塘仔即上镇约开基之始祖也。分四房：长房祠堂上孙排，二房祠堂上袁田，三房祠堂下孙排。黄牛挨磨，即开基祖祠是也。”

所谓“忠坝公馆背”，今称中心坝公馆背，地在上下孙排之间。下孙排今无孙氏屋宇，盖已移为他族居地。上孙排今称孙屋排，其南有孙氏宗祠，与“公馆背”相接，今仍为友松公子孙所宅居，即所谓“黄牛挨磨”祖祠也。此与国父对林百克（Paul Linbarger）所述家庙在公馆村（Kung Kun）一事实，完全相合。而友松公入居紫金，在朱明永乐年间，所传世次，与翠亨孙氏世次，年数相合。该谱卷端载光绪二年孙见龙撰谱序云：

“我祖友松公偕弟友义公，大明永乐年间，由闽迁居嘉应州长乐县，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县，即惠州府永安上镇约开基始祖也，迄于今，来永者十有余世矣。”

自明永乐中叶，至上文所考定之连昌公生年，即康熙八年，凡历二百五六十年，平均每世积二十余年，以中国崇向早婚，生子较早之情势考之，亦无不符。而今日忠坝孙氏，已传至十八九世，亦与国父一家之世次相近。盖年代与世次，亦无稍异。其非偶然巧合，更可知矣。考永安今名紫金县，明初为惠州府属归善河源长乐三县属地。隆庆间以土寇初平，析归善古名宽得二都，长乐琴江

都，及河源蓝能，为新县，锡名永安，仍属惠州府。[①]忠坝在旧属长乐琴江都，而长乐于清初改隶嘉应州，故孙见龙谱序，遂谓友松公迁居嘉应州长乐县也。琴江都分上正、中正、贺冈、袁田、秋溪等五约，上正中正，又称上镇中镇，秋溪约又称清溪约，忠坝则在上正约内。忠坝孙氏，当全盛时，殆分布于上正中正贺冈袁田等约，惟今则非昔日比矣。

至忠坝孙氏族谱所述连昌公移居增城后即未知下落者，或以其人辗转迁徙，所传丁口无多，因失于连络，亦未可知。而当日紫金人民之移居增城，则似为相当普遍之现象，不仅忠坝孙氏为然。乾隆增城县志卷一舆地，曾略述其事，文云：

“明季兵荒叠见，民多弃田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维难。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有英德长宁人来佣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稍稍至。清丈时，山税之占业浸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绥福金牛三都尤多。”

惟连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故在增城未留若何明显痕迹，而其卒年与葬所，则已在涌口门村。忠坝孙氏族谱所以记云“移居增城，于后未知”者，意即因此失去联络之故也。

而国父自述，所以称家庙在东江上公馆村一小名，而不言永安忠坝一较大地名者，当根据其家历代父子口头所传述。按各地人

① 参考刘彬华等纂道光永安县三志卷一沿革，及卷五人物。又屈大均于康熙二十六年所修永安县次志十七卷，今北平故宫博物馆尚有其书，甚可参考。而屈氏广东新语，有永安县一条，永安三都一条，秋乡一条，火带一条，南岭一条，永安五江一条，永安诸盗一条，永安黄氏三孝子一条，均可考见明末清初紫金景况。又康熙初刊本翁山文外，有永安五列女传，亦可参考。

民外出耕殖，其为一县一邑成群迁移者，必统记原籍县邑总名，以为号召互助之根据；其各人原居乡镇小名，往往浸假失记。其为一村一家之辗转移殖者，必仅记原居乡镇小名，文籍既鲜携带，于原籍县邑之总名，必浸假失记。[①] 国父上世之移居中山县，本非自永安直接成群前往，故于东江原籍，遂只记公馆村一小名也。

五　紫金忠坝孙氏之源流与迁移背景

至紫金忠坝之上世源流，则据上述孙见龙所撰谱序，谓出于唐末之孙诇。其文云：

“迨及诇公，族众曰百将公。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才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是也。以功封为东平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雩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雩都青塘，或居安远。……积德后昌，生齿日繁，其子孙遂多莺迁。”

考诇公确为宁都南门外孙氏始迁祖。近日浙江东南日报社曾派记者至宁都考察，谓曾于该县南门外直街孙世通家，借阅其第八修与第十一修各族谱，[②] 内载：

“始祖讳诇，乃堂中书舍人讳拙之子，唐僖宗中和三年，因黄巢之乱，充承宣使，引兵游击闽越江右间。以功封东平侯，嗣略至虔

① 族兄梓材参谋长，尝为余言：于驻军粤桂各地时，尝访问当地各乡村之居民源流，其自外地所迁入者，于原籍地名，或统记州邑总名，或仅记乡村小名，求其原因，悉与此所述全同。斯亦治人文地理学者所宜注意者也。

② 自民国三十年九月六日中央通讯社桂林分社，发表关于余新近发现国父上世谱牒一专电消息后，各地报纸悉为揭载。浙江东南日报社，曾特派记者至宁都调查，见广东文化新闻社所出文化新闻第三号史料栏泰和通讯。

化县。民皆安堵,父老遮道请留,遂定居该县。诇公娶陈氏,生一子讳实。实公生士元公。”

而诇公则原籍陈留,与宁官田孙氏族谱云:

“四十一世拙,字玄几,唐为中书舍人,及两浙节度使。四十二世诇,号百将。为粤赣闽开基始祖,原居汴梁陈州。唐僖宗时,因黄巢之乱,以公才武,选为百将,领兵闽越江右之间,屯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之宁都也。中和四年,乱既平,封东平侯,遂为我始祖焉。”

按汴梁即今开封,陈州即今淮阳,皆在河南东部。惟陈州素不属汴梁,此当为陈留之误。是忠坝孙氏,其先盖宅居陈留,至唐末始以黄巢之乱,徙居宁都。按黄巢于唐僖宗乾符初,为乱于鲁豫皖间,驱河南山南二道百姓十余万,进掠淮南,为官军所阻,乃转寇浙东,旋收众逾赣,破吉、虔、饶等州,复刊山伐木,东掠闽西建州,于乾符六年,进陷福州,旋复退赣,出湖湘,至桂管,进寇广州,会大疫,引众北还,沿湘下衡,破潭鄂诸州,复趋宣州,进迫广陵。所过,居民逃散,官兵望风而降。广明元年九月,遂北渡淮水,攻陷洛阳,又进据长安,称齐帝。计巢自发难至称帝,为所屠毒者以今日省份计之,前后殆达十省。[①] 就中尤以今日河南省西南部中部,湖北省东北部,湖南省东北东南二部,广西省东南部,广东省中部与西北部,江西省中部与北部,及安徽省南部与西南部为最烈。惟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及广东东北部,未受巢害,为当日避地良所。虔州虔化县,即今江西宁都,扼赣省东南咽喉,诇公以堵御黄巢之故,而定居其地,实为当日局势所必然。观陈观酉所纂赣州府志卷五十八人物仆都监传,载仆都监以巢乱避居虔化,知当日自中原避地

① 参考旧唐书卷二百下黄巢传。

宁都者，且必甚众。其文云：

“仆都监，逸其名，官司天监都监。黄巢之乱，与杨筠松避地虔化，遂以青鸟术传中坝廖三传，三传传其子瑀，瑀传其婿谢世南，世南传其子永锡。”

而诇公子孙之散居于赣南闽南与粤之东北部，亦为自然之发展。即宁都孙氏，传至宋代，亦名贤辈出，如苏过斜川集卷五，载孙志康墓铭，述志康与其父立节之学术道艺，即其明证。[①] 惟忠坝孙氏，上世果自宁都迁闽何县？复由闽何地迁粤紫金？则忠坝孙氏谱未见明载。考宁都南门外直街孙氏族谱，载诇公有第四世孙曰承事者，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其余各房则无迁福建者。[②]是忠坝孙氏当自长汀之河田所辗转迁至。惟其在闽之世次与名讳，则非详考福建长汀等地孙氏族谱，及其他文籍，则未能遽为追述耳。

至紫金各姓，如忠坝孙氏等之所由多移居外县如增城等地，则似与清初粤东反清复明之运动有关。盖即以抗清不成，被迫解散，其子若孙之移居外县，或竟如逋逃。故文籍难存，事迹湮晦，非就当日局势多为考核，则难洞明其人之所由迁移转徙也。考紫金琴江都秋溪约，明末有义士钟丁先者，尝于清兵入粤时，起师与抗，既屯重兵于忠坝凹口，而其地亦为孙友松公子孙所分居，[③] 非其人曾应丁先号召共为勤王，料丁先未必能如是部署，亦未必有如是重

---

① 商务印书馆新印丛书集成本斜川集，卷五孙志康墓铭，称志康为虔州感化人。虔州即今赣州，两宋虔州有虔化县无感化县，此必虔化之误。

② 此据江西通志馆馆长吴藹林先生(宗慈)所函告，盖该馆曾派人至宁都调查也。参见注二十。

③ 紫金忠坝凹口寨一带，原亦为友松公子孙所移居，见李蔚春先生所寄余之调查简报。

兵也。按道光间永安许鼎亨,尝辑刊丁先遗文,名钟义士集,[①] 末附传略一篇,于丁先集义民抗清事,颇有记述。文云:

"钟丁先,字后觉,又字南山,永安琴江都清溪约人。父国祥,邑庠生。丁先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生。自幼颖异,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崇祯十五年壬午,吴韩起夏允彝主广东乡试,举丁先第一。旋丁先北上会试,猝遇流寇,至河而返。癸未国乱,越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师,吴三桂引满清入关,丁先闻变痛哭。顺治三年,清兵徇岭表,所至皆下。丁先招集义民,据永安抗清,意图恢复,有众千余,屯于凹下山。时桂王方都肇庆,称端京,改元永历,授丁先监军道,旋升参议,后升广东按察副使。桂王奔粤西,号令隔绝,丁先知势不可为,即解散义兵,居蓝塘下石彼岸庵,削发为僧,号忏云。府县及平靖二藩,皆致书招丁先出仕,丁先坚辞。答书风霜满纸,忠义凛然。丁先气性刚毅,学识渊深,才节兼全,智勇俱备。在彼岸著四书明微若干卷,未刊行,今无知者。后离彼岸,卒于里舍,年岁失考。后裔俱往四川。"

所谓凹下,又称凹口,盖为出入忠坝唯一孔道。按忠坝为琴江都小盆地,东西南三面,群山环抱,成为天然屏蔽,惟北面有琴江,自五华蜿蜒而至,入境处,左侧二山,有险道可达,即所谓凹下山也。以地势险阻,易守难攻,故为兵家所重视。忠坝当明清之际,以孙、杨二族为大姓,今二族已式微;代之者为温姓。丁先所集之千余义民,虽名氏无考,然以当日情势勘之,必有忠坝孙氏如上述家谱所载十一世鼎茂鼎山鼎标,十二世道元继东连盛等参与其间;不然,不致以凹下为屯兵所在。观丁先答平靖二王书,谓:

---

① 参考拙作晚明钟丁先义士集跋,文见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书林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为遵王谕归农事:先登雋于崇祯,授官于永历,正也义也。永历元年,擢福建监军道,二年升参议,三年升今职,与汀州贺总兵鏖战数月,与惠州黄总兵相持二载,与班固山连总兵郭总兵向牛录白牛录,各战数十合,此皆先之往事,不容掩也。今者西粤之报梗绝,明主号令不及,所欠古人,只一死耳。……先未出土,三代祖骸被戮,千里入觐,先断有所不敢。”

可知其曾与清兵抗战甚力,非得忠坝以至琴江都大部分之人民,相与协助,使无内顾之忧,能如是作战耶?若更证以忠坝孙氏族谱所载十一世与十二世诸族人多明注“未传”一事实勘之,其曾参与抗清义师,更昭然其若揭矣。

今忠坝人民,皆谓父老相传,其地在明清之际,战祸颇盈,民多流徙。而勘以许鼎亨所作钟义士集跋,亦知紫金人民当日确曾以遭变而离散于外,其文云:

“夫自崇祯壬午以后,世事变更,人民离散,即家中契券产业,消归无有。而此卷至今二百余年,岿然独存,此虽人重先生手泽,抑亦先生之灵有以使人流传之而不灭者。”

夫既丁先三代祖骸被戮,子孙多往四川,而紫金人民亦以世事变更,而多数离散,则谓曾于其地屯集抗清义兵之凹下居民,及与凹下相邻而关系甚深之忠坝孙氏,而克不受影响,靡有迁移,决其无是理矣。此为国父上世自紫金向外迁移之背景。国父胞姊妙西,尝谓其家先人,在清从无应举觅官者。倘亦与此有关乎?

抑此外尚有可附为注意者,即太平天国之创建者花县洪秀全,其先世亦自广东东部之嘉应州所迁出,其迁移之年代与背景,亦与

国父上世自紫金所迁出者略相似。[①] 按花县洪氏族谱，载其嘉应州始基祖为念九郎公。念九郎之曾祖贵生公，于元代由闽迁粤丰顺汤田布心。至念九郎之妣及子法珩，复于明初再迁嘉应州石坑堡。至十一世祖沁三公，于康熙中叶，再迁花县官禄坳。考花县原为番禺南海增城交界地带，清初广东东部各地抗清义民，颇入据其地，清所封靖南平南二王，先后平定其地，收为王庄或官庄。后平南王子尚之信，应吴三桂约，起兵反清，向日义民，因据地遥应大举。及平藩被灭，义民受剿，清于其地，建为花县，以安抚义民，并招致东部农民，相与垦殖。而嘉应石坑堡洪氏十一世祖沁三公，遂辗转移家其地。与国父上世，盖源流相似云。

……

十二　结论

要之国父之家世源流，自其入粤始祖友松公于明永乐年间自闽迁粤紫金县后，至国父适传十八代，世以耕读为业，各代之名讳世次，皆甚明确。自友松公至十一世祖鼎标公，俱住紫金忠坝，以鼎标公一支，尝开基于忠坝公馆背，故国父尝称其家庙在东江上公馆村(Kung Kun)。自其十二世祖连昌公于清康熙年间由紫金迁居增城，未几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越二传，至十四世祖殿朝公，又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至国父本身，适传五代，故国父尝谓其几代近祖皆住翠亨。至其远世源流，则唐以前俱住陈留，为中原世族，自唐僖宗时黄巢变乱，其远祖诇公，始以领兵堵御之故，迁居江西

① 参考拙作太平天国洪天王家世考，文见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所编广州学报第一卷第二期。及逸经第二期简又文先生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又见花县洪秀全族内所遗家谱抄本，余亦获藏一部，可参考。

宁都，历五代至宋，子孙浸多，散布于赣南、闽南等地，元明之际，始多自闽赣，迁粤，国父之入粤始祖友松公，即自福建长汀河田迁粤之一支也。

至其在粤之迁移背景，则十二世祖连昌公之迁居增城，实与其上世之曾参与抗清义师有关。盖义师解散，故里受迫，其子若孙，遂浸徙于外也。而其自增城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则更与顺、康间清廷迫令粤东濒海迁界复界有关。唯其辗转迁徙，皆有所不得已者，且尝蒙受绝大痛苦，故其民族意识，亦愈传袭而愈深切。而迁徙之际，辄受自然淘汰与人力胜天诸作用之支配与影响，终以优者而得生存演进。至国父遂以接受家世传袭，及时代刺激，与国父本身之奋斗，遂挺然为旷世英豪，而为民族国家之领袖，盖其导源甚远，故其洪流弥长也。此则今所考述大凡也。

惟此外尚有须附为说明者，历史之研讨，全以资料之获得为凭准，而资料之搜访，又往往受时间与地域之限制。今兹所考，如自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诇公之世次名讳，皆以资料不备，未能明述；而自友松公至国父十五世祖恒辉公，亦仅略举其世次名讳与迁徙背景，其余生平行谊，多未提述，盖亦以资料尚缺乏也。海内不乏鸿博而富庋藏之君子，甚望能以此类资料，惠赐补订，或藉为更进一步之研讨，而别为一书！学术乃国家公器，倘蒙进而教之，则尤馨香祷祝焉！

国父家世源流考跋

以救国救世界之三民主义，再造寰宇，以致知力行唯生之学术思想，启发多士，以大雄无畏，至诚不息之精神，感召万汇，若国父孙中山者，盖所谓以一身参天地之造化，以一言启世运之新机，其

生也人类之大幸，其薨也人世之大戚，千秋万祀，虽欲不为皈依，不可得也。

香林曩岁寄居旧京，尝数往西山，谒国父灵柩，山高地爽，默念宇宙无穷，国父如在。会政府为奉安大典，灵柩南移，道路趋跄，万方致敬，香林恭睹其盛。后数年，香林执教于纪念国父之中山大学。又二年，讲授南雍。每春秋佳日，驱车谒陵，献鲜花，瞻遗容，训语如新，高明光大，所感发于人心者，未可以言语形容也。香林自是卓然有恭纪国父伟迹之志。

顾欲恭纪国父伟迹，必先广搜资料，而其最难获致者，厥为关于国父起居言动之资料，与关于国父家世源流之记录。盖前者感人独深，而记录特少，仅昔年追随国父，幸获瞻对之雅者知之。士生若干年后，非分谒先进，博访咨周，慎审追记，鲜克有济。后者系于生命传袭，为阐释国父聪明睿知，与气宇魄力所必参稽。而贤豪兴起，每值巨变迭更之后，耆旧凋零，文籍散乱，自非天假机缘，鲜能守其先世谱牒。香林惧资料日乏，句稽不易，乃于讲授之暇，首为关于国父起居言动之访问注记。二十五年秋，奉命返粤，主广州中山图书馆事，于一般图籍，罔敢或忽，而于访求国父生平与其他与革命建国有关之资料，更竭力焉。而其间复分谒革命先进，与粤中各地孙氏父老，冀以采访所获，恭拟国父传稿。属倭寇侵凌，肆无忌止，所怀未遂，而广州陷没，香林简料馆籍，舶载而桂，间关黔蜀，而所业以阻矣。

惟香林之志，则未尝一日懈也。会中山大学，奉命迁滇，香林再返授课。越明年九月，学校再迁粤北，山村讲授，如汉初经生，失其本经，口以传习。香林惧讹伪失实，乃与所授学生，倡史迹考访，与资料搜索，数往来湘桂粤间。远近友好，知其嗜史，多以珍闷相示，或以考订之责委之。而国父上世家谱旧本，遂于紫金忠坝弋

获，香林大喜不置。遂参求历年访问所得，与其他有关资料，归纳比证。撰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盖即国父传稿前纪。

以资料弋获匪易，是以海内人士，党国先达，皆乐予指示。而总裁蒋公，更赐颂题字，孙哲生邹海滨吴铁城陈立夫四先生，赐撰序文，于右任张浦泉二先生，赐予题签，所以昭示隆重，奖掖而教督之者，为惠甚厚。以香林之不才，诚受教而愧甚。然谨证以国人及先达助其研讨国父家世源流之厚谊，知必能于国父起居言动之资料，更有以广其征访，以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完成，窃不自揆；假之岁月，则国父传稿，亦冀终能撰拟也。斯则香林于感谢党国先达与国人之余，所由恭示其对于国父之景行仰止者，敢不更自奋励以报先达与国人所期望之万一乎！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兴宁罗香林跋

国父家世源流考正*

邓慕韩

去岁报载罗香林先生新发现国父家世,由紫金而迁香山,余甚惑焉,然未得其详也,今夏余应中山大学而往演讲,得睹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全文,知罗先生之著是书,起源于美人林伯克所著《孙逸仙传记》,中有"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Kung Kun里,而紫金县忠坝旧有公馆背村,其地又确为孙氏所居,则Kung Kun为公馆对音,复得紫金县长李蔚青所查得紫金忠坝孙氏之家谱旧抄本,"十二世祖琏(原文)昌公与国父家中所藏孙氏列祖生没纪念簿,所载之十二世祖连昌公,世次名字相同,琏昌公"移居曾(原文)城,于后不知",罗先生遂以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徙居中山县涌口门村,越二传,殿朝公又迁往翠亨。此为罗先生所考得国父先世由河南陈留,而江西宁都,而福建长汀河田,而广东紫金,而增城,而中山涌口门村迁居翠亨之证据也,罗先生并引太平天国之创建者花县洪秀全,其先世亦自广东东部之嘉应县所迁出,与国父上世源流相似,又引汪文炳纂香山县志所述沾涌陈族,神湾刘姓,旗岭下村毛姓,沙埔洋罗族,均由岭东迁至,以为国父上世亦系岭东客籍之佐证,文以总理家谱所载:"始祖二三四世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大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

---

* 据《大同杂志》第1卷第5期,1943年。

造祖祠"罗先生则谓:"乐千乐南,当日似未曾以子孙寄居涌口等地。""所谓号乐南之禘宗公,当与迳仔蔸孙氏关系较深,与今日翠亨孙氏或无甚关系,""据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下距十二世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孙可知矣。"又以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迁来迳仔蔸,乾隆二字之误,便谓瑞英公"乃为迳仔蔸孙氏始祖,与翠亨无涉",并谓"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蔸所再迁",断定国父上世非自东莞迁出,又以"禘儿之禘,不作缔而作禘,其别号不作乐川而作乐千,而左坡头孙氏族谱,亦无禘宗或缔宗其人,苟禘宗与缔儿为同自东莞迁居中山县之兄弟,以居地相邻,二地子孙必易以来往,即不祀之于祖祠,亦当列之于家谱,今竟阙而不书,则其不相连接,而非同出一源,亦可知矣",并谓左坡头亦非同源,甚至翠亨国父家中所藏家谱,亦谓普通人士由迳仔蔸左坡头二地孙氏族谱转抄附益,而不承认。罗先生用心亦殊苦矣,爰就余所睹之国父家谱及调查所得,将罗先生所持各点而辨正之。

查林伯克所著《孙逸仙传记》Kung Kun 译作龚公,罗先生则以为公馆对音,不知 Kung Kun 就是东官即东莞,译者非粤人,不知有东官即东莞县故译作龚公耳,我国人相晤,询问籍贯,即先道省,知省则言县,如粤省除著名之汕头、佛山、江门、九江等外,鲜有以乡村称道,因人鲜知,国父以林伯克既知其为广东人,便称东莞,又恐外人不知属在何方,故冠以东江,使其易知,至罗先生以惠州各县,乃称东江,东莞系在东江下游,不在范围,在岭东人士心理,则不知,在广府人则以东江流入东莞者数十里,上沙近其流域,自属东江,如以东莞居东江下游,不予承认,然则高明亦非西江,清远亦非北江矣。照孙逸仙传记而观,则国父出自东莞,更有何说。

罗先生以忠坝孙氏族谱与国父家中孙氏列祖生没纪念薄,均

有十二世琏昌公与连昌公此系偶然巧合，事所常有，兴中会时，史坚如轰炸清两广总督德寿，为奸细郭尧阶所引拿，中国同盟会时，汉口圣公会同志多人被捕，亦为奸细郭尧阶所密报，广州党人于己酉庚戌之间，在河南设一裱画店为机关，名曰守珍阁，黄复生汪精卫谋炸清政摄王载礼于北京，先组织一影相店为机关，亦名曰守真阁，均系偶合，不能认为同是一人所为，同为本党所组织也，罗先生于紫金徙往增城之琏昌公，“于后未知”，便即指为再迁往香山涌口门村居住，未免过于自信，其实琏昌有无后嗣，有嗣纵不往居增城转移东西南北，随遇而之，系属常有之事，并无事实证明，而断必以住往香山涌口门村，则太强矣。

罗先生谓“乐千乐南，当日似未必曾以子孙寄居涌口”，“禘宗公当与迳仔蓢关系较深，与今日翠亨孙氏或无关系”，国父上世由东莞而香山涌口，而迳仔蓢，在此建有祖祠。后因水灾，该处房屋均被冲毁，乃迁入翠亨而居，是孙氏族人所述，现迳仔蓢已鞠为茂草，是迳仔蓢与翠亨虽为二地，由彼迁此，即一族也，罗先生曾至迳仔蓢矣，便知虚实。

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漏去第七至十一凡五代系因其目的在第五六代，证明由上沙乡迁出便了，他非所计，叶溯中先生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而止者，系照余所述，余因总理家谱所列七、八世祖，共有数人，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一时未能查考，故溯至高祖殿朝公而止，近外所叙世系，有由始祖以至本身者，有仅叙五代者，有叙三代者，详略均可，期不失实而已，不能以此便遽指为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也，至家谱所载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迁来迳仔蓢一事，乾隆二字余当日疑其有误，党史会亦有疑及之者，以国父家中所藏列祖生没纪念簿计之，似在清代顺治时，乾隆二字，想系顺治，大抵族谱关于纪载年久世远之地名年代，间

有错误，即如孙氏各谱所载第二世，各有不同，员头山族谱载常德公生二子，上沙乡族谱常德公生四子，左涉头族谱载常德公生五子，另图则载常德公生四子，不特各谱于人数既有不符，而次序亦复相异，大抵世远年湮，族谱纵不遗失，亦为虫蚀，事后追忆，传闻遂异，故将各说具载，以备考证，吾人但求其昭穆无误，本源可寻便了，不能因其少有差异，便斥为伪，如罗先生于连昌公考证其年岁为六十，而孙氏列祖生没记念簿则叙五十二岁，孙氏忠坝族谱误广东英德县为江西英德县，不能以此二者小错，遂谓全皆伪也，且总理家谱既有瑞英公之名，则列祖生没纪念薄必将生没纪入可考。（年来多难，余之所存，经已散失，总理故居党史会必有存在可查，）故不能因乾隆二字之误，遂谓连昌公与瑞英公无传代关系也。

罗先生以禘儿之禘，不作缔而作禘，其别号不作乐川而作乐千，左坡头孙氏族谱亦无禘宗或缔宗其人，又不祀之祖祠，列之家谱，以此证明翠亨孙氏与左坡头孙氏非同出一源，夫禘与缔字相似，川与千音相近，抄录错误，固无足异禘儿与禘宗既已分房，不祀祖祠，不列族谱，不能责备，总理家谱有叙，便可证明，罗先生既能原谅忠坝孙氏族谱琏与连曾与增之笔误，而独计较于禘与缔川与千者何耶，国父家中藏有列祖生没纪念簿及家谱二种，罗先生于纪念簿则信之不疑，于家谱则谓为普通人士由迳仔蔭左坡头二地孙姓族谱转抄附益，想罗先生到国父故居时，管理人不以家谱出示，使罗先生仅得阅其一，以致罗先生费了许多心血，而撰成是书，否则罗先生既见总理家谱，而断未必尚谓为非由东莞迁出。余于民国十九年被任中央党史会编纂，及兼广州办事处主任后，乃与国父又侄满（不言侄孙者，因孙字与姓有关，恐阅者易误，）亲往翠亨访查国父世系，适同事中央党史会编纂王斧亦负此任务，在澳门相遇，遂同往翠亨调查，及阅家谱，乃知国父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长

沙乡迁居香山涌口，至十一世祖瑞英公再迁迳仔蓢，后迁翠亨，当日同为抄录，报告党史会，且有国父又侄满在场，并非由别处孙姓族谱抄来可知。

后余以其始祖二三四祖名讳尚阙为为憾，拟询之长沙乡孙族，但不知在何处，问之广州莞人，无有知者，乃去函东莞党部县府询查未几上沙（即长沙）圆头山两孙族，出而争认国父所自出，均携族谱就正于余。余以两族均有理由，证据未足，不能确定。旋与国父又侄满乾二人亲往上沙孙族调查，见该宗祠有一木联，系由与国父之世祖迁往涌口后分枝左坡头孙族所送，言派系由上沙所出，（联文忘记）然为慎重计，尚未敢定翠亨孙族出自上沙也，又与国父又侄乾（时为石公安歧局长）乘车往左坡头孙族，将其族谱神位，详为查考，乃敢断定孙常德公为国父上老来粤开族始祖，上沙圆头山两孙族，均其后裔，五世祖礼赞公由上沙迁往香山涌口，生有二子，长乐千，分居左坡头，次乐南，仍居涌口，至十一世祖瑞英公徙居迳仔蓢，后居翠亨民国十九年，余已有文刊在广东省党部之新声杂志，是国父家世系出自东莞，在吾国为余最先发表，中央党史会所编总理年谱、西南执行部之西南党务月刊，均根据余抄录总理家谱及向有关系孙姓调查所得而刊，即中山县长唐绍仪呈复，亦照家谱抄录，其他著述，如何不同，余不负责，不能视为茅盾，是即余之调查国父世系经过之始末，次并有国父又侄同行可证，他人谱牒，尚不敢妄造，岂有最尊严国父之家谱，胆敢转抄别处同姓族谱附益，以紊乱国父世系，而受严重处分乎。

罗先生以《孙逸仙传记》有国父，庙，原在东江如能在此寻得源流，则洪氏自嘉应客籍徙居花县，而创立太平天国，又有国父亦自东江移住中山，成立中华民国，上世同是客籍，源流相似，后先辉映，厥功岂不甚伟，故极力搜集资料，强史就我，但国父家中所传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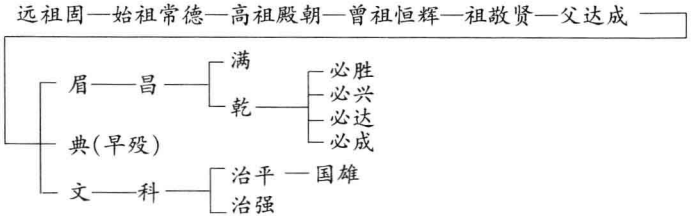
谱，述其始祖由东莞，而香山涌口，而迳仔蓢而翠亨，均有事迹可寻，与罗先生所引出自东江客籍，完全相反，即征之语言习惯，翠亨孙族，及杨陆各族，均操粤语，不操客语，民国以前，客籍人与广府人绝少婚嫁，余见国父于民国前数代未有与客籍通婚，若谓翠亨孙族出自客籍，果如是乎，按之总理家谱则如此，揆之语言习惯，又如彼罗先生之言，恐难取信，是书虽孙哲生先生未及细察，遽为之序，而其子侄，必不承认，纵其子侄不言，翠亨孙族，必不甘被人乱其世系，出而反对，昔在清季，保皇党首领康梁反对吾党提倡种族革命，搜集历史，洋洋万言，谓满洲种族，出自华夏，与汉人同一本源，以乱人心，不知满人与汉人界限分明，且有满汉不婚，及语言文字习惯生活，种种不同可据，保皇党欲以此献媚满人，卒之满人置诸不理，反贻讥国人，徒见其作伪心劳日拙矣，罗先生是书，得毋类是。

罗先生于国父故居，因不见有家谱，致有此误，亦不过徒耗光阴而已，若既见家谱，欲创为新说，惊奇立异，以求见知于世，如此用意，则非敢知。余以是书已刊于世，其终信国父家世系者必不少，关系极大，故不俟罗先生之表示，为文以正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国父年表* (选录)

邓慕韩

翠亨孙之先系出金陵。(员头山孙氏族谱所载)其远祖固,号允中,谥温靖,宋代进士,受知于宰相韩琦。神宗时,任枢密院使。因议王安石青苗忤旨,被谪江西,遂分居焉。至玄孙常德,号员沙,为元杭州刺史,遭陈寇之乱,乃迁于南雄珠玑巷。后与明东莞何真公善,真公慕其品学,聘为西席。旋相偕来粤,至东莞员头山乡而家焉,是为来粤之始祖。常德公来粤时,携同长子贵荣、次子贵华、三子贵绍、四子贵武。初与长子贵荣居员头山乡,后以次子贵华分居上沙乡。(即国父家谱所称长沙乡)。爱其风景清幽,遂颐养于此而终。(上沙乡孙氏族谱所载)。爱及明代,五世祖玄,号礼赞,迁于香山(现改中山)东镇涌口。生二子:长缔宗,号乐千,又号乐川。次号缔儿,又号乐南。缔宗则分居左步头。至清初时。十一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至翠亨乡迳仔蓢,建宗祠,明祀典。但丁口甚稀,老壮出外,乏人料理,未几祠圮。(国父家谱所载)溯自常德公以至国父,已为十八世矣。国父世系,自六世祖至九世祖,家谱不甚明晰,兹将高祖以来,叙之如下:



* 据广州《新时代月刊》第1卷第7期,1946年7月15日。

后序

余于国父逝世之二年，便有年表之作，编成至今，已二十年矣。易稿逾十次，犹未敢刊而问世者，诚恐一有错误，贻害无穷也。是以欲付印而中辍者屡。日陷广州，避居北江，友人谓余曰：与国父关系之深，且知其事之详而确者，除吾子与胡汉民、冯自由两先生外，尚有几人？今胡先生已归道山，吾子关于国父之著述，犹谦让而不公诸于世，倘遭敌人毁灭，损失不更重大乎？余闻斯语，考虑再三。刊而有误，害及来者，误而改正，尚有可挽；毁则无存，使别书之可疑者，亦无考证。权其轻重，遂欲付印，而敌又陷西北两江，交通断绝，欲印无从。今敌人既降，暇将旧稿，再为厘订，与国父自述补遗诸作，先登《新时代月刊》，请四方贤达，为之教正，然后付印，庶其过或寡乎。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邓慕韩序于三水西南

《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

罗香林

余曩者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盖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先以之为普遍谘访之依据，继乃分析公馆村地望，为建立紫金忠坝为国父上代所尝居止之假设；然后，乃搜集有关资料，并于紫金为特殊调查，赖友好协助，果于忠坝孙屋排孙桂香家，发现孙氏族谱旧本。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琏昌公，旧居公馆背，遭时多艰，迁徙外地。其年代，名讳，世次，及地望，皆与国父所述与列祖生殁纪念薄所记相密合。由假设而获致证明，而以科学方法治史之功能以显。由是研究，更知连昌公父子，且尝于顺治康熙间，随明解元钟丁先起义抗清，相持数载，后以兵败，散居增城，值清初沿海迁界复界，遂乃再迁香山县焉。且由新发现之忠坝孙氏族谱，更可上溯其先世，原居河南陈留，自唐末黄巢变乱，有孙诩公者，南下平乱，迁江西宁都，以功受封为东平侯，子姓繁昌。至宋，有讳承事公者，复迁居福建长汀河田，至明永乐间，有讳友松友义者，再迁广东长乐琴江都，即今紫金忠坝，而友松公遂为入粤始迁祖焉。由是，国父上代史实尽明。余不揣浅陋，乃为撰著专书，虽篇幅无多，而自经始研求，以至获致结论，盖已十易寒暑矣。然犹不敢遽以问世，乃于三十一年春，入中枢服务，特袖手稿，就正于国父哲嗣孙哲生先生。承谕阐发详确，勖勉有加。

---

* 据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 1954 年版。

乃送交书局印行，并承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送请吴稚晖先生审查，并通过给奖。而国内外言国父家世史迹者，遂多以拙书为主焉。惟以拙书亦颇论及前此言国父上世为自东莞所迁出在香山已建有祖祠者之非是，故为邓慕韩先辈等所不悦。邓君意气甚盛，尝作《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然徒以谩骂相加，非有信据以是正史实，余未为公开答辩，仅致书孙先生，略论其乖谬而已。兹值拙书在台复版，爰为略识数语，并附录原日致孙先生函如次。亦以见拙书撰著经过，并昔年政府与国人所为奖掖而教督之者，无微不至，余诚铭感无竟焉。民国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罗香林再跋。

附录　致孙院长答邓慕韩君关于《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书：

哲公院长钧鉴：久未谒教，至罪。顷承转示邓君慕韩所撰《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蒙指示辨正。谨加研讨，觉其论据及态度，皆与现代以科学方法治史者绝异，而徒以盛气相加，恐其出于误会，非以考史求真也。谨就鄙见，条列如次：

一、美人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引国父口述，谓国父家庙在东江 Kung Kun，移居翠亨，只数代耳。原文本作："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开智书局译者，不知 Kung Kun 原名，译为龚公村。译名虽误，而原文 Kung Kun 之 Kung 声母从 K，至东莞之东，拼音如 Tung 声母从 T，K 与 T，绝不相混。如别无资料得以证明林氏以 K 为 T，或以 T 误 K，则 Kung Kun 一名绝非东莞英文拼译。况东莞为县，而林氏原文称 Village，显有分别，其非出自东莞，盖昭然若揭也。且普通之所谓国父上世源出东莞者，皆

以曾在涌口居住之孙禘宗为根据，而不知禘宗之世次既与国父上代可考之世次不相衔接，而禘宗公本身，据东莞县长邓庆史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呈文，则又明谓“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国父上世与东莞孙氏之无涉，稍明史文辩伪者，早已知之，无待今日喋喋也。此其一。

二、邓君所谓国父家谱，其资料已发表于西南月刊。不佞曾为比勘，觉其矛盾抵牾，所推溯之始祖常德公，实非国父直接系统。恐当日汇录成篇，未及深考，而即以邻村孙氏所藏资料相互排比。而邓君此文，亦谓“因总理家谱，所列七、八世祖，共有数人，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一时未能查考”。夫自七、八世祖至国父之父，仅十世耳，信如邓君所言国父五世祖礼赞公即由东莞上沙迁香山涌口，至十一世再迁迳仔蓢，建有祖祠，后迁翠亨。则涌口，与迳仔蓢及翠亨，皆在香山县内，距离至近，历代相传，必有坟墓与附簿，可资询查，何至家谱之内，竟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近代人所叙世系，固有仅叙五代或三代者，然此指变乱频仍，无旧谱可考者言之，非所语于在一县居至十代，亦不能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也；既不能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则其不足据以立论，亦可知矣。况国父对林百克所言家世，既明谓家庙在东江 Kung Kun Village 而此所云之迳仔蓢孙氏，则已在当地建有祖祠，其非国父系统所自出，更可知矣。此其二。

三、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殁纪念薄，不佞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九月，往翠亨巡礼，承故里管理委员陆华禧先生引导，谒见妙西老姑太，承老姑太出以相示，经不佞全部抄录。其首页第一人，即十二世祖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倘瑞英为直接系统，则如邓君之说，以其为自涌口迁迳仔蓢第一代祖，且与连昌公有父子关系，自必于纪念簿内载入。今竟绝不提载，则其不能贸然牵涉，亦

可知矣。且邓君所谓之总理家谱,已明载瑞英公于乾隆甲午年迁居迳仔蓢,如无别书关于瑞英公之记载,且可证明乾隆二字有误,则终不能直谓乾隆为顺治之误。历史上人名地名年代之因传抄或传述而互有讹伪或错误者,必有其原因,如或以字形相近,因而讹书,或以字音相近,因而讹传,或以父子事迹颠倒而讹,或以故意牵合而误。乾隆与顺治,字形不近,字音亦殊,谓乾隆为顺治之讹,实曲解耳,不足以此遂引瑞英为连昌公之父也。且邓君所谓之总理家谱,于序文另一段(下注"据云总理之父笔记),明谓"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此类祖坟,不佞昔岁曾为巡礼,盖即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各代坟墓,无瑞英公坟墓也。信如邓君所云以十一世瑞英公为国父系统所出,则其坟墓,依通例,非显宦或特有势力者,当在所住附近,何以仍须俟光绪六年始自涌口迁回翠亨也?国父直接世系非自迳仔蓢瑞英公所出,厥理至明。想国父于家庭间,亦必有口碑可据,故曰家庙在东江,而绝不提瑞英公也。此其三。

四、邓君谓不佞所考紫金忠坝孙氏十二世之一支名琏昌公者与翠亨十二世连昌公,为偶然之名字巧合。不知名字虽可偶然巧合,而世次未必亦连带巧合,其同为康熙时人,更未必连带巧合,而东江 Kung Kun Village 一名,更未必与公馆背村对音能完全密合,其民族迁移之时代与背景,亦未必能如此相合。倘以此类由调查考察与归纳比证之史学方法所得结论,仍谓为偶然巧合,而不置信,则其所据资料,年代不符,系统不接,地名各别,坟墓无征,且与当日时势无涉者,而反谓为可信,则其为成见所蔽,而非真有意于考史求真,亦可知矣。邓君既以不佞所考连昌公为偶然巧合,而又举兴中会时广州奸细郭尧阶与同盟会时汉口奸细郭尧阶姓名之偶

然巧合为例。不知不佞所证,实不止姓名相合,邓君拟不以伦,于国父十二世祖犯不恭之咎矣。其明知故犯耶?抑竟不知立言有应守之态度耶?非不佞所敢思议矣。此其四。

不佞与邓君,素未谋面,然颇敬其善于搜罗革命史料,特以其不注意史学方法,对于史料整理,每以成见出之,故不能不辨正耳。肃此奉陈,并叩钧安。民国四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

谭彼岸

1951年广东中山县在土地改革中发现旧香山县孙氏祖尝旧契约四张和管公尝旧账簿一个。这四张废契约包括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孙梅景等卖田契一张,同治二年(1863年)孙达成兄弟二人开荒合约一张,同治三年(1864年)孙达成兄弟三人开荒合约复本两张,原归翠亨村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保管。因同治三年的合约有两份,该馆把其中一张赠给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纪念室",其余三张,去年由中山大学历史系陈胜粦同志从中山县借回来。感谢他们将这些资料提供给我写成这篇文章。

一、孙中山家世源流辨伪

这四张废契约和一个旧账簿的发现,为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的经济情况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使我们有充分证据指出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关于孙中山先世自增城迁来说不能成立,同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资料。

罗香林考证孙中山上世出于广东紫金县忠坝公馆背村孙氏。他说:

"根据美人林百克《孙逸仙传记》所述孙氏家庙在东江公馆(Kung Kun)一事实,假定国父上世或自广东之紫金迁出。"(《国父家世源流考》第二页)

---

* 据广州《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

罗香林以这个“大胆假设”和1941年他在紫金县所发见光绪二年(1876年)重修《孙氏族谱》所载:“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两相牵合,于是武断地说:

“国父十二世祖之连昌公与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之Kung Kun村(公馆村),皆一一相合,而年代亦相符,其非偶然类似,实无疑义。”

按琏昌“移居增城”,本应追查增城《孙氏族谱》以求解决这个“未知”。因为二者世数虽然相同,但“琏昌”和翠亨村《孙氏族谱》的十二世祖“连昌”字形小有差异是一问题,更重要的是“连昌”世居香山县涌口村;而“琏昌”迁居增城,“于后未知”,是否定居或者再迁香山县,罗亦“未知”。可是仅凭琏、连字音大体相同,就推翻翠亨孙谱的全部世系,否定孙中山十一世祖瑞英的记载,其唯一理由只是发见翠亨村《孙氏族谱》有些错误。原谱载:

“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香山县)居住,妣莫氏太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住涌口。乐千乐南祖因粮务迫速,遂回东莞,未曾回来,……。兹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

罗香林谓孙中山“十二世祖连昌公,既生于康熙八年,卒于雍正六年,而瑞英公于乾隆三十九年始自外地迁入迳仔蓢,世数早于连昌,而年代在连昌之后,则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所再迁,亦可知矣”,断定翠亨《孙氏族谱》所载“瑞英公迁迳仔蓢一事,实为录自迳仔蓢《孙氏族谱》……。”又指出“翠亨村《孙氏族谱》除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外,似皆为迳自别谱所抄入,非其固有世系”。罗香林的逻辑是:翠亨村《孙氏族谱》十二世祖连昌以外为真,十一世祖以至始祖常德公为伪。同一族谱世系有真有伪,这是不合传统的谱乘的习惯;特别在相蝉联的两代而有一真一伪,更不会有这样糊涂事。根据新发见的同治二年(1863年)孙达成

兄弟批垦其十一世祖瑞英迳仔蓢山埔的合同，证明瑞英迁居迳仔蓢的记载确是事实，现在再把两个不同地区的《孙氏族谱》中的十二世祖对照如下：

香山县翠亨村《孙氏族谱》

连富　连德　连昌　表腾　廷尊　□□　表国　表生

紫金县忠坝《孙氏族谱》

道元　琏盛　琏昌　琏桥

由此可知翠亨谱十二世有八房，而忠坝谱只有四房，除连昌和琏昌类似外，其余无一相类，最大差别是房数不同，世数只有一个类似。而且，翠亨谱十二世三个人名均用“连”字，无偏旁；忠坝谱三个人名均用“琏”字，多一偏旁，若认为忠坝谱可靠，何以不称“琏昌”，而称“连昌”？显然罗香林以琏昌为连昌，在考据上亦不能成立。若以翠亨谱连昌为真，则琏昌为不真；连昌既真，则其父瑞英亦应为真，岂有父子蝉联，而瑞英抄自别谱之事。再从世系和世居两者而论，翠亨谱屡载其祖世居涌口村。罗香林谓忠坝谱十一世鼎标“二子连昌，初移居增城，后徙中山县涌口(门)村”。翠亨谱连昌为瑞英的第三子，分明二房和三房有别，不能以世数偶同而忽视此差别。承认连昌世居涌口村，则必然同时承认其先世亦世居涌口村，不能因为翠亨谱世数和年代不相符，遂怀疑瑞英和连昌的父子关系。罗香林强合琏昌、连昌为一人，便切去翠亨谱十二世以上列祖，而把忠坝谱十一世以上接上去，构成有尾无头、移花接木式的孙中山世系。试用翠亨谱和罗谱从六世祖起作对照如下：

	六世祖	七世祖	十一世祖	十二世祖	十三世祖	十四世祖
翠亨村《孙氏族谱》	乐南	容窝	瑞英	连昌	廷尊	迥千	殿朝……
《国父家世源流考》	明富	仕伯	鼎标	琏昌(迁增城，迥千于后未知)			殿朝……

迥千为连昌的儿子，瑞英的孙子，罗香林要迥千认增城县的琏昌作父，而不认瑞英为祖父，乱改孙中山世系，而成为古今罕见的伪造家谱的例子。古代汉人重谱牒，宗法为重，十口相传的近缘世系，不会有误。如果凭一条不可靠的材料，妄图推翻孙中山家世源流，另造一套莫须有的所谓国父家世源流，这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再利用新的材料，提出无可反驳的证据，以辨罗说之伪。兹抄录乾隆八年香山县孙梅景等卖田契于下：

立卖田契人孙梅景、梅占、云灿，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愿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依口酬还时价银壹拾陆两正，四家允肯，五面言定，就日立契期，银一色在众交足，[梅]景、[云]灿二人亲手接回应用。税现在本户孙通办纳。立契之日，交[廷]尊、[迥]千批耕管业，不干众人之事，此田明买明卖，不是债利准拆，并非信写等情，如有不明，系同众理明，不干买主之事。今恐[口]无凭，立明卖契写照。

一、实卖到土名横坑上税田四亩。

开四至：东至山，西至山，南至沟，北至山。

一、实接到价银壹拾陆两正。

亚喜(押)
云瑞(押)
连维(押)
乾隆八年十二月拾柒日立卖契孙梅景(押)
梅占(押)
云灿(押)
见银作中人　谭恒玉(押)

乾隆九年七月十二日纳税讫

原件书写四至，年月处有汉满文方形朱印及香山县字号骑缝和朱印，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立契，九年七月十二日纳税契讫，在“本户孙通办纳”，是否过户则未详。据翠亨村《孙氏族谱》知道契上的容窝祖为孙中山的七世祖，是乐南的第四子，葬涌口村。孙廷尊为孙中山的从十二世祖，是连昌的同胞弟，孙崚千为孙中山的直系十三世祖。田契的发见证明翠亨村《孙氏族谱》的世系及世数无误，容窝为廷尊、迥千的七世祖，在明嘉靖辛巳迁居涌口村，紫金县忠坝《孙氏族谱》中的仕伯不是其七世祖。十二世祖、十三世祖均容窝的后代，可知十一世瑞英必然是连昌、廷尊的父亲。由此足以证明孙中山的上代早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县大字都，所谓紫金县忠坝公馆村连昌为翠亨村始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总之，根据家族口传的世系及族谱记载，再证之旧契约，可以确定孙中山先世定居香山县始于明代七世祖容窝，所谓琏昌迁自增城之说，全属子虚，我们有充分证据推翻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有关考据，把孙中山的家世源流还其本来面目。

在这张契约上还可看到争山的社会意义和尝田租佃关系的变化。在此略略解释几句，以供读者参考。

契载因争山无银开支而出卖尝田。尝田即太公田，是旧广东的封建土地占有的形式之一，具有地方色彩，它是广东家族主义的经济基础。尝田是一种族产，依清律不得出卖。但孙氏这次出卖尝田是“众议”，并非私人盗卖，于清律并无抵触。因争山而出卖尝田，已道破尝田出卖的原因。争山又是扩张公尝的手段。乾、嘉时代(1769－1805年)广东官府《严禁豪强霸占官山示》(《问奇书室告示杂抄》续集)指出广东“无业贫民，全赖岭畔冈头旷土，垦耕杂粮，或于深山穷谷砍柴烧炭，籍资生计”。等待农民“垦耕成熟”，不法的土豪劣绅就“冒称粮业”，“或恃势夺耕和抢割”；或“在官山葬

有祖坟,辄将全山据为己有,于民人采樵则勒取租钱"。"此等恶风所在皆有"。孙氏争山是"此等恶风"之一。因争山而动员族人械斗,也是言外之意,故有需银作伙食之用,岂不是厉兵抹马的筹饷措施?

容窝尝田出卖是封建土地的族内转让。族内的土地买卖,即由家族占有转移为私人占有,原来的佃农随着地权的转移而成为新业户孙廷尊、迥千的佃户。契上载"批耕管业",就是佃户转移的标志。

二、孙达成经济状况及其经营水果园的企图

孙氏公尝除了尝田之外,还有山地,乾隆八年所争的山和孙中山的父亲达成(1813 - 1888 年)批垦十一世祖瑞英迳仔蓢山埔。争山和批山埔同是属于封建性质,可是批山埔开垦种水果的事,在孙氏公尝的土地利用上却具有新的意义。

孙达成批迳仔蓢山埔开辟水果园的合约有三份。其中有同治二年用孙达成、学成两人立约的;同治三年用孙达成、学成、观成三人立约的。两份合约对勘,内容和文字大致相同,签字则有不同:二年约签字人有房长学贤等,没有达成、学成的签字,三年约则除了房长等人签字外,达成三兄弟亦有签名。兹录同治三年约全文如下:

立明合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朗税山埔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无庸丈量税亩,任达成、学成、观成围筑以种果物,限以伍拾年为期。今围园及种果物等项费用本银若干乃系达成、学成、观成自出。众议愿抛荒伍年,任达成、学成、观成种植,

所出利息乃系达成、学成、观成收回自用；如抛荒期满者，此园每年所出果物利息若干，俱要登明大部，当祖炉前算数，弍捌均分，每两银瑞英祖份下该得弍钱，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三人份下共得捌钱。或园内所种些瓜菜等物，乃系达成、学成、观成收自用，众无得浅见，多生异言。又不得强霸占植此园，须待至五拾年期满之日，达成、学成、观成将此园及所种果物等项送还瑞英祖管理为业后，集众再议，另行发批、开投，以价高者得。前达成、学成、观成费用本银，亦不得追究填还，化为乌有矣。恐口无凭，今立合约弍纸：房长尊贤执壹纸，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执壹纸，永远为据。

国贤　　学成
同治叁年弍月十弍日立　　房长：尊贤　种植嗣孙达成
业贤　　观成
茂成

同治二年的一份合约签订后第二年（同治三年）又由达成等三兄弟另订新合约，改约的原因，可能由于山埔开荒种果树，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和本钱，由二人增为三人，多一家人参加，即多增加劳动力，这在发展小房经济上，是有利的。同治三年合约有房长孙尊贤，据乐安堂旧账簿，咸丰四年尊贤和达成共管公尝，国贤、业贤又是尝田佃耕者，和达成的关系较深，都是以房长身分批租迳仔蔸山埔给达成的。

从这份合约的内容可以看到以下的几点意义：

水果园经营的企图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营水果园是中国自然经济开始加速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的一种反映。尤其是沿海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这一时期，某些商品经济已发展的农村，出现富农或经营地主从事商业性农业经营，说明中国农业资本

主义因素的逐渐增长，如南海县陈启沅继父志与两兄以农桑为业，江西刘芋珊经营桑蚕，安徽胡元龙经营制茶业等。自然，孙达成经营水果园也有同样的性质。

水果园是一种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农业经营，水果是一种商品生产，它不是为了自给，而是供应市场消费，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带的农民经营水果在明末已相当发达。明末诗人屈大均（1629－1696年）叙述“东粤故多荔枝，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此外，他还提到龙眼、香蕉、橘等水果。这是鸦片战争前144年以前的事。鸦片战争后，广东水果商品经济更加向前发展，因而刺激珠江三角洲地区水果商品生产的繁荣，孙达成等的水果园经营的企图，是具有反映当时经济发展特点的意义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已逐渐地出现在工业上，1863年上海洪盛米号开始机器碾米；在农业经营方面1863年孙达成等经营水果园的企图，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鲜事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倾向。

批租祖尝山地开垦种果要有一定的人事关系和本钱。瑞英祖的子孙众多，批山地不通过投标，以高价者得，而是优厚的五年抛荒和五十年的期限，没有一定的人事关系是办不到的。

孙达成的父亲敬贤（1768－1849年）“以耕读发家，颇有钱。后以醉心风水，屡事坟工，所费不赀，变卖田地，入不敷出，家赀遂耗”。纯粹农民不可能“耕读发家”和“醉心风水”，为了迷信风水而耗尽其现金，还要“变卖田地”，则其为中小地主兼有绅士地位可无疑义。达成亦好风水，“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待朋友甚诚挚，家虽不敷，曾养其友某君至十八年之久。”在封建农村长期养风水先生，可以拉拢房亲，在某些方面达到自己利用祖尝的企图，敬贤参加管公尝，到了孙达成就成为孙氏管公尝的人。据乐安

堂《道光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部》载：

道光廿九年达成收扣租谷5斗

咸丰四年尊贤号来银23.513两

通共存银43.743两

七月十五日支出银23.510两

达成手收入

看风水、管公尝在旧中国的农村当为有一定地位的人，这可能是达成得以批租迳仔蔸瑞英祖山埔的条件。

关于孙达成的经济情况 据孙妙西（孙中山之妹）口述："初父亲家尚小康，以迷信风水，遂致贫苦，不得已，乃至澳门，就业于外国鞋铺，每月工资仅四元，如是数年，始复返里。三十三岁与母亲隔田杨氏结婚。"① 香山县濒海区靠近澳门，商业资本较为发达，孙达成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还能到澳门外国鞋铺佣工，每月工资四元，假定佣工三年，共计工资一百四十四元，可能有所蓄积，三十三岁结婚，四十一岁合伙开荒种果，是其经济有所筹措的标志，据合约载"达成、学成所筑园及种果物等项，费用本银若干"，三兄弟合伙开荒，头五年没有收入，需要支出五年劳动、生活资料以及购买果苗，生产工具的添置与修补，没有相当的资金和劳动力是办不到的。不料合约签订后，开荒的劳动力发生很大的变化，孙达成的两个弟弟先后死去。他的二弟学成（1826－1864年）在订合约那年的秋天（八月十八日）死去，三弟观成（1831－1867年）在订合约后三年又死去。在头五年开荒期中，三人合伙，两人死去，不能不使水果园的计划受到重大的影响，但他是否还坚持下去，则未详。

孙达成虽佃耕尝田，犹不改其父遗风。看他所作的翠亭《孙氏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1943年渝版，第34～35页。

族谱序》及其迁葬祖先坟墓之事实,可知他颇有文化,曾参加管公尝的事务,并且负责收集孙氏各房捐款。《孙氏族谱序》说:

"惟因拜扫路途遥远,往来艰辛之故,是以檀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搬迁,……"①

可知孙氏族人从事贸易的大不乏人。孙达成从事水果园经营亦是属于商品生产,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农业经营。这些家族环境不能不给少年孙中山以相当的影响。

水果园经营对孙中山的影响 孙达成的弟弟之死,使达成不能不把长子德彰(1854 - 1914 年),作为垦荒种水果的辅助劳动力。如果后来水果生产有一定的收入,当会把德彰留在家乡,可是德彰就在这个时期忽然去檀香山,经营畜牧业,不久就成为茂宜岛大畜牧家,"租地六千英亩(合华亩二万亩)雇佣工人逾千。"孙中山十二岁时和他的母亲赴檀香山,其时去水果园的经营已有 14 年了。孙中山的家庭经济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家庭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孙中山的早年政治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

孙中山早年对农业生产发生浓厚的兴趣,和他的父亲经营水果园的企图有一定的联系。他在香港西医书院念书时,曾写过一些有关资本主义农业政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农功》,全篇以资本主义农业政策为立论重心,认为要改变古老的农业生产技术,吸收现代科学农业技术,以图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他《上李鸿章书》末段重申其提倡资本主义农政的主张:"以我国家自钦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他在广州双门底(今永汉北路)王家祠创设农学会,以为起事机关,并撰《创立农学会书》,主张亦以农政为中心。《创立农学会书》中提及"劝

① 翠亨《孙氏族谱序》,据云系孙中山的父亲达成手笔。

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这又使人想起其父在迳仔蔸开荒之事来。这一位年轻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早年思想深处有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要求，和他的家庭出身是不无联系的。

国父家世流源再证*

罗香林

一

余昔著国父家世源流考①，盖纯以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② 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先以之为普遍谘访依据，继乃分析东江公馆村地望，建立紫金忠坝公馆背为国父上代所尝居止之假设，然后乃为搜集有关资料，并于紫金为特殊调查，赖友好协助，果于忠坝孙屋排孙桂香家，发现忠坝孙氏族谱旧本③。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连昌公，旧居公馆背，遭时多艰，迁徙外地。其年代、名讳、世次及地望，与国父所述及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皆相密合。由假设而获致证明，而以科学方法治史之效能以显。由是研究，更知连昌公父子，且尝于顺治康熙间，随明解元钟丁先起义抗清，相持数载④，后以兵败，迁居增城，值清初沿海迁

---

* 据罗香林著：《客家史料汇篇》，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

① 拙作国父家世源流考，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初版于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已出至四版，迄四十三年，复于台北出刊修订初版。

② 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为余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九月，亲至中山县翠亨村国父故居，面谒国父胞姊妙西时所见者。其经过情形，略见国父家世源流考附注二。

③ 忠坝孙氏族谱旧抄本发现经过，略见国父家世源流考附注三。

④ 见道光二十六年许梅村辑刻钟义士文集所载传略。

界复界⑤，遂乃再迁香山县焉。且由新发现之忠坝孙氏族谱，更可上溯其先世，本居河南陈州，自唐末黄巢变乱，有孙讳公者，南下平乱，始迁江西宁都，以功受封为东平侯，子姓繁昌。至宋有讳承事公者，复迁居福建长汀河田。至明永乐间，有讳有松有义者，再迁广东长乐琴江都，即今紫金忠坝。由是，国父上世，史实尽明。而其在粤世次，则为入粤始祖孙友松公，妣骆孺人，二世祖为敬忠公，三世祖为永良公，妣吴孺人，四世祖怀文公，妣汤孺人，五世祖凤宗公，妣叶孺人，六世祖明享公，妣宋孺人，七世祖仕伯公，八世祖绍宗公，妣古孺人，九世祖乃和公，妣林孺人，十世祖宗荣公，妣叶孺人，十一世祖鼎标公，妣叶孺人，十二世祖连昌公，妣陈孺人，十三世祖迥千公，妣谭孺人，十四世祖殿朝公，妣林孺人，十五世祖恒辉公，妣程孺人，十六世祖敬贤公，妣黄孺人，十七世达成公，妣杨孺人，而国父则为第十八世。虽余书篇幅无多，然自始事研究，以至获致结论，亦经十易寒暑矣⑥。且以国父上世源流，与国父家属及其子孙有关，乃复于民国三十一年春，特至行都，就正于国父哲嗣孙哲生先生(科)，承谕“阐发详确”⑦，乃为交书局印行。由是中外言国父家世史实者，始多以余书为依据。余寡陋无似，固未敢以此自喜，然得时贤赞许，亦未尝不因是而自励焉。

近者，乃承三数友人面告，谓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有广州专讯一节，据谓有谭彼岸者，曾于一九五一年发现香山县孙氏祖尝旧日契约四纸，及管理公尝旧日账簿一册。因其中有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国父之父孙达成公兄弟批垦所谓十一世祖

---

⑤ 参见广东文物(民国二十九年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卷六麦应荣撰广州五县迁海事略。

⑥ 拙作国父家世源流考撰著经过，略见该书跋文，及修订本再跋。

⑦ 见国父家世源流考书首孙哲生先生序文。

孙瑞英公迳仔蓢山埔合约，及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孙梅景等卖田契，乃为撰作《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谓可证明国父先世为自翠亨村相邻之迳仔蓢所迁至，其上世且早在明代既自东莞迁居香山县大字都，而非如余书所考国父上世为清康熙时始自紫金忠坝所展转迁至者，其十一世祖为孙瑞英公，亦非如余书所考国父十一世祖为孙鼎标公者云云。不齐其本，语近枝节，虽谭君撰文，或似别有用意，而可不予计议。然为祛除读者迷惑，亦不能不为辨白也。

二

夫世俗所谓国父上世，乃自中山县迳仔蓢所迁至者，以迳仔蓢一地，乃与翠亨村相接，而其地孙氏之始迁入居者为大字都孙氏之十一世孙瑞英公，与国父上世始居中山县之十二祖世连昌公，其世次适为可衔接也。不知此孙瑞英公乃乾隆时人，其迁居迳仔蓢，已建有祖祠，而国父一家，则在中山县本未建祠，其十一世祖，亦非乾隆时人也。《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曾载所谓孙总理家谱序文[①]谓：

“兹于乾隆甲午年（按为乾隆三十九年，即西元一七七四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

---

① 按此所谓孙总理家谱，即邓慕韩先生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往中山县翠亨村与迳仔蓢等地调查国父家世时所抄出发表者。其所列孙氏入粤始祖为常德公，其下则阙二、三、四世名讳，后复据左坡头孙氏祠堂所存资料，再为辅入，惟第七、八世内，仍未能载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与孙连昌公系统，更不能连接。其中关系，国父家世源流考第二、三章，已为论列。至其所载该谱序文，则未署作者名字。就内容分析，殆为综合迳仔蓢孙氏源流与国父之父孙达成公所记其将连昌公以下各代坟墓自涌口门村迁葬于翠亨村者，故亦有一部分资料，可为旁证。

盖迳仔蓢与翠亨村虽区域相接,然迳仔蓢之孙氏祖祠,则非国父之祖祠也。此据林百克(Paul Linebarger)撰孙逸仙传记(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①] 所载国父自述家庙尚在东江公馆村(Kung Kun Village)一史实,可为明证。其文云:

"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当他说到同志的时候,总是笑的,——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的。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说生在火奴鲁鲁,便可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几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

此为开智书局译本第一章翠亨译文。其原文则为:

"What about this report, Doctor, that you were born in Honolulu?" I asked Him.

He smiled. Sun always smiles the Smile of friendship when he speaks of his followers.

"It is true that the report was circulated. You see, some of my over-zealous followers thought that I could obtain protection from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gainst the Manchus by claiming to have been born in Honolulu, whhre, in fact, I did live for many years. So, of their own accord, they circulated this report; but ah, no! Choy Hung……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s. I say immediate

① 林百克撰作《孙逸仙传记》,大约准备于一九一九年,惟直至一九二五年始出版于美国纽约世纪公司(The Century Co., New York),全书共三百七十一页,为西文国父传记之较完备者。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in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

林氏追随国父多年,又为美籍,记事当属客观可信。此所述国父所言其家庙所在之 Villlage of……Kung Kun,虽开智书局译本误翻为龚公村,然实际则除公馆村外,似未见更有能为密合之名称①。前此邓慕韩先生虽尝指 Kung Kun 为即"东莞"之对音,然"东莞"之东,当音如 Tung 决不如 Kung。且"东莞"为县,与 Village 不合。抑国父既明谓 Kung Kun 乃在东江,则除紫金忠坝之公馆村外,更无与此能相密合之地名。国父生长地之翠亨,在清属香山县,即今日中山县。香山县内原有孙氏宗祠,而迳仔蔸亦有孙氏祖祠,东江公馆村之孙氏家庙,当远不若香山县各孙祠乃至迳仔蔸祖祠之声名显著。脱非国父家庙为确在东江公馆村,国父殊无舍弃香山县显名,而反称东江公馆村之必要②。夫亦正唯国父不举显著易明之香山县各孙祠与地区相接之迳仔蔸祖祠,而反举声名不显之东江公馆村家庙,则更可确知国父所述为绝可信赖,而当为首予尊重。若此最可信赖、最当尊重之史实,而亦不为依据,则尚有何种史实可为研考国父家世源流之据点乎?如此前提决定,则可明证今日中山县内,当无国父所直接见属之宗祠。迳仔蔸之孙氏祖祠,当与国父一家无涉。始建迳仔蔸孙氏祖祠之孙瑞英

① 见国父家世源流考第四章。

② 国父一支孙氏,在中山县未建祖祠,即孙哲生先生亦尝言之。民国三十二年七月,邓慕韩先生曾撰专文,分寄孙哲生先生与邹海滨先生(鲁),谓余不应明言国父上世为自紫金所迁出。至八月十日,邹先生即命其秘书,致余一函,谓"此事昨晤哲生先生,伊谓:'邓实糊涂,余十二世祖与紫金者相同其名字,竟称偶合。且(余家)孙氏(在中山县)无祖祠,不能强余认其他孙氏宗祠为余之祖祠也。'"云云。

公，当与国父一家无直接之传统关系。此其一。

抑国父上世之迁入香山县地，乃为先居涌口门村，由涌口门村即再迁翠亨村[①]，而非由涌口门村先迁迳仔蓢，后再迁翠亨村者。故始迁迳仔蓢之孙瑞英公与始迁涌口门村之孙连昌公，其年代乃不相连。据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首载连昌公及其子迥千公生卒年月，谓：

“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十三世祖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

按孙迥千公，生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西元一七〇一年），卒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享年五十二岁，则其父连昌公卒年戊申，当在康熙四十年以后，以历表考之，必为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年），其生年己酉，必在康熙四十年以前，以历表考之，必为康熙八年已酉（一六六九年），享寿六十岁。纪念簿谓其“寿五十二岁”，当是误以其子迥千之寿数为寿数。孙连昌公为康熙时人，盖至明者。而始于迳仔蓢建立祖祠之孙瑞英公，则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始为迁居其地。其时孙连昌公，且去世已四十六年矣。孙连昌公之年代早于孙瑞英公，谓其为即由孙瑞英公所传，有是理乎？且如谓孙瑞英公为即连昌公之父，则国父家藏列祖生殁纪念簿，胡为不特载其名讳于簿首乎？孙瑞英公之为十一世祖，乃香山县别支孙氏之十一世祖，非国父一支之十一世祖

① 见前引孙总理家谱序文。

也。此其二。

谭君所据香山县孙氏祖尝旧日契约与管理祖尝之账簿，皆为本属香山县孙氏祠堂之文件。此类文件，虽可能牵涉国父上世自连昌公以下至达成公等批垦批耕或买受祠堂所属山埔农田等史实，如所谓同治二年国父之父达成公兄弟批垦孙瑞英公迳仔蓢山埔一文件，即其例也。然此仅可证明国父上世与较先迁入香山县之别支孙氏，有经济上之关系已耳，非能证明其上世祖先有传代之关系也。盖依中国昔年农村佃耕或批垦惯例，倘某一祠堂所直属之子孙如无人为批耕批垦其祠堂土地，则非同姓中人，亦可批耕批垦[①]。至同姓而支派不同之农人，得为批耕批垦，则更无论矣。香山县各孙祠烝尝，虽皆与孙连昌公以至孙达成公等无隶属关系，然达成公以居住翠亨村，其批垦邻村迳仔蓢孙瑞英公祖祠尝内各山埔，自可依乡俗进行，不能因此遂认其为即孙瑞英公子孙也。昔年粤中多有数姓而垦耕某一姓氏之祠堂田者，岂此数姓亦得谓为皆某一姓氏某一祠堂之子孙耶？此其三。

三

宗上三节所论，可知国父上世，其迁居香山县，仅数代耳。国父之十一世祖，决非为原居香山县而再迁迳仔蓢、且建有祖祠之孙瑞英公，可为相混。国父之十一世祖既非为孙瑞英公，则其上世自非如孙瑞英公之先代原自东莞而于明朝已迁居于香山县者，可为相混。国父之家世源流，自仍以余书所已考定而经孙哲生先生认

① 以祠堂祭田出批与非同姓中人耕种，闽粤各地，多有此俗。如日人多贺秋五郎所编《宗谱之研究》，资料篇，四、关于宗族祭祠资料，所载福州龚氏支谱祠堂条例，其“祭田以供祭祀”一节，即曾明示将祭田出批与非同姓农民佃耕。

为“阐发详确”者，为真实可据。谭君《新证》，恐仅志在说明某一部分之经济状况而止，而非有裨于国父家世史实之探讨也。

若夫谭君所谓翠亨村之《孙氏族谱》，昔年亦称《孙总理家谱》，则其内容资料，早经发表于西南党务月刊，余往年亦尝取以比勘，第觉其矛盾抵牾，显为自迳仔蓢与左坡头诸孙氏族谱所抄合而成，故中缺数世，年代不接，而非为国父一家之直接世系。故即邓慕韩先生亦不能不谓该谱所载“七八世祖共有数人，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一时未能查考。”① 夫既未能载明“何人由何人所出”，又何能藉以考证国父上世之真实史迹耶？国父昔年对林百克氏讲述其上世迁移源流，所以仅谓其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而不以该谱所载为依据者，盖有深识存焉。余书第二、三章，亦经略予论列，此不复赘矣。

此文原为一九六四年九月亚洲史学家第三届会议宣读而作，今以归类，附录于此。

① 见国父家世源流考附录。

国父的家世源流*

中　原

关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初见于美人林百克之孙逸仙传记，谓国父自述其祖祠原在东江之 Kung Kun 村，迁居中山才数代。据开智书局的译本，上述 Kung Kun 村被译作龚公村，这是随便音译的字。惟因有此记载，遂有人以为，国父上代系由东莞所迁出。后经罗香林教授多方考证，证明国父所述之旧家庙所在地，实为紫金忠坝之公馆背村。罗教授于民国卅一年著有《国父家世源流考》，根据其历年搜集所得之资料，包括孙氏族谱，祖坟墓碑等，旁征博引，寻求实证，获致结论如下：

“国父之家世源流，自其入粤始祖友松公于明永乐年间自闽迁粤紫金后，至国父适传十八代，世以耕读为业。自友松公至十一世祖鼎标公，俱住紫金忠坝，以鼎标公一支，尝开基于忠坝公馆背，故国父尝称其家庙在东江之公馆村（Kung Kun）。自其十二世祖连昌公于清康熙年间由紫金迁居增城，未几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越二传，至十四世祖殿朝公，又由涌口门村迁居翠亨，至国父本身，适传五代，故国父尝谓其几代近祖皆住翠亨。”

上溯国父之远世源流，则唐以前俱住陈留，为中原世族。自唐僖宗时黄巢变乱，其远祖谌公始以领兵抵御之故，迁居江西宁都。历五代至宋，子孙繁衍，散布于赣南闽西等地。元明之际，始由赣闽迁粤，国父之入粤始祖友松公，即自福建长汀河田迁粤紫金之一支。

---

* 据香港《自由报》，1965 年 11 月 10 日。

又国父上代在粤一再迁徙，亦有其背景。十二世祖连昌公之迁居增城，乃与其上代曾参加抗清义师有关，盖义师解散，故里受迫，其子孙遂转徙外地。至其上代由增城迁居中山涌口门村，则与顺治康熙间清廷迫令粤省濒海迁界及复界有关。

由于罗教授上项考证，使我们获知，国父之上代，原系由中原辗转迁徙之客族。（关于客族源流，罗教授另有专著，考证甚详）。盖客族南迁一般路线，皆系由河南到江西，由江西入福建（闽西），再到广东。亦有由赣南迳迁粤东粤北者。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于明永乐间定居紫金忠坝，其地原系广东长乐琴江都。长乐即今之五华，清朝属嘉应州，嘉应州为客族聚居地。又据国父胞姊妙西姑太太谈述：国父之祖父敬贤公醉心风水，屡事坟工，国父之尊翁达成公亦好风水，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各祖先坟地皆由其寻觅改葬。可见国父之祖若父虽迁中山，仍与嘉应州之客族人士相往还。

罗教授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书中，还提起一项值得注意的事，即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其先世由粤东嘉应州迁出，其迁移之年代与背景，和国父上代自紫金所迁出者略相似。洪秀全上代由闽迁粤丰顺，明初再迁嘉应州石坑堡，明末清初，粤省抗清义民蜂起，花县旧地亦被义民所据，迨清兵平定其地，始建置花县，招引粤东农民垦殖，洪秀全之十一世祖乃自嘉应州迁往。国父上代在紫金忠坝，明末清初该地有钟丁先义士起兵抗清，公馆背有孙大食公随同起义，以骁勇善战著称，后因兵败散走，忠坝孙族遂亦受影响而迁移。国父十二世祖由紫金迁增城，后复迁中山，可见都和清初粤东反清复明运动有关。

花县后来出了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中山县诞降国父，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论时代背景，可谓一派同源。上代为反清复明之义民，后裔乃为民族运动之斗士，到了国父，遂卓然为群伦领袖，世纪伟人。

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

——读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存疑

孙甄陶

一、前　言

兴宁罗元一(香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旁征博引,资料甚丰。复得当代显要,如孙哲生、邹海滨、吴铁城、陈立夫诸先生为之撰序;而尤以国父哲嗣之孙哲生先生对其书所论述,颇为称许。宜乎出版后风行一时,而当代对此未经详细研究之学者,固亦不敢稍持异议矣。本文作者与罗教授为知交,其书面世后,尝蒙两次持赠。阅竟即觉可疑之点甚多;惟时值抗日,无暇及此,且反证一时亦不易汇集,遂将此事暂行搁置。国家多故,丧乱频仍,余亦不遑宁处,转瞬三四十年。岁月催人,修名不立,而老冉冉忽然已至矣!

窃念国父为国人所崇敬,其家世源流,似不宜任其含混不清。我今于此纵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足以推翻罗教授谓国父先世非系出东莞孙族而实系出紫金孙族之说,然至少尚能指出罗教授之说,亦非特有真凭实据足以证实国父先世确非源出东莞而是源出紫金。即此便足使后世研究国父家世源流者,增加若干意见不同之参考资料;由是或亦足使国父先代祖宗不至蒙李戴张冠之冤,即其争认为国父同族者经此一度澄清,当不复有"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尽带令。"之诮,为温飞卿者流所讪笑也。

---

* 据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3~4期,1981年。

二、罗教授谓国父上世非源出东莞孙族而是源出紫金孙族之理由

罗教授谓国父上世之在广东者，非源出东莞之孙族，而实源出于紫金忠坝公馆背之孙族。其自认为理由中最充分者，即以美人林百克氏(Paul Linbarger)所著《孙逸仙传记》(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书，所引国父口述孙氏家庙在东江公馆一语，为最有力证据。国父此语，其英文原文之一段，载在开智书局译本第一章《翠亨》，译成中文如下：

"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当他说到同志的时候，总是笑的。——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的；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说生在火奴鲁鲁，便可以得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几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

罗教授便就林百克氏所引国父口述家庙在东江一语考之，以为国父之先世居地，亦似不在东莞。何则？东莞为清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所谓'南番东顺'是也。虽其地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为县。如国父上世居地确在东莞，则以东莞一名之易使人明晓，即但称家庙在东莞，或东莞某一村足矣，何必复冠以东江一词乎？至上沙乡则更在东莞南部滨海之地，冠以东江，更不类矣。"云云。

罗教授既从林百克著《孙逸仙传记》所引国父口述家庙在"东

江公馆”一语，而得到上述论据，于是即持此论据以否定国父上世源出东莞之说。微论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其系出东莞。《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东莞县属）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亦谓其系出东莞。《越风》第二卷第一期，载叶溯中先生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列《孙公世系简表》，亦认其系出东莞。又《西南党务月刊》第二十六期，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亦称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而吴稚晖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会演讲《总理与中国革命》，亦称其先世从东莞搬到香山县，再移到翠亨村云云。凡此皆罗教授书中所曾引述，而俱谓其由于根据不健全之资料而未加详考，故一律予以否定。

罗教授既以国父先世源出东莞之说为非是，于是即以林百克氏所引国父口述家庙在“东江公馆”一语为根据，从东江流域访寻有名为“公馆”之地。结果在紫金县访寻得有地名“忠坝公馆背”者，今称“中心坝公馆背”，地在上下孙排之间。下孙排今无孙氏屋宇，盖已移为他族居地。上孙排今称“孙屋排”，其南有孙氏宗祠，与公馆背相接，即所谓“黄牛挨磨”祖祠也。此与国父对林百克氏所述家庙在公馆村之一事实，完全相合云云。

罗教授复查阅其所发现之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列十二世祖之琏昌公，与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之十二世祖连昌公，名字与世数皆甚相符，认为同属一人。琏昌之“琏”，虽视翠亨总理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载十二世祖连昌公之“连”，多一偏旁，然此类偏旁，或加或不加，为粤中命名与家谱著录之常例，绝非相异之二名。观该谱旧抄本之书增城作曾

城，知其抄手本非能文之士，其非伪作冒充之文籍，正亦在此。罗教授又云：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故在增城，未留若何明显痕迹，而其卒年与葬所，则已在涌口门村。忠坝孙氏族谱所以记云“移居曾城，于后未知”者，意即因此失去联络之故也云云。

国父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于记述翠亨孙氏世次，仅起自十二世祖连昌公，而连昌公以后十三世祖以至现代二十世祖，名讳班班可考。惟连昌公上代十一世祖以前之列祖列宗名讳及何时始迁入香山涌口门村之记载，则皆付阙如。紫金忠坝公馆背村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其十二世祖以前，从自闽入粤始祖友松公起至十二世祖琏昌公止，世代相传，名讳亦班班可考。惟十二世祖琏昌公以后，则又尽付阙如。故罗教授得以紫金忠坝孙氏之始祖友松公以至“移居曾城于后未知”之十二世祖琏昌公；以接驳中山翠亨孙氏之十三世祖迺千公，以迄于今之二十世祖，如移花接木然。遂使国父上世之在粤者，世系传统，历代相承，完整无缺。表面观之，此一接驳，宛然天衣无缝，诚似一新发现之杰作；而不知其亦无健全之资料为根据者也。

三、罗教授谓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之说为吾人所怀疑之理由

本文作者系出中山东镇沙边乡孙族，与左坡头孙族，翠亨孙族，近支虽叶散条分，而上世入粤始祖，则同为一人。由此一点，引起我辈对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之说，极为怀疑。而罗教授所提出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之最有力证据，仅凭藉林百克氏著《孙逸仙传记》所引述国父口述家庙在“东江公馆”一语。按此语在林著

《孙逸仙传记》中,其英语原文云: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

此语若译作中文,并假定以 Kung Kun 二字译作"东莞",则应是:

"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

如此全句文义,简单明了,更无须加以注释说明。若译作"公馆",则恐无人能了解到属东江水域之紫金县内"忠坝公馆背村",是即罗教授所简称之"东江公馆"也。而罗教授又云:

"……原文 Kung Kun 之 Kung,声母从 K,至东莞之'东',拼音如 Tung,声母从 T ,K 与 T 绝不相混。如别无资料得以证明林氏以 K 为 T,或以 T 误 K,则 Kung Kun 一名,绝非东莞英文拼译。……"(见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附录致孙院长答邓慕韩君书》)。

吾人以为林百克氏此传记原稿之 Kung 字,未必非 Tung 字,其 T 字误植 K 字,或属手民之误,而非林百克氏之误。此其一。"东莞"二字,英译为 Tung Kun,是译音。中国地名之英文译音者,有从国语而来,亦有从方言而来。中原及华北各地译名,其音多从国语。华南及东南沿海,则颇杂当地方言。例如汕头之英文译音为 Swatow,厦门之英文译音为 Amoy,尽皆从潮福方言略带讹误转音而成。亦犹 Canton 为广州之译名,其始乃由"广东"二字从广州方言说出,外人因不习听,讹误转音而成。或者当日国父与林百克氏对语时,林百克氏误听国父之发音,以 Tung 字为 Kung 字,亦未可知。此其二。中国地名之英译,有从音译,亦有从义译者。如东莞,则与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汉口等都市之英译,皆从音译者也。东江之英译为 East River,与珠江之英译为 Pearl River,黄河

之英译为 Yellow River，黄海之英译为 Yellow Sea，东海与南海之英译为 East Sea 与 South Sea，则皆从义译者也。大抵国父与林百克氏对话时，为使林百克氏对东莞在广东之地理位置了然于胸，故以属东江水域一语诠译之，不意罗教授反谓国父之先世居地似不在东莞。盖东莞为清代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虽其地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属县云云。吾人以为罗教授此说非也。按《辞源》(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江"条云：

"东江……在广东境，即古浪水，一名龙川水，珠江之东源也。出江西定南县南之九连山，西南流入广东境，至龙川县曰龙川江；又西南流，合新丰、城泗二江；至东莞县，合增江；西南流至波罗南海神庙前，合珠江；由虎门入三角江，注于南海。"

观此可知东莞县非止"为东江最下游所经"，如罗教授言；且实为东江主流之所经，其为东江属县，自应毫无疑问。然则国父对林百克氏所云："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 Kung Kun，属东江水域。"其 Kung Kun 二字，殆必为东莞矣乎？

抑国父对于东莞与东江之地理关系，了如指掌。在其所著《建国方略》内《实业计划，第三计划》、《第二部，改良广州水路系统》，《丁、东江》，第二段云："……自新塘上游约一英里之处，应凿一新水道直达东莞城，而以此悉联东江左边在东莞与新塘间之各支流为一。……"又在同计划《第二部，改良广州水路系统》内，并附第十四图与第十五图，图中所示东江主流，皆经东莞而后入海者，即此国父所谓："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 Kung Kun，属东江水域。"之 Kung Kun 两字，殆必指东莞而言，于此又可作一旁证矣。

国父上世源出东莞之说，如再寻出历史事实足资证明，则其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之说，自必不攻自破。今姑勿论国父上世是否

源出东莞,但罗教授谓其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之历史事实,亦非有确切证据,而属于臆测者甚多。兹择要一一列举如下:罗教授谓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氏重修族谱旧抄本所列之十二世祖琏昌公,与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之十二世祖连昌公,名字与世数皆甚相符,认为同属一人。吾人认为此说有不足置信之点六:琏昌与连昌之"琏"与"连"字各异,若必强同,则上述 Kung Kun 之 Kung 字,其第一个字母之"K"字,亦可强断其必为"T"字之误,而不必求确证也。此其一。琏昌公与连昌公,俱为十二世祖,世次相同一节,殊不足为奇。即如本文作者为中山第四区沙边村孙族,其世次为十八世,与现代翠亨孙族及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之世次,亦非不相符,大抵入粤后之孙族,其世次或皆约略相同也。此其二。罗教授谓:"国父十二世祖讳连昌公(附注:罗教授强将紫金孙族十二世祖琏昌公之'琏'字,改用'连'字,以自圆其假设臆测之说。)始自紫金忠坝,移居增城,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云云,兹据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记,仅言:"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如此而已。而罗教授谓其"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村。"此语若非假设,即属臆测。否则有何真凭实据,足资证明?复查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旧抄本所记,十一世祖共有四人,一讳道元公,未传;二讳琏盛公,未传;三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四讳琏桥公,移走他方未知。盖其地时值明清之际,战祸频仍,民多流徙,乃至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故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所载十二世诸族人,多明注"未传"。而琏昌公与琏桥公兄弟二人,则竟远离乡井,一则"移居曾城,于后未知";一则"移走他方未知"。可知当日二公流离情状之惨,其不为"老弱转乎沟壑"者几希,而尚能远走高飞至中山滨海之涌口门村,为国父中山县之始基祖乎?此其三。纵退一步言,紫金忠坝孙族之琏昌公,果

另有奇迹出现，使其能从曾城远至中山涌口门村，开基立业，成为中山翠亨孙族之始基祖矣。顾何以于其能开基立业之后，不能与故乡忠坝族人通声气，取得联系；乃竟任令消息隔绝，使忠坝族人，只知其“移居曾城，于后未知”乎？紫金县为客家籍人地区，客籍人士，重乡族之情，敦团结之谊。琏昌公乃客籍人，倘能作中山翠亨孙族之始基祖，岂有不怀念故乡客家宗族，使其子孙知木本水源之有自；而翠亨孙族之源出紫金忠坝，如琏昌公之祖讳宗荣，父讳鼎标，其兄若弟讳琏盛与琏桥，即不祀之于祖祠，亦当列之于家谱。否则最简略亦当叙明琏昌公系出紫金忠坝公馆背村孙族，其父乃讳鼎标公者。今竟全无记载，使人对其来自紫金忠坝，毫无迹象可寻。数典忘祖，岂一始基祖及其嗣续所应忽略至此者乎？此其四。若更以常理言之，国父生前，未尝言其上世源出客籍。其革命党同志中，客籍闻人不少，其著者如廖仲恺、邹鲁、古应芬、谢英伯、姚雨平、谢良牧诸先辈，皆属客籍，其中亦有仅先世系出客籍者，无不以客人自居；未闻有谓国父亦客籍中人；而在粤各客籍社团，更从未闻有以国父同属客籍而特予招待或开会欢迎莅临指导者。反之，只闻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国父世系原出于其乡族而后迁往中山者。然则国父先世似非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于情于理，或较可信欤！此其五。琏昌公自紫金忠坝公馆背村流移至曾城，其时客籍人士之流寓曾城者正多，若迫于生事，似应投向曾城客人聚居之地区求助，为何舍近图远，竟至中山沿海一陌生地区之涌口门村，后且竟成为国父在中山县之始基祖乎？似又非人情之所近也。此其六。

客籍人士，为中华民族中之一优秀种族，才略出众，耀于史册者，代有其人。民国以来，文治武功，脍炙人口者，尤更仆难数。倘有极可靠之历史资料，能证明中山翠亨孙族国父上世，果属客人，

则国父与客籍先贤之光荣,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即凡属中山孙族,其远祖与翠亨孙族同气连枝者,固亦与有荣焉矣!惟研讨谱牒,首贵其史料之真,在真史料尚未能发现前,只有存疑待证,绝不宜牵强附会,以构成一种迹近冒滥顶替之谱牒。若罗教授仅藉清初广东濒海迁界所影响于国父上世族谱混淆颠倒脱漏之缺憾,而强以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十二世祖琏昌公及其上世自入粤始祖以至十一世祖全部移充补偿。又藉紫金义士钟丁先于明末清初,率众抗清,屯重兵于忠坝凹口,战祸所及,忠坝孙氏受其影响,后裔离散。至十二世祖琏盛、琏昌、琏桥三人,或子嗣未传,或移走他方,于后未知之情况之下,遂硬指琏昌即中山翠亨孙族十二世祖之连昌,而以连昌公之后,即作为紫金忠坝孙氏十二世祖琏昌公之后。遂使国父世系,成为一个移花接木之世系,以人工造成,如植物之"驳枝"者然。凡此皆由于未尝取得真确健全史料之支持,自难遽视为可信。此吾人对于罗教授虽费十易寒暑之悠长时间所研求,而获致国父家世源流之结论,仍不能无疑,故亦不敢苟同者也。

罗教授言:"今按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坡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坡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能以片言肯定。考广东各地孙氏,多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例如中山县小榄孙氏,即不以常德公子孙同派。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爰及有明,三卫兵移居小榄,永奇与弟永源,同隶后卫陈宪旗下,遂家焉。分三房,现历二十四代,丁口二百有奇。'可知即就中山县之孙氏而论,亦派别不一,未可悉以常德公子孙目之也。"(见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三、国父上世与左坡头孙氏同源说之非是》,末段。)云云。上述罗教授所言,谓:"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坡头孙氏为同一

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垅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能以片言肯定。”玩其“既未必”与“亦未必”，“是否”与“亦未能”等语气，可知其尚未敢断然否定国父上世与左垅头孙氏为同一本源及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更不敢以片言肯定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垅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同属一人。于此足觇罗教授以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氏之论据，自身尚立足不稳也。

四、中山各乡孙族之入粤始祖似同为一人

上述罗教授云：“考广东各地孙氏，多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事实或然。惟谓“即就中山县之孙氏而论，亦派别不一”；则又似未尽然。曩闻之本乡父老言，吾族之在粤始祖，讳恒所，仕南宋为谏议大夫，卒葬广州白云山。其后裔子孙，分入东莞、中山、新会三县定居。每当春秋佳日，如清明重阳等节，三县裔孙，按年轮流赴广州白云山省墓。即在三年之内，每一年由东莞县子孙前往一次，中山县及新会县子孙，亦各前往一次。舟车转运，往复频繁，此礼至民国卅七年未尝或废。先君（讳璞，字仲瑛）尝语余，民国初年，中山孙族赴广州省墓，哲生先生曾应邀参加。兹复就余所知，民国三十六、七年间，中山孙族赴广州省墓，西村士敏土厂厂长孙满（德彰公嫡孙，国父侄孙）与焉。并尝借出厂车数辆以助交通。此外，余又尝从本乡昆仲借阅沙边孙族不完整之家谱残本，首称：

“第一世太祖宋将仕郎，讳天球，字汝球，号恒所，孙公，先为南雄府保昌县沙水里人。仕理宗朝，为广州府路官，因家居于羊城华宁巷焉。公生于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岁次乙卯四月十三日辰时，终

于景定四年,岁次甲子十一月二十日未时,享寿七十岁。妣氏梁,生于庆元丁巳三年六月十三日酉时,终于咸淳乙丑元年三月初四日卯时,享寿六十九岁。生二子,长希文,次希武。公与氏合葬于省白云土名后厄山第三臂,坐申寅兼坤艮之原。”

按此家谱所记载,与曩所闻于本乡父老者,尚无大异。然则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所载,小榄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与吾族来自南雄之始祖恒所公,未必非世系相同,可见中山孙氏,固未必如罗教授所言,派别不一也。惟上述余所见闻,尚非中山各乡孙族来源极健全之资料;然而中山、新会、东莞三县孙族递年轮值前赴广州白云山扫墓,其规模之大,阵容之盛,谓非全无族谱之真实资料为根据而能历年举办不绝者,其谁信之!

五、研讨国父家世源流要不存偏见乃可得正确之结论

如上所述,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之论据,除资料欠健全外,并颇有偏见。既不足以肯定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亦不足以否定国父上世源出东莞孙族。然则国父上世之来源,自尚有留待吾人考求之余地。故凡右源出紫金孙族之说者,似应研究何能证明中山翠亨孙族十二世祖连昌公即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十一世祖鼎标公之次子,而其长子即琏盛,三子即琏桥。又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十二世祖之琏昌公,既迁居增城,为何又舍增城而远走至中山涌口门村,亦应细寻其故,而求得其史迹所在以资印证,庶几国父家世源流,乃得其真。非然者人若视同张冠李戴,只不过贻考据失实之讥;若视同以吕易嬴,则将使其子孙,永感难堪矣。至其主源出东莞孙族者,似亦应查明中山翠亨孙族十二世祖连昌公之先

代十一世祖为谁，是否即瑞英公；但瑞英公于乾隆时始由外地迁入，世数早于连昌公，而年代则在连昌公之后。为何世数与年代，如此先后倒置若是；此则亟待吾人详加考核正误者也。

据罗著引述《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其第五世祖礼赞公，生二子禘儿、禘宗。禘儿，中山四区左坡头始祖；禘宗，中山四区涌口乡始祖。由涌口再支分六区翠亨乡，而生十二世祖连昌。但此月刊同期，又载东莞县长邓庆史关于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原呈有云：

“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

同期月刊，又载《孙总理家谱》序云：

“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子因马贼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蔺居住，建造祖祠。”

观上文罗著所引述国父上世之史料，如东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于其《总理世系图》，已指明第五世祖礼赞公生二子，即禘儿与禘宗。禘宗为中山四区涌口乡始祖，由涌口再支分六区翠亨乡而生十二世祖连昌，虽然东莞县长邓庆史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原呈，谓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等语。但《孙总理家谱序》则竟谓礼赞公已从东莞迁来涌口村

居住。妣为莫氏太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乐南即禘宗，虽在上沙孙氏宗祠未见其牌位，要不能谓非涌口村孙氏始祖。何况在涌口村尚有乐千、乐南立石之莫氏母坟墓遗留，更足使禘宗确为中山四区涌口村孙族始祖之有力证据。至于罗教授谓："自常德公至禘儿、禘宗，据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下距第十二世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孙可知矣。"云云。吾人认为罗教授所指出之罅漏，应予填补。填补之方，应从东莞县上沙乡及员头山乡、中山县涌口村、左坡头村、迳仔蓢村及翠亨村各孙氏祖祠详细检阅其族谱与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祖先牌位，以及其他收藏文件，当必有所获而足资补充。乃罗教授不此之图，其最关重要之涌口村，究竟曾否经过调查，迄未提及；遂遽断定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硬派紫金县忠坝公馆背村流寓增城而名字不尽相同之琏昌公以补缺。实则琏昌公自从紫金移居增城以后，生事如何，曾否到过香山县（即今之中山县），乃至到过涌口村，殊成疑问。而罗教授竟欲使之成为翠亨孙族之始迁祖，多见其"强为牵合"，"空疏无谓"也。

查孙绳武所列世系图，自常德公至十二世连昌公，其间所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世。大抵其时适当明季东南沿海不靖及明末清初郑成功据闽、粤沿海各地抗清，而清廷亦有迁界之狠毒殃民政策以为对付。以致粤东濒海居民，流离失所，庐舍为墟，祖祠为官兵毁坏者所在多有。凡此惨状，随处可见。人民救死不暇，自难顾及族谱之完整保存。是故中山翠亨孙氏族谱之有罅漏，盖时势与环境之险恶所致。且应不仅翠亨孙氏一族为然，即中山县孙氏各族，如左坡头、涌口、迳仔蓢、沙边各村孙族，殆莫不如是。甚至粤东沿岸距海五十里内之各乡各姓族谱，其间亦必有不少缺去数代之罅漏，

一如上述中山县涌口村及翠亨村孙族者，岂可即以此便遽决定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乎？故凡主国父上世源出东莞孙族者，似应搜集其源出东莞之真材实料或确切证据，始足以澈底推翻罗教授谓其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之说。此种资料与证据之搜集，第一除东莞员头山乡、上沙乡、中山涌口村、左坡头村、迳仔蓢村、翠亨本村等处，各孙氏祖祠、须详细检阅其族谱，列祖列宗生殁纪念簿、祖先牌位，以及其他收藏文件，已如上述者外；次则宜从中山县沙边村孙族、小榄孙族，乃至新会县各孙族，各宗祠、各祖先牌位、族谱、冢墓等处入手，作详细之调查，亦当必有所获。惟我中国大陆粤东沿海各地，自中共统治后，今非昔比。宗祠多已改作公社，祖先牌位及族谱，已遭毁灭，荡然无存。坟茔冢墓，其能不被破坏与发掘者，亦极有限。[①] 因此今日惟有退而思其次，向中华民国台湾及海外各地规模较大之图书馆及藏书家借阅各种地方志，如广东通志、广州府志、东莞县志、中山县志、新会县志，乃至南海、番禺、顺德、增城、惠阳、博罗、高要等县县志，详加查考，或可于当日满清政府迁界虐民之资料，发现更多；而孙族受祸之惨酷，以致由东莞迁入香山，一迁再迁、三迁，何为迁到如此频繁，或亦可得其真相，并得以证明国父上世确由东莞迁入中山者也。

惟是各县县志中，其有甚不可靠者，厥为《香山县志续编》。是编倡修于民国乙卯年（即民国四年，公历一九一五年），书成于民国癸亥年（即民国十二年，公历一九二三年）冬月。香山知县六合厉式金延邑绅汪文炳、张丕基为总纂，林郁华、黄应枢、李麟昌、郑鼐、黄佛颐为分纂。修志在民国时代，而其书不以民国纪元。大抵受命编纂及董其事者皆满清遗老。书中于舆地卷内新增“氏族”一

① 编者注：孙说不确，翠亨孙氏祖墓至今大多保存完好。

门,其大乡巨姓,如义门、南湖郑族、长洲黄族、隆镇高族、刘族、李族等,皆丁口逾万数,故其族谱概略,俱得纪载于此一"氏族"门中,固无论矣。惟其中一族丁口,数仅十余人乃至数人者,亦颇有纪载。例如榄镇"曹族,始祖德章,原籍三水,迁居顺德龙江乡,后又迁居小榄,现历四代,丁口四人"。"凌族始祖炳林,由番禺深井乡迁居小榄,现历三代,丁口八人"。"大环林族,十二世祖绍芬,由柏山迁来,现历十五代,丁口数人"。"大环邓族,十四世祖镇东,由牛起湾迁来,现历二十一代,丁口数人"。"涌口黎族,始祖从广,由西桠乡迁来,其后族姓支分,……现涌口黎族,丁口三十余人"。"左坡头袁族祖义华,由小榄迁居南蓢墟,……自廷英徙左坡头住,分东西两堡,现历八代,丁口六十余人"。凡此氏族,虽式微至此,而续志氏族门中,仍俱有纪载。查《中山县志续编》户口门宣统二年本邑户数表所列各区各段各乡正户总数,最多者如:第一区第三段西门外,正户总数为四千三百四十一;第二区第十段象角乡,为二千二百三十零;第三区第三段车公庙坊,为三千七百六十九;第四区第卅二段张家边乡,为一千三百四十四;第五区第一段平岚乡,为一千九百八十七;第六区第八段官塘乡,为一千二百七十三;第七区第一段前山,为一千二百八十四;第八区第十六段南水三灶,为三千四百七十六;第九区第二十二段黄角乡,为三千二百九十九。其最少者如:第一区第十八段龙塘乡,为五十四;第十九段梅坪乡,为五十九;第四区第十五段长命水乡,为三十二;第十四段龙贡乡,为四十零;第五十九段稿荻乡,为三十一;第二十七段西陂乡,为四十七;第五十三段湖头汕乡,为四十八;第五十五段井头山乡,为四十三;第五区第十七段黄竹蓢乡,为六十九;第二十二段獭山乡,为六十六。其中户口最少之乡,多属第四区;而中山县孙族亦以居第四区者为多。惟孙族所居各乡,则非正户总数最少者。

如第四区第六十二段左坡头乡，正户总数为七百二十四；第六十三段涌口乡，正户总数为四百六十七；户数已逾中乡，且近大乡矣。即第四区第二十五段之沙边乡，正户总数为三百七十三；人口比率，孙族占绝大多数。第四区第七十六段翠亨乡，正户总数为一百四十七；与全县各区各乡比较，尚非甚小之乡。迳仔蓢想亦非正户总数极少之乡，而其乡名则竟为本表所漏列。夫孙族之在中山县所居各乡，固非丁口极少之乡；而其在左坡头、涌口门、沙边、翠亨，乃至迳仔蓢等乡散居各族，亦非极式微之族（迳仔蓢乡孙族蕃殖情况，现虽未确知；但据《孙总理家谱序》所言，则迳仔蓢孙族，固早已建有祖祠，似此自非极式微之族也）；奈何本县志续编之“氏族”门，对于孙族除在榄镇者尚有纪载外，其余散处各乡者，不独全无一字提及；甚至孙族所居之乡，如“沙边”、“翠亨”、“迳仔蓢”，其乡名亦付缺如。即此可见《香山县志续编》纂辑之疏漏，其纪实固不足使人置信，其资料抑更无足以供研究国父家世源流者之采择与参考，明矣！

六、总结语

胡汉民先生尝云：“写自传，是一种历史的纪述，每不免讳、饰、诬、枉。如数年来（作者按：大约是指民国二十二年以前数年而言。）出版的关于中国国民党史作品，大半便犯了这样的弊病。”所谓讳、饰、诬、枉四字，任何一字施之于自传，则自传失其真；施之于历史，则历史失其真；施之于家乘族谱，则家乘族谱亦失其真。家乘族谱者，一家一族之历史也。罗教授所著之《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乃研讨与纪述国父孙中山先生家乘族谱之作。其撰述用意，至深且善；特其见解不免有所偏蔽，遂使其所撰写国父之家族历史，不能使人无疑有如上述。于是讳、饰、诬、枉四字之中，必有所

犯,以此致失其真。而与著者撰写此书之原意,大相迳庭矣。余与罗教授为知交,自读其所赠书后,疑莫能释,顾又不得其当以示有所异同;否则一得之愚,定蒙采纳。而《国父家世源流考》,再版亦必改观。今罗教授已悲宿草,余于此念,惟抱无穷之恨而已!

国父孙中山先生政治道德之崇高,政治人格之伟大,当代人物无出其右,不独在中国为千古一人。乃其家族历史,至今犹未能发现其全部真实性。其第七世祖至十二世祖究为何人,尚成问题而待考证。此我阐扬中华文化之负责者及研究中国近代史与谱牒专家所宜急起直追,以完成其未了之重要任务也。抑余犹有不能已于言者:罗教授此书,早经国父哲嗣孙哲生先生以及邹海滨、吴铁城、陈立夫诸先生为之撰序,复经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送请吴稚晖先生审查,并通过给奖。于是罗教授遂有"国内外言国父家世史迹者,遂多以拙书为主焉。"之语,意者其所主国父上世源出紫金而非源出东莞之说,至此可成定案矣!殊不知罗教授书中所论,满纸假定臆测之辞,绝未能提出确证以支持其说。吾人若不及早将国父家世源流考定,日久积非成是,则国父家族历史,所受讳、饰、诬、枉之害,创巨痛深矣!

所望我中华民国国史馆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有关当局,即予重视此一问题,成立小组研究解决,使国父家世源流,从此不失其真。是则吾人此举在精神上所以对国父表示崇功报德者,当较在物质上建堂造像勒碑刻铭之纪念为更有意义也。

本篇参考书:

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孙文著:《建国方略》,上海民智书局发行。
厉式金修:《香山县志续编》,台北市中山同乡会印行。

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辩正问题*

祝秀侠

一、引　言

《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三、四两期曾发表旅美报人(《少年中国晨报》主笔)孙甄陶兄《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一长文,为对罗香林撰《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谓国父家世源自紫金县忠坝公馆背提出存疑辩正。极为海内外国人重视。盖近数十年来,自罗著发表,对国父家族源出紫金客家之说几成定论。后学史家,未敢轻持异议,一以罗氏为史家名家,(亦朱希祖之婿)又以书首序言,均为党国勋耆所撰,尤以哲生先生为国父哲嗣,一经品题,尚有何说。(实则吴铁老一序,当年笔者隶其幕下,原瞩代为执笔,后香林以出版急迫即以自撰序文请铁老签名。哲公一序,亦曾在十年前于哲公从美返台时询及,亦云系由香林自拟稿送签付排。)甄陶兄此文认为罗著证据不足,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与紫金县忠坝公馆背孙氏族谱琏昌公合为一人,有移花接木之嫌,诚为罗著后提出异议之有力辩正。甄陶孙家亦由中原南迁,不仅与国父谊切宗亲,甄陶先德仲瑛先生(璞)亦隶同盟会籍,为南社词人,为中山县革命前辈。甄陶兄对罗著存疑,固非率尔操觚者。去年五月间旅美侨选立法委员潘朝英兄返国参加例会,道及甄陶兄的致意,并谢我曾将其文转载于广东同乡会出版之《广东文献季刊》上。其时台北正召开中

---

* 据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1982年11月。

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中外史学界济济一堂由党史会主委秦孝仪先生主其事，但会中似乎对国父思想三民主义虽各有广泛的研讨，而对国父家族源流并无提及，朝英兄认为国父家世源流不可不求澄清，以昭永久，共商宜请示国史馆长黄季陆先生并约孙家在台后人而谙熟孙族家事掌存孙家族谱之孙满兄叙谈，孙满为德彰公之嫡孙，其父昌亦追随国父，于民六年奉命解押军饷于黄埔海面因公失足溺水殉职。某日，朝英约定黄馆长、孙满及笔者在国宾大饭店二楼茗叙，季老瞩孙满取出家藏孙氏族谱残本说明一切，叙后由笔者与侯中一兄(侯兄曾在南京立法院哲公任院长时追随为交际科长)纪录孙满所述如下：

二、孙满先生口述孙氏族谱所载家世源流

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旁征博引，资料丰富，惟认为十二世祖连昌公旧居紫金县忠坝公馆背，后迁徙增城，再迁香山云云，则证据不足，迹近虚构。当年邓慕韩先生(中央党部史料编纂会广州办事处主任)读后，不以为然，乃撰《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曾记民国廿三年我陪同邓主任慕韩赴东莞上沙乡员头山迳仔蓢等地视察该乡孙氏宗祠，邀请其族家及干事取出族谱，翻阅祖先名讳，果有十二世祖连昌公名与翠亨孙氏家谱相符，因之邓先生当时致函西南执行部，证实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是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再迁翠亨的。而且偕同往翠亨村坟地察看时，确有上代金塔(广东对骨灰之称谓)十余个。而先高祖敬贤公及先曾祖达成公之坟墓，则地势较高风水更佳耳。

忆吴稚晖老先生在民廿九年总理诞辰纪念会上演讲，谓：总理的老祖宗，应上溯到北宋时代的枢密使孙固，到元朝末年，有一个

杭州刺史孙常德，是孙固的十五代孙，这位常德先生，到了元亡明初，因不事二主，便从杭州远远迁徙到广东东莞隐居起来，他的子孙一直住下来，到了他的八代孙，（孙固的二十三代孙）又从东莞搬去香山县涌口，再迁翠亨村。稚老的说明国父先世自东莞迁至香山非常清楚。国父自己亦曾自述其祖祠原在东江之 Kung Kun 村，迁居中山仅数代耳（见美人林百克所撰《孙逸仙传记》，而罗香林认为这个英文村名，不是东莞，千方百计托其友人代为调查，发现紫金忠坝公馆背，有一孙氏旧族谱中，记载有十二世祖琏昌公，遂硬指与我十二世祖连昌为同一人，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竟将“连”“琏”认同，至为牵强！

再一证据，我家妙茜老姑太所藏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所记载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以至先高祖敬贤公各名讳，生卒年月日均一一载明，但在罗香林所提出的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谱中，并无十一世祖十世祖名讳的记载，而十二世祖名“琏昌”的连字有玉字旁，显然不同。妙茜老太为国父胞姊，所藏该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用墨笔写于大红色纸上，我曾抄录一副本，为我孙家唯一家传信史。

我在故乡时，曾听过妙茜老太说这样的一段家世故事：祖父敬贤公以耕读发家，很有钱财，后来因为相信风水，各处找寻山坡佳地，准备迁葬上代祖宗坟墓，所费不赀。又因争山地而涉讼，变卖田产，入不敷出，家道遂以中落。至父亲达成公，亦好风水，终年供养一位来自嘉应州的堪舆先生。各祖先坟墓，都由父亲寻得风水最好之地改葬。敬贤公之墓葬在翠亨村北犁头山南峰，墓门可远眺金星港外诸岛屿，气象壮阔，风景佳幽，地师谓葬后十年，必生伟人。咸丰四年安葬，至同治五年胞弟德明诞生（国父）相距果然只有十年多，而你祖父（德彰公）后来在外洋开垦山林农场，从事牧

畜,果然亦成巨富,岂非富贵都应验了吗。在我家孙家,尔应了解此事云云。

关于曾祖达成公迁葬祖先的事迹,尚有文略记云:"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故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道遥远往来艰辛之故,是以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

三、中共伪中山大学[①] 讲师谭彼岸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新证》对罗著提出辩正

一九六五年伪中山大学讲师谭彼岸(中山县人)在学术研究第三期上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根据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对中山家世源流问题提出新的论证。谭君根据一九五一年中山县土地改革中发现旧香山县孙氏祖尝旧租约四张和管公尝旧帐簿一个,对罗香林的说法,提出辨伪。(一)孙中山先生父亲达成公兄弟批垦其十世祖瑞英公迳仔蓢山浦的合约,证明瑞英公迁居迳仔蓢的记载,确为事实,从而否定罗香林谓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与十一世祖瑞英公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迁去的说法。(二)从乾隆八年香山县孙景梅等卖田契约的内容分析,证明翠亨村孙氏族谱的世系及世数无误,十一世祖瑞英必然是连昌的父亲,由此证明国父的上代早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县,所谓紫金县忠坝公馆背琏昌为翠亨村始祖之说不能成立。(三)除连昌和琏昌类似外,翠亨谱十二世祖有八房(连富、连德、连

① 编者注:原文如此。但是,我们并不接受此提法。

昌、表腾、廷尊、□□、表国、表生)。紫金忠坝公馆族谱所列只有四房,(道元、琏盛、琏昌、琏桥)。翠亨谱十二世三个人名均用"连",而忠坝公馆谱三个人名均用"琏",此琏昌非"连昌",罗氏强合为一人,切去翠亨谱十二世祖以上所有列祖,而以忠坝公馆十一世祖接上去,遂谓瑞英公与连昌非父子关系,构成移花接木的中山世系。

兹将谭文从原简体字复原摘录如下:"一九五一年广东中山县在土地改革中,发现旧香山县孙氏祖尝田契四张和管公尝旧帐簿一个,这四张契约包括乾隆八年孙梅景等卖田契一张,同治二年孙达成兄弟二人开荒合约一张。同治三年,孙达成兄弟三人开荒合约复本两张,原归翠亨村中山故陈列馆保管,因同治三年的合约有两份,该馆把其中一张赠给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堂,其余三张,去年由中大历史系从中山县借回来,感谢他们将这些资料提供我写成这篇文章。

"这四张契约和帐簿的发现,为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情况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使我们充分证据指出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关于国父先世自紫金迁来说不能成立,同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资料。罗氏考证国父家世自紫金迁出,这个大胆假设,和一九四一年在紫金县所发现光绪二年重修孙氏族谱所载: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遂牵合武断说:十二世祖连昌与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皆一一相合,而年代相符。按琏昌居增城,本应追查增城孙氏族谱,以求解决这个"未知",因为二者世数虽然相同,但琏昌与连昌,字形小有差异是一问题,更重要"连昌"世居香山涌口村,而琏昌迁居增城以后未知,是否定居或迁香山县,罗亦未知,可是又凭琏连字音大体相同,就推翻翠亨孙氏谱全部世系,否定孙中山十一世祖瑞英的记载,谓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断言瑞英迁迳仔蓢一事,实为录自迳仔蓢孙氏族谱,

又指出翠亨村孙氏族谱除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外，似皆为迳自别传抄入，非其固有世系。罗氏的逻辑是：翠亨村孙氏族谱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外为真，十一世祖以至始祖常德公为伪，同一族谱世系有真有伪，这是不合传统的谱乘的习惯，特别在相联的两代而有一真一伪更不会有这样的糊涂事！

“根据新发现的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孙达成兄弟批垦其十一世祖瑞英迳仔蓢山浦的合同，证明瑞英迁居迳仔蓢的记载确是事实，现再把两个地区的孙氏族谱中的十二世祖对照一下：

翠亨孙氏族谱：连富、连德、连昌、表腾、廷尊、□□、表国、表生。——八房。

紫金忠坝孙氏族谱：道元、琏盛、琏昌、琏桥。——四房。

“由此可见翠亨谱十二世祖有八房，而紫金忠坝谱只有四房。罗氏强合琏昌连昌为一人，便切去翠亨谱十二世祖以上列祖，而把紫金忠坝谱十一世祖接上，构成有尾无头，移花接木的孙中山世系。

“古代汉人重谱牒，宗法为重。十口相传的近缘世系，不会有误。如果凭一条不可靠的材料妄图推翻孙中山家世源流，另选一套，这是毫无意义的。

“现更利用新资料，提出可无反驳的证据以辨罗说之伪，兹抄录乾隆八年香山县孙梅景等卖田契如下：

“立卖田人孙梅景、梅占、云灿，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愿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依口酬还时价银壹拾陆两正。四家允肯，五面言定就日立契期，银一色在众交足。梅（景）云（灿）二人亲手接回应用，税现在本户孙通办纳。立契之日，交孙廷尊迥千批耕管业，不干众人之事。此田明买明卖，

不是债利准拆并非信写等情……恐口无凭,立明卖契写照。乾隆八年十二月拾柒日立卖契孙梅景梅占云灿等乾隆九年七月十二日纳税讫,见银作中人谭恒玉(押)。"

"原件书写四至,年月处有汉满文方形朱印及香山县字号骑缝和朱印。据翠亨村孙氏族谱,知道契上的容窝为孙中山的七世祖,葬涌口村,廷尊为孙中山的从十二世祖,是连昌的胞弟,迥千为孙中山的直系十三世祖,田契的发现,证明翠亨孙氏族谱的世系及世数无误。容窝为廷尊迥千的七世祖,在明嘉靖已迁居涌口村,十一世瑞英必然是连昌廷尊的父亲,孙中山的上代早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县大字都,紫金忠坝公馆琏昌为翠亨村始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总之,根据家族口传及族谱记载,再证之旧契约,足以充分推翻罗香林的考证,把孙中山家世还其本来面目。"

五[①]、关于国父家世文献史料亟应认真整理以成信史

由于国父家世源流考证问题,使我们联想到国父年谱传记等问题,至今迄无一本正确完整的传谱,党史机构出版的年谱长编,多年以来,仍未能成为修订确定的正史,近年朝野举行过几次现代史座谈会,也邀请了许多中外史学家座谈研究,谈及并提出许多民国史研究所遭遇的困难与未来发展的方向。这都是需要史料主管机构和全体史学研究者的努力的。

且舍民国史不谈,单就国父生平及其家世文献而言,应有丰富的史料珍藏于史料主管机构,何以至今仍未能整理出一本正史初

① 编者注:原文如此。实应为"四"。

稿出来，据史学家吴相湘先生言，大陆近年正积极编辑民国史，也曾刊行《孙中山年谱》，且已由华盛顿中国资料中心复印发行，于篇首加一英文引言说明，谓大陆已将中山先生的生平研究列为最高优先（见本刊三十七卷一期吴氏《国父年谱要认真改编》文一）。中共对国父生平研究及篡改民国史当别有用心[①]，可置不论，但我们要认真完成国父家世、年谱、传记的工作，却是每一个中国炎黄子孙所切望。我十分赞同吴相湘先生的话："至盼国史馆及党史会迅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立即开始搜集研究新史料，国父年谱必须如此彻底认真，才能将孙先生平凡的伟大呈现于国民及世人之前。"

① 编者注：原文如此。我们并不接受此说法。

孙中山先生家世辩争平议*

钟正君

史家考证几种争议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上世究竟是从江西直接南迁广州府属的东莞、中山？抑从江西东迁福建汀州，再南迁广东嘉应州，又再南迁增城、中山？是国人争论而有待继续探考的问题。国父在世时，此问题并未有人注意，国父去世之后，中央着手编撰国父年谱初稿，时值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姓，争认国父上世系由其乡迁出，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党国元老吴敬恒以及胡去非、邓慕韩诸先生，对此均有论述，但互有参差，意见不一；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乃就诸人所说，加以综合研究，并就有关各地，广事征访，探求事迹，深入研究，穷十年之血汗心力，于民国三十一年秋发表其研考结果之《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付梓问世。说明国父上世系由江西宁都迁福建汀州河田，再迁广东长乐琴江都，即今紫金忠坝，又再迁增城、中山。此说一出，竟引起邓慕韩先生的不悦，对罗肆意谩骂，并发表《〈国父家世源流〉正误》一文，冀以推翻罗说，并诉之国父哲嗣孙科先生，希望支持其说，孙科先生未予采信。民国六十年，孙科先生手撰《八十自述》，将罗香林先生考出之世系冠于篇首（《八十自述》是孙科先生自己动笔，非他人代撰。手稿经由钟天心先生亲送国父纪念馆珍存），至此国父家世源流问题，应属尘埃落定；惟自

---

* 据台北《中外杂志》第34卷第2期，1983年8月。

孙科先生及罗香林先生先后谢世之后，又有中山孙甄陶先生重提异议，番禺祝秀侠先生亦有文提出意见，研讨《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及《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辩证问题》，两文主旨，均在谋推翻罗说，孙甄陶先生说罗牵强附会，使国父世系成为一个移花接木之世系，秀侠先生文拥护其说，认系罗著发表后，提出异议之有力辩证。兹将两文所提，加以研究分析，籍以就正高明。

对孙甄陶文的研释

一、美人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国父口述家世，是罗香林先生研究本问题的线索，也是确定国父上代由东江公馆村迁出来的根据，关系非常重大，该传内记国父口述原文为“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 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依原文直译，应该是：“翠亨诚然是我与最近的几代祖先出生的乡村，但我们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家屋及祠堂，则在东江的公馆村。”孙甄陶先生文亦首先提出此点来，欲图推翻罗说，他的理由第一是：假定 Kung Kun 为“东莞”而非“公馆”，Kung 字头一个字母为 T 误 K，系手民之误。实则 K 与 T 字形不相类，误植之可能性至微，罗著已有详说。第二他说东莞亦属东江，且强调为东江主流所经，其为东江属县，自应毫无疑问。不错，东江下游是经过东莞县北，不过东莞地域已在珠江三角洲内，县境大部份在珠江流域，南、番、东、顺各县境内，均不少通入珠江的港汊，密如蛛网，大概就是珠江得名的由来，甄陶先生为了使国父的说话尽量适合他的意想的要求，乃将译

文颠倒并添加“水域”字样为:“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在原文中没有“水域”字样,可能甄陶先生明知东莞系东江水域县份,县北虽为东江下游所经,但东江为构成珠江三大主流之一,愈在下游,愈是珠江范畴,故变更国父说话语气,添加“水域”字样,导人入迷。至其举国父实业计划,谓国父对东江与东莞之关系了如指掌,此亦不能说其上祖即由东莞迁出,盖其对东方大港与北方大港之河汊亦了如指掌也。

东莞、中山两县,系隔水相望之比邻县份,如果国父的祖先是从东莞迁出,以国父语言文字之简明扼要,只要说从东莞某乡村迁来便可,绝不会再提“在东江”字样那样衍赘;惟有距离中山较为遥远之紫金,才有指明方向在东江之必要。又东江源出赣南,经和平、龙川、河源、紫金、惠阳、博罗、东莞等县,汇珠江入海,在博罗以上直至赣南,均为客家人聚居地域,又紧靠纯客人居住的嘉应州,所属五华、兴宁等县人士要赴广州,均经东江搭船顺流直下,广州市中由东江来的人,绝大部份是客家人,可以说“东江人”就是代表“客家人”。一般来说,言东江绝不包括广州府基本县的东莞。所以国父特别提到的“东江”,必然是指客家地区无疑。又“东江”一词,虽是河流,也带点“方向”的意思,所以东江所指,不单东江沿河各县,即连嘉应州所属各县亦包括在内。

是否客家人的探讨

二、甄陶先生对琏昌、连昌罗说同属一人之六点质疑评释:

(一)“琏”字与“连”字各异 一般中国人均信“玉”能避邪招福,故常佩带玉器,名字亦多加上玉旁,琏字一般字典辞书注释多为:瑚琏为上古祭器,同连字。所以罗说为是。

(二)世次相同不足为奇 名字、世次同为康熙时人,东江公馆村与紫金公馆背村,及时代背景五者均同,则难能有此巧合,足为奇矣。

(三)流离状惨,琏昌公难免已转死沟壑 增城在清初为盗匪渊薮,居民多弃田徙避,康熙时寇患渐平,乃引致英德、紫金等县人前来垦殖,琏昌公亦离乡前往。紫金距增城不过二三百里,路途并非遥远艰难,一个乡下壮男,绝不致脆弱到转死沟壑。

(四)连昌公到中山涌口开基后,为何不与紫金忠坝族人联络 连昌公到中山涌口,是定居,说"开基"似太严重。他之未与忠坝族人连络,第一、可能因与父兄参与抗清义师失败,为避祸而离乡,自未便将行踪暴露。第二、因其兄琏盛未传,其弟琏桥亦远走他乡,故乡已无至亲之人。第三、连昌公只身到中山陌生地区,忙于立身维生,非已发财致富,又非贵显光荣可夸耀乡里,自无与乡人连络兴致。第四、如连昌公读书无多,写信不易,加上当时邮传不便,自难与故乡连络。第五、鼎标公系抗清著名人物,紫金忠坝为义民抗清大本营、根据地,为免招祸,自不便列之家谱祀之祠庙。

(五)国父未尝言其上世源出客籍。客家人自中原辗转南迁,到每一地均为后至,常受当地先至者之忌视,广东在清末民初,便有多次广府人排客风波,所以客家人到广东省会的广州市,多不言自己是客人;又洪秀全率客家子弟奋起革命,客人被清廷视为叛逆,为免招祸,亦为讳言客人之原因。国父以中山人奋起革命,自须获革命策源中心地广府属人的支持协助,自不宜随时随地言及上世根源,以自树藩篱,招致阻力,减少革命实力;但亦非绝未言及,当广州新军起义时,他便对姚雨平将军说过他上世来自嘉应州,民九到潮汕检阅粤军时,顺道到梅县松口拜会谢逸桥、谢良牧兄弟时,亦曾对当地晋谒他的父老言及他是客家人,特少为人知

耳。至客籍社团特予招待开会欢迎一节，一因罗著未发表前多未知国父是客家人，二因当时极少此种风气。更有为甄陶先生告者，胡汉民先生，人均知其为番禺人矣，又安知其祖若父，亦为江西南部庐陵县客家人（见世界客属总会所存文献），胡先生亦绝未对人言及。

（六）连昌公迫于生计，应投向增城客人聚居地求助，为何舍近图远而至中山沿海，非人情所近 连昌公赴增城垦殖未久，值政府宣布沿海复界，奖励人民前往，增城已非沃壤，根基又未深植，自然便是最适宜于再迁的人，何况客人南来多居山地，渴慕沿海土地的肥沃，连昌公只身在增城，自非为顾目前生活，而是要展望未来，有此良机，当然欣然毅然前往。

对祝秀侠文的评析

一、孙满先生所提意见

（一）孙满先生说："民国廿三年陪同邓慕韩先生赴东莞各地视察孙氏宗祠，取阅族谱，果有十二世祖连昌公名，与翠亨孙氏家谱相符。"连昌公既然非由东莞迁往中山的始迁祖，出生在中山涌口，为何在东莞孙家的族谱中又有连昌公之名？此点有些使人不解，难道由东莞迁往中山的孙姓，仍按期将子孙名单送东莞老家上谱？不知是否尚有所谓连富、连德等名字否？

（二）关于吴稚晖先生所提入粤孙氏远祖孙固及孙常德一点，业经罗先生分析不是国父先祖，罗先生意见且经吴先生审查认为正确，亲自主持颁奖给罗先生。更有请孙满先生注意的，则是哲公对此问题，数十年中，不知听过多少意见，看过多少文籍，到晚年手撰《八十自述》时，仍将罗的考证郑重列诸篇首，且特别声明："我的

祖先都是深明民族大义，很重气节的。宋亡，则不仕于元；明亡，则不仕于清。到了抗清兵败，就干跪隐居起来，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这种屡世相传的民族大义，对国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后来之所以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帝制，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环境所刺激；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祖先遗传的结果。”其中有“宋亡，则不仕于元。”一句，孙满先生如果谬然确认做过元朝杭州刺史的孙常德为祖先，那哲生先生便不好交代了。至 Kung 一音之为“公”而非“东”前面已有释说，目前坊间英文译音字典，一翻便见，尚再牵拉，便无意义。

（三）民国廿二年九月，罗先生到翠亨拜见妙西姑太时，取阅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据述首页第一人即十二世祖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达成公迁葬之列祖坟墓，即连昌公以下坟墓，亦无瑞英坟墓（达成公且在家谱中注明：“兹以前，先祖在涌口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头尖土名竹篙龙真武殿安葬”）。今孙满先生则谓纪念簿载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与罗说大异，罗说在其专著中公开发表已数十年，如有不实，在当时孙满先生事关自己祖宗，为何不设法纠正？孙满先生又谓廿三年偕同邓慕韩先生到翠亨村坟地察看时，确有上代金塔十余个。文中虽未说明是谁人之金塔，但意思则在证明上代系由东莞搬来，是自己祖宗金塔。金塔系未下葬之骨罐，达成公明明谓一切祖坟均已在真武殿安葬，为何尚有十余金塔？如果真有金塔，而达成公未予安葬，那一定不是达成公上代祖先的金塔，而是别房别派的。

（四）孙满先生提到妙西姑太所述敬贤公及达成公均相信风水，终身供养一位来自嘉应州的堪舆先生，各祖先坟墓，都由达成公寻得风水最好之地坟改葬一节，除了可以证明系上段所述尚有

十余金塔之言有待考究外，对国父上代家世亦极关重要。因为客家人系举家远从中原辗转南迁的汉族正统，万里关山，不知经过多少崇山峻岭，眼看着起伏的山峦，即意会到动物的各种形象，配合着重视祖先的伦理文化，养成了相信风水的习惯。敬贤公与达成公熟知其祖先来源，承袭了此种习性（广府属人世居广大平原，大多少此习性），而供养了来自嘉应州的地师，可能就是因他们知道祖先便是来自嘉应州，所以相信嘉应州籍的地师的缘故。

谭著新证价值之辨

二、谭彼岸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新证》评释

谭某之文系为被罗氏推翻诸说求翻案，所以其依据的，仍为罗氏认为有自别谱抄入混杂的翠亨孙氏族谱，及一九五一年，中共在广东中山县土地改革中所发现的孙梅景等卖田契一张，及达成公兄弟开荒合约原约一张，与复本二张。关于翠亨孙氏族谱方面，谭某所称十二世祖连富、连德、连昌、表腾、廷尊、□□、表国、表生八人，不知是否在谱中列为十一世祖瑞英公之子，在罗著中未见提及，谭文亦未提及；而在此八人中，前三人共一连字，后五人有三人共一表字，一人失名，一人为廷字，如此杂乱，且有八人之多，与国父上代甚多单传，顶多三人者，颇不相类。似拼凑成的，或非一人所生，而连富、连德等有无子孙？其状况又如何？实值得深入研究。罗著发表后，倘有连富、连德、表腾、廷尊、表国、表生等七人中任何一人的子孙，出而指正罗考的错误，则罗说早就立脚不稳，无须诸公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力谋推翻罗说了。但是直至现在，仍未见连富等人的子孙出面说话，转使人怀疑连富、连德等是否真有其人？自不足以动摇罗说。此其一。谭文中仅提及达成公兄弟开荒

合约字样，此外未有半句叙说，亦未见合约原文，秀侠先生或许已看过其全文，代谭说明为："孙中山先生父亲达成公兄弟批垦其十世祖瑞英公迳仔蔴山埔的合约，证明瑞英公迁居迳仔蔴的记载确为事实，从而否定罗香林谓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与十一世祖瑞英公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蔴迁去的说法。"客家人子孙，因流徙异乡，所到之处，均无现成田产，开荒开垦，已成习惯。达成公家到翠亨虽有数代，但仍感耕地不足，所以仍向邻村迳仔蔴批垦土地。照一般乡俗传统，假如瑞英公系达成公的直系祖宗，则对祖遗土地，分地承垦便可，无须订约批垦；订约批垦，系对别姓别房手续，似可证明瑞英公非达成公之上祖。瑞英公迁居迳仔蔴的事实，罗先生并无否定之词（罗考定瑞英非连昌公之父，是因连昌公系康熙时人，瑞英则是乾隆时人），此不足否定罗说。此其二。孙梅景等出卖祖遗尝田，此有两点研究：第一、容窝公如果是迥千公直系的七世祖，则其尝田，迥千公有承耕权利，承耕便可，又何为出之买卖？迥千公与孙梅景等已同为容窝公子孙，那田又是尝田？而不是分与孙梅景等的田，为何一个是卖主一个是买主？此点只可证明迥千公非容窝公派下子孙，不妨碍罗先生立说。第二、与迥千公合买容窝公尝田的孙廷尊，如不是谭某为推翻罗说而特意虚加，则孙廷尊究竟是什么身分？倒是很值得研究。因田契中没有说明，而其名字列在迥千公之前，说是迥千公之叔或兄，则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未载，如只是迥千公同族别派较要好之亲房，则又很少有合买田地可能；果如谭某所说系迥千公之胞叔，亦即连昌公之胞弟，则对罗的考证便构成莫大的威胁，甚而可因此而推翻其说。但如说容窝公是国父的七世祖，在明朝嘉靖年间，便已迁居涌口村，则国父对林百克所言在中山只有少数几代之说，又作如何解释？国父向来不打诳语、不说虚话，此又关涉太多，容当另加研究，

再作详论了。

以上分析，系因甄陶先生与秀侠先生两文，均偏重推翻罗先生的考证，而罗先生业已作古，无所申说，故本文以不忽视罗的成就来评析，如此才能得其均。倘蒙甄陶先生及孙满先生进而匡教，则事实愈辨而愈明，必能对国父家世之探考有所助益，此亦抛砖引玉之意也。

研究工作更进一步

罗香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付梓问世后，数十年来，虽间有异议提出，要不能撼其立说，故能使广识明智之孙哲生先生，终其一生坚信罗之考证为确实。虽然如此，但琏昌公在增城之状况如何，由增城赴中山之经过又怎样？等等，仍应作进一步探考。今甄陶先生认识此事之重要，重提研究，自属有心人，值得钦佩；其所提研考途径，亦多有价值之意见，值得重视。

不过甄陶先生自称与罗教授为知交，且谓罗曾两次持赠该书求指正，而甄陶先生在其生前既无一字提供其参考，在其死后又苛责其作品若是，两不相称，令人慨叹！

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为罗氏考定连昌公由紫金、增城迁至中山之依据，关系非常重大。罗先生谓该纪念簿首页第一人即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且曾一再公开提出，孙满先生事关自己祖宗，当时既无只字提出异议，到罗去世才谓自己抄的副本，有十一世瑞英公及十世植尚公，当年尚无影印机，两人所抄亦难辨别真伪，而妙西姑太所存原本，今落何所，又不可知，如已失落，则永成疑案。罗先生根据国父所言而采集资料作考证，相信其并无私心，亦不会存心作伪，祝先生之文如记录不讹，则孙满先生谓其“千方

百计""虚构",亦属过当。孙满先生系达成公传下系列的长曾孙,对上祖来源的考证,有比治平、治强诸先生更为重要的责任,希望能整理保存现有的各项资料,搜求更充分的有关资料,虚心作再进一步的研考,以是正祖宗根源。末学与治平先生为素识,与治强先生亦有一面,尔后有机,亦当拜会孙满先生,以求教益。

国父家世之仍当继续探考,自属无可置疑之事,但应以求"真"为鹄的,我们大多是纸上谈兵,没花过多少功夫,罗香林先生则付出过十年血汗与无限心力,所以其研究之成就,不必一意求推翻(凭意气求快一时,于事无补),而应作为再进一步研考之指引;不过在多难的国家当前环境下,研考此问题之道路,更为崎岖坎坷,诚如甄陶先生所言,大陆粤东沿海各地,自中共统治后,宗祠多已改作公社,祖先牌位及族谱已遭毁灭,坟墓多被破坏发掘,① 欲更进一步考证国父上代世系,更为困难,虽然如此,但此项工作十分重要,仍应突破困难,积极筹划实施,并应吁请党史会及国史馆董其事,才能期其有成。秀侠先生望重文坛,出而号召,当见功效。本文成于仓卒,其有语言失谨,开罪于甄陶先生及孙满先生之处,还请海涵赐谅。

① 编者注:此说不确,翠亨孙氏祖墓至今大多保存完好。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 (选录)

谢福健

孙 序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是吾友谢福健君所编著。谢君隶籍台湾,自幼生长于农村,对旧社会之风土人情,阅历颇深。念旧怀乡使然,故对粤东故土文化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谢君出身理工,服务工商界多年,利用闲暇之余,广研国父思想,尤其对民生主义,颇具见解。

谢君十分景仰国父的道德事功与国父的睿智、气宇。因此,十分留心国父的事迹及思想。为了探究国父家世源流,谢君除了详研史学家罗香林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外,多方旁征广引,走访故老,以求言证。于书中,将国父上世于唐末时,由河南陈留南迁江西宁都,明初友松公由闽西迁居广东紫金,清初连昌公迁居香山,皆略加阐述。还将迁粤始祖友松公至吾儿国元、国欣,历六百年,传二十一代,以科学方式,编成表格,一览无遗。对国父家庭与后裔及客家源流,亦予详实报导。

谢君近出《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一书,可说是一部有意义的建设性著作。在此,吾愿勉励谢君,继此一书,继续研究国父思想,来日对国家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

* 据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版。

孙治强(署名并章)
民国七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于台北阳明山

张 序

好友谢福健君,博学多能,目光锐利,近出所著《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一书,将六百年来,中山孙氏世系,列成表格,于历代祖先及后世子孙之名号、生年、居所,一一列入,一览无遗。又旁征广引,博访咨周,将有关国父家世之讲述语文汇成一册,请余为序。余感其诚,且佩其能,爰缀数语,以为推介,续貂献丑,非所计也。

余世居广东五华县,五华、梅县、兴宁、蕉岭、平远属于嘉应州,居民全系中原客属。与其四境为邻者有兴宁、丰顺、揭阳、陆丰、龙川、河源、紫金诸县。从史事地缘而言,则与紫金最为密切。缘五华原名长乐,紫金旧名永安,"长乐"、"永安"本属天然对称之吉祥语,亦可视作现在流行的姊妹县。尤其琴江发源于紫金,流经五华再以入海,而紫金建县时,亦曾将五华琴江都,划为其辖区。如果吾人以水喻血,以土比肉,则两县堪称血肉相连,同气连理矣。

余生长五华,自幼即闻知有革命首领孙文,其祖上原居永安,后迁香山——即今之中山县。后来国父亦曾亲告美籍学者林百克,谓"祖庙在东江公馆村"。后经查证,证实此一公馆村即系现在紫金县忠坝乡之公馆背村,亦即旧属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辖地。余自民国十年以后,服务党国,历经追随国父左右亲信邓泽如、谢良牧、谢英伯、姚雨平诸先进,均异口同声说:国父系客家人,因此可说吾人与国父之先世原是小同乡。

国父为旷世伟人,其丰功伟烈,彰彰在人耳目,毋庸吾人赘述。但其家世源流,则知者甚鲜,因而谢君此著,于党史、国史、世界史、

人类学、优生学之研究，均将有所裨补也。

张民权（署名并章）
民国七十二年七月十二日于台北景美

罗 序

国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人，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伟人，我们实在是无限地敬爱他，仰慕他。在敬爱和仰慕之余，我们也不禁常常会好奇地追问：像国父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人，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很难也很深，而且未必有最后的答案。但是，不断地去思考和研究这问题，总会能增进一些人生的智慧。

关于伟人形成的原因，其说法和理论可以概略区分为神学的、玄学的和科学的三种类型。所谓神学的说法，就是认为伟人的产生是天生的。因此，谁该是伟人，上天早已有所安排，凡间的人无能为力去改变它；所谓玄学的说法，乃是认为伟人的产生是受其出生年月日生辰八字姓名笔划、手相、面相或地理风水而决定，依这种说法，人力可以有限地去助长伟人的形成；至于科学的说法，则是企图能从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与过去的历史遗业中，找出形成伟人的重要具体因素或条件，一旦能找出，人力便可以全面参与伟人形成的全部过程。

虽然，这三种不同的说法，无论在中外古今，大体上还是同时并存的——因为目前人类的知识水准；还不能说明那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站在人类的立场，希望能以科学方法寻出伟人成功的因素，俾使后人可以完全的参与过程，而走向伟大的彼端。但是科学的说法，是必须人们辛劳地去研究——为伟人建立完整的传

记;而后从伟人的成长过程中、从伟人的社会生活中、从伟人的言论事功中,悉心观察比较,以找出伟人之所以为伟人的因素。但是,只研究狭义的传记还不够,还要进而研究广义的传记,广义的传记有纵横两方面:即从横的方面看,伟人所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大社会背景、大社会空间,其范围可以由家庭而扩展到国际层次。从纵的方面看,则是从时间上去探索此伟人的家世源流或宗族源流,以观察此伟人在祖宗德泽方面的因素。因此,伟人形成说在科学论方面的建造工作,乃是一项沉重的、庞大的和艰辛的工程。它必须多数人去分工合作,始克有成。然而一旦有所成效,则对于世道人心的裨益也最大,因为从此人们可以具体地有效地去效法伟人,增进人人皆可成为伟人的信心和希望。

基于这种信念,因此我喜欢鼓励我的学生研读伟人传记,我总希望他们能受到伟人行谊的熏陶之后,也能效法伟人,最后也成为伟人。同时,我自己忝为革命先烈后裔,不避鲁钝,也于民国六十三年为先祖父撰写《罗福星传》、于民国六十七年撰写《大湖英烈》,希望有助于研读伟人传记的风气。即在此时,而结识钦佩先祖父革命事迹的谢福健先生。谢先生除对先祖父革命事迹颇有心得之外,对国父家世源流的研究方面亦极有心得。谢先生从事国父家世源流的研究,乃是从玄学与科学两条路线同时进行,二者并重,堪称别树一帜。

我从小对国父非常之敬佩仰慕,对其事迹家世也很关切,这主要是先祖父福星公是国父忠实信徒,十八岁在厦门入党。之后,在新加坡晚晴园,见到国父风采,即追随国父从事宣传革命的工作,曾以"国权"之别名在缅甸书报社,一方面写稿宣扬革命,一方面从事侨教工作。民前一年又参加黄花岗之役,身负重伤幸免于难。武昌起义成功,缔造民国之后,又奉国父指示前来台湾组党抗日,

以期早日光复台湾，不幸壮烈牺牲。刑前，并曾作《中华民国孙逸仙救》之凤顶格绝命诗，以表示对国父的崇敬。

谢先生为考究国父家世源流，多方整理资料，复访问时贤，而有明确肯定的结论。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也尝听家母谈及国父家世源于广东紫金，系客属，家母对国父家世的认识是她在读小学时，听学堂先生讲的，家母生于民国十二年，此认知早于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以国父原籍广东紫金，诚为可靠。

自认识哲公夫人及治强先生伉俪之后，深切认识国父家属朴实无华之家风。其间，治强先生伉俪并且曾于民国七十年十二月六日前往苗栗大湖昭忠塔吊祭先祖父暨各烈士之灵，此种仁德之风，表现了革命世交之隆谊，令我及所有追随先祖父抗日志士之后人皆感念不已。今谢先生研究国父家世源流有成，特籍此一角，一以朋友身分向谢先生致申贺忱，一以烈士家属身分向国父家属致申敬意。

罗秋昭（署名并章）

民国七十二年七月十六日于省立台北师专

自　序

我生长在台湾桃园新屋乡，此地居民大部分是粤东之移民，也有部分来自闽南。乡民来处虽异，然经过几代相处，却都非常融洽。少时阅览族谱，得知自己祖先由河南渐次南迁，于明初到达广东五华县。嗣读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又悉国父先世亦出自河南，明初迁居广东紫金县中心霸（亦称忠霸，原系五华县辖地）。这与我老祖宗南迁经过似乎很接近，好奇之心油

然而生,关切之情亦与时俱增,遂决心对于国父家世作进一步深入研讨。

中国人一向重传统、重因缘、重谱籍。我深信一个人的造就与事功成败,都和他的家世渊源、出身环境、时代背景、天赋气度息息相关,故有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但世人多囿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偏见,当其得势时,颂扬吹捧,无所不至,一旦衰败或事过境迁,失去利用价值时,则指摘唾骂,又无所不用其极。综观今古,其能流芳千古,永垂不朽者,又有几人?犹忆国父奔走革命,流亡东京时,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曾盛赞其崇高品格,谓:"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足征天生圣哲,绝非偶然,而盛德感人,无间中外,因此更加强了我研讨国父家世之勇气。

世人既然对国父家世所知有限,自罗香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问世四十余年,仍有部分人士对于国父家世不甚了解。为此我特遍访国父在台家属及曾追随国父或深悉其家世情况者,如:国父儿媳,高龄九十一岁之国大代表孙陈淑英女士;国父嫡孙治强夫妇;国父生前爱将,现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委薛岳将军;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陈槃院士;国父之党书记张民权先生等。面聆教益,详加查证,所得结论,众口一词,国父系客家人,老家在紫金,与罗香林教授大著所述完全一致。国父哲嗣哲公夫人孙陈淑英女士,且亲题证言,以坚世人之信念。张民权先生特指示笔者,应以国父哲嗣孙科先生手著《八十述略》一书所言为准,一语道破,恍然大悟,洵为极有意义之启示。兹将有关国父家世系谱之文献,并参照诸先进口头或书面所引述,编著《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一书。惟仓卒付印,错漏在所难免,敢乞读者诸君,随时给予指正。

民国七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承蓝育辉先生陪同赴国史馆,拜见

馆长黄季陆先生，报告拙作内容，同时把拙作面呈审阅，九月五日蒙党国元老，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先生赐题书名。并承国父嫡孙治强先生、国父党务书记张民权先生、罗福星烈士嫡孙女罗秋昭女士赐序鼓励，益增光宠，谨申谢忱，并致崇高敬意。是为序。

谢福健（署名并章）
民国七十二年九月八日于台北

谈国父家世源流

——拜访国父哲嗣哲公夫人

前　言

笔者原乡广东省海丰县。海丰为客属与潮属混居之县份，因而家中兼具客、潮两属之习俗与语言。宗亲内有人曾议论：自己源流究竟是客属？还是潮属？这个问题引发了笔者研究民系源流的动机。同样的，在国父家世源流方面，亦曾有过翠亨孙家究竟源自何处之争议。笔者为了对名史学家罗香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更加深入了解，特地拜访了曾随侍国父革命多年的薛岳将军，并请教过权威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槃先生及国父在台家属。所得到的结论是：国父上世系出中原，原籍广东省紫金县，国父系客属。

以下是笔者研究有关国父家世源流问题之心得：

一、我国名史学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于民国卅一

年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按罗著国父上世系出河南陈留，因御黄巢作乱，南迁江西宁都，经五代再迁闽西，明朝永乐年间有讳友松公者迁广东紫金，历十二代有讳连昌公者反清兵败，乃迁增城旋再迁中山。自紫金迁粤始祖友松公至国父凡十八代。附罗香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乙本。

罗教授向治史学，经十年研究，实地赴紫金县公馆村及中山县翠亨村探考国父家世，于民国卅一年著成《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哲嗣孙哲公于罗著序文中确认其所阐发皆明确。党国元老邹海滨、吴铁城、诸先生亦做序赞誉。并获中山学术奖（由吴稚晖先生审查）。商务印书馆主编王云五先生认罗著深具学术价值，特予选入人人文库，向海内外发行。全国史学界咸认为罗著为国父家世源流研究之权威著作。

二、民国五十九年孙哲公手著《八十述略》，手稿现存于国父纪念馆。首篇为先世述略，其中阐明了国父上世于唐朝时从河南陈留南迁江西宁都，明初由闽西迁广东省紫金县，清初由紫金迁香山之经过，从迁粤始祖友松公至国父嫡孙治平、治强恰好二十代。并称国父祖先皆深明大义，极重气节。宋亡不仕元，明亡不仕清，这种相传民族大义对国父影响很大。国父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帝制，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的环境所刺激，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祖先遗传的结果。附孙哲公著《八十述略》。

三、民国六十一年，世界客属总会于台北筹办第二次恳亲大会，筹备干部邹志奋、翁钤、蓝萼洲三位先生向孙哲公报告工作情形时，哲公对筹备工作垂询颇详，并予嘉勉，哲公也欣然接受大会名誉会长，谈话间，哲公称：国父曾告诉他，老家原住东江永安县（现名紫金），并对客属从中原南迁及代出英豪史迹亦知之甚详。附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实录乙册。

四、民国七十年八月，笔者为了更了解旷世伟人孙中山先生的家世及行谊，特地拜访一级上将薛岳将军。薛岳将军为我国北伐抗日名将，抗日期间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领导百万雄师，赢得长沙数次大捷，名震中外。因为薛将军早年随侍国父革命多年，并曾任国父的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对国父家世知之甚稔。以下摘录笔者拜访所得：

1.问：将军追随国父革命期间是否知道国父原籍？

答：当然知道国父原籍是紫金县。国父也说过自己是东江客家人，老家原住紫金县。

2.问：国父当年在粤对部属等讲话通常用什么话？

答：与客籍同志讲客家话，与广东各地同志相聚讲白话（粤语），与别省同志及集会时通常讲普通话。

3.问：为何仍有部分人士对国父是客家人不甚了解？

答：因国父少年在广州及香港读书及后奔走革命与粤侨接触日多，故多用白话（粤语），且香山县居民大部分讲白话，客家人较少，因此可能有部分人士不了解，但国父确系客属，绝对不错。

此《访问薛岳将军记》并经薛岳将军亲自加批：所问无错。

附笔者所写《访问薛岳将军记》全文一份。

五、民国七十年笔者到南港中央研究院，有关罗香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内容向名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槃先生请教，陈院士称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内容正确。

六、综合以上各点可知，孙哲公、邹鲁、吴铁城、王云五诸先生都一致同意罗著所言，及随侍国父革命多年的薛岳将军对国父家世谈话与罗著内容相吻合。孙哲公学贯中西，文理兼备，历任行政院长等国家要职，而邹、吴、王三老亦皆学识渊博，为国人

所熟知。他们能够对罗著给予确认,定非轻易。且邹先生、薛将军与国父同系客属。吴先生、王先生与国父同是中山县小同乡。四位先生皆曾追随国父多年,其能够对罗著给予肯定,也提供了客观性与正确性。当民国卅一年罗著发表时,面对全国党政军前辈,面对全国学术界,面对国父乡亲故旧,多经考验,从《国父家世源流考》中,可以知道国父上世系出中原,原籍是紫金,系客属,绝对是正确的。

七、罗教授对部分人士所称"国父上世源自东莞"之错误,曾详加说明。

国父逝世至民国廿二年,西南党务月刊所载东莞上沙乡、员头山二地孙族争认国父迁出源流一案文件。罗教授依据史学道理对此案曾予详细分析。(摘录如下)。

1."至满清乾隆时,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更为绝大谬误。夫自明初至乾隆中叶,凡三百九十余载,谓常德公至瑞英公仅仅七世,平均每世积长至五十余年,当无是理。而乾隆中叶至国父诞生则未足百年,谓已传十一世,平均每世相积不及十年,其为无稽,亦不待辩而知也。

2.国父之十二世祖连昌公,既生于康熙八年(西元一六六九年),卒于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而瑞英公于乾隆卅九年(西元一七七四年),始自外地迁入迳仔蓢,世数早于连昌 ,而年代则在连昌公之后,则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翠亨孙氏非自迳仔蓢所再迁,亦可知矣。

3.西南党务月刊十四期,曾载东莞县长邓庆史关于调查上沙孙氏原呈,谓:"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

牌位”。

以上三点系摘录罗著中之说明,从中可知,所谓瑞英或禘宗是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之父亲,均系误传、伪造,皆非事实。

八、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传记文学有一篇文章,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辩正问题。其中引用一九六五年,谭彼岸在广州所写的《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而此文系根据一九五一年在中山县“土改”中发现国父父亲达成公兄弟批垦孙瑞英的土地合约书,而谭君就认定孙瑞英就是达成公的祖先。按照常理推论,果真孙瑞英是达成公祖先的话,还要批垦合约书?且谭君以孙瑞英迁迳仔蓢(翠亨邻村)是事实,就肯定了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的父亲就是瑞英。罗教授于胡去非先生所谓的瑞英连昌之谱系中,发现了两则令人起疑之问题,其一是,瑞英上七代平均代差为五十余年,乾隆中叶后十一代的平均代差却未足十年,其二是十一世瑞英公于西元一七七四年始自外地迁入迳仔蓢,而十二世连昌公生于一六六九年,卒于一七二八年,形成了瑞英世序在前,年代在后的矛盾。因此罗香林教授完全否定了瑞英连昌有传代关系之无稽论调。

谭君此文依据批垦合约书之事实,只能证实国父孙中山先生出身贫苦农家。绝不能证实瑞英与连昌有传代关系。

我们从国父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歿纪念簿》中知道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西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卒于西元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寿年六十。而根据一九五一年中山县“土改”中所发现达成公兄弟批垦孙瑞英土地合约书,其时间系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果真瑞英与连昌有传代关系的话,为父者瑞英签订批垦合约书时,为何竟会在为子者连昌去逝后的一三五年呢?连昌公寿年六十,难道为父者瑞英会在年纪高达二一〇岁以上时,签订批

垦合约书吗？至今人类史上，尚未发现有二一〇岁之人瑞，因此瑞英与连昌有传代关系之说法，系完全错误。从罗教授之说明及笔者研究之心得，并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显而易见，孙瑞英者是翠亨邻村——迳仔蓢村孙家的祖先，与翠亨村国父孙家绝无传代关系。（请参考伪谱评述第七项）。

一九五一年，中山县"土改"中另发现，香山县孙景梅等卖田契，与国父孙家完全无关，假如以其卖田契之资料与国父家世研究混为一谈，是一种严重错误。因为孙景梅等只不过是与国父孙家同姓同乡而已。

传记文学七十一年十一月期刊中之文章也谈及吴稚晖先生曾于民国廿九年讲过国父上世由东莞所迁出云云。如果稚老当时这种说法是对的话，为何在民国卅一年审查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时，还能赞同罗著所言，而审查通过颁给罗教授中山学术奖？可见稚老此时已否定了他先前之说法，也无异说明了国父上世源自东莞之说是错误的，肯定了罗著所言，国父之原籍是紫金的事实。

传记文学这篇文章里，谈及："翠亨孙氏族谱：连富、连德、连昌、表腾、廷尊、□□、表国、表生。——八房"。这绝是错误，原委是这样的：东莞县上沙乡、员头山二地孙族争认国父上世迁出源流一案，其中一个派别，所造之谱系，其中有十一世瑞英公生八子之记载，一人名为连昌，故称瑞英与连昌是父子关系，瑞英自东莞所迁出，连昌为国父十二世祖，故国父原籍在东莞。罗教授给予反驳，并予否定（请看前文所叙）。同文中有人说，妙茜老姑太所藏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有十世植尚公、十一世瑞英公之记载。这个说法完全违背事实。关于这个问题，罗教授于罗著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民国廿二年罗教授赴翠亨国父故居晋见妙茜老姑太，

并获读《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而簿中只记载十二世连昌公至十八世为国父孙公,各世名讳,与生卒年月。在罗著发表后的四十年,怎有可能在此纪念簿上又冒出十世植尚公、十一世瑞英公?民国四十四年国父胞姊妙茜老姑太逝世于翠亨故居,老姑太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乃是研究国父家世源流最珍贵的证据,是否会被成见者所变造,史学界应密切注意。

九、罗香林教授是名史学家,尤其在民族学方面造诣颇深。在探考国父家世源流之前,罗教授发现国父家世与客家文化有相当的渊源,其原因有三:其一,从照片中发现国父母亲杨太夫人所穿着之衣装为客家妇女旧式服装。其二,国父家中所供养之风水先生是嘉应州客家人。其三,国父少年时喜听太平天国的老兵,讲述洪杨革命的故事。当时洪杨革命之成员皆为客家人,所以讲故事时所使用之语言很可能是客家话。

民国廿二年,罗教授赴翠亨国父故居,获读孙氏列祖纪念簿,簿中只记载十二世连昌公之后各世名讳,连昌公之前各世名讳均无记载。罗教授参阅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记》,其中引用国父口述,谓:家庙在东江公馆 KUNG KUN 村,移居翠亨 CHOY HUNG,只数代而已。罗教授依此线索,探考国父之原籍所在,花费数年并无所获,直到民国三十年八月,方获得东江紫金县公馆村孙氏族谱旧抄本(写于光绪二年西元一八七六年)。此族谱内记载国父十二世连昌公以上各世名讳。查验其世次、名讳、地望、历史背景、年代,均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所记相符合。而公馆旧抄本所载连昌之琏多一偏旁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字形相近,字音相似,因而误写为昔日命名与抄谱时常有的现象。其二,连昌公为反清英雄,为避人耳目,免于累及家族,故把琏字改成"连",亦有可能。

罗教授并参考史籍，发现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当年参加抗清义师，因兵败逃离家园。而连昌公为何迁居香山县涌口村呢？乃是与迁界复界案有关，当年清廷为防止台湾郑成功反攻大陆，令沿海居民撤退五十里。康熙中叶，平定郑氏，虽然解除大陆沿海威胁，但香山沿海土地已荒芜多年，故官衙通知嘉、惠、潮各州百姓来此植垦，这就是香山沿海乡镇有不少客家居民的原因，这也就是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迁居香山涌口村的历史背景。

民国卅一年罗香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通过了全国学术会议审查，并获中山学术奖、国父哲嗣孙哲公之确认，以及多位党国元老的赞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国父系客属，原籍在紫金。

十、笔者研究国父家世源流，发现国父家世有下列特点：

1.清朝初年，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是抗清英雄，享年六十。清朝末年，国父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享年亦为六十。

2.自迁粤友松公至国父嫡孙凡廿代。前十代单传者有六代，后十代单传者亦有六代。从国父诞生至今已近一百二十年，只传哲嗣一人，嫡孙二人，嫡曾孙三人。可见人丁单薄。

3.国父历代祖先，经济状况相当贫苦。国父父亲达成公年轻时在外打工，年至卅三略有积蓄方才结婚，至五十一岁时还靠垦荒糊口。处境虽然艰辛，但皆有人穷志不穷之情操。

4.国父祖先，自唐朝末年以来，大凡一千年，未闻有为官者。国父亦常以“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来勉励国人。

国父孙中山先生出身寒微，一介书生，毅然倡导国民革命，历经艰苦奋斗，手创三民主义，成为历史的不朽伟人。国父不但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救星，也是世界上的超级伟人。其伟大的人格，坚强

的革命精神，乃是先世优秀健实之传统，经蓄久而发煌。故研究国父思想，必须同时研究国父家世与行谊，如此方可了解国父的睿智与气宇，源出有自，绝非偶然。

以上是笔者所撰：谈国父家世源流全文。
恭请国父哲嗣哲公夫人指正。

谢福健撰民国七十二年五月于台北

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

孙陈淑英（署名并章）
七十二、五、二

伪谱评述

一九八三年春，国父嫡孙治强先生，接粤籍某君从美国寄来孙氏谱系影本乙份（十一张），治强先生认为该谱系完全系杜撰，且以影本，已被分寄多处，为免以讹传讹，混乱视听起见，特将该影本交给笔者正其谬妄。经笔者详细研查，发现这份谱系，就是所谓瑞英、连昌是父子关系的谱系，也就是民国三十一年罗香林教授给予反驳及否定的伪谱。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五期，十四至十六页，有题为：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辩正问题（以下简称传文）。及民国七十一年十二月广东文献季刊，第十二卷第四期，三十至三十三页，有题为：《恭述国父家世源流》之文章。这两篇文章之文题虽异，然为同一作者所发表，内容亦是大致相同，且赞同了伪谱的说法。现在笔者把伪谱与传文之矛盾及错误提出，并加予说明。

一、在这份伪谱中，未具明何人为何人所出，也未载明子息名额，违反了中国传统的治谱常理。

二、研究国父家世源流之关键在于十一世与十二世。因翠亨国父家中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簿中只记载了十二世连昌公至十八世国父孙公之各世名讳及生卒年月。故作伪谱者为了缝接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编造了一位“十一世祖瑞英公”。伪谱中第五世之左下旁，有“十一世瑞英公”迁居之纪录（见伪谱）。而在伪谱另外部分又有“十一世瑞英公”生终年月无考之纪录（见伪谱）。伪谱中孙瑞英是唯一被如此重复纪录的一位，此点颇令人怀疑。

三、国父上世及后裔，兄弟均按辈份排名，如十六世敬贤公生三子：达成、学成、观成。十九世哲公生二子：治平、治强。二十世治强公生二子：国元、国欣。而伪谱中十二世连昌公有八兄弟之多，却未全按辈份排名，形成特殊现象。

四、伪谱中载明十一世瑞英公乾隆甲午年（西元一七七四年）迁居香山县迳仔蓢村，建有祖祠。而美籍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中，引用国父口述：谓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可见伪谱所载之祖祠地点与国父所述之家庙地点不符。

五、从伪谱中知道，“十一世瑞英公”于西元一七七四年迁居迳仔蓢。而从国父家谱中知道，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西元一六六九年，卒于西元一七二八年。二者互相比对，形成瑞英世序在连昌之前，而年代却在连昌之后的矛盾。显而易见，瑞英与连昌非父子关系。

六、伪谱中载明六世祖乐南，生于明成化五年（西元一四六九年），至“十一世瑞英公”于西元一七七四年迁迳仔蓢，其中历经六代，年数相距约三百年，平均代差高达六十年，不合常理。由十一

世瑞英公迁居的时间(乾隆甲午年,西元一七七四年),至十七世国父父亲达成公诞生(嘉庆十八年,西元一八一三年),相距只有三十九年,其中却历经七代,如此算来,平均代差不足十年,此处违反常理。

七、传文中刊载,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国父之父亲达成公兄弟(十七世),批垦"十一世瑞英公"迳仔蔴山浦的土地,并签订批垦合约书。但在传文中未提及达成公兄弟签订合约时,对方签约人是何人,故笔者研究此批垦合约书时,有二点说明。

1.如果签订批垦合约书时,达成公兄弟之对方是孙瑞英本人的话。十一世的祖先,怎可能与十七世之后代签订批垦合约书。并请看《伪谱评述》第八项及第九项。

2.如果签订批垦合约书时,瑞英已去逝,而迳仔蔴山浦之土地是孙瑞英所留之遗产。瑞英若是达成公兄弟之祖先的话,达成公兄弟对是项土地,应有继承权或分配权,依照中国传统民俗,怎要签订批垦合约书。从此亦可证实瑞英者非达成公之祖先,同时可以证实瑞英者非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之父亲。

八、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康熙八年(西元一六六九年),卒于雍正六年(西元一七二八年),享年六十。而传文中刊载"十一世瑞英公"于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签订批垦合约书。果真瑞英、连昌是父子关系的话,为父者瑞英签订批垦合约书的时间,为何竟会在为子者连昌去逝后的一三五年呢?按以上资料推算,为父者瑞英签订批垦合约书时之年纪必在二一〇岁以上。人类史上未闻有如此高龄的人瑞,故瑞英与连昌是父子关系的说法,绝是错误。

九、传文中刊载,"十一世瑞英公"于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签订批垦合约书,而国父孙公出生于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

年),其中相距只有三年,可是按代数来算,却历经八代,岂非荒谬。瑞英者非国父十一世祖先,其理至明,不待辩可知矣。

十、经查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迁居香山县至十八世国父孙公诞生,因单传居多,人丁不茂,故香山县内属于国父孙家者,仅有一户,并无其他国父孙氏亲族分居于香山县内。当国父领导革命,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国父家人走避美国檀香山。按清朝戒律,凡谋反者皆当累及九族,假如翠亨邻村——迳仔蓢孙族果真是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兄弟之后代的话,当时岂有不避难之理?

十一、国父之父亲达成公迁葬祖墓,其文云:"兹于前先祖在涌口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年)七月一概已将先祖坟墓,一切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头尖土名竹篙笼真武殿安葬"(引用达成公笔记)。当年罗香林教授为了研究国父家世源流,曾赴上述墓园考证,然而只见十二世连昌公之下的各代坟墓,却无瑞英坟墓。既然伪谱中称,瑞英于乾隆甲午年(西元一七七四年即迁居香山迳仔蓢村,为何到光绪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年),达成公迁葬祖墓时,竟然未把"十一世瑞英公"之墓迁回翠亨孙氏墓园呢?此外,依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簿中只记载十二世连昌公至十八世国父孙公之各世名讳,却没有"十一世瑞英公"之纪录。综合以上各点看来,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瑞英者与国父孙家源流绝无关连。

伪谱中载明了十一世瑞英公由东莞县迁居香山县迳仔蓢村,以致一般未研究国父家世源流者,误以为国父的祖先是由东莞迁入香山。依笔者以上评述,当知孙瑞英者绝非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之父亲,瑞英与国父孙家源流无关。经过详细研究可以知道,民国二十年左右有一帮人编造伪谱,把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十三世祖迥千公之名讳及生卒年月抄录在伪谱上,同时编造了几位连昌

公之兄弟，再把别的孙氏祖谱加予缝接，硬指孙瑞英者是国父十二世祖连昌公的父亲。整个伪谱之编造，的确是个很大的骗局。研究国父家世源流之学者不得不察。

孙中山祖籍何处?*

——东莞市举行座谈会探讨

杨维敏

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将届之际,广东省东莞市二十三日举行了研讨孙中山祖籍问题的座谈会,出席的有东莞市政协、文化局、地方志编纂办公室、长安区公所和上沙乡府等主办单位负责人,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孙中山研究所、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的学者、专家,以及东莞上沙和中山翠亨的孙族老人等,香港上沙同乡会代表也应邀前往参加。

罗香林考据祖籍紫金

孙中山祖辈是从东莞还是紫金迁居香山(今中山)的,是四十多年来仍有争论的问题。三十年代出版的孙中山年谱、传记,原采孙氏祖先明代居于东莞长沙乡(今上沙乡)之说。一九四二年中山大学罗香林教授在重庆出版了《国父家世源流考》,否定源自东莞之说,提出孙氏十二世祖于清初始从紫金经增城移居香山的论点。当时国民党党史会的一些资深编纂如邓慕韩、孙镜、莫纪彭、许师慎等曾有撰文反对,但罗著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题署,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后来又获国民党政府学术奖,故此后出版的有关著作追述孙氏先世时几乎都采罗说。

---

* 据香港《大公报》,1986 年 10 月 26 日。

祖籍东莞的论证

一九六三年中山大学谭彼岸在广州，一九八一年孙甄陶在台湾，以后又在香港发表论文，认为罗香林论点不能成立；孙中山侄孙孙满也在他的《恭述国父家世源流》中表示赞成谭、孙意见，只是他们掌握的证据尚未足以推翻罗说论点，至今台湾和海外仍多以罗说为正宗。大陆也有接受罗说观点的，前年江西宁都、雩邑等地还据罗说为线索，传出"发现孙中山祖墓、先世族谱"的消息。

去年初，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讲师邱捷、中山市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伯新在前人研讨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山故居收藏的《孙氏家谱》、《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和各种契据、帐册以及其他文献，李伯新还与中山故居工作人员在翠亨附近寻找到孙氏五世祖礼瓒公以下各代祖坟，邱、李两人通过对中山、东莞等地调查访问，得出孙中山祖籍是东莞而非紫金的结论，已先后写成《孙中山祖先非由紫金迁来》、《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等文，并将有关孙中山祖籍资料收集整理发表，引起海内外有关学者注意，有人誉为这是广东研究孙中山的一项突破。

在这次座谈会上，邱捷、李伯新根据共同研究成果，作了专题发言。他们认为罗香林提出孙中山祖籍为紫金的论点材料不够充份，罗著引用的所谓"孙中山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系美国林百克著《孙逸仙传记》的中译本一处错译；而罗作为主要论据的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氏族谱，仅有"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的记载，无法证明此琏昌公到了香山，也无法证明与翠亨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为同一人。

他们以孙中山之兄孙眉收藏的《家谱略记》、孙中山之姊孙妙

茜收藏的《孙氏家谱》,和其他一些口碑记载为例,都与紫金的孙氏族谱毫无相同之处;而从中山故居所藏清乾隆八年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和清同治二年、三年孙达成(孙中山之父)兄弟批垦祖尝山荒合约中,可知翠亨孙氏祖先明代已定居香山,并非如罗所说清康熙年间始从紫金辗转迁入。

他们提出孙氏始祖原在东莞,至五世祖始迁中山。因翠亨孙氏自五世祖以下各代,多葬在翠亨附近的犁头尖山、谭家山,至今坟墓尚在,基本保存完好,十年动乱也无受到破坏,这是翠亨孙氏明代即开始定居香山的重要证据。

明代移居香山

东莞市政协文史组负责人和上沙、翠亨孙族老人的发言,也提供了东莞上沙乡是孙中山先代故乡的有力论证。如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回粤后,东莞上沙孙姓族人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参加在广州大石街萧公馆召开的孙族恳亲会,当时照片、新闻报道犹存为证;孙中山侄孙孙满、孙乾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曾到上沙寻根,调查先代世系,并谒祭祖祠、祖墓;中山与上沙孙姓一直都有联系,一九四七年孙科还为上沙车站茶亭牌坊(已毁于一九六六年)题写"国父先代故乡"等。

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在这次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认为邱捷、李伯新引用的资料比较可靠,论点经得起推敲,拟在他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提上一笔,以澄清四十多年来对此问题的误会。他还表示,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结论,但应该承认罗先生写这本书是为了尊崇孙中山,应该承认罗先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中作过的贡献。

应广泛征求学者意见

中山大学和省社科院从事孙中山研究的林家有、方式光等学者、专家也认为这次座谈会上提出了大量可靠的资料、文物论证，对“孙中山祖籍是东莞上沙乡而非紫金公馆背村”这个结论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但这是纯学术问题，作为一家之言，还需要广泛听取有关学者专家们的意见，才能实事求是地取得一致结论。据悉，邱、李的论文将会提交下月上旬在广州和中山举行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山先生始祖来自东莞*

——孙中山祖籍座谈会侧记

夏　木

十月二十三日东莞市举行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座谈会，由当地政协、文化局等单位主办，参与座谈的有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林家有、讲师邱捷，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方式光等学者，有东莞市委、市政协等领导人，有东莞旅港上沙孙姓族人，有翠亨村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伯新，翠亨孙氏老人孙社正等二十多人。

座谈会本着尊重历史，弄清史实的精神，对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上沙还是紫金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四十年前一宗公案

一九四二年，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在重庆出版了《国父家世源流考》，否定孙中山祖先从东莞迁来香山的成说，提出孙氏十二世祖连（琏）昌于清初始从紫金经增城辗转移居香山的论点。该书出版后，蒋介石、于右任、张继为之题署，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颇有影响。此后，不少孙中山传记、年谱均采此说。一九七一年，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提到先祖源流，亦依据罗先生的观点。

但罗书出版后，已先后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国民党党史会一些资深的编纂如邓慕韩、莫纪彭、孙镜、许师慎等均不赞成罗说。

---

* 据《澳门日报》，1986 年 10 月 27 日。

一九六三年，中山大学教授谭彼岸曾根据中山故居的两种契据，撰文指出罗说不能成立。罗香林则于一九六五年撰文反驳，重申《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观点。

到了八十年代，孙甄陶在台湾发表文章，指出罗香林引为重要论据的《孙逸仙传记》中孙中山自述祖籍在东江龚公村一事，实为中译本的误译。稍后由孙中山侄孙孙满口述，祝秀侠笔记的《恭述家世源流》，赞成谭彼岸、孙甄陶的意见。一九八五年，谢福健在台湾发表《国父侄孙——孙承祖》一文，仍采用罗的说法。

“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说法相持四十多年。

“东莞说”理由更充分

座谈会上大家都同意“东莞说”。其理由为：

一、罗香林的主要根据是紫金忠坝孙氏族谱中所载“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一语，由此推论此十二世祖琏昌公即翠亨之十二世祖连昌公，认为孙中山先祖于清初始从紫金经增城移居香山。但此说难以立足。据现存翠亨孙氏墓葬，有十二世祖连昌公墓，连与琏字形相异，未必是同一人。且墓葬中尚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墓，按翠亨孙氏祖谱，此为中山先生祖先，说明非十二世祖始从外地迁入。中山之父达成公在批耕瑞英祖遗下荒地合约中自称为瑞英祖的“嗣孙”，充分说明瑞英公为孙中山的先辈。

二、翠亨《孙氏家谱》与东莞上沙孙氏族谱对照，均记载礼赞（墓碑作瓚）生二子，长子乐千，迁香山左步头村，次子乐南迁香山县东镇涌口村。两谱互相印证，可见《孙氏家谱》关于祖籍在东莞的记载可信。

三、孙中山家族成员承认东莞为祖籍。一九三一年，孙中山的

姐姐孙妙茜曾口述: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此后于此县中曾迁徙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广东孙姓二百余人曾在广州举行"孙族恳亲会",欢迎孙中山。东莞上沙乡孙姓有数十人参加,与会者孙同发至今仍保留当时合照及所发传单。孙中山的答词称与会者为"我族叔伯昆弟",说明中山先生与上沙孙姓有渊源关系。这次参与东莞座谈会的人士还看到刻有中山大道牌坊的图片,据督造该工程的孙秋称,此牌坊后面刻有孙科题写的"国父先代故乡"六字。不少见过这牌坊的人至今仍存。

座谈会上还提出不少调查资料和物证,说明"东莞说"言之有据。

盼与台湾海外人士讨论

这次对孙先生学说素有研究的中山大学教授陈锡祺先生因事未能与会,他在书面发言中,认为会上宣读的邱捷和李伯新所写文章,论证中山祖籍是东莞而非紫金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引用的资料比较可靠。他打算在其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引用此说,以"澄清四十多年来的误会"。但他说,这也仅是一家之言,尚待继续认真研讨。

他说,在学术研究上,很多问题须经过反复推敲、商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罗香林先生在研究孙中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贡献。《国父家世源流考》的结论虽与事实不符,其出发点仍是为了对孙中山表示崇敬之情,如果罗先生看到今天大家掌握到的资料,也许他会对自己的结论重加考虑的。台湾和海外都有不少人关注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他希望在这个座谈会之后,大家有机会与台湾、海外人士开展讨论,以求取得一致的意见。

孙中山祖先从何处迁来?*

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从紫金迁来香山;一种认为从东莞迁来

曾若醉

中山大学历史系最近向记者透露:孙中山祖先从何处迁来?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孙中山的先辈本居住在紫金县的忠坝公馆背村,十二世祖孙琏昌于清初才从紫金移居增城,后来辗转迁到香山定居;另一种则认为是十一世祖孙瑞英早在明代从东莞迁来的。

据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收藏的《孙氏家谱》记载,以及该村孙氏历代口碑相传,孙中山的先辈是从东莞迁居香山县的。但是,到了四十年代,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首先发现《孙氏家谱》有不合理之处,继而根据美国作家林百克转述孙中山一句话的译文;其后又在紫金县忠坝公馆背村发现一本孙氏家谱,上面记载孙氏十二世祖孙琏昌于清初移居增城,此后去向不明。他据此即论断孙琏昌便是孙中山十二世祖孙琏昌,并撰写了一本《国父家世源流考》。这本论著疑点颇多,有的还是大胆的假设。但由于他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的书又有蒋介石题词,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尽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他的假设在国民党史学中还是成为定论。时至今日,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仍以紫金的孙琏昌作为孙中山在香山的始祖,大陆也有学者赞成此说。

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谭彼岸先生(已迁居美国),曾撰文论

---

* 据《羊城晚报》(海外版),1985 年 12 月 1 日。

述过孙中山的先辈并非从紫金迁来(发表于《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今年春,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邱捷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李伯新在翠亨村孙氏墓地发现十一世祖孙瑞英与明代远祖之墓,从而否定清代紫金迁来的说法。他们撰写的《孙中山祖先并非由紫金迁来》一文,发表于今年九月出版的《历史大观园》第三期。为弄清事实真相,他们期望海峡两岸史学家共同来研讨这个问题。

孙中山系同何门?*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三大错误

谭彼岸

一、"阐发详确"并不真确

德绍江东传岭表　泽由莞水播香山
五世箕裘开莞岭　三房俎豆贡香山

史学家罗香林于一九三三年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经抗战时期教育部全国学术审查委员会评定给二等著作发明奖。出版时,罗香林又代孙科撰序文,自我肯定己著为"阐发详确"。《国父家世源流考》有两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说孙科自己承认祖籍在紫金县——"国父之家世源流,自仍以余书所已考定而经哲生先生认为阐发详确者"①。另一方面说"中外言国父家世史实者,始多以余书为依据"②,如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卷首世系表全录自罗书,此年谱代表党史立场,最重要的是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谱学会(Genealogical Department)把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编为一一四四号码③,经过电脑贮备书中孙中山客家源流资料,一按电钮即可查得,日本方面也强调孙中山为客家人的革命英雄最有代表性

---

* 据香港《明报月刊》,1986 年 11 月号、12 月号。

①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篇》第三九五页。

② 《客家史料汇篇》第三八九页。

③ 据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所藏中国家谱目录(该会后孙满兄函附件)。

的人物[①]。

中外既然一致采用罗说，于是一代革命家生前并不表示自己家世为客家，死后由于罗香林教授误认琏昌即连昌为香山县翠亨始迁祖。四十多年来，孙中山被宣传为客家先贤。

近三十多年中山县陆续发现有关孙中山家谱文物的新资料，学者始根据新发现资料，揭开“阐发详确”的非是，用充分证据否定紫金县公馆背孙琏昌（改连昌）作为香山县翠亨村始迁祖说，可是正在展开有关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争辩的时候，孙中山的儿媳孙陈淑英用国父家属代表名义，分别致函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和《广东文献季刊》，声明继承其先夫孙科《八十述略》所坚持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客家源流说。

孙中山是不是客家，可以从他的家庭旧习惯传统来探讨。

台湾庄政看了孙陈淑英自己承认为紫金县祖籍客家，特别跑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探望她，问有关家世源流的客家问题，她说：“我不能说国父一定是客家人，也不能说一定不是。”[②] 可见她还是采取存疑的态度。

误把琏昌当连昌

但在孙氏老辈妇女的家庭传统，存在妇女缠足和客家人通婚问题。孙母杨太夫人要为女儿缠足，女儿感到很痛苦，少年的孙逸仙恳求母亲不要迫姐姐缠足，杨太夫人答道：“如是，则人以为客民矣。”从这一件事说明孙中山并非生于一个传统的客家家庭[③]。又

① 日本财团法人《客家论の现代ン构图》第五页。
② 庄政《国父是客家人吗?》，《书和人》第四八四期。
③ 因客家妇女不缠足。

卢太夫人极力反对女儿金琬与客家人戴恩赛结婚，如孙中山是客家人，夫人必不干涉女儿婚事。

上述孙科“终其一生坚信罗之考证为确实”①，是从学术二等奖而言，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否考证确实呢？就罗香林自己的话说：“今按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坡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坡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必片言肯定”②，可见罗氏自我肯定的“阐发详确”，应打折扣，就他所使用家乘文献而论，只以妙茜姑太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同房）为依据，断自十二世祖连昌，没严格区别同姓名例，彭作揖辑《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所收姓数共四百零三姓，名数约一千六百名，人数约五万六千七百人，得出一条同时同姓名易混淆的通例，举出中国大陆东北有十六个李芳，多属生存，且多为县长，常常弄错，此名虽同而实异③，不可不细辨，琏昌与连昌不能看作同名，因有“同房”限制，这是第一点不忠实。

孙中山对友人林百克回忆重修宗祠的事：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o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East River.（即“吾族的宗祠在东江 Kung Kun 的乡村”）。述 Kung kun 的乡村重修宗祠的事，必然指十八传同“德”字辈裔孙所闻的原籍东莞上沙乡大宗祠落成一事，同时左坡头有小宗祠，舍此小大宗祠的宗法联系，日求其 Kung Kun 对音密合“公馆背”，未必正确。

史学大师陈寅恪说：“用对音研究古地名，是很危险之方法。

① 钟正君《孙中山先生家世辩平议》，《中外杂志》第十二期。
② 孙甄陶《国父家谱历史尚待考证》，《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
③ 彭作揖辑《古今同姓名大辞典》第三十页。

因为两千年的中外古音,都是不易确定的"[①],同样近人放音因人而异,用拼音亦不相同,同一人拼音因事过境迁,亦不易识,按公馆背与非标准拼音 Kung Kun 的偶合,尽猜想之能事,那是很危险的事!

林百克原文为 The village ……is at Kung Kun,而罗香林简称为国父对林百克所言家世,既明谓家庙在东江 Kung Kun village[②],原义为家庙在东江 Kung Kun 的乡村,绝非 Kung Kun 村,而是背或排。背与排的土名单位,考究起来,绝不等于村的单位,四川重庆附近有个山区叫"北碚","碚"即四川土音的"背"字,两者相通,北碚不可以作北村,犹如公馆背不可以作公馆村一样。"孙屋排"乃袭瑶族石牌(排)的旧地名,排与牌相通,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系的村寨联合订立石牌制。盘村瑶族大寨十四村石牌五百四十石排,是牌即排[③],这是第二点不忠实。

试列举紫金县的地名级次如下——(一)紫金县、(二)忠坝、(三)孙屋排及(四)公馆背。

东江流经不是第一级地名紫金,第二级地名忠坝,第三级地名孙屋排,而是一个穷山剩水的公馆背。这个公馆背,在没有发现光绪二年公馆背孙氏族谱以前,连罗香林教授也不知道的小山区,很难想象出自一个奔走革命的政治家口中,说公馆背就是孙中山口中的 Kung Kun,有是理乎?为什么四级地名,不举紫金县、忠坝或孙屋排,独举罕僻的公馆背?罗香林教授解释道:"夫亦正唯国不举显著易明香山县各孙祠与地区相接之迳仔蔭祖祠,而反举声名不显之东江公馆家庙,则更可确知国父所述为绝对可信赖"。公馆

① 谭彼案《汉代与南海黄支国的交通》,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第二期。
②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第六一页。
③ 胡起望、范宏贵《盘林瑶族》第一〇六、一〇八及一一四页,一九八三年北京版。

背即 Kung Kun 的对音，显然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况且香山连昌葬涌口门，与增城琏昌“于后未知”，不是同一人的同姓名，连昌的独生子十三世迥千于乾隆九年与从叔廷尊共同承买七世祖容窝在涌口门祖尝田的税契发现，廷尊与连昌非同房十二世祖，连昌又有“同房”在香山境内，迥千与廷尊的亲属关系，足以否定增城琏昌即连昌的论断。

深入考证免以讹传讹

其三，房份坐标不忠实。列坐标系如左：

世系（十二世）

房份：	一房	二房	三房
紫金县公馆背：	琏盛	琏昌	琏桥
香山翠亨村：	连德	连富	连昌

翠亨十二世连昌，系第三房，公馆背琏昌迁居增城“于后未知”，琏昌二房与连昌三房，不同年生。又多一偏房，故不能看作同一人；况父亲家长制下的命名父命名子继，绝不可以随意而去偏旁，这是第三点不忠实。

“琏昌移居增城，于后未知”。翠亨村孙氏“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断自十二世祖连昌，未注明从增城迁来香山县涌口门，由于琏昌与连昌相似，便推测琏昌即为连昌，连昌葬涌口门，于是又推论琏昌亦迁自涌口门。试问琏昌在“于后未知”的情况下，怎样知道他一定迁去香山县涌口门？由增城至香山，其间相隔如何沟通，没有任何材料可作佐证，“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

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①，孙甄陶先生指出：“据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记，仅言：‘十二世祖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如此而已，而罗教授谓其‘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此话若非假设，即属臆说”②。何以增城去紫金县较香山为远，而离香山较近，为何琏昌移居香山，代代相传，竟忘记其出发点，两地相隔，而无一桥梁为之沟通可乎？

梁启超论史德，强调史学家要心术端正，对史要忠实，怎样才做到忠实呢？“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客观态度，不丝毫参照自己的意见便是”③。综合以上三点不忠实的叙述，就再不能承认罗氏原著为“阐发详确”：孙科生前学术观点未能及见其祖父达成公的三份契约，核对正谬，晚年《八十岁感言》又由别人代笔，重复此“阐发详确”。而后人却把“阐发详确”继承下来，自己承认是紫金县公馆背孙鼎标之后，不见十七世祖达成公等三份契约，更见不到孙中山回左坡头谒祖照片，嗣孙寻绪，现在是推翻《国父家世源流考》，恢复家世以慰先灵的时候了。

罗香林教授为史学名家，精于唐史与家谱学，倘无中外的偏见以蔽其学问，深信会察觉乐安孙氏族谱的源流，本不分畛域，紫金县公馆背孙氏十二世祖琏昌二房，迁居增城“于后未知”，与翠亨村《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十二世连昌三房，虽同为“德绍江东”——富春孙权之后裔，两人非同年出生、非同姓名，必能分辨两地不同支派。直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使其考据之学在孙中山家世源流研究上，并未发生自己所预期的作用，而且视琏昌（二房）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趋》，《傅斯年选集》第三册第四八四页。
② 孙甄陶《国父家谱历史尚待考证》，《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卷十九。

“于后未知”作为连昌(三房)“同房”的同义语,即铸成大错。古希腊哲人有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辩“阐发详确”的谬误,则人人有责。为公为私,纠正愈早愈好,庶几谬误得以停止流传。

二、国父谒祖祠照片重见天日

左坡头、迳仔蓢与翠亨村的宗亲与地缘关系,是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重要依据。但罗香林教授附会紫金县公馆背十二世琏昌作为香山县翠亨村孙氏始迁祖,同时分割翠亨村孙氏与左坡头、迳仔蓢的宗亲关系。他说:“近人之追记国父家世源流者,每谓国父上世,实自东莞之员头山或上沙乡所迁出,此盖以国父上世一度居住之涌口门村与左坡头相接,其后所迁处之翠亨,又与迳仔蓢村相接,而左坡头与迳仔蓢之孙氏,则为自东莞所迁出,以居地之相近,或以为即同出一源。而普通人士之所谓总理家谱者,又为混合中山县迳仔蓢、左坡头二地孙氏源流与翠亨村孙氏一部分传说而成之文籍。资料之条统既不明备,依之以绌之世系,自亦难符。”①

现在根据新发现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足以辩正上述论断的错误。先述孙中山回左坡头谒祖祠的照片,而后论述达成公批垦迳仔蓢瑞英祖山埔《合约》与家世源流关系。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孙中山伦敦蒙难时,曾向清朝驻伦敦的使馆人员自述原籍左坡头(原作早埔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大总统职,回广东视察,在广州参加广东孙氏宗亲欢迎恳亲大会摄影留念,坐在第一排正中,全体宗亲共一百九十余人,包括乐安孙氏宗亲,不分宗派与畛域,是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第六〇页。

一次宗族的团结大会。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孙中山自香港经澳门抵香山县翠亨村，在故居停留了三天，他亲率随员到左埗头谒小宗祠探访宗亲，在孙氏宗祠内祭祖完毕后，与宗亲五十余人坐在神主殿前正中摄影留念。神主牌垂直斜面排级，最高神位前挂大灯笼，瓦檐张结彩灯，作波浪形。孙中山留胡须，脱草帽坐正中，左侧的士女头戴西帽身穿西服白衫黑裙为女秘书宋霭龄，坐右边的少女为长女孙琬[①]。

这一张底片原是中山县严炳枢夫人孙女士从左埗头带回三藩市湾区，交程贞可先生晒相，我知三藩市有两个人保存这幅照片，可惜现已散佚了。这一幅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这张照片的发现，可以根本上否定孙科自己承认为客家源流的讲法，孙中山用祭祠仪式及亲宗的活动照片，声明先世非客家系统，为七十多年来孙中山文物的大发现，值得大书特书。

左埗头孙氏究竟与翠亨村孙氏的关系怎样呢？翠亨《孙氏家谱》载："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麦）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左埗头，乐南居住涌口。"[②]

孙中山自称迁自左埗头，据东莞县调查上沙乡孙氏源流，"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有禘宗，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华祖起至禘儿祖为止，不见禘宗牌位"。禘宗迁居涌口村，生终年月无考，墓碑只题"明孙公"，而无其名，入祠神主有困难。至左埗头乐千裔孙东莞上沙孙氏大宗祠落成，撰送贺联两副，很可能与乐千入祀牌位同时进行有关，禘儿、禘宗两房在香山落籍，是无可怀疑的，邓慕韩以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

① 编者注：原文附图见本书图版十三。

② 翠亨《孙氏家谱》抄本过录本第一页。

主任名义，曾亲到左坡头查核族谱与神位，致西南执行部函云："总理家谱所载六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涌口，长子乐千居左坡头，次子乐南居涌口，后迁迳仔蓢，再迁翠亨。查核与左坡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源。"①

所谓"同一本源"者，实指左坡头小宗祠同奉香山始迁祖六世礼赞为始迁祖，左坡头与东莞上沙孙氏同源，孙中山就近到左坡头谒祖祠，证明邓慕韩到左坡头调查"同一本源"确实不移，有力地驳倒翠亨孙氏家谱是拼凑左坡头与迳仔蓢两地文籍而成的谱牒。

溯本追源至三国时代

孙中山祖祠在香山县的分布，涌口村早已有祖祠，据《孙氏家谱》载"十世祖考毓表，妣梁氏安人葬于香山四祖祠左侧"，可知清初已建有孙氏祖祠，在翠亨村附近也有孙瑞英公祠，两扇石门联为东莞上沙乡宗亲所撰。此祖祠孙氏族人"孙社正（经常得澳门卢太夫人的教益）小时又到过瑞英公之祠堂"②，左坡头孙氏祖祠奉祀始迁礼赞及乐千一支列祖神主，香山所有的祖祠，都是小宗祠，与上沙大宗祠互为宗法关系。上文提及林百克纪录孙中山回忆东莞上沙乡大宗祠重修落成时的英文意译为"我们的祖祠在东江 Kung Kun 的乡村"。开智书局译本《孙逸仙传记》把 Kung Kun 误译为"龚公村"，原意指东江经流一个县止 Kung Kun，并非一条村子。孙中山回左坡头谒祖是小宗祠，而在 Kung Kun 为大宗祠。罗香林教授考证"Kung Kun 之 Kung 声母从 K，至东莞之东，拼音如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第五页，商务旧版。

② 邱捷《中山的孙氏墓园》，三藩市《时代报》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第十二版。

Tung声母从T,K与T,绝不相混。如别无资料得以证明林氏以K为T,或以T误K,则Kung Kun一名绝非东莞英文拼译"①。脱离香山小宗祠与东莞大宗祠的宗法关系,把公馆背或孙屋排错误地当作"村",以公馆背作为Kung Kun村的密合地名对音,是毫无根据的。

林百克《孙逸仙传记》著作的时间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间,距孙中山回左坡头谒祖有七年时间,林百克所述"祖庙"在Kung Kun,不可以任意找什么密合地名对音,实指东莞上沙孙氏大宗祠的重修,光绪年间,东莞上沙乡孙氏大宗祠落成,左坡头裔孙十八传撰贺联两副,追溯源流如下:

庙貌庆重新想当年乐业安居德绍江东传岭表
宗支同衍派看此日源长流远泽由莞水播香山
左坡头坊裔孙英德俊堂俊连敬撰

萃子侄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
安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
十八传俊邦俊棠敬撰

第一联撰者有"英德",与翠亨村十八传德彰、德明,同为"德"字辈,应属本支分派,与第二联撰者十八传俊棠、俊邦不同房。

第一联叙江东始迁富春郡望,即所谓"德绍江东,传岭表","莞水播香山",明言迁徙的路线,第二联述明"五世箕裘开莞岭"为大宗"三房俎豆贡香山",三房指香山始迁祖礼赞子孙在左坡头的小宗祠贡祀上沙乡太祖神主,莞水指东江流入东莞归大海,莞岭即上沙乡鼠岭和螺峰,十八传俊邦与英德同为光绪时裔孙。孙中山为十八传,对林百克所述的东莞家庙必指上沙乡大宗祠。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第六〇页。

所谓“德绍江东”，按“穷源极流”的原则，可以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孙武奔吴，江东为吴故地，孙武在江东著十三篇《兵法》进吴王阖庐，任为吴将，用兵伐楚胜，名显诸侯，以有军食采富春，死葬吴郡，当时撰贺人的心目中的“江东”，指孙权割据江东六郡而言，晋孙楚说：“吴的祖先发祥于楚地荆山，现在天下大乱，吴的子孙静静地向江东迁居。”① 回忆三国吴孙坚的儿子策临死召他的弟弟权授印道：“咱们兄弟俩，讲到打仗的本领，你不如我，但选拔人才，任用贤人，则我不如你。你接印后，要好好保存江东这一块立国的基地啊！”② 孙权奠都江东建业（即今南京），统治江东六郡富饶之地，大力发展东南沿海航海，开创历史的空前大规模南太平洋航海史的新纪元，曾派人访问夷洲（今台湾），建置广州，孙中山先世始迁祖落籍东莞濒海地区，子孙躬耕于南海之滨，自明迄清，积三百余年的艰苦奋斗，受清朝迁海的压迫而不屈不挠，保持子孙通海的生命线，有其历史的前缘与近因。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职临时政府大总统时，有同志问及为什么要定都南京呢？答复的理由之一是“我先祖曾定居于此”，联系到左垺头送给上沙大宗祠的联句“德绍江东”——富春郡，“定居”非指一般的定居，而是指孙权在两千一百六十四年前定都建业（南京），祖孙两千多年遥相望，源远流长。

江东以富春为新望，子孙不忘其乐安旧望，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要从“德绍江东”——富春郡入手，凡富春新望，必然同奉乐安郡始祖孙书。孙武为江东始迁。一九八四年江西省宁都县发现《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谱》，有人宣扬孙中山祖籍客家源流，唯台

① 《晋书》卷五六《孙楚传》。
②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湾家谱学家客观地揭出江东孙武乃至孙权都是乐安郡后裔，为富春郡远祖，而唐孙诜是孙权十七世孙，迁居河南陈留郡，富春郡为吴姓，并非客家，翠亨孙氏，紫金县公馆背孙氏，兴宁章峰堡孙氏，都是富春郡后裔，也就是同为乐安郡后裔。因此考证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拼音地名 Kung Kun 的方法，最不可靠是用对音，应据左坡头孙中山谒祖祠（小宗祠）珍贵照片，由此左坡头小宗祠去找东莞上沙乡孙氏祖祠的大宗祠，明确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是由香山与东莞两地的宗法关系所决定的，拼音 Kung Kun 的 Kung 中第一个字母 K 是音讹，要校正为 Tung，K 改为 T，Kung Kun ⟶ Tung Kun 为东莞，而非公馆背，对音密合是依据错误的拼音 Kung，就不正确了，拘泥于错讹拼音 Kung Kun 硬译为“公馆背”对音，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现在大批有关孙中山家谱文物资料的新发现，孙科生前都没有见过；尤其是孙中山在左坡头谒祖与宗亲合照，它断定孙中山先世非客家源流，祖籍不在紫金县而在东莞县。孙中山和杨太夫人生前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客家，作为孙中山的哲嗣怎样对待这一件事呢？那位追随孙科几十年的梁寒操说：“孙先生（哲生）是位事父尊，事母敬的大孝子，孙先生对他的卢太夫人，有七分爱，三分惧；卢太夫人说什么话，给他什么教训，他毕恭毕敬地接受，从未使她失望伤心。”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孙科一辈子守奉父亲的心志和训示，可谓大孝。既是大孝子，面对孙中山左坡头谒祖的照片，必然收回他评价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为“阐发详确”的话，继承左坡头孙氏宗祠的祭祀，奉东莞上沙孙氏大宗祠为始迁祖。

三、孙父批垦祖田合约重见天日

罗香林教授主张孙中山十二世祖连昌为香山始迁说，最重要的论据是瑞英与连昌无传代关系。

一九五二年中山县土地改革时没收大批地契，在无数地契中发现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批垦迳仔蓢山埔开辟水果园的合约共三份图二。[①] 其中同治二年（一八六二年）由孙达成、学成两人立合约骑缝字“合同签验”，一式两份，右半截一张为房长尊贤收执，左半截一张由达成、学成两人收执。同治三年重订合约，后因两兄弟先后死亡，致经营水果种植计划失败，达成遂把手持的合约退还房长尊贤。现存共有三份合约，两份对勘，内容大致相同。这三份合约的发现，驳倒罗香林教授所谓瑞英与连昌无传代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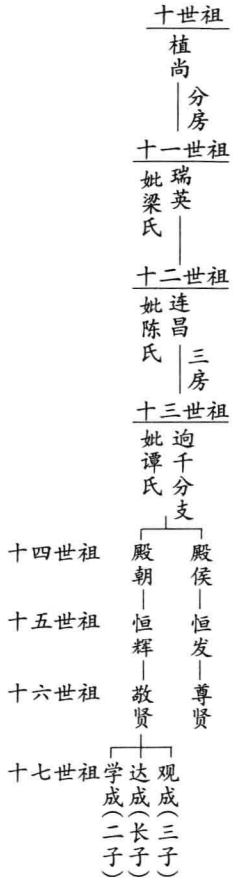
契载：“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瑞英祖家长尊贤召开祖尝会议。据德彰公所传抄《家谱略记》的世系分房与分支关系如下：

十三世迥千分支，长房殿侯，生恒发，恒发生尊贤，为长房；二房殿朝生恒辉，恒辉生敬贤。本《合约》的签订，由房长尊贤召开家族会酌议，瑞英嗣孙主要人都要签字，《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以亲尽只记五代，所以断自十二世直系连昌，至十六世敬贤为止，十七世是后补上去，与《家谱略记》（分房）互相衔接，不可分割；只看《纪念部》则不知分支，误作四代单传，实际在家谱上有同房与分房之别，连昌有三兄弟，迥千独传，殿侯有两兄弟，敬贤独传，而非四代单传。

“合约”上的房长四人，与种植嗣孙三人，均是瑞英祖的子孙。

---

① 见本书图版四。



“合约”规定与瑞英的嗣孙与房长的房亲关系，均为十一世瑞英祖嗣孙。其祖孙关系极之明确，但罗香林仍说：“……然此仅可证明国父上世与较先进入香山县之别支孙氏，有经济之关系，非能明其上世祖先有传代之关系”①。

迳仔蓢始迁为十三世迥千，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二世连昌公死葬涌口门，后迁回翠亨村安葬。迳仔蓢有孙瑞英祖祠，孙满幼年尝随祖母谭太夫人访祖祠，有上沙乡宗亲送的联，瑞英祖有尝田二亩六分，另山埔地一段，翠亨村所传《乐安堂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事部》即是瑞英祖尝公尝簿，但罗教授却不重视。

一九八五年中新社九月三十日电，中山县翠亨村东北二公里孙氏墓园发现孙中山十一世祖瑞英、十二世祖连昌及十三世祖迥千墓碑，从而否定罗香林教授谓翠亨无瑞英墓，只有连昌以下诸祖坟之说。

上三份合约内容全同，仅由兄弟两人改为三人批垦，合约上表明瑞英祖公尝众裔孙的祖孙关系；三份合约保存完整，合约载明山埔坐落迳仔蓢，房长四人（国贤等）及种植嗣孙三人（达成、学成、观成）均是瑞英祖尝权益人，房长“贤”字辈与国父祖父敬贤公同辈，均属于十六世，而茂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再证》，《客家史料汇篇》第三九三页。

成与达成三兄弟同为“成”字辈，均是十七世，三份合约有九次称“嗣孙”，是十一世祖瑞英的直系裔孙，怎能因瑞英公于乾隆三十九年迁居迳仔蔸的时间有错误，遂武断瑞英公与连昌公非父子血统关系？

罗香林教授说：“香山县各祠蒸尝，虽然与孙连昌公以至孙达成公等无隶属关系，然达成公以居住翠亨村，孙瑞英公祖祠内各山埔，自可依乡俗进行，不能因此遂认其为即孙瑞英公子孙也”①。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有专门研究蒸尝“合约”性质的论文。合约蒸尝组织，在亲人拓垦过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一种“移植性”的宗族团体，通过宗亲关系组织蒸尝，以筹集资本与劳动力，积极从事拓垦工作，是一种现代的“土地利用合作社”②。合约规定权利与义务，合约上分明有房长召开瑞英祖子孙会议，而种植人孙达成兄弟则以“嗣孙”名义承垦。

再就合约利益分配关系，亦证明达成等与瑞英祖的直属关系。如规定“五年期满，每年所出果物二八均分，每两银，瑞英祖份下该得二钱，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三人份下共得八钱，五十年期满，全个果园归瑞英祖管理为业”，集众再议，孙达成等以瑞英祖嗣孙名义批垦，这份合约共二纸，房长尊贤执一纸，种植嗣孙达成、学成及观成执一纸。因经营失败，达成把合约交还房长尊贤保存。直到土地改革才被发现。

十一世祖瑞英与十七世孙达成三兄弟血统，证明十一世瑞英与十二世父子血统关系，世代蝉联，不可分割。再得乾隆九年十三世迥千承买七世祖尝田税契证实不可移易，不能因瑞英迁迳仔蔸

① 同上，第三九四页，

② 庄英章、陈运栋《清代头份的宗族与社会发展史》，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

的年代有误，遂怀疑十一世祖瑞英与连昌无传代关系。

家世有宗法制度相维系，族有族长，房有房长，各大族世系，尊卑嫡庶的所以秩然有序，经数十年不紊，全赖家谱。别支混入本支，史学家研究谱牒，应当首先尊重旧习惯的世系的父子蝉联关系，不宜以十一世祖瑞英迁迳仔蔴年代有误。以失误的年代而否定其世系，妙茜姑太所存的《列祖生〈歿〉纪念簿》(同房)，是断代近祖的生辰死忌时日簿，并非可以代替家谱，断代自十二世，连接《家谱略记》开首列明三代，十世植尚(分房)、十一世瑞英及十二世连昌；三者蝉联，罗香林教授无视家谱所传世系的继承性，大悖于旧习惯传统。“孙连昌公为康熙时人，盖至明者，而始于迳仔蔴建立之孙瑞英公，则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〇四年)始迁其地。其时孙连昌公，且去世已四十六年矣。孙连昌公之年代早于孙瑞英公，谓其为即由孙瑞英公所传，有是理乎?”① 同一家谱，明记十一世祖瑞英祖死葬涌口村，何能复活迁居迳仔蔴乎？上列提问可以抵消。况父子相蝉联，会有子误认父，有是理乎？十一世祖瑞英公的直系，有达成、学成批垦十一世祖瑞英迳仔蔴山埔开水果园合约三份为证。何得谓“瑞英祖与国父无直接之传统关系”② 乎？

三份契约达成公对十一世祖瑞英称“嗣孙”凡九次，十七世祖达成公是十一世祖瑞英的嗣孙，嗣孙对瑞英祖是继承关系，包括对瑞英祖的祭祀继承与祖名继承。“合约”属习惯法，是社会的惯行，而发生的行为经社会公认它具有法的效力的法律和成文法，并为法律的依据。这三份契约，凡为达成祖子孙均有继承(Succession)的法律效力，达成祖(一八一三—— 一八八八)所订立的契约，离

① 《客家史料汇篇》第三九三页。
② 同上。

现在已一百二十三年时，在经济行为上已终结了权利与义务，但在家世源流问题上，身份继承仍有法律效力，身份继承在性质上却属于单独继承，身份大多不能加以分割。再上溯二百四十一年（乾隆八年）七世祖容窝的公尝田税契，契上有八个裔孙，充分证明七世至十三世，都是达成祖的祭祀继承，办税契人孙通是十一世从祖，承买人孙廷尊，十二世与连昌为堂兄弟，迥千为十三世，系达成公的直系，廷尊、迥千叔侄同买公尝田，证明连昌非增城“于后未知”的琏昌，连昌的十、十一、十二（同房）及十三世祖均居香山，税契同样具有法律效果。孙科原任前立法院院长，如果他还健在，能够见到祖父的三份合约以及乾隆九年香山县十三世祖迥千税契，必然以达成祖的嗣孙作为身份继承，而继承十一世祖瑞英，不会再认为罗香林教授的吕为秦式的家世源流“阐发详确”。

四、驳紫金县琏昌为翠亨始迁说

一九五二年土改运动时，还在大批田契中发现孙中山直系祖十三世迥千与其从叔廷尊承买七世祖容窝尝田税契，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立断卖契（图三）[①]，九年纳税契讫，原件书写四至，年月处有汉满文方形朱印及香山县字号骑缝和朱印。此税契的发现，证明翠亨孙氏家谱是本支祖正宗家世源流，非从邻村排比资料而成的文籍。据《孙氏家谱》载：

七世祖考容窝公　　葬于涌口村对面山
妣梁氏安人　　葬于涌口榕树园

尝田断卖契中有五个先祖名字与家谱相一致，大破罗香林教

① 编者注：见本书图版三。

授所谓十二世祖连昌始迁说，尝田座落涌口村横坑，横坑一名黄南坑，七世祖乐南公葬于黄南坑、八世祖日昌妣王氏葬于黄南坑，耕隐公葬于黄南坑，横指南北，黄南坑，当属涌口村一条坑的异名。承买裔孙廷尊迁居海塘湾烟墩（地在今石岐市高坡），迺千迁居迳仔荫，承买税契由两人收执，械斗后保存起来，经过二百零八年时间，是家谱的第一等史料，非常珍贵，它保存在孙廷尊子孙手中，迺千子孙则不知有此税契，涌口村横坑路途遥远，承买后，因处于强族势力下，不能自己耕种，批耕与人，又只限于本支子孙，日久无人耕抛荒，或被别姓霸占，只留下空契，世代时迁，就失落此田。至土地改革时地契才被发现，史料价值很高，为孙中山家世源流提供空前的证据，推翻紫金县公馆背十二世琏昌为香山始迁说。

本税契文中有“税现在本户孙通办纳”、“本户”指容窝尝田户，“孙通”即七世祖容窝的裔孙通，按翠亨村《孙氏家谱》所传世系表通为十世，与承买孙十三世迺千，相隔四代，活至百余岁，即使生存亦不能办税契事，当有错误；疑为十一世，与瑞英同辈，其子亚喜为出卖人签字第一人，顺序订为十二世，承买孙廷尊十二世，十一世祖瑞英生连德、连富、连昌三人，连昌属第三房十二世，廷尊必为连昌的堂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税契上的世系如左图：

七　世			容窝				
十一世	瑞英	××	××	××		××	通
十二世	连昌	连维	廷尊	云瑞	梅景	梅占	喜
十三世	迺千						

习惯法规定祖尝田不得私卖。浙江《海宁查氏族谱》载酌定规条“不准将义庄田亩及所存银钱擅自变妄费，如有犯者，听合族公举惩罚”，但《上东义举志要》规定“族中有盗卖公私祀田义产者，送官请依律处治”，在注中又说明“此为盗鬻者言之，其有合族公议，

因时变迁,有裨公事,并无受贿侵蚀情事者,不以此论”。族产的处理要家长召开全体族人大会作出决议;容窝祖家长孙梅景等,断卖上书明:“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愿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时价银十六两”,每亩价四两,为当时香山县上税田时价,立明卖田契孙梅景、梅占,而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买卖双方均是容窝祖的“房亲”,而非别支,卖田出于众议,即容窝祖全体子孙的共认出卖,“此田明买明卖,不是债利”,而且向香山县办纳税契过户手续,“交契之日,尊千批耕管业,不干众人之事”,这就是“为何一个是卖主,一个是买主”[①] 的根本原因。“明买明卖”是族产的地权族内转移,税上双方都是容窝祖“房亲”,廷尊、迥千叔侄共同承买尝田,合乎中国农村惯例。

钟正君说:“与迥千公合买容窝公尝田的孙廷尊,如不是谭某为推翻罗说而特虚加,则孙廷尊究竟是什么身份?倒是值得研究,因田契中没有说明,而其中名字列在迥千之前,说是迥千之叔或兄,则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未载,如只是迥千公同族别派较要好之亲房,则又很少有合买田地可能;果如谭某所说是迥千公之胞叔,亦即连昌公之胞弟,则对罗的考证构成莫大的威胁,甚至可因此而推翻其说[②]。钟氏大概没有看过翠亨《列祖生殁纪念部》(同房),不了解括弧内“同房”的含义,琏昌在紫金公馆的兄弟琏盛,琏桥已知不传,也就是没有“同房”在香山,紫金公馆背已无“同房”,试问增城琏昌在“于后未知”情况下,单身迁居香山,何来“同房”,可见牵合琏昌(二房)为连昌(三房),作为同姓名不可通。

---

① 钟正君《孙中山先生家世辩争平议》,《中外杂志》第十二期。

② 钟正君《孙中山先生家世辩争平议》,《中外杂志》第十二期。

争山械斗屡见不鲜

迥千、廷尊在契中与出卖田人孙梅景、亚喜及办税契人孙通均为七世祖容窝的房亲，且因争山无银支付伙食，众议出卖尝田团结房亲，非容窝子孙不得参加一族争生存的斗争。迥千如非容窝子孙，决不能承买族田，并参加容窝祖争山武斗。

出卖容窝尝田"争山米饭应用"是宗族之间的械斗行动，在孙中山家世上，已发生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闽粤向多各姓械斗的事，起因多是为这一姓对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占，便不惜牺牲无数金钱生命求为姓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因争山引起械斗，中国东南沿海闽、粤、桂三省近三百年来械斗史实斑斑可考，它深刻地影响民族主义思想。

乾嘉时代(一七六九—— 一八〇五年)广东官府《严禁豪强霸占官山示》，指出广东"无业贫民，全赖岭畔冈头旷土，垦耕杂粮，或于深山穷谷砍柴烧炭，藉资生计"，等到贫民"垦耕成熟"，不法土豪劣绅"冒称粮业"，就是测绘山形田亩图，利用人事关系向政府纳税占为己有，官地摇身一变成私有，而耕者尤不知情，浸假而变为租户；或在官山葬有祖坟，辄将全山据为己有，"此等恶风所在皆有"①。容窝先世迁自东莞上沙乡，自然受涌口门土著大姓欺凌。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开平县歇马梁姓与郑吴二姓争山地建村，发生械斗"至数十万人"，据赤溪县记载，估计双方伤亡合计约五六十万人，甚至坟墓亦各相掘毁。例如一九二二年从化县木棉村谢姓与西湖村李姓，鸟歌林刘姓，三姓因争山坟两起械斗，双方

① 旧抄本《问奇书室告示杂抄》续集，广州中山图书馆广东文献室藏。

集中斗徒约万人，枪炮互攻，焚烧村舍，水陆交通要道阻塞。一九二五年清远县浸江李、欧两姓因争山起斗，演成五姓混战，参加者有朱、徐、欧、陈、李等姓，斗众约二千余人，伤亡二十余名，损失十余万元。①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里肯定宗族械斗，“事虽野蛮，义至可取”，其目的在因势利导。把宗族的械斗改良成为一致对外侵略的抵抗力量，这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思想基础，值得研究。

五、宁都富春孙氏族谱的发现

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于一九四二年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时，猜测孙中山原籍紫金县公馆背孙氏远祖唐朝孙诜曾在江西宁都定居；他代孙科为该书作序时，重提此书没有孙诜子孙由江西迁入福建而转迁广东的一段历史，认为留下了空白。

一九八二年江西省宁都县普查该县各村家谱时，依据罗氏的指向，以孙氏族谱，特别是唐孙诜一支为重点，经过两年多努力，结果从七百多部家谱中发现《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笔者按：三十年代共产党在宁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古本族谱已荡然无存，此为一九四九年修的，史料价值不大，惟不忘富春新望郡对反证孙中山的家世非客家源流是很有用的）。

这个讯息在南昌新华社发出电讯之前，已有人从江西宁都获悉此事，并寄给美国三藩市《金山时报》。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该报第七版发表《孙中山家谱的新发现》，说这部完整的孙氏族谱，详细纪录了孙中山先辈从中原迁江西、福建及广东的过程，可以填补

① 谭彼岸《械斗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影响》未刊稿。

前此孙氏家谱学中的一段空白,且带来研究客家人的迁徙历史。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南昌新华社发布江西宁都发现孙氏族谱;六月二十二日三藩市《世界日报》更来个说明:"最近在江西省宁都县发现的孙中山先生族谱,证实著名教授罗香林的考证——孙中山祖辈是在江西宁都定居后经闽西再迁到广东,有客家血统。"其他报章则无此附加的说明。

私人讯息比南昌新华社电早七个月,是出于某种渲染的需要。罗香林教授是家谱学家,如果他健在,见到宁都孙氏族谱,他会考虑到陈留郡孙诩迁自富春,与东莞县上沙乡孙氏中山县翠亨村孙氏同奉孙武为富春始迁祖。富春新望是以乐安为旧望,台湾所藏乐安孙氏族谱明载:

"吴孙武,齐孙膑,吴孙权,皆子占(孙书)之后,孙权十七世孙诩,迁居河南陈留郡,唐僖宗乾符年间(八七四——八七九年)黄巢叛乱,诩奉命平乱有功,封东平侯,定居虔州虔化[①] (今江西宁都县)。"

春秋齐将孙书奉齐景公(公元前五四七——四九〇年),伐莒有军功封乐安(今山东历城附近)为食采,是为乐安郡始祖,翠亨孙氏属乐安郡,有《乐安堂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事部》为证,堂号即郡号,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谱学会所藏一一四二号《乐安孙氏先代纪念册》,为新加坡入闽始迁孙义斋,厦门乐安堂藏板。《台湾区百姓堂号考》,全部把郡望作为堂号来研究,台湾区孙氏乐安孙氏族谱,明书富春为乐安的新望,两者不可分割。《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

---

① 杨绪贤编撰林藜浅释《白话台湾区百姓堂号考》台湾新生报版第二四七——二四八页。

台湾乐安族谱，乐安旧望下联富春新望，使我们知道江西富春孙氏孙诩为孙权的十七世孙。一九四九年重修富春孙氏族谱，尤不忘江东郡望，齐乐安旧望，台湾家谱研究者说："今世俗虽有闽南、客家之分，但追究其根源，实在是同一家，还是由民间所传的姓氏牒谱，可获证实"①，乐安孙氏最具有代表性，台湾乐安、富春孙氏著录如下：

• 富春孙氏族谱六卷，同治十年孙方兴等修；

• 乐安孙氏世系族谱一册，民国二十四年重修（台湾台北）；

• 乐安孙氏族谱，民国三十年台湾苗栗；

• 乐安孙氏族谱一册，民国六十年始祖孙书，孙氏族谱修订委员会（台湾）。

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谱学会（Genealogical Department）藏本如下：

• 一一三四号为阳川孙氏宗谱，道光十年孙循诚等增修（浙江绍兴县始祖为东汉孙钟，即吴主孙权的高祖，元代始迁祖孙通）；

• 一一四二号为乐安孙氏先代纪念册一册，孙世南编（福建龙溪县、新嘉坡、入闽始迁清孙义斋厦门乐安堂藏版）；

• 一一三八号为富春龙门孙氏宗谱三十八册，孙瑞元等重修民国二八年（浙江富阳县始迁宋孙仁匡）；

• 一一二三号为富春孙氏家谱六册，同治十年孙广俊等重修（始迁宋孙翊迁，包港南宋孙栋）。

台湾乐安孙氏族谱，所以旧望不忘新望，主要原因是孙氏敬祖亲宗与穷源极流。旧习惯观念强，墓碑上常刻铭郡望，每隔若干年父老率领子侄渡海回福建原籍实践敬祖亲宗，勘修家谱，《宁都富

① 《白话台湾区百姓堂号考》第二页。

春孙氏伯房十二修谱》只述唐孙诇一支，参考台湾乐安孙氏族谱，就会知道孙诇是孙权第十七世孙，并非客家源流。可是江西有人不讲郡望源流，误信孙中山的远祖为唐代孙诇，胡说宁都是孙中山的祖籍①，就是不了解富春郡在那里，更谈不到乐安郡了。

乐安孙氏散居全国，均不称客家，独闽粤两省，宗族械斗频仍，地成狭乡，由于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的互相作用，其居住山区者，长期共同战斗，习同一方言，形成地区性风俗习惯。紫金县公馆背孙屋排，早年与山区瑶族相争，因而留下瑶人石牌（排）的地名遗迹，其居住东江者称客属，居住珠江三角洲者为广属，本同是乐安郡后裔，罗香林教授引述紫金县忠坝《孙氏族谱》所载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孙继周撰《孙氏族谱》序云："迨至大明永乐年间，我祖友松、友义，离闽迁粤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一图，开创于上正约忠坝，遂家于此，则为发冈头乐安孙族矣"。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重修忠坝《孙氏族谱》载："友松公（始祖）……妣骆八十娘，葬发冈头不（墩）上②。"

始祖友松迁居紫金县忠坝，定居后不称陈留郡，而仍不忘旧望称为发冈头乐安孙族。罗教授又引用兴宁章峰堡《乐安孙姓族谱世系录》，摘录出乐安孙氏古今世系通谱，由春秋齐田书赐姓初祖书。江东始迁孙武、子明，以武有军功，食采于富春，中断若干世系。又述粤赣闽开基始祖孙诇至兴宁始迁伯传，伯传父母回浙江，为浙江人，独留伯传一房在兴宁，以生活环境的需要，习用方言，并参加械斗，习用客话，成为客家，子孙仍不忘其乐安故郡。

罗香林教授说："兴宁章峰堡孙氏族谱，……自《乐安孙姓族谱

① 赖国芳《雩邑孙氏族谱中发现孙中山祖籍考的新线索》，《江西历史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②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第四四—四五页。

世系录》所抄出纂录，盖以原谱为统合粤赣闽等省‘自春秋时孙书所传各支孙氏而总修者”。这是孙氏乐安郡源流，若论粤、赣、闽，只限于孙诇一支。孙诇原属孙权之后，亦即吴郡富春孙武之后，富春又从乐安分支来的，齐国为其故地，所谓“总修”就是合乐安、富春、陈留而言，因此兴宁章峰堡《乐安孙姓族谱世系录》，既是“春秋时孙书所传各支孙氏而总修者”，总言之，应该包括齐、吴、闽、赣、粤等地，从谱牒源流来说，吴郡富春，兴宁章峰堡孙氏、公馆背发冈头孙氏及东莞上沙孙氏、翠亨村孙氏，均为乐安后裔，本是同一家。

考兴宁章峰堡乐安孙氏所传世系，由始祖孙书止于五世孙膑，没有秦将孙胜直传至孙权先祖孙钟以上共十五世，中间隔一条大代沟，又另以孙诇为始迁直至十四世伯传定居兴宁章峰堡，不知孙权十七世孙诇迁居陈留的事，罗香林教授是唐史专家，何不运用《新唐书·宰相世系》孙氏世系详表，把孙钟以上列祖补齐上去，使两段世系衔接起来，他为了强调兴宁章峰堡孙氏迁自陈留，独立出一部《章峰堡孙氏族谱》，而删去乐安郡号，台湾家谱学家早已指出孙诇是孙权十七世孙。

归根结底，宁都富春孙氏原籍在吴郡富春，富春出于乐安，这才是孙中山正宗的家世源流，孙诇为富春别支，与孙中山不同富春始迁本支，不可混同，何必斤斤于同姓名与地名对音来考证孙中山家世源流呢？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

邱　捷　李伯新

一、引　言

一九四二年，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在重庆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该书否定孙中山祖先在明代从东莞迁来香山的成说，提出孙氏十二世祖孙连（琏）昌于清初始从紫金经增城辗转移居香山的论点。罗先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该书出版后又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题署，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这就使罗先生的论点添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此后，国民党政权统治地区出版的各种孙中山传记、年谱，追述孙中山先世时几乎都采用罗说。一九七一年，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提到孙氏祖先时，也是依据罗先生的观点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先后有人撰文提出反对意见，但未能推翻罗先生的论点②。至今，在台湾及海外，提到孙中山家世源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 年第 6 期。

① 台北《传记文学》第 22 卷第 4 期。

② 发表反对罗先生意见的论文有：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广州《学术研究》1963 年第 4 期）；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台北《传记文学》第 38 卷第 3、4 期）。谭文已基本得出正确结论，但在论证中有些小的差错。孙文颇有启发性，但因没有文物资料作依据，说服力不足。罗先生看到谭文后，又写了《国父家世源流再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 1965 年版），重申自己的论点。前些年，孙满在台湾发表《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台湾《广东文献》第 12 卷第 4 期）赞成谭、孙的论点而批评罗香林，但该文系他人代笔，有些不确切的地方。

流时，固多以罗先生的说法为正宗；在我国大陆，也有人接受他的观点[①]，某些谈孙中山家世的文章，基本上是照抄罗先生的结论。前年，江西宁都等地传出了“发现孙中山祖墓、先世族谱”的消息，也是依据《国父家世源流考》而来的。

本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不一定要追溯到他若干代以前的祖先。但既然四十多年来对孙中山祖籍问题一直有争论，而孙中山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有关他的一切记载都应力求准确无误。为尊重历史，避免以讹传讹，作为孙中山研究工作者，我们感到有责任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误解。本文拟依据翠亨孙中山故居的文物及其他可靠文献和调查材料，在前人研讨的基础上对孙中山祖籍问题再作一次全面的研究。

二、罗先生“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

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混淆了四十多年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罗先生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上来。

以往，据翠亨孙氏历代口碑相传及《孙氏家谱》，孙氏祖先是在明代从东莞迁居香山的。本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刊物所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先世状况的文章，均采是说。胡去非的《总理事略》及国民党党史会一九三二年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也都提及孙中山祖辈从东莞迁居香山的事。

《孙氏家谱》的记载是有错漏的（这点后文再作分析），一些文章摘引时未能加以考订，辗转传抄，又产生一些差错。这样，在三

① 《羊城晚报》（海外版）1985 年 12 月 1 日报道：《中山祖先从何处迁来》，副题为：“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从紫金迁来，一种认为从东莞迁来”。

十年代末，罗先生即对孙中山祖上源出东莞的说法有怀疑，并产生孙中山上世出自东江的假设[①]。后来，他找到一本紫金的孙氏族谱，经过一番考证，作出了“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县忠坝公馆背”的结论。罗先生后来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中概述自己的研究经过：“余曩者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盖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没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先以之为普遍咨访之依据，继乃分析公馆村地望，为建立紫金忠坝为国父上代所尝居止之假设；然后，乃搜集有关资料，并于紫金为特殊调查，赖友好协助，果于忠坝孙屋排孙桂香家，发现孙氏族谱旧本。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琏昌公，旧居公馆背，时遭多艰，迁徙外地，其年代、名讳、世次及地望皆与国父所述与列祖生没纪念簿所记相密合。由假设而获致证明，而以科学方法治史之功能以显。”

如果孙中山确实说过家庙在东江公馆村，那自然是重要依据，问题是孙中山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罗先生所依据的仅仅是美国人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记》中译本的一处误译。该中译本有一段孙中山关于祖籍的自述：“……其实我和我的几代近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②] 罗先生正是以“龚公”村即“公馆”村建立假设的。但按英文原文，孙中山关于家庙的话却是“……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正如孙甄陶先生所说，若假定“Kung Kun”为“东莞”，正确的译法是：“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

① 罗香林：《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

②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第3页。

域。”[①] 罗先生所引之译文,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看出是误译。

英文原文之“Kung Kun”当系“Tung Kun”(东莞)之误,罗著出版时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纂邓慕韩即已指出过。但罗先生并没有理会全句的意思,硬说字母“K”与“T”绝不可能相混,且东莞并不属东江范围[②]。关于东莞应属东江范围及孙中山本人在著述中亦以东莞属东江,孙甄陶先生的文章已作论述[③],此处不必重复。至于说字母“T”与“K”绝不可能相混,则未免太武断。林百克著书资料虽多得自孙中山口述,但误记之处亦不少见。他是外国人,因误听或误写,在中国地名拼写上出现一个字母之错是不足怪的,何况排印时手民误植也有可能。罗先生自己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各种版本,均把孙氏始居之涌口村误作涌口门村,以本国人怀着极大敬意认真撰写而又获政府奖励之专门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著作,一版再版,尚有此地名之误,对林百克的书,怎能断言在地名拼写上不会出一个字母的差错呢?再说,从整段话的英文原文看,前面既有“the village”(村庄),后面的“Kung Kun”指的当然不会是一个村庄。

罗先生提出的“国父所述”,本身就令人费解。祖籍在何处并非秘密之事,清初到孙中山也不过数代,若祖籍确在东江紫金的公馆,翠亨孙氏应合族皆知,孙中山的兄、姐更应清楚。何以只有孙中山向外国人谈及过,家中其他成员却全不知晓,孙眉、孙妙茜甚至还保存了足以否定罗先生论点的家谱资料?答案只能是所谓“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全属子虚。

其次,罗先生所说“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没纪念薄所记连昌公

① 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
②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60 页。
③ 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

始居香山县”也并非事实，该资料现仍存中山翠亨，并无罗先生上面说到的内容，罗先生对这项资料颇有误解之处。“始居香山”云云，仅系罗先生本人的推测，而这个推测又并不正确。

再次，罗先生证明自己论点的最重要依据——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的旧抄本，根本不能证明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有任何关系。紫金的孙氏族谱只有一句：“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罗先生便认为，此琏昌公即翠亨《列祖生没纪念部（薄）》中所记的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这个紫金的琏昌公迁居香山的经过，罗先生的论证是：“惟连（应作琏）昌公之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居中山涌口门村”。“连（应作琏）昌公之初迁增城，本属流移性质，其迫于生事，而谋再迁沃壤，乃人情之常。而当时粤东大吏，又能明为招徕，则其迁居涌口门之底蕴，不难推证而知之矣。”[①] 说来说去，始终是推测之词，无任何证据说明紫金的琏昌公到了香山，更无任何证据说明紫金的琏昌公与香山的连昌公为同一人。两人世次相同，姓名读音相近，只是巧合而已[②]。

如果像罗先生所说的那样，香山的连昌公系从紫金迁来，那么，翠亨孙氏应是客家人。在香山县的五桂山区有不少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翠亨附近的石门、白企等村也是如此。石门村的甘姓，就是清初从紫金迁居香山的，至今人人仍知紫金为祖籍。若紫金的琏昌公真的到了香山，按常理他应到客家村落定居，而不会到并无客籍人居住的沿海村庄涌口落脚。以往的客家人即使一再迁徙，都会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从紫金迁来的石门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15 页。

② 紫金孙谱之十二世祖三人为琏盛、琏昌、琏桥，翠亨孙谱之十二世祖名字以“连”字排行有三人：连富、连德、连昌。

甘姓至今还讲客家话。但翠亨孙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与客家人不同,他们说的是香山本地话,孙中山连客家话也不大会听[①]。客家妇女不缠足,但在清代孙家妇女却是缠足的。孙中山反对给姐姐缠足时,母亲杨氏还以客家人才不缠足的事实反驳儿子[②]。昔日客家人一般不与当地土著通婚,但孙中山的祖母黄氏、母亲杨氏、叔母程氏和谭氏、元配夫人卢氏都是当地人而不是客家人。也没有听说孙家上代有与客家人联婚的。客家人有一个风俗:已婚妇女无论贵贱,在墓碑及族谱中均称作"孺人"。罗先生找到的紫金孙姓族谱就是如此。但在翠亨的《孙氏家谱》、《列祖生没纪念部》与祖茔墓碣中,妇女多称作"安人"。《国父家世源流考》卷首的所谓"国父家世源流图表",把翠亨孙氏世系强接在紫金孙氏世系之后,在翠亨孙氏十二世祖妣陈氏以下硬加上"孺人"称号,是毫无根据的。

考察罗先生研究孙中山祖籍的全过程,不难看出,罗先生对引起自己假设的各种资料并未仔细研究。由误会引出假设,用经不起推敲的孤证资料来证明假设,证明的方法又纯为推测,这样,当然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来。因此,即使没有反证,罗先生的论点仍是难于成立的。何况,有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先生的论点是错误的。

三、翠亨《孙氏家谱》

证明罗先生论点错误的最重要的证据是翠亨《孙氏家谱》。罗

① 丘一中:《孙中山到松口二三事》(《广州文史资料》第20辑)。

②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第73页。

先生似乎没有见过这本家谱，但他据一些转引家谱内容的文章，对翠亨《孙氏家谱》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孙氏家谱》的可靠性问题。

我们认为，《孙氏家谱》为孙中山的家谱，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孙氏家谱》记载了公认的有关孙中山家族的事实。它一开头就记有："兹以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盖（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盘（搬）迁回来，在翠亨村黎（犁）头尖山土名竹高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途遥远、来往艰辛之故，是以檀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盘（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罗先生也认为这段事实与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有关[①]。《孙氏家谱》列祖名讳中，有已确认为孙中山祖先的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从笔迹看，全谱为同一人所抄。因此可断定它确是翠亨孙氏的家谱。

第二，《孙氏家谱》以前由孙妙茜珍藏，她去世后其后人送故居纪念馆保存。邓慕韩曾与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委员会编纂王斧一起在故居抄录《孙氏家谱》，孙中山之侄孙孙满也在场[②]。邓氏披露之孙氏家谱内容与现在所见的一致，可见他抄的就是这一本。《孙氏家谱》一直保存在孙中山故居，它的来源是可靠的。

第三，《孙氏家谱》所记翠亨孙氏各代名讳，现已多数找到坟墓印证。在犁头尖竹高龙有始祖婆陈氏太安人墓、五世祖礼瓒公墓、六世祖乐南公墓、七世祖耕隐公墓、八世祖怀堂公墓，十四世祖殿朝公亦葬此。在翠亨村东北谭家山（土名猪肝吊胆）有十一世祖瑞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25页。

②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影印件（原件藏香港大学）。

英公墓、十二世祖连昌公墓、十三世祖迥千公墓[①]。只有第九、第十两代祖墓尚未找到。此外，孙家祖上遗下的乾隆八年的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与同治二年、三年孙达成兄弟批垦祖尝山荒合约(谭彼岸先生曾引用过)，都是《孙氏家谱》的有力佐证[②]。

《孙氏家谱》一开始即提到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迁葬祖坟事，抄写年代当在此后；谱内两处"历"字均作缺笔(避乾隆讳)，估计仍在清代。家谱没有重修、再修等名目，说明它修撰时并无旧谱可参照。翠亨孙氏虽已在香山居住十多代，但历代多为贫苦农民，族内缺乏资金[③]，又没有读书人，这就是没有修成家谱的原因。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人到了海外经商，族内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才得以把远祖的坟墓从涌口迁到翠亨附近，此时考虑修家谱应是顺理成章的。家谱对各代祖妣葬地及生卒时间记载较详，去世时间常写作"某年某月某日告终"，与当地"金塔"(骨殖坛)[④] 内盖写法相似，这多少反映了迁葬祖坟与修家谱两件事的关系。

家谱从头一气写下，叙述迁葬祖坟事后，继述先祖从东莞迁居香山概况，下面突然接上"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迁居迳仔蓢并建造祖祠的事。以上内容，解放前有的著述转引时称之为"总理家谱序"，实则并无"序"的字样。

以下内容便是孙氏入香山后各代祖妣世次、名讳姓氏、生卒时间、葬地的记载。家谱统系是不明确的，只把同一世代的排在一

① 三十年代时王斧赴翠亨调查，在长沙埔黄草岗曾见孙氏十四世祖殿侯公与十五世祖恒辉公叔侄合墓(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建国月刊》5卷第7期)。

② 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

③ 据孙氏公尝《乐安堂仕合号》账册，从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四年，共七年多时间，全族公尝收支总数目不过四、五十两。其经济状况可见一斑。

④ 以往广东有二次葬风俗，下葬后数年将尸骨起出放入"金塔"内再葬。"金塔"外盖如帽，内盖盖于瓮口，通常在内盖写上墓主生卒时间。

起,多数没有标明何人为何人所出①。各祖妣生卒时间记法颇不一致,有的则付阙如,有的注上"未知"、"无考"或"查人家牌位便知"。一些生卒时间是明显错误的。如七世祖中的容窝公生年记作嘉靖乙亥,查嘉靖无乙亥年;其父乐南公生于成化己丑年(一四六九年),容窝公生年恐应系正德乙亥年(一五一五年)。类似问题甚多。全谱只记至十三世为止(谱内之十四世祖植尚公,一说为十世祖)。显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稿本。

家谱不仅记载疏略并有错误,而且文字不通,开头部分尤其如此。它有大量的错别字(包括当时被认为不规范的简化、异体字)。然而,内容、文字的粗糙及有些先妣条下有"出嫁他族"的记载,又表明它不大可能抄自其他族谱。我们认为,《孙氏家谱》之所以有种种错漏矛盾,一是因为它并非已修成的定本,二是因为执笔者非能文之士,以致辞不达意。但家谱的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罗先生认为"……而普通人士之所谓总理家谱,又为混合中山县迳仔蓢左坡头二地孙氏源流与翠亨孙氏一部分传说而成之文籍"②。这个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翠亨孙氏六世祖乐南公与左坡头孙氏六世祖乐千公是兄弟,两地孙氏一直彼此互认为同源族亲③,若两地孙氏家谱彼此有所参照,本来也在情理之中,但实际上却没有这种情况。一九三二年广州出版的《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刊登了一个所谓《总理家谱

① 谭彼岸的《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把《孙氏家谱》中之十二世祖八人误作同胞兄弟,实则他们的年龄有相差四、五十年的,名字排行不类。且家谱的十一世祖就有八人。故十二世祖八人应既有同胞兄弟,也有堂兄弟。

②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11页。

③ 1912年5月28日,孙中山回乡时曾到左坡头孙氏宗祠,并摄影留念。孙眉与左坡头孙锦芳曾商量合建"乐千乐南公祠"事,后因意见不一未果(李伯新调查访问记录,照片藏翠亨孙中山故居)。

四修序》。罗先生正确地指出它并非翠亨孙氏的家谱,而是左坡头孙氏的家谱。我们只要把两种家谱稍加比勘,即可知现存的翠亨《孙氏家谱》与所谓《总理家谱四修序》(实则为左坡头孙谱序),从内容到文字均无抄录的痕迹。且翠亨孙谱六世祖乐南公以下各世的内容,是左坡头孙谱不可能有的。所以,可肯定《孙氏家谱》没有抄引左坡头孙姓的族谱。

罗先生所称的"迳仔蓢孙氏",实际上并不存在。迳仔蓢村离翠亨村约一公里(在今纪念中学内),孙氏初居于此,后迁入翠亨村内。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邓慕韩到中山调查时,迳仔蓢已"鞠为茂草"①,早就没有孙姓居住,翠亨孙姓都承认自己是祠堂曾在迳仔蓢的瑞英公的后代。如果说有"迳仔蓢孙氏"的话,那与翠亨孙氏是同一回事。

况且,如果据《国父家世源流考》,也将不会有翠亨孙氏。罗先生认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始从外地迁来,而连昌公定居香山后,"四代且仍单传,至十六世敬贤公始生三子。"② 大家知道,敬贤公之次子、三子观成和学成壮年时客死异乡且无男性后裔,其长子达成有二子长大成人,即孙眉和孙中山。但孙眉和孙中山青年时代均已离开家乡,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在翠亨居住。照此说来,自连昌公以后,孙中山祖祖辈辈都是独户。其实却不然,大量物证说明罗先生所说不确。孙中山诞生前后,翠亨的孙姓有八户,系同宗③。

---

①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又据翠亨孙姓族人孙社正、孙锦言忆述:"翠亨和迳仔蓢孙姓,是同一祠堂,并无外人插入。迳仔蓢本为一小村,以何姓为主,现已不存在。"在三十年代,迳仔蓢尚有数家草顶泥屋,早无孙姓人居住(李伯新调查访问记录)。

②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3 页。

③ 陆天祥口述(李伯新调查访问记录)。

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曾参与管理族内公尝，现尚存翠亨孙氏公尝“乐安堂仕合号”账册。既有公尝，即有族事，“四世单传”自非事实。孙中山一家以前一直承认翠亨姓孙的为族人，孙中山通过卢夫人对族人有所周济，他给卢夫人的信就提到过“接济穷亲”及向“乡中各亲戚问候”的事①。翠亨祖庙重修、三修、四修碑记列名的孙姓族人有孙敬贤、孙殿碧、孙阿德、孙阿海、孙阿叠、孙德□、孙尊贤、孙学成、孙亚察、孙茂成、孙达成、孙德彰(孙眉)、孙拔贤、孙德修、孙集贤等。孙达成兄弟批垦祖尝山荒合约上除了他们兄弟三人外，尚有孙国贤、孙尊贤、孙业贤、孙茂成之名。“乐安堂仕合号”账册提到的族人有(孙)恒有、恒亮、恒彩、殿章、国贤、业贤、尊贤等②。葬在谭家山孙宅山庄的除了瑞英公、连昌公、迥千公外，尚有(孙)恒达、尊贤、业贤、启成、万成、富成、学成、玉成、以成、用成、德勤、德昌等。上面提到的名字不少与孙中山一家四代的排行相同，他们或与达成公同列名于族内文契，或在达成公参与管理的公尝账册中有名字出现，或与达成公之直系亲属同葬一坟园，他们与达成公为族亲是无可置疑的。于此，亦可见罗先生对翠亨孙氏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翠亨孙氏族人的情况，也间接证明《孙氏家谱》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翠亨孙氏既是同宗同源，这就完全排除了孙中山祖上一支从紫金迁来的可能性。

四、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与孙氏定居翠亨的问题

探讨孙中山的家世源流，翠亨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是个关键

① 孙中山致卢夫人函件，藏翠亨孙中山故居。
② 碑记、账册仍存于翠亨孙中山故居。

人物。罗先生认为孙氏十二世祖连(紫金孙谱为"琏")昌公始从紫金迁入香山,连(琏)昌公之父为紫金的鼎标公。如果有资料证实原居香山的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为孙中山的祖先,那么,罗先生的论点无法成立是不言而喻的。

罗先生看到有关瑞英公的记载有些矛盾,就不承认他为翠亨孙氏的祖先。如胡去非的《总理事略》称瑞英公为七世祖,下文又以孙中山为第十八代。罗先生认为,瑞英公是乾隆时人(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至孙中山出生不及百年,决不会传至十一代,因此斥胡去非的说法为"绝大谬误"①。粗看起来,罗先生的批评理由十分充足,但实际上,胡去非只是犯了把两种计算世代方法混淆的错误。当日的史籍计算孙氏世代的方法,一种是以入粤始祖常德公算起,至瑞英公为十一世,至孙中山为十八世。另一种则以孙中山本人为准上溯,高祖殿朝公称四世祖,再往上两代连昌公为六世祖,瑞英公恰为七世祖。一九三二年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用的就是后一种方法。所以,胡去非的说法只是不确切而已,罗先生的批评不足以否定瑞英公为孙中山的祖先。

翠亨孙氏历来均以瑞英公为定居祖。《孙氏家谱》记有瑞英公世次名讳。因为罗先生对家谱的可靠性是怀疑的,我们姑且先引用其他证据。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孙达成兄弟批耕瑞英祖遗下迳仔蓢山荒地之合约。谭彼岸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引录该合约以说明孙中山上代的经济状况。奇怪的是,罗先生看到谭先生的文章后,竟认为契据"此仅可证明国父上世与较先迁入香山县之别支孙氏,有经济上之关系已耳,非能证明其上世祖先有传代之关系也",并且坚持说: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46 页。

“国父之十一世祖,决非为原居香山县而再迁迳仔蓢,且建有祖祠之孙瑞英公。”① 在此,有必要再引该契约开头几句:“立明契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蓢税山铺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既为“瑞英祖”的“嗣孙”,瑞英公当然是孙中山的祖先②。

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翠亨东北谭家山孙宅山庄的瑞英公墓,墓碑作“显十一世祖考瑞英孙公、妣梁氏安人同墓”。瑞英公墓两侧分别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的墓。此处的孙氏祖墓原多在迳仔蓢附近,三十年代唐绍仪长中山县时,因修建纪念中学及为方便祭扫才迁葬的。迁葬时孙妙茜尚健在,孙科亦曾过问。参与迁葬事的孙社正老人(翠亨孙姓族人,现居中山市)因瑞英公为始迁祖,对其墓印象较深,记得原墓在上林边(今纪念中学内),与《孙氏家谱》关于瑞英公葬地的记载“葬看山田、后迁上林边”相符。

以上两个证据,与《孙氏家谱》可互相印证,说明瑞英公确为孙中山家族的祖先。

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的附录中提到,自己曾“巡礼”翠亨附近的孙氏祖墓(那时尚未迁葬),只见“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坟墓,无瑞英公坟墓也。”他把这点也作为否认瑞英公系孙中山祖先的一个依据。罗先生误以为连昌公等墓是光绪六年从涌口迁来的祖墓,实际上从涌口迁到竹高龙的是五世祖礼瓒公以下几代远祖的墓,瑞英公、连昌公以下各代,前此已葬在迳仔蓢附近,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再证》。

② 1984年,孙满曾将整理乃祖孙眉衣箱时发现的《家谱略记》影印,其中有“十一世祖考瑞英公,妣梁氏,生连昌公,系第三子”的记载。

本来就非集中一处。罗先生未见瑞英公的墓，不等于此墓不存在，更不能因此否认其为孙中山的祖先。

罗先生又以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其首页第一人，即十二世祖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作为否认瑞英公为孙中山祖先的另一个依据。该纪念簿现仍藏翠亨孙中山故居，只记录达成公一家以及十二世祖至十六世祖的生卒时间，并无其他内容。它明显以孙中山之父达成公为界限，前此每世代只记一祖，故使罗先生产生“孙氏四世单传”的误会；至达成公一代，所有去世的家庭成员（包括孙中山之侄孙昌、长女孙娅）均有记载，孙中山（德明）逝世的时间也记下了。从笔迹看，全簿系同一人抄写，故抄写时间当在一九二五年之后，并非孙家历代相传的文献。因为它记的是列祖生卒时间，所以只能从已查明生卒时间的世代记起。按《孙氏家谱》十一世祖瑞英公下注明：“生终年月无考”。罗先生指出的问题，只说明翠亨孙氏后来始终未能查明瑞英公的生卒时间，并不能说明瑞英公不是孙中山的祖先。

引起罗先生怀疑和否定瑞英公为孙中山祖先的主要是《孙氏家谱》的一段记载：“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蔸居住，建造祖祠”。这确实是个问题。以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一六六九——一七二八）及十三世祖迥千公（一七〇一——一七五二）的生卒年代看，若瑞英公为他们的先辈，那他绝不可能在乾隆甲午年（一七七四）才迁居迳仔蔸。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如前所述，《孙氏家谱》仅系一未完成之稿本，资料既不完备又未加考订，文句不通，辞不达意，开头的部分几乎没有一句是通顺的。我们认为，既有证据证明瑞英公确为连昌公的先代，所谓瑞英公“乾隆甲午年迁居迳仔蔸”应系一种误记。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孙氏家谱》的修撰者把瑞英公定居迳仔蔸及其后代再迁至

迳仔蓢与翠亨、并建造瑞英公祠两事混记为一事了。

孙氏列祖均系平民百姓，瑞英公迁居迳仔蓢的具体经过，不可能在史书、方志、文人著述中找到有关记载，但我们从《孙氏家谱》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在旧日，一般乡村的平民百姓，葬地多在所居住的村庄附近。《孙氏家谱》所记十世祖妣以前的葬地均在涌口村的黄南坑、芒皮山、容(榕?)树围等地，至第十世则有一位祖妣梁氏葬翠亨附近的“看山田祖祠左侧”。第十一、十二世祖以下葬地常在翠亨附近的看山田、上林边、迳仔蓢山、后门山等地。瑞英公既被后代认为是始迁祖，葬地又在迳仔蓢，他迁居迳仔蓢当可相信。瑞英公生卒时间虽不可知，但以其子连昌等三人之年推测，当系明末清初时人。

但瑞英公及其子孙并非在迳仔蓢一直住下去，孙氏肯定离开过迳仔蓢一段时间。康熙初年，清政府厉行迁海，迳仔蓢为滨海村落，居民自当内迁。康熙七年以后下诏复界，允许居民回到沿海居住。香山县各地实行复界的时间并不一致，大抵离县城较近、建村历史较长之村庄复界早，偏远临海之村庄复界迟①。迳仔蓢是个近海依山的的小村落，复界估计应迟一些。待迳仔蓢一带复界后，瑞英公及其后代是没有再回迳仔蓢，还是回来后住了一段时间，因环境困难再迁走，现已无可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瑞英公或其子、孙，又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涌口村。证据便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此契开头几句是：“立卖田契人孙梅景、梅占、云灿，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孙氏家谱》有七世祖容窝

① 参看《国父家世源流考》第六、七章。

公名讳,谭彼岸先生曾据此契断定容窝公为孙中山的祖先[①]。但本族子孙不可能出头承买公尝田,故孙中山的祖先迥千公不会是容窝公的后代。实际上容窝公只是家谱中四位七世祖中的一位,并非翠亨孙氏的直系先祖。根据新近发现的坟墓,翠亨孙氏的先祖当系另一位七世祖耕隐公。契据说得很清楚,容窝公的后代是孙梅景等人,迥千公是孙梅景等人的"房亲",已出了五服,故容窝公留下的尝田,孙廷尊、孙迥千可以承买。根据我们的调查,此次交易之田所在的横坑在涌口附近,契据所开的田地四至,与现时横坑地貌大致相同。此田离迳仔蓢及翠亨二十多里,迥千公若此时在迳仔蓢居住,当不会购买此处山坑田。可见,迥千公当时住在涌口村。

据翠亨孙氏口碑相传,孙氏十四世祖殿朝公定居翠亨[②]。我们认为,乾隆甲午年迁居翠亨并在迳仔蓢建祖祠的正是殿朝公,而不是瑞英公,理由是:第一,到乾隆甲午年,瑞英公决不会仍健在。第二,若说"乾隆甲午"这个时间有误,那瑞英公所建祖祠应奉祀上代祖先,他断无为自己建祠之理。但翠亨孙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达成公兄弟批耕瑞英祖山荒合约中曾规定收入"每两银瑞英祖份下得二钱"。孙社正老人也十分肯定孙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他小时尚见过遗址。因此,在迳仔蓢建祠者必系瑞英公的后代而非他本人。第三,按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殿朝公生于乾隆乙丑年(一七四五),卒于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按旧日计算法,乾隆甲午他是三十岁,正当盛年,率家从涌口再迁乃曾祖居住过的迳仔蓢并为其建祠,是完全可能的。

---

① 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

② 罗先生也了解到这一情况,见《国父家世源流考》第53页。

总之，瑞英公为翠亨孙氏的先祖，是无可怀疑的，因此，他的儿子连昌公，就决不是从紫金迁到增城的孙琏昌。

五、翠亨孙氏源出东莞

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里用了整整一章，论证“近人所述国父源出东莞说之非是”。但罗先生的论证，也是不正确的。

罗先生列举胡去非的《总理事略》、东莞上沙乡孙绳武等人的“孙公世系图”①、叶溯中的《孙中山先生之先世》、邓慕韩致西南执行部函、吴稚晖演讲等几种提及孙中山上世源出东莞的资料，以其细节不尽相同，便认为这是“国父上世源出东莞之矛盾”，所有关于孙氏上世源出东莞的说法“皆由于根据不健全之资料而未加详考”，从而一概加以否定，断言孙中山先世与东莞毫无关系②。本来，反映同一事件的不同资料的记载有歧异，是史学研究中常碰到的事。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分析歧异的原因、性质，以辨明真伪是非，决没有把全部有歧异的史料连同提及的事实一概否定的道理。况且，罗先生指出的矛盾，往往为枝节问题。如世系图上孙氏三世祖之贵华公，在《总理事略》作“华贵”。按东莞上沙孙氏族谱，则为贵华，且兄弟名字均以“贵”字在前，可见，《总理事略》之“华贵”为误。此外，他指出的禘宗、禘儿（即《孙氏家谱》的六世祖乐南、乐

① 《西南党务月刊》刊载的孙氏世系图表有两种，第一种为东莞孙绳武等人呈文的附件“总理先代世系表”。另一种为“总理世系图”，系中山县县长派人调查抄呈，作为广东省政府复西南执行部秘书处函之附件。两表中孙氏一至六世情况基本一致，罗先生把两表误作同一件，他所批评的实际是后者。

②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6 页。

千)名的"禘"有时又作"缔","乐千"有时又作"乐川"[①],皆为类似问题。

罗先生认为有关孙氏源出东莞的资料"不健全",倒是有些道理的[②]。但不健全不等于全不可靠,如罗先生指出,世系表的第六代禘儿、禘宗公后即接上第十二代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可知矣。既非本生,而又无别种资料补其所缺之五代,或证实其所缺失之情窦,则诸人所述禘宗公以上至常德公诸代名讳,是否为国父祖宗,亦滋可疑矣。[③] 这个推论的过程是不合逻辑的。本来,中间缺漏数代的原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不能据此断言连昌公一定不是禘宗公后代,更不能作为结论进一步推断以否认在东莞的禘宗公以上各代与翠亨孙氏的关系。事实上,在翠亨《孙氏家谱》中,六世祖乐南(禘宗)公以下俱有名讳,且多可在翠亨附近找到其坟墓,罗先生怀疑之点已获解决,他的结论自不能成立。

罗先生又以当日东莞县长邓庆史派人到上沙乡调查后在呈文中提到上沙孙氏族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记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以及上沙孙姓祖祠未见禘宗牌位[④],就否定禘宗公与东莞的关系,并进而否定翠亨孙氏与东莞孙氏的关系。且不说邓庆史的呈文仅系疑似之辞,即使有

---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3~5 页。

② 在罗先生以前,高良佐已对孙氏在东莞的世系提出一些疑点(《孙中山故乡世系研究》,《建国月刊》第九卷第六期)。罗先生某些意见与高良佐相同。其实,族谱资料"不健全"是常事。如邓慕韩在左坡头见到的孙氏族谱,其二世祖姓名就有两种写法。(邓慕韩:《总理世系确由东莞上沙迁来之考证》,《建国月刊》第 10 卷第 3 期。)

③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10 页。

④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 14 期"重要公文"栏,第 31 页。

“后来加入”之事，亦不一定是伪造的证据，何况邓庆史同一呈文转引上沙孙姓族谱内容时又有禘宗之记载，他所指的仅是支派图上立祖栏的问题而已。据翠亨《孙氏家谱》，六世祖乐南（禘宗）之父已迁往香山，他虽“过回东莞”，但后来有没有再去香山，说得很含糊，而他最终却葬在香山。所以，东莞上沙孙姓祠堂未立他的牌位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罗先生以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作为否定孙氏源出东莞的依据，前文已谈及该纪念簿的内容及罗先生的误会，这里就不必重复了。

要了解翠亨孙氏源出何地，首先仍应以《孙氏家谱》为据。家谱若干记载虽有错漏，但祖籍在何县这样的大事，历代相传，不大可能搞错。《孙氏家谱》明明白白地记着：“……始祖、二世、三世、四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墓碑作瓒），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罗先生也承认上述内容与迳仔蓢孙氏及瑞英公有关。前面我们对《孙氏家谱》、迳仔蓢孙氏及瑞英公的问题作过论述。因此，可以断定，《孙氏家谱》关于祖籍在东莞的记载是可信的。

当日东莞县县长邓庆史所抄东莞上沙孙氏族谱有关部分称：“……常德公生四子，长贵荣居员头山，次贵华居上沙，三贵绍居三株竹，四贵武居南海。贵华字子贤号鹤湖，明赐乡钦正宾生，三子：长礼和，次礼忠，三礼禋。礼禋生三子：长子受，次子广，三子晟。受生三子：长子能，次子通，三子玄。玄字礼赞，生二子：长子禘儿，次禘宗。禘儿字乐千，迁往香山县左坡头村；禘宗字乐南，迁往香

山县东镇涌口村。”① 如果没有证据说明上沙孙氏族谱系伪造，那么上述内容当可作翠亨《孙氏家谱》的佐证。

孙中山家族的成员，也曾在一些场合有过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表示。这方面的资料虽零散，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孙妙茜曾与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谈话。钟所记录的孙妙茜口述有“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的内容②。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邓慕韩偕孙满、孙乾往东莞上沙调查孙氏先代世系③。孙满、孙乾那时是已任官职的成年人，若非心中认定东莞为祖籍，当不会跟邓慕韩去东莞。邓慕韩是始终反对罗香林论点的，直到最近，孙满仍表示赞成邓慕韩的意见。

至于孙中山本人，也有资料表明他曾认为东莞是祖籍。本文第二部分提到林百克著的《孙逸仙传记》中孙中山关于祖祠在“Kung Kun”的自述，我们的意见与邓慕韩、孙甄陶等人一致，“Kung Kun”指的是东莞。因字母有误，自述不可能成为大家都接受的证据，但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有力的旁证。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广东孙姓二百余人在广州大石街萧公馆举行“孙族恳亲会”，欢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回广东的孙中山。东莞上沙乡孙姓有数十人参加了这个会。与会者孙同发的后人孙衍佳至今尚保

---

①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栏，第31页。

② 林一厂抄录钟公任《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见《林一厂日记》（现藏于中山大学）1944年2月9日。

③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栏，第30页。

存开会的合影和《孙族恳亲会欢迎孙中山记》的传单[①]。当日恳亲会的宣布员孙龙光在致辞中除歌颂孙中山的功德外，还提到“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孙中山的答词称与会者为“我族叔伯兄弟”，答词内容谈及家族、民族、国家的关系[②]。据上沙孙氏族谱，东莞上沙孙姓始祖曾流寓南雄珠玑巷，但罗先生找到的紫金孙氏族谱则与南雄珠玑巷了无关系。东莞上沙孙姓族人得以参加这个恳亲会，可见孙中山和上沙孙姓彼此都认为有渊源。

今日在东莞方面，虽已不易找到更多直接证明翠亨孙氏源出东莞的文物。但上沙孙姓人士的回忆，仍反映了翠亨孙氏与上沙孙氏有来往的一些情况[③]。然而，在紫金方面，却不可能找到当地孙姓与翠亨孙姓有联系的线索。

当然，翠亨孙氏在东莞的先祖的具体情况，以及迁居香山的原

---

① 孙衍佳已将照片、传单暂存于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在东莞上沙，过去不少人家都有此照片，以前上沙中山小学还挂有一幅放大了的，该村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较深印象。

② 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5月15日。报道内容与传单大致相同。又，过去国民党党史会曾收到一份“民元总理返粤，曾往东莞员头山孙氏祠堂祭祖”的资料，但该资料“罅漏甚多”，其中提及冯自由陪往。冯自由答复询问时称他当时已在北京，“实未陪往”，但又说“总理曾往东莞，似属确实”(《林一厂日记》1944年2月22日)。

③ 1986年5月13日，在上沙党支书孙如寿、乡长孙润洪协助下，我们对上沙的老人进行了调查访问。老人们对三十年代孙满、孙乾兄弟到上沙一事都有很深印象，孙满兄弟到上沙时受到隆重的欢迎，他们去谒、扫了礼禋公的祠和墓。孙秋、孙文达还谈到，一九四七年，广州的一位中山人孙丽莲律师(女)曾代孙科要上沙孙姓送族谱出去，他们抄送了有关翠亨孙氏源流部分交给孙丽莲。后来，孙丽莲向上沙人孙子安转交了一幅孙科为上沙车站茶亭的题字“国父先代故乡”，茶亭建成后按原字大小镌在上沙车站牌坊上，无数人见过此牌坊(坊毁于一九六六年，现尚存照片)。现存《乐安亭记》抄件有“今孙院长题书石坊曰‘国父先代故乡’者……”之句。中山县县长孙乾也为茶亭书写了对联。

因和经过，孙氏更远的祖辈的情况，还有很多问题弄不清楚。古往今来，多少簪缨世族以至帝王之家，追溯到远祖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翠亨孙氏在民国以前历代都是平民百姓，要把千百年的家世源流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宁肯阙疑，也不要强为之接续世系。但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来看，翠亨孙氏在明代由东莞迁居香山是可以肯定的，孙氏在香山定居后各代名讳是大致清楚的。上述结论，无论如何较之罗先生的翠亨孙氏清初始从紫金迁来的说法更有根据。罗先生提出的唐代孙诩开始的河南陈留——江西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广东增城——广东香山的所谓“国父家世源流”，是缺乏根据、不能成立的。

六、余　论

误传了四十多年的孙中山祖上源出紫金说，实在是国民党孙中山研究中一个不算太小的错误。

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不管其结论正确与否，只是一种学术探讨，也只能是一家之言。然而，他那并不正确的学术观点后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罗著出版后，在国民党的史政机构中就受到激烈批评。国民党党史会的一些委员、编纂邓慕韩、孙镜、莫纪彭、许师慎等都不赞成这本书的结论，甚至有人建议禁止出版。当日负责增修《总理年谱长编》的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开始时对罗著十分重视和欣赏，但比对有关史料后，也认为罗著“应加复查”，并写了一份题为《〈国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点》

的报告[①]。但是,复查核实的工作后来显然没有进行过。一批"党国要人"的表态,使这个学术问题失去了继续讨论的余地。记有孙妙茜忆述的资料无人重视,也没有找当时还健在的孙妙茜和卢夫人核对一下。罗先生的书出版时虽值抗日战争时期,但核对工作也非绝无可能,抗战胜利后,看来也没有做这项工作。

必须指出,解放前对孙中山家世和少年时代情况的调查都是较粗疏的。当时知情人士及有关文物不难找到,但多数调查者只在翠亨作短暂逗留,并没有认真考查文物和广泛调查访问,因此,罗著出版后就得不到有足够说服力的反驳批评了。

罗先生这个不正确的学术结论的产生和流传,也反映了在解放前一种旧的史学观念对孙中山研究的影响。在我国的封建时代,举凡名人,都必须为他建立一个详尽的世系,通常还得为他寻找一个有名气的祖先,以此说明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的根源,读《国父家世源流考》的几个序,就不难体会到这种意味。罗先生写这本书时尽管声称"以科学方法治史",但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仍跳不出旧史学的窠臼。他对孙中山出身于一个世系不甚清楚、历代都默默无闻的贫苦农民的家庭这一事实,感到很难理解和接受;于是,便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主观想法去代替客观事实[②],千方百计为孙中山建立一个"耕读传家"、祖上参加过反清斗争、远祖当过大官的世系。其实,孙中山本人从不讳言自己是贫苦农民的子弟。他由一个农家子而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领袖,是他所处的时代造就的,也是他自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

① 《林一厂日记》1944年1月31日、2月22日、3月3日、3月10日。

② 如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上转述孙妙茜的话:"祖父敬贤公以耕读发家、颇有钱",又说孙中山之母杨氏"本名门之女",其父胜辉公"尤望重一乡",均不是事实,与孙妙茜其他忆述并不相同。

需要”,奋斗终生的结果。家世的影响,主要是使他从幼年起便体察到人民的苦难,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培养了一些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品质。搞不清孙中山远祖的谱系,对认识和理解孙中山并无影响。相反,如果硬要从不存在或不确切的远祖那儿去寻找孙中山“聪明睿智”的根源,未必对尊崇孙中山有何种益处。

台湾的国民党史政机构至今仍未正视和纠正在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上的错误。这说明了台湾海峡两岸加强学术交流、共同研究孙中山的必要。我们极愿意与台湾的同行就孙中山家世问题作进一步研讨。

罗香林先生是史学界前辈,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如今,他已作古多年,我们无从再向他请教、与他讨论了。但罗先生历来主张对不清楚或有疑问的问题再探讨,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的结论虽与罗先生的截然相反,但尊崇孙中山的出发点,则是与罗先生有相通之处的。

附:孙氏入香山后至孙中山出生前之世系

世次	名讳	记载	现时坟墓所在
五	礼瓒(赞)	家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六	乐南	家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七	耕隐	家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八	怀堂	家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九	?		未见
十	?		未见
十一	瑞英	家谱	谭家山
十二	连昌	家谱、纪念部	谭家山

续表

世次	名讳	记载	现时坟墓所在
十三	迥千	家谱、纪念部	谭家山
十四	殿朝	纪念部	犁头尖山竹高龙
十五	恒辉	纪念部	未见
十六	敬贤	纪念部	犁头尖山南半腰
十七	达成	纪念部	今纪念中学范围内

说明:“家谱”指《孙氏家谱》,“纪念部”指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孙氏家谱》记有九世祖四人:派清公、东园公、派源公、辛霞公,十世祖四人:赞广公、直吾公、毓表公、毓伦公,现尚未能查明谁为孙中山的祖先。孙满找到孙眉所保存的《家谱略记》所记十世祖为植尚公。又,十五世祖恒辉公原与其叔殿侯公合葬于长沙埔黄草岗,现未见此墓。

在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会上的发言*（选录）

金冲及

……

第一，这次会上的论文，一般都坚持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论文作者尽可能系统地详尽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包括大量的档案文献、报刊的评论和报道、时人文集以及有关人物的回忆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些论文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微观的剖析，以至具体史实的考订。有的论文，根据大量文献、文物与访问材料，进行了细密的考证，指出孙中山的祖籍是广东东莞，而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出自广东紫金，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许。所有这些论文。不管探讨的问题是什么，一般都能言之有物，确有所见，很少那些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和缺乏事实依据的空泛议论。这种良好的学风，使与会论文的质量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切实的研究工作，才能将孙中山研究工作不断地推向前进。……

---

* 据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9 年 10 月版。

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考证*

江西省档案局：舒斯华、王 延
中共广东省紫金县委办公室：张祝强
广东省紫金县档案局：蒋作绍

孙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问题，已众说纷纭，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始祖？源出于哪里？说法不一。其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解放前，中山大学历史系罗香林教授，根据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的演变过程所提出的“紫金”之说。

另一种是解放前，胡去非先生，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始祖源流演变过程也提出了“东莞”之说。

江西省档案局于一九八五年收藏了宁都发现的《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鉴于以上两种观点，对《谱》（简称）进行考证鉴别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就谈这次会同紫金县档案局对孙氏族谱进行考证鉴别情况。

一、首先介绍《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中的内容。

此谱是民国三十八年在孙氏十一修的基础上修的伯房十二修族谱，一直珍藏于宁都田头乡孙屋底村孙世龙家里。共五卷六本。

---

* 据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会秘书组编：《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1986 年 11 月 12 日铅印本。

《谱》(以下简称)的首卷"大五房分支源流便览文"载:"孙氏始祖讳诇,居汴梁陈州,诇公乃唐中书舍人拙之子,唐末因黄巢之乱以公村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间,逐居于虔化县(今宁都县),以功封百将东平侯。诇生四居士讳实,生七子,五郎六郎皆殇,长大郎讳耀,次子郎讳英,三三郎讳士元,四七郎讳爽,五八郎讳充。以公侯伯子男编立五房。公房查老谱所载人丁稀少,传至二十三世仁兴,仁旺即无续笔。侯房自英公以下散处各乡里,至十一世彬公字彦文,迁青塘而分居于雩都,丁财甚盛。伯房三世祖士元生四子,有恭、有敬、有惠、有信。有恭房在宁者仅数丁,迁居兴国赣州者人丁亦少,有敬房今居严坑、法沙,汀州河田等;有惠房居城南北暨平阳乡孙屋底等处,两处子孙为多;有信房查老谱惟载一宣教子孙迁浙江余姚县,传十六世八县尉讳时敏,子孙迁韶州到兴宁。子房之第九世郎者徙居于都南山下。男房之弟世曰大贡者至纯者,宋宝庆四年举人,迁徙广东韶州"。

在二卷"士元祖次子有敬公位下世传:""云四世十七郎字有敬生六郎,五世六郎生十六居士,生二子、惟九承事下传三子;二居士三承事,四职医。二居士生二子;五平事,七知录,居宁都石塘即郭家坳。三承事原本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四职医居宁都归仁里丁家陂"。

二、再谈谈用《谱》的几种鉴别考证情况。

①、用史料去考证《谱》的有关内容。罗香林教授在《国父家世源流考》的"结论"之末写道:"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诇公之世次名讳,皆以资料不备,未能明述"。

而这段历史,经查《谱》二卷内容,孙氏迁福建长汀河田的各代

世次。以上二卷已记载不复述，一一相合，线索清楚。

②、用宁都《谱》来考证紫金《谱》。紫金《谱》在谱序云："我祖友松公离闽迁粤嘉应州长乐县，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县，即惠州府永安上镇约开基始祖也"，宁都《谱》二卷记载："有敬公位下三承事原本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根据《谱》之间的联系，可得出：孙氏源流的发展线索；即：河南陈留县——江西宁都——福建长汀河田——广东紫金中坝。

再用紫金《谱》来考证香山翠亨《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紫金《谱》中记载："十一世鼎标公之子，十二世祖孙连昌公移居增城、后移香山县开基"。香山翠亨的《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中记载："其所记世次，自十二世连昌公起，文云："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已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十三世祖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十四世祖考殿朝，生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寿四十九岁。妣林氏，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生，嘉庆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寿二十岁"。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卒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享年五十二岁。则其父连昌公，卒年戊申，当在康熙四十年以后，以历表考之，必为雍正六年戊申，其生年已酉，必在康熙四十年以前，以历表考之，必为康熙八年已酉，享寿六十岁。纪念簿谓其享"寿五十二岁"。当是误以其子迥千之寿数为寿数。根据两《谱》对照，传代关系紧密。即：紫金县中坝——广东增城——广东中山翠亨村。通过以上考证情况，真实地记载了自孙中山先生入赣远祖，唐僖宗时百将东平候孙诫至孙中山的玄孙女孙美珍二十九代，前后经历一千年，平均每代三十多

年。说明罗香林教授提出的“紫金”文说，是同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的演变历史，其中无断代现象，代代相传，世次名讳。

③、谈谈用《谱》来考证各代迁入始祖的墓碑。宁都《谱》中记载，入赣始祖名讳孙诇公的墓葬地理位置，于宁都县城南五里处乌石营，紫金《谱》记载入粤始祖友松公的墓葬的地理位置，即紫金中坝贺光塔凹林和塘，(墓碑具存)。“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记载了入翠亨的始祖十二世孙连昌的墓葬地理位置，即翠亨村东北谭山(曰猪肝吊胆)保存良好。

④、谈谈如何用资料来考证有关地名、古迹。据紫金县中坝有关资料记载入粤始祖友松公住房名曰：“黄牛埃磨”。现在这个地方是正堂三栋，及左右片横屋、方向为壬山兼子一线，已破漏不堪，亦已拆段不少，大门额有“庆衍东平”横匾，亦已毁掉。据史料记载；曾拟在卧龙山下建连昌公纪念亭，蒋介石还题了词。后有中山中学即紫金第六高等小学之旧址，校名为孙科先生所书。经访问当地群众，他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些历史情况。

三、谈谈用《谱》来考证胡去非先生所提出的“东莞”之说。

①查阅资料，进行分析，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书中记载，胡去非先生在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字允中，谥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其之聘，至广东东莞任西席，逐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华贵公，分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华贵公生一子名玄，字礼赞，始迁香山县(今改为中山县)之东

镇涌口村，此为孙氏香山之始祖。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谱所载，自常德公侨居东莞后，至中山先生之世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合孙治平治强之弟，适为二十代”。

罗香林在考证这段历史时说：“而胡去非先生所谓”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如为翠亨乡之始祖”，为绝大谬误。自明初至乾隆中叶，凡三百九十余载，谓常德公至瑞英，仅传七世，平均每世积表长至五十余年，当无是理。而自乾隆中叶至国父诞生，则未足百年，谓其七传十一世，平均每世相隔不及十年，其为无稽，亦不待辩而知也。这段史料说明胡去非提出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出东莞之说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近年来，“东莞之说”又重新提出来了，经查历史资料考证，也缺乏历史根据的说法不少，一、孙瑞英是孙中山先生始祖，并没有历史根据。《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是国父胞姊妙茜及故陆华禧先生皆其唯一家传信史，也没有记载孙瑞英是十一世祖，十二世祖孙连昌之父。

二、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书上记载“国父之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康熙八年，卒于雍正六年，而瑞英公于乾隆三十九年始自外地迁迳仔蓢，世数早于连昌，而年代则在连昌之后，则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

据李伯新、邱捷所说的，孙瑞英与十二世祖连昌公祖（入翠亨始祖）有父子关系。认为此种说法更毫无根据了。即使现在连昌、迥迁、瑞英等墓在一起，这不等于他们之间就有父子关系？何况墓是经迁移过墓碑也是新的，没有留下历史痕迹，难于考证。

四、说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出于东莞。那么入东莞始祖是谁？他的儿子又是谁？有何族谱记载？如果这些必须有的历史记载都

没有，怎么可信呢？

综上所述：我们这次通过对罗香林先生的“紫金”说和胡去非先生所代表的“东莞”说的考证，我们先后到江西宁都县、广东紫金县、广东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采用族谱之间的横向检查鉴别，探误虚实，又根据族谱所提供的世次相传的线索，进行一一校对，基本上做到族谱中的人物、墓碑、时间、地点记载清楚。我们还用史料中的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是否真实，通过考证——可以说，罗香林先生说的：“孙中山先生祖籍在紫金”之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八六年十月

翠亨孙氏源出东莞之说不能成立*

——与李伯新、邱捷同志商榷

洪永珊　舒斯华

1985年《历史大观园》第3期，发表了李伯新、邱捷同志合写的《孙中山的祖籍并非由紫金迁来》一文；1986年《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又刊登了他们撰写的文章《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以下简称《辨误》）。他们认为："在紫金方面，不可能找到当地孙姓与翠亨孙姓有联系的线索"，而"翠亨孙氏源出东莞"的记载是可信的，并认为罗香林教授在1942年出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反映了"一种旧的史学观念对孙中山研究的影响"。对于李、邱同志的观点，我们认为有许多不妥的地方，在此对《辨误》一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就孙中山祖籍问题与他们进行商榷。

一、《辨误》对《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评价不公平

罗香林原系中山大学教授，已逝世多年。李、邱同志把他的学术观点冠以"国民党孙中山研究"是不合适的。罗先生曾说过："余浅陋无似，于国父世系问题，初不敢妄赞一词。"① 只是在1933年

---

* 据南昌《争鸣》，1987年第4期。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

秋到了中山县翠亨乡之后，访问了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姑太太，先烈陆皓东之弟陆华禧先生，抄录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即追根溯源，收集资料，才写出《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尽管该书出版后得到孙科本人认可，以及国民党党政要员的题署作序，但并不能以此否认这本书是作者基于对孙中山先生伟大人格及其光辉业绩的敬仰而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更不能只视之为“国民党的孙中山研究”。

李、邱同志还认为，所谓研究孙中山必须为他“寻找一个有名气的祖先，以此说明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的根源”，其实不然。罗教授在《国父之父母行实与国父所感受之家乡陶冶》及《国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所由发扬之根源》两章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是由于他目睹清朝末年的种种社会腐败现象和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自幼就受三合会和太平天国洪秀全革命精神的熏陶而产生的。罗教授还引用了吴稚晖的一段演讲词：“总理那时在私塾里读书，却一切也不能解决他的疑难，还是他六、七岁的时候，听到了太平天国老兵讲洪秀全的故事，倒给了他了不起的教育。总理的革命思想，就在这种教育下发生的。”① 接着，罗教授还认为，孙中山“先世无赫赫荣名”②，其精神气质是由孙氏家族在几经迁移转徙，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中，经过锤炼和积累养成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说罗教授写该书有“寻找一个有名气的祖先”的目的呢？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39 页。
②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3 页。

二、翠亨的《孙氏家谱》不可令人信服

李、邱同志的文章主要依据是翠亨《孙氏家谱》,但该谱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罗教授已作了详细的考证。其谱列祖名讳非常疏略,而且许多地方文字不通。《辩误》作者说此谱是初稿,或推托为"执笔者非能文之士",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辩误》作者还将《族谱》的原文"乾隆甲午十一世"(1774 年)变为"顺治甲午"(1654 年),由此来列出孙氏世系,这是无法使人相信的,因为两个年代整整相距 120 年。

续修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大事,必推选有威望的族老领头,请文人执笔编修。每凡一姓祖宗都有尝田,其收入是专用于祭扫祖坟和修谱等事。修谱时,为保证不出错漏,要先对祖坟作一番调查,用罗盘校准座山和方向,后到始祖的出生地,查阅其原籍兄弟分支的族谱,往上追溯上祖,写作"序",往下核对世辈,世辈除按数字顺序排列外,还为生男规定辈字,一辈一辈往左排"谱"。家谱修成后,还要召集各支脉族老,核对审查,择日祭祖后,按谱主人的兄弟抄成几份,兄弟支脉各存一份。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就是这样修成的,《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也是这样修成的。修谱都要注明时间,如紫金档案局藏《孙氏族谱》注有"皇清雍正七年岁次己酉仲春月初二日增修正",又写上"十世嗣孙宗麟、庆祥、如盛、尚兰同修;学容、任成、宗兰、宗元同校"等。象《辩误》所引用的无头族谱是很难使人相信的。

为了证实翠亨《孙氏族谱》的可靠性,《辩误》论述了家谱所记翠亨孙氏各代名讳,现已多数找到坟墓印证。果真如此,那倒也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李、邱又在《孙中山的祖先并非紫金迁来》一

文中说:“发现一个皇明孙氏始祖之墓,墓主名字恐已不可考,但这已可证实孙中山的祖先在明代已定居香山。”这样的论证推断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众所周知,为祖先修坟立碑是很讲究的,事先要选择日时,墓碑尺寸也要按规格取舍,刻写上“生顺死安”之词。如 1985 年,我们发现的孙闲夫人墓碑就记载曰:“嘉庆十九年六月重修陈夫人墓志铭,特授文林郎原任江西赣州府雩都县加五级记录,四次庐江宗裔传绪拜撰。

大凡成久远之业者,必资内助……鼻祖妣陈夫人有感焉,夫人乃东平侯闲公之元配,因黄巢之乱,其夫选为百将,遂随夫平兵于闽粤江右之间,以功封侯,始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之宁都州是也。”

《辨误》作者在文中却举不出类似确切的历史记载来,只说翠亨孙氏祖坟葬在一起。再仔细推敲一下,既然祖坟是搬迁集中的,那么原存的墓碑怎么会连一点影子都不存在呢?可见《辨误》的论证材料并非严密。罗先生在翠亨村调查时,只见“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坟墓无瑞英公坟墓也。”《辨误》作者却不知凭什么说瑞英公墓出现在十二世连昌和十三世迥千公的墓旁边距离三米处?又不知凭何说孙瑞英这个生卒年代都记载不详的人是十二世连昌之父,孙中山的祖先?《辨误》还说:“迁葬时,孙妙茜健在,孙科也曾过问。”仿佛由此可以旁证,孙科已经认可十一世瑞英为十二世连昌公的祖先。但李、邱在同一篇文章的开头却又说:“1971 年,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提到孙氏祖先时,也是依据罗先生的观点”,而且他们还引用孙满的话,即孙科为罗教授书作的序,并非孙科亲自撰稿。如此观之,1971 年,孙科的《八十述略》又作如何解释呢?显见《辩误》的论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三、《辨误》中的“引证”材料多数属于误传

1.《辨误》文中所引证的“十二世祖孙琏昌，移居增城，于后未知。”这是罗教授书中引用的一个不可靠的材料。

罗香林在调查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时，由于当时受条件限制，就委托紫金县的李慰春县长帮助调查抄录族谱，故内容有些出入，其中“十二世祖孙琏昌移居增城，于后未知”，就是如此。这是罗教授的一个失误。经考证：紫金档案局所藏《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光绪二年重修）所记载的“十二世孙连昌移居增城，后移香山开基”，才是可靠的历史事实。而《辨误》一文的作者，并没有到紫金县实地调查，查阅《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中的内容，所以就难以避免《辨误》一文中出现“引证”材料误传的现象。

2.《辨误》作者认为《紫金县孙氏族谱》中孙琏昌的“琏”字与《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的孙连昌的“连”字不同，故不是同一个人。经考证，《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中的“十二世孙连昌”与《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载的“十二世孙连昌”是同一人，并没有“王”字旁的“琏”字。这纯属当时作者失误而造成后人的讹传。

3.《辨误》作者提起过孙中山先生曾在东莞拜祖之事，经调查考证，其真情也属误传。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确实曾带廖仲恺、王宠惠（当时的外交部长）和邹鲁（中大校长）去东莞拜过祖。事实上，孙中山去东莞只是借拜祖之名，其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因当时东莞明伦堂握有万顷良田，粮足钱多。《辨误》作者用这一误传的材料来说明“孙中山先生祖籍在东莞”，也是不可信的。

4. 孙连昌与孙瑞英毫无传代关系。《辨误》作者说孙连昌与

孙瑞英是父子传代关系，这是不确凿的。据紫金县档案馆所藏《孙氏族谱》记载，十一世祖孙鼎标之子即十二世祖孙连昌公（生于1669年，卒于1728年）移居增城后，再移香山县开基。在明末清初时，孙连昌就跟着父亲孙鼎标在孙屋排设立武馆，训练义士，抵抗清兵。当时连昌为武馆总教练，成为紫金中坝一带有名的抗清总帅。抗清失败后，移居增城，后来移居香山县涌口村，其二代再迁至翠亨村。而孙瑞英何时人也？据翠亨《孙氏族谱》记载，其生卒年不详。《辨误》作者推测说可能是明末清初人。经查考有关史料，胡去非先生在《总理事略》中记载："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由涌口迁居翠亨乡径仔蒴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族谱记载，自常德公迁居东莞后，至中山先生为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罗香林先生在考证这段历史时说："自乾隆中叶至国父诞生，则未足百年，谓其七传十一世，平均每世相积不及十年，其为无稽亦不待辩而知也。"事实上，孙瑞英并不是十一世孙连昌之父，他们之间没有传代关系。如果以孙瑞英墓两侧有孙连昌、孙迥千之墓为由，就说明他们之间是父子关系，其证据也并非确凿有力。

四、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中坝

《辨误》认为在紫金中坝"不可能找到当地孙姓与翠亨孙姓有联系的线索"。这个观点不符合事实，因为：第一，紫金县所藏《孙氏族谱》（光绪二年重修）和在江西宁都发现的《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修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及《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所述孙氏世系完全能衔接起来，毫无错误。第二，紫金所藏族谱与墓志铭可相互印证。宁都乌石营马家坑发现的孙诇妻陈夫人墓，该墓为嘉庆十九年六月重修，其墓志铭记载与富春孙氏伯房

族谱记载相类似。我们就是根据《族谱》记载的孙诇及陈夫人的墓址和地图找到其墓地的;紫金所藏《孙氏族谱》记载的世次名讳明确,也保留有当时的墓碑,可以一一对照。

1. 孙中山先生至紫金中坝之上世源流,根据孙见龙所撰谱序,谓出于唐末之孙诇。其文曰:"适及诇公,族众曰百将公,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才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是也。以功封为东平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雩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雩都青塘,或居安远……"①。

孙中山先生紫金中坝始祖讳友松,通称孙伯三十三郎,妣骆八十娘,中坝《孙氏族谱》卷首载雍正七年孙继周撰谱序,其文云:

"我祖讳友松公偕友义兄弟,离闽迁粤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上正约忠坝,遂家于此。"

2.《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也记载了入香山开基始祖十二世祖孙连昌的情况:

"连昌公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年是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戊申年为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连昌享年六十岁,所记五十二岁是误传。"

3. 紫金中坝所藏《孙氏族谱》内孙氏人物多有墓葬地的记载,并留下遗迹。

友松葬贺岗约林和塘螳螂捕蝉形西山卯向,妣骆氏葬发岗头墩子上。贺岗约在琴江都西南部,即今中坝区,紫五公路由此经过。其"螳螂捕蝉形"一坟墓,当地人称"虾公地",现尚完好。

除了孙氏家族的墓地有记载外,最重要的是还有发掘的遗物

① 该《族谱》藏江西省档案馆。

和墓碑。1986年5月在江西宁都发掘孙诇墓，获得孙诇夫人墓碑（孙诇的墓碑在1960年前后失落），孙诇遗骨以及陶瓮一只、铁剪刀一把、铜环一个，据初步鉴定，其墓为宋朝所修。墓碑内容可印证紫金《孙氏族谱》的正确性。

在紫金中坝也有墓碑两块：一块刻有“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显祖考谧恭穆讳鼎山孙公，妣谧安真孙母陈孺人之墓”；另一块是“显祖友松公孙伯三十三郎墓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考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尚存在一些缺陷罢了。《辨误》一文所引证的一些材料并非可靠，其中一些结论当然也就难以使人信服。因此，翠亨孙氏源出东莞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续考*

薛　翘　刘劲峰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 1936 年),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罗香林先生借主持中山图书馆之机,以数年光阴,广泛访求与收集中山先生的生平及其和革命建国有关的资料,并以其高深的史学才识,对所集资料比证归纳、覃研精思,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 1942 年)撰出专著《国父家世源流考》。①

罗先生的考证资料丰富、论据凿确,其"所考得之世系与事迹,皆明备而前此未晓,其发现之多"② "为《总理专传前记》《党史》所不及详。"③ 孙科先生赞扬说:"罗君此书,于资料搜讨、事迹阐发,皆惨淡经营,成之非易,贡献实巨。盖即所谓世系研究有其明效大验之实证也。"④ 故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影响遍及海内外。

可是,正如罗先生在该书《结论》中所说到的:"历史之研讨,全以资料之获得为凭准,而资料的搜访,又往往受时间与地域之限制。今兹所考。如自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诇公之世次名讳,皆以资料不备、未能明述……盖亦以资料尚缺乏也。海内不乏鸿博而富度藏之君子,甚望能以此类资料,惠赐补订,或籍为更进

---

* 据《江西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民国卅一年十二月于重庆初版,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于上海再版,民国卅六年二月于上海三版。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 见《国父家世源流考》"吴铁城序"。

③ 见《国父家世源流考》"邹海滨序"。

④ 见《国父家世源流考》"孙科序"。

一步之研讨，而别为一书！学术乃国家公器，倘蒙进而教之，则尤馨香祷祝焉。”孙科先生序中亦说：“（罗君之书）自晚唐以至赵宋，其各代名讳事迹，与自赣迁闽之经过，则条例大体，未遑详述，斯因资料不备，有以致之，而闽赣之仍须调查，以别为一书，亦至明矣。”

值得庆贺的是，1981—1983年，江西宁都先后发现《于邑孙氏族谱》、《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以及《唐敕封东平侯讳诇正配陈夫人之墓孙母陈夫人墓志铭》等一批珍贵资料，卒然一读，茅塞顿开，笔者故撰《续考》一文，以补订前考中的某些欠缺之处，并求教于诸位前辈学者。

一、自中山先生远祖孙诇至入闽始祖三承事世次、名讳补正

从孙中山先生起，上溯至入粤始祖友松公，其世次、名讳与行实，《国父家世源流考》俱已明备。结论为：孙百三十三郎讳友松，明永乐间偕弟友义公自闽迁粤长乐上镇约（今紫金县忠坝），自友松公至中山先生，共传十七代。

然而，紫金忠坝孙氏之上世源流又如何呢？罗香林先生仅据《紫金忠坝孙氏族谱》中光绪二年孙见龙撰序云：“我祖友松公偕弟友义公，大明永乐年间由闽迁居嘉应州长乐县，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县，即惠州府永安上镇约的开基始祖也。”“迨及（上世）诇公，族众曰百将公，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才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州也，以功封东平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于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于都青塘[①]、或居安远……积德后昌、生齿日繁，其子孙遂多莺迁。”并佐以宁都

① 青圹乡原属江西于都地，今属江西宁都地。

孙氏八修、十一修族谱(今失)和广东兴宁官田孙氏族谱,确认孙中山先生之远祖为惠末孙诇。而对其在宁都各代先祖的名讳、行实,作者未能涉及。

今证以最近从宁都孙夫人陈氏墓址上发现的清嘉庆十九年重立《唐敕封东平侯孙公讳诇元配陈夫人之墓孙母陈夫人墓志铭》:"夫人乃东平侯诇公之正配,因黄巢之乱,其夫选为百将,遂随夫平兵于闽粤江右之间。以功封侯。始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宁都州是也。生子实,实生七子,惟五子有传:一耀、二英、三士元、四爽、五允,以公、侯、伯、子、男编立五房。人丁繁衍,或隐于凤凰、不头、檀口、七里、清泰,或迁于赣州之赣县、安远、吉安之泰和花石潭、水沟圹;浙江之绍兴、余姚;湖广之湘乡、衡州之衡阳;福建之长汀河田与宁化;广东之韶州、惠州与兴宁。"墓志内容与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所载一致,地点亦能前后衔接。然宁都孙诇后裔迁居福建者,先后曾有二支,一为《于邑孙氏族谱》录五十二年《重修始祖东平侯墓记》所云"……侯房之后八郎传十郎则居福建宁化。"一为《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录《孙氏伯房世系总考》所云:"三世祖讳士元生四子:……次十七郎字有敬……有敬房之后传至七世九承事生三子:……次三承事……三承事之后居福建汀州河田。"按:河田,为今长汀县属地。明清时,长汀、宁化同隶汀州府,长汀为府治所在地。然依民间风俗,所谓居某州、某府者,仅指州治、府治而言。试以清道光四年《宁都直隶州志为证,其"人物志""选举志"下均分列宁都州、石城县、瑞金县各章,而"宁都州"一章只收今宁都县范围内出现的人物,说明狭义的"州"、"府",只指州治、府治所在地。以此可见,紫金忠坝孙氏族谱中的"苗裔定居汀州府"指的是由宁都迁往长汀河田的孙氏伯房后裔,而不是迁往宁化的侯房后裔。

继查《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卷首“世传”、卷二“士元次子有敬公房位下世传”：

“始祖诩公，乃中书舍人拙之子……殁葬第三桥乌石营，今呼马架坑，癸山午向肖人形。配陈氏，诰封一品夫人，殁亦葬于归仁里乌石营，与公坟隔一堵，地肖绣针落槽形，卯山酉向。生子：四居士。”

“第二世，诩公之子四居士，讳实，殁葬松上鹤卵圹兑山卯山乙向。”“夫人邱氏、继刘氏，俱原葬万伏里高山芙容圹。子七：大郎耀为公房……二郎英为侯房……三郎士元为伯房……四郎叔、五郎容无考，六郎爽为子房……七郎允为男房。”

“第三世，实公之子士元公，殁葬归仁里第二桥果子园藤形亥山巳向。”“娶赖氏，原葬归仁里大仙山岭下，生四子：有恭、有敬、有惠、有信。”

“第四世，士元之子十七郎，字有敬，娶林氏，原俱葬祝家分马铺前……生一子：六郎。”

“第五世，十七郎之子六郎，字思明，殁葬万伏里仰湖底金盆形，娶赖氏，原葬祝家分……生一子：十六居士。”

“第六世，六郎之子十六居士，字汉儒，葬石圹里七星圹。娶陈氏，葬夫墓左，生二子，惟九承事传。”

“第七世，十六居士之子九承事，讳智亮，字元明，葬郭家坳七里圹挂壁金钗形癸山丁向。娶张氏，葬桃林里鹧鸪金笼岭下，生三子：二居事、三承事、四职医。”

“第八世，九承事长子二居士，讳璋、字彦珪，葬钦贤里长胜雪坑桥伏兔形。娶刘氏，葬归仁里中坑，生二子：五评事、七知录。”

“第八世，九承事次子三承事，原本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

“第八世,九承事三子四职医,字日华,娶周氏,原俱葬十七都新田村兰竹头黄蛇衔鼠形。生二子:六职医、八郎。”

从上可知,自孙诫起至入闽始祖三承事,孙中山先生之先祖在江西宁都共居了八世。八世名讳均有据可查。至此,除福建长汀一段历史,因资料匮乏,尚不能明了外,中山先生在江西及广东的先祖世次、名讳及行实,俱已一目了然。

但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之五“紫金忠坝孙氏之源流与迁移背景”却谓:“考宁都南门外直街孙氏族谱,载诫公有第四世孙曰承事者,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这种说法显然与史实相违。为什么罗香林先生会产生这种错误呢?究其原委,原来罗香林先生在撰写《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前,并未亲眼见过宁都孙氏族谱,其部分史料是由当时的江西通志馆馆长吴霭林先生提供的。书末“附注20”云:“江西通志馆馆长吴霭林先生(宗慈)自余发现国父上世谱牒,知其先代曾宅居江西宁都后,即曾派员至宁都调查遗迹,闻已获得相当资料,亦可喜消息也。兹抄出其第二次来函,以供参考。‘香林先生史席:奉十月二十八日手书,关于国父世系源流考,具悉梗概,现已派专员调查其族谱、墓地等尚未藏事……据已查得之谱系表,将由虔化迁居各地之记载抄奉……诫公之子伯房之第四世,曰承事者,谱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而由闽再迁粤。只伯房第四世承事一支……弟吴宗慈拜启。卅年十一月四日。’”信中所谓迁居福建汀州河田之“承事者”,吴先生并未指明是“九承事”还是“三承事”。但依其语意,是伯房以后的第四世,而从孙诫至伯房始祖士元还有三世(包含士元),一共为七世,这恰与九承事的世次相吻合。可是,史料记载九承事并未迁往福建,其墓葬仍在江西宁都县郭家坳七里圹。迁居福建长汀者是九承事的次子三承事。显然,吴先生是把三承事与九承事混为一谈了。之

后，罗香林先生又因一时疏忽，把“诇公之子伯房之第四世”看作是“诇公之第四世”，于是错上加错，得出了与史实相违背的结论。

至于三承事为何携家迁闽？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我们须先明了三承事的身份及其所处时代如何？对此，族谱无明确记载。然从孙诇家族的情况来看，五代、宋、元，其子孙多有以官职为称号者，如《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公房世传：九世，一学谕，讳述，登绍兴二十年科举人，授沙县教谕。”“男房八郎公世传：八世，六权府，讳逑，登宣和五年科举人，授象州推官权府事。九世，八县尉，讳时敏，登宋绍兴二十三年科举人，授英州真阳县尉。”“伯房三子有惠公位下：十世，九贡元，讳材卿，登淳熙十三年科举人。十四世万一盐运，讳舜臣，字大用，仕元授两浙都转盐运使司；万四元帅，讳正臣，字平轩，授提举，封奉议大夫、吉水知州……再赠中顺大夫、淮东道元帅、乐安郡侯。”而宋代有所谓“承事郎”者，是文官的低级官阶，为正八品。以此可以推论，孙氏九承事和三承事均可能做过宋代的下层官吏。又根据宁都孙氏族谱所录由宋岳州知府孙勰编次的《孙氏宗族世次总录》，作者署为孙诇八世孙。考孙勰为孙氏伯房有信公的后裔，弟元祐三年进士。勰与三承事世次相同，在世年代亦应相近，故三承事在世和迁闽时间可大约定在宋元祐前后。此时正是宋政治局面最混乱的时期，官场中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现象尤为严重，故许多有志之士退避三舍、隐居山林，以免杀身之祸。而孙氏家族在此前后的处境也是非常艰难的。史载三承事的堂伯（叔）父、有信公后裔孙立节，字介夫，弟皇祐进士，授翰林学士，后因对王安石行新法持异议，被贬为镇江军书记。不久，在鞫宜州狱时，为保全无辜者十二人，被经制使谢麟指为“抗拒君命”，险遭不测。后来，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一宣教携家迁居浙江余姚；三子勷多期隐居宁都郊外，屡荐不仕。次子勰虽然致仕，

历陈、岳二州知府，但心情一直很忧郁，有诗为证："多病厌丸垢，思欲求道真。金精古福地，中有超世人。驾言从之游，洗我千劫尘。……"① 其父之好友苏东坡在来信中也谆谆相告："窜逐中惟欲亲故，谢绝为孤寂可怜者，则孤老犹可以谪安。若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远千里相求，此重增其罪戾也。千万寝之，切告切告。"② 不久，勰亦告退，携家移居陈州。③ 据此分析，三承事由江西宁都迁居福建长汀，或许与同辈人一宣教、勰一样，皆因宦业关系，不愿连累其族，而远其居也。

二、对自孙诜至中山先生所传世数的推算

前文已经论及，罗香林先生在撰写《国父家世源流考》时，因一时疏忽，把中山先生之先祖在宁都的世数搞错了。但因罗先生德高望重，这个错误长期以来得不到纠正，以致后人一再沿用，使得在推算中山先生的先祖世数上，亦出现不少混乱。

今仅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澳门《华侨报》上发表的胡伯洲先生的《孙中山家族世次、名讳、生卒年代、诞生地点与行实的研究》一文为例，胡先生一方面沿用了罗先生"从孙诜的第四世起迁居福建汀州河田"的错误观点，一方面又吸取了宁都孙氏族谱上所记载的"孙诜——实——士元——有敬——六郎——十六居士——九承事"的世传资料，于是便主观地把孙氏入闽始祖由"承事"改为"有敬"，把九承事列为孙氏入粤始祖友松公的父亲，并由此得出结论：从唐末孙诜起，中山先生之先祖在宁都居四代，在福建居

① 见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卷首：《志康祖题金精洞诗》。
② 见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卷首：《苏文忠公答志康公书》。
③ 见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卷首：苏过撰《二知府墓志铭》。

三代，在广东居十八代，“到孙中山先生已是二十五代”。这种结论显然是很不科学的。

前文已证，孙氏入闽始祖三承事在世和迁闽时间大约在宋代元祐前后，而史载友松公是大明永乐年间自闽迁粤的。三承事的父亲九承事与友松公之间相差三、四百年，怎么可能是父子关系呢？又据史载，孙诜于唐僖宗中和年间在世，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诞生。从友松公在世的明永乐初年至中山先生出生，历 463 年，传十七代，每代间隔约 27 年，殊诚合理。但从孙诜在世的唐中和初年至明永乐初年，中间至少相隔五百多年，如果仅传七代，每代间隔竟长达七十余年，其为无稽，则不待辩而可知。

那么，以笔者之见，从孙诜到孙中山先生，其间到底应该传了多少世呢？今据以孙诜八世孙三承事的在世时间，因有同房同辈人相比较，可定在宋元祐前后。而从唐中和初年（公元 881 年）至宋元祐初年（公元 1085 年）历 205 年，传了七代，每代间隔为 29 年。对照自友松公到中山先生，每代间隔 27 年，仅多了二年，这种传代速度是可信的。如果用这种速度去推算孙氏在闽期间的传世数，则从元祐初年到永乐初年的三百余年中，至少可传十代。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致地推断：从唐末孙诜起，孙氏在江西宁都传七代至八世祖三承事；三承事在福建长汀传十代至十八世祖友松公；友松公在广东又传十七代至孙中山先生。前后大约共传三十四代。也就是说，中山先生应是孙诜的第三十五世孙。证以《城南富春孙氏伯房第十二修族谱》中对有确凿生卒年月的人物的记载：“九承事长子二居士位下：十七世，子美公，生于明永乐十五年七月初二日，殁于宏治四年二月十五日；子实公、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八月初五日，殁于宏治十五年五月初一日。三十三世，家谟公，生于清同治壬戌年五月二十三日，殁于光绪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三

十五世，良桂，生于民国甲戌年六月十九日子时。”这些人的世次及在世时间均可能分别与友松公和中山先生相近似。说明这种推算尚属比较合理。当然，准确的结论还待对福建孙氏族谱考证以后才能作出。

“紫金说”与“东莞说”孰是孰非*

——孙中山祖籍何处?

张　方

最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为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县中坝区“孙中山纪念馆”以及“发昌孙中山祖籍纪念陈列馆”赠送了邓小平亲笔题写封面的《孙中山先生画册》。在这同时,民革中央又为紫金县“发昌孙中山祖籍纪念陈列馆”赠送了瓷塑孙中山座像。

这则短新闻,不会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但却引起不少史学界人士的注意。因为刚刚一年前,史学界曾在东莞市举行过一个规模颇大的“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座谈会”。最后得出颇具权威结论:世有孙中山祖籍是广东紫金县和广东东莞县两说。但前一说论据不足,“东莞说”理由更充分。有关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海内外传媒曾予广泛报道。

但是,最近民革中央向紫金赠书,赠像之举,显然还承认紫金是孙中山的祖籍!同座谈会的结论大相径庭。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向来有“由东莞迁中山”的成说。但是,一九四二年,著名学者罗香林在重庆写成《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提出“孙中山的先辈本居紫金中坝公馆背村,十二世祖孙琏昌才从紫金辗转迁到中山定居”的新说。得到包括蒋介石及孙中山儿子孙科等在内的时人承认(当然也有人认为论据不足)。一九六三年,

---

* 据香港《新晚报》,1987 年 10 月 18 日。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谭彼岸撰文指出罗香林之说不能成立;但两年后,仍然健在的罗香林又撰文反驳,重申他的"紫金说"的观点。

罗香林的主要论据有两条。中其之一系美国人林百克写的传记《孙逸仙》转引过孙中山的一段话。中译本中的一句作"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据此,罗氏推断孙中山的先代住在东江一条名为"公馆"(Kung Kun)的村里,而紫金恰有此村。另外,罗氏又在公馆背村内发现了孙氏族谱,上有该村孙氏十二世祖琏昌于清初移居增城,去向不明的记载。

否定罗氏说的依据之一,系"Kung Kun"显系"Tung Kun"(东莞)之误。笔者系考古的外行,但这"监硬"改 K 为 T 的论据却实在感到欠说服力。

前不久,江西宁都发现了一部孙中山的祖系家谱。经有关部门、学者的调查,证实孙中山的祖籍是从河南陈留迁粤的。其路线为:陈留——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增城——中山涌口门村——翠亨村。看来,要真的推翻"紫金说",还要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来。

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

邱　捷

孙中山的祖籍在何处，对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1986年，我和李伯新同志写了《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目的只是为了澄清在孙中山祖籍问题上的误会。这篇文章提交1986年11月在广州及中山翠亨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一些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肯定了该文的结论，认为问题基本上已说清楚。本来，似乎没有必要再就这个问题做文章了，但出乎意料，我们的文章在孙中山研究的学术界以外却产生了反应，少数人在批评我们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制造了新的误会。为弄清历史真相，维护纪念和研究孙中山的严肃性、科学性，我不得不再作些补充说明。

一、几种不确切的看法

我们在1986年写的文章认为，罗香林教授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提出的"孙中山祖籍紫金说"是不能成立的，孙中山的祖籍应是东莞。有人称我们的观点是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新说"。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据孙中山家谱及孙氏历代口碑相传，孙家的祖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年版。

籍就是东莞。30年代初,国内多种刊物依据邓慕韩披露的翠亨《孙氏家谱》的内容,谈及孙中山祖辈时也说是从东莞迁来。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32年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铅印本)及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的《总理事略》,均采"东莞说"。而"祖籍紫金说",则是罗香林先生1942年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后才出现的。开始,这只是罗先生个人的一种学术观点,由于学术范围以外的原因,这种观点后来才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论点。我们的文章只是引用多种文物资料证明孙家历代相传的"祖籍东莞说"是正确的而已,算不上提出什么"新说"。

有人认为,罗先生的论点"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接受,影响遍及海内外"。[①] 我们虽无从统计究竟有多少学者接受罗先生的意见,但可以说,在我国研究孙中山的学术界,多数人并不认为研究孙中山的祖籍有很大意义,更没有重视所谓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宁都的说法。同时,无论是内地、台湾还是海外,都有研究过孙中山家族的文物史料的专业工作者写出文章论证罗先生的"祖籍紫金说"不能成立。国内也有一些文章接受和沿用罗先生论点的,但在国内报刊正式发表的专门为罗先生论点辩解的文章,我只见到洪永珊、舒斯华同志的《翠亨孙氏源出东莞之说不能成立——与李伯新、邱捷同志商榷》一篇。这篇短文的作者对问题的研究状况和有关资料了解不多,引用资料时又没有注意核对考订,主要是强调自己的一些疑问和想法[②],很难说这是学术界代表性的意见。

---

① 薛翘、刘劲峰:《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② 见江西《争鸣》1987年第4期。舒斯华等同志还写了一篇没有正式发表的《孙中山家世源流考证》。此外,紫金县的钟声、陈国岐也向各地寄发过一些油印文章。但这些文章只是不确切地抄录罗先生的一些说法,主要是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谩骂攻击,故不予讨论。

有人认为，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题署，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这可以证明罗先生的论点是正确的。应该看到，因为国民党中央在1940年作出追尊孙中山为国父的决议，而罗先生在不久后即以学者身份、怀着对孙中山崇敬之情写成了这部研究孙中山家世的学术著作，正好适应了当时的需要。但也要看到，上述题署、作序者，虽身任要职，但恐怕不能说都是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无论是他们本人或是他们的侍从机要人员，都未必有闲暇认真阅读这部长达数万言又十分专门的书稿；而有关的参考资料又均不在重庆，就算读了也无法对学术问题的是非作出判断。孙中山的侄孙孙满前些年透露，孙科和吴铁城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的序，是罗先生草拟的。[①] 此说可作了解题署作序情况的参考。况且，我们研究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而不应以昔日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物的表态为根据。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物对学术问题的表态，有时可以阻止学术讨论的正常进行，却不可能长久地压住不同的意见。在罗著出版时，国民党党史会就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意见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但在近年，台湾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批评罗先生的论点了。到底翠亨孙氏历代口碑相传的“东莞说”和罗先生提出的“紫金说”孰是孰非，我们认为，只有在详细搜集和深入研究有关文物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学术讨论，才能作出结论。

二、翠亨的文物证实孙中山的祖籍不是紫金而是东莞

在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问题上，从罗先生那时到现在，所有

① 孙满：《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台北《广东文献》第12卷第4期。

持“祖籍紫金说”的人都有不重视甚至完全离开中山翠亨的文物的倾向。须知我们研究的是孙中山的家世,当然应从孙中山的故乡翠亨出发,再上溯寻找根源。如果无视孙中山家族成员留下的文物资料,到远离翠亨千百里外的地方“考证”孙中山的家世源流,无论怎样努力,也只会是南辕北辙。

罗先生考证孙中山祖籍时引用的翠亨孙氏文物只有一种——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他转述孙妙茜、陆华禧的话说这是孙家的“唯一家传信史”[①]。所谓“唯一家传信史”的说法,不是孙妙茜的原话,只是罗先生的理解或概括。但这种理解或概括是否符合事实则值得研究。孙氏在翠亨至少已居住了百余年,其间并未经历乱离迁徙(据现有史料,清朝官吏也没有对中山故居进行过破坏),何以整个家族才留下一种可信的文物?事实上,目前在翠亨中山故居保存和展出的文物就有多种,它们都是孙中山家族留下的原物,并无任何证据说明其中有不可靠的。

翠亨孙氏的文物,包括《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没有一种提到过紫金。罗先生对《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的误解,我们在1986年写的文章已详为论述。这本纪念簿并不是家谱,它只是以孙达成(孙中山之父)为界限记录十二世祖至十六世祖历代祖先及孙达成一家人的生卒时间,此外并无其他内容,与紫金孙氏一点关系都没有。

翠亨的《孙氏家谱》则确切地记载着孙氏上世来自“东莞长沙乡”(今上沙乡)。罗先生似乎没有看过这本家谱,对他提出的一些疑点我们也已作过详细说明。最近,有人因《孙氏家谱》疏略,文句不通,对其可靠性提出怀疑,这是要作些分析的。

---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5页。

一种家谱是否可信，不应看它的文字是否典雅及印刷是否精美，而应由它所记的内容、它的收藏者与收藏地以及有无其它文物资料作佐证来判定。翠亨《孙氏家谱》并不是在远离中山故居千百里外新发现的东西，它长期保存在翠亨孙中山故居，以前由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收藏。30年代初邓慕韩抄写该谱时孙满也在场[①]。孙妙茜的后人和故居的工作人员都可证实其来源的可靠性。若它不是孙氏的家谱，孙妙茜当然不会珍藏它。

有人以《孙氏家谱》和其他一些族谱有所不同，而且又是个稿本，便妄称之为“无头族谱”。旧日的家谱族谱并无统一的规格，岂能因《孙氏家谱》与其他一些族谱有不同便认为它不可信！事实上，《孙氏家谱》也如一般家谱族谱一样，有修谱原委、祖籍所在、历代祖妣名讳生卒年代葬地等内容，只是文字较粗糙而已。须知孙中山的先世是“躬耕数代”的乡村居民，翠亨孙氏全盛时不过十来户，这样一本简陋的家谱稿本与孙氏家族的情况是相适应的。家谱开头没有像一般族谱那样详述始祖的官职头衔，倒是反映了翠亨孙氏纯朴的家风。如果孙中山的家族保存了一本记载详尽、文字典雅的大部头族谱，才是不合情理的事情。记载翠亨孙氏来自东莞、详尽而印刷精美的族谱也不是没有，中山沙边《孙氏族谱》就是一种（藏中山市中山图书馆）。但这种族谱不是翠亨故居收藏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它作为论据。

翠亨《孙氏家谱》可与翠亨的孙氏各代祖墓、族内账册、文契互相印证。特别是坟墓，那是很有力的证据。在翠亨附近的孙中山先代及亲属墓，大致分布三处：一处是犁头尖山脚西南面，即现中山纪念中学附近，此处有孙中山之父孙达成墓、兄孙眉墓及孙眉之

①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中山大学藏原稿影印件。

子孙昌墓(在犁头尖山脚南);第二处为犁头尖山腰,土名竹高龙处,有始祖婆陈氏、五世祖礼瓒、六世祖乐南、七世祖耕隐、八世祖怀堂、十四世祖殿朝之墓,十六世祖敬贤则葬山腰南面土名皇帝田的地方;第三处是翠亨村以北二公里处崖口乡附近的谭家山,十一世祖瑞英、十二世祖连昌、十三世祖迥千以及孙中山长女孙娅均葬此,共39穴。谭家山的山坟是30年代从犁头尖山脚的看山田、上林边等处迁来的。在30年代唐绍仪任中山县长时,因修建纪念中学,便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拨款,经唐绍仪过问择定谭家山的一面平坡作为孙家的墓地。孙社正老人(现仍健在)亲与迁葬事,有详尽的说明。①

这些坟墓的墓主很多在翠亨《孙氏家谱》有记载,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家谱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有力证实了罗先生关于翠亨孙氏十二世祖连昌于清初始从紫金迁居香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孙氏五至十一世的坟墓就在翠亨。可见,孙中山的先世在明朝已经定居香山了。

但是,对孙氏祖墓这个铁证,不知何故,也有人认为不可信,甚至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议论。坟墓不比其他东西,在昔日是一年祭扫几次的。孙妙茜长期住在翠亨,孙科虽在外,孙满、孙乾兄弟则是常回乡的,孙乾还在中山县任过官职(解放前孙乾先生在中山县任过公安局长、县长),若说有其他人将祖坟冒葬入孙氏墓园而无人过问,那是绝不可能的事。翠亨村并无别支孙姓,也不会发生其他孙族墓葬与孙中山家族墓葬混淆的情况。而且,这些墓葬中有人所共知的孙中山家族的成员,从各墓的排列也可看出这是同一个家族的墓地。例如,十二世连昌和十三世迥千是可以确定

① 《翠亨附近孙氏祖墓情况》,《中山文史》第10辑,第31~33页。

为孙中山祖先的，十一世瑞英的墓与连昌、迥千墓同一列，瑞英墓居中，各墓相距不足三米，墓碑分别写明系孙氏十二、十一、十三世祖，这充分说明墓主之间有传代关系。有人还因罗香林没有见过这些孙氏祖墓就认为它们“不可信”，这更没有道理。这些墓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以其他人看见与否或承认与否作为其可靠性的依据。

翠亨孙氏十一世祖瑞英是不是孙中山的祖先？罗先生曾认为不是。问题出在翠亨《孙氏家谱》关于瑞英的记载有些问题，在1986年写的文章中我们对所谓瑞英“乾隆甲午”始迁迳仔蓢的问题作了说明，但有人仍一再重复罗先生的误解。瑞英为孙中山的祖先有多种文物可证实，是无可怀疑的。解放后，研究过孙中山家世及早年事迹的专业工作者，都知道翠亨孙中山故居的两件文物——同治二年、三年孙达成兄弟批耕瑞英祖遗下山荒合约（两件）。这两件合约在故居展出了二三十年，一些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著作中早已引用过它们。在合约中，孙达成兄弟自称为“瑞英祖”的“嗣孙”。孙中山的父亲已明确承认瑞英是自己的祖先，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可信”，这就很难理解了。

翠亨孙中山故居保存的“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也证实翠亨孙氏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孙达成参与管理过翠亨孙氏公尝，留下《乐安堂仕合号帐册》；翠亨祖庙有重修、三修、四修碑记。帐册和碑记内列的族人姓名与《孙氏家谱》、孙氏祖墓可互作参证，说明罗先生提出的孙中山祖上于清初才从紫金迁入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山市中山纪念堂二楼还陈列了一幅孙中山1912年5月在左埗头乡“孙

氏宗祠”与孙族叔伯的合照[①]。它证明了罗先生的“国父上世与左坡头孙氏同源说之非是”的论点是错误的。文物与口碑资料均可证实,左坡头孙氏与翠亨孙氏是同源族亲,先世均来自东莞上沙乡,与紫金孙氏完全无涉。

三、孙中山族人对祖籍表态的资料——多数承认东莞

罗先生的“祖籍紫金说”,发端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译本(徐植仁译)的一处误译,故有“国父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误解。只要把中、英文对照,稍懂英语的人都可以看出译文的错误。罗先生认为东莞不属东江,其实是不对的。东江穿东莞县境而过,故英文可称东莞“on the East River”。《实业计划》第三计划第二部丁有关东江一节中着重讲东莞,可见孙中山本人也认为东莞属于东江范围。至于罗先生误以为是孙中山祖籍的紫金中坝“公馆背”,位于紫金县的东北,离东江最近处也有数十里,已在东江、韩江分水岭的东北,作为一个村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on the East River”的。所以,拿林百克转述孙中山的话来证明孙氏祖籍在紫金,那完全是误会。

1912 年 5 月 11 日孙中山与东莞上沙孙姓族人同开孙族恳亲会,上沙乡孙衍佳尚存有其父孙同发留下的开会的传单、合照,1912 年 5 月 15 日广州《民生日报》对此事也作了报道。这是证实孙中山承认与东莞上沙有渊源的一项资料。恳亲会的宣布员孙龙光在演说中称,与会孙氏系“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的,上沙孙氏

① 于平:《孙中山 1912 年回故里》,《香山》报孙中山诞辰 120 年纪念专刊,该照片也在同期刊出。

正是这样，紫金孙氏则不是。旧日国民党党史会还收到过一件“民元总理返粤，曾往东莞员头山祠堂祭祖”的资料，冯自由在答复党史会询问时说：“总理曾往东莞，似属确实”①。此事详情如何，尚待进一步证实。但最近有人宣称，“经调查考证”，“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确实曾带廖仲恺、王宠惠（当时的外交部长）和邹鲁（中大校长）去东莞拜祖。事实上，孙中山去东莞只是借拜祖之名，其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因当时东莞明伦堂握有万顷良田，粮足钱多”②。这种说法十分奇怪。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王宠惠任外交总长时是在南京，怎有可能去东莞祭祖筹饷？邹鲁任中山大学校长是1932年的事（1924－1925年任广东大学校长）。东莞明伦堂于孙中山在世时并无孙姓参与掌管，祭祖怎能筹饷？无论祭祖一事是否属实，以孙中山的品格和身份，他岂会为筹饷而冒认东莞孙姓为祖先？显然，上引“调查考证”违背常识，发言也是不够慎重的。

持“祖籍紫金说”的人，特别强调孙科先生曾有承认祖籍为紫金的表示，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前，孙科先生曾为持“祖籍东莞说”的《总理事略》题写书名，并曾“商请粤省府拨款廿万元在员头山建立中山小学，并摄影祠宇，筹建纪念祠，旋因政变中止。”③ 在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后，他又于40年代末为东莞上沙题写过“国父先代故乡”。④ 孙科先生对祖籍的表态与孙氏其他成员有异，前后不一致，他自己又没有作过

① 《林一厂日记》1944年2月22日，原件藏中山大学。林为国民党党史会纂修。

② 洪永珊、舒斯华文，见1987年南昌《争鸣》第4期。一说此事系在大元帅任上，但王宠惠1917年以后已没有在孙中山的政府内任职。且孙中山任何时候都不会为筹饷而冒籍祭祖。

③ 孙汉基致罗香林函，12月8日，年份不详，当在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藏影印件。

④ 牌坊毁于1966年，但看过此坊的东莞人甚多，上沙旅港同乡会保存有照片。

说明。因此,无论是“东莞说”还是“紫金说”,似均不宜以孙科先生的表态作为主要论据。

孙氏族人承认东莞为祖籍的最明确、最有力的证据,是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对国民党党史会的钟公任说的话:“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① 近年孙满公布乃祖孙眉保存的《家谱略记》,与《孙氏家谱》大体相合,也可作为孙眉承认“东莞说”的一项间接证据。孙满、孙乾兄弟从来只承认“东莞说”而不承认“紫金说”。1933年5月22日,孙满兄弟偕同邓慕韩到东莞谒祠祭祖,调查孙氏先代世系。② 近年,孙满不仅发表文章反对罗先生的论点,而且致函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详细列举证据说明孙氏祖籍为东莞。③目前仍居中山市的翠亨孙氏族人孙社正也证实,他们孙家历代都以东莞为祖籍,与紫金并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在孙妙茜以前,翠亨孙氏已把祖籍搞错了呢?这种事在旧日是不可思议的。若真如罗先生所说那样,孙氏祖先清初始从紫金移居香山,到孙中山出生时才不过五六代,不满200年,孙氏又一直居住在香山,而且孙中山的祖、父都“醉心风水”,孙达成还参与过族内公尝的管理,何至会“数典忘祖”,连祖籍在何处也不清楚而要由别人日后“考证”出来?何况,翠亨所存的各种文物资料,又都证实了孙氏历代口碑相传的“祖籍东莞说”是有根据的。

---

① 钟公任:《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引自《林一厂日记》1944年2月9日。

②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第30页。

③ 《国父年谱》第3次增订本(台北,1985年),第2页注。同页注又提及孙科夫人陈淑英女士的一封信,称孙中山“为客家人,老家在紫金县”,而未列举依据。但陈女士稍后在答复《国父之生平与志业》作者庄政询问时又说:“我不能说国父一定是客家人,也不能说一定不是”(庄政:《国父是客家人吗?》,《书和人》第484期)。

在这里,顺便谈谈孙中山家族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对此,国内外若干书刊有些不正确的记述。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特色和优秀传统的一支,仅在近代就涌现出很多为国家民族作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孙中山是否客家人,本无关宏旨。但为弄清历史真相,也应作些说明。我们曾从居住地、语言、风俗、习惯、婚姻等方面分析了翠亨孙氏不可能是客家人的理由。若孙中山先世真是在清初从紫金迁来,以客家人顽强刚毅、重视传统的特性及当时香山有大量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聚居的环境,孙家决不会在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把语言风俗改变殆尽。现再补充两条足以证实孙家并非客家人的资料:

《孙逸仙传记》中译本记载孙中山反对给姐姐(疑为妹妹之误)缠足时,孙母以客家人才不缠足的事实反驳儿子。[①] 但孙母反驳儿子的话,中译本省略了没有译出,在英文本,这一段是:"'Behold the Hakkas!' declared the mother or Wen. 'No Hakka woma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 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 Hakka woman or a Chinese woman?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②]。译成中文,大意是:"文(中山)的母亲断然地说:'看看客家人吧!没有一个客家妇女是缠过脚的,客家人不像本地人或中国人那样缠足。你想你的妹妹成为一个客家妇女还是一个中国妇女?你想她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还是成为一个外乡人?'"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人误以客家人为少数民族;怀有大汉族主义偏见的人甚至有把少数民族当成不是中国人的。孙母的话反映了旧日一些

①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英文原著名为《孙逸仙与中华民国》),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第73页。

② 《孙逸仙与中华民国》(英文),第81页。

错误的见解。但是,于此也可见孙家并不认为自己的家族属于客家人。

另一个证据是孙妙茜之孙杨连逢先生的说明。他长期与孙妙茜住在一起,直到她去世。他答复笔者关于《孙氏家谱》是否孙妙茜收藏及孙妙茜是否客家人两个问题时说:"1. 翠亨现存的《孙氏家谱》是我在 1956 年底交给故居的,该家谱是家祖母在世时一直保存的。""2. 翠亨村附近都是客家村(如石门、九堡、竹头园),惟独翠亨村的人是讲本地话的,家祖母是讲本地话的。"①

四、紫金中坝的孙氏族谱和其他资料——与孙中山的家族无关

罗先生写《国父家世源流考》,在翠亨孙氏的资料中只引证了一种——《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在紫金的资料中也只引用了一种——紫金忠(应为中)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翠亨的《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第一句有"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而紫金孙谱又有"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的记载,罗先生便断定紫金中坝的琏昌即香山翠亨的连昌。关于紫金的琏昌是否到了香山,罗先生的考证是:"惟连(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盖连(琏)昌公之初迁增城,本属流移性质,其迫于生事,而再谋迁沃壤,乃人情之常。而当时粤东大吏,又能明为招徕,则其迁居涌口门村之底蕴,不难推证而知矣"②。一部《国父家世源流考》,在紫金的

① 杨连逢先生 1987 年 11 月 2 日给笔者的复信。

②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 1954 年修订版,第 15 页。

琏昌是否到了香山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的直接考证，仅有上面这86个字的推测之词。而事实上，翠亨的各种文物完全可以证实，紫金的琏昌并没有来到香山涌口，翠亨孙氏先世在明朝已居住在香山，并非琏昌的后代。

有人详细摘录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各代的内容，以为这就可以“考证”孙中山祖籍在紫金。那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并不是孙中山家族成员保存的，也不是在翠亨收藏的。要证明这个族谱与孙中山家族有关，首先必须在翠亨找到相应的证据。但翠亨的所有文物资料没有提过紫金，罗先生引用的中坝孙氏族谱也没有提过香山。因此，把紫金中坝的族谱引述得再详细，也只是反映了紫金中坝孙氏的家世，与孙中山的家族了无关系。

近来有人提出，罗先生引用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关于“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是“一个不可靠的材料”，“经考证：紫金档案局所藏《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光绪二年重修）所记载的‘十二世孙连昌移居增城，后移香山开基’，才是可靠的历史事实。”并说紫金中坝琏昌的“琏”字有“王”字偏旁也是“后人的讹传”①。

这也可以说是“祖籍紫金说”的一项新发现了，但如何“考证”的，并没有任何说明。《紫金中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是罗先生写《国父家世源流考》最为重要的资料。若这一新发现可靠，虽仍未能证明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但却无异说罗先生在研究时引用不可靠甚至是伪造的史料。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比批评他的论点还要严重的指责，因为这涉及史德问题。

但是，在引用紫金族谱问题上，说罗先生有“失误”，这是不公

① 洪永珊、舒斯华文，见1987年南昌《争鸣》第4期。

正的。我们不同意罗先生从这个族谱得出的结论，但我们又看到，罗先生引用该项资料时态度是严肃负责的，他在书中说明这本族谱是中坝孙屋排孙桂香保存的，还详细说明寻找和抄录这本族谱的经过。①

1954年台湾出版的修订本《国父家世源流考》和《国父之家世与学养》，均把紫金中坝孙氏族谱旧抄本照片制版置于卷首。关于十二世祖琏昌公的记载，确实是“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紫金族谱十二世祖琏盛、琏昌、琏桥均以“琏”字排行（翠亨《孙氏家谱》十二世祖连富、连德、连昌以“连”字排行）。可见，罗先生引用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并无“失误”之处，无论从来源或内容来看，都决不能认为是“不可靠的材料”。至于他根据这个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

紫金中坝的孙氏族谱修于雍正七年（1729年），那时已查不清琏昌的情况了，到光绪二年（1876年）重修族谱时，关于琏昌的记载仍是“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从本世纪40年代罗先生依据孙桂香保存的族谱写成《国父家世源流考》，到1954年修订这本书，都没有发现琏昌公“移居香山”及“琏”改为“连”的资料。同为光绪二年重修的中坝孙氏族谱，为何现在披露的与罗先生引用的在关键的字句上有如此不同呢？

我看过目前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的一页影印件，才明白了问题所在。在十一世鼎标公栏下，确有“次曰连昌公，后居增城，后移香山县开基”的字样，但同页另一处又有“……系十六世嗣孙君盛、桂香重修置过新碑”的记载。而孙桂香正是为罗先生提供中坝孙氏族谱的人。可见，“后移香山开基”是《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修订版，第49、50、59页。孙桂香等人曾与罗先生通信。

才"考证"出来的。现在有人竟拿这点"考证"出罗先生写这本书时引用的中坝孙氏族谱"不可靠"。这真是太冤枉罗先生了。

事实上,要"考证"出琏昌到了香山翠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香山(更不用说在翠亨了)根本没有发现过任何有关紫金琏昌的资料。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因为"事出意外","忠坝孙姓少数人竟为地方豪劣讼棍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榨,无不令人感慨。"① 这个颇带戏剧性的插曲,也足以证实罗先生的著作出版以前,紫金中坝的孙姓和其他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中坝孙氏会与孙中山的家族扯上关系。怎能到了现在,却可考证出琏昌"后移香山县开基"呢?

紫金的琏昌与香山的连昌并非同一个人,还可以由中山、紫金的文物资料证实。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再证》中提到紫金的琏昌参加过钟丁先起义②。近年,紫金的同志经过细致的调查也肯定了这个事实,还找到了琏昌参加钟丁先抗清起义武馆的遗址。③据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孙中山的祖先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己酉(康熙八年)即1669年,而钟丁先抗清起义却发生在顺治三年(1646)左右④。紫金的琏昌既参加了这次起义,那他与20多年后才出生的翠亨的连昌当然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翠亨的连昌成年时已是康熙二三十年,当时永历帝早已死去,三藩之乱也已平定,广东岂能还有"抵抗清兵"的义师?可见,在紫金县也发现了足以彻底推翻"祖籍紫金说"的文物资料。

---

① 温济琴致罗香林电,1944年1月18日,中山大学藏影印件。
② 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第388页。
③ 《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会刊》,第4、7、9、14、23、26页。
④ 《钟义士集》(中山大学藏线装本)。

1987年,《紫金文史》第5辑刊登了一个所谓“孙中山家族世系表”,列出从孙诇以下入宁都的八世及自友松以下至美玲、美兰的二十二代世系。表后注:“摘自江西省档案局、中共广东省紫金县委办公室、紫金县档案局联合调查考证资料《孙中山家世源流考证》。”这容易使人误以为该表真是经几个机构联合考证后公布的新资料。但江西省档案局办公室1987年9月15日给笔者的复信说,该局只有两位同志参加“调查考证”,“这只能代表他们的观点,并不等于是以我局公布的史料,特此说明。”这个世系表也并不是什么“调查考证”的结果,它抄袭自胡伯洲同志《孙中山家族世次、名讳、生卒年代、诞生地点与行实的研究》的附表①,只在江西的世次上稍作了一些改动。胡伯洲同志一时大意,把孙科夫人陈氏与孙治平夫人张氏列入“祖妣”栏中,抄袭者照抄不误。紫金六世的明亶(享),胡伯洲同志的表不误,抄袭者却误抄作“明亭”了。

胡伯洲同志原表入广东一世友松至二十世治平、治强的内容,也不是调查考证的结果,而是基本来自罗先生编制的“国父家世源流图表”(见《国父家世源流考》卷首)。这个图表,始祖友松、二世敬忠、三世永良、四世怀文、五世凤宗、六世明享、七世仕伯、八世绍宗、九世乃和、十世宗荣、十一世鼎标,系紫金中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的内容;十二世连昌、十三世迥千、十四世殿朝、十五世恒辉、十六世敬贤、十七世达成、十八世文(德明,即孙中山),则录自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中山和紫金多种文物资料已证实紫金的琏昌并非翠亨的连昌,所以中坝的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并无关系,不能相接。罗先生的图表也只

① 澳门《华侨报》1985年11月12日。胡伯洲同志1986年在此文基础上改写成的《孙中山先生九族(按应为九代)世系概述》(《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已将十四世殿朝公以前的内容全部删去。

是由两种无关的资料拼成的，没有反映孙中山家世源流的真实情况。现在，有人把罗先生的图表稍作加工，辗转抄袭，用几个机构的名义当作“调查考证”的新资料公布，还称之为“孙中山家族世系表”，这很难说是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

五、江西宁都的孙诇墓和宁都的孙氏族谱
——只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而与翠亨孙氏无关

前些年，传出了在江西宁都发现唐末孙诇墓及《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孙氏族谱》的消息。孙诇墓在40年代已被发现和重修过一次[①]，现在再作修葺，也是为了保护文物的需要。宁都孙氏族谱修成年代虽较晚（1949年修成），但据说内容详尽，相信对了解宁都孙氏源流及迁徙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撰文把孙诇当作孙中山的远祖来纪念，把宁都孙氏族谱当作孙中山上代的族谱，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即使按罗先生的说法及宁都孙氏族谱的记载，孙诇及其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的后代住在江西也是唐宋间事。就算真与孙中山上世有关，纪念1000多年以前的远祖，恐怕也不符合孙中山的一贯思想与作风。孙诇再往上溯，还可找到三国的孙权和春秋的孙书（其他支派的孙氏也如此），难道我们也要把孙权、孙书这些古人作为孙中山的远祖来纪念？

而且，孙诇及宁都孙氏与孙中山先世有关的说法，也是依据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而来的。紫金中坝孙氏的先世是从宁都经福建迁来，宁都孙氏第一代祖先便是孙诇。因为罗先生误以紫金中坝为孙中山的祖籍，按此线索上溯，就把宁都的孙诇误作孙中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26、52页。

山的远祖了。各种文物资料已证实,翠亨孙氏与紫金中坝孙氏并无家世源流的关系。孙诇和宁都孙氏只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与翠亨孙氏无关。在中山翠亨,没有找到任何提及孙诇和宁都孙氏的文物,也没有发现任何证实孙诇和宁都孙氏与孙中山家族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因此,无论把宁都的孙氏族谱抄录得如何详尽,把孙诇墓的方位、外形以至陪葬品描述得多么细致,仍然不能证实这就是孙中山先世的族谱和祖墓。

1986年11月,一些报刊登载了一则题为《专家考证孙中山远祖在江西宁都》的新闻。这则新闻在引述一位"江西省档案局官员"的话后称,"这一结论是江西省档案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宁都县和广东省紫金县、中山县有关人员专门进行实地调查和史料考证之后得出的";并称"在调查考证中发现,宁都的《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与《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有传代关系,而《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又与《国父故居所藏生没纪念簿》有世次传代关系";"考证结论认为,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确为孙中山在赣远祖之族谱,宁都所发现的孙诇之墓确为孙中山先生在赣远祖之墓"①。

必须指出,这位"官员"向新闻界提供的这条消息是失实的。考证"孙中山远祖在江西宁都"的专家们的姓名虽然一个也没有披露,但我们作过了解,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山市并无任何专家参与过上述肯定紫金、宁都为孙中山祖籍的"调查考证"。这次发现的宁都孙氏族谱明明是1949年修成的,怎能"确为孙中山先生在赣远祖之族谱"?宁都的孙氏族谱与紫金中坝的孙氏族谱是否有传代关系,与孙中山的家族无涉,这里无须讨论。所谓

① 《中国新闻》第10997期。

《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有世次传代关系"的说法,则与中山翠亨及紫金中坝的文物不符。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是"调查考证"者完全不了解或无视翠亨的各种文物资料,他们只引用《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一种,又增改了其中的字句,甚至把资料的名称也弄错了。对紫金县的有关文物,也没有作科学的分析考证。离开孙中山家族成员留下的文物资料去"考证"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当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而且,紫金的文物资料恰恰也证实了《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不能相接。

我与李伯新同志曾多次说明,我们研究孙中山的祖籍,只是为了探讨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引用过的每一项资料都详细注明了出处,对不符合我们观点的资料,我们也没有回避。我们愿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我们又认为,祖籍问题虽不影响对孙中山功业与思想的评价,但孙中山是全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人物,研究一切有关孙中山的问题时都应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要科学地、负责地对待一切有关的文物资料。大家都能这样做,才有可能通过讨论取得一致的认识。

《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所考证的并非孙中山的先世*

邱　捷

薛翘、刘劲峰两同志的《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沿罗香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1942年出版)提出的线索,对唐末孙诜以下八世在赣闽的情况作了详细考证。但是,罗先生这本书提出的"国父家世源流"是不正确的,薛、刘两同志的《续考》也因而误以为孙诜以下各代是孙中山的祖先了。

《国父家世源流考》在资料不完备的情况下,提出孙中山的先世于清初康熙年间从广东紫金迁居广东香山,并据紫金中坝孙氏光绪二年族谱抄本的记载,把"国父家世源流"上溯到唐末的孙诜。然而,现存于翠亨孙中山故居的有关孙中山家族的文物资料,说明孙中山的先世于明代中叶已从广东东莞定居香山,香山翠亨孙氏与罗先生提到的紫金中坝孙氏不可能有亲缘关系。在广东东莞和其他地方发现的文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①。

罗先生的书出版后,在国民党党史会的一些学者中就受到激烈的批评。当时负责修订《总理年谱长编》的林一厂,开始时对罗著很欣赏,但对比有关史料后,也写了一份《〈国父家世源流考〉未

---

* 据《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薛翘、刘劲峰《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见本书第479~487页。

① 有关文物资料可参看《中山文史》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专辑,《东莞文史》第4、9、10期。

足征信之点》的报告[②]。因为祖籍问题与孙中山的思想事业没有密切联系，所以，解放后多数学者对罗先生这本书没有特别注意。但是，一些考察过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的史学工作者写出了考证罗先生错误的论文[③]，一些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也谈到过罗先生的论点是错误的[④]。

罗先生的书出版时曾得到蒋介石、吴铁城、孙科、邹鲁等人的题署或作序。不过，研究孙中山的祖籍，自然应以文物资料——首先是翠亨孙氏的文物资料为依据。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中，相信不会有人认为必须以为罗著题署作序的国民党政要的意见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孙科曾为罗先生的书作序，但后来又为被罗先生否定是孙中山祖籍的东莞上沙乡题写“国父先代故乡”的牌坊[⑤]。孙中山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接受罗香林的说法。近年，在台湾和海外有孙甄陶的《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4期）、孙满的《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台北《广东文献》第12卷第4期，孙满是孙中山长兄孙眉的嫡孙）与谭彼岸的《孙中山系同何门——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三大错误》（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0、11月号，谭先生现居美国）等文指出罗先生的错误。台湾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已觉察罗先生的说法不合事实。如对孙中山家族作过专门研究的庄政所著的《国父之生平与志业》一书，就没有再沿用罗先生的说法。

---

② 《林一厂日记》（原件藏中山大学）1944年1月31日～3月10日曾多处提及。

③ 如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广州《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

④ 可参看《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通讯》第6期第8页及香港《大公报》1986年10月26日《孙中山祖籍何处》。

⑤ 该牌坊毁于1966年，东莞市方志办尚存照片。

从文物资料看，孙诇的后代只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但紫金中坝孙氏与香山翠亨孙氏无关，因此，薛、刘两同志《续考》中考证的孙诇以下各世并不是孙中山的祖先。

薛、刘两同志的《续考》，考证的是孙诇以后在唐、宋时期的各世代，对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只是间接涉及。所以，本文实际上并非对薛、刘两同志的考证本身提出商榷，只是提供一情况供他们参考而已。

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

方式光

自从1982年江西发现了《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民国三十八年修)和《雩邑孙氏族谱》(民国三十八年修)以来,各地报刊、杂志、电台多次报道"发现孙中山祖墓,先世族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去年10月,东莞召开了"孙中山祖籍问题座谈会",提出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同年11月12日,紫金县举行了"孙文祖居紫金中坝纪念孙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强调孙中山先祖来自紫金。随后,《江西日报》和《团结报》分别报道了江西宁都"孙中山先祖孙诫墓修葺一新"。这样一来,在中国大陆就似乎有三个不同的孙中山祖籍所在地了。

孙中山祖籍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孙中山的先祖究竟来自何处?是东莞,还是紫金、宁都?如何评价这场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

问题的提出

1931年4日26日,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对前来调查访问的国民党党史会人员钟公任说:"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总理系十八世)。"这是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的最早记载。此后,1932

* 据《南方日报》,1987年12月21日。

年国民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以及1937年胡去非在《总理事略》一书中，分别都采用孙中山祖辈明代从东莞迁居香山（中山）县，俗称“东莞说”。但1942年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中，否定了孙中山先祖从东莞迁来香山的成说，提出了孙氏十二世连（琏）昌公清初从紫金经增城迁来香山的论点，首创“紫金论”。该书得到了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蒋介石、于右任、张继题词，因而“紫金论”就成了国民党官方出版物有关论述孙中山祖籍问题共同采用的权威观点。不过，当时国民党党史会内部就有不同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解放后，我国学术界研究孙中山一般不大注意很多代以前的祖籍问题。但1963年中山大学谭彼岸在广东《学术研究》上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论文，根据翠亨中山故居收藏的两种契据——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批租十一世祖瑞英公遗下的荒地的契约及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否定了“紫金论”，坚持了“东莞说”。1981年台北孙甄陶在《传记文学》上发表《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一文，也主张“东莞说”。稍后，孙满在台北《广东文献》发表《恭述国父家世源流》一文，也批评了“紫金论”，申明孙氏祖籍是东莞。去年11月，邱捷、李伯新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供了《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论文，全面否定“紫金论”，力倡“东莞说”。这就是40多年来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大体经过。

“紫金论”不足为据

1942年，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根据1926年美国人林伯克在《孙逸仙传记》一书译本中有下列一段孙中山关于祖籍问

题的自述——“其实,我和我的几代近祖的确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的”。罗香林从“龚公”村即“公馆”村的假设出发,后又发现紫金中坝有个公馆背,还有中坝《孙氏族谱》记载了“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一句话,与翠亨孙中山故居所藏《孙氏家谱》中有“十二世祖考连昌公”世次、姓名、读音相同,从而得出了“国父上世源流出于广东紫金中坝公馆背”的结论。

这种做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首先,把“龚公”村假设为“公馆”村是一种误译。关于孙中山家庙(祖祠)的英文原文是:“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若假定“Kung Kun”为东莞,则正确的译法是:“我家祖祠所在之乡村,在东江流域的东莞。”

其次,把“紫金中坝琏昌公”同“香山翠亨连昌公”划等号,似有牵强之处。罗香林说:“惟连(琏)昌公之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居中山涌口门村。”这只是推测而已。因为既没有过硬材料证明紫金的琏昌公迁往香山,也缺乏充分依据说明紫金琏昌公与香山连昌公为同一人。无论是墓碑还是族谱都没有什么可以佐证香山翠亨十二世连昌公系紫金中坝公馆背十一世鼎标公之子,或者能够反映紫金的孙氏家族与香山的孙氏家族有什么血缘关系。

现在看来,近年来发现的江西两个《孙氏族谱》只能说明宁都与紫金的孙氏家族同一源流,或可以称“紫金的远祖来自宁都”,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江西两“谱”的发现也不能反映紫金与香山孙氏家族有什么亲缘关系。

因此,“紫金论”不足为据。把江西两“谱”的发现报道为“孙中山祖墓,先世族谱”的新发现是以罗氏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的结论为根据的,因而是不科学的。“紫金论”要成为定论,必须从十一

世鼎标公如何由紫金移居增城，再从增城迁往香山这两方面找出突破口。应从福建长汀、增城以及香山县各乡孙氏家族中继续寻找族谱、墓碑及其他可资旁证的有关文献材料。

“东莞说”亦有问题

“东莞说”依据下列几条重要材料：

(1)翠亨《孙氏家谱》明确记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今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左坡头、乐南居住涌口。……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村居住，建造祖祠。”

(2)孙达成兄弟批耕荒山合约指出：“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蓢税山埔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无庸丈量税亩，任达成、学成、观成围筑，以种果物。”这里，孙中山父亲孙达成自称为十一世祖瑞英公的“嗣孙”，从一个侧面反映瑞英公与孙中山一家有祖孙关系。

(3)翠亭东北谭家山孙宅山庄保存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墓，该墓两侧分别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的墓。其墓碑记载与《孙氏家谱》大体相同，可以互相印证。

(4)1912 年 5 月 11 日，广东孙姓 200 余人在广州大石街肖公馆举行“孙族恳亲会”，欢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回广东的孙中山。东莞上沙乡孙姓有数十人参加了这个会。当时恳亲会的宣布员在致词中说：“今日，我孙氏叔伯兄弟开恳亲会，欢迎中山家先生。……余等忝属同乡同族，开会欢迎，殆亦表示崇拜伟人之意

也”，并提出：“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孙中山的答词称与会者为“我族叔伯昆弟”。据上沙孙氏族谱记载，东莞上沙乡孙姓始祖曾流寓南雄珠玑巷。因此，东莞上沙乡孙氏族人以代表身份得以参加这个恳亲会，可见孙中山与东莞上沙孙姓彼此都承认其渊源关系。

(5)1912 年 5 月 27 日，孙中山自香港经澳门抵香山翠亭村，在故居停留了 3 天，他亲率随员宋霭龄及长女孙媛等到左坡头谒小宗祠探访宗亲，在孙氏宗祠内祭祖完毕后，与宗亲 50 余人坐在神主殿前正中摄影留念。随后又到过东莞祭祖。

上述五个材料，从家谱、墓碑、田契、文献记载以及照片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的可能性。

但“东莞说”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一、被“东莞说”说成为“证明罗(香林)先生论点错误的最重要的证据是翠亨《孙氏家谱》”，却是个残缺不全的草稿本。该谱正文 53 页。第 1 页至第 7 页记载了孙氏祖坟迁葬经过及祖上从东莞迁居香山的概况，第 7 页至 21 页记载五世祖至十四世祖妣世次、名讳、生卒时间、葬地。以下空白 29 页，至最后两页记下未列世次之祖考 29 人及其配偶。内容错漏甚多，文字粗糙，似是个尚未完成的初稿。谱中各祖妣只列出世次，多数未注明何人所出。同一世次，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也无法弄清。尤其是这个《家谱》究竟是谁写的？哪一年修的？如何保存下来的？至今仍然不清楚。

第二、“东莞说”认为“探讨孙中山的家世源流，翠亨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是个关键人物”。但“谱”中记载“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村居住，建造祖祠”。查乾隆甲午年系 1774 年，而据孙中山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部》记载十二世祖连

昌公系 1669——1728 年及十三世祖迴千公系 1701——1752 年，这起码说明，《孙氏家谱》的记载是有错漏的。

第三、据“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刊登《总理世系图》表明：常德公（来粤始祖）——二世贵华（上沙乡始祖）——三世礼禋——四世受——五世玄（礼赞）。这里，三世“礼禋”与五世“礼赞”名字都用了“礼”字，不太符合中国宗族一般辈序传统习惯的。至于“东莞说”的孙氏迁粤始祖常德公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他们具体迁粤的来龙去脉也说法不一，不甚了然。

因此，“东莞说”要成为大家都接受的说法，今后还有待于从东莞上沙乡、员头村、中山市涌口村、左坦头村及翠亨孙氏家族发掘更多的族谱、墓碑、先祖牌位及口碑材料。

一点余论

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及其光辉业绩，有时追根溯源是必要的，但不一定要追述其多少代以前的祖先。孙氏很多代以前的远祖究竟来自何处？是东莞还是紫金？对于我们了解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演变，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更丝毫不影响其崇高的历史地位。换言之，孙中山族谱这个课题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均无重大的意义。

诚然，孙中山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革命领袖，要求一切历史记载都准确无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既然孙中山祖籍问题已争论 40 余年了，那么作为学术问题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它弄清楚，也是必要的。何况，孙中山祖籍问题的解决，对于保存文物、订正史料、开拓旅游业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既不是“血统论”的崇拜者，也不是“地理决定论”的

鼓吹者。对于孙中山祖籍问题，诸如他的远祖是谁、先世来自何处等等，不必花太多的力量，应放在适当地位，让少数有兴趣的学者以及有关部门去研究就可以了。既然孙中山祖籍问题一直有争论，迄今尚未获一致的结论，那么举行有关纪念活动就应持慎重态度，不宜采用行政决定，立碑修墓，扩大渲染；也不要忙于请领导同志题词、表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造成被动；或者以讹传讹，贻笑天下，造成不好的影响。

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

——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潘汝瑶　李虹冉

(一)引言

在广州中山大学学报上(1986年第四期·哲学社会科学版)看了一篇文章，题名为《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题下有副题，名为《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正如副标题所标明的那样，文章的主旨，在于推翻罗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从而证明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其实，这个聚讼纷纭了十余年的问题，自从1942年孙科明确表态之后(孙科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序中说："罗君所考，自国父上世入粤始祖以还。诚赅矣备矣"。又说："罗君此书……贡献实巨。")已告完全解决。《国父家世源流考》亦从此成为研究孙中山家世的定谳；而孙中山的祖籍是在紫金亦已明白无疑了。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人，生怕孙中山认错祖宗，千方百计，殚精竭虑的图谋推翻罗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以下简称为《源流考》)，从而证明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这种现象，在广州出现于最近几年，这可说是近年来广东论坛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当然，认为孙中山祖籍有问题，自然可以各抒已见的，但是必须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要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切忌弄虚作

---

* 据《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见本书第439～463页。

假，颠倒是非。也不要炒冷饭，把拾人余唾作为新发明。如果以为谎言重复一千遍，便会成为真理，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遗憾得很，文章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以致全文充满着矛盾抵牾，论题、论据虚假，悖理失实。想要以这样的文章，去推翻罗氏的《源流考》，看来没有可能。道理很简单：一个不真实的判断，不能驳倒一个真实的判断。

文章是一篇“辨误”文章，也就是一篇反驳文章。现在且让我们言归正传，看看文章是怎样进行反驳的罢。

先说明一下文章的反驳大意。由于罗氏《源流考》的翠亨孙氏是来自紫金的结论，据罗氏自言，是“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以下简称《纪念簿》）所纪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①]而得出来的，因而文章认为想要推翻罗氏的结论，最好是用釜底抽薪之计，根本打掉罗氏这两个研究准则。把罗氏这两个研究准则打掉了，那罗氏的结论不就成为“不正确”的无稽之谈了吗？但是既然《源流考》成为“不正确”的无稽之谈，那么正确的有稽之谈又是什么呢？文章对此推出了《孙氏家谱》。据说《孙氏家谱》就是孙中山家谱。根据这个《孙氏家谱》来自紫金的连昌公，成为据说系出东莞的瑞英公的儿子。既然连昌公是系出东莞瑞英公的儿子，那么，孙中山的先世，不用说，自然就是出自东莞的了。东莞说也就确立起来了。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反驳大意。它的行文也是根据这个大意的顺序来进行的。预先知道一下文章的大意，对于了解文章的全部内容，是不无一些方便之处的。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

(二)打掉罗氏的第一个研究准则——"家庙在东江公馆村"

关于这个问题,文章放在它的第二部分阐述。在这个第二部分中提出四个反驳理由以证明"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之非是。第一个反驳理由是:公馆是东莞的误译。由于孙中山所说"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一语,是由英语"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 is at KungKun , on the East River"翻译出来的。因此便有人从这里想办法做文章,说"公馆"是"东莞"的误译。邓慕韩就是其中主张最坚决的一个。但是,这种说法,早就被罗氏的理论及其考证的成果所驳倒,今天实无须再"错"调重弹。然而文章毕竟又把"错"调重新弹起来了。文章依样画葫芦地主张:按照英语的语法,把它译成为"家庙在公馆村"是不通的,因为"前面既有'The village'(村庄),后面的 Kung Kun 指的当然不会是个村庄"。(文章还就此讥笑罗氏不懂英语。文章说"罗先生所引之译文,稍懂英文的人也可看出是误译"。罗氏是出身于清华大学及其研究院的学者,谓其不懂英语,未免自许太过了吧?)其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既然文章如此迷恋过去东莞说关于这方面的旧调,那么,让我也引用一下罗氏关于这方面的当时的驳斥语来对照一下罢。罗氏说:"按林氏(林百克)追随国父多年,所言当自可信。兹就其所言,公馆 kung Kun 一语考之,国父之先世居地,亦似不在东莞。何则?东莞为清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所谓'南、番、东、顺'是也。虽其地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属县。如国父上世居地确在东莞,则以东莞一名之易使人明晓,即但称家庙在东莞或东莞某一村足矣,何必复冠以东江一

词乎？至上沙乡则更在东莞南部滨海之地，冠以东江，更不类矣”。[①]我认为只要站在客观立场的人，都必会同意罗氏此说。因此说是符合实际情况之言，不是牵强附会之语。譬如现在称东江客家人，都是指博罗、惠阳、紫金、河源一带的客家人而言。东莞虽有少数客家，但称为东莞客家人，不称为东江客家人，这就好象东江菜一样，指的是各客家地区的菜色而言，不包括东莞在内。尤其是被说成是翠亨孙氏发源地的东莞上沙乡，是滨海之地。（上沙泉居长安镇，长安镇与虎门镇间的广深公路，是西南沿海平原区，属珠江三角洲地带）。在要表明祖庙之所时，照理应以相距近的地方为标志。说“属滨海地区”，现反而以相距远的地方为标志，说“属东江水域”。有这样的道理吗？至于文章所谓“前面既有’The village(村庄)后面’Kung Kun’指的当然不会是一个村庄”这一个反驳，也是令人糊涂莫解的。公馆是一个地名，说我们的乡村在公馆这个地方，有何不可？广州石牌村就是以乡村在石牌而得名的，难道不可以说我的乡村在石牌吗？

其实，现在用译语的谁正谁误来确定孙中山的先世是出自何方，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事实胜于雄辩，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才是最好的办法。罗氏以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一语为第一个研究准则，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考证出孙中山的先世是出自紫金；而以公馆是东莞的误译的主张者，以东莞为研究的出发点，到现在为止，曾拿出什么确凿证据来呢？所以，时至孙中山的先世是出自公馆村的假设已得到证实的今日，而仍纠缠在译语上的正和误，仿佛译语改为东莞，孙中山的祖先便是出自东莞似的。这未免把研究孙中山祖籍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同时也未免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第十二页

表明自己的研究落后于时代太远了。文章为了要证明公馆是东莞的误译,在谈论这一问题的最后,还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孙中山的"祖籍确在东江紫金的公馆,翠亨孙氏应合族皆知,孙中山的兄姐更应清楚。何以只有孙中山向外国人谈及过,家中其他成员却全不知晓……答案只能是所谓'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全属子虚。"恕我直言,文章这样的质询和论断,实在太轻率了。试思,如果有人应用你的反驳逻辑,反问你说:如果孙中山的祖籍确在东莞,"翠亨孙氏应合族皆知",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更应清楚",何以经过十余年东莞说论者的大事宣传而且宣传者尽是国民党的史学专家和党史高官,登载的刊物又是国民党最有权威的刊物——《西南党务月刊》,而孙科反偏不采取东莞说,而独采取一个名不见经传初登大学教席的罗氏的紫金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你将如何回答?对于翠亨孙氏的祖先是出自紫金一事,你说孙科知道呢还是不知道?

第二个反驳理由是,十二世祖连昌公不是迁居香山的始祖。这个反驳理由是为了要把来自紫金的连昌公作为据说是来自东莞的瑞英公的儿子的这一巧妙布局扫清道路而提出来的。因为如果不把连昌公是从紫金迁居香山的始祖这一事实反驳掉,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的这一精彩节目便不好安排,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研究准则也就不能打掉。于是文章说:"罗先生所说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也并非事实","罗先生对这项资料颇有误解之处。始居香山云云,仅系罗先生本人推测,而这个推测并不正确"。但是,在我看来,"对这项资料颇有误解之处"的不是罗氏,而是文章自己。因为罗氏原来的"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连昌公居香山县一史实"这句话,到了文章的笔下,却不见了"一史实"三个字。有没有这三个字,对于罗氏所说

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一史实”这三个字，是表明《纪念簿》虽没有记载“连昌公始居香山县”的字句，但却记载着“连昌公始居香山县”的史实。这个史实是什么呢？就是《纪念簿》是妙西亲自交给罗氏展阅的孙中山的“唯一”“家传信史”。[①] 在这个《纪念簿》上记的第一位祖先，便是连昌公。连昌公不是“始居香山”的始祖是什么呢？这就是史实。文章说它是“推测”，不知从那一方面说它是“推测”？罗氏在《客家资料汇篇》中有节记述，其中有孙科一段说话。这段说话，可以证明“始居香山一史实”完全正确。现将之抄录如下：

国父一支孙氏，在中山县未建祖祠，即孙哲生先生亦曾言之：民国三十二年七月，邓慕韩先生曾撰专文，分寄孙哲生先生与邹海滨先生（鲁），谓余不应明言国父上世为自紫金所迁出。至八月十日，邹先生即命其秘书，致余一函，谓“此事昨晤哲生先生，伊谓’邓实糊涂，余十二世祖与紫金者相同其名字，竟称偶合。且（余家）孙氏（在中山县）无祖祠，不能强余认其他孙氏宗祠为余之祖祠也’”。[②] 云云。

在这里看到孙科所说的“邓实糊涂，余十二世祖与紫金者相同其名字，竟称偶合”这句话，连昌公是来自紫金的“始居香山”的开基祖这一史实，应该是明白无疑了。

第三个反驳理由是：紫金族谱记十二世祖琏昌公的“琏”字和纪念簿所记的连昌公的“连”字，其字不同，不能认为是同一个人。他们“两人世次相同，姓名读音相近，只是巧合而已”。很明显，这是刚才看到过的邓慕韩氏的“偶合论”的旧调重弹。它已被孙科所

① 妙西和陆华禧语，见《国父家世源流考》第五页。

② 《客语资料汇篇》三九六页注十。

驳斥过的，本无再加以计议的必要，但既然文章重新提出来了，也就顺便说几句罢。由于汉语的同音字太多，写人名地名时，常常求自己的方便或就自己的所知，写成音同（连、琏二字客语发音相同，不是相近）而义不同的字。这是常见的事情。客家地区有句俗话："人名无白字"，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来说的罢。在文章的第五部分，文章不也就谈过这个问题吗？但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在其第五部分反驳罗氏指出的东莞说中所记载的人名有"禘宗""缔宗"和"乐千""乐川"的差异时，却说是"枝节问题"，而在这里却把"连"、"琏"两字的差异，看作是决定孙中山祖先是否出自紫金的关键性问题。同样的问题，何其对待的态度悬殊之若是也！其实，如果罗氏仅凭"连"、"琏"两个同音字便断定翠亨孙氏祖先是出自紫金，那他的《源流考》肯定没有问世的可能。我以为罗氏的《源流考》的作成，至低限度，要经过十二度难关：第一，公馆的地旺在哪里？广漠的东江流域，向那里去找？第二，找到了地旺，在那里有没有姓孙的存在？有没有祖祠？第三，有了孙族和祖祠，有没有可资查考的完整的族谱？第四，在那族谱中有没有连昌公其人？第五，有了连昌公其人其世系是否相同？第六，世系虽相符其年代是否相符？第七，世系、年代虽相符，但有无连昌公外迁的记载？如无外迁记载而其子孙仍留在公馆，其本人坟墓亦在公馆，那么，虽世系、年代、名字相符亦不足为据；第八，外迁方向如何？如远走北方，则再迁香山县的可能性少，除非找到另有证据；第九，当时有无促使人们迁徙的时势背景？第十，翠亨孙氏家谱所记的祖先，是否以连昌公为第一位？第十一，紫金是客语地区，翠亨孙氏是否说客语的？第十二，孙中山家庭成员是否确认他们是来自紫金的客家人？把这十二度难关统统冲过去了，他的《源流考》才能成立。到了这个时候，那"琏""连"两字的差异，还能成什么问题呢？

第四个反驳理由是:如果“香山的连昌公系从紫金迁来,那么,翠亨孙氏应是客家人”,但“孙中山连客家话也不大会听”。这意思就是说,足见翠亨孙氏不是从紫金公馆搬来的。还有,“客家妇女不缠足但在清代孙家妇女却是缠足的”,“昔日客家人一般不与当地土著通婚”,但孙中山从祖母以下直至其原配夫人“都是当地人而不是客家人”。这意思就是说,由此可知,紫金说是错误的。文章这样的提出反驳理由,我以为是缺乏考虑的。因为用一个人能不能说是种语言以及和当地人通婚不通婚来断定他是什么地方人的方法是十分皮相的。我国华侨(入他国籍者除外)不是很多不懂本国语言而懂外国语言,不娶中国老婆而娶外国老婆的人吗?孙中山的母亲及其元配夫人是广府人,[①] 而中山又是讲广府话地区,在这种环境下,他不会讲客家话是不足为奇的。就好象现在广州的客家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广府人的话,他的儿女90%以上不会讲客家话。但是孙中山会讲客家话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讲客家话的。孙中山的胞娣妙西说:“至父亲达成公,亦好风水。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②] 这便是绝好的证明。在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地区与地区之间,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尤其距离遥远语言不同的地区,更是如此。香山离嘉应州几百公里,如果不是客家人,决无千里迢迢往语言不同地区的嘉应州聘请地师之理。只有达成公因为嘉应州本来是他的家乡(紫金忠坝这个地方,原属嘉应州长乐即今五华县)才会回到嘉应州去聘请地师。这也就是说,只有达成公是客家人才会去客家地区聘请地师。由于孙中山家庭原本是说客家话的,所以孙中山也

① 广府是广州府之义,客家人称凡是广州语系的人为广府人。

② 《国父家世源流考》三十五页。

仍然会说客家话。不信吗？且举个例子罢：台湾有个研究孙中山家世的专家谢福建，编写了一本《国父家世源流汇述》，[①]为了要弄清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特地去访问了在抗战时期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孙中山在世时曾任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的薛岳，访问后，写了一篇《访问薛岳将军记》，在记后薛岳签名并题字说："承问无错"。现将其问答词摘录如下：

1. 问：将军追随国父革命期间，是否知道国父原籍？

答：当然知道。国父原籍是紫金县。国父也说过自己是东江客家人，老家原住紫金县。

2. 问：国父当年在粤对部属等讲话，通常用什么话？

答：与客籍同志讲客家话，与广东同志相聚讲白话（粤语），与别省同志及集会时，通常讲普通话。

从这个对话看来，文章所谓"孙中山连客家话也不大会听"一语，真是"纯属子虚"。文章所依据的"羊打虎"（酿豆腐）的笑话，是客家人自己嘲笑客家人讲普通话拙劣的笑话。客家人和任何官员打交道，只要是使用普通话的，都可以套上这个笑话。而文章竟信以为真，太轻信了！

孙中山是客家人一事，凡是研究客家历史和研究孙中山历史的人，都是知道的。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是如此。远年的且不谈，只看看近年的一、二位国内外作家的写作，便会知道此言之不谬。

①1985 年 6 月 2 日《参考消息》转载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千洋的报导说：

在中国的十亿人口中，有一支被称为"客家人"。他们属汉族，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汇述》谢福健编著。1983 年台湾狮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孙治平（孙中山孙）作序

祖籍中原。客家人的祖先当年由于异族入侵和战乱频仍向大陆的南部迁徙,不管走到那里,都被人叫做“外来人”或“不受欢迎的客人”,不知不觉中被冠以“客家”之名了 。

然而客家人中人材辈出,诸如: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中国革命之父孙文、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小说《慕情》的作者韩素音、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

②1984 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小平评传》是海南人寒山碧所作,里头有这么一段:

也许正因为客家人具上述优点,所以尽管他们占中国人口并不多,但在现代史上却有很杰出的表现。邓小平、朱德、叶剑英、叶挺都是客家人中之表表者。不过最杰出的一位却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今日的中山县)翠亨村。虽然是粤语地区,客家人只占很少数。但孙中山先生却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

对于如此国内外都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竟有自称为“孙中山先生的研究工作者”,对此竟然茫无所知,实在不能不令人惊讶!叹为奇闻!

也许文章会说:这些报导都是受“并不正确”的《源流考》的影响而写出来。那末,好罢!现在就让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对这件事是拍板子的人——孙科及其家属的言行,看看那些报导是错了还是没有错。孙科在为《源流考》作了肯定的序文之后,于 1943 年开始协助其祖籍紫金中坝筹建中山中学。1944 年还为中山中学题写校名,到现在仍保存在校门上。1962 年,他为旅港紫金同乡会会刊题词,题词是“讲信修睦”,上款是“侨港紫金同乡会会刊”,下款是“孙科”。他还担任了该会的名誉会长。1972 年,世界客属总会于台北筹办第二次恳亲大会,他参加了这此大会,并说他的父

亲曾告诉过他，老家原住东江永安县（现名紫金）。[①]他还担任了该会的名誉会长。他在《八十述略》中，亦确认其上世出自紫金。1983年5月2日，他的夫人陈淑英为谢福建所作的《谈国父家世源流——拜访国父哲嗣哲公夫人》一书，题写了“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的字句，下面还盖了私章。

自称为“为尊重历史，避免以讹传讹，作为孙中山研究工作者”，不承认孙中山是客家人的先生们，对此应该无话可说了吧？

为了证明孙中山不是客家人，文章还提出“昔日客家人一般不与当地土著通婚，但孙中山的祖母黄氏……元配夫人卢氏都是当地人而不是客家人”以为佐证。这也是十分皮相的，于历史于现实都是错误的。从世界史来看，造成彼此不通婚的原因。不外是五种关系：1. 仇敌关系；2. 种族不同关系；3. 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关系；4. 皇帝、贵族与平民关系；5. 种姓制度。文章既然说“昔日客家人一般不与当地土著通婚”，但不知造成不与当地人通婚的是上述的那一种关系？在我看来，不与当地人通婚的现象，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是可能有的。[②] 因为那个时候，彼此都以仇敌看

① 《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实录》，现存紫金县档案馆

② 这是指清代咸丰六年（1856年）到同治六年（1867年）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广东西路鹤山、开平、恩平、高明、高要、阳春、新会、新宁八县可悲的土客械斗一事来说的。此次械斗影响极大。过去广府人和客家人思想感情出现不融洽，实从此始。此事件的起因，是当时鹤山、恩平、开平、新宁等县城，颇受土匪攻扰。地方官乃募当地客家人为兵以防守，名为客勇，屡胜土匪。嗣以两广总督叶名琛欲将残匪肃清，命令鹤山知县沈造舟率客勇进剿。土匪思图自保，乃散布谣言谓客家人挟官铲土，煽动原当地住民共同对付客勇。由此而一场官匪之斗遂变为土客之斗。极端仇视客家的咒言诅语亦由此产生。如“客匪”、“客贼”、“非汉族”，“客家霸地主”等等名词都产生了。四会县志甚至以“ ”代“客”，新会县志及新会乡土志则以“犵”代“客”。客家人大有被视为古代猺狫、獯鬻之概。在这种敌对的情况下，彼此以仇敌相视，自无通婚之可言。但此事到底是有空间时间的限制的。现在不是早就雨过天晴了吗？所以，把它作为超空间时间的问题来看待，那当然就错了。

待的缘故。但把它扩大化,把局部变为整体,把一时变为长远,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与现实的实际情况不符。在鸦片战争后,客家人往港往省(广州)做生意的商人,携本地籍的妻和妾返回故乡享齐人之福者大有其人。曾在陈炯明部下当过军长,是陈的一员干将的梅县人熊略,他的父亲熊长卿与孙中山同时代人,在前清做过标统,他是广东数一数二的多妻者,有三十个老婆都是广府籍;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左右手的廖仲凯是惠州客家人,但他的夫人何香凝是广府人,还有,顺德人黄节是前清举人,在李济琛掌政时曾做过广东省教育厅长。他的女婿是客家人。名叫李韶清。李韶清的儿子李华钟,不久前曾任中山大学校长。更有讥刺意味的是,孙中山女婿是客家人;女儿是天足,名金琬,美国加州公立大学文学士;女婿名叫戴恩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做过几任海关监督、广州军政府外交秘书、梧州市长、巴西公使等职,在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中,有他的签名。他有一个女儿名叫戴成功,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住澳门。听说成功的名字,是孙中山亲自起的,希望革命成功之意,故名。如果按照文章的逻辑,和广府人通婚便是广府人,那么,和客家人通婚,又是什么人呢?还有,现在孙科的儿子孙治强的妻子,是梅县人,名叫林伦可。把这些婚姻算起来,孙中山是:女嫁客家人,孙妻客家人。按文章的"通婚说",孙中山应该是什么人呢?所以,我说,以通婚不通婚为判断孙中山是客家还是非客家的标准,是十分皮相的。

为了证明孙中山不是客家人,文章在提出了通婚问题之后,还提到客家妇女在墓碑上及族谱中均称作"孺人",不称"安人"的问题。客家有这样习俗是事实。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纪念簿》中,即无"孺人"字样,也无"安人"字样。而文章却说:"但在翠亨的《孙氏家谱》、《列祖生殁纪念簿》与祖莹墓碣中,妇女多称作"安人"。把

《纪念簿》和《孙氏家谱》以及所谓“祖莹、墓碣”相并列，固既有鱼目混珠之嫌；而把没有“安人”的说成是有“安人”的，那就不但是有鱼目混珠之嫌而且是确确实实在弄虚作假了。这是明显对读者的欺骗。此如可假可骗，何事不可假可骗？文章的价值和信用哪里去了?!

(三)打掉罗氏第二个研究准则——“《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一史实”

关于这个问题，上面已涉及到了，但所谈的角度不同。上面所谈的主要是对罗氏的句子表述问题。这里所谈的主要是文章欲以《孙氏家谱》代替《纪念簿》问题。

“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这一史实”，是罗氏研究孙中山家世的第二个研究准则。连昌公是不是始居香山一事，是决定他是不是来自紫金的关键。所以，想要推翻罗的紫金说，必须否定连昌公是翠亨孙氏始居香山的始祖这一史实；同时，还要证明他是在香山土生土长的人物。但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文章推出了一个《孙氏家谱》，根据这个家谱，瑞英公是十一世，连昌公是第十二世，连昌公就是瑞英公的儿子，从而连昌公也是土生土长的人物。但是这个来历不明的《孙氏家谱》如何能取得人们的信认呢？同时，这个家谱在作为孙中山家谱时，存在着许多解释不了的大漏洞。这应如何处理呢？文章对此，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大力吹嘘《孙氏家谱》的可靠性，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论据；另一个是大力填补一一辩护大漏洞，填补不了时，将《孙氏家谱》修改。文章的第三、第四部分，就是论述这些问题的。现先看看文章是怎样吹嘘《孙氏家谱》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开宗明义就说“《孙氏家谱》为孙中山家谱。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怎见得它“是可以肯定的”呢？文章提出了许多理由作为论据。第一个论据就是，“《孙氏家谱》记载了公认的有关孙中山家族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搬迁祖坟的事实，即“以前先祖的涌口村所葬之山”，“一盖（概）已将先祖之坟葬一切盘（搬）迁回来在翠亨村……安葬”这一事实；其次是在“《孙氏家谱》列祖名讳中，有已确认为孙中山祖先的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的名讳在内。文章欲将这两种事项的记载，以“肯定”《孙氏家谱》就是孙中山家谱。但看来，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孙氏家谱》只凭记载了这两件事项便可证明它是孙中山家谱，那么，如果手抄《孙氏家谱》的人，有作伪行为怎么办？文章似乎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于是在段末它又写道：“从笔迹看，全谱为同一个人所抄，因此，可以断定它确是翠亨孙氏的家谱”。从“同一人所抄”的“笔迹”，便可以断定一个家谱的真伪！这样的“简易辩伪法”，恐怕没有人敢发明。就是有人敢发明，恐怕也没有人敢相信。为什么文章就如此相信这个“简易辩伪法”呢？

第二个论据是，《孙氏家谱》的“来源是可靠的”。可靠的理由有二：(1)它“以前由孙妙茜珍藏，她去世后，其后人送故居纪念馆保存”；(2)“邓慕韩曾……在故居抄录《孙氏家谱》”。这真是弥天大谎。如果该家谱确为妙茜所珍藏，为什么不像《纪念簿》那样，在生前就交给“故居管理委员会”而要她死后才“由其后人送故居纪念馆保存”？邓慕韩是东莞说的最积极主张者，如果他确在妙茜手中发现《孙氏家谱》，正可以此为宣扬东莞说的绝好材料，将之原原本本抄录一遍，并用其原名公之于世（就好象罗氏对于《纪念簿》所做那样）。为什么邓氏并不这样做，而偏要另编造出一本《孙总理家谱》呢？这样显而易见的谎言也竟欲将之作为《孙氏家谱》就是

孙中山家谱的佐证,不觉得太不策略了吗?

第三个论据是,"《孙氏家谱》所记翠亨孙氏各代名讳,现已多数找到了坟墓印证","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与"孙达成兄弟批垦祖尝山荒合约"都是"《孙氏家谱》的有力佐证"。文章的这个论据,提得太奥妙了。在《孙氏家谱》还没有被肯定是不是孙中山家谱之前,文章就先肯定《孙氏家谱》中所列的各代祖宗名讳,就是翠亨孙氏各代宗祖名讳。这不是有点奥妙吗?如果《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其中所列的祖宗的坟墓,就是百分之百找到了。这和翠亨孙氏有何相干?怎么能以《孙氏家谱》中所列的祖宗的坟墓多数找到了来作为它就是孙中山家谱的佐证呢?尤其可笑的是:《孙氏家谱》明载着六世祖乐千乐南公"过回东莞,未曾回来",直到十一世祖瑞英公始"迁来径仔蓢居住"。似此,则六世祖到十世祖的坟墓应都在东莞,为什么竟跑到中山涌口去了呢?荒诞如此,何以服人?至于"田契"和合约问题,文章认为是推翻罗氏紫金说的王牌。是不是果真如此,在下面再来讨论罢。

以上是关于为《孙氏家谱》的"可靠"性吹嘘而提出论据的情况。现在再来看看文章是怎样为《孙氏家谱》的大漏洞作修补工作的。

《孙氏家谱》作为孙中山家谱,有四个解释不了的大漏洞。这是《孙氏家谱》的致命伤:第一个大漏洞是《孙氏家谱》有世无系,传代关系不明,且多缺代,因而无法有根有据地合理说明连昌公是东莞孙氏的后代。这表明《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的家谱;第二个大漏洞是孙中山和孙科都说其家在翠亨村只有数代,无祖祠,而《孙氏家谱》则明载着瑞英公"迁来径仔蓢居住,建造祖祠",差异十分明显,这证明《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第三个大漏洞是《孙氏家谱》中的瑞英公为十一世祖,但在胡去非的《总理事略》中则为七

世祖。同一瑞英公，忽而七世祖，忽而十一世祖，这证明瑞英公的世次是没有确实的资料可据，而是任凭各个修谱者按自己的设想安排上去的。这证明《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第四个大漏洞是按《孙氏家谱》连昌公是瑞英公的儿子，但同家谱又载明瑞英公是乾隆时人，而《纪念簿》则载明连昌公为康熙雍正时人。乾隆时人何能为康熙时人的父亲？这证明《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文章深知这四个大漏洞的存在，对于欲把《孙氏家谱》说成为孙中山家谱是极端不利的，因而在为《孙氏家谱》吹嘘其可靠性之后，便急忙大力开展漏洞的补修工作——辩护。

对于第一个大漏洞（有世无系，且多缺代）的辨护是这样的：首先承认《孙氏家谱》有“错漏”，但又认为该家谱之所以有“错漏”，“是因为它并非已修成的定本”，“资料既不完备，又未加考订”。同时，其“执笔者非能文之士”所造成，但“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为了避免转述有错误，现将其原文摘录如下：“家谱统系是不明确的，只把同一世代的排在一起，多数没有标明何人为何人何出。各祖妣生卒时间记法颇不一致，有的则付阙如，有的注上“未知”，“无考”或“查人家牌位便知”。“全谱只记至十三世为止（谱内之十四世祖植尚公，一说为十世祖），显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稿本”。“我认为《孙氏家谱》之所以有种种错漏矛盾，一是因为它并非已修成的定本，二是因为执笔者非能文之士，以致辞不达意。但家谱的基本内容是可信的”，文章在其第四部分又说“《孙氏家谱》仅系一未完成之稿本，资料既不完备又未加考订”。谁都知道历史之研究，全靠了大量资料之搜集。有了大量资料，才能进行排比考勘，去伪存真，才能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信史。修编族谱也是如此。而现在文章竟把“资料既不完备又未加考订”的记载零星无系统，传代关系不明，世次颠倒混乱（如瑞英公忽而七世祖忽而十一世祖；植

尚公一说十世祖一说十四世祖)的"未完成的稿本"说成是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不知是根据什么逻辑而云然?在封建时代,族谱之所以被重视,因为它有辨昭穆,别亲疏,知长幼,上溯流而知其来源,下顺流而知其分派的职能。然而现在的《孙氏家谱》呢?不知谁是父谁是子,谁是兄谁是弟,且世次颠倒混乱而残缺,既不能辨昭穆,别亲疏,知长幼;也不能上溯流而知其来源,下顺流而知其分派。这样的家谱,而犹谓之"其基本内容可信",且硬说某人是某人之子,不亦谬乎?至于说什么"执笔非能文之士,辞不达意"一层,更令人觉得十分牵强。不知世系残缺,传代关系不明和"辞不达意"有何关系?

以上是文章对《孙氏家谱》的第一个大漏洞的辩护内容。对于第二个大漏洞(有祖祠无祖祠问题)又是怎样辩护的呢?让我们看看罢。"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这是孙中山亲口说的;"(余家)孙氏(在中山县)无祖祠,不能强余认其他孙氏宗祠为余之祖祠也",[①]这是孙科亲口说的;瑞英公"迁来径仔蓢居住,建造祖祠"。这是《孙氏家谱》所载明的。一个是口头所说,见诸史籍;一个是家谱载明,一清二楚。一无一有,截然分明。这表明径仔蓢孙氏和翠亨孙氏是不同支派的孙氏,各有其分支系统,绝不能混而为一的。然而为了要把孙中山说成是东莞孙氏的子孙,又非把他们两者混而为一不可,于是文章想出把两者混而为一的两个妙说:第一,"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径仔蓢已'鞠为茂草',早就没有孙姓居住,翠亨孙姓都承认自己是祠堂曾在径仔蓢的瑞英公的后代。如果说有径仔蓢孙氏的话,那与翠亨孙氏是一回事"。第二,"罗先生认为……连昌公定居香山后四世且仍单传,至十六世敬贤公始生三子"。如

① 《客家史料汇篇》三九六页注十二

果这是事实，那么，“孙中山祖祖辈辈都是独户”。但“其实却不然”，“孙中山诞生前后，翠亨孙氏有八户，系同宗。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曾参与管理族内公尝。现尚有翠亨孙氏公尝‘乐安堂仕合号’帐册。既有公尝，即有族事，‘四世单传’，自非事实”，理由是提出来了。但能不能因此而就把径仔蓢孙氏和翠亨孙氏混而为一呢？看来，绝无可能。因为提出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理由，且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上了谭彼岸氏的大当而不自知，实堪惋惜。就第一理由而论，其中的在“三十年代初……径仔蓢已‘鞠为茂草’，早就没有孙姓居住”这一节，就够人费解的了。难道径仔蓢没有孙氏居住，翠亨孙氏就变为径仔蓢孙氏了吗？孙中山就变为瑞英公后裔了吗？至于“翠亨孙姓都承认自己是祠堂曾在径仔蓢的瑞英公的后代”一语，又更加令人难懂了。真正的翠亨孙氏——孙中山和孙科有没有承认过瑞英公祠是他的祖祠？为什么抛开孙中山、孙科的否认他们在中山有祖庙的说话而不引用，而却要引用文章自己定名的翠亨孙姓的所谓“承认”？这其中道理在哪里？径仔蓢和翠亨村地方接近。不排除径仔蓢孙氏有人迁入翠亨的可能性。但两者源流不同，不能因同在翠亨而统名之为翠亨孙氏。翠亨孙氏是指以连昌公为始祖的孙中山这一派孙氏来说的。这难道文章不知道么？还有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第二个理由。我以为这个理由的提出是由于文章过于轻信谭彼岸氏所说之所致。文章把谭氏之所说重新翻版，把截然不同的商号帐册，说成是“公尝帐册”，即把“乐安堂”和“仕合号”两间商号的来往帐册，合成为“乐安堂仕合号”名字离奇古怪的公尝帐册，从而以此为出发点，大做文章。说孙中山的父亲达成公曾“管理族内公尝”，“孙中山诞生前后，翠亨的孙姓有八户，系同宗”，罗氏所谓“四世且仍单传自非事实”。欲以此推

翻罗氏的“连昌公迁居中山县后”,“四世且仍单传”[①]的考证,以为这个考证一被驳倒,则连昌公来自紫金之说,自可不攻自破。其实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如果假证虚词,可以驳倒已成社会所公认的考证的话,那还要科学做什么?就拿“公尝帐册”来说罢。所谓公尝帐册,在旧社会就叫做“公尝簿”或“尝簿”。公尝簿有一定的格式,在簿面上或簿首必须标明某某公尝簿字样。因为公尝是尝产所构成。没有遗产的人,便没有公尝。公尝不是个个祖先都有的。而且公尝产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只有其直系子孙才能分享。所以在其簿面上必须标明某某公的名字,以示区别。又由于公尝簿主要是用于尝产(如耕地、山林、店铺、鱼塘等等),祭祀和饮宴用品,以及该公尝的财政收支状况的登记的。所以,凡是公尝簿的内容,必有上述各项的记载。然而现在文章所提出的所谓管理公尝帐册呢?在簿面上写的是“乐安堂”号和“仕合号”;在里面所记录的是一些粮食或银钱的来往数目,绝无上面所说的簿面和簿内的内容。无论从名称和内容来看,一望而知为是商店的帐册。而文章竟说成是管理公尝帐册。论据如此虚假,如何能驳倒对方?“公尝帐册”既已如此虚假,以此为出发点的达成公曾“管理族内公尝”,否定“四世单传”的说法,自然也是虚假。孙中山和孙科明言在中山无祖祠,孙科没有否认孙氏“四世单传”的考证,妙茜说及孙氏家世时,对达成公事迹说得最详细。但没有说及公尝之事。所谓孙氏公尝从何而来?达成公曾理公尝事又何从而来?文章欲以捏造的公尝帐册和“孙中山诞生前后,翠亨孙姓有八户,系同宗”为辞,以证明孙中山上世不是“四世单传”。且有公尝之事,抑亦作伪太过矣。无论当时是否有此八家,就是有此八家,文章能否说明他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四五页

们是孙中山上世那一位祖先的所传?

(四)强把乾隆时人瑞英公作为康熙时人连昌公的父亲

《孙氏家谱》的第三和第四个大漏洞,都是关于瑞英公问题。因此,把这两者都放在这里来阐述。

第三个大漏洞是瑞英公忽而七世祖忽而十一世祖的问题。文章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那就证明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的说法是胡说,同时也证明《孙氏家谱》绝不是孙中山家谱。文章为了替这一大漏洞辨护,发明了一个旷世无双的以后裔为始祖从下而上计算世系法,企图以此弥缝七世祖和十一世祖矛盾的大破绽。文章说:"罗先生看到有关瑞英公的记载有些矛盾,就不承认他为翠亨孙氏的祖先。如胡去非的《总理事略》称瑞英公为七世祖,下文又以孙中山为第十八代。罗先生认为,瑞英公乾隆时人(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至孙中山出生不及百年,决不会传至十一代,因此斥胡去非的说法为'绝大谬误'。粗看起来,罗先生的批评理由十分充足,但实际上,胡去非只是犯了把两种计算世代方法混淆的错误。当日的史籍计算孙氏世代的方法,一种是以入粤始祖常德公算起,至瑞英公为十一世,至孙中山为十八世。另一种则以孙中山本人为准上溯,高祖殿朝公称四世祖,再往上两代连昌公为六世祖,瑞英公恰为七世祖……所以,胡去非的说法只是不确切而已。罗先生的批评不足以否定瑞英公为孙中山的祖先"。照文章这段的意思就是说,第七世祖和第十一世祖差异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计算世代方法"不同所引起的,两者实为同一人,七世祖即十一世祖。可是,我按照文章的计算法计算,算来算去,总算不出他们是同一人。同时还发现文章的从下而上的计算法,实在令人无法

接受。简直把读者当成阿斗。我以为即使游戏文章也不应如此。现在为了便于了解文章的计算法,列表如下:

1	2	3	4	5	6	7	8	缺	缺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常德				礼赞	乐南乐千	瑞英				瑞英	连昌	回千	殿朝	恒辉	敬贤	达成	孙文

根据上表,按照文章算法计算,从常德公到十一世为瑞英公,这没有错。但从孙中山到十一世瑞英公为八世祖而非七世祖,这就大有问题。难道是文章错算吗?我认为决然不是。这是文章在玩弄手法,玩弄令人寒心的手法。为了修补第三个大漏洞,竟出此下策,置名誉于不顾,不觉得不值吗?与此相关连,文章采用的从下而上的计算法,也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依照那种计算法,孙中山为始祖常德公为十八世祖;如果从孙科算起,则常德公又为十九世祖,究竟谁是始祖?这不令人糊涂莫解吗?还有更令人糊涂莫解的,就是文章为第四个大漏洞的辨护。

第四个大漏洞是什么呢?就是乾隆时人的瑞英公,何能为康熙雍正时人连昌公的父亲问题。这是决定孙中山是不是东莞孙氏后代的最关键问题。但其实孙中山是不是东莞孙氏的后代,在上述的文章为三个大漏洞的辩护词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孙氏家谱》根本不可靠(下面还要谈到),孙中山在中山县根本就无祖祠,瑞英公的世次问题又根本弄不清楚,怎么能说孙中山是东莞孙氏的后代?但是为了更进一步明确问题,把文章在这方面的辩护辞,再研究一下,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年代问题。《总理事略》、《孙氏家谱》是东莞说的两个谱系,都载明瑞英公是乾隆时人。《总理事略》载:"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

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①]《孙氏家谱》载:“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把这两个记载对照一下,除一个是七世祖,一个是十一世祖和一个说及建造祖祠,一个没有说及建造祖祠外,其他如瑞英公于乾隆年间迁居迳仔蓢一事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两个家谱都明载着瑞英公是乾隆时人;而《纪念簿》则明载着连昌公是康熙雍正时人,且没有瑞英公的名字。如果这前两个家谱和《纪念簿》是属于同一支系的孙氏家谱的话,应该不至有这样的矛盾抵牾的现象产生。有这样的矛盾抵牾的现象产生,正说明这两种家谱不是属于同一支孙氏的家谱。两者是联系不起来的。但现在文章硬要把《孙氏家谱》和《纪念簿》联系起来,而又碍于年代的差异和瑞英公名字之有无,这怎么办呢?文章的办法是:(一)歪曲《纪念簿》;(二)修改《孙氏家谱》;(三)编造神话般的故事。结果,原本是对罗著的“辨误”,反而变为对《孙氏家谱》的“辨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文章是怎样歪曲《纪念簿》的呢?因为《纪念簿》所记的列祖,以连昌公为首,没有瑞英公名字,这是连昌公来自紫金始居香山的始祖的重要证据,《孙氏家谱》无从把瑞英公名字加于其上的。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但文章却歪曲地说:“罗先生又以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其首页第一世祖连昌公,并无瑞英公名字,作为否认瑞英公为孙中山祖先的另一个依据。该纪念簿……只记录……生卒时间,并无其他内容,因为它记的是列祖生卒时间,所以只能以已查明生卒时间的世代记起。按《孙氏家谱》十一世祖瑞英公下注明:‘生终年月无考’。罗先生指出的问题,只说明翠亨孙氏后来始终未能查明瑞英公的生卒时间,并不能说明瑞英

① 迳仔蓢和翠亨村是两条乡,现把它们混而为一,不知是何意思?

公不是孙中山的祖先”。文章的意思很明了,就是把《纪念簿》为什么没有瑞英公的名字的原因,归之于没有“查明瑞英公的生卒时间”。但是,我不明白,全中国有没有因为不知道某一位祖宗的“生终年月”而就把这位祖宗名字抹掉的家谱?《孙氏家谱》不是有很多生终年月“无考”、“未知”,或“则付阙如”的吗?瑞英公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又没有抹掉他们的名字?如果说,那是因为《纪念簿》是专记“已查明生卒时间的世代”的,那好罢,为什么文章就曾提到过的“生于成化已丑年”的乐南公,《纪念簿》上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样的悖理矛盾的辨护,我以为还是避免为好,因为它的效果,肯定是和目的相反的。用成语来表现,就是“欲盖弥彰”!这又何必呢?文章在歪曲《纪念簿》之后,接着就是对《孙氏家谱》的修改。这个修改可说是大刀阔斧,弄得被修改部分面目全非。神话般的故事,也就由此而来。因为要解决乾隆时代的瑞英公和康熙雍正时代的连昌公的矛盾,就只有将乾隆时代的瑞英公的年代提早到康熙以前的年代。但在这被提早的空白的时间里,又不能没有瑞英公的活动史迹以补填这个空白,于是神话般的故事就不能不产生了。据文章所说:(一)“瑞英公生卒时间虽不可知,但以其子连昌等三人之年推测,当系明末清初人”(把瑞英公迁居迳仔蓢的年代,最低限度提早了一百三十年);(二)“但瑞英公及其子并非在迳仔莧一直住下去,孙氏肯定离开过径仔一段时间。康熙初年,清政府厉行迁海,迳仔蓢为滨海村落,居民自当内迁”(迁至何处文章无交代);(三)“待迳仔蓢一带复界后,瑞英公及其后代是没有再回迳仔蓢还是回来后住了一段时间,因环境困难再迁走,现已无可考”。(这实际是说复界后瑞英公不知去向)“但有一点是可肯定的,那就是:瑞英公或其子孙,又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涌口村。证据便是乾隆8年(1743)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此契开头几句是:‘……众议将

容窝祖遗下尝田……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关于这一点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文章所以引用这段卖田契文,因文中的迥千公是孙中山香山始祖连昌公的儿子。文章为了要证明瑞英公的后代确曾回到过涌口村,故引此文。其实这是无补于事的。因为:①迥千公买田活动是一回事;迥千公是否为瑞英公儿子又是一回事。把迥千公的活动认为就是瑞英公后代的活动,未免失于武断;②既然认为迥千公购买容窝公尝田,便是容窝后代(谭彼岸氏说),他们彼此之间,应有明确的传代关系资料以资证明。然而谭氏提不出来。文章不同意谭氏意见,认为"本族子孙不可能购买公尝田",所以"迥千公不会是容窝公的后代"。迥千公的祖先,"当系另一位七世祖耕隐公"。但耕隐和迥千公的传代关系又是如何呢?有无明确资料证明呢?文章亦无言及。似此,则迥千公的祖先,可以任由人们指派,这又未免迹近滑稽了;③所谓"房亲",有近房亲、远房亲的区别。远房亲可以远溯至始祖的第二代。所以,"房亲"常常用作"族亲"即同姓人解。如果迥千是近亲或五服外而仍同住一条村的房亲;则购买祖尝田决无须托外姓人作中,更无须由外姓人引至。要外姓人作中,要外姓人"引至",则表明迥千公决非容窝公或容窝公兄弟的同支孙氏,不过是同姓人而已;④卖田契的出处不明,真伪尚待考核。(4)"乾隆甲午年迁居翠亨并在迳仔蓢建祖祠的正是殿朝公,而不是瑞英公。""翠亨孙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文章这样的描述瑞英公三次大迁徙的故事,是否言之有理,在此不想置议了。我只想相应的提出四个问题:①孙科已明确言明十二世祖连昌公就是紫金孙代族谱所载的琏昌公。那么,连昌公的父亲就是鼎标公,和瑞英公风马牛不相及。而现在竟根据连昌公年龄来推算瑞英公年龄,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②因迁界内迁。这内迁地址在哪里?有什么史籍或事迹

可以证明瑞英公确曾内迁？③因复界迁回涌口，何以不见瑞英公和他两个儿子？他们是否失了踪？为什么涌口没有瑞英公的活动史迹而其坟墓和遗产又都在迳仔蓢为什么涌口独见连昌公儿子迥千公的史迹？④文章说殿朝公"迁居翠亨并在迳仔蓢建祖祠"，为什么他不建在翠亨村而建在迳仔蓢？《孙氏家谱》明载着"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莧居住，建造祖祠"。祖祠者，祖宗之祠也，非瑞英公本人之祠也。这是谁都会知道的。为什么文章却居然说，"祖祠就是瑞英公祠"？如果迳仔莧的孙氏祖祠，确为殿朝公所建，为什么孙中山和孙科都说他们没有祖庙在中山县？故事如此神奇，令人殊难领会。

为了要证明孙中山是瑞英公的后代，文章还另外提出它认为是王牌的两个"重要证据"。文章说，"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孙达成兄弟批耕瑞英公遗下迳仔蓢山荒地之合约"，因为在这个合约中有这样的句子："立明契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莧税山铺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权侄酌仪，将此山铺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段句子中，有"嗣孙"两字。文章便以引"孙"两字断定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既为瑞英祖的"嗣孙"，瑞英公当然是孙中山的"祖先"。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①] 应该冷静一下，考虑三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合约的真伪性问

① 据紫金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张祝强、张杰同志研究，认为该"契"和"约"是十分可疑的。理由是：1983年谭彼岸在《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的《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中说，该"契"和"约"是在中山县土改时发现的，但不说明发现地点。而《中山文史》总第10期《孙中山家世源流若干资料》则称"该卖田契存于孙中山故居和《孙氏家谱》等是孙妙西保管，后由杨连逢同志兄弟送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如果是这样的话，无须土改时才发现。而妙西保管《孙氏家谱》一事，根本就是虚构。由此可见，所谓"契"和"约""公尝账册"等的出现，仅出处就参差其说。其真其伪，可思过半矣。云云。我以为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题。从签名的笔迹相同和合约出处不明,这两件事来看,合约不是无可疑之处的;二是"嗣孙"的含义如何?三是在什么场合使用这个名词?第一个问题,尚未研究,姑不置论。第二个"嗣孙"含义问题,是可以推敲的。"嗣孙"两字,字典上无此词。按字面的意义解释,"嗣"字有两种含义:一是继承,二是过继,和孙字合起来,就是继承孙或过继孙的意思。但不管是那一种意思,都不适用于达成公。因据说瑞英公为十一世,达成公为十七世,达成公根本不能称孙。按我国宗族的亲属称呼习俗,孙以下皆有名,如曾孙、玄孙、第几世孙等。今不能称孙而称孙,这表明这里有问题。达成公决然不是瑞英公的后代。有人说,"嗣孙"是后嗣、裔孙之意。如果作这样解释也是解释不通的。因后嗣,裔孙这两个名词,不是对直系某一祖先的相对称的自称语,如子对父称男不能称孙,也不能称后嗣、裔孙;孙对祖称孙不能称男,也不能称曾孙,当然也不能称后嗣、裔孙。这就叫做对直系某一祖先的相对称的自称语。后嗣、裔孙是后代子孙的通称。对某一直系祖先自称为后嗣、裔孙则成为不能辨别是那一代子孙的亲属关系的漠然不定之词。所以它们是不适用于对直系某一祖先的自称的。根据"合约"中的"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铺批与达成……开荒围园"这句话来看,嗣孙达成是主语,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即自称语。因为他是对瑞英公的自称,应该使用对称语,即第几世孙才合适。现在不用相对称的自称语而用后嗣、裔孙意义的"嗣孙",这显然是不通的。还有一点,这次的"合约"是在瑞英公后嗣之间进行的,大家都是他的后嗣,没有在某一当事人的头上,再标明他是瑞英公后嗣的必要,所必要标明的倒是他在这些后嗣之间是瑞英公第几世孙的身份。然而现在事情却与此相反,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以为这是因为达成公不是真正瑞英公的后代,他不可能自认他是瑞英

公的那一代孙，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能从权地采用了这个含糊名词。正如刚才在上面说过的那样，使用“嗣孙”两字要看是那种场合，才能辨明其意义。在宗法社会里，一个祖尝的尝产如尝山、尝田等的使用权，只有其直系子孙才能分享。尝田通常轮耕或收租，山荒地可能批种，在批种的时候，按照习俗，其对象必须是直系子孙。达成公虽然孙姓，但和瑞英公这一派孙氏，是不相统属的。现在想要批种瑞英公的尝山，除非攀宗认亲，在合约上写上一个什么亲属的名词，以符合乡俗，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对方批种的同意。在这种场合下，使用含糊不清的“嗣孙”（不管是那种意义）这个名词是完全可能的。但不能以此即认为是瑞英公的真正后嗣。

文章在提出“嗣孙”两字的“重要证据”后，又提出“另一个重要证据”。这个“重要证据”是十一世祖“瑞英公墓两侧分别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墓”。以世系和坟墓相连为连昌公是瑞英公儿子的证据。我认为这样的证据，只要是稍为知道翠亨孙氏坟墓变迁情况的人，都会明白那是欺人之谈。在三十年代正是东莞说盛行之时，趁修建纪念中学的机会，东莞说得大行其道。按照东莞说者的意旨，大事迁坟、造坟、换碑，制造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假像，把原葬犁头[①]尖山的连昌公，改葬在谭家山；把原来在其近傍并无瑞英公墓的连昌公墓改成居然有瑞英公在其上首！欲以此作为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佐证。这种佐证，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有人伪造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又将此伪造的身份证。作为证明自己身份的佐证。情况似乎极为类似。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在文章中所提出的种种反驳理由，其中绝大部分是根据《孙氏家谱》提出来的。因此，现在我们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

应该回过头来较集中地看看《孙氏家谱》究竟是什么货色。我以为《孙氏家谱》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伪造的家谱绝不是孙中山家谱。否则,决不致于有这样多的矛盾和漏罅出现。证明其不是孙中山家谱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如果《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为什么1937年罗香林访问孙中山姐姐妙西时,妙西只交出《纪念簿》给罗观看?且说是她家"唯一信史"而不交出《孙氏家谱》给罗观看?(二)如果《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为什么妙西不把它像《纪念簿》那样,于生前交给故居管理委员会保管,而要到死后才由其后人交出保管?(三)如果《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为什么两者的记载方法如此不同?《孙氏家谱》记载祖妣时有"安人"字样,而纪念簿的记载,则但云"妣某氏",没有"安人"字样。《孙氏家谱》记载祖先,有世无系,传代关系不明。而《纪念簿》则有世有系,传代关系分明;(四)如果《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为什么两者所记的内容如此不同?《纪念簿》所载的最先的祖先是连昌公没有瑞英公且其生卒年月是在康雍时代,而《孙氏家谱》所载的却有瑞英公且是乾隆时代人。据文章说,《孙氏家谱》的抄写年代"估计仍在清代",《纪念簿》的抄写时间"当在1925年以后,是则《孙氏家谱》为旧家谱,《纪念簿》为新家谱。新家谱应为旧家谱的继续,为什么新旧家谱的记载的内容及其方法却如此不同且大相矛盾?《孙氏家谱》抄写于清代,在清代那一个时期,文章虽未言明,但总不能排除十四世殿朝公的时期在内。因《孙氏家谱》记至十三世。殿朝公为乾隆时代的人物。从乾隆中期算起到1930年代,亦有百余年历史,为什么在这百余年间竟没有人将之继续编写完成,反而在这期间,有新的以连昌公为始祖的《纪念簿》出现?在同一家族里头,有可能出现这种矛盾情况吗?(五)据文章说,《孙氏家谱》抄写于清代而《纪念簿》则写成于1925年以后,但奇怪的是《孙氏家谱》的纸

色，却大新于《纪念簿》的纸色，岂《孙氏家谱》驻颜有术欤？

（五）遁辞·SOS的“余论”

文章在为《孙氏家谱》的四大漏洞辨护之后，在其第五部分提出“翠亨孙氏源出东莞”的问题。因其内容空洞没有新的东西，所提理由又极薄弱，对此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文章的第六部分是“余论”。名为“余论”实际是对罗著——《源流考》的总否定。所谓总否定，就是对罗著整本书的否定，而不是对罗著的某一个问题的否定。但对否定不了的，则采取回避回答的态度。总否定的理由有二：一是罗著一开始便有人“不赞成”；二是罗氏的治史方法，仍跳不出旧史学的窠臼。现从回避问题开始分述如下：

1. 回避解答否定不了的问题。否定罗氏的《源流考》，尽管可以用歪曲、颠倒黑白的方法去进行，但有一点，人们是歪曲不了，颠倒不了的。这就是《源流考》的问世，得到了孙科本人高度的赞扬；得到了包括非客家的中山县名人吴铁城在内的许多国民党的党国要人为之作序；得到了蒋介石为之题词；还得到了国民党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审议前该著曾交给素持东莞说的吴稚晖的审阅并认可）民国三十一年度学术著作发明奖金。如果说《源流考》是不正确的，那么，这就无异于说：孙科犯了神经分裂症，“谓他人父”；而与该著有关的国民党的党国要人自蒋介石以下都是草包，任凭罗氏如何说便如何认了。这个问题对于反对罗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难关。想要否定罗著，必须首先考虑如何跨越这一关，否则，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终归是无用的。文章对此，如何作出解释呢？文章很聪明，使用偷渡的办法，只淡淡的说了“他那

并不正确的学术观点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这么一句话，便想溜过关去。这是不够正正堂堂的。“学术范围以外”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告诉大家。须知这一问题一突破，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驳倒罗著之事，可以一举而就。为什么文章不这样做呢？看来文章所说的这一句话，无非是回避问题的遁辞而已。“遁辞知其所穷”，文章已理屈辞穷矣。

2. 总否定理由之一。文章所持的总否定最大理由之一就是“罗著出版后，在国民党史政机构就受到了激烈批评……甚至有人建议禁止出版”。我以为文章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一下，如果有人反问说，凡是有人反对的著作，就是“不正确”的著作吗的时候，自己将如何回答？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①。按照文章的说法，那当然也是几何公理是“不正确”的了。当否定一个人的论著的时候，只要真理在自己这一边，就不必借他人以自重。从现在文章看来，不但借人以自重，而且还力图借他人以壮大自己声势，说什么“极愿与台湾的同行就孙中山家世问题作进一步研讨”。殊不知这么一来，反而暴露了自己“理论之船”碰了礁，不得不向台湾彼岸发出 SOS 信号。这又何苦呢？

3. 总否定理由之二。文章所持的总否定最大理由之二，就是罗氏“仍跳不出旧史学的窠臼”。其表现在于“千万百计为孙中山建立一个“耕读传家”，“祖上参加过反清斗争，远祖当过大官的世系”。我以为想要批判一个人的论点，必须批判它不真实的地方。如果它是真实的，你去批判它，那自己就变成颠倒黑白的说谎者。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一页

这有什么意思呢？“耕读传家”是妙西说的，并不是罗氏的杜撰。证之以孙中山幼年，在家境贫困的条件下，仍往冯氏宗祠从师读书。“耕读传家”是没有错的。没有“耕读传家”的精神，不可能有近代孙中山的出现。关于“祖上参加过反清斗争”一事。是罗氏根据史籍和调查当时的地理环境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凭主观的捏造。钟丁先的抗清根据地是忠坝凹口，这个地方就是孙中山紫金祖先的所居地。钟氏在此与清兵相持数年之久，而谓当地人民不参与其事，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对井冈山根据地，说当地人民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政权是不合实际情况一样。至于“远祖当过大官”一事，几年前就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即在宁都已发现紫金孙氏元祖百将公孙俐的坟墓。这表明紫金孙氏族谱是可靠的，罗氏的考证是正确的。孙中山远祖孙俐定居宁都，并做了高官，是确凿无误的事实。然而文章在明知此事的情况下，仍谓罗氏捏造。这种自欺欺人之语，不觉得有愧于中吗？

(六)结语

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从三十年代开头便开始争论。论阵容东莞说戈戟如林，罗氏只单枪匹马而已。经十余年争论后，手握对两说取舍决定之权的孙科，采取了紫金说。此事本已彻底解决了的。然而直到现在总还有一些人很不服气，不断的重弹旧调，这究竟原因在那里呢？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孙中山太伟大了。如果孙中山是一个无聊政客，或是个大汉奸卖国贼，那么，紫金说肯定没有人反对。但是紫金说又是那么容易反对掉的吗？我以为要反对掉紫金说，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必须找出一部像紫金孙氏族谱那样的，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和《纪念簿》能两相吻合的可

取得人们信任的孙氏家谱。如果找不出这样的家谱，只凭世代断续，传代关系不明而又自相矛盾，漏罅处处的谱系去反对紫金说，那是不能收到效果的；第二，东莞孙氏是属于广州语系的，如果孙中山是出自东莞，为什么到了翠亨村，忽然变为客家语系的人了？对这一点要能作出合理的说明；第三，孙中山的祖先是否来自紫金，最有发言权的是孙科。孙科及其家属既已在口头上、书画上、行动上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出自紫金，你们要能够使他们声明取消这些表态。

如果做不到这三件事，那么，一切反对的努力，都将会是白费的。

最后，听说现在中山县“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中所陈列的孙中山的世系图表，连昌公以上的世系为东莞说的世系。这大概是欲以此表明翠亨孙氏是出自东莞的罢。在翠亨孙氏系出紫金的考证已得到孙科确认了数十年之久的今天，而仍坚持成见，不但宣之于口，且见于行动，强行篡改孙中山的先世世系，这似乎很不妥当吧？如果有人任意篡改你们祖先的世系，你们将作何感想？你们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研究历史的人，不顾历史事实，不讲学术道德，行吗？

来自闽南？源于赣南？国父是客家人！？*

——两岸史料阻隔，学界无法肯定

江中明

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不是客家人？大陆史学界近年发现国父远祖来自江西赣南的家谱。这项发现，推翻已故客籍学者罗香林教授所说国父先祖是来自闽南的说法；这项翻案资料因两岸学术阻隔，本地学者无法考证。学界表示，即使国父远祖是源自赣南而非闽南，也无法肯定说他是或不是客家人。

罗香林是著名客籍史学家，晚年旅居香港，曾出版《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和《国父家世源流考》等书，至今客籍同胞都服膺他的说法，国父是杰出的客家人物。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表示，史学界过去未曾确切肯定国父是客家人。

罗香林在民国卅一年出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指出，国父的远世，唐以前住在陈留，是中原世族，到唐僖宗黄巢变乱时，其远祖讳公迁居江西宁都，经过五代，繁衍子孙众多，散布在赣南和闽南等地，元明之际，才从闽赣迁粤。

国父的入粤始祖友松公，即是从福建长汀河田迁粤的其中一支，其后十一代都住在广东紫金忠坝，十一世祖鼎标公，曾开基在忠坝公馆背。

国父曾告诉林白克(Paul Limbarger)，他的家庙在东江公馆村(Kung Kun)，罗香林考证林白克撰写的孙逸仙传记，国父十二世

---

* 据台北《联合报》，1989 年 10 月 18 日。

祖于康熙年间由紫金迁居增城，不久又迁到中山县涌口门村，过两代，再迁翠亨村，自入粤始祖到国父，总共传了十八代。

罗香林这本《国父家世源流考》，书前有先总统蒋公“载德奕世”题字，并有国父哲嗣孙科及邹鲁、陈立夫、吴铁城等人作序。但是罗香林在书后结论中也表示，历史的研讨，全凭资料的获得为准，而资料的搜访，又往往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他的考证，自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到诇公的世次名讳，皆因资料不足，不能明述。

罗香林并曾表示，客族原是中原汉族，活动范围原在北起山西长治，西到河南灵宝，东达安徽寿县、南到湖北黄冈、黄陂的区域之间，自公元四世纪起，同受五胡乱华、黄巢之乱、宋高宗南渡等影响，陆续自中原避难到湖北、安徽、江西，以至广东等地。

但史学界表示，罗香林的说法，史界及部分与国父同期的老革命党员一直有歧异，唯因历史考证最重要的史料仍然不全，因此始终未有定论，大陆所发现的国父先世家谱，也仅见目录，未见全文，学界迫切希望政府在两岸学术交流迅速开放脚步，让学术归学术，考证详尽史实。

港台学术界对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问题的争议*

刘孔伏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像孙中山先生这样伟大杰出的历史人物，历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对象，论著丰富，考证精详。可是，迄今为止，关于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争议颇大。笔者仅就所见港台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论争文字，择其要加以介绍，供读者参考。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据孙中山先生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薄记述翠亨孙氏世次，仅起自十二世祖连昌公，而连昌公以后十三世祖至现代二十世祖，名讳班班可考。惟连昌公上代十一世祖以前之列宗名讳及何时始迁入香山县涌口门村（翠亨村属涌口门村孙氏之分支），却无记载。又据《孙总理家谱序》云："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子因马贼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出自广东东莞县上沙乡。因此，学人论著中均持此说，如吴稚晖在一九三九年

---

* 据《太原师专学报》，1989 年第 3 期。

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演讲中称其先世从东莞搬到香山县。

解放前,在《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上刊登了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的文章,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其第五世祖礼赞公,生二子禘儿、禘宗。禘儿,中山四区左坡头始祖;禘宗,中山四区涌口乡始祖。由涌口再分支六区翠亨乡,而生十二世祖连昌。同期又刊登了东莞县长邓庆史调查上沙乡孙氏源流之呈文云:"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这表面上好象是关于五世祖礼赞公或六世祖禘宗搬迁涌口乡的问题,实际上牵扯到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是否出自东莞的问题。再加上孙绳武等人提出的谱系图仅列六代,下距十二世连昌公,其间缺七至十一凡五世,这就不能不令学者产生怀疑。

三十几年前,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港台著名家谱专家、香港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现已转任香港珠海书院文学与历史研究所所长)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该书旁征博引,资料丰富,认为东莞说不能成立,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谓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应出自广东紫金县。其据为美国人林百克氏(panl Lin barger)所著《孙逸仙传记》云:"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当他说到同志的时候总是笑的)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说生在火奴鲁鲁,便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几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

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里。"(见开智书局译本)东莞为广州府属地,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所谓"南番东顺"是也。虽其地在东江最下游,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属县。孙中山先生口述家庙在"东江kung kun(公馆)",因而东莞之说不能成立。罗先生又在东江流域寻访有名"公馆"之地,结果在紫金县找到名"忠坝公馆背"者,今称"中心坝公馆背"。邻近有姓孙的,并有祠与公馆背相接,即所谓"黄牛挨磨"祖祠也。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新修族谱抄本所列十二世祖为琏昌公,与孙中山先生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薄中的十二世祖连昌公,仅多偏旁"王",世数皆相符。因此,罗先生认为应该视为同一人,从而提出了紫金说。

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首有孙中山先生之孙孙哲生和国民党元老邹海滨、吴铁城、陈立夫为之撰写序文,颇为称许。因此,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紫金说影响极广。不过,紫金说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忠坝孙氏族谱与孙中山先生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薄中十二世祖名相近似,可能是出于偶然的巧合,这在谱牒学研究中极为常见。而且,忠坝孙氏族谱所记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而这支增城孙氏又何时移居香山县,尚无史料加以证明,这就不免有"移花接木"之嫌。

一九八四年八月出版的香港《新亚学报》第十四卷第二期上刊登孙中山先生后裔孙甄陶《读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存疑》一文中,不仅指出了紫金说的不足之处,而且对林百克氏所著《孙逸仙传记》译文提出了异议。林百克氏那句英语原文为:"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若将 kung kun 二字译作"东莞",则全句可译成:"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如此则全句文义,简单明了,更无须加以注释

说明。如果译作“公馆”(kung kun),恐怕无人能了解到属东江水域之紫金县内“忠坝公馆背村”,即罗先生所简称的“东江公馆”。东莞英文为 Tung kun,与公馆英文声母“K”稍异,这或许是笔误,亦有可能属听误译误。孙甄陶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广东各地孙氏多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但就中山县而论,却又似未尽然。他早年闻本乡父老言,吾族在粤始祖讳恒所,仕南宋为谏议大夫,卒葬广州白云山。其后裔子孙,分入东莞、中山、新会三县定居。每当春秋佳日,如清明、重阳等节,三县裔孙,按年轮流赴广州白云山省墓,沿袭至今。又见沙边孙族家谱残本首称:“第一世太祖宋将仕郎,讳天球,字汝球,号恒所。孙公,先为南雄府保昌县沙水里人。仕理宗朝,为广州路官,因家居于羊城华宁巷焉。公生于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岁次乙卯四月十三日辰时,终于景定四年,岁次甲子十一月二十日未时,享寿七十岁。妣氏梁,生于庆元丁巳三年六月十三日酉时,终于咸淳乙丑元年三月初四日卯时,享寿六十九岁。生二子,长希文,次希武。公与氏合葬于省白云山土名后厄山第三臂,坐申寅兼坤艮之原。”此家谱所记与本乡父老所言,尚无大异,可知父老言传不假也。

当然,东莞说和紫金说各有所据,目前尚难断言孰是孰非,有待于学术界作进一步地探索研究。孙绳武所列世系图缺七至十一凡五世,大抵其时适当明季东南沿海不靖及明末战乱、清初迁界,以致粤东濒海居民流离失所,庐舍为墟,祖祠为兵燹毁坏。人民救死不暇,自难顾及族谱之完整保存,中山翠亨孙氏族谱之有罅漏,大概亦因于此。如果国内外学人共同努力,认真搜求,或许能够发现新的史料和新的线索,揭开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之迷。

承蒙香港新亚研究所全汉升教授惠赠有关资料书籍,特致谢忱!

国父不是客家人*

施荣安

十月十八日贵报专文讨论国父是否系客家人的问题。

我的舅父于抗日时担任情报员，负责广东之中山、新会、江门、港澳等地区，与翠亨村之国父家族及邻居甚熟，从未听过国父之族人以客家语交谈，他们日常生活均以广东话言谈，盖广东的客家人在外用广东话但在家族内一定使用客语交谈的，正如台湾地区的闽南人、客家人一样。

或许，国父的先祖可能是客家人，但传至国父的前几代已与一般的广东人相同了。

---

* 据台北《联合报》，1989 年 10 月 28 日。

认识国父家世*

——由《联合报》载《国父不是客家人》说起

陈运通

联合报七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专文讨论国父家世史料，谓国父是否客家人，无法肯定，同月廿八日联合报又刊出台中大里施荣安《国父不是客家人》一文，内容更简单而不深入。

兹就笔者查考所及，提供数点，以作大家参考。从资料上看来，国父是客家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早在一九八四年（民国七十三年）六月廿九日笔者旅居美国期间，见华府邮报刊载："国父族谱在大陆江西省宁都县发现"，惟中共并未公开详细内容，无法探其究竟。

研究国父家世的学者甚多，著作亦不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如：

一、一九四二年（民国卅一年）史学家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

二、一九七〇年（民国五十九年）孙科著：《八十述略》（手稿现存台北市国父纪念馆）。

三、一九八三年（民国七十二年）谢福健著：《国父家世源流汇述》。

四、曾任国父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现任世界客属总会会长的薛岳上将。

---

* 据台北《广东文献》，1990 年 3 月。

五、久居阳明山庄的国父哲嗣孙科夫人孙陈淑英女士。

六、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槃先生。

综合以上各位学者、国父家属、部属等人所得的资料及谈话记录，对国父家世源流与信仰，可增加更多的认识：

一、国父与一般客家人一样，来自中原，其上世系出河南陈留，因御黄巢之乱，南迁江西宁都，经五代再迁福建长汀，明朝永乐年间有讳友松公者，再迁广东紫金，历十二代有讳连昌公者，反清兵败，乃迁增城，旋迁中山。自紫金开基祖孙友松公至国父，凡十八代。

二、孙科著《八十述略》中，曾说明其上祖迁徙经过历程，并说，国父祖先深明大义，重气节。宋亡不仕元，明亡不仕清，如此相传民族大义，对国父的思想影响很大。

三、一九七三年（民国六十二年）世界客属总会，在台北筹办第二次恳亲大会（笔者为筹备委员之一），孙科先生，承认他是客家人，是年六月廿六日来函欣然接受大会名誉会长之职，并曾告诉筹备人员说，国父亲自告知，他是客家人，家在广东省永安县（即紫金）。

四、薛岳上将现仍健在，居嘉义及台北，他追随国父多时，他也说国父是客家人，家居紫金。交谈时，与客籍同。

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

邱　捷

自从1942年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以来,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一直存在着"东莞说"和"紫金说"两种意见的争论。1986年,李伯新与笔者合写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论证了"紫金说"不能成立的理由,主张"东莞说"。1989年的《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1期潘汝瑶、李虹冉两先生的《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评》文),认为我们的文章"全文充满着矛盾抵牾,论题、论据虚假,悖理失实";一再以"鱼目混珠"、"弄虚作假"、"欺骗"、"捏造事实"、"自欺欺人"、"作伪太过"等词语加以指责,并认为我们论点的出现"是近年广东论坛上一个奇特现象"。对"自欺欺人"这类指责,自然无须一一反驳,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仍有必要对《评》文提出的问题再作些说明。

---

* 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潘汝瑶、李虹冉《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一文见本书第519~550页。

一、回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结语”的三个问题

《评》文在“结语”中说，要反掉“紫金说”必须做好三件事，在这里先予以回答。

“第一，必须找出一部象紫金孙氏族谱那样的，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和《纪念簿》能两相吻合的可以取得人们信任的孙氏家谱。”

答：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的家、族谱。孙中山上世“躬耕数代”，家谱资料不甚完备无足为怪。现存的翠亨《孙氏家谱》是孙中山胞姐孙妙茜老姑太留下的，不见得“人们”都对这本家谱持不信任的态度。邓慕韩在30年代公布这个家谱的内容时已说明系抄自翠亨孙中山故居，后来他还说明抄写时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先生和国民党党史会的编纂王斧也在场。《孙氏家谱》在记载上确有一些疏漏。但家族谱牒有疏漏是常见的事，一般农家保存的家谱族谱更是如此。《孙氏家谱》从收藏者及收藏地看来源可靠，又有《列祖生没纪念部》、契据、坟墓作佐证，就不能因其记载上有一些问题便完全推翻。现在我们看到的洪秀全的族谱，就有极为明显的疏漏，但因为它是官禄垅洪氏保存的，从未有人怀疑它是赝品。“世系井然、传代关系明确”并非判别家谱、族谱真伪的准则，而伪造的家、族谱做到上面两点也不困难。如果说有疏漏的家谱不可能是孙中山的家谱，只能是其他孙姓的家谱，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在条理、文字上较翠亨《孙氏家谱》为优，但它不是孙中山家族成员保存的，收藏地远离翠亨数百公里，发现和公布的时间是本世纪40年代，

迄今仍找不到一条直接证据肯定它可以与翠亨孙氏保存的谱牒资料相接;相反,否定的证据却有不少(详后)。因此,完全没有理由否定翠亨《孙氏家族》而代之以与翠亨孙氏无任何关系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

"第二,东莞孙氏是属于广州语系的,如果孙中山是出自东莞,为什么到了翠亨村,忽然变为客家语系的人了?"

答:所谓"客家语系的人"并非事实。现举出两个很易查核的证据:

1. 孙中山留下有普通话、广州话演讲录音。他的普通话略带广州话口音,广州话略带中山土音,但都没有客家口音。

2. 孙老姑太是讲白话的,她的后人与中山市见过她的人士可以证实。翠亨村的人也是全部讲本地白话的。

罗香林先生认为孙家本来属于客家语系,但他又说:"至孙父达成时已是本地化了。……孙公父子,尚能客语,但他母妻,则已操本地白话了,翠亨……周围凡24村,就中除翠亨和迳仔路村外,其余都是纯粹的客家村。"① 可见,即使按罗先生的说法,至少到孙中山父亲一代,并非"客家语系的人"。

那么,孙家是否本讲客话、后改白话的呢?这个假设至今仍找不到任何证据。不过,翠亨周围是客家人聚居之地,在这个环境中,本讲客话的家族怎么会"忽然"改说本地白话呢?

"第三,孙中山的祖先是否来自紫金,最有发言权的是孙科,孙科及其家属在口头上,书面上,行动上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出自紫金,你们要能够使他们声明取消这些表态。"

答:我们当然不能使孙科先生及其家属取消表态。同样,任何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264。

人也无法取消孙老姑太及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先生只承认东莞为祖籍的事实。在祖籍问题上,他们同样"最有发言权"。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孙科先生也有过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表示。《评》文的第五部分说:"如果说《源流考》是不正确的,这就无异于说,孙科犯了神经分裂症,'谓他人父'。"这类强加于人的话与学术讨论并没有关系,恐怕还会产生某些消极的效果。一个人对远祖的情况不很清楚,同族人对家世源流有不同看法,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因为孙家成员对祖籍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所以,无论持"东莞说"还是"紫金说",在引述孙中山亲属意见时,态度不妨客观些。

二、"紫金说"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

《评》文说我们的文章把"琏昌"与"连昌"的差异"看作是决定孙中山祖先是否出自紫金的关键性问题"。我们的文章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与文字。"琏"与"连"的差异不算重要。"紫金说"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是:

1. 所谓"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前提不能成立。我们的文章说,这种说法来自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段话("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的误译。(中译本作"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里。")《评》文说我们是"讥笑罗先生不懂英语"。这未免近于深文周纳。误译与否,将中、英文对照即可判别。中文本译者是徐植仁,译本有误译之处,也与罗先生没有关系。况且,早年罗先生自己也说过这是误译,他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上说:"Linebarger 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

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 Tung 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① 《评》文还有指责我们"谓罗氏捏造"的说法。这有违事实。我们从来没有对罗先生使用过这种字眼。在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上我们与罗先生虽有不同看法,但对罗先生的人格和他在学术上的整个建树是尊重的。在文章中讥笑、谩骂他人有悖学术道德,对一般人尚且不可;我们作为后学晚辈,对已故的罗先生更不会这样做。

现在再回头谈谈所谓"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问题。紫金中坝孙氏族谱上说:"……所遗祭田,小土名林塘肚,又忠坝公馆背灌水塘杨坊矿石屋下三坟地,旱塘仔即上镇约开基之始祖也。分四房:长房祠堂上孙排,二房祠堂上袁田,三房祠堂下孙排,黄牛挨磨,即开基祖祠是也。"② 显然,"公馆背"只是一处祖坟所在地的小土名,祖祠所在地的土名是"黄牛挨磨"等。而罗先生认定为孙中山祖籍的村庄,按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是"紫金(永安)县琴江都上正(镇)约中坝上孙排"(现在的地名是"紫金县中坝发昌乡孙屋排"),无论如何都插不入"公馆"两字。孙中山和一位外国人谈祖籍时,为何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都不提,只提一处祖坟(不是祖祠)所在地的小土名的前半截?("公馆背"按理也不能简化作"公馆")因此,还是罗先生早年同意过的,"Kung Kun"乃是"Tung Kun"之误较为合理些。

就退一步说,"紫金琴江都上正约中坝上孙排"等于"公馆村",它也并非"on the East River"(在东江)。这个村庄在紫金县东北,离东江至少数十公里,位于韩江的支流琴江上游,在普通的河源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274。

② 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影印件)。

市、梅州市地图上都标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村庄最多也只是"韩江公馆村"而非"东江公馆村"。不管怎样解释也无法与前引的孙中山自述联系起来。

2. 从罗先生那时至今,尚未找出过一条证实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有关系的直接证据,说来说去仍是一些推测之词,或把某某人认为如此当作证据。而翠亨则有多种来源可靠的物证说明孙中山上世在明朝已居住在香山,并非清初从紫金(永安)迁来。我们的文章已谈了很多,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

3. 紫金的琏昌并非香山的连昌,除了翠亨的文物可以证实这一点外,还有一个极有力的证据:罗先生说过紫金的琏昌参加过钟丁先的抗清斗争(发生于1646年左右),这一事实又为紫金县近年细致的调查所证实。① 但香山翠亨的连昌生于1669年,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参加发生在他出生前20多年的抗清斗争。因此,紫金之琏昌并非香山之连昌,当无可怀疑。这点并非枝节问题。须知"紫金说"是没有直接证据的。紫金孙氏族谱有一位十二世祖琏昌,而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则有一位十二世祖连昌。此琏昌即彼连昌的假设,乃是"紫金说"最为关键之点。现既已可确定两人并非同一个人,紫金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不能相接,"紫金说"当然就失去了成立的可能性。

4. 紫金(永安)在昔日是一个"纯客住县",但翠亨孙氏在语言、风俗、习惯与客家人不同。

《评》文无视以上的问题,说罗先生的考证"冲破了十二道难关"。文中列出的"难关",有的与本论题了无关系,而"紫金的琏昌

① 紫金琏昌参加钟丁先抗清,见于《国父家世源流考》吴铁城、陈立夫序;又见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388;紫金方面的资料参看《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会刊》,紫金,1986。

是否到了香山？是否有确凿证据？”这个大“难关”却没有列入；同时，所列出的“公馆的地旺在哪里”、琏昌与连昌“世系虽相符其年代是否相符”、“翠亨孙氏是否说客语的”、“孙中山家庭成员是否确认他们是来自紫金的客家人”这几个“难关”，恰恰就都没有“冲破”。

《评》文在开始时还说过：《国父家世源流考》“已成为研究孙中山家世的定谳，而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亦已明白无疑了。”事实上，我国大陆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很少人重视所谓“孙中山祖籍在紫金”的说法。在我国台湾和海外，也有人对“紫金说”提出质疑。1985年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第3次增订本，在提及孙中山家世源流时虽仍沿用紫金说，但补加了一条长注。注文一开头就说：“关于先生（孙中山）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注文还引述了孙满先生致函台湾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反对“紫金说”的意见；注文最后说“本谱暂仍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再行补正。”可见，即使在台湾，“紫金说”并非“定谳”。“紫金说”存在的问题，罗先生当时没有解决，《评》文也没有解决。《评》文和我看到过的另外两三篇为“紫金说”辩护的文章（有的是油印散发的），在学术上都讲不出多少道理，更拿不出有力的新证据，只是一味强调罗先生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连篇累牍地挖苦、斥骂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用这种方法，恐怕还是不能冲破“紫金说”的难关。

三、为什么我们赞成“东莞说”

《评》文说：“以公馆为东莞误译的主张者，以东莞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的文章并没有把“Kung Kun”为“Tung Kun”之误作为

论据。把这段误译作为出发点的，是“紫金说”而不是“东莞说”。我们赞成“东莞说”的主要理由是：

1. 孙妙茜老姑太保存的《孙氏家谱》有“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的记载。而东莞上沙孙氏族谱可与翠亨《孙氏家谱》相接。

2. 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在《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中记录了孙老姑太1931年4月26日的一段答问：“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这与《孙氏家谱》的记载是一致的。

在研究一个普通农家（孙中山的上世就是普通农家）的家世源流时，以上两点应说已是很有力的证据。至今仍找不出什么证据说明孙老姑太及孙家的前辈早把自己的祖籍搞错，非要日后另行考证出一个新祖籍不可。

“东莞说”还有下面一些相当有力的佐证：

1. 东莞上沙孙姓人士保存了1912年5月与孙中山同开孙族恳亲会的照片、传单。这证实上沙孙氏与孙中山渊源相同。

2. 中山左坦头孙氏祖籍为东莞是确凿无疑的。左坦头孙氏保存了一些可以证实与翠亨孙氏源流相同的文物，如1912年5月孙中山在左坦头孙氏宗祠与族人的合照。

3. 近年，罗香林先生的好友温济琴先生披露，罗先生对他说过：“孙中山当大元帅时确实又曾带廖仲恺、王宠惠、邹鲁去东莞拜过祖。其实，孙中山到东莞为名，捐军饷是真。”[①] “捐军饷”的解释是讲不通的，相信多数人不会认为，孙中山会去一个并非祖籍的地方祭祖。国民党党史会还收到过一件关于孙中山在民国元年到东莞祭祖的资料。冯自由在答复党史会的询问时说：“总理曾往东

① 《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会刊》，11。

莞,似属确实。"[①] 对孙中山往东莞祭祖的具体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说明。但上述两条资料,至少反映了后来提出"紫金说"的罗香林和熟悉国民党历史掌故的冯自由都相信孙中山有过到东莞祭祖之事。

4. 孙科先生曾有过接受"东莞说"的表示,而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则始终坚持"东莞说"(孙满、孙乾先生曾到东莞上沙寻访先祖祠墓,孙乾先生还曾为上沙孙氏祖祠书写对联)。但因孙科先生后来又赞成"紫金说",这一点不能作为关键性的证据。

四、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

对客家人和客家历史,我们没有作过专门研究,只是在探讨孙中山祖籍时顺带涉及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当时考虑到:

1. 孙家讲本地白话而不是讲客家话。

2. 孙家居住在讲白话的翠亨村而不住在附近的客家村。孙氏上世住过的涌口村也不是客家村。

3. 孙家连续几代与本地讲白话的人通婚而不与附近的客家人通婚。

4. 孙家的风俗习惯与一般客家人不同。如妇女有缠足陋习。还有一点:客家妇女在墓碑、家谱中一般称"孺人",而翠亨孙氏妇女在墓碑、谱牒中多称作"安人"而没有称作"孺人"的。被"紫金说"者当作来自紫金的十二世祖连昌公,其墓碑是"显十二世祖考连昌孙公、妣陈氏安人同墓"。从这个墓碑看,连昌公不会是来自紫金的客家人。他的后代就更不会是客家人了。

① 林一厂日记(中山大学藏)。

除了以上各点外，我们再考虑到昔日客家人在乡居环境中一般不会改变语言、风俗的特点以及翠亨附近多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这个特殊环境，才认为“孙家不是客家人”。但近来发表的一些论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在此，我对这个问题再作一个更明确些的表述：根据已知的各种资料，我们认为翠亨孙氏不可能是清初来自紫金的客家人。至于孙氏更远的祖先是否客家人，则不敢遽下断语。

事实上，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有过孙家并非客家人的极明白的表述。林百克记述了孙中山反对给妹妹缠足时杨太夫人反驳儿子的话。现将林百克所记的英文原文再次抄录：“‘Behold the Hakkas!’ declared the mother of Wen.（“文”，即孙中山）‘No Hakka woma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本地人）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 Hakka woman or a Chinese woman?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① 因为经过两重转述及译成英文，林百克所记在字句上未必与杨太夫人的原话完全相同，但她认为自己的家庭不是客家人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

能不能说，因为杨太夫人是“广府人”才这样说，而孙家的男子仍是客家人？这种假设是很难成立的。达成公若为客家人，当不会允许家中有缠足陋习。杨太夫人若真的嫁到一个客家家庭，作为一个贤惠的旧式妇女，她也不会对儿子说一番自外于客家人的话来为缠足辩解。

《评》文在“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上对我们的指责，采用

① Poul Linebarger, 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1925, P81。

了学术研讨中罕见的做法。我们的文章说到“昔日客家人一般不与土著通婚,但孙中山的祖母黄氏……元配夫人卢氏是当地人而不是客家人。”《评》文不理会我们已作了“昔日”、“一般”的限定,而且没有把这一点作为主要论据;仍说我们把土客不通婚“扩大化”、“把局部变为整体,把一时变为长远”;在列举了后来一些土客通婚的事例后又硬说我们的文章的逻辑是“和广府人通婚便是广府人”、“以通婚不通婚为判断孙中山是客家还是非客家的标准”等等。这里所指责的,完全是我们的文章里没有的东西。

我觉得,过于强调“孙中山是客家人”或者“孙中山不是客家人”都没有现实意义。因为无论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既不影响他崇高的历史地位,也不影响客家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会同意的。

五、关于翠亨的文物资料

因为翠亨孙中山故居的多种文物都不利于“紫金说”,所以,《评》文花了不少篇幅论证这些文物资料是“不可信的”。不过,文中列出的理由,看来还是不能把这些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一一推翻。

翠亨故居现存的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是翠亨《孙氏家谱》所记的一位七世祖容窝公的后人孙梅景等人把一块祖尝山地卖给“房亲”孙廷尊和孙迥千(翠亨孙氏十三世祖,连昌公之子)的契据。这个契据,一方面可以作《孙氏家谱》的佐证,一方面也证实了翠亨孙氏不可能是十二世才从外县迁来。《评》文对契据中“房亲”一词作出新解释:“‘房亲’常常用作‘族亲’即同姓人解”;又说:“如果迥千是近亲或五服外同住一条村的房亲,即购买祖尝田决无须托外姓人作中,更无须由外姓人引至。要外姓人作中,要外姓人‘引

至',则表明迴千公决非容窝公或容窝公兄弟的同支孙氏,不过是同姓人而已。"相信多数懂汉语的人不会接受《评》文对"房亲"一词的新解释。仅仅同姓而源流不同的中国人也无互称"房亲"的习惯。从后文看,《评》文对"房亲"一词概念的使用也是前后不一致的。若孙梅景等人与孙迴千没有亲族关系,决无互称"房亲"之理。至于说"决无须托外姓人作中",则不知《评》文有什么依据。纵然真的拿出了依据,古代民间契据情况千差万别,相信谁都不敢说没有例外的情况,怎能因"有外姓人作中"就判定卖买双方即使互称"房亲"也没有亲族关系?何况契据里作中的"外姓人"还可能是孙家的表亲或姻亲。因此,《评》文否定孙梅景等人与迴千公有亲族关系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

翠亨故居有一件展出多年的文物——孙中山父亲达成公兄弟批耕瑞英祖留下山荒的契约。在《孙氏家谱》,瑞英公是十一世祖,达成公兄弟在契约中自称是"瑞英祖"的"嗣孙"。这个合约有力地证明了孙中山上代不可能是十二世始从紫金迁来,因为十一世祖瑞英公就居住在香山。《评》文对这个契约的议论同样是没有说服力的。如该文提出"签名笔迹相同"(并非完全相同)的问题。其实,这在昔日乡村文契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当时乡村并非人人都能写字。若系日后有意伪造的赝品,写成不同笔迹亦非难事。《评》文还对"嗣孙"一词发表了六七百字的莫名其妙的议论;又说"'嗣祖'两字,字典无此词",达成公兄弟在契据使用"嗣孙"一词"这显然是不通的"。我认为,达成公在这个契据中自称瑞英祖的"嗣孙",并无不通之处。"嗣孙"一词,在昔日族内文献是常用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就有。无论古今,大概不会有人把不是自己祖宗的人称作"祖"而自称"嗣孙"。而且,在该合约中署名的房长和房亲尊贤、业贤、国贤、茂成等人的姓名,与敬贤公、达成公两代排行相

同。显然他们是同族宗亲,同为瑞英公的后代。为了否定达成公为瑞英公的后代,《评》文甚至想出这样的解释:"达成公虽然孙姓,但和瑞英公这一派孙氏,是不相统属的。现在要批种瑞英公的尝山,除非攀宗认亲,在合约上写上一个什么亲属的名词,以符合乡俗,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同意。"现在大家都知道,达成公虽然只是一介乡农,但为人公正廉明,不苟取予;而且,他尊崇祖先,极重风水。他怎么会为批耕一块山荒地而做出"攀宗认亲"这种在当日为人们所不齿的事?而且,同居一村,谁为谁的后代,彼此都一清二楚,又岂会发生这种"攀宗认亲"之事?《评》文是为《国父家世源流考》辩护的文章,却写出这种毫无根据的对达成公不恭的文字,这就与罗香林先生尊崇孙中山的本意大相径庭了。

对故居收藏的《乐安堂仕合号》帐册,《评》文称之为"'乐安堂'和'仕合号'两间商号的来往帐册"。这也是毫无根据的。该帐册确有达成公管过公尝的内容。《评》文以这本帐册与他们认定的公尝簿格式有别,又断言这本帐册是"捏造"的。昔日民间的帐册,情况也是千差万别,谁也不可能制定一个格式让人人都严格遵守。这个帐册明明记有达成公管理公尝的内容,怎能因不符合某种格式便斥之为"捏造"?

对《孙氏家谱》和上述几种资料,为慎重起见,笔者曾托人向孙老姑太之孙杨连逢先生和在50年代即负责管理故居文物的李旭昭先生请教过。杨、李两先生都亲笔作函予以明确、肯定的答复。李先生还说明,当日纪念馆入藏这些文物都是无偿的。在翠亨故居文物是否可靠这个问题上,杨、李两先生的话无疑较《评》文那些缺乏根据的猜测和议论更有价值些。

对翠亨附近的孙氏祖墓,《评》文发表了如下不负责任的议论:"在三十年代正是东莞说盛行之时,趁修建纪念中学的机会,东莞

说得大行其道。按照东莞说者的意旨，大事迁坟、造坟、换碑，制造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假象，把原葬犁头尖山的连昌公，改葬谭家山，把原来在其傍并无瑞英公墓的连昌公墓改成居然有瑞英公在其上首！欲以此作为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佐证。”请问：这些话有什么根据？这些胆大妄为的“东莞说者”是谁？在30年代，根本不存在“紫金说”和“东莞说”的争论，谈及孙中山家世源流的人多是“东莞说者”（对孙中山祖籍在东莞上沙还是东莞员头山则有过争论），何须为证实一个被人们接受的说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孙中山祖墓大做手脚？兴建纪念中学是孙科先生主持的；孙老姑太一直住在当地，孙满、孙乾两先生经常回乡，孙乾先生还任过中山县公安局长，若说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伪造孙中山的祖墓（共数十座）并将真正的孙氏祖墓改头换面，当时无人制止，事后也无人追究，有这个可能吗？

孙中山在逝世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尊崇，翠亨孙中山故居成为圣地，经常有人前来瞻仰，许多专门的研究人员来作过调查、研究。中山县的人民和各级政府都不会容忍任何亵渎孙中山故居的行为。因此，所谓大批伪造孙中山家族文物、祖墓的事，绝不会发生。我们大家在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时，对史料进行考证是正常的事，但当涉及到孙中山的故乡和亲属时，态度是否可以冷静些、慎重些？是否可以先同对文物有发言权的人士及有关文物管理部门交换一下意见再发表议论？

六、《评》文提到的一些"新"论据

罗香林先生在30年代就有"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①]的想法,至40年代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宣布发现一本紫金中坝孙氏族谱抄本,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紫金说"。多数对"紫金说"提出异议的人,都以承认罗先生提出的紫金方面的资料的可靠性作为讨论的前提,只是不同意他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评》文对"紫金说"的资料谈得不多,大抵只是重复一些罗先生说过的东西;但提出和引用的一两条罗先生没有谈过的新证据,在可靠性方面却不能不说大有问题。

《评》文提出一个新论据:孙中山的父亲是讲客家话的。这并非事实,已如前述。但这个新论据是怎样得出来的呢?原来,《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载了孙老姑太说达成公"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评》文把这番话改动成达成公千里迢迢到嘉应州"聘请"这位地师,并以此作为达成公讲客家话"绝好的证明"。且不说"往聘"之说并无证据,以达成公当日的家境,恐怕没有财力专程到嘉应州聘请风水先生;而且,供养过一位嘉应州的风水先生也不足以证明达成公讲客家话、是客家人。风水先生闯荡江湖,一般也无须到其家乡聘请。《评》文以改动《国父家世源流考》内容的方法提出一个"新"证据,又拿这个"证据"来证明《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论点是正确的,这种论证方法恐怕不能说是谨严的。

《评》文还引用了台湾"研究孙中山家世的专家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中薛岳所述:"国父原籍在紫金县,国父也说过自己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264。

是东江客家人,老家住在紫金县。”这又是罗香林先生没有提过的一项新证据。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的序介绍作者时说到:“谢君出身理工,服务工商界多年。”谢先生前几年发表过一篇《国父侄孙——孙承祖》(台北《传记文学》第46卷第4期),说孙中山的叔父学成公去世时留下一个19岁的儿子官星,将钱汇回乡供养寡母程氏,而学成公夫人程氏至本世纪30年代百多岁高龄时才去世等等。查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学成公去世时程氏才29岁,自不会有19岁的儿子。且《纪念部》明确记载程氏于民国元年去世,寿77岁。显然,谢先生撰文时还不大熟悉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的内容。看来,谢先生是一位研究孙中山家世的有心人,但未必是“研究孙中山家世的专家”。

《国父家世源流汇述》有一些作者近年收集记录的口述史料,这些口述史料几乎众口一词地显示:被访问者早就(甚至在孙中山生前)知道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上引薛岳所述是其中一种。在历史研究中,口述史料是值得重视的,但应对口述者的身份、史料产生的时间和背景作分析;不能偏信某类口述史料而无视其他反证资料。如果孙中山真的早就说过自己“老家原住紫金县”,为何以往从未披露过,连“紫金说”的提出者罗香林先生也不知道?为何孙家的长辈孙老姑太和后辈孙满、孙乾先生都不知道而要承认东莞为祖籍?为何孙中山的亲信高级干部胡汉民、邹鲁、吴稚晖等都不知道而接受过“东莞说”?孙中山为何不与亲人、不与高级助手谈祖籍,只告诉当时只是中级军官的薛岳?这些,都是引用这类史料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至于那些听说某某人说过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的口述史料,其可信程度就更低了。这类后出的口述史料再多,在价值上恐怕都不能与孙老姑太1931年

关于祖籍在东莞的口述相比。因此,这类口述史料不足以成为"紫金说"有力的新证据。对谢先生的研究,我知之甚少。只是因为《评》文引用了《国父家世源流汇述》的内容,所以顺带谈一下,再多说就不应该了。

七、对研讨这个学术问题的一些想法

不了解围绕孙中山家世源流这个学术争论来龙去脉的人,如果看到"紫金说"有一些著名人士接受,又看到一些为"紫金说"辩护的语气非常激烈的文章,可能认为"紫金说"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些根据。其实,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紫金说"是至今都没有直接证据的。现有的证据(包括在紫金县的一些资料)都有利于"东莞说"而不利于"紫金说"。"紫金说"之所以产生相当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

《评》文对我们文章中"其主要原因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这句话作了很尖锐的指责,斥之为"偷渡"、"溜过关去"、"不够堂堂正正",并宣布我们已"理屈辞穷"。其实,在我们的文章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后来我在 1987 年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 5 集)又进一步作了说明,那就是:昔日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的表态,阻止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使证据不足的"紫金说"得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自不应在这里多费笔墨,不知何故竟被说成是"偷渡"。《评》文还认为蒋介石等人的表态对批评"紫金说"的人"无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难关";如果要说《源流考》是不正确的,就无异说"与该著有关的国民党的党国要人自蒋介石以下都是草包。"对"党国要人自蒋介石以下"的功过贤愚,没有必要也不

可能在讨论孙中山家世源流这个学术问题时作出评价。说他们对一个学术问题表错了态,也算不上“大不敬”。他们并不是研究这个学术问题的专家,在今天,人们更不必把他们的表态作为研究的准则。因此,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党国要人自蒋介石以下”的题署、序言是“不可逾越的难关”。与这些“党国要人”们相比较,国民党党史会那些作过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其意见更客观些,对问题的研讨也更有价值些。当时,国民党党史会负责增修《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的纂修林一厂(即林百举,梅县人,“厂”音 an),起初对《国父家世源流考》十分赞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把该书的内容详为摘录。国民党党史会的一些人要求禁止罗著出版(实际上已经出版),林还反对这样做。后来,他调阅了《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等资料,把这些资料与《国父家世源流考》列表逐条比较,又托在广东任职的友人设法调查紫金的情况。最后,他感到罗先生这本书确实还存在问题,在 1944 年 3 月花了几天时间撰写题为《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点》的报告。1944 年 3 月 17 日,他到国民党党史会办公处,“将关于总理世系案㈠本会调查经过、㈡罗著可疑之点、㈢学术会议讨论原案与签呈共订一本,附缴罗著一册交冯绍苏,饬送秘书室转呈张委员。”① 如果台湾的学者能在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找到这些资料并予以披露,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当时就罗先生的著作进行的争论有更多的了解。

研究孙中山,首先应该研究他的事迹、他的思想和他对历史的伟大贡献。祖籍问题只是一个不算很重要的具体学术问题。对这个学术问题,除罗香林先生外,邓慕韩、谭彼岸、孙甄陶、庄政等先生在我们之前都作过专题研究。我们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① 林一厂日记(中山大学藏)。

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来没有想过要作出什么“新发明”，更没有认为自己的文章有何等重要的价值。“广东论坛”也理所当然地没有特别注重我们这篇文章。它所引起的某些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其实，孙中山祖籍问题是一个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从长讨论的学术问题。如果通过讨论大家达成一致认识固然好；就是意见仍不一致，关系也不大。因为谁都同意孙中山是中国人，是广东中山（香山）人。至于孙中山很多代以前的祖籍在何处，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各人不妨采纳自己认为正确的那种观点。

读完《评》文，我颇感困惑：有些问题在我们的文章及笔者1987年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已作了说明，《评》文仍就这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问。难道两位作者并没有读完他们所批评的文章？作为一篇研讨学术问题的文章，《评》文的语气似乎盛气凌人了些，“欺骗”、“可笑”一类字眼也稍多了些。特别是该文在列举他人论点再予以驳斥时不注意准确性，立论则颇有忽略论据的倾向；这些，更使《评》文与一般研讨学术问题的文章有较大的不同。不过，这篇文章毕竟是在一个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这就比非公开地散发一些油印件来得堂堂正正，也给了我一个尽言之机，也许会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因此，我还是应该对这篇文章表示欢迎的。

关于翠亨孙氏是否为客家人的问题*

林家有

孙中山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伟人,其思想功业彪炳千秋;客家人是中华民族中汉族内具有优秀传统的一支,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起过并仍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由此,孙中山是否客家人,既不影响孙中山、也不影响客家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研讨乃至争论,只是学术研究范围内的事。

关于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在孙中山逝世后几年即有人提出,自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颇有争论,即孙氏族人,意见亦不一致。在此,把我们所了解到的有关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争论的由来与发展,各种意见的论点与论据,以及翠亨一带居民的状况作一介绍,并谈谈我们的看法,以供研究孙中山以及研究客家学的人士参考。

一、"翠亨孙氏为客家人"说之由来

在孙中山在世时形成的文献中(不包括后来的忆述),我们没有发现孙中山及其家人对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作过表态。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一般人并不认为孙中山是客家人,陶成章在1909年散布谣言说孙中山"常言必先杀尽嘉应客及外江同志,然后乃可革

---

* 原文曾于1992年2月香港"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发表,此据谢剑、郑赤琰主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1994年版。

清政府之命。”[①] 陶成章当时正不择手段地反对孙中山。如果孙中山当时被认为是客家人,那么陶成章当不会制造出这种荒唐的谣言来进行挑拨。

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已有人提出并见诸文字,罗香林先生在30年代《客家研究导论》一书,[②] 对此言之颇详。

在本书中,罗先生引述古公愚、郭冠杰、范锜等先生的意见,他们提出,“孙公祖先,确为客籍,”“先生之兄弟平日善为客语”,“孙中山,实客家人与广府本地系之混血种,所居翠亨,原字菜坑,盖客家移民,初以种菜为生,故以菜坑名村也。”甚至还提到孙中山还亲口承认自己是客家人。[③]

罗先生也谈到他在30年代初访问翠亨三两天后所得之结论:“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至十二世连昌公复于康熙间与子迥千迁香山县东镇涌口门村,与邻居不很融洽,故数传又迁同镇翠亨村。后来与本地系互通婚姻,至孙父达成(字道川)时已是本地化了。孙母杨氏及原妻卢氏,皆为曾经缠足的本地人。孙公的姐(适杨)妹(已故)亦曾缠足。孙公父子,尚能客语;但他母妻,则已操本地系白话了。翠亨村距石门坑凡四里,周围凡二十四村,就中除翠亨村及迳仔路村外,其余都是纯粹的客家村落。孙公上世,种种经历,及其与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关系,各村老年人,多少还知道一点。据他们说:客人和本地人,到现在还是不很和睦,唯翠亨

① 《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页。

② 本人所据引的《客家研究导论》系兴宁希山藏书房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本,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263~264页。

孙家，则自来主张联合，不肯排客。”①

罗先生所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到了孙中山之父达成公一代，已是“本地化了”的客家人，只是“尚能客语”；他也了解到孙家语言、婚姻、风俗与一般客家人不同，却并没有谈到发现了什么可证实孙家为客家人的史料；相反，他提到的“各村老年人”所说翠亨孙家“不肯排客”，倒是反映了他们只把孙家看作对客家人持友好态度的本地人。第二，罗先生认为孙家“原住紫金，后迁东莞”，与后来《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说法有较大出入。而且，罗先生在该书谈到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译本一段话“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时加了一个注：“Linebarger 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 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 Tung 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② 而这恰恰是罗先生后来极力反对的论点。

罗先生 1942 年出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并未就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展开论证，但因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翠亨孙氏祖籍为紫金，而紫金是“纯客住县”，则本书认为翠亨孙氏为客家人是不言而喻的。

罗著发表后，既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如邓慕韩所写之《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就以孙氏语言、婚姻与客家人的差异作为反驳的理由。但其时罗著已得到蒋中正、孙科等题词作序，邓慕韩等人的意见似未受重视。此后，有不少书与文章依据罗先生的结论，称孙中山为客家人。我们看到过一种日本人写的关于面相的书，第一个标题便是《客家人与中国江南型面相——孙中山就是客家人》。③ 足见“孙中山是客家人”之说流传颇广。

---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 264～265 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 274 页。

③ （日）坂元宇一郎著、李奇编译：《面相与中国人》，北京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

自60年代以后,陆续有人撰文对罗著提出质疑,也有人著书撰文为之辩护,在争论中,连带涉及到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的问题。[①] 下面,把各方面的有关论据,再归纳和分析一下。

二、翠亨孙氏族人对祖籍及自己是否为客家人的意见

自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对翠亨孙氏祖籍是紫金还是东莞,"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②] 甚至有人对有关文物资料的可靠性也提出疑问。如果详为引述,非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容纳。现在,只能就翠亨孙氏成员的表述(包括他人的转述),作些介绍和评论。

赞成孙氏祖籍为紫金的人士常引用所谓"国父自述祖祠在东江公馆村"。这段自述出自林百克著、徐植仁译之《孙逸仙传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查英文原文则为"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现在被认为是紫金祖籍的中坝孙屋排,其孙氏一处坟地小土名称"公馆背"。但这里有两个疑问:第一,孙中山与一外国人谈祖籍,为何不说县名,只说祖籍所在村

① 参看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广州《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再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4期);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潘汝瑶、李虹冉:《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1期);邱捷:《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② 《国父年谱》台北1985年增订版,第2页注②。

庄的一个小土名的前半截？（“公馆背”似不可简化为“公馆”）；第二，中坝孙屋排实际上并非“on the East River”，而是属韩江水域的村庄。因此，以孙中山这段话作为祖籍紫金的自述并没有说服力。罗香林先生早年同意过的 Kung Kun 为 Tung Kun（东莞）的可能性恐怕更大些。当然，因字母有异，这段自述也不足以作为孙中山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证据。

近年，有人披露，孙科先生曾说，“国父曾告诉他，老家原住东江永安县（现名紫金），”① 但我们所见的一些文献资料，与上面转引的口述史料则明显有矛盾。

1.1912 年 5 月，孙中山曾到香山左坦头孙家祠堂祭祖，现留有合照。② 如孙中山早知祖籍为紫金，当不会到与紫金毫无关系，祖籍为东莞的左坦头孙氏祖祠祭祖。

2.1932 年 9 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之《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系采“东莞说”，上有“十五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珠玑巷。后与东莞伯何真公善，复偕子贵荣贵华贵绍贵武，至东莞员头山居，乃为来粤之始，十四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迄明代。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香山县，即今所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此谱稿成后曾分送国民党元老及党史会委员签注。后来，国民党党史会把各方意见集成《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所有签注者均未见对上面引文孙中山祖籍东莞提出异议，更无人提及孙中山祖籍为紫金。孙科的签注只是把“分居左沙头”改正为“分居左

① 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版，第 26 页、第 81～82 页。

② 本照片收入盛永华、赵文房、张磊所编《孙中山与澳门》图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版，第 99 图。

坉头”，若孙中山以往对孙科讲过祖籍为紫金，孙科在签注时不应毫无表示。左坉头孙氏按“东莞说”与翠亨孙氏同宗，若按“紫金说”则不相涉。孙科既把“沙”字改正为“坉”字（此字不常见，非中山当地人亦不会知道正确写法），可见当时对“东莞说”并无异议。①

3.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的《总理事略》，谈及孙中山先世时也采东莞说。孙科曾为题写书名，他在亲笔题词中又说：“《总理事略》，编订明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举出40年代以前形成的文献中有孙科承认紫金为祖籍的证据。实际上，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党史会的委员均接受“东莞说”，至少并无异议；只有罗香林先生说“原住紫金，后迁东莞”，但现在的史料已证实“紫金”、“东莞”两说并不相容。因此，近年出现的各种关于孙中山早就说过祖籍在紫金的口述史料，与已知的文献资料便有矛盾。

至40年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时，孙科为之作序，至此时，孙科接受了“紫金说”。但在40年代末，他又为东莞上沙题写“国父先代故乡”。② 可见，当时他仍承认东莞上沙为祖籍，而不甚清楚“东莞”、“紫金”两说是不相容的。至70年代后，孙科在台湾发表《八十述略》，采用紫金说。此后在多种场合孙科自认为客家人，这是人所共知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孙科接受东莞说，应系得自早年的听闻；而接受“紫金说”，则系得自罗香林先生学术研究的结果。

除孙科及其家人外，翠亨孙氏的其他成员，尚未见有赞成“紫

① 本文所据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本，档号（七一六）508。

② 据广东省东莞市地方志办公室藏照片。

金说”的表示，只有赞成“东莞说”的表示。

原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在《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中记录了孙妙茜老姑太（孙中山胞姐）的一段答问：“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① 孙老姑太之孙杨连逢先生现住广东省中山市，他也证实孙老姑太只承认东莞为孙氏祖籍，从未谈过紫金（永安）。而孙中山胞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只承认东莞为孙氏祖籍而始终不承认紫金，那也是大家都了解的。

从以上情况可知，在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发表前，翠亨孙氏的成员（也包括其他人）根本没有想到过紫金可能是自己的祖籍。罗香林先生说过：“客家人士，最重视谱牒，虽其上代亦已迭遭兵灾，文籍荡然，不易稽考，然其人能靠历代口头的传述，其子若孙，于前代源流世次，不至完全忘却。”② 如翠亨孙氏真是清康熙年间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到清末民初也不过二百多年，期间又未经兵灾流离，何以至今仍不能发现一件写有“紫金”（或永安）两字的文物。显然，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翠亨孙氏是否自认为客家人？很多人都知道，孙科曾接受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名誉会长。谢福健先生之《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也影印了孙科夫人的印有私章的亲题证言：“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但孙眉后人孙满、孙乾则否认自己的家族是客家人，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所以，两方面的说法，恐怕都不能作为翠亨孙氏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的主要证据。

Paul Linebarger 氏在“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① 我们看到的是林一厂在他的工作日记转引，见该日记第五本，1944 年 2 月 10 日。林是梅县人，时任国民党党史会纂修。其工作日记原由其后人收藏，80 年代入藏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② 《客家研究导论》第二章“客家的源流”，第 41 页。

一书中有一段记述:孙中山幼年时反对母亲给姐妹缠足,孙母杨太夫人以客家人才不缠足为理由反驳儿子。这段记述的英文原文是:"'Behold the Hakkas!' declared the mother of Wen("文",即孙中山), 'No Hakka woma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本地人)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s Hakka woman or a Chinese woman?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①因为经过两重转述及译成英文,林百克所记未必与杨太夫人当时的原话完全相同,但她认为孙家并非客家人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杨太夫人是一位贤惠的旧式妇女,若她真的出嫁到一个客家人家庭,她决不会对儿子说一番自外于客家人的话为缠足辩护。

三、翠亨孙氏语言、婚姻、风俗状况

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书中,称孙中山会讲客家话,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提及。近年,又有些著述提出了翠亨孙氏操客语的证据。如:

(1)谢福健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中,记录薛岳将军一段答问:"(孙中山)与客籍同志讲客家话,与广东各地同志相聚讲白话(粤语),与别省同志及集会时通常讲普通话。"(该书 36 页)

(2)有人提出:"孙中山会讲客家话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讲客家话的。孙中山的胞姐妙茜说:'至父亲达成公,亦好风

① Paul Linebarger, Sun S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1925), p. 81.

水,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便是绝好的证明。'"①

(3)林嘉书先生在《鲜为人知的孙中山讲话录音》中谈到他在近年发现了孙中山《告诫同志》的讲话录音唱片,"他以带古中原音韵色彩的汉族客家人的发音腔调讲普通话。"②

关于第(1)点,薛岳将军的说法与罗香林先生"尚能客语"之说并无重大差别,并未能说明翠亨孙氏是否主要(或历代相传,在家庭中使用)讲客家话。

第(2)点称孙中山先生"是讲客家话的"。但这只是撰文者的主观判断,并没有任何依据。

本文拟对第(3)点谈些想法。孙中山《告诫同志》的演讲,应不属"鲜为人知",国内大多数纪念、研究孙中山的机构均有收藏,1986年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据上海宋庆龄故居收藏的声片还制成《孙中山先生演讲》录音带发行,其中包括《勉励国民》、《告诫同志》(以上为普通话),《救国方针》(广州话)三段演讲录音。我们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人员有好几位是客家籍的,大家反复听过这些录音,都认为并无明显的客家口音,孙中山把"世界"的"界"字说成"gai",有人认为这是客家音,但广东白话"界"亦读作"gai"。而他讲"详细来了解"一句时,几乎与广州话完全相同。因客家话与广州话均保留了不少中原古音,所以,孙中山普通话的录音恐不足以证明孙中山原来是讲客家话或讲广州白话的。

但孙中山《救国方针》广州话的演讲,则明白无疑是带有中山白话口音的广州话,并无任何客家口音。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孙中山早年在家乡讲的是中山(香山)本地白话而不是客家话。

---

① 潘汝瑶、李虹冉:《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1989年第1期,第28页。

② 参见北京《旅游》月刊,1991年第11期,第28页。

孙中山因少年时代即离家乡外出，他的口音或有可能变化。而孙中山胞姐妙茜，毕生几乎未离开过家乡，她所操的语言，应是翠亨孙氏本来的语言。据杨连逢先生说，祖母讲中山本地白话，从来没有听她讲过客家话。

孙眉之孙孙满先生（生于 1906 年）孙乾先生（生于 1908 年），幼年至少年时期先后曾依祖父（孙眉）、祖母（谭太夫人），同孙中山及孙老姑太、卢夫人常有接触。据他们说，孙家长幼在家中均说本地白话或广州话，他从未听过长辈在家中讲过客家话。①

因此，可以判定，翠亨孙氏在以前，讲的是香山本地白话而不是客家话。

笔者是客家人，对于客家人的风俗习惯是知道的。客家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很重视保持自己的语言。据笔者调查所知，时至今日，翠亨附近的客家人，在家庭中以及与客家人交往中，均讲客家话，我们见到的一些幼儿也是如此。如说翠亨孙氏是客家人，却在附近有大量客家人的环境中改说了本地白话，恐怕是不可能的，与客家人重视保持自己语言的习俗也是很不相符的。

再看翠亨孙氏的婚姻状况。孙中山父达成公妻杨氏，隔田村人；孙中山叔学成公妻程氏，南蓢人；观成公妻谭氏，孙中山长兄孙眉妻谭氏，崖口人；孙中山姐孙妙茜，嫁崖口村杨家；孙中山之妻卢夫人，则为外莹人。以上南蓢、崖口等均为纯讲香山本地白话的村庄，并无客家人。

在今天，不同民族通婚已相当普遍，无论讲白话还是讲客家话的，都是汉族人，通婚更不会有任何问题。众所周知，孙中山的后人就有与客家人通婚的。但在以往（特别是在百余年前）乡居的环

① 此系孙乾先生长公子孙必胜先生转告。

境中，土客通婚的情况是不多的。若翠亨孙氏为客家人，当与附近客家人通婚，但至今找不到翠亨孙氏与香山本地客家人通婚的任何记录，翠亨孙氏历代先妣也无附近客家大姓甘、古、何、贺、谢姓的人。附近客家村杨贺村有杨姓，但孙中山母亲是隔田村人。因此，从婚姻状况看，以往翠亨孙氏与一般客家人也是有不同的。

再看风俗习惯。翠亨附近讲客家话的人与讲白话的人，至少在清初时即已居住在同一个区域的不同村庄，风俗习惯互相影响，比如房屋的形状，饮食的习惯，在几十年前甚至百多年前已有相同的地方。有人以孙中山故居的厨房、水井与客家人居屋相似作为翠亨孙氏是客家人的证据，[①] 恐怕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在以往，中山（香山）客家人与本地人风俗有一重大不同，即妇女不缠足。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颠沛流离，须与各种严酷的环境作斗争，所以，历来有妇女不缠足的好传统。在香山的客家人，也始终保持这一优良传统。以往，当地说白话的贫穷人家的妇女，间或也有学客家人不缠足的，但却从来没有客家人沾上缠足的陋习。而翠亨孙氏的妇女，在清朝时是缠足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反映出翠亨孙氏与一般客家人的不同。

翠亨孙氏在风俗习惯上与一般客家人不同还反映在墓碑上。客家妇女在谱牒、墓碑一般称“孺人”，而现存翠亨孙氏祖墓先妣多称“安人”。十二世连昌公以前的各代，因为存在争议，兹不论。而连昌公以后各代的墓碑为：

显十二世祖考连昌孙公、妣陈氏安人同墓

显十三世祖考迥千孙公、妣谭氏安人同墓

① 据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于平先生见告。他认为，这不足成为有力证据，因为孙中山故居建筑参考了各种建筑的特点（包括外国建筑），并非典型的客家建筑。

显十四世祖考殿朝孙公、妣林氏安人同墓

十五世恒辉公原与叔殿侯公同墓，墓今不存。十六世祖敬贤公与妻黄太夫人分葬，黄太夫人墓依堪舆先生言未立碑。十七世祖达成公墓在翠亨中山纪念中学内，杨太夫人墓则在香港。

若翠亨孙氏真的是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其墓碑写法也是应当与客家人习惯写作“孺人”而不应写作“安人”的。

所以，综合翠亨孙氏语言、婚姻、风俗的情况，也很难作出孙家是客家人的结论。

四、翠亨附近客家村和讲本地白话居民分布的状况

中山(香山)是一个珠江三角洲沿海县份(现为市)，居民以讲本地白话的占多数。翠亨孙氏会不会原来是客家人，后来因为生活在完全讲白话的社区，所以语言、婚姻、习惯发生改变了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前不久，我们曾对翠亨附近的居民状况作了一些调查。

现将我们调查的情况简述如下：

目前，翠亨镇下辖4个管理区，即崖口管理区、翠亨管理区、石门管理区、下沙管理区。据1991年统计，全镇常住人口7280人。其中崖口管理区3255人，全都是讲本地白话；石门管理区1573人，基本上都是讲客家话；下沙管理区874人，以往是水上人家，讲当地称为“下沙话”的语言，属广州白话语系，音调近似于顺德话。翠亨管理区则既有讲本地白话的村庄，也有讲客家话的村庄。

翠亨管理区辖平顶、长沙埔、竹头园、翠亨四村。前三个村都是客家村，平顶村居民主要为古姓客家人，长沙埔村主要为廖、温、甘姓客家人，竹头园村主要为何姓客家人。翠亨村常住居民全部讲本地白话(现在有一位医生是客家人，但是外地来工作的)，以往

也没有讲客家话的人居住。①

翠亨管理区居民的语言、姓氏状况如下表：

村名	语言	主要姓氏	源流(县名按今日)
翠亨	中山白话	杨、陆	杨、陆两姓清康熙年间从崖口迁来
竹头园	客家话	何	何姓祖先于元朝时从五华县迁来
长沙埔	客家话	廖、温、甘	明初从紫金县迁来
平顶	客家话	古	明万历年间从五华县迁来

石门管理区所在地杨贺村离孙中山故居三公里，但最近的村庄不足一公里。这个管理区下属二十多条自然村，全为客家人。情况如下：

村名	语言	主要姓氏	源流(县名按今日)
杨贺	客家话	杨、贺	杨姓先世于清康熙年间从紫金迁来 贺姓于清雍正年间从下栅(今属珠海)迁来
兰溪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世于明崇祯年间从紫金大坪迁来
三家村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世于清道光十年从兰溪迁来
攸福隆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九年从龙舟地(今中山逸仙水库区)迁来
新村	客家话	甘	1956年从龙舟地、葫芦门、回察村迁来
金竹山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人于清乾隆年间从剑首村迁来
后门坑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人于清康熙年间从兰溪迁来

① 据中山市翠亨镇民政干部甘容甲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萧润君等先生提供材料。

续表

村名	语言	主要姓氏	源流（县名按今日）
书房坳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人于清康熙年间从兰溪村迁来
练屋	客家话	练	练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紫金迁来
张琶企	客家话	何	何姓先世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从竹头园村迁来
田心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人于明崇祯八年(1635)从紫金大坪迁来
龙田	客家话	甘	甘姓系1925年后从剑首迁来
大象埔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世于清嘉庆年间从邻村白石岗迁来
峨嵋	客家话	徐	徐姓先世于清乾隆年间从紫金九曲树村迁来
白石岗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梅县迁来
黄猄头	客家话	谢	谢姓先世于清乾隆年间从紫金麻竹坑迁来
张落坑	客家话	谢	谢姓先世于明顺治十七年(1660)从紫金麻竹坑迁来
木子埔	客家话	谢	谢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九年从邻村张落坑迁来
剑首	客家话	甘	甘姓先世约于乾隆十五年(1750)从紫金县迁来
刘屋排	客家话	刘、甘	甘姓先世于清道光年间从邻村兰溪迁来

另外，以前还有官坑（谢姓）、葵坑等村（姓氏不详），今已荒废。

目前，翠亨镇单独列入地名志的村庄共有28个（翠亨管理区4、石门管理区20、崖口管理区3、下沙1），其中23个是客家村。这些村的居民状况，在土客、姓氏方面，大多数从清中叶以后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①

翠亨镇西面的五桂山镇，基本上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

① 主要据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编撰委员会编：《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8～263页。并参考笔者对石门村客家人士甘桂明（67岁）、甘国雄（65岁，田心村人）、甘水连（73岁）、甘伟雄（56岁）等调查访问记录。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翠亨村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客家村，西边更是客家人的聚居地。翠亨村成了客家语小区中的中山本地白话方言岛，只有东北方向约3公里的崖口村才是与翠亨一样讲本地白话的村落。

与翠亨镇北接的南蓢镇，也是既有客家村，也有讲本地话的村庄。大抵是客家村在岐关公路以西以南，与五桂山镇、翠亨镇客家村相连，而岐关公路以东的临海村庄，则都不是客家村。“东莞说”认为孙中山先生曾住涌口村，一支迁左坡头村；“紫金说”认为连昌公曾居涌口门村，这三个村现均属南蓢镇，均在公路以东临海处，都不是客家村，据了解，以往也没有客家人居住。[①] 客家人从外地迁来，多聚居于近山之处，涌口、左坡头、涌口门都是沿海村庄，又是讲本地白话的人早已聚居之地，外来的客家人当不会居住于此。

据石门村的客家老人说，翠亨一带没有姓孙的客家人，他们也没有听说附近有过姓孙的客家人。

我们访问过的几位石门管理区的客家人，他们都清楚自己的祖先来自紫金，但何时迁来，从紫金哪条村迁来，他们不十分清楚。过去，甘姓也有族谱明确记载从紫金（永安）迁来。以前有人回过紫金祖籍祭祖，紫金原籍也有人下来续过家谱。翠亨附近的客家人，在家庭中和村中都讲客家话，但音调已与紫金原籍有异。当地客家人保持了客家人艰苦朴素、顽强刚毅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多为客家人居住的村落。中山的客家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特别惨重，在翠亨西南约一公里处抗战期间被日军残杀的民众的坟园，埋有死难者40余人均为客家人，他

① 据翠亨村孙中山故居萧润君先生的调查。我们还请教过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罗佩影女士（涌口村人，她的先生是客家人），她也证实这几个村都不是客家村。

们都是因不肯供出抗日游击活动情况而被日军活埋的。今天在广东省、中山市的政府部门和文化部门中担任负责职务的有不少中山客家人。

以往,中山客家人与讲本地白话的人虽无重大冲突,但也有些隔阂,讲本地话的人称客家人为"挨子佬",讲客家话的人则称本地人为"Xi－sa佬",并有调侃讲白话人的歌谣"Xi－sa佬,Xi－sa嬲,煮饭唔煮茶"。抗战前,石门客家人与崖口讲本地白话的人还发生过械斗,但同翠亨村人则从来相安无事。翠亨一带是客家人聚居之地,而且多数还是清初和清中叶来自紫金的客家人。但是,如果说翠亨孙氏上世也是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则有些情况无法解释:

第一,翠亨孙氏为何不与紫金同乡一起住在客家村,却先后居住于不讲客家话的村落涌口(或涌口门)、迳仔蓢、翠亨村?

第二,翠亨孙氏为何不与附近的客家人一样明确知道祖籍在紫金,反而接受"东莞"说?

第三,翠亨孙氏为何在客家人聚居的环境中改说了本地白话?

第四,翠亨孙氏为何在客家人聚居的环境中,改变了客家人不缠足的传统习惯?

第五,翠亨孙氏为何几代都不与附近祖籍紫金的客家人通婚,而与讲本地白话的家庭通婚?

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客家人士,他们有的说从未听说过孙中山是客家人,有的说听说过,但对其祖籍是东莞还是紫金不清楚。但所有的人都知道,翠亨村过去和现在都无客家人居住,翠亨孙氏的语言、婚姻、风俗与附近客家人不同。

关于客家人的定义,似乎还没有大家公认的比较严格的标准。因为客家人只是汉族中的一个民系,是靠语言、风俗等区别于汉族的其他支系。如果在语言、婚姻、风俗与典型的客家人明显不同,

恐怕就不能说是客家人了。而从现有的各种证据来看,说翠亨孙氏是客家人看来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翠亨孙氏与一般客家人的特点有很大差别。如果说翠亨孙氏本是客家人,后来才"本地化",这也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这里恰是客家人集中居住的小区,若原为客家人的家族,是不会"本地化"了的。

不过,对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似乎不必看得太重要,因为大家都承认孙中山是中国人,是中山人。至于其他一些微细的差别,只是学术研究中不大重要的课题,笔者在本文开头时已说过,无论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以及客家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参考书目

1.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印书馆 1945 年版。
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藏书房 1933 年初版。
3.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 1965 年出版。
4. 华东师大客家研究所编《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9 年版。
5. 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版。
6. 林一厂《林一厂日记》(未刊本),藏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7.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民智书局 1926 年版。
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9.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5 年版。

再论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
并答《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潘汝瑶

一、篡改孙中山祖籍不是“学术研讨”

去年冬我从经济系拿到一封写给我收但没有寄信署名的信，信中有两个文件：一是中山市故居纪念馆答复省文化厅和我的信（复印件），另一个是登载在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九〇年三期的丘捷同志的文章——《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前者是一封极力为篡改孙中山祖籍一事辩护，并且把责任推给上级的稍欠得体的信，我早已依理答复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想要表示一下意见的，就是丘捷同志的《再谈》。

我认为《再谈》是十分令人失望的，事情十分清楚，如果大家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那么，是非曲直是很容易弄清楚的，最怕的是不“赌直”，来一个打横来，那就很难说了。

不是吗？真的说成假的而又不能证明其假；假的说成真的而又不能证明其真。一个劲儿打横来，明明是欺骗，硬说不是欺骗，明明是商店帐簿硬说是公尝簿，说公尝簿有“千差万别”、“没有一

---

* 据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编《客家纵横》第2期，1993年版。本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涉及本馆名誉，但是，为客观反映不同观点，我们仍原文照录。本馆的一些意见和看法见本书“附录”。邱捷《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见本书第560～578页。

定格式”，殊不知帐簿和公尝簿有其本质和特征，是不能混淆的。明明是假证不能用，偏说可以用，总之，不管有理无理，对方之所是者非之，对方是所非者是之，还不许人指出其假，这就叫做反驳。如此的反驳作风，除了表明《再谈》无意于解决问题而只是一意想把水搅浑之外，还能表明什么呢？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一意想把水搅浑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不能说，我这篇文章是漫无目的闹着玩的吧？既然不是闹着玩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从《再谈》强调“学术研讨”，使用了许多这一类的字眼，如“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讨论孙中山家世源流这个学术问题时”、“对研讨这个学术问题的一些想法”、“作为一篇学术研讨的文章”等等的情况来看，《再谈》是想把发表《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和《再谈》这两篇文章的目的，转移为在于“学术研讨”，是十分显然的。但是，严酷的事实证明，《再谈》想挂“学术研讨”这块招牌，无论如何是挂不起来的。

《再谈》的目的，不是在于“学术研讨”

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的120周年，不知为什么（据说和某县企图扩大其旅游业有关），就在这一年，在广州掀起一场推翻紫金说的运动。指导这场运动的理论，就是《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这篇判决书性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推翻紫金说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看不出有那些是“学术研讨”的影子。

①召开宣判会式的座谈会，散发判决书性质的文章。1986年十月，某某县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召开，是推翻紫金说运动的第一次的重要行动，其所以说是重要行动，因为这个座谈会，并不是一般的座谈会，而是颇

为奇特的，大张旗鼓的宣判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而是在东莞的宣判会。在会上还散发了判决书。这个判决书，就是《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①] 这篇文章。为什么说这篇文章是判决书呢？因为随着这篇文章在会上散发之后，接着来的便是实行孙中山祖籍的篡改，把孙中山的紫金系统的世系，改为根本就不成系统的东莞系统的世系，从这个意义来说，前者是判决，后者是执行。所以说《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这篇文章是判决书，判决书和学术研讨的文章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决定性的、强制性的、指令性的、后面有执行跟着它的，但后者却没有这样的性质。如果是学术研讨的文章的话，决没有不经过研讨而马上由单方作出结论，并按照结论而立即付之实施之理。因此《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这篇文章，按其性质来说，是判决书性质的，把它说成是一篇学术研讨的文章，是说不过去的。

②召开宣判会性质的座谈会，是推翻紫金说的第一个行动，篡改孙中山祖籍是它的第二个行动。这个第二个行动是最关紧要的行动。没有这个行动，判决书是空的，座谈会的目的也是空的。但是，这个最关紧要的行动，却成了人们最惊奇最不理解的行动。这是“执行”错误呢？还是“判决”的错误？我以为都是十分值得反思的。现在我提出几个很不好理解的问题，乞赐明教。

首先令人想到的是：为什么要篡改孙中山的祖籍？目的在哪里？难道是为了学术研讨？

其次是：根据什么篡改孙中山的祖籍？目的在哪里？难道不知谁是父，谁是子，甚至儿子大于父母，死后还能生子多人的神奇怪诞的《孙氏家谱》也可作为孙中山的祖籍是在东莞的证据吗？这

①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一文，见本书第 439～463 页。

也是学术研讨吗?

第三是:不知你们篡改孙中山的祖籍是得到了谁的承认?紫金说之所以成为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定论,是因为它符合孙中山家世的客观实际,得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的承认,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得到了蒋介石以下的包括原来宣扬东莞说的吴稚晖在内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的承认。而你们的篡改呢?得到了孙中山家族的承认吗?得到了党中央或国务院的承认吗?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承认吗?这种做法,也是学术研讨吗?

第四是:不知谁给你们篡改孙中山祖籍的权利?一个普通公民的祖先,尚不容许他人随意篡改,而一个世界伟人的孙中山的祖先竟可任由你们几个人决定篡改吗?这也是学术研讨吗?

第五是:没有篡改孙中山祖籍的权利,而硬将之篡改,这对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来说,是严重失职问题,是违反国家文物工作法规的行为;对于孙中山先生研究所来说,是违反科学精神,歪曲历史事实,肆意践踏真理,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第六是: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和孙中山先生研究所,是广东孙中山的两个权威机关,它们的言和行对于外界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历来"馆"和"所",对于言行都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的,现在篡改孙中山祖籍的"行"和宣扬神奇怪诞的《孙氏家谱》的"言",似乎大有背于过去的优良传统,不知为什么要改变这个优良传统?

③封锁消息的自我广告。"广东孙中山研究会"出版的《通讯》(1987年第六期),报导了全国各地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集会活动,惟独不报导紫金县的这一纪念活动,漏掉了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对紫金县实行封消息的自我广告而已,但这种做法,和学术研讨又发生矛盾了。

④拒绝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1988年,我提出《看了〈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以后》一篇文章,请求某大学学报发表,遭到了拒绝,最初我很不平。但后来看到《通讯》不刊登紫金县的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时,始恍然大悟,原来事出有因,也无怪其然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做法,也是为了学术研讨吗?

从以上所说,可以知道,丘捷同志的两篇文章,决不是为了"学术研讨"而是为了篡改孙中山祖籍。

二、回答《回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结语"的三个问题》

《再谈》万余言,共分七个部份,但其重点是《回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结语"的三个问题》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关系到东莞说能不能成立的问题,所以谈到它的时候,必然会关涉到其他六个部分,因此,我不准备每个部分都回答,只回答作为重点的这一部分。

(甲)关于《再谈》对于"结语"中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我在《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的结语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提的:"我认为要反对掉紫金说,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必须找出一部象紫金族谱那样的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和《纪念簿》能两相吻合的,可以得人们信任的孙氏家谱,如果不能找出这样的家谱,只凭世代断续,传代关系不明而又漏缺处处的谱系去反对紫金说,那是不能收到效果的。"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容,所要回答的,只是两句话,即能或者不能,如果是能,那就把符合问题所要求的家谱拿出来,使对方哑口无言,答然若丧而

去,如果不能,就干脆认输。这样,不就一了百了,一场的是非曲直,从此了决了吗?然而《再谈》不能这样做,只是找出一些不可作为理由的甚至是过去提过的理由,为之辩护,这样的争论,一万年也将无了期,不知有何意义?

《再谈》辩护理由之非是

这次《再谈》为《孙氏家谱》辩护所提出的理由有三:1."家族谱牒有疏漏(疏漏和作伪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作者)是常见的事"、"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有世系井然,传代关系分明的家族谱"。2."世系井然,传代关系明确,并非判别家、族谱真伪的准则"、判别家、族谱真伪的准则是看它的"收藏者"和"收藏地"。3.《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其证明就是孙妙茜"留下"的,邓慕韩"抄写"过的,还有"《列祖先殁纪念簿》、契据、坟墓作佐证",我认为《再谈》提出这三个理由为《孙氏家谱》辩护,是欠缺考虑的。

①第1、2理由之非是

谁都知道,族谱是记载出自同一祖先的血缘亲族系统关系的谱牒,所以,凡是真族谱,必然是能正确反映血缘亲属系统关系,即传代关系的族谱,反之,不能正确反映血缘亲属关系的族谱,诸如儿子大于父母,阴魂可以生子之记载的族谱必然是伪谱。简言之,即符合一族传衍的客观实际的是真谱,不符合一族传衍的客观实际的是假谱。这应该是个常识,为什么还说"传代关系分明,并非判别家族谱真伪的准则"呢?由于族谱是反映一族的传衍客观实际的谱牒,所以,凡是不是这样的谱牒,就决不会有那一个血缘团体(族、姓)会将之保存。那么,所谓"常见之事",不知此事除《孙氏家谱》之外,还能不能举出其他例子?至于"收藏者"、"收藏地"这一准则,我认为是自我否定的准则。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准则来判别族谱的真伪,则所有东莞说的族谱,都将是伪谱,例如上沙乡的

《总理世系图》的收藏者为上沙乡的孙氏族人，其收藏地为上沙乡，并不是存于翠亨孙妙茜之手，这是伪谱；现在丘李两位同志提出的《孙氏家谱》，也不是存于翠亨孙妙茜之手，而是不知存于何人之手，然后又将之陈列于故居的家谱，这也是伪谱，我这样写，也许有人会大不以为然，但是否言之有理，且容我据实剖析而言之，证明《孙氏家谱是百分之百的伪谱》。

②第3理由之非是，《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是伪谱

《再谈》的作者说《孙氏家谱》抄成于1880年——1911年之间①，"本家谱从未全文发表过"②，"《孙氏家谱》为孙中山家谱，这是可以肯定的"③，"《孙氏家谱》过去由孙妙茜保存，她生前对此极为重视，每年必将《孙氏家谱》与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按时翻晒，孙妙茜去世后，由其后人杨连合、杨连逢献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④，"《孙氏家谱》从收藏者及其收藏地看来源可靠"，"本家谱记载了孙氏祖上系从东莞迁来"⑤。

以上的意思就是说，《孙氏家谱》是抄于1880——1911年之间，过去一直由孙妙茜每年翻晒保存，死后由其后人交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从来没有全文发表过的"可靠的"孙中山家谱，这也就是说，《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的真正的固有的可靠的载明孙中山先世是来自东莞的家谱，但是《孙氏家谱》果真是这样的家谱吗？绝对不是！下述一系列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和《再谈》所举的辩护理由，都表明《孙氏家谱》，绝不是孙中山家谱，在孙中山家中，

① 李伯新、丘捷、《孙中山家世源流若干资料》载《中山文史》总第4期。
② 李伯新、丘捷、《孙中山家世源流若干资料》载《中山文史》总第4期。
③ 丘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载中山大学报1986年4期。
④ 李伯新、丘捷、《孙中山家世源流若干资料》载《中山文史》总第4期。
⑤ 李伯新、丘捷、《孙中山家世源流若干资料》载《中山文史》总第4期。

决然不会有这样的家谱的存在,其理由如下:

(A)历史事实证明,《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

①为了"争认"孙中山是他们祖先的后代,东莞的上沙乡和员头山两支孙氏,打了一场官司,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争认"的官司呢?谁都知道,这是因为双方都拿不出真正的固有的(世代相传的)可靠的载明孙中山的先世是出自东莞的族谱(下简称真族谱)以资凭证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的真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官司呢?

②出自同一祖先,住在同一乡村的血缘团体,在同一时期,通例只有一种族谱,然而东莞说者所提出的有关孙中山世系的族谱(包括图表)在同一十年左右时间内,竟有七、八种之多,如再加上八十年代的"新作"在内的话,总在十种以上,这已经是惊人的了,然而还有更惊人的是,这些族谱,尽是世系凌乱,传代关系神秘莫测而又彼此互相矛盾的举世难见其例的族谱,这种奇异现象的产生,究竟为什么呢?谁也会明白,这是因为没有载明孙中山上世是出自东莞的真族谱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的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这许多孙中山研究工作者"去效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呢?

③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为了调查孙中山的家世源流,除派了许多国民党史官四出调查外,连他自己也不惜纡尊降贵,风尘仆仆地来往于翠亨、迳仔蓢和左步头之间,搜集有关资料,为什么邓氏如此不辞劳苦地去收集资料呢?此无他也,是因为找不到载明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东莞的真族谱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的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邓主任还要下去调查呢?为什么调查后,又写了一本《孙总理家谱》呢?

④据罗香林自言,他所以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是因为看到东

莞两支孙氏的“争认”之争和当时主张孙中山上世是来自东莞的各种谱牒所说之矛盾,觉得“国父世系实多未能即为明晰之点”①,罗香林于1933年,以工作的机缘,获读由孙妙茜出示之“国父家藏的孙氏《列祖生歿纪念簿》”②,他将此《纪念簿》与上沙乡和员头山两支孙氏因争讼所提出的谱牒“略加比次”,作了一篇《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一文,文中“首述一般关于国父家世源流凡所追忆之讹误(即对东莞说提出异议——作者),继根据美人林百克、孙逸仙传记所述孙氏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一事实。假定国父上世自广东江东之紫金迁出”③,从这一段罗氏对紫金产生过程的自述来看,罗氏紫金说的产生,是从三十年代对于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产生疑问而开始的。如果一定要说有载明孙中山上世是自东莞的真族谱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公之于世,使紫金说不能坐大呢?

⑤1942年春,罗香林以《国父家世源流考》手稿,亲自送交孙科审阅,这是判定紫金说和东莞说谁真谁假的关键时刻,邓慕韩深知这个时刻的重要,为此特写了一篇《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送交孙科查阅,照理,如果在孙中山家中,确有《孙氏家谱》的话,邓氏根本就不要写什么文章,只要提醒孙科,叫他把《孙氏家谱》拿出来,以证实紫金说之无稽便可,为什么邓氏不这样做呢?还要写文章去辩驳呢?

(B)论据虚假,证明《孙氏家谱》是伪谱

《再谈》为了证明《孙氏家谱》是孙中山的真家谱,提出了三个论据。第一是“《孙氏家谱》是孙中山胞姐孙妙茜老姑太留下的”(其他各语,在上面引用过,不重复)。第二是“邓慕韩三十年代公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引论》。
②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引论》。
③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引论》。

布这个家谱的内容时，已说明抄自翠亨孙中山故居，后来他还说抄写时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先生和国民党党史会的编纂王斧也在场”。第三是“又有《列祖生殁纪念簿》（下简称纪念簿）、契据、坟墓作佐证。”因此，“就不能因其记载上有一些问题便完全推翻”。我认为这些所谓论据均不能以此作为《孙氏家谱》是孙中山家谱的证明。

论据是用于证明论题的，正确性的充分理由，是证明的必要根据，能够做证明的根据的论据，最重要的是经过证实的事实和科学原理，但从《再谈》所提出的论据来看，它和作为论据的要求相距太远，想要把它作为证明《孙氏家谱》是孙中山的家谱的论据，显然没有可能，因为它们都不是事实。

就第一和第二两个论据而论，当读者看到这两个论据时，必然会想到，邓氏抄录《孙氏家谱》王斧和孙满在场（有一说又谓邓氏和王斧一起抄录，孙满在场）和孙妙茜每年翻晒《孙氏家谱》这两个动人场面，有何人亲眼看见过，有何物（如照片）可以为凭？如果提不出人证物证，那么，这些话都将是空的，又如果这些话不是空的，但它和已知事实相矛盾。又将如何解释？即邓慕韩到翠亨各处调查后，写了一本《孙总理家谱》，后来又写了一篇《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这些都是事实，如果邓氏确曾在翠亨孙氏发现过《孙氏家谱》并将之抄录过，那么，为什么不将之按原名原文抄录或拍照下来，公之于世，以表明东莞说完全正确；反而要不惮其烦地另编一本《孙总理家谱》呢？难道《孙总理家谱》的权威性，要比原有的《孙氏家谱》权威性大吗？这是一个矛盾。还有，他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是和《国父家世源流考》决定胜负的文章。如果他确曾在翠亨抄录过《孙氏家谱》。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一处看见有《孙氏家谱》的字样呢？这又是一个矛盾，由此看来，所谓邓氏抄录《孙

氏家谱》一事，实不免有虚构之嫌。与此情况相同，所谓《孙氏家谱》过去由孙妙茜保存一事，也是令人费解的，既然孙妙茜每年必将《孙氏家谱》与《纪念簿》一起翻晒，而且前者是老谱，后者是新谱，为什么孙妙茜如此喜新厌旧，每年翻晒之后，只将新谱（纪念簿）公之于世，陈列在纪念馆任人参观；而把老谱（孙氏家谱）却藏之于私，使它成为绝密文件；甚至在东莞说之生死关头（罗香林把《国父家世源流考》送给孙科审阅时），仍不让它和世人见面呢？更重要的是《孙氏家谱》和《纪念簿》的记载内容是完全对立的。《纪念簿》记载的连昌公是第一个祖先，是始祖，连昌公以下，是四代单传。在中山县居住，只有数代；而《孙氏家谱》记载的是，连昌公是瑞英公的儿子，不是什么始祖，而是世代居于中山县的东莞孙氏的后裔，连昌公本人就有弟兄八人，这表明他并非只身来中山的开基祖，连昌公以下也不是四世单传，十三世迥千公就有弟兄五人，像这样互相对立，彼此不相容的两种族谱，孙妙茜决无将之兼容并蓄之理，所以，所谓《孙氏家谱》是孙妙茜收藏一事，是不能取信于人的。既然孙妙茜没有收藏《孙氏家谱》的可能，那么，也决无死后由其后人收藏之理，所谓由其后人交出一事，实未免有点蹊跷。我以为收藏此谱必另有其人。此人必是与参与修补此谱之事有关的人。此谱原名为《孙总理家谱》，后来谭彼岸称之为翠亨《孙氏族谱》。这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改名，容易使人相信是翠亨孙氏老谱的缘故吧，现在丘李两同志又名之为翠亨（孙氏家谱）；在美国则称之为《孙氏谱系》；1984 年孙满将此谱加以修补，将单身的瑞英公，改为有妻梁氏的瑞英公之后，又改名为《家谱略记》，现在的《孙氏家谱》和前此的《孙氏族谱》不同，新加了一些材料，如“乐南公生下四子，长子桂廷，次子日昌，三子耕隐，四子容寓是也。”以及“七世祖耕隐公，生终年月无考……”这两条，都是前此《孙氏族谱》所没有

的，似此，则《孙氏家谱》为八十年代被人修改的家谱，八十年代被修改过的家谱，为什么能被生活在五十年代以前的孙妙茜所收藏呢？这似乎又近于神话了，那么，究竟收藏在谁的手里呢？我以为一定是收藏在修改家谱的人的手里，但若果如此，则以“收藏者”和“收藏地”的准则，来衡量其真伪性，《孙氏家谱》又当是假家谱了。

至于第三个论据，其不合理的情况，要比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据严重得多，《孙氏家谱》和《纪念簿》的存在，只能证明《孙氏家谱》是假谱而不能证明《孙氏家谱》是真谱。但是为什么《再谈》又把它作为《孙氏家谱》是真谱的佐征呢？他的用意，可能是这样的：《纪念簿》上，有连昌公和迴千公的名讳，而《孙氏家谱》也有连昌和迴千公的名讳，这表明两谱是互相衔接的，从而证明《孙氏家谱》是真家谱，但是《再谈》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把连昌作为瑞英儿子这一点，有了这一点，不但把《纪念簿》和《孙氏家谱》是不相衔接的两谱的真相暴露出来了，而且也把《孙氏家谱》的伪假面目，暴露得一清二楚了，瑞英公果然能作连昌公的父亲吗？我们不需要找其他什么证明，只要根据《孙氏家谱》本身的记载来分析一下，便可断定瑞英公决然不是连昌公的父亲，第一，根据《孙氏家谱》，包括瑞英公在内的十一世祖共八人，在这八人中，没有一个被叙明他生了何人，何人为他所生，究竟根据什么能说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第二，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是康熙时代的人，康熙先于乾隆，为什么在后的乾隆时代的人能作在前的康熙时代的人的父亲？第三，根据《孙氏家谱》记载，十二世连昌公这一代各祖的年龄，除一人外，其他都大于十一世瑞英公这一代各妣的年龄或者只略小几岁，似此则十一世祖和十二世祖根本无传代关系，无传代关系的两个世系，如何能说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第四，瑞英公是单身汉，单身汉如何能生连昌公为儿子？把明明绝不可能之事，

硬说成是确有其事;明明是两相对立的族谱,硬说成是两相衔接的族谱,明明是没有父子关系的人硬说成是有父子关系的人。这样的做法,就关系到讲不讲学术,讲不讲道德的问题了,作为一个研究孙中山的工作者,对于这样蛮不讲理的事,还是以少宣传为好。关于"坟墓、契约可佐证"的问题,我以前已答复过[①],这里就不说了。

(C)《孙氏家谱》是彻头彻尾的假谱

上面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了《孙氏家谱》不是孙中山家谱的问题,但都是从回答的角度,理论的角度来论证的,并不是从《孙氏家谱》本身,作具体的分析来论证的,我以为现在应该是从《孙氏家谱》本身,作具体的分析和将之揭露的时候了。《孙氏家谱》的真面目一经揭露,不但它不是孙中山家谱一事可以大白于天下,而且迄今为止的对于被散布的孙中山祖籍的疑云也可以一扫而空了。

①两说争论的起因及其经过

所谓东莞说和紫金说之争,争什么呢?争孙中山的祖籍所在地。为什么会有祖籍地之争呢?中山县出了不少名人,如王云五、吴铁诚、唐绍仪都是名扬中外的人物,为什么他们没有祖籍问题的发生而惟独孙中山有祖籍问题的发生呢?这是因为孙中山家族到他这一代止,在翠亨村只住了五代,连居住在涌口门村的一起计算,在中山县也只住了七代,他们在中山县没有祖祠,祖祠在外县,他们是外来者,语言习俗有异,如果孙中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些情况,恐怕也不会有人注意,偏生孙中山是个世界伟人,因而这些情况,便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了,于是便产生了孙中山的祖籍在

① 潘汝瑶、李虹冉《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载《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1989年1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处的问题，最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东莞说，东莞说者认为是在东莞，随后回答是紫金说。紫金说者认为是在紫金。不管东莞说也好，紫金说也好，既然是这样的主张，那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最重要的证据，便是族谱，紫金说提出的族谱，是紫金孙氏族谱和孙中山家藏的《纪念簿》。在紫金孙氏族谱中，有琏昌公名讳及其外迁的记载，在《纪念簿》中，则有连昌公名讳并且是第一位祖先的记载，琏、连两人虽有无偏旁不同，但发音相同，可能就是同一人。因此，以此为线索，查对其世次和年代，发现其世次和年代相同，再查核其传代代数，亦几乎相同（从紫金的始祖到孙中山止，传至十八世，而紫金孙氏，亦传至十八九世）。再查核其传代差，亦符合代差规律（从紫金的始祖起至连昌公生年止，约经二百六七十年，历十一代，平均代差为二十余年），在这些查对和考核的基础上，再追究其迁徙原因，从各种的史、志得悉，在康熙年间，广东实行复界。由于迁复居民疏稀，地多荒旷之故，招民垦殖。广东东部各县农民，多因此而往中山县垦殖之事。由此而推测连昌公亦必是在这种背景下，迁往中山县的。根据这种种的情况，断定琏、连实为同一人，连昌公是从紫金迁去的，但是这种断定，从逻辑角度来说，是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而这种（归纳推理有多种方法）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还是或然性的。要把或然性结论变为必然性的结论，就必须经过演绎推理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因为紫金县是客语地区，可以使用假言推理的方法。即：

如果是客家人后裔，说客家话的，那他的上世是从紫金迁去的。

现在孙中山是客家人后裔，说客家话的；

所以孙中山上世是从紫金迁去的。

这种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是可靠的，但真理最终的

检验还是社会实践，这种场合的社会实践，就是要认真调查孙中山家族是否客家人的后裔，是否说客家话的，最重要的是要得孙中山家人的承认，如果孙中山家人不承认他们是客家人后裔，不是说客家话的，那么，上面的演绎推理，就是犯了前提不真实的逻辑错误，结论归于无效，但是社会实践证明：孙中山家族是来自紫金的结论，完全正确，当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交给孙科审阅时，孙科完全承认了他们的祖籍是在紫金，并盛赞该著“阐发详确”。随后该著又得到了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蒋介石、邹鲁、吴铁城、陈立夫等人的承认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从此，罗氏的紫金说，遂由假说而成为定论，成为事实——符合客观实际的知识。

说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即罗氏紫金说之成为定论，《再谈》作者大不以为然。他说：“他那并不正确的学术观点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①。但是，这个“学术范围以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后来，他补充说：“那就是：昔日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的表态，阻止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使证据不足的紫金说得以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就是说紫金说之所以“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是因为“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向它表态的缘故，我以为《再谈》作者这样的解答，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有人反问道：“东莞说是先于紫金说提出的，为什么“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不向东莞说表态而向紫金说表态呢？难道又可以用“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这句话来回答吗？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东莞说的情况。关于东莞说方面，情况与紫金说不同，照理，既然提出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东莞的观点，那

①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18页。

么，就应该拿出一本传代关系分明，能说明连昌公确是来自东莞的族谱，然而尽管东莞说声势浩大地宣扬了十余年，而且有众多的谱牒，但终未见有能说明连昌公确是来自东莞的族谱的提出，没有这样的族谱的提出，那就意味着东莞说没有“真凭实据”，[①] 来进行争论，没有“真凭实据”的争论，是无谓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就应该于孙科向紫金说表态之后，就一直停止下去，但事有出人意表之外者，两说之争二十余年之后，于六十年代，谭彼岸以翠亨《孙氏族谱》为依据，重新向紫金说提出挑战；八十年代，以美籍华人孙甄陶为首和在台的祝秀侠孙满两人，各以“无真凭实据”为依据，或以《孙氏谱系》或以《家谱略记》为依据，重新向紫金说提出挑战，此后不久，在广州则由丘捷、李伯新两位同志，以翠亨《孙氏家谱》为依据重新向紫金说提出挑战，总之在八十年代，台湾和广州，都先后地刮起一阵反紫金说风或者说掀起一场反紫金说运动。他们都是以《孙氏家谱》为依据的(尽管名称有所不同)。《孙氏家谱》是个假谱，上面已经论证过很多了，现在再将其本身具体的分析一下，使我们对于它的伪假面目，有更深切的了解。同时还可以使我们知道这次东莞说向紫金说的挑战，是毫无根据的，是别有用心的挑战。

②《孙氏家谱》的真相

将《孙氏家谱》本身作了具体分析之后的结论是：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谱。根据《孙氏家谱》所载的世系计算，从由东莞迁往作为中山县涌口门村的开基始的五世祖礼赞公起到十四世祖植尚公止。共十代，在这个十代中，没有一代是真实的，没有问题的，这

① 孙甄陶说：“我今于此纵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足以推翻罗教授说国父先生世非系出东莞孙。族——之说”见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一文，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

样的族谱也说可以作为孙中山的上世来自东莞的证据，实在未免太玄了，现从五世祖礼赞公说起吧。

五世祖。五世祖礼赞公有三个问题：1. 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列礼赞公为五世祖，但胡去非的《总理事略》则列礼赞公为三世祖。礼赞公之世次不明，此其一；2. 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载明礼赞公居上沙乡，无迁往中山之记载，但《孙氏家谱》则谓礼赞公是由东莞迁往涌口村的开基祖，礼赞有无迁居一事不明，此其二；3. 《孙氏家谱》载明礼赞公是由东莞迁往涌口村的开基祖，但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则载明六世祖缔宗是迁往涌口村之开基祖。礼赞公是否为迁居中山涌口的始祖一事不明，此其三。有此三不明问题之人，如何能断定他就是孙中山在中山县的始祖？

六世祖。六世祖乐南公亦有三个问题：1. 是否确有其人不明。根据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和左坡头的《孙氏族谱世系图》，没有乐南公这个名字，现在《孙氏家谱》则载明乐南就是缔宗，但缔宗是上沙乡《总理世系图》中的虚拟的名讳，实际并无其人，如乐南就是缔宗的话，则乐南是虚拟名讳的祖宗——缔宗的别名，也是虚拟的名讳。实际上并无其人，此其一；2. 谁长谁幼不明。胡去非的《总理事略》记载："礼赞公生两子，长缔宗号乐千，次缔儿号乐南"。但上沙乡的《总理世系图》则载明礼赞公生两子，长子缔儿，次子缔宗，究竟谁长谁幼不明，且"缔"、"禘"字体有别，是否为同一人不明，此其二；3. 谁居涌口，谁居左坡头不明。胡去非的《总理事略》谓"乐南公分居左坡头"，乐千居涌口，而邓慕韩致西南执行部函，则谓"长子乐千居左坡头，次子乐南居涌口，两人所说完全相反，究竟居住何地不明，此其三。有此三不明之人，如何能断定他就是孙中山的祖先？

七世祖。七世祖容窝公也有三个问题。1. 死后生子和八世

祖无传代关系，七世祖四人，生终年月无考者二人，有生年可考一人（即容窝公），有卒年可考者一人，现以容窝公为例，七世祖容窝公生于1515年，八世祖怀堂公生终年无考，但其妻则生于1641年，中间相隔126年，假定怀堂公与其妻同年，则容窝公126岁才生怀堂公，容窝公妻死于1562年，怀堂公妻生于1641年，中间相隔79年，是怀堂公（假定与其妻同年）为其母死后79年之所生，此种死后生子的怪事，说明七世祖和八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一。2. 七世祖四人，没有被说明他们生了何人，不知根据什么，就知道容窝公是孙中山的七世祖？此其二；3. 既已指定容窝公为孙中山的七世祖，为什么丘捷同志又把他改为耕隐公？孙中山的祖先，可以任人指派的吗？此其三。

八世祖。八世祖怀堂公，有两个问题。1. 他是阴魂所生之子。八世祖只有一人，就是怀堂公，他是其母死后79年所生之子。因此，可以说是阴魂所生之子，既是阴魂所生之子，何以能确定他就是孙中山的八世祖？他就是七世祖容窝公之子？此其一；2. 父小于子，和九世祖无传代关系，八世祖怀堂公生终年无考，假定与其妻同一年生，则为生于1641年，九世祖四人，除一人生年月无考外，其他三人生年，分别为1608、1616、1624年，按这些生年计，其岁数都比八世祖大，大于八世祖17－33岁，父小于子，表明八世祖和九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二。

九世祖。九世祖的问题有一。即和八世祖一样，父小于子和十世祖无传代关系。九世祖四人，除一人终年月无考外，其余三人的生年，分别为1608、1616、1624年。十世祖亦四人，除一人生终年月无考外，其余三人的生年，分别为1576、1576、1582年，按生年计算，十世祖大于九世祖的年龄26－48岁，即是父小于子，则九世祖和十世祖自无传代关系可言。此外，还有个特点，即九世祖四

人，丘捷同志以“尚未能查明谁为孙中山的祖先”为理由，没有指派谁人为孙中山的九世祖。

十世祖。十世祖的问题有一，就是死后还能生子多人和十一世祖无传代关系，十世祖四人，最后死的是在1648年；十一世祖八人最先生的是在1652年，这就是说，十世祖都死去了之后，才见有第十一世祖的出生，死后生子表明十世祖和十一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外，也和九世祖一样，在十世祖八人中，没有被指派谁人为孙中山的十世祖。

十一世祖。十一世祖瑞英公问题有五。1. 十一世祖是阴魂所生的世系，是假世系，像上面说过的那样，十一世祖是十世祖统统死去之后才出生的，如果要把他们和十世祖联系起来的话，那只能说，他们是十世祖阴魂所生之子，是十世祖阴魂所生的世系，阴魂所生的世系，就是不知何所自来的假世系，此其一。2. 说瑞英公是孙中山的十一世祖是纯属捏造，上面说过，九、十两世，不知何人为孙中山的祖先，而且这两个世系又是无传代关系的世系，它们和十一世，也没有传代关系，十一世是十世祖阴魂所生的世系是假世系，在这个假世系中的瑞英公，根本就不知何处飘来的人物，把这个不知何处飘来的人物，硬指他是孙中山的第十一世祖，此非捏造为何？此其二。3. 指瑞英公为连昌公之父，时代颠倒，瑞英公为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为康熙时代的人，时代在后的人，竟成了时代在前的人的父亲。如此时代颠倒的父子关系，历史上有谁曾见？4. 十一世祖八人，都没有被说明他们生了何人，根据什么说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此其四。5. 子大于妣，和十二世无传代关系。十二世祖八人，其中有生年可考者五人；十一世妣九人，有生年可考者六人。照理为母的年龄应大于为子的年龄，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十二世祖五人中，除一人外，其他四人的年龄，统统

大于十一世妣的年龄或只略小数岁。子大于妣，说明十一世祖和十二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五。

十二世祖。十二世祖连昌公，问题有二。1. 指派连昌公为瑞英公的儿子，是捏造历史的也是不道德的。东莞说者为了要把十二世祖连昌公纳入东莞孙氏系统之中，就必须以家谱的形式给他安上一个父亲，以此表明连昌公不是由紫金迁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东莞孙氏的后裔。但是，找谁来当连昌公的父亲呢？恰好迳仔蔺孙氏的始祖为十一世，世次相衔接，因而就把十一世祖瑞英公作为十二世祖连昌公的父亲。殊不知这么一来，创谱者却犯下了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因为只注意世次的衔接，而忽略了年代的衔接，把乾隆时代的人，作为康熙时代的人的父亲，无论谁看到了都会看出这是《孙氏家谱》的大破绽，而且强迫连昌公“谓他人父”是捏造历史不道德的行为，应该不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之所当为，此其一。2. 十二世是为指派连昌公为瑞英公之子而设的假世系，它和十三世祖无传代关系。东莞说者为了要打乱《紫金孙氏族谱》和《纪念簿》的世系，以表明连昌公不是来自紫金而是东莞孙氏的后裔，创造了两个假世系，一个十二世的世系，因为按照《紫金孙氏族谱》的记载，连昌公弟兄三人，为了要打乱这样的记载，《孙氏家谱》的十二世祖包括连昌公在内的弟兄八人；按照《纪念簿》的记载，连昌公以下四代单传，为了要打乱这一记载，《孙氏家谱》的十三世祖包括迥千公在内有弟兄五人。可惜的是，伪造这两个世系的手法，终于不能不露馅。到了十四世祖殿朝公，十五世祖恒辉公，又恢复了单传，那些十二世、十三世众多的祖宗的子孙到那里去了呢？难道都绝了代？由此可知，十二世是为了指派连昌公为瑞英公之子而设的假世系和十三世祖无传代关系，此其二。

十三世祖。十三世祖迥千公问题有一。就是这个世系也是假

世系，而十四世祖植尚公又是世次未定之人，所以它和十四世祖无传代关系。

十四世祖。十四世祖植尚公问题有一。1. 即植尚公是一个世次未定之人(根据孙满说是十世祖)。把世次未定之人安放在这一世次上，这表明《孙氏家谱》的世系记载，并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任意安排的，从而是不可信的。

根据以上对十个世系的分析，可以知道，《孙氏家谱》是怎样杂乱无稽，荒唐怪诞的假谱。在十个世系中，只有两代有传代记录，但这个传代记录又是不可靠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传代关系，因为六世祖禘宗是否有其人尚不能证实。至于其他世系，从《孙氏家谱》的记载来看，不但无传代记录，而且都是各自独立的世系，它们之间没有一代是有传代关系的。计其中：死后生子者两代，父小于子者两代，妣小于子者一代，为把连昌公纳入东莞系统而特设的世系两代(十二、十三世)。本人世次不明而暂设的世系一代。如果再加入头两代，那么，十个世系，都是各自独立的彼此无传代关系的世系。这样的各自独立的彼此无传代关系的族谱，也算是真族谱吗？由于《孙氏家谱》是假谱，所以也出现了许多神奇的怪现象。如祖宗可以摆上摆下，礼赞公可以为五世祖又可为三世祖，瑞英公可以为七世祖又可为十一世祖；植尚公可为十世祖又可为十四世祖。祖宗也可以除名和替补，如容窝公可除名、改补为耕隐公；八世祖有人将之除名而有人将之补上，迁往涌口门村做始祖的，可以有几个人；祖宗也可以无中生有，真是千奇百怪，纷现叠呈。然而对于如此虚假的家谱，竟有人为之捧场吹嘘甚至为之

修改和作世系表，下列一表[①]，便是其中之一。

世次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
名讳	礼赞	乐南	耕隐	怀堂	？	？	瑞英	连昌	迥千	殿朝	……

此表实在制作得太神奇了。不知从世系各自独立彼此没有传代关系的家谱中，用何智慧，竟能辨别出礼赞公乐南公、耕隐公等便是孙中山的直系祖先！更不知用何种智慧，竟能知道瑞英公便是连昌公的父亲！太玄妙了！

《孙氏家谱》的虚假性，还可从传代的代差方面查察出来，从生于1462年的六世祖乐南公起到1774年迁居迳仔蔴的十一世祖瑞英公止，经六代历时305年，平均代差为50.8年，又从十一世祖瑞英公起到生于1813年的孙中山的父亲达成公（十七世祖）止，历时39年，平均代差为5.5年，即使假定瑞英公四十三岁迁迳仔蔴，其平均代差也只有十一年[②]，这两起平均代表数字，都大大违反了传代的平均代差规律，即此一端，便可看出《孙氏家谱》及其图表的真实性程度了。

以上是《孙氏家谱》的虚假全貌，“谓予不信”。请予复查。

最后，我有几句话作为本段的结束语：考史求真，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严守的信条；考史求假，考史作假，不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之所当为，然而今日竟有人为之矣。悲夫！

（乙）关于《再谈》对于“结语”中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我在“结语”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东莞孙氏是属于

①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21页，因篇幅关系此表有删节。

② 这些代差材料，来自杨曾前同志的《孙中山祖籍考证》手稿，紫金博物馆藏。

广州语系的，如果孙中山是出自东莞，为什么到了翠亨，忽然变为客家语系的人了？（即客家人之意）

对于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简单的，即“不是”或者“是”。但《再谈》的回答却不是这样，一方面说“不是”，但同时又说“是”，令人看起来觉得很矛盾，不知究竟是也不是。《再谈》说，“所谓客家语系的人，并非事实”，理由是：1. 孙中山的“普通话略带广州话口音……但都没有客家口音”；2. 孙老姑太是讲白话的……翠亨村的人也全是讲本地白话。这就是说孙中山不是客家人，不是客家语系的人，但同时《再谈》又说：“罗香林先生认为孙中山本来属于客家语系，但他又说至孙父达成时已是本地化了……孙公父子，尚能客语”。从这些语句看来，分明是说孙中山是尚能客语但已经本地化了的客家人。但须知本地化的客家人也还是客家人。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用出生地主义和血统主义两个原则来辨别，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即孙中山上世定居于中山县，他本人出生于中山县是中山县人，但从其血统来看他是客家人，是客家血统，合而言之。则孙中山是中山县的客家人。这就好像“外籍华人”这个词一样，这个词中所说的“华人”不但是本地化了而且连国籍也是外国籍的“华人”。但尽管如此，“华人”还是“华人”。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是从国籍来说是外国人，从血统来说是“华人”，所以说“外籍华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是菲籍中国人。至于那些被当地本地化但没有加入外籍的中国人，那就连“外籍”两字也用不上了。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孙中山本人和他的家属，不承认他们是客家人，那又当作别论了，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孙中山祖孙三代，都承认他们是客家人，特别是孙中山儿媳陈淑美为了“恐口无凭”特

亲笔书写“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① 的证词,在这个铁证面前,应该是无话可说的了。然而,竟还有人说三道四,硬说孙中山不是客家人,还说陈淑美的证词不可信,要庄政之言才可信。② 如此丧良灭性之语,不知如何能说得出来?有人说,此事毫不足怪,患了红眼症的人是够胆这样干的——其然乎?岂其然乎?!

(丙)关于《再谈》对于“结语”中的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在“结语”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孙中山的祖先是否来自紫金,最有发言权的是孙科,孙科及其家属既已在口头上、书面上、行动上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出自紫金,你们要能够使他们取消这些“表态”。对于这个问题,《再谈》是怎样回答的呢?它说:“我们当然不能使孙科先生及其家属取消表态。同样,任何人也无法取消孙老姑太及德彰公(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先生只认东莞为祖籍的事实,在祖籍问题上,他们同样‘最有发言权’。”这就是说,孙中山——这里提到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曾亲口对孙科说过:“老家原住东江永安县”③。他也曾对林百克说过,家庙在东江公馆村,所以孙科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表态,实际上是出之于孙中山的表态——祖孙三代之言不可信,只有孙满之言才可信。《再谈》这样的答法,是殊欠妥当的。其不妥之处有五:1. 回答自相矛盾,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明明承认孙中山是“尚能客语”但已经本地化了的客家人。这就无异于承认孙中山的祖居是在紫金。但在这里又不承认他是客家人,说他的祖籍是在东莞而不是紫金,这是一个矛盾。2. 说孙妙茜承认祖籍在东莞一事与事实相矛盾。孙妙茜

① 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简述》台北市狮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② 丘捷《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见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业》1987年第5集。

③ 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众述》81页,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担任故居管理委员时，从未见有人见她出示过《孙氏家谱》。对于这一矛盾，不知将作何解释？3. 以孙乾曾以做官的身份去过东莞，便以为这是孙乾承认祖籍在东莞的表态，这是否合理，似尚可考虑。4. 误解“发言权”，我所说的发言权，不是指会议上的发言权，而是指对于某一事物了解不了解的发言权。前者是凡是得以参加会议的正式成员，都有资格发言的发言权；后者是一个人对于某一事物很了解、发言能反映出它的真实情况，那就可以发言，这就叫做有了发言权。如果对某一事物不了解，发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甚至是一片胡言乱语，那就不要发言，这就叫做没有发言权。前者是一种规定，有强制性；后者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没有强制性的。由于《再谈》误以为我说的发言权是前者，所以以为凡是达成公以下各家家属都有发言权，因而引出孙满的表态以抵销孙中山祖孙三代的表态，这是完全错误的。须知我说的发言权是指后者来说的，按照后者的涵义而言，孙满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因为他对于翠亨孙氏的家族历史，根本就一无所知，甚至是伪造家史，何以说孙满对于翠亨孙氏家族历史一无所知甚至是伪造家史呢？现在我只举两个例子，便可明白其中的一切了。

例一：1981 年由旅美侨选的台湾立法委员潘朝英约请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孙满、祝秀侠等人，“茶叙”于国宾大饭店二楼，“茶叙”间，“季老瞩孙满取出家藏孙氏族谱残本说明一切”[①]（请注意，在这次“茶叙”中，黄季陆迄无表态，但后来为谢福健所著《国父家世源流汇述》题写书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黄季陆心中，谁真谁假是十分了然的——作者）茶叙后，由祝秀侠和候中一记录，

① 祝秀侠《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辨证问题》、《传记文学》第 41 卷 4 期。

孙满口述,孙满的口述有如下的二段:“我家妙茜老姑太所藏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中所记载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以至先高祖敬贤公各名讳,生卒年月均一一载明”。妙茜老姑太……所藏该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用墨笔写于大红纸上,我曾抄录一副本,为我家唯一的家传信史”①。孙满把他所看到的《列祖生殁纪念簿》说得活灵活现,但是《列祖生殁纪念簿》果真是这样的纪念簿吗?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为什么丘捷同志还要着力说《纪念簿》之所以没有瑞英公的名字,是因为《纪念簿》只记录“列祖的生卒时间,并无其它内容。”瑞英公因“生终年月无考”,所以没有把他记上的缘故。这不是有矛盾吗?又如果是真的话,故居纪念馆的《纪念簿》,岂不是要用大红纸来改写以恢复原来的真面目?又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在它上面所记的十世祖植尚公,在《孙氏家谱》中变为十四世祖了?看来,孙满根本就没有看过《列祖生殁纪念簿》,不过是信口胡诌而已,把信口胡诌的语言,当为圭臬,这是轻信呢?还是别有用心?例二:孙满从他的祖父孙眉(年病逝于澳门于 1915)遗下的历时 69 年没有开启过,即:孙眉去世后其子孙昌没有开启过,其孙孙乾孙满也没有开启过,澳门沦陷时也没有开启或被开启过,后来运往台湾,在台湾也没有开启过,一直到 1984 年,不知在什么启示下,才由孙满将之开启的衣箱中,发现了一本《家谱略记》的影印本。在这个《略记》中又发现了对《孙氏家谱》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则记载,那就是把单身汉的瑞英公变成为有“妣梁氏,生连昌,系其第三子”的瑞英公!真是妙作!但这个妙作是不能取得人们相信的。首先《家谱略记》是影印本,有影印本就必然有原抄本,

① 祝秀侠《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辨证问题》、《传记文学》第 41 卷 4 期。

但这个原抄本在那里？孙妙茜从来没有提到过，邓慕韩在故居“抄写”《孙氏家谱》时，也没有发现过，到底它在那里？没有它，能说明《略记》是真的吗？其次，据丘捷同志说，《孙氏家谱》抄成于1800－1911年之间，那么，这本《略记》应该是《孙氏家谱》的略记，是《孙氏家谱的略记，则其关于祖先的记载内容就应该一致，为什么《略记》和《孙氏家谱》关于瑞英公的记载却如此不同？把单身汉的瑞英公，变为有妻有子的瑞英公，这究竟是“略记”呢还是“补记”？再其次，为什么孙眉的衣箱要待69年之后才开启？这三个问题不能不令人想到所谓《家谱略记》只不过是有计划的为堵塞《孙氏家谱》的大漏洞而作的假谱而已，制造假家谱的人，歪曲家族历史的人，对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也有发言权吗？他的发言也可信以为真吗？还必须指出把孙满和孙中山、孙科等同看法，这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谎谬的。5. 以否认孙中山祖孙三代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表态为新武器，我觉得近来东莞说者反击紫金说的武器，除了误译论、巧合论、“乾隆”两字误载论的老武器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否定孙中山祖孙三代表态的新武器，例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说：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不要“根据某人怎样说来作为历史结论，正如孙中山曾宣誓，他1870年出生在檀香山而我们却不这样认为一样”①。这就是说，孙中山也说过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所以他说的话也不一定可信。丘捷同志说：“翠亨孙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孙社正老人也十分肯定”，这就是说，孙中山和孙科所说的他们在中山无祖祠的话为不可信，丘捷同志又说：“任何人也无法取消……孙满……只承认东莞为祖籍的事实”，这就是说，孙中山祖孙三代承认祖籍在紫金的一切表态都不可信，只有孙满之言为可

① 1990年4月8日孙中山故复省文化厅信。

信,更露骨的是某系主任在宴会公开场合说:“孙科是 XX,其言不可信。”我以为作为一个系主任说这样的话是令人震惊的,孙科以不“谓他人父”而名之曰 XX,那么,不是 XX 的人,是否就可“谓他人父”呢?

一方面说是研究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但一方面又把孙中山祖孙三代对祖籍的言行表态一律排除在外,认为他们之言不可信,只有孙社正老人之言为可信,孙满之言为可信,某主任之言为可信,作过“深入细致调查”的某君之言为可信,凭他们的'可信'语言,便宣布紫金说被打倒了,“不能成立”了,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有这样的赌博赖帐式的研究方法吗?

三、是意气之争不是两说之争

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东莞说和紫金说两说之争是观点之争,但我以为在三十年代和四十代年初是两说观点之争,但自从紫金说成为定论之后,就不能说是两说观点之争,而是意气之争或因某种目的而故意引起之争了,其理由如下:

科学的研究是从对于某一现象、过程产生疑问开始的,有了疑问,便会产生试图加以解答的初步假定或者说初步答案,但这种初步假定,是还没有被充分研究,他的根据何在也没有被说明的一种推测,因此,必须把它理论化,把它提高成为一种能充分解答疑问的理论,但这时候的理论,由于还没有经过证明,所以称之为假说,假说一经证明,便成为定论,便成为事实,事实是客观真理性的东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必须接受它,但假说如果经不起检验,得不到证明,那就会被推翻。

假说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1. 必须从事实和科

学知识出发，没有事实和科学知识作依据，假说就不能成立，这就好像以雨师风伯为依据不能成立下雨的假说一样。2. 假说还必须对自己所要研究的疑问，能作出完满的解答，如果对于自己所要研究的疑问不能作出完满的解答，那就表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因而就要被推翻。由此可知，一个假说能不能成为定论，首先就要看它具备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以为紫金说之所以成为定论是由孙科的表态，而产生孙科之言不可信论。其实这是错误的，孙科之所以向紫金说表态是因为紫金说是建立于事实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它能正确反映孙中山家世的客观实际（即能完满解答孙中山祖籍在何处的疑问）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孙科决不会贸然向它表态，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如果他不是客家人，他怎么会承认紫金的客家人为他的祖先呢？难道他不承认祖宗是客家人，他就不能生存下去吗？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但是现在仍有人否认这个道理。我看这是殊可不必的。因为由假说而成为定论并不是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由逻辑推理和社会实践来决定的，孙科的表态所起的作用只是社会实践证明的作用，并不是对于两说的取舍作用，这一点必须分别清楚的。

孙科所以不向东莞说表态是因为东莞说完全不符合他的家世实际的缘故，例如孙科和孙中山都说他们在中山县无祖祠，而东莞说却说迳仔蓢的瑞英公祠是他们的祖祠；孙科说紫金族谱上的琏昌就是《纪念簿》上的连昌，是他们的祖先，但东莞说却说琏、连不是同一人是巧合，像这样和他的家世的实际完全相反的东莞说，叫他如何能作出肯定的表态？东莞说之所以会作出与孙中山家世实际完全相反的结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建立不是以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而是以虚构为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做法，不但

建立东莞假说是这样，连反驳紫金说和为《孙氏家谱》作辩护也是这样。都是以虚构为依据来进行的。现在先看看东莞假说的建立，建立东莞假说最重要的事实依据就是真实的族谱，有了真实的族谱，才能有根有据地根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从而知道他的祖籍所在地，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然而东莞说提出来的族谱是怎样的族谱呢？是父子不辨甚至儿子大于父母或死后还能生子的族谱，以这样的族谱来作为成立东莞假说的依据，这个假说自然没有成立的可能。现在再来看看它对紫金说的反驳，东莞说对紫金说的反驳武器有四：一是误译论；二是巧合论；三是“乾隆”两字误载论；四是孙中山祖孙三代对紫金说之表态不可信论。前三者是老武器，最后一个是新武器，不论是新还是老，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误译论而论，即使承认 Kung Kun 应译为东莞，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孙中山的祖籍就是在东莞，你还必须拿出是东莞的哪一个村，哪一支孙氏，经过如何传演，传至连昌公的证据来，否则，误译不误译有什么关系呢？巧合论也是如此，所谓巧合是彼此间没有必然联系而出现的相同的现象，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时死于1616年，这是巧合，无论用何方法，都不能证明此两人为一人，而琏、连两人则不同，他们可以用逻辑推理和社会实践证明其为同一人，有什么理由说它是巧合呢？又再就乾隆两字误载论来说，它的虚构是十分显然的，说不出瑞英公的生年由乾隆年间提前到顺治年间的根据，说不出瑞英公为什么是连昌公的父亲的根据，而只凭空主张那就是虚构了。至于最后一个新武器，因上面已经说过，这里就请容从略。关于东莞说者为《孙氏家谱》辩护所提出的三个假理由——孙妙茜留下的，邓慕韩抄录过的，有《纪念簿》、坟墓、契约可为佐证的，也因上面已经说过，也请容从略，不过。我想提个问题，为什么紫金孙氏族谱不需要什么辩护而《孙氏家谱》却要花那

么大的气力去辩护呢?

由以上所说,可知东莞说和紫金说两说之争,跟着紫金说成为定论而宣告结束,东莞假说因不具备假说的两个最基本条件和经不起检验而宣告失败,因此,自那以后,东莞说已不复存在,因而就无所谓两说观点之争了。如仍围绕孙中山祖籍问题重提旧观点,一个假谱,三个武器以挑起争论,那只能说是意气之争或者是为了某目的而对紫金说横加攻击之争了。

1991 年 12 月 25 日脱稿于中山大学

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

潘汝瑶　何国华

(一)争论的起因及其概略过程

五十年前,在我国学术界有个热门话题。那就是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有东莞和紫金两说之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呢?原来中山县出了不少有名人物,如唐绍仪、王云五、吴铁城等俱是一时名扬中外的人物,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祖籍问题,而惟独孙中山有祖籍问题呢?这是因为孙中山这支孙氏不是世居中山县的孙氏而是外来者。语言习俗有异。他们迁居中山后传至孙中山这一代只有七代。始祖是连昌公。他们在中山县无祖祠。他们的祖祠在东江公馆村(孙中山语)。关于这些特殊现象如果孙中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偏偏孙中山是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先行者,是世界伟人。在国民党南京建都后,又被尊称为国父和总理。这样,对于与他家庭有关的各种特殊现象,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加以研究了。关于这一问题,吴铁城有过很好的说明。他说:"比政府已因国民群意,明令以国父尊事总理,则其家世研究,更与国家功令有关,为义盖弥重矣"。①

---

* 据广州《岭南文史》,1993 年第 2 期。本文提出的一些问题涉及本馆名誉,但是为客观反映各方观点,我们仍原文照录。本馆有关意见和看法见本书"附录"。关于孙满的意见和看法,见本书第 95~98 页《对〈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一文之答复》。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吴铁城序》。

在国民党重视和倡导之下，作为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正式回答，最先提出来的是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早在1930年，该编纂委员会的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以在东莞孙族找不出和孙中山上世有关联的固有族谱，特往迳仔蓢、左坡头和翠亨村等地孙氏调查，将各地的孙氏谱牒，抄摘拼凑，合成一本《孙总理家谱》，即现在之《孙氏家谱》（下称《家谱》）。这本《家谱》，直到现在，仍为东莞说者奉为圭臬。为什么邓慕韩认为孙中山的先世是出自东莞呢？原来孙中山的中山县始祖连昌由紫金迁往中山最初的居住地是涌口门村，而这个涌口门村和左坡头相连，左坡头适有来自东莞之孙氏，因而邓氏认为居住在涌口门村之连昌公上世亦必来自东莞。邓说连昌公上世“查核与左坡头族谱及神位，实同一本源”。[①] 后来连昌公之孙殿朝公离开涌口迁往翠亨村，而翠亨村的邻村迳仔蓢又适有说是来自东莞之孙氏。但这次这两支孙氏的关系，邓氏不但把他们认为都是出自东莞，而且认为迳仔蓢的始祖瑞英公就是连昌公的父亲。因瑞英公是十一世，而连昌公恰为十二世也。邓氏的《孙总理家谱》就是根据这两个观点搭配成的。由于这两个观点都是揣摩推理为之的，并没有事实根据，所以，终于成为东莞说致败的根源。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东莞说观点，实际上是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观点；孙总理家谱，并非东莞孙氏之固有家谱，而是邓氏自制之新谱。

跟着东莞说之后，对于孙中山祖籍问题作出回答的是罗香林的紫金说。他认为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紫金而不是出自东莞。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据罗氏自言[②]，他曾阅读过许多东莞说者所提

① 同上书第二章《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
② 同上书《引论》。

出的有关孙中山祖籍的谱牒和查阅过东莞长沙乡和员头山乡二支孙氏在“争认”孙中山的上世是出自其乡涉讼时所提出的谱牒，觉得这些谱牒，矛盾抵牾，不足以说明孙中山的祖籍确是在东莞。因此，根据孙中山家中的固有族谱——《列祖生殁纪念簿》（下称《纪念簿》）和孙中山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这一事实，写了一篇《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的文章，发表于《更生评论》2卷2期。由于这篇文章明确提出“国父上世或自广东东江之紫金迁出”的假定，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就是紫金说的产生，同时也可以说就是两说之争的开始。两说的最后一场争论是1942年到1943年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下称《源流考》）和邓慕韩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两文的争论。这次的争论，可说是紫金说成为定论，而东莞说反对其成为定论的争论。经过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942年罗香林将其完成已久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亲自送交孙科审阅。征求意见。结果，得到了孙科意外的好评。盛赞《源流考》为“成之匪易，贡献实巨”。[①] 孙科完全承认他们的先世连昌公是来自紫金。《纪念簿》中的“连昌公”即紫金孙氏族谱中的“琏昌公”。他们在中山县无祖祠[②]。由于孙科这一承认，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蒋介石、于右任、邹鲁、吴铁城、陈立夫和国民党政府，皆相继承认。至此，众说纷纭了十余年的孙中山祖籍问题，才大白于天下，得到了完全解决。紫金说从此成为定论。

紫金说之成为定论，意味着东莞说不能成立。这就不能不激起东莞说权威邓慕韩的愤怒。他针对《源流考》，发表了《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说了四点正误，1. 邓氏认为孙

① 同上书，《孙科序》。

②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再证》注(12)，见《客家史料汇篇》。

中山所述家庙在东江 Kung Kun 村的 Kung Kun 二字，译为“公馆”有误。应译为“东莞”(Tung Kun)(这是误译论)。2. 邓氏认为说孙中山家世源自紫金有误。应该像《孙总理家谱》所说那样是源自东莞。其源流是这样的：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上沙乡迁往中山涌口，至十一世瑞英公又迁迳仔蓢并建祖祠，后又迁翠亨。3. 邓氏认为罗氏以十二世祖连昌公为翠亨孙氏在中山的第一位祖先有误。连昌公是瑞英公的儿子。是东莞孙氏的后裔，不是外来者。(这是瑞英公和连昌公是父子关系论)但据《孙总理家谱》所载，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是康雍时代的人，乾隆时代的人如何能做康雍时代的人的父亲？对于这个问题，邓氏说，“乾隆”两字是误载，应改为“顺治”两字。(“乾隆”两字误载论)4. 罗氏认为紫金孙氏族谱中的“琏”昌公即是《纪念簿》中的连昌公有误。“琏”“连”不是同一个人，不过是偶然的名字“巧合”而已(巧合论)。由于这四点“正误”，都是违背事实的，不讲逻辑思维的，专事将非作是和将是作非的强争“蛮拗”的，不讲社会道德的做法。当他把该正误文寄送孙科审阅时，当然受到孙科的严词驳斥。孙科的驳斥有两点：“1. 邓实糊涂，余十二世祖与紫金者相同其名字竟称偶合”。2.“且(余家)孙氏(在中山县)无祖祠，不能强余认其他孙氏宗祠为余之祖祠也”[①]。孙科这两点驳斥，实际上包括了其他两点。因为不承认名字“巧合”，就是承认他的上世是来自紫金。瑞英公不是他的祖先，否认在中山有祖祠，就是否认瑞英公祠不是他的祖祠。他的祖祠是在东江公馆村。孙科对邓文这一驳斥，是孙科承认紫金说反对东莞说的明确的至关重要的表态。他对两者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但是有些人却对此故意装作不知道。把承认紫金说反

① 见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再证》注(12)，见《客家史料汇篇》。

对东莞说的态度十分鲜明的孙科，诬蔑成为一个对祖籍问题毫无定见，可彼可此的糊涂人物。说什么“孙科先生对祖籍的表态……前后不一致”，因此“不宜以孙科先生的表态作为主要论据”①。这真是镂心刻骨的名言！试思，如果孙中山的先世不是来自紫金，孙科有什么必要要承认紫金客家人做他们的祖先？是不是他不承认紫金客家人做祖先，他便不能在中山生存下去？如果他对祖籍问题，没有深切确凿的了解，为什么他对邓文要加以驳斥？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

（二）决定两说胜败的根本原因

既然不能把紫金说成为定论、东莞说不能成立的原因，归结为由于孙科的错误表态，那么决定两说胜负的是什么呢？我们以为是假说最终能成立的条件，即具备假说成立条件者胜，不具备者败。要建立假说，最少要具备三个条件：1. 提出假说，必须以可靠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否则，便不能成立。就好像以雨师风伯的神话为依据不能成立下雨的假说一样。2. 假说可以引申。引申应该可以得到与它（引申）相符的事实。如果所得到的是和它不相符的反面的事实，那么，这个假说是错误的，也就不能成立。3. 假说还必须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现象，能作出圆满的回答。否则，这个假说便不能成立。在这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条件。没有它，便谈不上其他两个条件。东莞说之所以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没有第一条件，以一字之差，竟至满盘皆错。现将

① 丘捷《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见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

两说具备条件的情况比较如下：

紫金说。第一条件依据，据罗香林自言[①]，他的孙中山祖籍是在紫金公馆的假说，是以孙中山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和孙中山家藏的“《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依据而提出来的。由于这个假说依据是真实可靠的事实，所以它能加以引申。把紫金假说加以引申就是：如果孙中山的祖籍确是在紫金公馆，那么，在紫金公馆这个地方，必然有孙氏、孙氏家庙以及至关重要的载明孙中山上世确是出自其乡的族谱的存在。因此，到紫金公馆村调查了解，搜集这些事实至为重要。如果搜集不到这些事实，那紫金说便不能成立。经过一番艰苦的调查访问，终于在公馆获得了这些与引申相符的全部事实。即不但有孙氏、孙氏家庙的存在而且有至关重要的载明孙中山上世是出自其乡的族谱——《忠坝孙氏家谱》旧抄本的存在。该谱有明确的琏昌公的名讳及其外迁的记载。但“琏”、“连”两字发音虽同而有无偏旁不同，因而不能遽断为同一人。要确定“琏”、“连”同为一人，必须应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从世次、出生年代、传代的代数、传代的代差、迁徙时代的背景、琏昌公在紫金有无坟墓或后裔的遗留、孙中山是否说客语的等方面，从而论证“琏”、“连”是否同一人。论证的结果，证明“琏”“连”确为同一人。既是“琏”、“连”为同一人，紫金假说的真实性便完全得到证实，孙中山家族的各种特殊现象，也便一一得到说明。这就是说，能圆满回答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假说的第三个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但是，尽管如此，紫金假说想要成为定论，还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紫金假说的社会实践就是要认真调查孙中山家族是否说客语的，是否客家人后裔。最重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1954年版。

要的是要得到孙中山家人的承认。如果孙中山家人否认他们是说客语的,否认他们是客家人后裔,那么,上述的紫金假说,也就只好报废。(由此可知,孙科承认紫金说所起的作用,是社会实践证明的作用。而不是由于个人好恶的选择作用。说他对祖籍无定见表错态是错误的。)但社会实践证明,紫金假说是真实的。当罗氏把《源流考》送给孙科审阅时,孙科完全承认了他们的祖籍是在紫金(承认紫金就是承认他们是客家人后裔,是说客语的),随后又得到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蒋介石、于右任等人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从此,罗氏的紫金说,便由假说而成为定论。

现在再来看看东莞说的情况。东莞说和紫金说完全相反。它的提出,不符合第一条件。即不以可靠事实为依据,而以虚构揣摩为依据。因而它的引申,得不到与引申相符合的事实,从而不能以引申所得事实,证明它的起初性和圆满回答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现象。最终,以经不起社会实践的检验而只能宣告失败。

东莞说的提出,是以连昌公的祖先和左坡头孙氏祖先"实同一本源"和连昌公是瑞英的儿子的两个虚构为依据的。为什么说两者都是虚构呢?先说说前者。所谓"同一本源"是指:据说是由东莞上沙乡迁往中山涌口的五世祖礼赞公,生有两子。一是禘儿一是禘宗。禘儿是左坡头孙氏始祖,禘宗是当时居住在浦口连昌公的始祖。所以说是"同一本源"。但据上沙乡孙绳武提出的《总理世系图》,上面虽然有禘宗之名,但当时的东莞县长邓庆史证明禘宗两字为"后来加入"并"再查上沙子氏宗祠先祖牌位……又未见禘宗牌位"①。足见根本就没有禘宗此人。又可据"同一本源"的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第三章。

左坡头的《孙氏族谱世系图》[①] 所载，亦找不到禘宗之名。没有其人，而硬安上其人，此非虚构为何？现再说说后者。这个虚构，其荒唐之处，更甚于前者。因为它直接和《孙氏家谱》相矛盾。这一矛盾，迫使东莞说者或则修改《孙氏家谱》，或则制造假谱、假证，以图弥补。然而扶得东来西又倒，欲盖弥彰，于事毫无裨补。现且看看它和《孙氏家谱》是怎样矛盾的。1. 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连昌公是康雍时代的人，时代在后的人如何能作时代在前的人的父亲？2. 在《孙氏家谱》上，并没有载明连昌公是瑞英公所生，也没有载明瑞英公生连昌公，根据什么说他是瑞英公的儿子？3. 十一世瑞英公这一代和十二世连昌公这一代是父子关系的两代。为什么十二世祖的年龄竟大于十一世祖妣的年龄？年龄小的母亲如何能生出年龄比她大的儿子？4. 瑞英公是单身汉，单身汉如何能生连昌公？没有父子关系的两人，硬说他们是父子俩，这不仅是虚构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东莞假说以这样两个虚构为依据，当然它的引申就没有得到与引申相符的事实，以证明它本身的真实性的可能。现试分析一下它的引申：如果连昌公在中山的始祖确是禘宗公，而禘宗公又确是来自东莞上沙乡，瑞英公又确是连昌公的父亲的话，那么，在东莞上沙乡必然可以找到载明禘宗公是由东莞上沙乡迁出去的，连昌公是禘宗公的后代，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的族谱。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族谱，东莞假说的真实性便可得到证明，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现象，也可得到圆满的解答了。但是遗憾得很，在上沙乡竟找不到这样的族谱（情况已上述）。由于找不到这样的族谱，邓慕韩乃亲自往左坡头，迳仔蔸、翠亨村等地调查编出一本《孙总理家谱》。欲以这本《家谱》当作东莞孙氏的固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第三章。

有家谱来使用。但不知为什么,这本《家谱》,编造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它记载着十个世系,但十个世系都没有传代关系。计其中:有无迁居中山县之事不明者一代;是否确有其人不明者一代;死后尚能生子者的两代;父小于子者两代;妣小于子者两代;为连昌公纳入东莞系统而特设的世系两代(十二、十三世);本人世次不明而暂设的世系一代(十四世)①。欲以这样的家谱来证明东莞假说的真实性,显然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经说过,假说引申,如果得不到与引申相符的事实而得到的是相反的事实,那么,这个假说便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可知,东莞说之所以不能成立,是由于它不具备假说条件的结果,并非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所以,用不着怨天尤人,更不要再事弄虚作假。想要复活东莞说,必须使它具备假说的条件,否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三)新一轮争论的性质及其现状

紫金说之成为定说,东莞说之不能成立,意味着东、紫两说之争的结束。

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在台北和广州先后有人大事宣扬紫金说尚未成为定论,从而挑起了新一轮的东、紫两说之争。有的人发誓要把孙中山祖籍问题弄清楚,说什么"孙中山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有关他的一切记载……作为孙中山研究工作者,我们感到有

① 欲知《孙氏家谱》的虚假详细情况,请阅潘汝瑶《再论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此文将在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客家历史文化》和闽西客家学研究会出版的《客家纵横》发表。

责任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误解”[①]。这显然是两说尚有争论。怎么能说此后再没有两说之争了呢？诚然，最近十多年来，先在台北由孙甄陶、祝秀侠和孙满等人，后在广州由某几位同志掀起一阵反对紫金说之风，因而引起了争论。但这次的争论，从其性质来说，绝不是以前的两说之争而是两说之争结束后的意气之争。什么是两说之争呢？两说之争是谁能把孙中山祖籍考证得正确之争，是谁能成为定论之争，是谁能具备假说条件之争，即科学与非科学之争，是真与假之争。什么是两说之争结束后的意气之争呢？因为意气之争是这样引起的：两说之争结束后，有人不甘心于紫金说之成为定论，觉得伟人祖籍所在地的光荣被人夺去了，于是企图人为地改变孙中山的祖籍，从而放弃了理智立场，任凭情感行事，无视事实和真理，发表和作出许多无理无据的非理智言行，于是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所以，这一轮争论具有独特的性质。它的性质是：理智与感情之争。把理智与感情之争和真与假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争论混为一谈，无非是欲以此迷惑世人，以为其改变孙中山祖籍的用心开路而已。

为了使大家知道一下意气之争的现状，现略举反映无理无据非理智的言行数例如下：

1. 毫无根据地改变孙中山祖籍。

1986 年，为孙中山诞辰 120 周年。人民政府拨款 50 万元，为全面修整翠亨村“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之用。有些人，趁这个机会，利用职权，把孙中山的祖籍加以更改。即将原来陈列的紫金孙氏族谱和紫金系统的世系图表以及其他与紫金有关的文物，统统撤

① 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见《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 年 4 期。

去,换上东莞的《孙氏家谱》和东莞系统的世系图表以及其他与东莞有关文物。籍看管"故居陈列馆"文物而竟破坏"故居陈列馆"文物。这是稍有理智稍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所不敢为而亦不忍为的行为。

2. 为补《孙氏家谱》的不足而制造假证。

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之说,在《孙氏家谱》中是找不到证据的。于是这些人便制造出假证以补其不足。且把它说成是"铁证"。其重要的有三:(1)卖田契[①]。所谓卖田契,据说是孙中山七世祖容窝公的后裔某某把田产卖给"房亲"迴千公(连昌公之子)及其叔(假)廷尊公(瑞英公之子)时所成立之契约。这张契约的妙用,就是利用"房亲"两字,透过叔侄关系,把连昌公说成是瑞英公的儿子。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假的。查迴千公生于1701年,买田于1743年。此时他已42岁。做他的祖父的瑞英公生终年月无考,但知其于1774年迁居迳仔蔴,与迴千公买田时间,相去31年。假定瑞英公30岁迁迳仔蔴,则迴千公买田时,他尚未出世。做他的儿子的廷尊公更不知渺在何方。试问,这个不知渺在何方的廷尊公,有何可能提前出世(比他父亲还要早出世)和迴千公一起买田?(2)开荒合约[②]。这个合约是欲以"裔孙"、"祖炉"四字,把孙中山父亲达成公说成是瑞英公的"裔孙",从而证明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但事实上这也是假的。该合约签订于1864年,两年后孙中山才出生。他出生后一直在翠亨村长大。如他确有祖祠在迳仔蔴,则决无不知之理。既知迳仔蔴有祖祠,则决无说"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之理。即此一端,便可证明其假。(3)坟墓。在30年代,

① 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

② 同上书。

有人趁在翠亨修建孙中山纪念中学迁移祖坟的机会，故意把瑞英公坟墓迁移在连昌公墓侧，以此作为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的“铁证”。但这种自己制造假身份证以证明自己身份式的“铁证”，是不堪一驳的。瑞英公是18世纪的人物。死葬看山田，墓前应有墓碑。《孙氏家谱》是抄成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碑在前谱在后。照理，碑谱所载应相符。如果墓碑刻明是双人葬，则《孙氏家谱》决无将之记成为单身汉之理。但现在葬在连昌公墓侧的瑞英公墓碑文是：“显十一世祖考瑞英公妣梁氏安人同墓”①。很显然，如果这块墓碑是18世纪保存下来的原碑。则《孙氏家谱》错误得出奇；如果认为《孙氏家谱》所载无误，则这块墓碑怪得出奇。为什么有这样怪的墓碑出现呢？此无他，因为瑞英公如果没老婆，就不能生出连昌公，从而就不能补《孙氏家谱》的不足的缘故。

3. 为了便于篡改，竟公然否认孙中山父子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言行（孙科担任过紫金旅港同乡会和台北世界客属联谊会名誉会长。这行为亦足以表明他是客家人）。

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应以孙中山、孙科关于其祖籍的言行为准则，这是常识问题。但有人因为要达到其篡改孙中山祖籍的目的，觉得孙中山父子承认祖籍在紫金的言行是篡改的大障碍，因此必须搬掉它。办法是：根本否认孙中山父子关于祖籍方面的言行。他们认为孙中山所述的“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孙科为《源流考》所作的序文以及孙科夫人陈淑英女士亲笔书写的“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② 的证词都是不可信的，可信的是与孙家毫无关系的

① 见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

② 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18页，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陈淑英女士题词手迹见文中影印件。

孙社正[①] 和对孙家家族历史知之甚少的孙满先生[②] 以及缺乏根据的庄政[③] 文章。名为研究孙中山祖籍,而又把孙中山父子关于这方面的言行统统排除在外。如此以言研究,何异缘木求鱼?!

4. 捧出孙满以与孙科对抗,以为否定紫金说的所谓证明。

有人不甘心于紫金说之成为定论,但又碍于孙中山父子都承认他们的祖籍是在紫金。因此除发出孙中山、孙科和陈淑英之言论和证词都不可信之外,还不惜采用捧出孙满以对抗孙科的方式[④],以作为反对紫金说的证明。他们以为孙满是孙家人(是孙眉之孙,孙中山之侄孙,孙科之堂侄),既然孙科对家史有发言权,孙满同样也有发言权。孙科承认祖籍在紫金,但孙满却承认祖籍在东莞。你说是紫金对呢,还是东莞对呢?欲以此抵消孙科之承认紫金说。这种"以孙制孙"、"以亲制亲"的"妙计",堪称一绝。但若拟以不论,又不免有溺人稻草之诮了。首先,孙科是孙中山的嫡子,自幼饱承父亲庭训,对于家史一清二楚。孙满是孙中山的侄孙,孙中山在世时他还是小孩,其父又早年去世,他从何处得来家史知识,可以和孙科相匹敌?现在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岂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孙科承认紫金说是有根有据的。他的根据:一是孙中山"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谈话;二是《列祖生殁纪念簿》。该簿载明连昌公是翠亨孙氏的第一位祖先;三是他们在翠亨只住了数代(孙中山语),在中山县无祖祠;四是他们是客家人后裔,且是说客家话的。因为这四个根据,和紫金说所说的完全吻合,所以他才承认紫金说。而孙满先生承认祖籍在东莞的根据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1954年版。
② 邱捷《再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见《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3期。
③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注(14)。
④ 邱捷《再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

是什么呢？是根据他祖父的说话吗？是根据他父亲的说话吗？都不是。从他的家史自述来看，他的根据有二：一是《孙总理家谱》，因它载明翠亨孙氏的上世是出自东莞。但是这本家谱是不辨父子，死后犹能生子的怪谱，孙满先生是不可能从其中认出自己就是出自其中人的后裔的。二是孙满先生自造的与孙中山家藏的《纪念簿》完全相反的《纪念簿》。他说，曾看过家藏的《纪念簿》，并且还抄写过它。它是用"墨笔写于大红纸上"，在该谱"所记载的十一世祖瑞英公，十世祖植尚公以至先高祖敬贤公各名讳，生卒年月日均一一载明"。[①]这就是说，《纪念簿》中有瑞英公的名讳，表明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纪念簿的话，当邓慕韩往翠亨调查时，岂有不将之录入《孙总理家谱》中，以为瑞英公是连昌公的父亲的绝好证据？何至于在《孙总理家谱》中，出现瑞英公"生终年月无考"，找不到瑞英公和连昌公有父子关系的记载以及瑞英公是乾隆时代的人而连昌公是康雍时代的人，致父子时代颠倒的百词莫辩的漏洞和矛盾呢？由此可知，孙满承认祖籍在东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还有一事令人难于理解。上述孙满关于《纪念簿》的说话，广州某大学教师是知道的，是和他自己所说的《纪念簿》完全相反的。他说的《纪念簿》是用"玉扣纸"写的[②]，不是用大红纸写的。在该簿上面是没有瑞英公名字的。而且正因为没有瑞英公名字，这位大学教师，还特地为它作过精心的辩护。辩护说，《纪念簿》中所以没有瑞英公名字是因为"它记的是列祖生卒时间"，瑞英公因"生终年月无考"，所以没有记上他的名字。"不能"以此"说明瑞英公不

① 祝秀侠《关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辨正问题》，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

② 李伯新、邱捷《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若干资料》，见《中山文史》总10期。

是孙中山的祖先”[①]。这个辩护，有没有理由且不管它，但它可以证实一点，就是《纪念簿》是确实没有瑞英公之名。既然《纪念簿》确无瑞英公之名，现在看到孙满编造的膺品，不但不加以指责，反而以孙满承认祖籍在东莞适合自己的需要之故，竟违心将之捧出台和孙科对抗。这种只要合用，宁愿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做法，实在使人难于理解。这种做法和捏造东莞系统的孙中山世系图表（《孙氏家谱》是完全无传代关系的假谱，在这样家谱中绝对不可能找出任何一人的直系祖先的系统，所以，不久前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陈列的孙中山世系图表是伪图表），发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计算祖宗的世系方法，伪造公尝簿，谎称达成公曾管理过公尝，编造瑞英公是明末清初人，在那个时候就迁居迳仔蔭，以后又作三次的迁移的故事，同样都是不可取的。

5. 为篡改孙中山祖籍辩护，极力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

最近有个别人撰写专文，花了许多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非理智之词，极力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以图掩盖其篡改孙中山祖籍的行为。我们以为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和精力是完全可以节省的。因为推翻不了紫金说，就无法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如果想要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则必须推翻紫金说，紫金说不推翻，就是写一千篇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的文章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紫金说能推翻吗？不是有人企图用紫金说“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其主要原因则是学术范围以外的”[②] 的理论以推翻紫金说吗？但是，“学术范围以外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后来作者“进一步作了说明，那就是：昔日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

① 李伯新、邱捷《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若干资料》，见《中山文史》总10期。

② 同上书。

的表态，阻止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使证据不足的'紫金说'得以产生较大影响"。[①] 但是，这样的"进一步以说明"能"说明"问题吗？东莞说是提出最早，宣传最力最久，而且是官方——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观点。为什么"昔日的一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如孙科、蒋介石、于右任、邹鲁、吴铁城、陈立夫，甚至是原持东莞说的吴稚晖以及国民党政府都不向它（东莞说）表态而向一介书生的研究成果——紫金说即《源流考》表态呢？此中道理，可得闻乎？然而聪明人很聪明，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最后干脆来一个什么孙中山、孙科和陈淑英之言论和题词俱不可信论，以为推翻紫金说之无上法宝。然而，这个赌博赖帐式的法宝，将何以服人呢？

6. 旧调重弹。

在这次意气之争中，除看见有人大力宣传神话般的《孙氏家谱》是真正的孙中山家谱（这本家谱，来历甚奇，据说它抄成于"1880年……之后，民国成立以前"。"从未全文发表过"。"过去由孙妙茜保存……每年必将《孙氏家谱》与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按时翻晒"，翻晒后由孙妙茜个人保存——不是"纪念馆"保存。"孙妙茜去世后，由其后人……献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②] 之家谱云云）外，还看见邓慕韩的五个旧论点——孙中山上世是出自东莞论、误译论、"乾隆"两字误载论、瑞英公是连昌公父亲论、巧合论——又被重新着力提出来，向紫金说挑战。我们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五个论点早就向紫金说挑战过而且是失败了的。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都是无稽之谈。

---

① 邱捷《再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

② 李伯新、邱捷《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若干资料》。

以上便是当今意气之争的现状。如此现状，应否长此下去，谨请读者卓裁之。

也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

邱　捷

《岭南文史》1993 年第 2 期刊出的《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严格地说来并不是一篇介绍这场学术争论始末的文章,它主要反映两位作者的主观想法和某种情绪。我的一些论文在该文中被不确切地引用后再予以猛烈抨击,因此,我不得不对《岭南文史》的读者再谈谈"紫金说"、"东莞说"的论据及其他一些有关问题。对该文"意气之争"、"制造假证"一类的指责,双方文章俱在,读者可以作出客观的判断,我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一、孙中山是否承认过紫金为祖籍?

《始末》称:"孙中山父子承认祖籍在紫金"。但所有研究孙中山的学者都知道,孙中山从未作过这样的承认。至于被"紫金说"者当作孙中山"承认"紫金为祖籍的所谓"孙中山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却是由一段误译引起的。

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在其所著之《孙逸仙传记》(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1925)一书中记述了孙中山的一段话:"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1926 年上海开智书局出版的徐植仁的中译本把这段话译作:"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

---

* 据广州《岭南文史》,1993 年第 4 期。

里。”这段英文并不艰深,稍懂英文的人都可看出徐译并不确切。比较恰当的译法应是:“我们祖祠所在的村庄,在东江的 Kung Kun。”“Kung Kun”应是一个县而不是一条村。有的学者认为“Kung Kun”实为“Tung Kun”(东莞)之误。例如,“紫金说”的提出者罗香林先生曾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中说:“Linebarger 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 Kung Kun ,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 Tung 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民十五年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① 可见,这段后来被“紫金说”者反复强调的所谓孙中山“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自述,其实是误译,连罗先生早年也看做是孙中山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表示。当然,由于字母有误,“东莞说”不能把这段孙中山自述作为论据。但它并非孙中山承认紫金为祖籍的表示,则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罗先生有“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的推测②,几年后,又把他否定过的这段误译作为假设孙中山祖上来自东江某个名“公馆”的村庄的前提,到了撰写《国父家世源流考》时,才截然排除东莞,提出孙中山上世于清初从紫金迁来,并确指紫金中坝孙屋排村为孙中山的祖籍。不过,这条村庄从来都不叫“公馆村”,只是紫金中坝《孙氏族谱》提及一处祖坟的所在地的小土名叫“公馆背”,祖祠却没有一处在“公馆背”。③ 孙中山和外国人谈祖籍,又怎么会不讲县名村名,只讲一处祖坟(不是祖祠)所在地的小土名的前半截呢?何况,被指为“东江公馆村”的中坝孙屋排村,位于韩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影印希山书藏 1933 年版本,第 274 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影印希山书藏 1933 年版本,第 264 页。

③ 参看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影印件)。

江支流琴江上游，它最多也只是“韩江公馆村”，并非“on the East River”（在东江畔），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与上引孙中山自述对上号。目前发现的所有文物资料也排除了这个村庄是孙中山祖籍的可能性。

所谓孙中山“承认祖籍为紫金”纯属子虚乌有。但一些文物却反映了孙中山祖籍为东莞的可能性。如1912年5月孙中山与东莞上沙孙姓人士同开孙族恳亲会的合照、传单，[①] 孙中山、孙眉到左坡头孙氏（源出东莞）祖祠拜祭后的合照等。[②] 近年，还有一位“紫金说”者谈到孙中山曾往东莞拜祖的事实。[③] 这些，都可看做孙中山承认东莞为祖籍的间接证据。

二、孙科先生对“东莞说”和“紫金说”的表态

《始末》十分强调孙科先生承认“紫金说”的表示。不过，孙科先生也有过承认“东莞说”的表示，在此，举出几个证据：

1.1932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编印了《总理年谱长编初稿》，该书首页即称孙中山祖上来自东莞，“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中山县，……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沙头（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七世祖）瑞英公以降，六世祖建昌（按：应为连昌）公，五世祖迥千公，四世祖殿朝公，曾祖恒辉公，祖敬贤公，历世未显。父达成公。”本书编成后，曾分送国民党元老及孙中山的亲友征求意见。国民党党史会于1933年把全部意见编成《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孙科先生的签注全部收入。对该书首页

① 东莞上沙乡村民孙衍佳保存有其父孙同发参加该次孙族恳亲会的传单、照片。
② 孙满先生保存有孙眉、孙中山在左坡头孙氏祠堂拜祭后的合影多帧。
③ 参看《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第11页。

关于孙中山祖籍在东莞的记述及孙氏历代祖先，孙科先生也和全部签注者一样未提任何异议，但他将“分居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分居左坡头”[①]。左坡孙氏有确凿证据源出东莞，历来与翠亨孙氏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坡”字非常见字，孙科先生作了改动，说明他是注意到这段记载的，当时他并不认为说自己的祖籍为东莞、与左坡头孙姓是族亲有什么不妥当。

2.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的《总理事略》，一开头就引述孙中山祖籍为东莞的说法。孙科先生在为该书的题词中说：“《总理事略》，编订明备”。

3.1947年，孙科先生为东莞上沙题写过“国父先代故乡”。（牌坊毁于1966年，现尚存照片）

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以上几件事实，已足以反映孙科先生也有过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表示，并非始终如一只承认紫金为祖籍。我的几篇文章都没有回避孙科先生有过承认“紫金说”的事实，只是指出对他两方面的表态都应注意。其实，孙科先生对祖籍的表态前后不一也并非不可理解。他从小在国外长大和受教育，孙中山主要在学习和革命工作两个方面严格要求儿子，对自己和家族的事似乎谈得不多，所以，孙中山逝世后要确定他的生辰，孙科先生也不能提供准确答案，终于还是卢太夫人找出她与孙中山结婚时的生辰八字才解决了问题。[②] 从他对《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的签注也反映他当时绝对未想到紫金可能是自己的祖籍。作为一位政治家，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先生不妨对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都予以肯定和支持，或者他也并没有太在意“紫金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党史会档案（七一六）508。

② 参看黄季陆：《关于国父生辰的考证》，载于《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1975年出版。

说”和“东莞说”的对立。我相信,无论孙科先生对祖籍作过什么表态,对这位近代有名的政治家的一生来说,只是不足道的小事,不应该因而说一些对他不恭的话。

三、孙中山其他亲属的意见

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对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说过:“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①]此说与《孙氏家谱》所记符合。她的后人也坚持认为孙氏的祖籍为东莞。

孙中山的侄孙孙满先生(孙眉之孙、孙昌之子)始终坚持认为翠亨孙氏的祖籍在东莞,拒绝承认紫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在文章中引述孙满先生的意见,《始末》指责为“捧出孙满以与孙科对抗”,并以挖苦的口气称之为“以孙制孙”的“妙计”。其实,孙满先生对祖籍的态度几十年来没有变化,无须谁去“捧出”。同族人对祖籍问题的看法有不同,也谈不上是“对抗”。孙满先生一些文章由别人代笔,有些出入也无须大惊小怪。他是翠亨孙氏的长房嫡孙,在国家大事方面的发言权自不可与孙科相提并论,但在祖籍这类家族事务上,按情理是应有发言权的。1992年6月,孙满先生访问中山大学,他谈到自己的祖籍不是紫金,也不是客家人,从他的说话中也确实听不出带有客家口音。罗香林先生说过,“客家人尚自重,喜自尊,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肯舍弃固有的语言和习

① 钟公任:《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笔者看到的是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an,梅县人)在其工作日记中的摘录。

惯。”[①] 客家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贡献早已得到公认，客家人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又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非客家人愿与客家人认同，却少有客家人自己拒绝承认之事。若翠亨孙氏确为来自紫金的客家人，孙满先生又何必拒绝承认？又有谁见过年届九十的客家老人不会说客家话、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的呢？

还必须说明，我们并不是仅根据孙满先生的意见便得出结论，只是把他的意见作为论据之一而已。

四、关于“紫金说”和“东莞说”的所谓“胜败”

《始末》一再宣称，“紫金说”已成“定论”，“东莞说”已经失败，如果再对“紫金说”提出异议、重提“东莞说”，就是“不甘心失败”、“非理智”、“意气之争”、“无稽之谈”。其实，所谓“紫金说”已成“定论”、已经“获胜”云云，只是一种主观想象。

自蒋介石、孙科等为《国父家世源流考》题署、作序以后，国民党的史政机构后来改为采纳“紫金说”，但两说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过充分的争论，邓慕韩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甚至没有公开发表。不过，一直有学者对证据不足的“紫金说”提出批评。1985 年，台湾国民党史政机构第三次增订重版《国父年谱》，虽仍采“紫金说”，但却加了一条长注，注文开头便说：“关于先生（孙中山）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论，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注文最后说：“本谱暂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影印希山书藏 1933 年版本，第 172 页。

再行补正。”可见,多年接受“紫金说”的台湾国民党史政机构,也承认关于孙中山祖籍仍有争论的事实,并未把“紫金说”称为“定论”。

在我国大陆(特别是在广东),缺乏证据的“紫金说”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重视,更谈不上成为“定论”了。1986年,一位著名的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发言,对提交大会的论文作了评述,其中谈到:“有的论文,根据大量文献、文物和访问材料,进行了细密的考证,指出孙中山的祖籍是广东东莞,而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广东紫金,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许。”① 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实正误》也把“东莞说”作为正,而把“紫金说”作为误。

我说这些,当然不是说“东莞说”已成“定论”或已经“获胜”,只是要说明《始末》所称“紫金说已成定论”并非事实。对孙中山祖籍这个学术问题,学者们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从长讨论,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固然好,就是意见终于不一致也关系不大,任何人都有权接受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那种观点,无须像体育竞赛那样非要分个胜负不可。

目前,有些人以极大的热情为“紫金说”辩护并激烈地抨击“东莞说”者。但从他们发表的文章和散发的印刷品来看,他们并不清楚这场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对“东莞说”的论据、论点固然知之甚少,对“紫金说”的主要论据、论点也不甚了了。如“国父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找到的所谓“东江公馆村”在什么地方,紫金《孙氏族谱》有些什么记载,紫金的琏昌和香山的连昌

① 《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上册,第8页。

各生活在什么年代，翠亨孙氏与紫金的客家人在语言、风俗、婚姻等方面有何异同，罗香林先生和孙科先生对“东莞说”、“紫金说”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孙中山的家族成员是否都接受“紫金说”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始终弄不明白或者不愿意弄明白，只是强调“紫金说”是完全正确的，是不必再讨论和不容再讨论的，但引用罗香林先生的论据、论点时却还闹过画蛇添足的笑话。这些人在他们从事的学科可能也是有成就的专家，如今却要在另一个学术领域中对一个自己没有认真研究过的学术问题用不容分说的口气作出裁决，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五、我们为什么不接受“紫金说”

这个问题我的几篇文章已谈过不少，所有论据均注明了出处。在此再概略地重复一下：

1.“紫金说”的前提“孙中山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不能成立，已如前述。

2. 在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无论家族文物，还是口碑相传，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过紫金（永安）。

3. 翠亨孙氏语言、风俗与来自紫金的客家人不同，历代只与讲香山本地白话的家族通婚，居住在全讲香山本地白话的翠亨村而不住在附近大量存在的客家村（不少还是祖籍紫金的客籍人）。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崇敬祖先，重视谱牒。[①] 如翠亨孙氏真是17－18世纪之交（连昌公生于1669年）才从紫金迁来，在没有经历迁徙流离的乡居环

① 参看何国华：《客家文化传承中所体现的民族凝聚力》。

境中，怎么会在定居香山百多年后就把记有祖籍的谱牒遗失净尽，甚至也不知道祖籍在哪个县，丢掉了客家话，还染上缠足陋习，并脱离了邻近的客家人群体住进讲香山本地白话的村庄？这一切对昔日一个乡居的客家人家族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翠亨孙氏原来就并非清初才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

4. 紫金方面也提出了一条足以彻底推翻"紫金说"的有力证据——紫金孙氏十二世祖琏昌公参加过发生于1646年左右的钟丁先抗清起义的事实，现尚有遗址。[①] 这一点，自40年代至今从无异辞。而孙中山的祖先香山的连昌公确知生于1669年。紫金之琏昌与香山的连昌并非同一个人，当无可怀疑。本来，紫金之琏昌与香山之连昌为同一个人之假设，是"紫金说"得以提出的关键之点。现已证实两人并非同一个人，紫金《孙氏族谱》自不可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簿》相接，"紫金说"就失去了任何成立的可能性。

因为以上各点，所以，即使没有其他反证，紫金也不可能是翠亨孙氏的祖籍，何况，在翠亨的多件文物以及孙氏的祖墓，都反映了翠亨孙氏并非十二世于清初始从紫金迁来。

---

① 紫金琏昌参加1646年钟丁先抗清起义的事实，见于：1.《国父家世源流考》吴铁城、陈立夫序；2.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第388页；3.《紫金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第9、23、26等页，与会者的发言及关于"家世源流展览"的介绍均提到鼎标、琏昌父子参加钟丁先起义之事；4.张玉杰、陈国歧：《孙中山祖籍紫金中坝的名胜古迹》，载《岭南文史》1989年第2期。此外，我看到的多种从紫金寄出的印刷品都提及此事。

六、有关文物资料的真伪问题

因为翠亨孙中山故居收藏的文物以及附近的孙氏祖墓都是足以推翻“紫金说”的证据，因此，《始末》一再说这些文物、坟墓全都是伪造的。但他们提出的理由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在研究名人的家世源流时，伪造谱牒等资料以图攀附的事是可能发生的。在孙中山祖籍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排除紫金、东莞两地的孙姓为攀附翠亨孙氏而假造谱牒等资料的可能性，但断无孙中山的亲属伪造谱牒以图攀附其他地方的孙姓之理。就一般情理而言，紫金方面伪造资料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紫金《孙氏族谱》的发现是在罗先生推测、假设孙中山上世可能出自东江紫金的几年之后，结论提出在前，证据却发现于后；而罗先生关于翠亨孙氏十二世连昌以后始有较准确记载等事实的披露，也会给伪造者提示了明白的线索。《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以后，还发生“中坝孙姓少数人，竟为地方豪劣讼棍所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榨，无不令人感慨。”① 在研究名人的家世源流时，遇到以上情况，学者都会对资料的真实性产生疑问。但是，我在以前所有的论文都没有讨论过“紫金说”论据的真伪问题，因为怀疑其有伪造的可能毕竟不等于是伪造的证据。我始终以承认紫金的谱牒等资料的真实性作为研讨的前提，只是认为即使它们全是真的，也与孙中山的家族毫无关系。我在研究中也没有太

① 温济琴致罗香林电（译电影印件）。

重视东莞孙氏提供的谱牒资料，主要以孙中山亲属收藏的文物等资料作为自己的论据。

翠亨孙中山故居收藏的《孙氏家谱》和几件契据、帐册，是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的遗物，后由她的孙子杨连合、杨连逢无偿献给故居收藏。而《家谱略记》是孙中山胞兄孙眉的遗物，由其长孙孙满先生披露。我们总不能怀疑孙眉、孙妙茜或其后人为攀附东莞孙氏（该支孙氏并无任何有影响的历史名人）而伪造这些文物吧？

制造假谱牒通常是在名人祖籍发生争论时或为推翻某一旧说而出现的。《孙氏家谱》在30年代初已为人所知，部分孙氏祖墓的迁葬也发生在30年代。在那个时候，并不存在“东莞”、“紫金”两说的争论，连罗香林先生都是“东莞说”者。“东莞说”者又何必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说法去作伪呢？

那么，作伪者会不会是翠亨附近的孙姓呢？《始末》无中生有地说30年代邓慕韩往“迳仔蓢孙姓”处抄家谱，其实，邓慕韩在《〈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中已说过，他到翠亨调查时，迳仔蓢村已“鞠为茂草”，再无人居住。30年代时，翠亨附近也没有多少孙姓居民。而翠亨东北六七公里的左坡头孙氏，孙眉、孙中山、孙科都承认他们与翠亨孙氏有同源关系（否定的说法是罗香林先生在40年代提出的）。他们也无须大肆作伪。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翠亨在孙中山逝世后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地，当地政府、民众以及孙中山的亲属，眼睁睁地看着“东莞说”者在翠亨大肆伪造文物、坟墓（达数十座）而不闻不问；而这些“伪造”的东西又竟被孙中山的胞姐接受，有这个可能吗？

细看《始末》和其他一些猛烈抨击“东莞说”的文章，所提出的“伪造”的“证据”无非是《孙氏家谱》记载上的某些矛盾、缺漏，指斥别人“制造假证”，引用的却是别人对这件文物为何出现矛盾的一

些理解或解释。看来,这些文章是把文物、史料的真伪与记载的准确性混为一谈了。在家世源流的研究中,常会碰到要考证谱牒的真伪及其记载的矛盾、错漏等问题。例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多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① 这说明即使宰相家的谱牒也还是有不确切之处,但不可能"逐家谱牒"均是伪品。又如,现在学者们看到的洪秀全的族谱,就有极明显的谬误,但它是花县官禄埠洪氏族人保存的,大家也就承认它在研究洪秀全家世方面的参考价值。② 珠江三角洲讲白话的贫苦农家,家谱往往十分简略,甚至找不出家谱。孙中山上世历代都是贫苦农民,从未出过文士,家谱资料不健全是不足为怪的。如果说,有矛盾、缺漏的家谱不会是孙中山的家谱,只能是其他孙姓的家谱,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而且,极为粗疏的本来面目,通常恰恰是伪造的反证,如果有人伪造家谱以图攀附孙中山,搞一本稍为完整、严密些的又有何难?因为《孙氏家谱》的记载存在种种问题,所以,我们也并没有仅依据它便得出结论,而是综合了各方面的文献、文物、口述资料和调查访问材料才作出判断。对这本家谱的矛盾疏漏之处,我们也从不回避、掩饰,并对各个不合理之处作了注明。③ 总的来说,我认为《孙氏家谱》从收藏者、收藏地以及披露的背景看,它不可能是伪造品,对孙中山家世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其中记载有不确切之处,引用时应注意分析考证。

至于《始末》指称达成公兄弟批垦荒山合约等文物及孙氏祖墓为伪造的所谓理由,多是一些主观臆测,也颇有矛盾之处。该文一

① 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唐书世系表"。

② 参看王庆成:《关于洪秀全族谱》,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请参看《中山文史》第 10 辑我们对该谱的注释。

再声言《孙氏家谱》为伪品，却又以家谱中有关瑞英公的明显不确的记载为出发点，从而企图证明所有其他提及瑞英公的文物甚至他的坟墓都是伪造的。这种论证方法与正常的历史考证毫无共同之处。

七、再谈对这场学术争论的一些想法

我曾多次申明，研究孙中山，主要应研究他的历史功绩和光辉思想，祖籍只是一个不算重要的具体学术问题。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何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没有指望大家都注意和接受我的观点，在史学界以外的某些激烈反应，是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的。

有人问我：是不是要为东莞争孙中山的祖籍？我明确地答复：不是！我并非东莞人，与东莞也没有私人的联系，只因参加《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纂，所承担的部分涉及孙中山的家世，所以才去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论为哪个地方去争孙中山的祖籍都没有意义。孙中山诞生及生活过、从事过革命工作的地方，应该作为纪念地，但他很多代以前的祖籍，却是不必特意加以纪念的。1986年，笔者与其他一些学者向东莞的同志建议，只把祖籍作为一个有关地方史的学术问题予以探讨，不要大拨公款修墓建祠。据笔者所知，东莞方面并没有对“祖籍”大加渲染，也没有为此花费大笔公款。

《始末》以及一些非正式散发的印刷品，一再强调否定“紫金说”就是“极力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这种说法当然很容易激起对这场学术争论了解不多的客籍人士的不满。笔者所在的孙中山研究所，大部分同事是客家人；内子也是纯正的客家人。如果我的

研究以“否认孙中山是客家人”为目的，那么在研究所和在家里就首先通不过。笔者只是从翠亨孙氏的语言、风俗、居住以及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的话，推断孙家不可能是清初始从外地迁入的客家人。这不过是笔者个人的一种学术观点。我相信，如果孙中山的家族确为客家人，自不会因我的几篇文章的发表而改变；而如果孙中山的家族并不是客家人，那么，既不会影响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也不会影响客家民系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贡献。我希望我以上的想法能得到《岭南文史》读者的理解。

孙中山祖籍在何处，不管怎么说，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只能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方法去解决。但有的人却千方百计要用学术范围以外的方法去对待。《始末》中触目皆是的攻击、挖苦他人的的词句，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学术研究必须提出可靠的证据，靠盛气凌人、恶语相加是无济于事的。

有的人还力图说服领导同志出面以行政的方法对这场学术争论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干预。几年前，一位研究孙中山的专家说过：“对于孙中山祖籍问题，诸如他的远祖是谁，先世来自何处等等，不必花太多的力量，应放在适当的地位，让少数有兴趣的学者以及有关部门研究就可以了。既然孙中山祖籍问题一直有争论，迄今尚未获一致的结论，那么举行纪念活动就应持慎重的态度，不宜采用行政决定，立碑修墓，扩大渲染；也不要忙于请领导同志题词、表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造成被动，或者以讹传讹，贻笑天下，造成不好的影响。”① 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特抄录以作本文的结束，供关心孙中山祖籍争论的人士参考。

① 方式光：《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载《南方日报》1987年12月21日。

孙连昌公迁香山动因经过之分析*

——读罗香林先生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指误

钟正君

罗香林教授,考证国父之十二世祖连昌公,系由惠州永安县迁居增城,再迁香山涌口门村,举证确凿,无庸置疑。且获孙哲生先生等孙家后人之确认,哲生先生之《八十自述》,开首便述世系源流,全系采信罗说,或含有国父早年之面谕。罗先生考证事实,本极细密,不知为何,对永安忠坝孙家子弟参与钟丁先抗清义师之世辈人物及孙连昌迁出永安之动因,竟出错误。先看其叙述原文:

"丁先所集之千余义民,虽名氏无考,然以当日情势勘之,必有忠坝孙氏如上述家谱所载十一世鼎茂鼎山鼎标,十二世道元继东连盛等参与其间。……"

"今忠坝人民,父老相传,其地在明清之际,战祸频仍,民多流徙。当钟丁先起义抗清时,公馆背孙屋排,有孙大食公随同起义,以勇敢善战,为钟氏所重,尝以一日升官三级,时人乃称公馆为连升馆。大食公以饶有气力,而食量甚大,故人皆称之为孙大食焉。其后大食公以兵败散走,忠坝遂无复其人后裔,其人原名,亦为后人所失记云。"罗先生在本文后又加附注:"据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忠坝孙桂香、孙启元、启恒、孙作君四人详函谓:查丁先公系明末解元,与满清打仗,与惠州黄总戎相持数载。孙大食公,系忠坝孙屋排人,随丁先公出军,人甚勇敢,一日升官三次,后因清例

---

* 据台北《广东文献季刊》第23卷3期,1993年9月。

非常之严，其下落后人亦无从考查。……孙连昌公是否即为孙大食公，虽今日已不易详考，然其随从钟丁先起兵抗清之背景，及兵败迁散之情势，则完全相同。”

根据上面叙述，罗先生确认孙连昌公与其父亲伯叔兄弟，参与钟丁先抗清义师，事败而逃离永安到增城与香山，甚而怀疑连昌公即是孙大食公。此种确认与推断，乃属大错，是何缘故，且听分析：

道光年间，永安许鼎亨辑刊丁先遗文，名钟义士集，书首载传略云：钟丁先字后觉，又字南山，永安琴江都清溪约人。父国祥，邑庠生。丁先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自幼颖异，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崇祯十五年壬午，吴韩起夏允彝主广东乡试，举丁先第一（解元）。旋丁先北上会试，猝遇流寇，至河而返。癸未国乱，越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师，吴三桂引满清入关，丁先闻变痛哭。顺治三年，清兵徇岭表，所至皆下，丁先招集义民，据永安抗清，意图恢复，有众千余，屯于凹下山。时桂王方都肇庆，称端京，改元永历，授丁先监军道，旋升参议，后升广东按察副使。桂王奔粤西，号令隔绝，丁先知势不可为，即解散义兵，居蓝塘下石彼岸庵，削发为僧，号忏云。府县及平靖二藩，皆致书招丁先出仕，丁先坚辞。答书风霜满纸，忠义凛然。……后离彼岸，卒于里舍，年岁失考，后裔俱往四川。

根据上述事实，则可断定孙连昌公，绝对没有参加钟丁先义兵行列，更非孙大食公其人，他之离开永安西迁，也绝非兵败逋逃亡命他乡。其理由如下：

有真凭实据确切可信的国父家藏《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上载：“连昌公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己酉为清康熙八年，等到他成年能参军打仗，已是康熙二十七、八年，上距清朝顺治三年钟丁先起义时间已四十多年，如何能够加入起义行列？不但连

昌公不能，就是他的父亲鼎标公一辈，在钟丁先集义兵时亦多是出生不久之幼儿，亦不可能参加，倒是他的祖父孙宗荣公一辈（第十世），才是适合参与义兵的二十多岁青年。你说是不是。所以罗著述说“宗荣公诸子或其侄辈，曾参与丁先抗清义师，无可疑也。”“国父十一世祖讳鼎标公，为宗荣公次子，生际明社倾覆，清兵南下，从同都钟丁先，屯集抗清义师于凹下山，后解散归农。”是未加思考错误的叙述。大概罗先生当时一心想将“深明民族大义”“慷慨赴义”的至好习性志节豪气，赋予国父的近祖，以表示国父之伟大，乃是有不平凡的遗传基因之故。

基于前述，连昌公迁离永安之动因，便不可能是因参与义师而受清政府之迫害所致，何则？因钟丁先集义兵抗清是在顺治三年，苦战二年余，至顺治六年，明桂王西迁，消息梗绝，眼见恢复无望，所以解散义兵，自己削发为僧，那时广东已由明朝降清之将清朝平南王尚可喜统理，他感于钟丁先之才干与忠义，致书招其出仕而为丁先所婉却观之，清政府对于反清之首脑尚如此优容，断无对附从者之子孙反加迫害之理。那么连昌公何故会离迁他县呢？那就是因忠坝地处山陬，人民生活普遍困穷，因思改善环境生活，而有迁地之想；加于忠坝附近居民，是时多有迁往增城垦殖者。如乾隆时增城县志舆地门曾载：“明季兵荒叠见，民多弃田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维艰。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稍稍至。清丈时山税之占业寝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绥福金牛三都尤伙。”连昌公因而打算到增城，离乡时将此意告知族人，因此忠坝孙氏光绪二年所修族谱上载：“十二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罗著说：“惟连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故在增城未留若何明显

痕迹。”此属猜测之词,不能作为定论,连昌公离开永安时,年龄应在成年之后,那时已是康熙三十年左右,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投降之后,清廷便下诏闽粤沿海复界,因迁界后历三十余年的岁月,界中原业主多已异地生根,不愿再回原地,或则物换星移,人事全非,因此沿海五十里地,大部空旷无人,清政府乃多方设法鼓励内地人民移居沿海。此种情况,正适合多居山地之客家人胃口,以是嘉应州惠州韶州等地客人,纷向沿海迁移。连昌公在离开永安向增城之途中,极可能听人劝说,舍增城山地而迳向沿海之香山涌口门村。那时由永安到惠州后,坐民船便可直达中山,较去增城便捷甚多,他因未去增城,所以在增城无迹可寻,如真去过增城,则觅到土地垦殖,一时何能离开?此种推断,我想大致不差。

永安忠坝孙家子孙参与钟丁先抗清义师之世辈人物,及孙连昌公从永安迁出之动因,因罗先生之错述,使后来引述罗说者,无人加以细勘而跟着错误,为免使后之传抄国父家世及连昌公迁移动因再有错误,特试拟后文备供采录:

国父远祖孙诇公,世居河南陈留,唐僖宗中和三年,黄巢作乱,朝廷以诇公才武,选为百将,引兵追剿黄巢于闽越江右间,事定以功封东平侯,驻节虔州虔化县(今赣州宁都),百姓安堵,拟北返时为父老遮道请留,乃定居焉,娶陈氏生子孙实,实公第三子士元之次子有敬,东迁福建长汀之河田,是为到闽之一支,数传至友松公,明朝永乐年间,偕其弟友义两人,南迁至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之中心坝,友松是为到粤开基之始祖,十传至宗荣公时,明廷倾覆,清兵南下广东,孙族子弟多人,应明末解元钟丁先之号召,参与起义抗清,奋战数年,以大势已去,恢复无望,解散归农。又二传至十二世连昌公因在乡生活艰难,图谋他迁以改善环境,乃于康熙三十年左右离乡,初拟赴增城,当时因朝廷早已下诏闽粤沿海复界,鼓励人民

迁居沿海，连昌公以沿海土地肥沃，优于增城山地，乃迳赴香山县之涌口门村定居，二传至十四世殿朝公再南迁数十里之翠亨，历十五世恒辉公，十六世敬贤公，十七世达成公，国父乃第十八世。自友松公迁居长乐中心坝开始，祖孙相传六代，历时一百四十余年，均为我嘉应州长乐县人；至明朝第十二帝穆宗隆庆年间，以土寇初平，析归善古名宽得二都五图，长乐琴江一都二图及河源之蓝能为新县，锡名永安，中心坝亦在其内，所以国父之七世祖仕伯公，八世祖绍宗公，九世祖乃和公，十世祖宗荣公，十一世祖鼎标公，乃为新建之惠州府永安县人。十二世连昌公以下各代至国父，才是广府属之香山县人。虽国父之上代，自孙诫公以次，所传孙曾，因所居地赣南闽西湘东及粤东粤北，均是客家人居住之区域，历世祖妣，自诫公陈氏祖妣开始，又均是就地物色之客家人，所以此一支繁衍众多之孙氏族，经历多世为客语系人；惟自连昌公迁居香山以后，因大环境之影响，无论语言、习性、习俗、风气，均大大改变，而成为道地的广府白话语系人，其原有之客人习性语言，仅在家庭间偶尔应用而已。

关于孙中山家族的两件土地契约文书释文*

梁方仲

一、清乾隆八年(1743年)广东香山县孙梅景断卖祖尝田契

[原文]

立明卖田契人孙梅景、梅占、云灿,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愿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逋千二人出头承买,依口酬还时价银壹拾陆两,四家允肯,五面言定,就日立契期。银一色当中交足,〈梅〉景、〈云〉灿二人亲手接回应用,税现在本户孙通办纳,立契之日,交〈廷〉尊、〈逋〉迁[千]批耕管业,不干众人之事。此田明买明卖,不是债利准拆,并非信写等情,如有不明,系同中理明,不干买主之事。今恐无凭,立明卖契为照。

一实卖到土名横坑上税田四亩。

一开四至:东至山,西至山,南至沟,北至山。

一实接到价银壹拾陆两正。

乾隆八年十二月拾柒日

亚喜押

---

*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此为梁方仲先生(1908—1970)遗稿。梁方仲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收集和研究广东土地契约文书,此文当写于1960年代初。

立卖契〈人〉:孙云瑞押　　乾隆九年七月
连维押　　十二日纳税讫
梅景押
梅占押
云灿押
见银作中人:谭恒玉押

[释文]:这一份清乾隆八年(1743 年)广东香山县永宁乡大字都孙梅景等因争山需银开支、众议出卖容窝祖尝田的税契的发现,为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可补《孙氏家谱》的不足。它有力地证明孙中山的七世祖容窝居于香山县永宁乡大字都。容窝葬于涌口村,他子孙众多,所遗尝田,已分给众房管业,孙梅景等出卖的容窝祖尝田即为其一部分。

契载该尝田坐落永宁乡横坑,上税四亩,"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四亩价共银 16 两,平均每亩田价 4 两。乾隆八年广东白银 1 两合制钱 700—815 文,则其时香山县每亩上税田[时价]4 两折合钱 2800—3260 文。契又载:该田"立契之日,交〈廷〉尊、〈迥〉迁[千]批耕管业"。据《孙氏家谱》,容窝为孙中山的七世祖;新业主之一孙迥千为其十三世祖;断卖契人孙梅景等为迥千房亲。这一次地权转移,乃系孙氏家族内部的土地买卖。

二、清同治二年(1863 年)广东香山县孙达成等批瑞英祖山埔开荒合约

一

[原文]

立明合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蓢山埔壹段,嗣孙孙达

成、学成与房长尊贤、国贤同众叔侄商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开荒围园，不用丈量，税亩为限，任达成、学成围筑以种果物，限以伍拾年为期。达成、学成所筑园及种果物等项费用本银若干，乃系达成、学成二人事。众议愿抛荒伍年，任达成、学成种植，倘得利，乃系达成、学成收回自用。如满伍年抛荒期，由第陆年起，此园每年所出果物、利息若干，俱要登明，大部当祖炉前算数，贰八均分，每两〈银〉瑞英祖份下该得贰钱，种植嗣孙达成、学成二人份下该得八钱。或有异言，又不得强霸植此园。园内□□所种等物，不关瑞〈英〉祖之事，乃系达成、学成前所费用，本银俱化为乌有。此园及种果物等项俱归果园瑞英祖管理为业，集众再酌另行发批，以价高者得。恐口无凭，今立合约贰纸，种植达成、学成收执壹纸为据。

一批卖果之银每月每年经份为凭。

一批明瑞英嗣孙执壹纸。

房长尊贤的笔

弟国贤

弟业贤

侄茂成

同治贰年拾月十三日立

二

[原文]

立明合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蔭税山埔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无庸丈量税亩，任达成、学成、观成围筑以种果物，限以伍拾年为期。今围园及种果物等项费用，本银若干，乃系达成、学成、观成自出。众议愿抛荒伍年，任达成、学成、观成种植，

所出利息，仍系达成、学成、观成收回自用。如抛荒期满者，此园每年所出果物、利息若干，俱要登明，大部当祖炉前算数，式八均份[分]，每两银瑞英祖份下该得式钱，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三人份下共该得八钱。或园内所种些瓜菜等物，乃系达成、学成、观成收自用，众无得浅见，多生异言；又不得强霸占植此园，须待至五拾年期满之日，达成、学成、观成将此园及所种果物等项送还瑞英祖管理为业后，集众再议，另行发批开投，以价高者得。前达成、学成、观成费用本银，亦不得追究填还，化为乌有矣。恐口无凭，今立合约式纸，房长尊贤执壹纸，种植嗣孙达成、学成、观成执壹纸，永远为据。

合　约

同治叁年式月十式日立

国贤

尊贤　　学成

房长业贤　　种植嗣孙达成

茂成　　观成

[释文]：合约系孙中山(1866—1925 年)父达成(十七世，1818—1888 年)、叔学成、观成和房长尊贤(十六世)叔侄于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1864 年 3 月 19 日)所立。约文载明达成兄弟三人，经房长尊贤等同意，批到十一世祖瑞英遗下迳仔蔭税山埔一段，“开荒围园”，言明期限五十年，任达成兄弟围筑以种果物，开荒本银，由达成等自理，五年内不收租银。五年后，每年所出利息，二八均分：祖尝二分，达成兄弟三人共得八分。五十年期满，达成须将山地及所种果物全部交还瑞英祖尝名下，由经管人另行发批，用投标方法，批给出价最高的人，达成兄弟不得追索开荒费用本银。

据翠亨父老回忆，孙中山出生前，家境困穷，一家数口，赖佃耕二亩六分地过活，不得已，才从祖尝名下批得山地一段开荒，种植果蔬，短期间当然不能对生活有多大的改善，所以在孙中山五岁时（1871年），他的大哥孙眉即被迫远赴重洋到檀香山充当雇工。

从合约中可以看出广东封建势力通过公尝田的一种剥削方式，三埔荒地也不例外。开荒期间租额虽不大，但一经期满，即全部收回，另行发批，价高者得，对族内贫户，特别对原开荒户并无优待。

据翠亨《孙氏家谱》，孙氏始祖居东莞县长沙乡，五世礼赞迁香山县涌口村，十一世祖瑞英再由涌口村迁永宁迳仔蓢村。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否认此说，然该合约证明罗说谬误。

合约两纸，由孙中山姊妙茜保存。解放后，其孙检出交当地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保存，馆长李旭昭以一份赠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纪念室。翠亨村故居另藏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立合约一纸，内容与同治三年约完全相同；惟承租人，同治二年的为达成、学成二人，不及观成，想系草约。同治三年二月改写，始正式成立。

谈谈孙中山的思想和孙中山研究的有关问题*（选录）

尚明轩

……十月中旬在北京开的“孙中山与客家精神”，……由四、五个团体联合召开，有文化部的华侨文化促进会、社会科学院的侨联和香港的国际科技学会等。……孙中山与客家精神，客家是个社会群体，一般泛指从中原地区由于战乱、天灾人祸而远迁的一部分人，他们有地域，有风俗习惯，有自己的语言，有一定的局部地区。客家人在全世界有一千一百多万。他们有一定的客家精神。他们被迫南迁，因为战乱和天灾人祸，在明末清初南迁去的，所以他们的凝聚力很强。我们说客家精神，就是指他们的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和爱国主义精神。把客家精神与孙中山联系起来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罗香林。他写了一本《国父家世源流考》。他说孙中山是客家人。以后他的文章又模棱两可地称孙中山不完全是客家人。所以孙中山是不是客家人就成了一个问题。深圳今年要出的挂历，全是客家人，如叶剑英、叶挺、廖仲恺等。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个大问题，但搞清楚也有好处。中山大学有个教授叫邱捷，到翠亨村深入调查、研究和访问后提出，孙中山的祖辈究竟是从东莞来的，还是不是从东莞来的，有不同的说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认为，邱捷这篇文章可以说明孙中山不是客家人。因为客家人有几个明显表现，如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孙中山

---

* 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1997年第1期。

不讲客家语言，客家人是逃过去，妇女是不缠脚的，而孙中山从小就反对姐姐缠脚。邱捷的文章，同志们有机会可以翻一翻。经过反复考证，否定了孙中山是客家人。既然孙中山不是客家人，把孙中山与客家精神联系起来，就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深圳挂历到的时候，我说不是的，他们马上就撤掉了。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名人效应，到处争名人。孙中山是不是客家人，并不影响孙中山的伟大和他对中国历史推进的影响作用。……所以说，以“孙中山与客家精神”为主题召开研讨会是欠考虑的。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代表全国几万万中国人民，那何苦要加一个客家人？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 (选录)

邱 捷

众所周知,关于中山先生的祖籍,有紫金与东莞两说。紫金说是已故知名学者罗香林先生提出的,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作了详尽的论证。② 本人虽赞成东莞说,在中山先生祖籍这个学术问题上与罗先生的意见有所不同,但对他的学术建树十分景仰。不管我在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上的观点是否正确,对罗先生的学术地位自不会有任何影响。笔者正是本着罗先生尊崇中山先生的精神及对有疑点的学术问题应该寻根究底的主张,才对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再作探讨的。前几年主要依据翠亨孙中山故居保存的文物,以及对翠亨一带的调查考察,再结合有关文献,发表了一些论文。③ 本文则拟着重反映《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前有关中山先生祖籍问题的记述及讨论;此外,对中山先生关于家族问题的言论,也谈一些浅见。

---

* 据(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编:《第二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1999 年 5 月版。

② 最早的版本是 1942 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③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与李伯新合作)、《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等。以上三文均收入拙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一)

目前,"关于(中山)先生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① 无论是学者,还是其他方面的人士,似乎仍有人对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不甚了解。例如,前些年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东莞说是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民党党史会)提出来的,其依据是邓慕韩"摘抄拼凑"的《孙总理家谱》。② 持此说者在文章中没有注明出处,不过,东莞说无论如何不是出自邓慕韩或者是国民党党史会。

据笔者所知,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前披露的中山先生关于祖籍的自述,仅有出版于 1925 年的美国人 Paul Linebarger(林百克)之 *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中译本名《孙逸仙传记》)一书一段话:"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s.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in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③

在 1926 年出版的徐植仁的中译本中,上面的话译为:"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

---

①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第三次增订版,第 2 页注。

② 潘汝瑶、何国华《孙中山祖籍争论的始末》,广州,《岭南文史》1993 年第 2 期,第 44 页。

③ Paul Linebarger, 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5, p5.

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Kung Kun)里。"①

对照原文,徐植仁的翻译显然不确切。最后一句,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我们祖祠所在的村庄,在东江之 Kung Kun"。问题是 Kung Kun 是什么地方。罗先生本人曾认为 Kung Kun 乃 Tung Kun 之误。他在《客家研究导论》第 8 章转引了这段话,并加了个注说:"Linebarger 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 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 Tung 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②

罗先生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常事,当然不可用他早期的论点作为否定他后来论点的依据,但于此也可见,东莞说在当日其实是谈论中山先生祖籍者的共识。

既然英文是 Kung Kun 而不是 Tung Kun,即使同意罗先生早年的说法,中山先生的这段自述也不可以作为东莞说的重要依据。不过,翠亨故居保存的《孙氏家谱》有"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的记载。这本家谱是孙妙茜姑太留下的,已故的翠亨故居纪念馆负责人李旭昭先生,以及仍健在的杨连逢先生(孙妙茜之孙)在给笔者的复信中,对家谱是否妙茜姑太遗物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③这本孙老姑太保存的家谱,当是东莞说的主要来源。不过,家谱本身有不少矛盾抵牾之处。笔者虽赞成东莞说,但完全知道,有关谱牒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

①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开智书局 1926 年版,第 3 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广东兴宁,希山书藏 1933 年印本,第 264、274 页。

③ 杨先生在 1987 年 11 月 2 日给笔者的复信说,"翠亨现存的《孙氏家谱》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底交给故居的,该家谱是家祖母在世时一直保存的,它联(按,当为连之误)同孙家开荒合约和记事部一齐用一箱子包起来放在柜里保全(按,应作存)的,家祖母每年也叫我们拿出来晒一次。(恐怕虫蛀)"

三十年代记录的一些中山先生直系亲属的意见，大概是时人普遍接受东莞说的重要原因。

1931年4月26日，国民党党史会的钟公任到翠亨采访，事后在《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中记录了孙妙茜的一段答问："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①]这段答问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相合。

1932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出版，其"一岁"条关于中山先生的先世的记载是："……十五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珠玑巷，后与莞伯何真公善，复偕子贵荣桂华贵绍贵武，至东莞员头山居，乃为来粤之始。十四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迄明代。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香山县，即今所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再迁镇内翠亨乡，居迳仔蓢，建宗祠，明祀典。顾丁口甚稀，老壮多外出，未几而宗祠以圮……瑞英公以降，六世祖建昌公，五世祖迥千公，四世祖殿朝公，曾祖恒辉公，祖敬贤公，历世未显。父达成公。"

这里的世次是以中山先生为准上溯计算的，同一般谱牒刚好相反。其中错误不少，例如六世祖（按谱牒是十二世祖）连昌公就误作"建昌公"。《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印行后，国民党党史会曾向中山先生的亲属、故旧征求意见，事后编成《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对前面所引之记载，邹鲁、王云五、何炳松、陈紫枫、孙科、陆灿、邓慕韩、吴醒汉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以上各人，无一人对东莞说有异议。孙科的签注只是把"分居左沙头"改为"分居左

① 笔者并未直接看到钟公任的报告。所据为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读an）1944年2月9日之工作日记（日记藏广州之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中的摘抄。

坡头”。[①] “坡”字非常见字，孙科先生做了改动，可见他细读了这部分内容。左坡头孙氏源出东莞，日后，罗香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写了一章“国父上世与左坡头同源说之非是”。但孙科先生在签注时是接受翠亨孙氏与左坡头孙氏同源、翠亨孙氏祖籍为东莞之说的。孙科先生后来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接受紫金说，今日这点常为持紫金说者所强调。但也应看到孙科先生曾接受东莞说。[②]

中山先生长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先生、孙乾先生则一直坚持自己家族的祖籍为东莞，几十年没有改变。1933 年 5 月 22 日，孙满、孙乾偕同邓慕韩到东莞上沙调查先代世系。[③] 他们当时都是已经担任公职的成年人，如果不是认定东莞为祖籍，自不会去东莞。

尽管近年有些著作提到，一些知名人士早在中山先生生前已经知道翠亨孙氏的祖籍为紫金，但如果看产生于《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之前形成的记载，这些说法很难找到印证。三十年代，东莞上沙与员头山发生争认中山先生祖籍之事。其时，同中山先生关系极为密切的胡汉民、邓泽如等人仍健在，但没有一个人对中山先生祖籍为东莞的说法表示怀疑。由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林翼中具名的致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公函也只

①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1933 年 5 月印本（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二部“关于各年之签注”，一岁条。

② 四十年代末，孙科先生又为东莞上沙题写了“国父先代故乡”，今此牌坊已无存，但尚有照片。

③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 14 期（1933 年 3 月），“重要公文”栏，第 30 页。

是附上上沙、员头山争认的全部文件请其核办而已。①

不过,这次上沙与员头山争认之事,也暴露了东莞说的一些问题。看来,翠亨孙氏祖籍为东莞,主要是来自祖辈的口碑相传,翠亨《孙氏家谱》固然问题不少,而东莞方面提供的谱牒,疑点更多。当时高良佐先生已经指出,东莞方面提供的一种由十三世孙立宝、孙立国在道光十三年修成的所谓《总理家谱四修谱序》,其内容与翠亨孙氏绝无关系。而在世系图中"连昌"一再误作"建昌"(邱按:显然是来自《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员头山的孙洁生称,"上沙孙族家谱,本极简单,而于分支香山之支独详,且为后日增添补缀者"。高良佐于是作出判断:"可知关于总理先族故乡传说不一者,实由于史料本身欠健全,又未经精详之调查与考证,故皆可逞其私见而自立其说也。"② 这些情况罗香林先生也注意到,所以,他对东莞说由接受到怀疑、否定,也是事出有因。

综上所述,在罗香林先生提出紫金说之前,中山先生的祖籍只有东莞一说,而争论则在于是东莞的员头山还是东莞的上沙(据东莞孙氏的谱牒,两地孙氏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

(二)

罗香林先生曾经到翠亨作过几天调查,见过《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知道翠亨孙氏自十二世祖连昌公以后才有系统的记载,又可能了解到翠亨附近客家村的居民很多是从紫金迁来的,加

①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栏,第21~22页。

② 高良佐:《总理先族之故乡及世系之研究》,《建国月刊》第9卷第6期(1933年12月)。

上有翠亨孙氏是个客家家族的先入之见，便猜测“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①

几乎在《客家研究导论》出版的同时，发生了东莞上沙与员头山争认祖籍之事，其时披露的各种谱牒资料，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罗香林先生逐渐对东莞说产生怀疑。他在1938年2月出版的《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发表了《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考》一文，对自己几年前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认为 Kung Kun 乃 Tung Kun 之误的说法作了修正，认为“总理先世既未必与左垌头孙氏同，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并提出“Kung Kun 既为东江区域之属地，按其地望似即指永安县之公坑或公坑嶂而言，永安即紫金县，公坑在永安东部琴江都，自公坑至其东北邻地中心坝，皆有孙氏居住”，这种“假定之解释”，实际上已经认定紫金是中山先生的祖籍了。

此后，罗香林先生托人“为致函紫金各界，详为调查”。他的朋友李蔚春出任紫金县长，该县孙桂香等提供了一种据称是光绪二年紫金孙氏族谱的抄本，罗香林先生于1941年8月1日看到这一抄本。② 这个族谱抄本提到忠坝孙氏祖墓、祖祠有如下记载：“所遗祭田，小土名林塘肚。又忠坝公馆背，灌水塘，杨坊矿石屋下三坟地。旱塘仔即上镇约开基之始祖也。分四房：长房祠堂上孙排，二房祠堂上袁田，三房祠堂下孙排。黄牛挨磨，即开基祖祠是也。”

---

① 《客家研究导论》，第264页。罗先生在同书第274页之注22提到：“我另有翠亨乡调查报告书，将在《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月刊》第2卷第2期发表。”但该期月刊及以后几期均未见罗先生此文。

② 参看《国父家世源流考》书末之“注四”、“注五”。笔者写此文用的版本是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出版的《国父之家世与学养》（收《国父家世源流考》与《国父之大学时代》两书）。

同时,族谱抄本有"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的记载。[①] 因为其中有"公馆背",罗先生认为这就是"公馆村",与 Kung Kun 相合;而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所记,第一位是十二世祖连昌公,罗先生认为即紫金的琏昌,从而得出中山先生祖籍是紫金的结论。对罗先生的论证,研究中山先生家世的学者都了解,而《国父家世源流考》也非难见之书,因此,本文对罗先生的论证过程就不详为引录了。

可见,罗先生原来是接受东莞说的,但又猜测紫金为更早的祖籍;后来则排除东莞,认定紫金。从提出紫金某地可能是中山先生的祖籍,到发现紫金孙氏族谱抄本,其间经过了七八年;如果有人想要伪造的话,那么罗先生前面的猜测或假设等于提供了线索或依据。然而,因为当事人恐怕都已作古,其中的细节已无法查考;而对罗先生本人的学术道德,更不应有所怀疑。因此,在讨论中山先生家世源流时,大家都把紫金孙氏族谱作为来源可靠的资料看待。但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即使紫金孙氏族谱是真的,它也与翠亨孙氏无关。罗先生据此而作出中山先生祖籍为紫金的结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很难成立的。

Linebarger 所记录的那段中山先生的自述,无论在英文原本或中文译本,都并无中山先生自述"在东江公馆村"的文字。如前所述,那段自述较准确的译法,应为"我们祖祠所在的村庄,在东江之 Kung Kun"。一般中国人讲自己的籍贯,通常是讲省和县(有时也说州、府),所以罗先生开头说的 Kung Kun 乃 Tung Kun(东莞)之误,对照原文,应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按罗先生后来的意见,翠

① 见《国父之家世与学养》中之《国父家世源流考》卷前之"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氏族谱旧抄本摄影之一、之二。标点按该书第 14 页。

亨孙氏在迁移过程中已经忘记祖籍的县名，而仅记住了公馆村一小名。[①] 这种情况在中国人中是极为少见的。笔者在1992年1月同本校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教授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先后任馆长的李伯新、萧润君两先生对翠亨附近的居民作过调查。据甘水连、甘国雄、甘桂明等人介绍，翠亨村附近的客家村以姓甘的最多，甘姓祖先是从紫金迁来的，他们都从长辈处得知紫金为祖籍，但祖先从什么村、何时迁来就不清楚，可能有三四百年了。[②] 如果真如罗先生所说，翠亨孙氏是康熙中叶之后始从紫金迁到翠亨，那么，到中山先生的祖、父辈，其间不过百余年，中山先生的祖父敬贤公还很重视风水，在附近有众多紫金同乡，乡亲们都没有忘记祖籍的情况下，唯独翠亨孙氏把祖籍在何县都忘记了，要由族外人士日后重新考证，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再细读紫金孙氏族谱前面所引的文字，我们可知，“公馆背”只是一处祖坟所在地的小土名，祖祠则在上孙排、上袁田、下孙排、黄牛挨磨等处。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祖籍的村庄，按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是“紫金（永安）县琴江都上正（镇）约中坝孙屋排村”（现在的地名是紫金县中坝发昌乡孙屋排），并不叫“公馆村”。如果说，翠亨孙氏在迁入百余年后，就已经把祖籍的县、都、约、乡、村五级地名都忘记了，只记住一处祖坟（不是家庙）所在地的小土名的前半截（“公馆背”也不等于“公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合情理的。

就算“紫金县琴江都上正（镇）约中坝孙屋排村”即是“公馆村”，也与前引中山先生的自述无关。这个所谓的“公馆村”在紫金县东北角，位于韩江支流琴江上游，只能算是“韩江公馆村”而非

① 《国父之家世与学养》中之《国父家世源流考》，第15页。

② 邱捷整理之访问记录（1992年1月13日），藏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东江公馆村"。

而紫金的十二世祖琏昌是否就是翠亨的十二世祖连昌呢?"琏"、"连"的不同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即使紫金孙氏真有一位十二世祖琏昌,也与翠亨孙氏十二世祖连昌的年代不合。按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1669年(康熙八年己酉);但紫金的琏昌则据称参加过发生在顺治初年(约1646年)的钟丁先抗清起事。[①] 紫金方面提供的史实成了中坝琏昌并非翠亨连昌的铁证。因此,紫金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无论如何都无法相接。

紫金中坝孙氏是客家人,但中山先生的先辈,在没有客家人的涌口、翠亨等村居住,而不是住进附近的客家村(翠亨三面都被客家村包围,其中多数人祖籍为紫金,而翠亨的居民则全讲本地白话)。在中山先生这代(十八世)以前,翠亨孙氏只与讲本地白话的家族通婚,而不与附近的客家家族通婚。翠亨孙氏平时讲广州话系统的白话。[②] 翠亨孙氏所有祖妣的墓碑都称安人,而不是像一

---

① 《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吴铁城序称:"……又十二传,有讳连昌公者,以连世参与反清义师,兵败流散"。陈立夫序称:"连昌公父子,则御外寇于明季矣"。罗先生在第五章"紫金忠坝孙氏之源流与迁移背景"虽未明言琏昌参加抗清之事,但提到忠坝孙氏之十一、十二世多参与抗清义师。后来,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再证》中说:"更知连昌公父子,且尝于顺治康熙间,随明解元钟丁先起义抗清"。(见罗香林编:《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第388页)《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紫金,1986年印行)多处提到紫金之"连昌"参与抗清之事。紫金当地人张玉杰、陈国岐写的《孙中山祖籍紫金中坝的名胜古迹》称尚有"连昌"抗清之遗迹。(广州,《岭南文史》1989年第2期)。可见数十年来持紫金说者都引述紫金之琏昌参与顺治初年抗清的史实。

② 中山先生粤语讲话录音的中山白话口音相当明显。又,笔者曾经向孙满先生(孙眉长孙)、杨连逢先生(孙妙茜之孙)请教过,两位都肯定地说,翠亨孙氏的前辈讲白话,不讲客家话。

般客家妇女的墓碑那样称孺人。客家妇女不缠足,而在清朝时翠亨孙氏的妇女是缠足的,而且,中山先生反对给妹妹缠足时,孙母杨太夫人用只有客家人才不缠足的理由来说服儿子。[①]在昔日乡居(而且附近有大量紫金小同乡)的条件下,一个客家家族不会迁出原籍百多年就把语言、习俗改变殆尽。可见,翠亨孙氏并非一个客家家族,这点,也是中山先生祖籍并非紫金的有力论据。

因此,仅仅对紫金说本身的论据作分析,即可推翻其说。更何况我们研究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本应依据翠亨孙氏本身的各种文物文献上溯探求,而不能无视这些文物文献。翠亨故居保存的家谱、契据、帐册,都足以证明翠亨孙氏在明朝时已经在香山居住,并非十二世始从外地迁来。十二世以前的祖墓,不少仍存在,与十二世以后的祖先同葬一处。这些文物文献,更进一步证明紫金说不能成立。[②]

《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各方反应不一,既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在国民党党史会内也有不同看法。据党史会纂修林一厂工作日记所记,在党史会工作的邓慕韩、孙镜、莫纪彭诸人反对把《国父家世源流考》中的"国父家世源流图表"附入《总理年谱长编稿》内。[③] 孙镜甚至"欲请委员会议决禁止该书出版",莫纪彭、龙毓峻诸人也赞成此种建议。许师慎仍主东莞说,"谓彼能查出总理民元往东莞证物"。林一厂则认为对罗著"不必禁止,只要作为史

① Paul Linebarger, 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 p81.

② 论证请参看拙文《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与李伯新合作)、《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等。

③ 林一厂之工作日记,1944 年 1 月 31 日。

料，俟本会将来派员赴翠亨、紫金、增城等地复查为妥”。[①] 林调阅了包括钟公任的《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等资料，连同《国父家世源流考》详细抄录对照比较，在阅读时便打算拟草一篇文章，认为对罗著应“指明其有可疑之处，但不能遽推翻其说，须俟派员复查”。[②]后来他动笔写作《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点》一文。[③] 复查结果如何，限于见闻，笔者无从揣测。但从此之后，就一直存在东莞说和紫金说的争论了。

① 同上，1944 年 2 月 22 日。
② 同上，1944 年 3 月 4 日。
③ 同上，1944 年 3 月 10 日。

中华姓氏录·孙*（选录）

杨师群

四、孙中山家族先祖与迁徙路线

据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和孙科《八十述略》诸书的考证和记载，该孙氏族人的先祖是晚唐僖宗时期的中书舍人及两浙节度使孙拙，族人长年居住于河南的陈留郡，即今河南开封东南的陈留县。孙拙的儿子孙诇，很贤达能干，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举事时，孙诇为承宣史，带兵去平息义军，征战于闽越江右之间，英勇善战立了军功，被封为东平侯，驻军于虔州虔化县，即今天的江西宁都县。由于治理地方成绩显著，老百姓安居乐业，当地人都挽留他，于是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由是孙诇便成为该孙氏族人由豫入赣的南迁始祖。

1984年前后，广东中山市中山研究会专门组织进行了孙中山家世的调查，在江西省宁都县田头乡孙屋底村孙世龙家发现了5卷本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① 里面记载了该孙氏家族从晚唐到明永乐年间在河南、江西、福建一带的迁徙繁衍情况，其中也是将唐中书舍人孙拙之子孙诇作为由豫入赣的南迁始祖，有关史实考证与上述记载大致相同。而其谱名所谓“富春孙氏”的记载，说明该族应是江浙富春孙氏的后裔。另外，如广东兴

---

* 据杨师群：《中华姓氏谱·孙》，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① 编者注：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从未组织过此类调查活动，《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的发现，亦与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无涉。

宁《章峰堡孙氏族谱》等，也都记载有孙拙、孙诇父子，及其世居河南陈留和选将南征诸事迹。

查《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 15，唐朝后期有《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乐安孙公墓志铭》载："公讳拙，字几玄，武水乐安人也。"据碑文记载，孙拙曾祖父孙会，官至吏部尚书；祖父孙公 x，以工部尚书致仕；父亲孙璜，为御史中丞。孙拙进士及第后，历任监察御史、右补阙、河南府长水令、殿中侍御史诸官职，政绩不错，声闻京师，后又拜中书舍人，金紫出使浙越。晚年，授西都留守副使、检校礼部尚书，直至后唐初年拜工部侍郎。粗略一看，此人主要在唐僖宗、昭宗朝为官，且官拜中书舍人，出使浙越，应即为孙诇之父无疑。这样的话，该支河南孙氏应来自山东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应为乐安孙氏之后，并非富春孙氏，且世代为显宦，灿然一高门大族。

但仔细考孙拙的生卒年，碑载：孙拙"以天成元年岁在丙戌五月十二日薨于洛城税舍，享年 69 岁。"就是说他生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 857 年），死于后唐天成元年（公元 926 年）。而黄巢起义是在公元 875－884 年，孙拙此时是 18－27 岁，如说孙拙本人率军与起义军作战，还勉强能成立；而说此时孙拙之子已为将官，率军去平息起义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碑中也没有孙拙子孙的记载，只是笼统地说："嗣子尽心全孝道，志在保家，仰奉训慈，专营大事。"孙拙葬于河南县平乐乡张扬里，俯祖坟旁，也非陈留郡人。这样便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孙诇不是中书舍人孙拙之子；要么在唐朝后期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孙拙，且都官任中书舍人。可以推测，后者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我们再查一下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中所载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 1767 年）所撰《先祖孙诇公五修墓志》，碑文

说:“宁之有吾孙氏也,以鼻祖讳诜于唐僖宗中和间,因黄巢之寇,充承宣使,提兵江右,略地至是。民皆安堵,父老遮道请留,遂家焉。”其后是孙诜子孙的详尽记载,而对其父祖,却只字未提。它只能说明,直到清朝前期,人们还不能肯定孙诜祖上的情况。其实,孙诜能率军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其年龄至少与孙拙相差不多,而将中书舍人孙拙找出来,作为孙诜之父,那是后来修谱之人惯用的手法。查一下地图,该族人所居河南开封之陈留,离先秦卫国孙氏当时的世居之地:汲郡(今河南汲县一带),只有五六十公里,应该说相当靠近,所以唐代的河南陈留孙氏也很有可能是先秦卫国孙氏之后。

该《修族谱》记载,孙诜约在唐光启四年(公元 888 年)被封为百将东平侯,即定居江西宁都,生子孙实,实生七子,其第三子孙士元生孙有敬,有敬第一个由江西宁都迁居福建长汀河田,成为孙家由赣迁闽之始祖。此后,孙家在闽历居四代,直到明永乐年间,孙有敬的第四代孙即为孙诜的第七代孙:孙友松由福建迁徙到广东紫金县忠兴坝落户,成为孙家由闽入粤的始祖。这一记载中,有关迁徙路线应大致不错;然而其世系肯定有误,就以孙友松于永乐初年(公元 1403 年)迁粤计算,从孙诜至孙友松共八辈人,而经历了 500 多年,平均每代相隔 64 年之多,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以一般 25 – 30 年为一代计算,其中应相隔了 17 – 20 代人。

而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中考证出,《宁都南门外直街孙氏族谱》载,孙诜公有第四世孙曰承事者,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其余各房则无迁福建者。孙科《八十述略》中说,孙诜五传至承事公迁闽。总之,是孙承事或其后裔迁闽,与孙诜相差 5 代以上,这样反而比《修族谱》要合理一些,而孙承事再传至十几代才至孙友松迁粤。

孙友松入粤后的家世迁徙情况，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载考证得比较详细：以孙友松为入粤始祖，至十一世祖孙鼎标，时值明清之交，鼎标随钟丁先起义抗清，虽英勇善战，然终不敌清兵。孙氏族人为避免战祸，纷纷离散流徙。鼎标次子、十二世祖孙连昌迁居增城，康熙中叶再迁居香山县涌口门村，成为孙家入香山之肇祖。再传两代，连昌之孙、十四世祖孙殿朝始由涌口村迁入翠亨村，成为翠亨村孙家之开基祖。再传三代：十五世祖孙恒辉，十六世祖孙敬贤，到十七世祖孙达成便是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生于1813年，从孙友松1403年入粤，经100余年，传17代。以后，孙中山及其子孙科都出生于翠亨村。

从地图上鸟瞰，孙中山祖先家族的迁徙路线稍有曲折，而由北往南之方向却是明显的。不过，该族人在进入南方后，其支脉也逐步分散迁徙。紫金县忠兴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载孙见龙撰谱序说："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雩都城内，或居本郡，或居雩都青塘、或居安远。……积德后昌，生齿日繁，其子孙遂多莺迁。"该孙氏族子孙散居于赣南、闽南与粤之东北部为多。

……

三、广东孙氏源出多支

在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将孙中山的家世考实出版之前，许多人认为总理家世是源于广东东莞孙氏。如胡去非《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字允中，谥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真之聘，至广东东

莞任西席，遂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华贵公，合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

即是说该支广东孙氏先祖为北宋之孙固，他先去官谪居江西，其后裔十五世祖孙常德，为元末明初人，始迁广东东莞，此说有东莞诸乡的族谱为据。再如《西南党务月刊》十四期上，经东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修正后的《总理始迁祖一案》，更将其世系表排列了出来。其中列出孙常德迁粤后四子的分徙状况：孙贵武居肇庆，孙贵绍居惠州三株竹，孙贵华居东莞上沙乡，孙贵荣居东莞员头山。同时，东莞县长邓庆史派人调查了上沙乡孙氏宗祠的先祖牌位，确是由孙贵华为始祖，后裔依次排列。另外，中山县左坡头孙氏名谱亦载始祖为孙常德，也为同源。可见这支孙氏的后裔在广东分布较广。实际上，至今仍有人坚持孙中山家族源出东莞之说法，并对罗香林的观点提出种种质疑。不过，经罗香林详尽考证后，绝大多数人已认同该支孙氏族人并非孙中山家族之先祖。

又以中山县小榄孙氏为例，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谓：“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爰及有明三卫兵移居小榄，永奇与弟永源同隶后卫陈宪旗下，遂家焉。分三房，现历二十四代，丁口二百有奇。”1912 年 5 月 11 日，在广州举行欢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回广东的“孙族恳亲会”上，宣布员孙龙光在演说词中道：“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枝派虽同，毫无联络。”其实，广东各姓氏几乎都有从“南雄珠玑巷”迁粤的传说，该“巷”作为广东北部与江西交界的交通门户，对移民的南迁具有象征意义，是一个理想的南移民居集结地，然后再分散迁徙。所谓“枝派虽同”也只是一句联络感情之语，而此恳亲会有广东各地孙氏族 200 多人参加，就可见其枝派之繁。

再如《榕冈孙氏世系图谱》谓，其先祖孙乙为孙觉的嫡孙，江苏

高邮人,绍兴三年进士,授广东揭阳县令,遂占籍于揭阳榕冈。宋末元初,其族人为避难,散居于惠来县华湖镇、潮阳市成器镇及沿海之海丰、陆丰等地。《吴川孙氏重修族谱》称,其为富春孙氏后裔,世居江西饶州鄱阳县。先祖孙祥任福州知府,家族遂迁居福建古田基巷仁寿里。再由闽迁粤,居化州(今广东化州县)之龙塘,又迁茂名落户,最后由茂名迁吴川(今吴川县)油麻坡。可知,广东孙氏族系派别之不一,主要为宋末以来北民南迁运动之结果。如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所指出:"考广东各地孙氏多系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

孙中山研究* (选录)

王 杰

……

(1)家世源流。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史学界即存在着不同看法,一主紫金说(以罗香林为代表),一主东莞说(以邓慕韩为代表),紫金说得孙科及国民党政府的认可而几成定论。多年后,有论者以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氏的"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从而再次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① 对这一考证,仍有人重申"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② 主东莞说者再次以翠亨故居的各种谱牒、契据、碑记、孙氏祖墓以及孙氏家族成员的口碑材料,乃至紫金方面的资料,印证和论述孙氏祖籍不是紫金,孙家的先世并非清初来自紫金的客家人。③ 此后仍有争论,但基本论点没有超出原来的范围。④

……

---

* 据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 4 月版。

① 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山大学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② 潘汝瑶、李虹冉:《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客家与客家人研究》1989 年第 1 期。

③ 邱捷:《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中山大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

④ 参见潘汝瑶、何国华:《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岭南文史》1993 年第 2 期;邱捷:《也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岭南文史》1993 年第 4 期。

一代天骄——孙中山的历程*（选录）

尚明轩主编

孙中山先世迁来香山县以前的祖籍在何地呢？

根据《孙氏家谱》的记载：孙家的“始祖、二世、三世、四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墓碑作瓒）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坡头，乐南居涌口……”以往，从翠亨孙氏历代口碑相传及《孙氏家谱》，人们都认为孙中山祖先是在明代从广东省东莞县迁移到香山县来的。本世纪30年代一些刊物所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先世状况的文章，以及一些成书如《总理事略》等，均采是说。因此，这一说法已成定论。但是，自从1942年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出版后，长期以来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便出现有东莞、紫金两说。罗香林否定孙中山祖先从东莞县迁来香山的成说，提出孙氏十二祖连（琏）昌公于清初从广东省紫金县经增城辗转移居香山的论点。在近半个世纪中，这一问题一直有争论，到80年代，海内外均有学者发表著作研究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东莞、紫金也分别公布一些史料。饶富兴味的是，事隔40多年后，还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邱捷等，依据翠亨孙中山故居的文物及其他可靠文献和调查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认真研究，明确地指出：罗香林“对引起自己假设的各

* 据尚明轩主编：《一代天骄——孙中山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第3版。

种资料并未仔细研究。由误会引出假设,用经不起推敲的孤证资料来证明假设,证明的方法又纯为推测,这样,当然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来。因此,即使没有反证,罗先生的论点仍是难于成立的。何况,有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先生的论点是错误的。"从而辨析了罗书的错误,又否定了紫金说,再次认定孙氏先世于明代已从东莞迁居香山,并非清初始从紫金迁来。①

邱捷、李伯新在《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一文中指出:"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来看,翠亨孙氏在明代由东莞迁居香山是可以肯定的,孙氏在香山定居后各代名讳,是大致清楚的。上述结论,无论如何较之罗先生的翠亨孙氏在清初始从紫金迁来的说法更有根据。罗先生提出的唐代孙诩开始的河南陈留——江西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广东增城——广东香山的所谓'国父家世源流',是缺乏根据,不能成立的。"他们还说得好,孙中山"由一个农家子而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领袖,是他所处的时代造成的,也是他自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奋斗终生的结果。家世的影响,主要是使他从幼年起便体察到人民的苦难,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培养了一些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品质。……如果硬要从不存在或不确切的远祖那儿去寻找孙中山'聪明睿智'的根源,未必对尊崇孙中山有何种益处。"

至于孙中山是不是客家人呢?也是一个长期以来颇有争论而

① 参见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 年第 4 期;邱捷:《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载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丛》第 5 集,1987 年;邱捷:《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 年第 3 期。

又迄今尚未完全认识一致的问题。

所谓客家，一般泛指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两宋之间）这三次中国历史上因战乱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迁徙到南方，定居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汉人。由于这些地区交通闭塞，相对安定，使数以万计的客家先民能在战乱中得以生息发展，并形成了稳定群体——客家民系。客家作为汉民族内的一个特定方言群体，总体上是北方汉族人民南迁的产物。

对于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近年来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抒己见，进行了专题深入的探讨，发表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文章。应该说，八九十年代之交，邱捷根据孙家的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等各种资料，与客家独特的方言和宗教信仰、生命礼俗相对照所作的考证，例如孙家讲本地白话而不是讲客家话；孙家居住在讲白话的翠亨村而不住在附近的客家村，孙氏上世住过的涌口村也不是客家村；孙家连续几代与本地讲白话的人通婚而不与附近的客家人通婚；孙家的风俗习惯（像妇女有缠足陋习等）与一般客家人不同等，而得出的结论，即指出孙中山不是客家人，符合于历史的真实，是可信的。

最近，仍有人把孙中山作为“客家先贤”，说孙中山“身上就体现着客家精神”等等，似乎就有点过于强调“名人效应”之嫌了。其实，孙中山不是客家人，既不会减低他具有的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和爱国主义等精神（华侨也同样具有这种崇高精神），也不会影响客家人对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

孙中山评传*（选录）

茅家琦等著

孙中山前五世谱系是十分明确的。孙中山的祖先殿朝公(1745～1793)迁移至翠亨村，成为孙家入翠亨村的开基祖。到孙中山诞生时，孙氏家族在翠亨村已居住五世，将近100年了。①

孙中山家世源流如何？从哪里迁来香山县的？学术界有两种说法：紫金说与东莞说。

历来认为孙中山的祖先在明代从东莞迁居香山。首先否定东莞说，提出紫金说的主要人物是罗香林。1942年，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罗香林在重庆出版了《国父家世源流考》，认为孙氏十二世祖孙连昌于清初从紫金经增城辗转移居香山。

罗香林的根据主要是紫金的一本《孙氏族谱》。这本紫金《孙氏族谱》记载十二世祖讳琏昌公归居公馆背，后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罗香林又说：孙中山"曾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因此，罗香林认为，紫金《孙氏族谱》中的琏昌公就是翠亨村孙氏《列祖生殁纪念部(簿)》中所记的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于是，他作出孙中山"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县忠坝公馆背"的结论。此说得到孙科等人的赞同。1996年孙穗芳在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也采取罗香林的说法。孙穗芳在书中说：

孙家入粤以后的情况考证较细较多的，还是罗香林教授的《国

---

* 据茅家琦等著：《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① 转引自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4页。

父家世源流考》一书。②

根据紫金说，最近几年苏州孙武子研究会又推断出孙中山为孙子第70世孙。③

不赞同罗香林的论点的人士亦多。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对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说过："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此说与翠亨村《孙氏家谱》所记符合。孙眉之孙、孙中山的侄孙孙满始终坚持认为翠亨孙氏的祖籍在东莞。④ 邱捷反对紫金说，坚持东莞说，用力最深。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否定紫金说。

第一、紫金说的前提是孙中山曾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这一条不能成立。孙中山没有说过这句话，罗香林所依据的仅仅是对美国人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记》中译本的一处误译："我和我的几代近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里。"罗香林认为"龚公村"即是"公馆村"，按英文原文是：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邱捷同意如下的译法：Kung Kun 当是东莞；全句应译为："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

第二、在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无论家族文物，还是口碑相传，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过紫金。

第三、翠亨村孙氏语言、风俗与来自紫金的客家人不同，历代只与讲香山本地白话的家族通婚，居住在全讲香山本地白话的翠亨村而不住在附近大量存在的客家村。这些客家村的住户不少是

② （美）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③ 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编：《孙氏宗谱世系源流》，1996年，第315页。

④ 转引自政协东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东莞文史》第26期，1997年，第186页。

祖籍紫金的客籍人。

第四、紫金方面也提出了一条足以彻底推翻紫金说的有力证据——紫金孙氏十二世祖琏昌公参加过发生于1646年左右的钟丁先抗清起义的事实,现尚有遗址。这一点,自40年代至今从无异辞。而孙中山的祖先香山的连昌公确知生于1669年。紫金之琏昌与香山的连昌并非同一个人,当无可怀疑。①

东莞说最重要的证据是翠亨村《孙氏家谱》。据方式光说:这本家谱,是残缺不全的草稿本,"内容错漏甚多,文字粗糙,似是个尚未完成的初稿。谱中各祖妣只列出世次,多数未注明何人所出。同一世次,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也无法弄清。尤其是这个家谱究竟是谁写的?哪一年修的?如何保存下来的?至今仍然不清楚。"因此,方式光认为:紫金说"不足为据",东莞说"亦有问题"。东莞说"要成为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有待于"发掘更多的族谱、墓碑、先祖牌位及口碑材料"。② 方式光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但就目前已经见到的史料看,应该相信东莞说。

---

① 邱捷:《也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转引自《东莞文史》第26期,第190~191页。

② 方式光:《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转引自《东莞文史》第26期,第154~155页。

附　录

编者说明：因职责所在，建馆45年来，本馆业务人员注意收集资料，研究孙中山的祖籍等有关问题。但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没有收录本馆在职业务人员的研究文章，我们只是希望本书所反映的孙中山祖籍研究各方面的观点更具客观性；书中有些文章的内容涉及本馆名誉，为保持客观和文章原貌，我们还是原文照录。

但是，为了表达本馆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意见和观点，我们在档案中翻出多年前本馆答复潘汝瑶的函件（中山故居[1995]17号）作为附录；同时，也藉此回应一些对本馆的无端指责，澄清一些不必要的混淆。

因为潘汝瑶等人散发给有关部门的信件和给广东省委统战部的信（即下文所简称的“来信”），其内容大致相同；并且，与本书所收录他们的文章中捏造的本馆把过去一直陈列孙中山祖籍紫金的文物撤换掉等所谓“事实”，指我馆“伪造文物”“篡改、歪曲历史”等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这些信件中的言辞更加激烈，对本馆攻击和诋毁更加肆无忌惮，故在此不再重复收录这些信件。

中山故居[1995]17号

关于潘汝瑶、何国华诬指我馆篡改、歪曲历史的复函

市委统战部：

你部9月13日转来的8月15日潘汝瑶、何国华诬指我馆篡改、歪曲历史给省委统战部部长的信(以下简称“来信”)收到，现回复如下。

一、我馆至今所收藏的关于孙中山祖籍方面的文物及我馆经过建馆近40年来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工作均证明孙中山的祖籍在广东的东莞。(我们注意到孙中山的亲属孙科、陈淑英夫妇及其次子孙治强等三人对此问题的表态，孙中山的其他亲属也向我们反映过他们表态的背景情况。我们也注意到大多数孙氏亲属及翠亨孙族人士对此问题的意见。)到目前为止，我馆没有发现过(更谈不上陈列过)任何关于“孙中山祖籍在紫金”的文物，也无法证实“孙中山是客家人”。“来信”指我馆“弄虚作假”改变关于孙中山祖籍的陈列实属无中生有，无稽之谈。“来信”捏造种种耸人听闻的谎言，令人难以理解。

二、孙中山先生出生在翠亨村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孙中山六代之前的祖籍问题，我们始终认为是孙中山研究的一个较次要的问题，更与我馆无任何利害关系，我们无意与他人争一高低，何须“制造假证”？我馆藏文物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的集体鉴定和其他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怎可指其为伪造？客家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族的一部分，他们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

他们之中涌现了大批优秀分子。但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都说成是客家人,似不够确切。我们根据科学研究的结论说孙中山不是客家人丝毫无诋毁客家人之意,更无诋毁孙中山之意。同样,我们根据文物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以及专家意见,采取一种学术观点,怎能认为是篡改历史?

三、值得注意的是,五年前(1990年),潘汝瑶曾致函广东省文化厅厅长,诬指我馆篡改历史,我们对此问题已经给过潘汝瑶先生答复与说明。(见附件一,我们现在仍持附件一所述意见和观点。)不可理解的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潘汝瑶等却公开发表文章诬指我馆篡改历史。(见《岭南文史》1993年第二期《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始末》一文。)还有人写信到台湾和把潘汝瑶的一些文章散发到台湾,诬指我馆篡改历史。现在又捏造谎言,向省领导部门多方发函肆意对我馆进行诬蔑和攻击。这一连串的事件,已经完全超出了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范畴。我们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四、孙中山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我国博物馆系统对外较有影响的单位之一,它是收藏孙中山有关文物、研究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专题博物馆。本馆的工作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各级领导、有关专家及广大观众的充分肯定。本馆多年保持着中山市文明单位的荣誉,并多次被广东省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授予荣誉称号。最近,继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后,又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统战部门在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把它视为重要的阵地,宣传部门也把它视为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我们认为,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捏造谎言,公开发表或到处传播诬指我馆伪造文物、篡改历史的言论,将会严重地损害我馆的声誉,损害我国博物馆的形象,损害统一战线工作。

“来信”散发到了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请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阅处，张磊等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四位专家给省委作了答复。在本文发出之前，我们收到了这四位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联合签署的《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几点意见》(见附件二)。我们把它作为本文的附件，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转呈省委统战部，并作为我馆对潘汝瑶、何国华两位先生的答复。

附件一：1990 年 4 月 28 日我馆给中山市文化局答复潘汝瑶来信指我馆篡改历史的函

附件二：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几点意见》

翠亨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1995 年 10 月 8 日

附件一:1990年我馆给市文化局答复潘汝瑶指我馆篡改历史的函

中山市文化局:

4月26日转来中山大学经济系潘汝瑶指孙中山故居陈列馆利用职权篡改历史给省文化厅厅长的信(复印件)收到,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孙中山故居陈列馆的基本陈列是在省文化厅文物处、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主持下,我馆经过两年的时间筹备展出的。其陈列大纲在修改过程中四易其稿,并印发有关单位及部分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国家文物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协助审定陈列大纲,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最后由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署名定稿。86年9月底陈列布展完成后至86年11月11日的预展期间,再次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山市委、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宣传部、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孙中山的部分亲属等有关单位及人员对陈列进行了审查;国家文物局、省文管会、省文化厅的同志对陈列进行了审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主办的、代表了孙中山研究最高水平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国内外一百多位专家,对陈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陈列正式展出近四年来,接待了海内外观众约二百五十万人次,其中包括中央及各级首长、各界知名人士、海内外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及博物馆同行和孙中山的部分亲属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陈列从内容到形

式都是比较好的。潘汝瑶先生指责我馆利用职权篡改历史，是极不严肃的，是我馆无法接受的。

二、潘先生来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有些是没有根据（或不足为据）的，有些提法是错误的。我们相信，这只是潘先生的一些误解而已，绝非有意混淆。也许潘先生是搞经济学教学的，对历史方面有些问题不甚了解，请潘先生就近向本校历史系及孙中山研究所的同志咨询。

三、潘先生的来信，似乎反映了当前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某种倾向，在此顺便提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我们认为，对孙中山祖籍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研究和探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孙中山研究的一个较次要的问题。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和他六代之前的祖先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孙中山的远祖何在，丝毫不影响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更无实际意义。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偏向：故意扩大对此问题的渲染；对一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无理指责；要求领导题词、表态来作为某种结论的依据；散布有人篡改历史、伪造历史证据的极不负责任的言论……，似乎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是一种不可取的态度。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原则，防止步入封建血统论的歧途。通过行政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也是不妥当的。

2、我们希望，真正有志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人士，不要忽略到中山市的翠亨村及其周围做一些深入细致地调查，客观地、不要带有偏见地了解一些情况，冷静地分析一些史料，从当时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实际出发，综合各种历史证据、民间的口碑材料、风俗习惯以及现在还居住在孙中山先生家乡的孙氏族人对其祖籍问题的意见来研究一些问题（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同志已经

这样做了)。不要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撇开问题的主流方面,只是纠缠于某些历史资料本身的不足之处大做文章;或者根据某人怎样说来作为历史结论,正如孙中山曾宣誓他1870年出生在檀香山而我们却不这么认为一样。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转呈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及各位副厅长和省文化厅文物处,并答复中山大学经济系潘汝瑶先生。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1990年4月28日

附件二: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几点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日前,张磊收到于幼军部长批转阅处的中大教师潘汝瑶和华师大教师何国华的来信;宣传部又转下《信访摘报》粤信摘〔1995〕9号《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领导篡改孙中山祖籍》一文。我们就此事交换了意见。下面,谨提出几点看法,供宣传部和有关领导同志参考:

(一)、关于翠亨孙氏的祖籍,孙中山本人没有留下明确的表述。30年代,国民党的史政机构根据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的口述及翠亨《孙氏家谱》,在著述中提及孙中山祖籍时采"东莞说";1942年,学者罗香林放弃自己赞成过的"东莞说",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中提出孙中山先世于清初从紫金辗转移居香山,这种意见可称为"紫金说"。罗著出版后,"紫金说"被国民党的史政机构接受,但几十年一直有学者持批评意见。在孙中山的家族成员中,对祖籍也有不同意见,孙科曾为罗著写序,承认过"紫金说",但事后又曾为东莞上沙题写"国父先代故乡",也承认"东莞说"。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及次子孙治强近年作过承认"紫金说"的表示。孙中山的胞兄孙眉的后人孙满等则只承认东莞为祖籍,坚决拒绝承认紫金。1992年孙满兄弟在中山市、中山大学都明确表示过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学术界,或是在孙中山族人中,孙中山祖籍在何处一直存在争议,"紫金说"从未成为定论。1985年,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第三次增订重版《国父年谱》,虽仍采"紫金说",但在注中说明了学者和孙中山亲属孙满等人的不同意见。在我国内地,几十年来,有

人接受“紫金说”,也有人撰文批评此说而主张“东莞说”。

(二)、孙中山家世数代都是贫苦农民,留下家谱资料很不完备,这是引起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存的翠亨《孙氏家谱》,有不少矛盾之处,而孙中山上世世系至今仍未能一一考证清楚。但据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留下的一批契据、账册,又据解放以来史学工作者对翠亨附近的文物、史迹、坟墓等的调查,可以确定,翠亨孙氏在明代已住在香山,并非清代才从紫金迁来。迄今为止,在中山翠亨还未发现过一件文物可以证明翠亨孙氏与紫金有关系,证明翠亨孙氏与紫金无关的文物资料却有多件;而罗香林提出的“紫金说”的证据,只是一种推测或假说;无论从年代、地理、还是从家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婚姻来看,紫金的《孙氏家谱》都不可能与翠亨孙氏家族的谱牒发生联系。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东莞说”还有一些有待充分说明的地方,而“紫金说”则较为明显的缺乏根据。

(三)、从50年代以来,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一直与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据我们所知,以往并没有展出过所谓“孙中山祖籍在紫金”的陈列品,也不保有这样的文物。相反,一直展出证明孙中山祖籍并非紫金的一些契据、账册等文物。1986年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调整陈列内容,事前曾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并经上级文管部门和中山市党、政领导部门的审查。陈列大纲经反复多次修改,方才定稿。有关孙中山家世的内容,主要是突出展示孙中山家庭成员遗下的文物,并根据这些文物指出孙中山祖籍东莞。陈列内容有所完善,而无所谓“篡改”。1986年和1990年,在中山市翠亨举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研究孙中山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与会的中外学者大都对孙中山故居的保护、建设和陈列的科学性表示赞赏。

(四)、我们认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事业和精神,主要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他的历史功绩和思想。如果说作为孙中山的故乡——翠亨的社会状况在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实践中曾留下了一些痕迹和影响;那么,则没有必要过于注意他迁居翠亨多代以前的祖籍。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不妨由感兴趣的学者各自发表学术论文,遵循学术界公认的规范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论据,阐明自己的观点。只要在学术上有充分的根据和科学的阐述,一定可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解与接受。采用非学术的方法去对待这个学术问题,无益于真理的探求。前些年,曾有紫金地区的同志请求林若同志为当地有关"祖籍"的建筑题词,当时,张磊根据林若同志的批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对题词最好慎重。现在,我们仍坚持这种意见和作法。

(五)、中山市孙中山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纪念馆在宣传和纪念孙中山、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海内外获得好评。它的各项工作,肯定还有需待改进之处,但伪造文物、篡改历史的事从未发生,因为这是文博工作所不允许的。我们还注意到,有些人不仅在给领导的信中无根据地指责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而且通过发表文章、寄发印刷品等方式传播这些说法。这就很容易使海内外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士对中山市乃至我国纪念孙中山、文物保护等事业产生误解和怀疑,造成消极影响。在此,也提请有关部门以及中山市予以关注。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公章)
名誉会长:陈锡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
会　　长:张　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副 会 长:黄　彦(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
孙中山基金会秘书长)
林家有(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教授)

1995 年 10 月 6 日

后 记

翠亨是孙中山的诞生地。但关于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还是“紫金”、“孙中山是不是客家人”等问题，尚存有不同看法。为了客观反映在这方面研究的不同意见，我们把有关史料、论著汇集成册。

这本书的内容大致分为“资料”与“研究论著”两部分。资料部分，收录了“东莞”、“紫金”两说所依据的家谱等家族文物以及其他文献、调查访问记录等资料。某些资料，有人可能会认为与孙中山的家世并无关系，因为有学者在论著中引用为论据，故予以收录。研究论著部分，主要收录“东莞”、“紫金”两说有代表性的论著，注意不偏于收录代表某一方观点的文章。为维持发表时的原貌，所收录内容除个别史料作一些校勘外，其他文件均原文照录（即使是明显的错字也未作改动）。所有资料、论著原则上按发表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希望这样可以反映有关孙中山家世源流争论的由来与发展。主要的文物资料制成图版，置于书前。所收录的资料及论著，均在每篇正文首页用题注注明来源与出处。对所收录的内容，我们作了一些简单的注释，原则上不作带倾向性的评论。本馆在职人员特别是参与编辑此书人员的研究文章没有收录。总之，我们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尽量客观、全面地反映“东莞”、“紫金”两说的观点，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士提供一本真正有参考价值的书。

由于篇幅所限，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论著难以全部收录。有些论著（如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因为篇幅太长，而

且在大图书馆不难找到，我们就采取选录的办法，只录研究家世源流的部分，如果读者要了解全部内容，可以查阅原书。有的学者近年写了不少研究孙中山家世的论文，我们只选取其与其他学者讨论的文章，其他的就没有收录了。本书所收录的内容和一些尚未收入本书的相关资料，并非为编辑此书临时收集所得，而是本馆人员长期研究、不断积累的结果。由于各种原因，也许还会有一些重要资料和论著是我们未能掌握的，希望海内外的学者以及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提供线索。

也许有读者会问，作为编者，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意见和观点如何？一些参观孙中山故居的人士也会向我们提出此类问题。

由于在孙中山先生的家乡的缘故，建馆45年来本馆业务人员注意收集有关资料，研究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山（古称香山）翠亨孙氏的祖先来自东莞。

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部分内容有损本馆名誉，为保持客观和文章原貌，我们还是原文照录。为此，我们在附录中发表了本馆1995年的一份函件，在表明我们的意见和观点的同时，也作为我们对有关问题所作的必要的澄清和说明。

长期以来，本馆的业务工作得到了有关史学研究机构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本书的编辑工作也得到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和孙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以及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孙中山先生亲属的支持和帮助。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复制

惠赠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及资料。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年届90高龄的陈锡祺教授对本书的编纂予以鼓励鞭策，并惠赐序言。在此谨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

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徐惟诚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吕建华和朱杰军主任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所给予的支持及帮助。

为编纂本书，本馆人员也付出了努力。萧润君馆长提出编纂本书，制定了指导原则，主持编辑和讨论书稿的工作会议，审阅了书稿并调整补充了部分内容；邹佩丛完成了全书大部分内容的收集、分类、选编、注释和校对工作；张咏梅参与了资料的收集、电脑录入与校对；黄健敏参与了注释和校对的后期工作；肖艳红等同事参与了电脑录入、打印等相关工作。

限于水平和条件，本书可能会有很多不足和纰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论著涉及作者甚多。由于多种困难，我们难与作者一一联系。有关样书及稿酬事宜，恳请作者与我们联系。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2001年11月